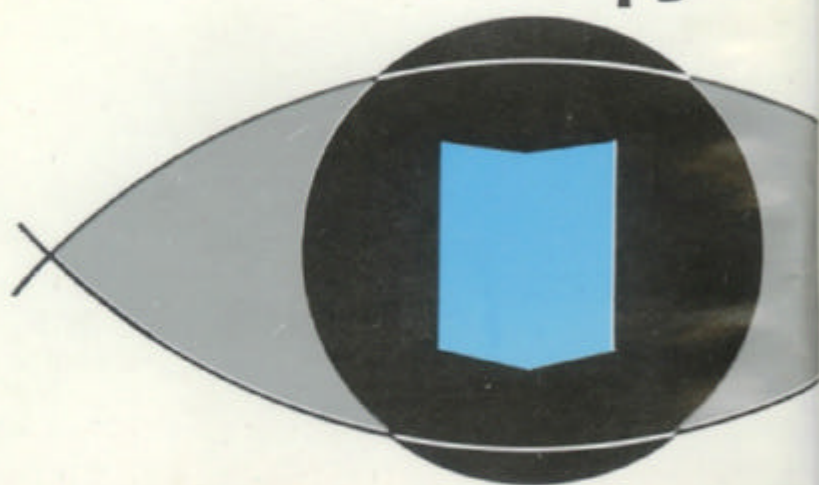


主 编 任慧英  
副主编 唐一民 曹 旭

# 辽版图书



LIAOBANTUSHUPINGLUNJI  
TUSHUPINGLUNJI

# 评论

LIAO  
BAN

# 集

辽版图书评论集  
辽版图书评论集

## 武 库 精 华

——评《中国兵书集成》（一）

许保林

我国最大的兵书丛书《中国兵书集成》首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之际，与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对古代兵书的研究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对于繁荣我国科学文化、军事学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兵书源远流长，萌芽于殷商，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历代著述不辍；卷帙浩繁，仅见诸史籍记载的就有两三千种，近万卷；种类繁多，有论述战略战术的“兵法”、军事制度的“兵制”、武器装备的“兵器”、海边防和军事地形的“军事地理”、兵马粮草供给的“军事后勤”，以及综合性兵书、军事丛书等类型；内容丰富，既讲军事，又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哲学、史学、文学、科技、交通等诸多方面，如被誉为古代军事百科的《武备志》，所记载的《郑和航海图》、《过洋牵星图》等罕见的珍贵史料，就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影响深远，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育了众多的军事名家和将帅，而且有些兵书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并逐渐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直至今日的热核时代，中外军事家乃至管理学家、企业家等仍在从中汲取营养。它是一座伟大的宝库，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对兵书的搜集整理。早在西汉王朝开国之初，汉高祖刘邦就命大军事家张良、韩信搜集整理兵书，共搜集到 182 家，从中选出他们认为尚有实用价值的 53 家，以供刊布，开创了政府组织整理兵书的先河，后代帝王相继仿效。但是，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为富国强兵、巩固统治而整理兵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群众掌握兵书起来造反。所以，在整理兵书的同时，又对兵书实行禁毁，如宋朝曾命郭固校兵书，但校而不刊，“秘而不与大臣”。清乾隆则“寓禁于征”，《武备志》等重要兵书都遭到禁毁，所以，在旧时代，兵书是不可能得到科学整理的。

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军事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建国以后，兵书整理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中止。当前，为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科学，很需要继承和借鉴古代的优秀军事遗产。因此，编辑囊括古代兵书精华的《中国兵书集成》，是时代的要求，是加速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国兵书集成》是我国有史以来部头最大的一部兵书丛书。我国兵书丛书以《武经七书》为代表，它只收录七部兵书。之后，历代都有兵书丛书问世，但都收书不多。收书较多的《韬略世法》、《帷幄全书》只有十几种，就连台湾李浴日辑的《中国兵学大系》也只有 30 种。而《中国兵书集成》拟选录 200 部有代表性的兵书，编为 30 卷，装订 50 册，约计 100 万字。其规模甚为壮观。

《中国兵书集成》拟收录古代兵书的各种类型。从内容上分，包括军事思想、兵法（战略战术）、兵略（用兵方略）、阵法阵图、兵制、军队建设与训练、兵器、军事地理（边防、海防、江防）、军队后勤、名将传略、军事天文和气象等。从体裁上分，有论文体、语录体、记叙体、注疏体、辑评体、汇编体等。从书籍形式上分，有综合性兵书、杂纂兵书、军事丛书、军

事类书等。甚至对兵书之外的诸子论兵篇章和综合性类书、政书等典籍中的兵法资料，也以附录和《中国兵书集成资料编》的形式予以收录。它堪称古代兵书大全。

古代兵书与其他古籍一样，也是鱼龙混杂、瑕瑜互见的。《中国兵书集成》有一定的收录范围和原则，在对庞杂的兵书进行认真研究、鉴别优劣的基础上，选精拔粹，剔除了那些整部书毫无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专为诬蔑攻击农民起义为能事的反动兵书，如《青溪弄兵录》等；阴阳杂占类中纯粹宣扬荒诞迷信的兵书，如《白猿经》等；专事抄录，与前代兵书内容完全重复的兵书，如《决胜纲目》等。全书以闻名中外的《孙子兵法》开卷，集中了历代兵书精华，如先秦的《吴子》、《司马法》、《孙臆兵法》、《尉缭子》、《六韬》，汉代的《三路》，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宋代的《武经总要》、《虎铃经》、《守城录》，明代的《续武经总要》、《投笔肤谈》、《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清代的《洪瀝百金方》、《治平胜算全书》、《戊笈谈兵》等，共 200 部左右。

在版本的选择方面，《中国兵书集成》及择善而从为基本原则，即在“早”中选“好”，或在“好”中选“早”。它在凡例中规定：在刊印时间较早的版本中选择书品好、字迹清楚的版本为底本；但不单纯追求祖本，也注意选用刊印时间虽晚而校勘写刻俱佳的版本；同时又注意选择长期被埋没而面临失传的稿本或精抄本。如已经出版的第一册，共收录先秦兵书和诸子论兵篇章 19 种，其中 4 种以新出土的汉代帛书、竹简本为底本，13 种以宋本或影宋本为底本，都是现存兵书最早的版本。有的兵书由于官方禁毁，书商做伪，使其版本发生复杂流变，稍有不慎，就会选进劣本，漏掉善本。本书编辑者为选善汰劣，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如茅元仪的《武备志》，由于在清代遭到禁毁，明刻本已很罕见。而清刻本又隐去刻书者姓氏和刻书年代，致使许多藏书单位误将清本著录为明本。就连台湾华世出版社 1984 年新影印的《武备志》也是以经过篡改挖补的清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的。一度有人怀疑真正的明刻明印本可能不复存在。本书编辑者经过对全国 10 余座大图书馆的调查，将现存各种版本进行校核、考证，弄清了《武备志》的版本源流，访到了三部明刻明印本。本书将以真正的明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这样做，不仅在内容上较好地保存了兵书的原貌，而且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刻本、活字本、抄本兵书的书籍风貌，为校勘、版本乃至版刻书法艺术等研究者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教材。

《中国兵书集成》以时代先后为序进行编排。这样可以通过本书窥探历代现存兵书的概貌；同时也便于研究断代军事史的人阅读和保存兵书资料。在对伪托兵书的编次上，以往丛书大都以旧题为据。但有些兵书伪托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撰述，若把它放在上古时代，那是很荒唐的。本书对伪托之作虽不作考证，但注意吸收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凡学术界有考证的，按考证结论编次；对于确无研究成果而又不便断代的伪托兵书，则按原书旧题或因袭传统说法编次，客观反映目前对伪托兵书研究的现状。先秦诸子中包含有丰富的兵法资料，其中的《管子》、《荀子》、《墨子》等 10 家在汉代曾被任宏收入《七略·兵书略》，但它们不是独立的兵书。本书把它们作为先秦兵书的重要补充，以附录的形式刊出，无疑能更全面地反映先秦一代的兵学思想。如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有 300 卷之多，分为 30 个大部类，部类下又细分若干个子类，辑录了军事上各个方面的资料。本书既保证了整套

丛书体系完整，井然有序，又增加了本书的信息量和实用价值。

《中国兵书集成》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对《握奇经》的编次就缺乏根据。学术界一般认为《握奇经》成书于唐代，本书虽然纠正了原题风后撰的荒唐说法，但将其排在《六韬》之后，《三略》之前，书前又未说明依据，容易使读者产生疑惑。但瑕不掩瑜，它不会影响这部大型兵学丛书的价值。

（原载 1987 年 8 月 6 日《光明日报》）

《中国兵书集成》（一），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 1987 年 8 月联合出版，定价 35.00 元。

## 评《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

沈泉水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一书，是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陈振羽同志积累二十多年教学与科研成果的力作，其中许多篇曾在《中国经济问题》、《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获得过专家、读者的好评。现在全书出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将提供比专题更为系统的参考价值。

乍一看来，本书的体系结构似乎已经出现在其他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中，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传统的，似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然而，读完全书，令人觉得本书是旧题新做，有不少独到的新见解。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突破了以年代为顺序的研究体系，以全新的布局展开阐述。它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形态为中心，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为线索，全面地考察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如何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而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在《资本论》研究方面，本书重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从批判和继承的角度去探讨《资本论》的历史观、研究方法以及它的理论体系是如何通过对前人的有关论述加以批判和变革中创立起来的，比较充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变革。本书所持的固然是传统观点，认为劳务价值论等是误解或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笔者尽管不完全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能从新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的上述三大理论，对劳务价值论等观点展开了较有力量的新的论争，提出了较有份量的论据。例如，书中从丰富的资料考证得出：把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混同起来，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和西斯蒙第以及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的错误，受到过马克思的批判；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序上把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区别开来，受到过马克思的肯定。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仅仅是商品价值实现的条件，才是马克思的原意。本书指出：按照布阿吉尔贝尔等人关于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需要分配于各生产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势必得出与劳动价值规律相矛盾的结论：“如果某个生产部门分配到的劳动时间过多，过多的那一部分劳动的时间就不能够形成商品价值；反之，如果某一生产部门分配到劳动时间过少时，较少量的劳动形成较大量的商品价值。”

作者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力图澄清国内外学术界的许多不同观点。书中证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进行了最详细的考察”，但“斯密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两个定义相混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都接受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较为正确的定义”，即“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马克思“批判和改造了斯密等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认为与资本相交换并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是资本主义劳动的“决定意义的特征”。同时，马克思把生产物质产品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

劳动的“补充定义”。作者深入分析了斯密不了解生产劳动为何只能限于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原因在于他没有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其结果是使他得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把生产劳动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变革了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历史观，就能够把生产劳动严格地限于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范围内，这是马克思“能够建立完全科学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关键所在”。作者认为，有些同志误解或回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在于误解了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来源，更进一步的原因，是对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体系的理解有片面性，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论述存在着误解。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论在体系结构的编排上，还是在具体的论述上，马克思的观点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泾渭分明，令读者一目了然；第二，恰如其分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书中指出“那种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科学贡献评价过低，忽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的看法，固然不妥当，而那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评价过高，似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已经提出过或解决了的看法，也是不妥当的；第三，重视文化的继承性，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关系上。正如作者所说：“本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如何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改造，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本书最大缺憾是：较少涉及如何以正确的态度研究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作者对马克思正确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推崇备至，是极对的；但我们能否从中得到启示，在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也可得到一些可取的东西呢？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基本理论倾向是辩护的、庸俗的，但某些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管理出发立论的科学成份，还是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作者倘能在这方面展开一些阐述，那末旧题新做的现实意义就会更明显。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1988年第1期）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陈振羽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定价3.20元。

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新书  
——评《开放的世界——世界各类国家的对外开放》

郑忠祥

肖枫同志著的《开放的世界——世界各类国家的对外开放》一书，系统地介绍和展示了实行对外开放给世界各类国家带来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的提高和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开放搞得好，已步入“新兴工业国家”行列。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从别人成功的经验中看到我们的问题和不足，也可以从他们的教训中引以借鉴，少走弯路。它为我国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我们今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也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具体情况，在论述中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颇有见地的论点。例如，作者认为，过去在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或者孤立地和片面地去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经济科学中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样，也就无法解释目前国际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譬如，在当今世界谁善于推行对外开放，谁善于利用国际条件来为发展本国经济服务，谁的经济就发展得快。这些问题，如果单纯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去研究，是难以得到满意答案的。据此，作者大胆提出，必须超越生产关系的具体性质，从社会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性上去寻求答案。

又如，什么是开放的世界呢？作者认为：一是指世界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向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等进入了国际交流。一国的社会再生产不仅要以世界市场为背景，而且要以国际交流和合作为条件，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了开放式的经济循环体系，即国家的经济计划、经济比例、经济平衡和日常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全过程，不能只考虑国内条件和因素，还必须考虑国际条件和因素。”二是指世界各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过去各国政策的重点着眼于国内经济，而不大重视预测世界经济趋势并把它的变化作为机会来加以利用；现在为发展本国经济则必须考虑如何扩大对外经济关系，让本国商品更多进入国际市场，同时让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各种资源能更多地进来，以便促进本国经济更快的发展”。

（原载 1988 年 6 月 1 日《新闻出版报》）

《开放的世界——世界各类国家的对外开放》肖枫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定价 3.25 元。

## 一部学习作风建设知识的好读物

陆年华

作风建设历来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内外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汤光伍主编的《党风知识手册》以党章、“准则”等党内基本规定和党中央关于作风建设的方针、原则、决定为依据，对有关党风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和回答，是迄今为止内容比较全面的一部党风知识专著。

本书紧紧围绕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党风党纪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例及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使人们能够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党风的形成、涵义及内容。

该书 478 个条目，分为党风的形成和涵义及内容、党的历史上有关党风的部分文献和史实、党风在党的建设体系中的若干关系、党风现状分析及思考、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部分事例及处理违法违纪案件部分事例等十二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的建设史中有重大影响或作用的政策、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叙述和阐释，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画卷较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风问题能够有更多和更深刻地了解，可以深刻地受到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书中叙述了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其中着重阐述了党风的概念、内容及其在不同时期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问题。本书还分析了目前党风的现状，介绍了用党性规范自己行动、默默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奉献的一大批党的好儿女，同时也鞭挞了那些丢掉共产党人的品质、情操，背离党的原则、纪律，在糖弹面前倒下去的腐败变质分子。书中较好地引导党员如何理解持久地抓作风建设与增强纠正不正之风紧迫感的关系和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时需要克服哪些思想障碍，以及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应着重抓好哪些环节等问题。本书认为，要使从严治党落到实处，首先必须把好党员质量关，搞好经常性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其次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对违法乱纪者坚决查究；再次狠抓领导层，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教育全体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总之，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并且易于查阅，是广大党员、干部了解学习党风知识的较好教材。

（原载 1990 年 3 月 9 日《光明日报》）

《党风知识手册》汤光伍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定价 10.20 元。



## 青年生活的向导

——评介“当代思想教育艺术丛书”

李 洋

由李永田、汤光伍、胡相峰同志主编的“当代思想教育艺术丛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为丛书题词：“忠于马克思主义，献身于中国人民，为人类的思想解放而奋斗！”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为丛书撰写了序言。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这不仅对编者是个肯定和鼓励，也扩大了丛书的影响，说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精选了近年来思想教育方面的优秀成果，对思想教育这门特殊的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进行人生观教育的优秀教科书，适合青年朋友和从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同志阅读。

该书的特点是：它首先把思想教育这种工作作为一种教育人成长的特殊艺术，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它在我党的思想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思想教育艺术学这个概念，认为它是吸取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演讲学、文艺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由此可见编者的见识、眼光和科学的开拓精神。它充分认识到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格的力量，从而通过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和形式，对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受到启迪、感染和影响，自觉地接受和追求真理，培养科学、健康的人生观，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

其次，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善于通过撰稿人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鼓舞读者追求真理，培养信念，渴求知识，正确地对待社会和生活，在困难面前永远不低头，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和集体的一分子。书中的撰稿者都是现实生活中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强者，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年龄也悬殊很大，现实的困扰和命运的挑战使他们各有特殊的境遇和特殊的感受。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不同的人生图画，特别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经验概括，会使你震动，推动你奋发。而与青年朋友的对话和通信，又直接地表明了他们对现实的看法和想法，读后你会理解。限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它不可能是万事俱答的天师，但却实实在在地探讨了诸如国家、民族、政治、伦理、思想、文化、婚姻、家庭、灾难、幸运、死亡等各种问题，恳切地引导你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生活、学习和工作，鼓舞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高攀真理的火把向前、向前！据此，我以为它比“文革”前的《青年修养十二讲》更丰富、更全面、更系统。

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或者说全社会都空前活跃，对于打破“左”的桎梏，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放松了党的建设，忽略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致使在整个社会风气不令人满意的大气候下，有些青年的思想也产生了空前的混乱，尤为严重的是，对人生缺少健康科学的看法，对他人、集体、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淡薄了；或者产生社会难以承受的愤激情绪，使个人、家庭、集体和国家都蒙受了损失。在此情况下，加强和提高政治思想工作及其水平，帮助青年们正确科学地认识社会和人生，也就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当代思想教育艺术丛书”既是对以往

思想教育成果的一次选择和检阅，也是对思想教育这门特殊艺术和科学进一步研究和提高的开始。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青年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和情操、意志的培养，将会起有益的作用。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4期）

“当代思想教育艺术丛书”李永田、汤光伍、胡相峰主编，白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包括：《思想教育对话撷英》刘吉等著，定价5.50元；《思想教育演讲集粹》李燕等著，定价5.10元。

# 一部颇具特色的比较宪法学专著 ——评张光博《比较宪法纲要》

## 章 文

吉林大学张光博教授所著《比较宪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颇具学术特色。

### 一、研究对象设计方面的特色

宪法为资产阶级所发明，比较宪法由资产阶级学者所首创。早期的比较宪法学只能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之间进行比较。自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后，开始有了包括社会主义宪法在内的比较宪法学。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比较宪法学著作就包括了两种类型的宪法比较。但是，由于受其阶级偏见的制约，他们往往从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为中轴或参考系，来论证和炫耀其宪法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优越性，歪曲社会主义宪法的真相，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宪政的现实和前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比较宪法学起步较晚，是最近10年的事情，缺点在所难免。其中最大的缺点是比较宪法学仍限于资本主义宪法内部的国别比较研究。虽然有的著作把社会主义宪法列入了比较研究的对象，但由于比较时采取了简单对照方法，客观上仍然是以资本主义宪法为主，起着渲染资本主义宪法的作用。

《纲要》针对上述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偏见和政治取向，以及我国比较宪法学研究中的缺点，强调我国的比较宪法学应当以社会主义宪法，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为中心，在与世界各国宪法主要是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比较中，认识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在宪法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两种宪法、特别是两种宪法所反映和维护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和对立；说明两种社会制度，主要是两种政治制度的优劣，以便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显示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实质、科学内容和进步程度，推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完善。为此，作者把比较宪法学解释为“研究并揭示各国宪法的异同优劣，从而深化对宪法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以期达到借鉴目的的一门比较法学”。

### 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

比较研究是一种方法。把它放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取得不同的效果。《纲要》的作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作者指出：我们的比较宪法学之所以自信能够达到科学的认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它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提供了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及实际情况的价值评判标准。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帅比较研究，《纲要》自始至终坚持如下观点和方法：

1.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各国宪法的类别归属和异同优劣，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因此，各国宪法的比较，只有深入到社会物质生

活条件中去，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无论是对各国宪法进行横向比较，还是对同一类型宪法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或是对宪法运行过程和实施情况的比较，《纲要》都是从对宪法条文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实际联系的分析入手，因此，才得以揭示出不同宪法的本质区别，宪法变迁、更替的动力，制约宪法实施的根本原因。

2. 阶级分析方法。国家和法是经济关系的记录，也是阶级关系的记录。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国家和法的基本方法，也是对宪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纲要》在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时，不是简单地比较宪法的体系、结构、条文及其语义，而是首先看它被组织在哪个阶级的统治秩序中，实现着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任务。也就是说，首先要进行定性分析，然后再作定量分析。在对宪法的发展变化、不同阶级属性的宪法的更替进行比较研究时，《纲要》比较好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指出，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如宪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宪法自身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宪法被社会主义宪法所代替，社会主义宪法的发展变化，莫不是由每一时期社会上阶级力量的对比所推动的。宪法条文能否落实，宪法以什么形式实现其作用，也要到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中去找答案。

鉴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曾被“左”的思潮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又被右的思潮歪曲和诋毁，因此必须强调弄清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真谛和阶级性的科学含义。作者指出，阶级性的科学含义不过是指当今社会和国家的事务都要有一定的阶级来代表和主持，因而其中必然渗透着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它所代表的发展方向。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把这个真相暴露出来，划清大是大非。

3. 整体性或系统论的方法。任何事物，当然包括宪法在内，不仅其自身是一个由要素构成的系统，而且必然作为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这种认识和方法出发，《纲要》在对宪法的条文、单项制度进行比较时，始终把它们作为整个宪法的要素对待，并把它们同宪法的根源、性质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对一国宪法整体，则把它放在法律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大系统中，并作为互相联系、影响、渗透的世界宪法群的个体来研究。

### 三、理论基础和观念模式的特色

《纲要》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法理学和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并主张和倡导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法观念模式和分析结构。作者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在对宪法进行宏观比较还是微观比较时，作者都能够较好地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和宪法的理论，从而使各种问题的分析起点高、视野宽，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触及社会思潮的热点和读者的思想深层。

《纲要》的成功也得力于作者提出的权利义务的观点。80年代初，《纲要》作者就提出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问题，在以后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和论著中对这一观点作了步步深入的阐述，并主张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基本范畴来观察、认知、思考法律现象。《纲要》纯熟地运用了权利义务的范畴。在作者看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好，阶级关系也好，在宪法中都表现为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规定或权利义务关系。宪法学所研究的主要就是民主制国家阶

级、民族、政党、国家机关以及公民的根本性权利和义务，研究国家机关职权和公民权利的相互保障和制约的机制。通过这种研究，认识并促进政治生活平衡的实现和政治发展。权利义务范畴的运用，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不同宪法的本体属性、价值属性、内在联系及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式。这种效果是其他观念模式和分析框架，如“规则模式”、“阶级斗争模式”，所很难达到的。

此外，本书在结构体系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就不详述了。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如虽然作者多次提出要在各国宪法的比较中吸收营养滋补和发展自己，但这方面的具体分析和论述尚嫌简略。某些观点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如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与代议制的划分，把人代会排除在代议制之外的观点，是否妥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究属国体或是政体范畴，还是既是国体又是政体？等等。再则，某些内容和文字也有重复之处。

（原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比较宪法纲要》张光博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定价8.00元。

## 评《贞操论》

刘尊利

自从保加利亚伦理学家瓦西列夫的《情爱论》中译本畅销我国社会以来，笔者就希望中国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能像《情爱论》那样富有哲理性和系统性，就希望中国的通俗政治伦理书籍能像《情爱论》那样寓于广博的知识性和生动的趣味性之中。笔者终于读到了我国作者著述的、可以与《情爱论》相媲美的图书——《贞操论》。

把贞操问题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和考察，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揭示出贞操历史演变过程和本质属性，以及贞操的异化和社会影响，在我国尚属填补空白之作。

贞操观念和行为是人类社会一种传统的历史文化现象。揭示和研究贞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属性，是《贞操论》的首要课题之一。任何历史文化现象，都可以从一定的社会生产找出根源。涉及人类两性关系的贞操观念的萌生，也是一定社会生产和社会家庭生活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贞操论》认为“贞操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虽然在对偶婚制的时候已经萌芽，但是它真正成为一种社会伦理和观念，却是父权制个体家庭取代了女性仍占主导地位的对偶家庭的时候，成为维护父权制个体家庭制度的一种重要工具”。最为精采的是该书作者在概括阐述了贞操的四大历史性功绩和两种负面作用之后，提出这样一个认识：贞操观念如同一把神奇的双刃利刀，起着自相矛盾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把性关系规范于一夫一妻之间，从而促进了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巩固，另一方面它又毫不留情地以婚聘结成的夫妻关系扼杀了人类的自由性爱，把女性变成了男权个体家庭的奴隶。可以看出《贞操论》把贞操观念置于促进或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平衡器上，较为深刻、准确地把握着贞操观念的本质属性。

贞操观念和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内容，有着自身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贞操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循着贞操观念和行为的轨迹，客观地探讨和研究了贞操观念自身运动的规律性。该书“贞操的流变”、“贞操的异化”等部分，对贞操观念运动的规律性作了相对集中的探讨。这种探讨既有客观性的历史演变形态的勾勒，又有微观性的社会具体形态的描画。还有一些较为深沉的理性分析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俗画面。可以毫无愧言地说，围绕着贞操观念和行为，《贞操论》展示出了人类社会性观念的发展线索和性认识进程的历史，以及性观念的民族差异史。该书是一部关于贞操问题的性伦理学专著，也是一部研究人类性观念、性行为的历史学书籍，还可以说是一部妙趣横生的社会民俗学读物。

性观念和性行为的理论研究，属于性社会学的范畴，在我国，这门学科的研究尚属起步。《贞操论》以贞操问题为轴心，对性观念和性行为的研究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这次尝试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起码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其一，贞操行为是否可以泛化。贞操作为一种行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从狭义上说，确指女子不失身或者说把第一次性关系限定在特定的一男一女之间；从宽泛一点的角度上说，“从一而终”的操守也沾点边儿。但是，“贞操”行为与“贞节”行为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限定于男女性关系

范围的行为，后者则是包括性关系在内的女性一切社会活动的行为。比如，“三从四德”、“烈女”一类的内容，属于女性封建性“贞节”行为，但不能笼统地归属于“贞操”行为。贞操行为是两性间性行为的内容之一，却不是两性间性行为的全部内容。虽然，贞操行为曾被封建统治阶级无限扩大为女性人生观的范畴，但不能因此就把两性关系的其他内容与贞操行为相联系。贞操行为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也只能限定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不能无限制地泛化。

其二，贞操观念是否应该淡化。贞操观念和行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自然进展过程。贞操观念是男权制个体家庭的巩固和发展的产物，也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男性奴役女性是与阶级的产生同时并存的，男权制个体家庭之所以受到以往剥削统治阶级的维护和重视，显然与其阶级压迫、阶级统治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从法律上和社会道德上彻底打碎了男权制个体家庭，建立起反映出同志式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男女平等的新型家庭。在社会主义的新型家庭关系中，贞操观念和行为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或者说，社会主义新型的体现男女平等关系的性行为，已经代替了以贞操观念为主体的男女间性行为，贞操观念和行为已经完成了维护男权制个体家庭的历史使命。尽管在我国，由于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有相当的影响，业已形成的民族性传统习俗还有相当的力量，社会主义新型家庭男女性关系的规范还不完备，贞操观念和行为还有其存在的现实社会性，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中还必须保护贞操观念和行为。

其三，贞操规范是否能够为现实服务。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精华，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继承和发扬。贞操观念和行为作为剥削阶级压迫和歧视女性的伦理规范，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和社会价值，能否为现实服务呢？在近年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性自由”等伦理观念的泛化，由于某些封建主义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复活，社会家庭生活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有的同志从善意的思维角度，重提强化贞操观念，并且把贞操行为从女性扩展到男性，以此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性自由”，以此作为男女性关系的伦理规范之一。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贞操规范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不能直接地为现实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的关于性道德、性行为的规范，是与人类自身性关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规范，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家庭内容相协调的规范，更是与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人生等各方面走向全面自由相适应的规范。封建性的贞操规范与资产阶级的“性自由”一样，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家庭性伦理关系的内容，用贞操规范对付“性自由”，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2期）

《贞操论》王绍玺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定价6.50元。

## 一条信息渠道 ——评《当代西方社会学》

李晓晶

宋林飞著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一书，是我们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信息渠道。

当代西方社会最热门的社会科学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社会学在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科，它的“时髦”与“走俏”的实际价值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探索多种多样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对政府、企业与人们有用处；社会学者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的决策方面起着顾问作用。重要特点是把揭示社会问题做为西方社会学观察的重要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彼德·L·伯杰对此指出：暴露性、不体面性、相对性、世界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观察方式，并含有“看穿”社会结构外观的过程；各种揭露社会生活的内幕不是为了摧毁该社会，而把研究的重点与长处做为修葺补缀、延缓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与崩溃的改良方案，使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商界那些集团，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和社会的权力，进而有力量影响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政策。

《当代西方社会学》把帕森斯的系统功能主义，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霍曼斯的行为交换主义，布劳的结构交换主义，库利、米德、托马斯、莫雷诺的符号主义，布卢默、登津的符号互动主义，戈夫曼与伯克的拟剧分析框架，舒茨、加芬克尔的理解分析框架等有代表性的西方社会学者做了客观介绍；从方法、理论与应用上，对其观点、重要著作作了全面的论述。在体例编排、内容剪辑与评述中，既注意运用西方社会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富有新意；又在了解知识中，注重了解方法；挖掘西方社会学者研究问题的思路、技巧等方法论因素；起到了运用西方社会学者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些实例，增加实感与启发性的效果。

颇具特色的是：以理论为中轴，主要介绍概念框架，使人们对其狭意了解的同时，对西方社会学的方法理论与应用进行探讨；对“方法”侧重介绍，形成理论的有关方法；对“应用”着重介绍，探讨了现实社会的经验与假设性命题系统，这种命题系统属于广义的理论成分，即应用理论因素；把社会冲突理论放入应用性理论范畴，意在包容这种理论流派中的概念框架与形式命题，直接用于概括或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经验事件，给读者展示大量对西方社会现实现象的描述与解释。

由于西方社会学在纯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在实行社会价值观的一体化的同时，现代西方社会还流行“价值多元化”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不意味着容忍否定私有制、反对资本剥削等价值观念，只表示在维护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允许各种非基本的价值观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提倡与依靠基本价值观的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所为，是受资助制度的限制，自觉与不自觉地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一体化而履行职能。因而，西方社会的繁荣是以两极分化为代价的，资本这个“上帝”只偏爱富人，并不“拯救”穷人的“灵魂”。西方社会用扩大代价的方式来扩大成果，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没有任何革命的期望。西方社会学家的视野与研究中心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发展与解放



事业。

如今，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渠道——他们本国社会现实的某些客观记录与论述，分析其技术和经验材料，研究西方社会的结构，剥离出合理的东西和显著与隐蔽的社会趋势，来促进我国社会学的发展。

（原载《读书》1991年第2期）

《当代西方社会学》宋林飞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定价5.30元。

##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楚 天

中国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中国国情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中国国情报告》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具体、综合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了一幅比较清晰而且又有立体感的画面。

首先，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确立一种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及适度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二是依靠对生活资料的高度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中国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人口众多的国情特点，没有条件采用高度消耗能源的生产方式和高度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从能源状况看，1985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的22%，能源生产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8.4%，人均能源消费量为0.733吨标准煤，这不仅远低于欧、美、日等国，而且低于世界人均消费水平（1.85吨标准煤）。若按现代化方式所需人均能源消耗的最低界限标准1.35吨标准煤计算，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为13亿，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为17.55亿吨标准煤。若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5亿，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0.25亿吨标准煤，中国的能源供给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量。而世界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的现实使利用国际廉价资源的条件也丧失殆尽。因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资源组合方式方面作出新的选择，确立一种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及适度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例如，在饮食的生产和消费上确立和选择动植物平衡的方式，避免以动物食品为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自行车、良好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为主的居民交通运输体系，避免选择以普及小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体系；以较多的劳动力集约化的经营和管理农业，发展生态农业，避免石油型农业的生产方式等，此外，大力扩展、完善物资与资源的回收和重复利用，尽量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等等。

其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代之以持续、协调发展为主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传统现代化道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主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一些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种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的紧迫感使它们始终把经济增长和赶超发达国家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繁荣。但是，它同样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通货膨胀，严重失业，收入分配不均，人口膨胀，城市拥挤，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人性扭曲以及不断爆发战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许多学者都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称之为“一柄双刃剑”。人类享受它所赐予的恩惠时，同时付出了巨大而又痛苦的代价。现代的经济增长挖去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自然基础。中国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40年的历史中，有过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盲目赶超发达国家的沉痛教训。另外，中国在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困境和危机。因此，中国必须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采取一种新的注重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持续和

协调发展的战略，这里最重要的是注意控制人口，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解决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向；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控制总人口的规模，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不但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地保持，而且会严重破坏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其实，所谓现代化不仅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这种单一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它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因此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我们选择以持续、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其着眼点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它既注重经济发展，同时兼顾安全、健康、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相对均等以及自然环境治理保护等社会价值。

再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农业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之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靠牺牲农业、积累资金，支撑现代化事业的。现代化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停滞。中国是拥有 11 亿人口的大国，其中 8 亿多在农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0%。农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问题，要靠农业发展来解决。中国要用占世界 7% 的耕地解决占世界 22% 人口的吃饭问题本身就不轻松。因此，保持粮食的稳定增产，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条件并不优越。现实存在着的耕地急剧减少，土地肥力下降，基础建设不足，物质资金投入少的问题已危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在人口仍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到 2000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能达 5 千亿公斤，其发展的压力会是很大的。那时，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将不得不用大量宝贵外汇进口粮食，由此大大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无粮不稳”的问题。因此，大力发展、解决粮食供需矛盾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其次，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既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条件。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有 1.6 亿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将为现代化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释放出丰富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个深刻的历史变动，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事新的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资金来源和装备的技术水平问题，新的产业结构和产品方向问题，以及城市发展规模和城镇建设的问题。转移是历史趋势，然而，转移的速度、规模、方式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发展乡镇企业，推进乡村工业化，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人口转移的一个有效途径。据统计，现在中国有乡镇企业 1500 多万个，共吸纳了 20% 的农村劳动力（约有 7000 余万人），是实现农业人口转移的一条好路子。因此，这需从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考虑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技术改造及乡镇企业稳定发展问题，为顺利实现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此外，农业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而中国国内市场主要在农村。据统计，1985 年，农业生产资料零售总额达 503.6 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11.17%；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2517 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58.5%，可见，农村市场占

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因此，如果农业发展停滞，农民的收入不能稳定地提高，必然会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展，并由此影响现代化的建设。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以牺牲农业，积累资金，推进现代化的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必须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政治上、经济上，从眼前和长远，从农业在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中认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农业的投入，搞好农业的基础建设、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避免发生农业停滞现象，实现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此外，本书的作者还以十分严肃的口吻提醒国人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环顾世界，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当前世界各国的竞争中，最激烈的是科学竞争。据计算，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本世纪初大约占5%—20%，现在已达到大约50%—70%，有的国家已经达到大约60%—80%。现在，各大国及地区集团都在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制定实施自己发展高技术的计划。美国有“战略防御计划”，西欧有“尤里卡”计划和科研总规划，日本有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东欧有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才能在综合国力的竞赛中领先。中国是在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技术落后、管理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而发展教育和科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用非传统的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雄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只有具备了雄厚的智力资源的储备，才能高瞻远瞩，发展、采用和吸收新的技术。因此，中国最迫切的是要改变教育落后的局面，持续地超前地发展全民教育，哪怕为此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必要的；第二，从农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中国人均土地仅有1.5亩，粮田仅有一亩，这个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还伴随着新的危机：每年增添1500多万人口，耕地以每年数百万亩的速度递减。我国经过艰苦的努力，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达到传统耕作方式的极限，再往前走，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了。不然的话，就难以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难以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甚至更高的水平前进。第三，在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大，经济效益低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目前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将糟蹋资源，加剧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之际，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它的全部优势或后起效应就是及时抓住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迅速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技术上的差距，后来者居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外，中国是一个具有11亿人口的大国。庞大的人口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也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由负担转化为资源的关键条件在于普及教育和发展科技。因此，要有一种远大的战略眼光，始终把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来。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把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变为丰富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二、充分发挥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组织和配置资源及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作用。发达国家历史已证明，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欠发达的落后大国中国而言，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更为重要和突出：首先，中国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资金和社会资源短缺的困境。能否将社会有限的资金和社会资源动员起来，加以有效的配置，是事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中国过去现代化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集中、组织和有效配置资源。在中国集中、组织和配置资源的任务只能由强有力的政府来承担。其次，中国现代化过程从总体上说是从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转变的过程，是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过程。在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它要求政府在建立社会基础设施，发育市场，确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的指导、宏观协调和组织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如若不然，上述的转变和变革是不能顺利完成的。第三，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社会各个阶层心理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冲突和摩擦。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往往以十分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和不安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的历史经验已说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和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秩序混乱、暴力和社会动荡。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协调好各种集团（政党、军队、官僚、农民）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的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中实现，因此，很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作用，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四，解决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大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世界上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危机与困境：如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问题，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问题，粮食短缺问题，尖锐的民族矛盾问题等等。面对这一系列复杂和艰巨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素质好、政治协调能力、控制能力、应变能力较强的领导集团和政府是驾驭不了的。第五，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世界发展潮流。任何一个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然而，政治民主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逐步推进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既不能照搬欧美模式，也不能以激进方式推行。如果一定那样做的话，那将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实、稳妥而正确地选择是：依靠强大的中央政权，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民主政治的训练，不断创造实施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物质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首先在领导方式和决策方式上增加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分，完善人民对各级领导的监督、监察和弹劾制度，使民意、民情、民心能得到自由和及时的传达。随着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最终确立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理想民主政治制度。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在利用政府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历史上，中国具有利用政府力量进行社会整合、繁荣经济和文化的传统和经验；建国 40 年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凝聚力的并在推进现代化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民政府和政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既保持长期社会稳定，又大规模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独特的组织资源优势，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有利条件，应充分地加以开发利用。

三、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坚持建国以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时，应贯彻经济增长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很显然，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仅要根除饥馑、愚昧、贫困和失业，而且要自立于民族之林，因此，保持一个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机制，发展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无疑应该是它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中国在解决经济增长的同时，应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化和贫富悬殊，实现适度的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中国只注意经济增长，没有兼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会带来极坏的恶果：（1）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过大，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2）过份注意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也许会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但社会的总体进步意义不大。它只能使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经过改革完善的分配制度），实施适度公平分配的话，就会使全国人民普遍进入小康状态。况且，避免贫富悬殊，解决全国人民普遍富裕的问题，是一个事关现代化全局的大问题。

四、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中，借助国际势能实现。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它已不能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状态中，完全依靠内部因素的积累实现现代化了。就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资金短缺，技术、管理落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规模小是其现代化的主要困难和矛盾。因此，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加强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在对外开放方面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格局。今后，为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后起效应，应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积极正确地选择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全方位地扩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五、中国应在保持传统文化优秀特质和精华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的一切先进思想文化，实现文化的更新和创造性转换。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下推进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包括观念）信息不可避免地要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量涌入，由此构成强大的冲击和挑战。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原封不动地保存传统文化，实现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完全抛弃传统文化模仿引进西方文化同样是不可取。从日本等具有浓厚历史传统基础的东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看，文化变革的方式往往采取平缓、渐进的方式进行。而变革的途径往往是“利用传统走出传统”。在这里，浓厚的传统文化精华是它发展的基础，然后，通过对外国先进文化、知识的吸收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日本人更能积极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日本人那样在实现了现代化的时候又保持了那么多的传统。中国历五千年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变革的自然扬弃保留了很多积极而十分有价值的东西，表现了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世界面临着由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性扭曲等多种困境的情况下，博大精深、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强调奉献精神，公为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化自有它独特的光采和魅力。世界上

的许多哲人学者如汤恩比等由此将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身上。此外，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虽不能孕育现代文明，但并不等于说它不能接受和承载现代文明。相反，经过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思想，发生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化，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协调的发展，迎来一个安全、幸福、和谐的未来。

（原载《读书》杂志 1991 年第 2 期）

《中国国情报告》盛斌、冯仑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定价（平）17.00 元，（精）20.50 元。

## “国情调研热”的兴起和深入

李 靖

与改革头十年经济学界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地发出改革呐喊、设计改革方案相对比相媲美的是，近两年经济学界一些同志似乎悄悄而又扎实地兴起了“国情调研热”。一批学者、特别是一大批在改革头十年十分活跃的中青年学者转入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中去，从而也转入了更冷静、更深沉的理论思考中去。继《国情知识手册》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中国国情报告》。这是一本从较深理论层次研究国情的学术著作。

“国情调研热”兴起和深入的深刻背景。近代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及其政党和代表人物，总要重新面向现实、审视现实、总结现实，从而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关头的第一部“中国国情报告”。他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的著名论断，结构性地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为他 1940 年 1 月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历史又向前推进了 50 年后，中国人民重新处在一个需要冷静反思过去、深刻认识现在、科学展望未来的重要历史关头。新的历史时期和任务使全民族都在关注、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那么，依据什么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呢？答案只有一个：依据中国的国情，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发出了研究国情的号召。“国情调研热”正是在那时逐步兴起，《中国国情报告》也正是在那时组织撰写的，编写者们决心从深层的理论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出路。《中国国情报告》“导论”开宗明义地指出：“正确而科学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深深植根于对中国国情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的土壤之中。没有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深入的了解，就无法走出一条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来。”

“国情调研热”兴起和深入的逻辑必然性。从轰轰烈烈地呐喊改革到冷静深沉地调研中国国情，是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从设计“怎么办”向研究“是什么”的一个深入和转化。所谓设计“怎么办”，是指对行动方针、目标、方式、策略的确立；所谓研究“是什么”，是指对事物性质、结构、状态的了解和把握。人们总会带着“怎么办”的目的意图去研究“是什么”，而又在研究“是什么”的过程中设计“怎么办”。但从根本上说，应该强调的是，研究“是什么”是设计“怎么办”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是什么”的完整、准确、深刻的理解，“怎么办”的设计必然是草率、盲目、肤浅的，从而最终会导致行动的挫折和失败。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当我们对国情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时，设计的改革方案难免会有各种不完备的因素，改革中的一些失误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国情报告》的编写者们，在经历了呐喊改革、设计改革的认识阶段后，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他们力图在书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向人们展现中国国情的性质、结构和状况。本书从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部分分别撰写了包括导论、国际环境、地理、自然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人口、粮食、农业、乡镇企业、工业、财政和



税收、金融、个人收入与分配、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市场体系、区域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城市化、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文化事业、人事与机构、政治与法律、政党与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社会心理、国防建设与军队、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探索与选择、后记等在内的三十个章节，使该书成为全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国情报告。他们将设计“怎么办”，寓于对“是什么”的研究中，使这种“怎么办”的设计显得深沉有力，不空泛、不肤浅。这种对“是什么”的深入研究探讨，是我们今天尤其值得提倡的。只有让对中国国情“是什么”的深刻理解为我们对“怎么办”的设计及实践导航，我们才能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国情调研热”兴起和深入的方法论特征。理论认识的深化必然伴随有研究方法的更新。毛泽东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情时，就曾尖锐批判了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多次重申：“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应当使今天的调查范围更广阔、内容更丰富、数据更详尽，从而使我们对国情了解和把握更深刻。在改革头十年中，一些学者就提倡用实证描述即调查研究的方法多积累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资料，他们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在实际材料的积累中得出理论结果，一些大结论会经不住实际的检验和事实的推敲的。《中国国情报告》令人欣赏的地方还在于，编写者在研究中国国情卓有成果的同时，也在国情研究的方法上作出了创新。该书突出资料性、实证性、研究性、科学性，从而使这种理论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具可信性。毛泽东曾经说：“一般地说，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同上）应该说，建国以来，搜集国情资料的工作仍然显得较为薄弱。因此，这种调查研究、搜集实证资料的方法今天尤其值得提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事实依据，为理论概括提供基本素材。正是在这点上，《中国国情报告》为我们树立了好的范例。

（原载 1991 年 3 月 31 日《光明日报》）

## 纵横交贯论用相宜 ——评《社会科学方法辞典》

关 丽

从 1985 年起，我国出版界涌现一股“辞书”热，确切地说是工具书的出版热。通过“辞书”热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感到，当代知识的生产也面临着生产方式的革新和生产工具的变革，就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这一变革任务显得尤为紧迫。我国辞书的出版虽热，但其中仍有疏偏，即知识性和史实性介绍充盈，方法论介绍似嫌不足，而研究方法实乃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握信息、整理知识、发明创见的最有效手段。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可高度抽象地概括成几条公理性原则，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些抽象的原则，必须化为具体的研究步骤，以揭示和解答问题。因此，社会科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特异性，它既依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又依研究者的思想特点而有所差异，这正是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根本区别，也是编辑、出版社会科学方法辞典的必要性所在。

今天，国内第一部如此性质的辞典问世了。《社会科学方法辞典》的作者来自国内重点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由教授、副教授等 20 余人组成，他们对各自从事的学科研究具有相当专长，从而确保了本书的水平和质量。纵观全书，它具备了纵横交贯、专精覃思、论用相宜的特点。

所谓纵横交贯，是就辞典条目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该辞典将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分为九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未来学。在介绍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时，按其方法论原理形成年代的顺序排列条目，并于阐明条目要义之后，扼要点明该方法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使读者得以了解各种方法之间的派生关系，及至通察本学科研究方法发展的总体线索。细心的读者若作进一步的思索还可发现，这九门学科的排列顺序，本身也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关系，在先后形成的各门学科之中，其研究方法的起点和演变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某一种方法论原则被提出之后，会在各门学科中得到不同的应用，其应用程度的差异，体现了学科之间横向关系的性质。把握学科的横向关系，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借鉴引用各种研究方法，拓宽视野，增进思想，在各自钻研方向上有所突破。这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所谓专精覃思，是就辞典条目编写的风格而言。社会科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特异性，方法、观点和研究过程往往融合一体，致使研究方法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这就需要辞典的编写者在把握各种方法要旨时，能准确地提炼概括，其抽象程度必须恰如其分，既不能超越，又不能不及研究者原本的思想程度。此外，对列入条目的各种方法的选取，要兼顾共性（典型性）和个性（特异性）的统一，以避免冗杂空泛之不足。作者较好地处理了上述问题。他们从浩繁的社会科学论著中筛选出近千例方法，将首创该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姓名直接标示于条目名称之前，对方法论要点分别从学者们提出问题的立场、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过程诸方面作出精炼概括，使读者能一目了然，把握各种方法的基本原理。

所谓论用相宜，是就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巧妙结合而谈。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讲过：“用法即意义。”这是对语词意义的解说，但同样适用于理解

社会科学方法的性质，亦即，“方法即使用过程”。社会科学方法主要是社会科学家解剖世事的高超“医术”，而不仅仅是“手术刀”。要掌握一种研究方法，就应该深入了解前人对该方法的实际运用过程。值得欣慰的是，《社会科学方法辞典》的编写者兼顾了这一特点，他们在介绍各学科主要研究方法时，既扼要概括出方法论要点，又适当荐举一些研究实例，以期将“手术刀”和“医术”共同展示于读者。如辞典“历史学部分”的“历史生态学方法”一目，首先列明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研究方法的要点：（1）生态系统观。把文明的变迁看作文明主体与文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主体，环境系统运动的条件不同，运动规律和运动方向便有所不同。（2）变迁理论。用“变迁”概念取代“进论”概念，来考察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变迁”与“进论”的区别在于：进论是单项的，强调继承性；变迁是多向的，强调替换性。（3）比较文明研究。以各种文明所在地域居民生活方式为考察的出发点，从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文明的不同表征，以便具体把握文明生态系统的原始差别和变迁结果。然后就其对世界文明地区的划分和历史进化线索的勾勒，以及将生态学方法移用于宗教传播问题的病因学研究择要作出介绍。这种词目编写形式兼备知识价值和实用价值，堪称“论用相宜”。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4期）

《社会科学方法辞典》陈建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定价（平）6.80元，（精）9.80元。

## 努力探究延安精神底蕴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读后

孙德生

郑启志主编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一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前夕和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部研究延安精神的综合性文集，收入了35位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理论探讨文章。这部文集的第一个特点是编排重点突出，理论色彩浓郁。整部文集分为“回忆篇”，“理论篇”，“实践篇”，分别由当年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老同志，热心于延安精神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撰写。“回忆篇”中的8篇文章是很生动感人的，文章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了难忘的延安岁月，深情地述说了延安精神对自己的哺育，为革命的后来者提供了继承延安光荣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实践篇”中的9篇文章，分别联系不同的工作实际，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发扬延安精神的时代意义和作用。尤其是占了全书一多半篇幅的“理论篇”，对延安精神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阐述，显示出了这部综合性文集的主要特色。

延安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具有创造意义的思想风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一大批信念执著的共产党人，在历经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落脚于中国西北角的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敌人的重重军事、经济封锁之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整顿“三风”，从思想上组织上空前地坚强壮大起来，胜利地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充分显示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生命力。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堪称是一个奇迹，引起了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研究兴趣，从理论上研究延安精神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延安学”。的确，也只有从理论上对延安精神给予透彻的研究，才能充分揭示伟大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

这部文集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有一定深度，视角比较开阔。本书的一些篇章对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的确定及表述，虽然稍有差异，但在基本的方面都取得了共识，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作者并未停留在这种对延安精神的一般意义的探讨上，而是从新的视角和不同的侧面，努力深入开掘探究延安精神的底蕴，从而拓宽了延安精神研究的思路。如戴鸿武的《发扬延安精神与加强调查研究》一文，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既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全面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措施”，指出：“领导者摆脱文山会海，挣脱无关事务的羁绊，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抓住一两个重大问题，扎扎实实地搞好调查研究，更好地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才是最好的发扬延安精神”，确实切中时弊。再如郭廷健的《延安精神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启示》，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延安精神的理性层面表现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延安精神的价值层面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金虎的《毛泽东伦理思想与延安精神的伦理价值》一文，则从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延安时期无产阶级道德意识的成熟。此外“实践篇”中的许多文章，探讨了发扬延安精神与企业精神建设、廉政建设、青年工作、学校工作、干部工作的相互关系，

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如果说这部文集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收入的某些文章还稍嫌粗糙，有的论述内容重复。但是瑕不掩瑜，本书作为延安精神研究的一个成果，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原载 1991 年 6 月 13 日《辽宁日报》）

《延安精神水放光芒》郑启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定价 5.00 元。

## 从新的侧面介入经济建设 ——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丛书”的出版

《新闻出版报》特约评论员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丛书”的出版表明，出版工作已从一个新的侧面介入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开始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携起手来，“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有可能从这个环节上有所突破。

与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化生产、管理相适应，不少发达国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在我国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企业文化建设也成了热门话题，不少部门的领导、企业人员同专家、学者一道，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是时代与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文化建设提出的崭新课题。

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固然不应排斥对于外国企业文化的某些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吸取，以开扩视野，活跃思路，掌握多种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则是从中国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探索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殊规律、发展轨迹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特殊要求。“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丛书”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探讨，注意立足中国国情，切合中国企业活动的内在规律，从而提出符合社会主义中国企业精神的真知灼见，是值得注意的。

什么是企业文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说法不一。有说是渗透于企业一切活动之中，又涵容企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总和的精神支柱，即企业的灵魂；有说是影响并制约着企业生存、竞争与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文化动态。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企业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界定，还可以深入加以研究。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形成什么样的企业精神？塑造什么样的现代企业的人的形象？如果企业文化建设忽视了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忽视了企业人员的主人翁地位及其思想文化素质的要求，那么，企业文化的建设就只能停留在一般文化学的层次，而不可能深入到企业生产、管理、经营、服务与文化学相结合的层次之中。

我们所要建设的企业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因而贯穿于企业流动中的各个方面的文化要素，必然形成有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内涵。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大庆精神”，就包孕着具有中国企业文化特色的宝贵经验。在60年代艰苦的石油会战中，光靠企业的行政法规与纪律约束是无法解决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的充分发挥的。而重视人的作用，发扬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正是在承认个体价值基础上弘扬工人阶级的集体价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庆正是凭藉这种企业精神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并进而在实践中形成过硬作风和光荣传统的。大庆企业发展的高水平，离不开科技的高水平和人员素质的高水平。这正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的又一关键环节。社会主义企业中人的政治觉悟一旦与高度的科技文化素质相融合，就将创造出人间奇迹。“大庆经验”对建设中国企业文化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诚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并非“大庆经验”所能完全包涵，“大庆经验”也仍需要继续丰富

和完善；但是，这些宝贵经验却启示和引导我们去创造更具现代化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新经验；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也亟需在这种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富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创造和贡献。

（原载 1991 年 6 月 14 日《新闻出版报》）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丛书”张铭远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1992 年出版。包括：《企业文化导论》张铭远著，定价 3.30 元；《企业之魂》张毅、史彤彪著，定价 3.30 元；《无形的链条》许鹏著，定价 3.30 元；《企业的良心》杨恒达著，定价 3.30 元；《企业的上帝》张毅著，定价 3.30 元；《成功的内在机制》杨钢元著，定价 3.30 元；《企业与美》王湊著，定价 3.30 元；《竞争·效益与创新》王振民著，定价 3.30 元。

## 一本有说服力的好书 ——张春雷著《社会主义纵横谈》

傅 墨

《社会主义纵横谈》是一本颇有吸引力、说服力的好书。一开卷，我就被它牵住了，直至读完全书。

此书，为何有这般大的吸引力呢？首先就在于它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全书包括序和后记，共计 51 篇独立成章而又有内在联系的短文。篇篇讲的都是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篇篇又都是有针对性的。诸如：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看社会主义好，谁的发展速度快，怎样看台湾经济的发展，怎样看我国的落后，为什么允许发展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多党制在我国行不通，怎样看失误，怎样看党内腐败现象，怎样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西方反动势力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等等，读者都可以从书中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作者还驳斥了有人散布的所谓“过时论”、“补课论”、“趋同论”、“政治多元论”、“全盘西化论”等谬论，揭穿了西方骗人的假民主。这对人们明辨是非、消除误解、澄清模糊认识大有帮助。

这本书，不是简单的重复基本原理，而是把理论与实际融会贯通，所以颇有说服力。作者运用大量的古今中外的事例和资料，采取竖看横比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得有理有据，使人心悦诚服，大长志气，倍增信心。

我钦佩作者的学识水平和文字功力，他把社会主义这样理论性、实践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大课题，写得如此深刻透彻，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无论干部或群众，只要认真读下去，都会读出味道；即使没有文化，听别人读也能听得懂。

《社会主义纵横谈》是一部适合城乡各阶层的社会主义教材。特别是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形势下，这本书对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改革开放，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原载 1991 年 9 月 17 日《沈阳日报》）

《社会主义纵横谈》张春雷著，沈阳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定价 3.95 元。



来源于实践 服务于实践  
——评《中国计划生育道路》

杨子慧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通读了曹景春著的《中国计划生育道路》（以下简称《道路》）一书。掩卷沉思，仿佛又回到我过去所从事的“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去了。

《道路》一书，辑入作者45篇文章和调查报告，涉及到全国性和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计划生育产生、发展和日臻科学化、规范化的历史进程，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组织体系、管理方式以及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一本“计划生育”的教科书，也是一本了解考察中国计划生育的启蒙读物。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深刻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紧迫感。人们生育行为从多生到少生的转变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发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为动力和前提的；一种是诱发性转变，即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社会的、行政的、法律的非经济措施，诱发人们提前改变生育观念和行爲，实现生育率的超前下降，从而走出“贫困出人口”的怪圈，使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趋于协调和适应。《道路》的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人口和世界人口发展态势，吸取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科学成分，反复论述了我国必须取诱发性转变这种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并把它概括为“超经济控制”的理论，很有科学性和学术性。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为实践服务是《道路》一书的突出特点。作者以他的方便条件和良好环境，深深扎根于实践之中，群众之中。计划生育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作者长期同那里的干部、群众“摸、爬、滚、打”在一起，走遍了辽宁省14个市，调查了70多个县区，深入到村、户，他了解群众的“脉搏”，不断学习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实践中吸取营养，丰富和指导自己的理论研究。因此，《道路》一书不是就事论事的毛坯之作，也不是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之谈，而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既有分析，又有对策，既提出问题，又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它以改革的精神，注意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计划生育道路的内涵。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经济改革为先导的条件下，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的改革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如何使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适应和促进改革的大潮，发展社会生产力，作者深入计划生育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报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的是作者独到的见解。读着这些文章，给人以高屋见瓴之感，又使你嗅到乡土的气息。似乎听到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继续前进的脚步声，再次领略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生育革命中的首创精神。

当然，中国计划生育道路，不是个封闭型研究课题，而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工程。《道路》一书还有许多需要发展和完善之处。我们盼望作者继续探索，深化研究，为社会主义计划生育理论建设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原载 1991 年 8 月 1 日《辽宁日报》)

《中国计划生育道路》曹景春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  
定价 7.50 元。

### 三重价值集于一书 ——读《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

刘曹利

《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是一部研究先秦时期刑法史的专著。这是一本将历史学术价值、现实社会价值和思想理论价值集于一体的好书。

历史学术价值。作者有这样一个著述思想：“人是习惯于；日的循规蹈矩的，然而在研究先秦时期的刑法史时，必须要抛弃这种旧框框，作出大胆的尝试，也许会从尝试中开拓先秦时期刑法史这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基于这种思想，该书依据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经济形态的特点，以及这个历史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点，研究我国奴隶社会刑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刑法产生和形成的规律。该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认为史学界流行的在夏禹时期或殷商时期才有国家的观点，“从其所持的论据来考察，是不充分不确切的”，而主张从黄帝时期开始我国就有了国家；认定《洪范》不是哲学文献，而是处罚犯罪的刑书简册，是我国夏代成文的刑法典，也是我国历史上现存史料中的最早的一部成文刑法典；提出《尚书·吕刑》是我国奴隶社会最后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刑书简册，并认为《吕刑》中有关刑法制度和刑法原则与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的刑法相对比，确实成熟得多；把“郑人铸刑书”看作我国历史上公开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标志着奴隶制上层建筑向封建制上层建筑过渡的开始；确定秦律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刑法典，是我国有刑法以来，第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的刑法典，等等。

现实社会价值。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为现实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刑法史研究也是这样。读书研究的刑法思想有许多古为今用的内容，殷商时期的“官刑”和战国时期的“八奸”罪，就是其中之一。“官刑”是殷商时期限制臣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刑事法规。“官刑”对臣僚的这样三种行为进行治罪：经常在庭内朋舞，在屋内沉溺于酒歌，荒芜政事的“巫风”；爱好货财或者贪婪财务，经常从事狩猎而不做正当工作的“淫风”；对天子的讲话采取不严肃的态度，顶撞忠言和直言，远离年高又拥有德望的人而庇护小人的“乱风”。三风中的乱风，是针对当时诸侯国的国君，其中包括即将继位的天子在内，历史上“伊尹放太甲于桐”，就是依据“官刑”处理的。可惜，这是我国历史上“臣下”以法制裁“天子”的仅有一例，以后历代封建君主只继承了“官刑”中对臣僚的处理，自己则不受法律的制约。

战国时期把臣僚的罪行归纳为八种的见于《韩非子·八奸》。关于臣僚犯罪的刑法思想，是法家中韩非独有的刑法思想，已成为后世刑法中读职罪的思想来源之一。“八奸”罪涉及臣僚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人品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的臣僚，被定为“民萌”罪，这大概与现今的慷国家之慨，收买民心一类的行为相近。又如，“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的臣僚，被称为“威强”罪，这大约相当于现今的结党营私一类的行为。

“官刑”和“八奸”仅是我国先秦刑法史上的“以古鉴今”的思想内容

之一，还有管仲的将刑罚惩罚、物质建设和伦理教育三者结合起来以减少并预防犯罪的思想；商鞅的刑罚无等级，不以善言而亏法思想，等等，都是宝贵的刑法思想财富。尽管这些刑法思想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思想理论价值。研究先秦刑法史也是研究古代人的思想理论观点。该书经过历史考察和抽象研究，提出了一些颇为独特的思想理论问题。如，对中华法系特点的概括，该书认为我国先秦时期以农业为基础的混合性的自然经济，决定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以刑法为主体的混合体系的中华法系，这个法系的最大特点，是民法和刑法合一，实体法和程序法合一，与罗马法的刑法、民法相分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法系。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现今社会流行较广泛的古语精华。该书作者不拘于已有的成见，认为已往的理解都是望文生意，是由于不了解我国的刑法史，特别是不明确殷商时期就有专门惩治臣僚犯罪的“官刑”而出现的误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确切含义是，不因为大夫知法，在犯罪时加重处罚，不因为庶人不知礼，在失礼时降低礼的要求。类似的“一家之言”还有许多，显示了该书作者理论思维的独创性。

《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一书，依笔者之见，尚有两点明显不足。其一，该书对古汉语文字中的省笔、误认、借字等多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这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内容占据的份量较大，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先秦刑法史实论述的展开和深化；其二，该书仍可见错字和漏字。

（原载 1991 年 8 月 9 日《辽宁日报》）

《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宁汉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定价 5.50 元。

## 革命风范传万代 ——读《老一代革命家风范 300 例》

吕 亚

为纪念建党 70 周年，中共辽宁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组成一个编辑小组，历时一年搜集整理，撰写了《老一代革命家风范 300 例》一书。为广大党员、机关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读物。

我党在长期武装斗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具体体现。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我们党所形成的优良作风，保证了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宏伟目标中，只有发扬光大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在培育和形成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过程中，老一辈的革命家不仅是倡导者，又是力行者。书中所搜集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数十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小故事 300 例，分为理想篇、艰苦奋斗篇、联系群众篇、廉洁篇、家庭篇等 10 个部分。这些故事以小见大，都是从生活实际中提取的，读来亲切感人。如刘少奇当年在安源从事革命活动时，工人选他当俱乐部总主任，一个月给他 200 元银洋，但少奇坚持只收 15 元的生活费；建国后，他到各地视察工作，从不接受地方送的礼物，就是平时或是开会，他都是自备茶叶与香烟。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坐国产红旗轿车的人，从 60 年代起，无论出席党和国家各项活动中，周总理都是乘国产车，而不换什么“奔驰”轿车；1962 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到黑龙江视察工作，北方大夏为他准备了宴席，他看后指示把菜冻起来给外宾吃，自己坚持吃黄豆芽炖豆腐。

这些小故事寓意深刻，生动感人，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理想和博大心胸；表现了他们工作上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精神，展示了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廉洁自律的道德情操。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德、情操和作风，加强每个党员以及每个人的政治修养就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 1991 年 8 月 10 日《辽宁日报》）

《老一代革命家风范 300 例》王惠民等编，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定价 3.90 元。

## 创建新学科体系的有益尝试 ——评《软科学大辞典》

邹德安

“软科学”一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1971年日本科技厅出版《科学技术白皮书》之后，但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叶美国的泰罗制。六七十年代，软科学在国际上蓬勃兴起，广泛应用于各种重大决策之中，其成果甚为可观。同一时期，我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等，把系统工程、运筹学、科学学等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企业管理、科研管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诸方面，同样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过，软科学在我国的迅速复苏和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这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痛感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极端重要。二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大大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和工作的难度，从而为软科学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三则，对外开放使我们开扩了眼界，获得了新知。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为软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

由李忠尚主编的《软科学大辞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这一时期我国软科学迅速崛起的历史记录和经验总结，是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内外近百名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全国数千名软科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的比较集中的反映。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初步构筑起我国软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作为一门以决策研究为核心的高度综合的新兴学科，软科学具有应用性极强的显著特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学科自身的建设，忽视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抽象。事实上，在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诸方面，国内外学者既有许多共识，也有不少歧见，有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不确定，有些问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国软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尤其需要创建一个学科体系，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本书作者独辟蹊径，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概括、整理、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且勇于创新，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软科学知识、方法和应用范例，为我国及世界的软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部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大型工具书。他们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精神尤其可贵。

本书是软科学工作者的“益友”，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决策者的“助手”和“参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为了保证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必须逐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民主的“多谋”，才有科学的“善断”；也只有科学的“多谋”，才有决策者代表人民的民主的“善断”。无论如何，软科学在这一过程中负有提供智力支持的神圣使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软科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各门“硬科学”而言的，它本身并不软。认为软科学无足轻重、多此一举，认为软科学神秘莫测、高不可攀，都是没有根据的。

《软科学大辞典》构建的学科体系，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自我封闭的体系，它还有待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我国软科学的成熟，有赖于它的实际应用的普及与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它的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比如决策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科学学、未来学、哲学等等）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赖于它逐步扎根中国的土壤，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本书较好地体现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软科学研究必须以决策研究为核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要严格地遵循上述指导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软科学必将自成体系，生机盎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原载 1991 年 9 月 5 日《辽宁日报》）

《软科学大辞典》李忠尚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出版，定价 38.00 元。

## 简评“运筹学小丛书”

施光燕

运筹学作为优化技术中定量计算的方法，以及制定、执行计划和管理的手段，恰好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技术、管理水平提高的需要，因此近十年来我国运筹学的研究及应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以不夸张地说，在这期间，几乎在所有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领域内，都在各种层次上提出了优化课题，而且其中许多课题通过研究、解决，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有更多的人要求了解、学习运筹学。“运筹学小丛书”极好地满足了这种需要。

运筹学的内容吸引着多种层次人员的兴趣，“运筹学小丛书”的特点就是能满足各种人员的需要。该丛书九个分册中的首册《运筹学介绍》，仅以3万余字的篇幅向读者打开了运筹学世界的大门，它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运筹学园地中的景象，使凡具有阅报能力的读者，就能以他们的理解回答什么是运筹学，使每位熟悉本部门业务的读者，就能把本部门的问题和运筹学对上号。对于已经进入过这个园地的读者来说，小丛书又似一位好的导游向读者讲述着各块小园地的典故、特点，指出其中的精品，展示它们宽广的效用，使读者从更广的角度，深层的领略园地的风光，甚至对于一些运筹学专业人员或运筹学教育工作者，也会有此收获。对于渴望掌握方法解决问题的读者来说，小丛书又像一位优秀教师，使你很快地既能有所依从，又能抓住关键，关且灵活运用。

小丛书各分册在编写上风格各异，有的简洁、严谨，使具有线性代数基本知识的读者一步就登入线性规划的堂室；有的致力于引起读者的兴趣，增长他们的才能，通过典型例子的阐述使读者既重视分析推理又学到计算技巧，引导读者顺利跨进组合数学的大门；有的向各类读者进行指引，用粗线条勾画出整数规划方法的基本面貌；有的从日常用语“拍板，定案”出发，层层分析，配合具体的例子，通俗地讲清了为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生疏的马尔柯夫决策规划研究对象和目标，然后再进行展开；有的则寓图论的基本概念与方法于十个典型应用问题之中。一套丛书中的多种风格使读者读起来更饶有趣味，从中领略到各种风采，促进了普及的作用。这些各异的风格却融会成一个共同点：起点低，广泛联系实例，由浅入深直至展现各分支的基本大貌。小丛书这个特点使读者易看、爱看和耐看。

“运筹学小丛书”的许多作者都是各该分支的国内学术的带头人，因而他们能居高临下写出如此好的通俗读物。

小丛书也存在着不足，如《矩阵与投入产出分析》分册以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写矩阵，这和本书的主题偏离太多。

（原载《博览群书》1991年第9期）

“运筹学小丛书”越民义、徐利治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包括：《运筹学介绍》越民义著，定价1.03元；《整数规划初步》许国志、马仲蕃著，定价1.66元；《线性规划初步》吴方著，定价1.75元；《马氏决策浅说》董泽清、刘克著，定价1.35元；《矩阵与投入产出分析》韩志



刚著，定价 2.10 元；《管理科学中的图论方法》宋国栋著，定价 1.53 元；  
《动态规划简介》杨敦悌、陈斌著，定价 1.70 元；《决策分析入门》张连诚  
著，定价 2.14 元；《组合数学入门》徐利治、蒋茂森著，定价 1.74 元。

## 以分析态度研究中国学术

张岱年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20 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

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后来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更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在此之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通几之学，即哲学；三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方以智论通几与质测的异同，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有其独到之处。

以上这些关于学术的分类，都未免简而未备，中国的传统学术实较此为宏广。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典籍目录来考察中国学术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家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历法，方技指医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自然科学及军事学居于显著的地位。而经学居于学科之首《汉书·艺文志》之后，传统的目录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四库全书总目》将哲学、自然科学及宗教都归入子部，不如《汉书·艺文志》将数术、方技与诸子并列。

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 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 Sinology 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灿烂光辉的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古语云：“国有与立。”（《左传·昭公元年》：“国于天下，有与立焉。”）我们中国必有其足以立国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湛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是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之一，先秦哲学可以与西方古希腊哲学媲美，宋明哲学的成就超过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文学艺术亦独具特色。20 年代曾经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然而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撰著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自

然科学曾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不过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而已。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其中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至今犹能给予人以深切的启迪；亦有违离客观实际的谬妄之说。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当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揭示前人尚未发现的真理。但是，创造性的思维仍以通晓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为必要条件。

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借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古语说：“虽有佳肴，弗食”，不以某一种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且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对这些地方文化，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文物的不断发掘和整理，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和领域的拓宽，为地区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值得高兴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文化也会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没有根或断了根的文化，即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不免于枯萎的。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良知，也有悖于历史的科学精神。因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涣散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因此，出版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通过对祖国各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但是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而当今之世，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祖国优秀

文化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心，则尤为重要。

（原载 1991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李侃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包括：  
《台湾文化》胡友鸣、马欣来著，定价 4.50 元；《齐鲁文化》黄松著，定价 5.30 元；《三晋文化》冯宝志著，定价 4.70 元；《巴蜀文化》袁庭栋著，定价 5.90 元；《吴越文化》张荷著，定价 5.50 元。

## 讖纬与《讖纬论略》

俞晓群

《讖纬论略》是四十年来国内第一部专论讖纬的著作。

讖纬的“身世”很怪。“讖”是所谓神的预言，而“纬”则是神学与经学的结合。“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释名》）。讖纬之学大炽于汉代，自汉武帝号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迅速上升到“圣人”的地位，同时六经也作为“圣经”为皇权所用。但经学毕竟是古传之物，难与现实吻合，由此诱发了将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其始作俑者系一代大儒董仲舒，他以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先导，以儒学为中心，以“类”、“数”为界说，将道、法、阴阳、五行等诸说兼容并汇，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成为经学与现实结合的先声。其后，儒教愈发神化，经学愈发得宠，加之王莽篡政、刘秀复汉，王朝起伏跌宕，争霸者无论在朝在野，都想证明其实现霸业是神的安排。于是汉代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显灵了，他们围绕经学编派种种骇人听闻的神话，一方面将孔子奉为“教主”，另一方面又忘却了“子不语”的古训，建立起种种神奇怪诞的学说。

值得强调的是，儒生们制造讖纬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逢迎皇权，达到“挟亡灵以今天下”的目的。帝王们每遇日食月食、狂风骤雨、人间怪异、自然灾变，都要请他们界说明察，以解“天人感应”之预兆。《讖纬论略》中即辑录了百余种古人关于日、月蚀的占验和征兆，像“臣子谋，日乃蚀”，“主骄慢，日月失明”（《开元占经》）等等。汉光武帝也是以讖语“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为根据，发愤兴兵，再成汉家霸业的。

然而，“亢龙有悔”（《易经》），物极必反。讖纬原本人造之神话，随用随编，并无专属，皇家适用，平民亦可适用。汉末黄巾军即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讖语以毒攻毒；曹魏也以讖语“代汉者魏公子”（《春秋·正版讖》），证明灭汉乃天经地义。如此神化之学，渐成灭国之利剑，令人望而生畏。所以魏晋时代皇家已深知讖纬可兴国亦可灭国，成霸业之后立即禁绝纬书之流传，后世均作此举，讖纬从此飘零散落，渐至衰灭。时至今日，虽几经历代后学暗中整汇刊抄、集结注校，终因时过境迁，再难成后汉之盛况，更无当年涉世之伟力，仅成二三学子抱残守缺之物。

作为一门屡遭查禁的“绝学”，今人要想理出些眉目来，确实困难重重。本书的作者广阅古今有关典籍，详加整理、阐述，终而成书。作为“四十年来第一部”，确有其意义。

讖纬实为由神话与传说组成的神学秘籍，通篇用语隐微，例说荒诞，虚实并储，鱼龙混杂。故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迷信”、“历史糟粕”，而很少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不过，读罢《讖纬论略》，却令人感到，无论在史学还是在其它的意义上，都不应无视讖纬的存在。首先它曾在后汉与古经比肩并立，被尊为“内学”和“秘经”，并且曾有取代经学之态势。对于如此显赫一时的学说，无视其存在并不能证其不存在，不究其内涵则难以体察古代之文化氛围及价值取向。再者，纬书的篇目极其可观，史称 81 篇，其中既有大量的神话，也掺杂着许多信史和科学知识。例如，《春秋纬》中即载有：“月为阴精，体自无光，藉日照乃明。”这些内容虽服务于荒诞之说，

却无损其科学价值。正如古人所说：“经明其义，纬陈其数；经穷其理，纬究其象，纬之于经，相得日彰。”（《诗纬集证序》）此说虽嫌过分推崇，但可以从认识到，了解讖纬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说的重要。

讖纬的典籍极其零乱，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也往往难以悟得深透。《讖纬论略》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观点分章立目的，作者在广集史料、详推细考的基础上，阐幽发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讖纬的发生、发展、兴替、流变及影响，叙说兼济古今，脉络清楚，并且理清了许多疑点和问题。例如，关于讖纬起源，就列出了十二类说法；同时还对 81 篇纬书逐一考证源流，实乃不易之举。尤其是在阐述讖纬与政治、社会、宗教、科学和历史等方面联系时，作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很有些临危不乱、无诤无玄的勇气。

（原载《读书》1991 年第 10 期）

《讖纬论略》钟肇鹏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定价 5.00 元。

## 为走向新世纪作理论上的准备

——介绍两部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辞典

姜思毅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第一任务。广大干部和青年也日益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由高狄主编老、中、青三代理论工作者通力合作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适应了人们的这一需要。每部大辞典都可以说是一个宏篇巨著。第一部大辞典内容覆盖马、恩、列、斯、毛著作的文献、人名、事件、会议、学说、团体、组织、书刊、典故等十个方面，还附有马、恩、列、斯、毛著作年表。第二部大辞典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and 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特点。两部大辞典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读原著，大辞典是帮助读原著的完备而良好的工具书。

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低潮，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挫折。在“低潮”和“挫折”面前，更需要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总结。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总结了经验并作了艰苦的理论探索。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获得了重大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给无产阶级锻造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在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年代里，列宁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写下了历史性的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回顾我们党 70 年奋斗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在每次困难、挫折和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了面临的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排除万难，取得了新的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军内出现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适时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状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为党指明了前进的航向。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之际，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着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写下了两篇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建国纲领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党顺利进城，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及时转入国家建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20 世纪实际上只剩下 8 年了。作为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为跨入新世纪作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思想理论等方

面的准备。我们党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前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就是为迎接新世纪作准备的。

在各种准备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是特别重要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威力最大的武器。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针对党的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强调全党同志尤其是新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提高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防止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这就是说，只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才能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才能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才能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影响，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和克服腐败，使党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有力佐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在当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全面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两部大辞典还努力做到对马、恩、列、斯、毛和周、刘、朱、邓、陈的全部著作都有所表述，因而全书的结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历史和理论概括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本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最好纪录，又是当今和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好启示。一些人制造和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目的是搞乱人们的思想，最后乱中夺权。其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否定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党的成绩、党的胜利历史，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党，就必将变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和进行改革中，我们党通过制定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下来，这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天看来更是了不起的决策。中国共产党 70 年的历史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为走向新世纪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原载 1991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高狄主编，辽宁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定价 93.40 元。

念念不忘 代代相传  
——读《大连英烈》

沙里途

正值三月春风抖擞之际，友人雪芹女士送我一本《大连英烈》，目光灼灼地叮嘱道：“看看吧，很有益的。”在妻子女儿进入甜蜜的梦乡的夜晚，我卒读全书。在我们大连地区成长和战斗过的革命先烈的英名，霎时在我面前站成一个威武的纵队：关向应，邹立升，刘逢川，张世兰，王立功，金伯阳，赵伯诚……无数革命先烈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共产主义精神，在这宁静的夜晚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宁静……

1926年1月，大连地区建立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造就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英雄。他们出生入死，前仆后继，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关向应这个土生土长的苦大仇深的农民的儿子，由不自觉的反抗到自觉地投身革命行列，在党的培养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邹立升认清在反动军阀的队伍里是寻不到救国救民之路的，毅然闯关东，终于在大连找到了党，义无反顾地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还有邓鹤皋、魏长魁、侯立鉴、张炽……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一个人只要找到了共产党，也便找到了人生的信念。

如今，在这片热土上，烈士的碧血已长成草木葳蕤，鲜花盛开的风景。改革开放，尤其需要革命先烈那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发生摩擦相互谩骂脑袋有问题时；当我们兜售某种商品有意无意坑害顾客时；当我们以职权之便为亲友开了后门时；当我们吃了贿赂而心安理得时；当我们为子女伸手要到了好工作好住房时；当我们得了某种小便宜沾沾自喜时；当我们高叫以“自我为中心”时……突然想到先烈殷红的鲜血，朋友，你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呢？当你看到辽阔田地上麦浪滚滚，阳光四射，农民耕田工人做工，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绿荫下有青年谈情说爱的剪影时，你是否想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呢？

我们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必然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革命传统的接力一代也不能掉棒！搞经济建设尤其需要革命先烈那种创业与献身精神。这就是今天出版《大连英烈》的意义所在。

妻子女儿睡得正香。我点燃一支烟，透过玻璃窗望浩瀚星海，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更坚信了现实。中华民族的足下没有过不去的大江大河高山草地……

（原载 1992 年 3 月 26 日《大连日报》）

《大连英烈》大连市民政局、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连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定价 3.60 元。

源于细微 势若云雷  
——“人生沉思录丛书”评介

王守范

还是在 1989 年的冬天，在看望景克宁、李永田教授时，两位教授很热情地谈起冯远征、初昭仑同志正在酝酿的一套青年思想修养丛书，并且赞同丛书的构思，表示要亲自参加丛书文章的撰写工作。时隔一年，我就成了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沉思录丛书”中《人生小语》和《生命的雷电火》最早的读者之一。接着，《省悟的 ABC》和《人·人·人》也相继与读者见面。我爱不释手地读着这些书，沉思着人生的价值，得到了启迪和力量。

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大特色：

第一、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丛书在前言中写道：“在人生旅途上，青年们在青春、理想、事业……等千百课题面前，大都会充满憧憬、倾注希望，也不乏存在困惑、疑虑、彷徨、梦幻……他们殷切希望得到挚情的友谊和力量，希望找到正确的答案和启示，并随时通过自身的感受、体会，去思考、鉴别、取舍……”丛书在内容上比较充分地满足了青年的这些希望。作者从生活细微之处，引发出深邃的哲理思考，梳理了生活中一条条纤细的思絮，汇成正确的人生道理。人们每透过一个细微之理，就会在眼前增加一丝豁亮，点燃一个希望，增加一份信心，从而变为奋发向上的巨大力量。

第二、具有和谐的相融性。作者是在生活的常青树下采撷枝叶，面对的是朝气蓬勃、富于活力的青年；所问所议所思都出自真挚的爱心，有长者的深情，有青年的心声。因此，与青年就很自然地取得心灵的沟通，同青年的思想具有相融性和激发性，拨动了青年的心弦，为青年所接受。

第三、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丛书的语言洗练精美，论点清晰，论据切理。文章多是采取一事一议，一物一思，一理一教，一思一得的方式娓娓道来，并不注重章节的衔接，也不讲求形式的一致，更不强求字数的多寡。但每议、每思、每教、每得，都能把读者引入妙景丛生的新天地，给人以山外青山、曲径通幽的感觉。

当然，丛书也有不够尽善之处。但既然是“沉思”，也就允许其多维性。只要是积极的，富于生机的，每个人都可以借题思考，这也许正是丛书给予人的启迪之点吧！

（原载 1992 年 11 月 8 日《新闻出版报》）

“人生沉思录丛书”白泉主编，白山出版社 1990 年 5 月出版。包括：《人生小语》冯远征著，定价 2.60 元；《生命的雷电火》景克宁著，定价 2.30 元；《省悟的 ABC》公方彬著，定价 2.00 元；《人·人·人》李永田著，定价 1.90 元。

## 研究人类思维经验，促进哲学的改革

——评《马克思 资本论 与黑格尔 逻辑学 》

新 山

辩证地研究人类思维经验，概括现代科学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前哲学改革的重要途径。中山大学刘景泉副教授的新著《马克思 资本论 与黑格尔 逻辑学 》对于深入哲学改革，促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钻研，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它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中，研究近现代人类辩证思维的结晶及其理论成果的一次可喜的创举。

该著内容丰富，体系严谨。作者首先在绪论中概述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批判地吸取黑格尔《逻辑学》的情况，着重分析了《资本论》与《逻辑学》体系的特点及其在辩证法发展史中的地位。接着第一部分阐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深入简明地分析了《资本论》与《逻辑学》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资本论》与《逻辑学》的范畴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及其实质。第四部分对辩证逻辑的实质、规律、思维形式和逻辑方法等，按照《资本论》与《逻辑学》的内容和提示，进行了比较透彻和全面的论述。

作者从事《资本论》和《逻辑学》辩证法的研究已经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思想解放，研究逐步深入，因而结合教学进行了系统的著述，取得了显著成果。从我国现有这一领域研究的情况看，这一论著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新颖。从苏联到我国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已开展多年了，但从《资本论》与《逻辑学》两者的内在关系上，这本书在我国还是第一本专著。它以人类辩证思维的有机发展，深入探讨两位哲学大师代表作的血肉关系，揭示了古今成果和思想根源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阐明了马克思如何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了科学的辩证思维，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在第二部分“联系的辩证法”中，分析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运用了系统观，指出《逻辑学》和《资本论》都贯串系统的整体思想；同时指出“中介”在联系中的作用，说明黑格尔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通过中介把各个环节、各个因素联系起来的，而“中介”“有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和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改造了黑格尔关于联系的中介的思辨性，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的联系以及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而“这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媒介”（本书 87 页）。这种分析给人一种清新之感。

第二、独特。作者对两部巨著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独具特点的分析。首先在概述《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体系时，不仅揭示了两者的共同特点，如范畴发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以及其圆圈或螺旋式的运动等，而且区分两部著作所贯彻的两种不同的本体论，说明“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资本论则是商品的逻辑学。同时论证了《资本论》与社会经验的关系，探讨了为何用《资本论》的矛盾分析法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论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普遍性，探索了辩证法范畴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研究了辩证逻辑的涵义、基本规律、思

维形式分类，以及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的方法。

第三、攻难。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刘景泉同志所以能从哲学上，着重从辩证法上攻取这两部巨著，揭示出两书的关系及其精华，关键在于他对两部巨著中的难度大的理论问题，不是采取回避或应付的态度，而是勇于探索，认真钻研，从而对一道道令人视而生畏的难题、疑案进行攻关、解剖，如在阐述《资本论》的矛盾分析法时，他不仅剖析了商品二重性、价值二重性、货币二重性以及剩余价值二重性、利润率二重性，分析资本主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而且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特点、表现以及各种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观点，从而直触理论界的险区。至于《逻辑学》和《资本论》中的概念、判断、推理，是历来难以弄透的问题，但该书则从它的特点、分类及其相互关系上作了系统而明确的分析，诸多疑难经过作者这种深入简明的阐述都一一解释了。

第四、全面。在近现代哲学史上，《逻辑学》和《资本论》是两部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内容丰富的巨著。过去的研究，大都是从某一侧面对这两大巨著进行探讨的多。刘景泉同志则从整个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原则，全面地解剖了两者根本对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进而从内容、体系、方法诸方面，系统地论证了他们之间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探索了辩证法范畴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并从纵横两者的结合对辩证逻辑这一思维科学的涵义、基本规律、思维形式作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同时遵循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哲学科学体系的初步构思，为当前哲学的改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积极的思想启迪。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与《资本论》关系密切的著作，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未进行挖掘，分析其哲学思想；其次，有些内容论述重复，如批判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一再提到，显得简单反复。

（原载《当代哲学》1986年第4期）

《马克思 资本论 与黑格尔 逻辑学 》刘景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定价2.65元。

## 一门新兴的学科 ——评《妇女心理学》

晓 书

妇女心理学是研究妇女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是心理科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被人们称为诱人的妇女心理学。

几千年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由于广大妇女在经济上无地位，政治上被压迫，思想上受歧视，以及一些相关科学的不成熟，因而有关妇女的科学包括妇女心理学在内，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至于某些有关妇女心理的思想，那是同神话、宗教、哲学和文学交织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主要是70年代以来，随着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政治运动、科学研究、文化生活的日益增多，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性学等有关科学的日益发展，妇女心理学同妇女学、妇女社会学、妇女人口学、妇女美学、女性学等有关妇女的学科先后应运而生。因此，妇女心理学产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妇女自身解放的需要，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高度分化的需要。

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正式建立了第三十五个分支即“妇女心理学分支”，至此，妇女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终于得到正式承认。1976年该分会开始出版会刊《妇女心理学季刊》，发表妇女心理研究的论文、问题讨论、情报交流等方面的文章。1984年美国还出版了《妇女心理学》。在前苏联，虽不用妇女心理学这一专门术语，但70年代末以来对妇女心理的研究却极为重视，并同家庭、婚姻等问题联结在一起。“婚姻家庭心理学”是前苏联妇女心理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前苏联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独立的部分。日本也注重妇女心理学的研究，近年来也出版了《女性心理学》等妇女心理学方面的著作。

妇女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包括：性别角色定型、女性的认知机能、妇女成就的内在和外障碍、女性生理特征及其对心理的影响、女性在学习、教育、恋爱、婚姻以至消费、服装等方面一系列的独特心理，并通过研究各种年龄阶段、各个生理发展时期、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的妇女行为和心理现象，揭示妇女的心理发展和个性心理特征的发展规律。

在我国，粉碎“四人帮”以来，也迎来了心理科学的春天。心理学界开始重视对妇女心理学的研究，有些妇女杂志开辟了“妇女心理”的栏目。学习和研究妇女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因为妇女心理学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建立妇女学、妇女社会学、妇女伦理学、妇女美学、妇女医学，破除各种封建迷信的思想，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助于掌握妇女的心理特点和个性特点，提高妇女的素质，发挥妇女的智慧，实现最佳女性角色定型，建立良好的婚姻家庭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由任平安、赵艳屏两位同志撰写的《妇女心理学》一书，是一部开拓性的心理学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妇女心理的专著。作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掌握许多资料的基础上，对妇女心理学的对象及其意义、妇女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妇女成才的心理因素与途径、妇女美感心理及培养、妇女的爱情与婚姻心理、犯罪妇女的心理及其矫正、妇女的心

理卫生、妇女的家政心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填补了我国心理科学这一领域的空白点。相信这部专著，定会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

（原载 1986 年 11 月 13 日《辽宁日报》）

0《妇女心理学》任平安、赵艳屏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6 月出版，定价 1.70 元。

提纲挈领 释疑解惑  
——简评《西方美学名著提要》

张元才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美学迄今已经积累了为数众多的理论著述，对于一个志在掌握这门学问或对美学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都必然首先要经历了解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认识前人已取得的成就的过程。曲戈、盛广智合著的《西方美学名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做为一本学习美学理论或西方美学史的入门辅导书，犹如一把开启美学殿堂的钥匙，可使读者用较少的时间获得较为全面的美学基础理论，解除在研读西方美学名著时可能产生的疑难与困惑。

《提要》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部《提要》选题独到，包罗较广。它从正规和各类业余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美学爱好者的文化素养和实际需要出发，以史为纲，斟酌取舍，着重介绍和评述西方美学思想史上主要人物的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全书选题包括上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中经欧洲文艺复兴、17、18世纪和启蒙运动，直至本世纪50年代前后的五十多位美学家的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单篇。读者可从一篇篇具体而简明的“提要”中，窥得原著精髓，掌握原著要领，并进而认识其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其次，该书评、介结合，针对性强。书名虽曰“提要”，却不仅止于介绍美学名著的内容，而更注重客观的评论分析。介绍原著内容时，或分章、卷阐述其要旨，或统观全书归纳其观点，形式上不强求一律，但介绍内容与观点，务求准确、简赅、明晰；评述分析则力避陈言，刻意标新，又注意有理有据，深入浅出，以适应初学者的要求。例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一部艰深难懂的美学名著，《提要》于总述其一般情况和原书结构之后，主要集中在评述了书中的几个美学观点，分为“美的分析”、“崇高的分析”、“关于艺术”、“关于天才”四部分，逐一评说，可助读者把握原著要点。

这本《提要》多方面吸收了国内外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材料丰赡，史证翔实，显示了作者比较扎实的工力。语言既富于思辨色彩，又不失通俗平易，可谓浅中有深，平中有奇，这也是它受到读者欢迎与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提要》的选题仅止于本世纪50年代前后，令人稍有遗憾，倘能扩大一下范围，反映当代西方美学发展的新潮，将另有一番新意。我们期待该书再版时，作者能考虑这一意见。

（原载1988年4月5日《吉林日报》）

《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曲戈、盛广智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定价2.80元。



## 徜徉于心海与艺海之间 ——评高楠的《艺术心理学》

李兴武

一部大书摆在案头，几次想读它，都被砖头一样的厚度吓得缩回了手，近来偶尔浏览一下，竟被书中那泉涌的文思、精彩的议论吸引住了，再也不忍释手，仿佛与作者一起徜徉于心海与艺海之间，随着他的指点，看到了无数的心理的和艺术的胜迹。这部书就是高楠著的《艺术心理学》。

近年来探讨艺术心理的书已出了好几本，但是这部书无论在宏观的构架上，还是在微观的描述上，它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丰姿，是其他的书所不能代替的。

这部书的最大特色是兼取众长，融会古今，贯通中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西方众多的心理学派、美学流派、艺术理论，大都只有片面的真理性，即在某一点上突破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再以点带面地用这种理论去解释整个世界，去解释人、人的心理和艺术。这样，当他们的理论只局限于自己的重点研究对象时，就显得睿智而深刻，到处都闪烁着令人惊赞的真理之光；而当他们的理论一旦超越自己重点的研究对象，并以此来解释整个世界时，于是就成了独眼蹙足的王子，尽管自己尽力装点王子的威严。

《艺术心理学》的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依据哪个心理学或美学流派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而是以恢宏大度的科学态度，客观实际的综合方法来构筑自己的学科体系。他实现了两个综合：一个是对客观存在的艺术心理现象的综合；一个是对各个心理学派别的理论的综合。在两个综合中又以前一个综合为主，即把大量的艺术心理现象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体系，再以后一个综合为辅，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去解释和说明这些艺术心理现象。譬如为了阐明艺术的本质在于人的生命的需要，是人的追求情感形态的自我实现，作者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参照比较，既指明了他们的理论的各自的利弊，也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论点。这样做的结果就避免了目前艺术心理学研究的两个弊端：一是以某一派的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的理论为框架，填充进去一些艺术现象的实例。一是将各派心理学的成果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中，但却不能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将这些理论统帅起来，整个体系变成了局部没联系的一堆积木，或一件虽有联系却没有内在联系的百衲衣。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高屋建瓴之势，单刀直入地阐述、解释艺术理论难题。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关于人的情感的理论，艺术形式的整体依据是唤情结构，艺术创作和欣赏所依赖的灵感和想象也不不具有情感的性质，从表面上看全书倾向于西方的表现论美学。这样就势必产生一个问题：如何涵盖大量的再现艺术呢？假如把大量的再现艺术抛出自己的理论视域之外，而显然有片面的真理性，该书的作者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解决这个难题贯穿在全书的始终。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人在情感方面的自我实现，但这情感的自我实现不是大哭大叫，而要具有意象性，是积郁于胸中的感受或情感的意象性表现，从而通过意象这个概念把情感和现实统摄起来了。他把一件艺术作品称之为一种唤情结构，但认为唤情结构是由对象和主体两个方面构成的，是这两个方面所形成的同形同构。他认为艺术想象要以创作主

体的情感为主导，是充分自由的，但任何自由都要为必然所制约，所以艺术想象又要遵从生活的逻辑，艺术作品中的性格的发展具有他治性，即要与作者对他的认识相切合，同时又有自治性，即要符合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这一系列的具体论述，无疑拓宽了情感这条主线，从而把情感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将表现论的美学同再现论的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一些具有二律背反性质的美学难题的解决。

这部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一些具体的心理现象和艺术现象分析得细腻、周延、入情入理、新鲜深刻。作者举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日常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来说明艺术知觉的情感变形。笔底波澜，妙趣横生。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因为全书都是以心理现象和艺术现象来说明艺术心理问题的，这种既是诗意义兼警哲的风格可以说贯穿全书。

（原载 1988 年 4 月 18 日《辽宁日报》）

《艺术心理学》高楠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定价 5.10 元。

## 让思维超越常规的框架 ——读《灵感学引论》

刘林元

读我国第一部灵感学专著——《灵感学引论》，深感研究这种突破性创造思维，在今天有着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 19 世纪末起，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两次大革命，它意味着对旧的模式、规范的突破，对常规思维框架的超越；意味着人类的多种实践认识活动的新的飞跃。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在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大变革、大飞跃的形势，迫切要求人们加强对超越常规的突破性创造思维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人类的许多突破性创造成果往往是与灵感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也指出“灵感与现象，自古以来为科学家孕育出无数伟大的创造杰作”。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更是把灵感的涌现、直觉的闪光作为他的科学史发展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作为科学革命中实现规范转换、认识飞跃的心理形式。灵感为什么能引导思维超越常规框架并具有奇特的突破性创造功能呢？库恩在其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说：“新的规范，或者以后环节容许的充分暗示，有时是在午夜，在深深地处于危机中的一个人的思想里突然出现的。那最后阶段的性质是什么？一个人是怎样发明（或者发现他已经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的，它给予那时聚集起来的全部资料的秩序？这一切在这里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永远是这样。”可见灵感确实是个难解的千古理论之谜。但它并非是“永远不可思议”、不可认识的东西。

在解这个千古理论之谜上，《灵感学引论》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运用心理学，特别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糅以我国学者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提出了灵感激发系统的一般结构模式，对灵感思维规律的认识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思维过程看作是人脑的信息处理和加工过程。思维效果的高低往往决定于怎样利用专业知识和启发知识组织搜寻策略。思维解題的搜寻方法可分为强方法与弱方法两大类。强方法在解題时首先搜寻，激活与课题有密切关系的现成专业知识、背景观念和成功思路，将问题情境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然后或者在长时记忆中直接寻找现成的和近似的答案，或者借助演绎法、归纳法从与课题有关的专业知识和资料中进行间接的逻辑推导。这种方法能有效地解决常规课题，但只能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进行创造。弱方法与强方法相反，由于研究对象是反常课题，在解題中超出原有知识框架，没有现成答案可提供，为此，其解决问题的过程像缺乏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新手那样，以尝试和易变为特征，常常搜寻、借用不相关的其它领域的知识，用启发式类比法来获得新答案。

《灵感学引论》研究了人们在解題过程中的各种心理活动的特点以及相互关系，认为对实践活动中提出的研究课题，人们一般习惯于首先借用以前的相关知识、常规思路，用强方法去解决。但是，当遇到用已有的科学原理、知识、观念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反常课题时，循守常规的强方法就无能为力

力。这时，人们的思维就陷入困境。然而，解题的迫切愿望使大脑长期处于需求——紧张心理状态，在已有相关观念中搜寻的强方法造成了大脑皮层连续的优势兴奋中心区和强烈“危机意识”、思维定势。这几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综合起来，就在大脑皮层某一部位造成具有高能量诱发势态的心理场。这种高能量的诱发势态反作用于偶然机遇和潜意识活动，就能敏锐地抓住或诱发出传统思路之外的触发信息，从而给人以新的启示，打破旧的思维定势，拓宽原有的思路，实现“智力叛逆”，获得超出常规的突破性创造成果。这种高级认识阶段上的心灵受激感应活动，巧妙地把强方法与弱方法沟通起来，自然地完成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过渡。正是从这种巧妙自然地沟通、转换、过渡中，《灵感学引论》用简洁、明了、透彻的科学语言向人们层层解析这个“千古理论之谜”，揭示了灵感所具有的突破性创造功能的心理机制。

在全书体系结构的安排上，《灵感学引论》也颇具特色。在“导言”中，作者首先向人们介绍了灵感现象的三大奇妙性、灵感理论的不成熟性、灵感研究的曲折和重要性，引人入胜地提出了这个难解的千古理论之谜。接着在有声有色地回顾灵感理论在西方的嬗变和在我国的独特发展之后（第一、第二章），将灵感激发系统的结构模式和盘托出（第三章），让读者有一个总体的宏观的鸟瞰。然后以此为纲，分述创造性课题与第一境界（第四章）、诱发势态与第二境界（第五章）、触发信息与第三境界（第六章）、兴会顿悟、逻辑整理、实践检验（第七章）等过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十分关心的灵感与人脑中的潜意识活动（第八章）、灵感与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第九章）、灵感与现代科学发现逻辑（第十章）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很多独特、新颖的见解。

文字活泼，材料生动，读了就放不下，是《灵感学引论》的又一个特点。全书处处注意紧密联系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创造的实际，剖析了古今中外 100 多个较为著名的灵感实例，资料丰富，史论结合，信息量大，科学性、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并重；并且专门讨论了如何自觉运用灵感激发规律、激扬创造智能、让思维超越常规框架的具体方法和有效途径（第十一、十二章），把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较好地结合起来，一扫灵感研究领域中长期弥漫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玄学主义的迷雾，对指导发明创造活动，激励改革创新意识，提高开拓创造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本书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灵感学引论》是两位青年作者十多年来业务研究、辛勤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去，人们往往把认识领域的灵感问题拱手让给唯心主义，但作者通过他们的科学探索，雄辩地说明了，灵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它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将灵感问题从神秘引向科学。《灵感学引论》在这方面的意义，我们要给予足够的注意。当然，既是探索，就不能保证十全十美，不能认为这本书所提出的模式即是灵感学的定论。正如书名所标明的，《灵感学引论》仅仅是个“引论”。作为“引论”，它的任务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对这个千古理论之谜去作更深入更科学的探索，促进人类智慧向更高的文明阶梯的腾飞！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4期）

《灵感学引论》陶伯华、朱亚燕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定价2.40元。

## 更大范围内的综合

——《文艺美学辞典》评介

马玉峰

任何一部辞书，哪怕是某一领域、某一学科分支的辞书，都应该体现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综合，更深刻程度上的摄取。由王向峰教授主编的《文艺美学辞典》，是一部内容浩瀚、专业性很强的美学辞典。它不仅为美学研究者们提供检索资料的方便条件，也是广大美学爱好者窥视美学世界的窗口。

这部辞书的体例是按文艺美学构成系统进行编列的，共分五大类，设计辞条 1200 多个。在内容上，它不但囊括了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美学家、美学著作和各种流派、观点，还旁及了生活美学、实用美学的有关理论和基础知识。它不但归纳了东方美学研究成果，也概括了西方美学的精华；不但继承了传统美学规范性的论述，也吸取了现代西方美学的积极因素。《文艺美学辞典》的编辑和出版，在国内是一项有首创性和开拓性的学术工作。

这部辞书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是体现了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的贯通。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辞条的设计上，有一般美学、文艺学辞书所拥有的基本理论、作家作品、观点流派，也有一般美学、文艺学辞书所根本未收的新成果、新流派。更反映在对条目内容的具体阐释上，比如关于“美的本质”，这是美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无数美学家争论不休的难题。目前还不具备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规范性的解释，于是辞书采取了复释的办法，把历史上和当代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列起来，几乎是对美学研究历程的客观展示。王向峰的释文重点阐述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观点。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在《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自然、社会和艺术中都可以找到确证的实例。这一命题的提出，为美的本质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洪凤桐的释文着重介绍了朱光潜先生关于“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观点，这是朱先生美学体系的基本构架之一，在我国现代美学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严昭柱的释文介绍了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西方美学家关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使读者粗略了解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全貌。周金环编述的“美的本质”，主要介绍了李泽厚关于美是真、善统一的观点，代表了建国以来中青年美学家研究的成果。一个条目，从四种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学术态度是谨慎客观的，也使读者不费气力便把握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现状。类似这样采取复释办法的条目还有“美的规律”、“美感”、“自然的人化”等等。这些条目大多是美学领域中的“热点”，也往往是众说纷纭的研究课题。

二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美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它应该打破国度、民族的界限。近几年，西方美学论著像潮水一样涌进国门，相对而言，我们对自己传统的东西却发掘得甚少。其实，中国古代美学的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许多富于现代意味的成分。我们应该把东、西方美学融合起来，使之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协调地发展。在这方面，《文艺美学辞典》有一定的自觉性。它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美学辞书，也不是对古代文论的注释，而是充分吸取东、西方美学研究的成果，借它山之石尽为我用。比如“审美知觉”条，诠释者借鉴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和心理分析美学的结论，界定了辞条的内涵。在进行具体说明时，列举了美国艺术心理学家冈布里奇

提到过的原始民族在观察狮子星座时的不同知觉反映，用以说明心理“期待”在知觉中的地位；用我国京剧中“以鞭代马”的虚拟程式，说明审美知觉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生理心理反应。这样的注释，有西方的科学性，也具有东方的特色，很容易唤起读者的审美经验，从而达到理解。

三是横向扩延，纵向拓展，体现更大范围内的综合。这部辞书以文艺的共同规律为主干，从审美的角度进行解析，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文艺学辞典。艺术美是一种反映形态的美，它是自然美、现实美的升华和结晶。因此，凡是与艺术美关系密切的其他形态的美学原理，在辞书中也均有涉猎。在纵向深度上，由于物质媒介差异，各种艺术门类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因此，辞书对音乐、舞蹈、绘画、电影、工艺美术、摄影、书法、建筑等也都有相应的词条设计，这就使这部辞书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文艺美学百科全书的性质。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部辞书的出版，对文艺美学的发展可能具备两重意义：一是普及有关的美学知识，使广大群众掌握他们需要的启发诱导；二是依靠读者自己的努力，间接地即反作用地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这样的评价和估计是中肯的。“授者即受者”，反过来，“受者”也可以成为“授者”，审美教育应该带有全民性。

（原载 1988 年 8 月 15 日《辽宁日报》）

《文艺美学辞典》王向峰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定价 18.00 元。

## 聚珍敛宝独辟新境 ——读《西方美学思想史》

高楠

西方美学史的系统研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特别在我国美学界巨匠朱光潜先生的力作《西方美学史》已经标立的情况下，以朱先生的美学阅历之博，占有材料之丰，钻研美学之深邃，很容易使后来想另就西方美学史论著者怯步。

但问题是史的研究总难免囿于研究者的思想体系，无论研究者怎样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合于客观实际，他个人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对于史的研究的局限。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是以他的美学思想体系作为选材、分析、论述、贯通依据的，是朱光潜观点的西方美学史。这对于朱光潜说，自然是他的美学观点在历史研究中的成功运用，但对于整个西方美学史来说，则只能算是见之一面而不是见之全体。对西方美学史的系统著述，如果只有一个人的一部书，那就好像只从一个方面去识物，不可能获得全貌。而当代美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对美学史多角度地、全面地把握的。美学史研究的高难度和这一研究的现实贫乏迫切需要美学功底深厚的学者有勇气拿出新的研究成果。现在，有这样一部系统研究西方美学史的新著问世了，这就是杨恩寰教授积多年心血所完成的《西方美学思想史》。

打破国内在西方美学史系统研究中朱光潜先生独步的局面，开辟了这一研究的新境界，可以说是《西方美学思想史》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

具体说来，这一总体印象可以得于如下几个方面：

以美学的实践观点为评述的理论依据，为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掌握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众所周知，实践观点美学，是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肯定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认为美产生于物质实践，是生之于实践的自由形式。《西方美学思想史》正是这一观点运用于西方美学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一点，只要把《西方美学思想史》与朱光潜的以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一观点为基本理论依据而完成的《西方美学史》做以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对某些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的概述，就能明显地看出不同的理论依据所造成的差异。以康德为例，两部著作都用较多的笔墨阐述了康德的“美的分析”。朱光潜认为，康德的所谓审美判断，是“对象的形式”所引起的一种愉快的感觉，“它可以说是对于对象形式与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内外契合，见出宇宙秩序的巧妙安排所感到的欣慰”。这里，对象提供了形式，主体对这形式产生了不涉及欲望与概念的愉悦，于是就有了审美判断，也就有了美。这很显然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在朱光潜看来，这种主客观统一的审美活动很类似于实践活动——“它不单纯是实践活动而却近于实践活动，它不单纯是认识活动而却近于认识活动，所以它是认识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基于主客观统一的理解，朱光潜完成了对康德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杨恩寰对于康德的“美的分析”的理解则与朱光潜不同，他依据实践观点，肯定唯心论美学必然认为美在心而不在物，康德美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美学，所以在他那里，绝不是就对象的形式而言，审美判断也不是对于对象形式的判断，而是主体对于自己心中所形成的表象的判断，“就美学本身看，他对美的第一个规定，



把美完全看成是主观的表象，与对象的存在无关”。由于杨恩寰把康德的美理解为表象，把他的审美判断力理解为表象的判断力，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于“判断力批判”所以能成为另外两个“批判”的桥梁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见于他对康德的美论与崇高论的综合之中：“美是想象力和悟性的自由和谐，崇高则是想象力和理性的结合……这种从‘美的分析’到‘崇高的分析’的‘迁移’，表现了从‘纯粹理性批判’向‘实践理性批判’过渡中的两个小过渡。”从朱光潜所理解的“形式”（客观的）到杨恩寰所理解的“表象”（主观的），这种差异，与两人所各自运用的理论依据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在面对任何对象时，都只能用自己的依据去理解。

不同的理论依据在两部著作中所造成的内容差异，除了见于对代表人物美学观点的理解与概述，更见于对其美学观点的不同评价。仅以对鲍姆嘉通的评价为例。这位美学之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丑的事物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较美的事物也可以用一种丑的方式去想。朱光潜与杨恩寰各用自己的理论依据理解与评价这一观点，便有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杨恩寰以实践观点美学的美的客观性为依据，认为这一观点把美丑看作是以主体的“感性审辨力”为转移的，因此结论说：“这样，鲍姆嘉通就把美丑归之于主体认识，看作观念的完善与否了。”朱光潜则不然，他从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基本观点出发，从鲍姆嘉通的观点中品出了美既在客观对象又在主观心灵的味道。因此他说：“鲍姆嘉通承认离开认识主体的‘对象和物质’本身可以有美，但认为美学所研究的是凭感官认识到的美，这种美不能脱离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美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一个定义就同时顾到客观性质与主观认识。”

《西方美学思想史》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各自依据着不同于对方的美学理论，完成了各自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毋庸赘言，美学的实践观点和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的美学观点是在彼此的争论中发展与完善的。通过读朱光潜的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实践观点；通过研究实践观点也才能更好地掌握朱光潜的观点。而且，美学的发展仅囿于一派之见又是绝不可能的。从这样的角度评价《西方美学思想史》，就不难认识它意义的重要。这是两大派美学论争向西方美学史领域的延伸，这是实践观点美学在西方美学史领域的一次成功的运用，它强化了实践观点美学的薄弱环节。尽管朱光潜先生已经做古，尽管国内美学领域的派别之争已经相对的消沉，但作为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互补，《西方美学思想史》仍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于当代乃至后来的美学研究者。

说《西方美学思想史》开辟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新境界，还在于这部著作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较重于艺术论的评述不同，它更重于美的哲学和审美心理学理论的评述。如《西方美学思想史》的绪论所说，西方美学史是属于历史美学的范畴，历史美学包括美学（思想学说）史，还包括审美意识史。趣味流变史和艺术风格史均属审美意识史，不在此书研究之列。此书只是以“西方哲学家、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中的美学言论、学说为依据，来叙述和描述西方美学（不包括现代）理论演变发展的历史，而以西方审美意识作为背景材料只做适当的涉及。”作者如此确定这部著作的研究和描述内容是有道理的。这有助于内容的紧凑、思路的集中，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捋出一条思想史的线索并钩深取极；同时，这也可以不必再重述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描述细密、分析透辟的内容。这对作者说是避彼之长，

就己之长，对整个美学史研究来说是补足了空白，厚实了薄弱，而对读者，则不仅提供了西方美学史的新的把握角度，也提供了新的内容。这一点体现在选择评述的代表人物上，朱光潜是更侧重于对审美意识论包括艺术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者，杨恩寰则更注重在美学思想史中有重要影响者；对同一个代表人物的观点或学说进行评述时，朱光潜也常常是侧重于审美意识史的方面，杨恩寰则常侧重于审美思想史方面。

《西方美学思想史》的再一个突出之处，是它对各代表人物的学说或观点进行评述时，注意指出该学说或观点的前承及后延，并基于此给予画龙点睛的评价。这部著作的体例取的是依时间顺序确定人物位置的列传形式，这种形式宜于把各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阐述清楚，但处理不好，也容易使史的发展线索被割裂。作者在对具体人物的评述中，随处地交待一下某一观点或说法之所由来，又随处地点示一下这一观点或说法后来又影响了谁，比如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居有重要位置，英国经验派的不同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对后来的影响广泛而且复杂，它可以是西方历史美学发展演变中的一个枢纽。对这样一个枢纽，作者在评述中就特别注意点示清楚不同的思想观点对于后人的影响。如对于休谟美学中人性结构研究的基本倾向，作者精当地指出，“它不仅为德国古典美学家如康德所重视，而且得到近代西方美学的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观点和材料印证……似乎可以在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同构说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的美是性力冲动的对象的观点中发现某种一致性”。对于柏克的美学思想，作者又点示道：“他的美学开始转向客体对象品质的分析，启发了狄德罗，特别是对崇高观念的探讨，更影响了康德。”

《西方美学思想史》给人印象深刻的第四点，是它对于代表人物美学思想的叙述，能抓住复杂思想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用精炼的文字，把一种思想或观点概述得透彻晓畅。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1期）

《西方美学思想史》杨恩寰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定价7.00元。

## 《西方美学思想史》述评

丁 枫

在北京昌平开美学年会的时候，杨恩寰同志告诉我，回去将寄我一本新书。我很高兴，猜想一定是《西方美学思想史》（以下简称《美学史》）。果然不错。

这本书我期待很久了，早在四、五年前，他就同我谈过写了这样一本书，但迟迟不见问世。现在知道了，那时他已经完成了《西方美学思想史略》的书稿，但不急于付梓，又把这“史略”作为初稿，作为起点，边教学，边修改，边充实、增订，历时五年，终于把这一部无论从结构、立论，还是史料、文字，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著作奉献给读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如今拜读这部大作，的确使人感到处处都写得很认真，不同于那些炒冷饭，打快拳，甚至抄抄拼拼、粗制滥造的东西。

《美学史》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写得干净利落，清晰而有条理。这部《美学史》的上限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下限止于上个世纪末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取舍很严，以19世纪末为限，即使与20世纪搭界的美学家，诸如立普斯、克罗奇等，也都忍痛割爱了。

《美学史》把整个西方美学（除去现代部分）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 西方美学的初始阶段（即古希腊罗马时期）；2. 在宗教神学笼罩下迂回曲折趋向人性复归的阶段（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3. 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4. 充实、发展、完善的阶段，或叫做理论形态化阶段（主要是德国古典美学阶段）。这四个阶段大体与欧洲史的分期相照应。在这里，作者充分地注意到美学史的演进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妥善地处理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学的历史与社会通史，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发展史的联系与区别。这样就使得《美学史》所理出的西方美学从萌芽、成长到独立、完善等各个阶段，都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划分得有根有据。

在《美学史》的分期中，作者一再强调了西方美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这是很有价值的见解。远在古代希腊的美学思想中，作者就已发掘出它的人本主义的萌芽，而且指出了苏格拉底之后，在柏拉图的神学目的论倾向与亚里斯多德的人本学倾向之间所形成的“双峰对峙”，从而找到了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矛盾。作者认为，西方美学在其始初阶段，“是在神性与人性、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发展的，导致双峰对峙，双向分流，而最后则趋向于神性，走向天国，把审美引向宗教”。而第二个阶段即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则“是在神性压制人性、人性摆脱神性的冲突斗争中发展的，最后走向人性的开始复归，从而又把审美从天国中拉回现实”。到了西方美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作者认为，“由于从多侧面多角度展开对人性的研究，终于导致把美学作为感性知识的科学而被提了出来”。至于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第四个阶段，作者虽然没有继续沿着人本主义的线索做出概括，但《美学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另外的一些美学家，他们都对人的心灵、理性充满了崇敬。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体系（不管这些方式和体系有时是多么蹩脚），使得西方人本主义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升华。这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读者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美学史》是一部精益求精的著作。以后倘有机会，相信它一定会修订得更好。那么，我就再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以供修订时参考。第一点是关于章节的划分。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全书末尾的第十一章，共七章全部冠以“近代西方美学”的题目，只是在其后标明了顺序和副标题。这样设想，时间跨度太大，特别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搞得比较模糊。第二点是觉得有几位大家被忽略了。比如卢梭，再比如叔本华。

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以上写了这么多，姑妄言之吧。

（原载 1989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审美王国的青春颂 ——谈谈《青年审美心理》

冬 风

美的研究属于哲学，哲学对很多人是门高深的学问；审美中心灵活动的探索属于心理学，心理学对很多人也同样高深。唯有通过哲学和心理学才能深入研究的青年审美心理，尽管它最经常地见于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却对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代生活绚丽多彩的美燃烧起青年人探索审美心理奥秘的极大热情，而有深度地揭示这个奥秘，使之合于大多数青年人的接受水平，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高楠著的《青年审美心理》一书，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这本书从当代青年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活动入手，以美学与心理学为其理论支柱，努力把青年审美中的问题从美学的高度提出来，进行心理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青年心理活动的独特依据，追求青年审美实践、美学理论与青年心理学理论的相互结合。可以说，《青年审美心理》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它既有审美心理学理论的总体构架和理论深度，同时，又较好地考虑了当代青年的知识结构，从阐述的方法到阐述的形式，都宜于为广大青年读者所接受。它是近年来所出版的同类书中的成就突出者。

从当代青年的审美实践出发，根据审美心理学理论构架的需要，确定全书的总体结构，保证全书内容的系统性，是《青年审美心理》的一个突出特征。研究青年审美心理，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一是依青年审美现象分条目，提问题，然后逐一地给予美学与心理学理论的分析与解答；一是按照一般审美心理学的理论展开逻辑确立章节，只是在阐述中更多地涉及青年审美现象和青年心理学知识。这两种方法各有其利也各有其弊。第一种方法属于现象解释型，容易写得通俗易懂，平易生动，但理论的逻辑联系却被现象所分割、所打乱，因此，也就失去了知识的系统性。第二种方法属于理论例证型，理论是比较系统的，比较严谨深刻，但却难以与实践相融，因此不易为广大青年读者所理解接受。《青年审美心理》避免了对这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的单一使用，而是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由青年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入手，进而向审美实践的理论应用延伸，并且在应用中，尽管循着由浅入深，由简单而复杂的逻辑顺序，这便保证了理论脉络的明晰。比如书的第一部分“青年与审美”，从青年心理学的角度论及了与审美相关的青年心理特征；第二部分“审美的心理条件”，则又是从一般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论及了审美中想象、情感、理解、注意等心理条件。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美学与青年心理学相融合的理论依据。起笔便见出了深度。随着理论基础的确定，作者又根据对于青年审美实践的分类，安排全书展开的构架，突出了实践性特点，而理论脉络则由明而暗，但并不碎乱，这又是得力于审美实践的每一分类即全书的每一部分，作者都设一章专谈该部分的理论依据，以此做为对整个这一部分的理论提领。如在“生活与审美”部分中，第一篇“饮不尽的美酒”，概述了生活与美的美学理论，接下去各篇则是对于多种生活美的展开分析。在“自然与审美”部分中，把“神秘的自然之神”作为第一篇，从美学理论中的难点自然美的价值问题入笔，以此提领对多种自然美现象进行分析的各篇。《青年审美心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较充分地体现在全书

的宏观结构上，证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确实取得了成效。

《青年审美心理》从当代青年的审美特点出发，对当代青年的审美活动所进行的心理学探索，能够见出作者理论拓深的魄力，有些观点对于审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比如在“审美的心理条件”部分中“勇敢的超越”这一篇，论及了审美中心理定势的形成及其突破的问题。定势理论，是心理学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但将之用到审美活动中来，用于对审美趣味问题的分析与阐述，其理论深度是应该肯定的。在“艺术与审美”部分中，“不仅仅是流泪”和“笑一笑十年少”这两篇，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悲剧与喜剧，并从这一角度规定了悲剧感与喜剧感的概念：“悲剧感，一言以蔽之，就是失去人格征服力的痛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升华的心境和谐”；“欣赏喜剧的心理感受即喜剧感，乃是面对虚饰从完美形式的有缺欠的人格而生的居高临下的情感评价”。这类规定是具有创见性的，而且从文中的论证来看，也是有说服力的。《青年审美心理》是具有实用性和通俗性的理论读物，这类读物能够不失理论深度，并在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有所创见，是不容易的事情。在实践迫切需要理论指导，理论也迫切需要实践中发展的当代生活中，这也是此类读物应力争达到的效果。这样看来，《青年审美心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更值得肯定了。

细致、生动又不失深度的现象分析，是一部应用性理论读物所不可少的。

《青年审美心理》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比如“生活与审美”部分中“身在画中游”一篇，谈环境美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一直是生活美学中的一个问题，但在当代生活中它却显得格外突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使环境美的追求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用美学与审美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的。“文化的表征，思想的形象”一篇，谈服饰的文化依据、审美依据，对人们追求服饰美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的审美心理学的分析，在服饰美越来越为人们所看重、所追求的当代，无论对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还是指导这一现象向更合于审美和审美心理规律的方向发展，都有其积极意义。在“爱情与审美”部分中，作者根据爱情在青年生活中的特殊意义，用了较多的笔墨，对爱情各个发展阶段与审美、审美心理的关系都做了生动的现象描述和较深刻的理论分析。如在“最初的震颤”一篇中，对于爱情初始阶段审美注意的形成这一微妙现象，作者指出它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动的注意，一是被动的注意；并进而分析了这两种情况的依据——顺向依据和逆向依据。这类分析很有层次性，入情入理，使人愿意接受。

给当代青年人写理论读物，靠板着脸孔说教是不行的，冷冰冰地谈玄说奥也不容易被接受，至于搜寻一些有刺激性的例子或者进行一些具有某种诱惑性的描述，更不会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尊重与信赖，最终失去他们是不可避免的。《青年审美心理》在这一点上很值得称道。从大量的例证中看得出来，作者熟知青年生活，有很多青年朋友，因此在分析中才做到了释人所惑，启人思。而且，在行文的字里行间，处处能看到作者所流露出的对于当代青年人的热情和爱。这种热情和爱，从该书前言的一段文字中也可以见出：“书中所说到的那些青年的审美经验，对于我来说，有的已成为过去，有的是终未实现的理想。……而你们，却正在中华大地以前所未有过的适宜环境中尽情地享受着美的青春、青春的美。你们是何等的幸福啊。”应该说，正由于有了如此的热情和挚爱，才有了全书如此精心安排的构架，有了如此

耐心而不失深刻的分析与论证，也才有了各篇如散文一般优美的论述语言。

《青年审美心理》这曲审美王国中的青春颂歌是会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所喜爱的。

（原载《出版工作》1989年第5期）

《青年审美心理》高楠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定价3.50元。

## 那一代中国哲学家 ——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郭小平

我一向以为，学好哲学，除了得啃经典名著而外，还须得读几本出自大家手笔的哲学史著作。读这类书所能获得的益处是读通常我们见到的那些哲学史教科书难以替代的。在教科书中，思想常常已经枯槁或支离破碎了，剩下的只是对观点和史料豆腐干式的拼排。而在前者那里，你却能把握到思想鲜活的脉动。贺麟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当之无愧地应算在大家手笔之列的。

贺先生的这些文字写于也已差不多五十年前了，主要论及的是自 1844 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到 40 年代中国哲学历经的变迁。书中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如张颐、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郑昕等都曾是贺先生的师友同事，所以对他们的思想的叙述在客观中肯之外，还让人读出几分亲近贴切的感受来。对于我们这些在解放后才成为贺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后辈来说，贺先生在书中讲到的那一段哲学，已经是属于“历史”属于“传统”的了，已经是“间距化”了的文本了，尽管从根上说来，我们就正是与这历史、这传统融为一体的。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将贺先生书中提到的哲学家称作那一代哲学家了，不过在他们那里，能找到我们的影子；从他们的如彼，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我们的如此。

贺先生在书中论及的那一时期，无论就当时的整个文化氛围来说还是单就哲学界来说，都称得上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力量的抵牾交锋，使得“许多激烈趋新之人，转瞬便变成迂庸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在文化领域，传统儒家思想的失去生气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涌入是两大主要特征。随着“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呼出，中国许多的文化人都觉得应该换换脑子了。毋需否认，对传统的全面反省和批评总是以现实为着眼点的。老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理通常便是从传统之中引伸出来的。问题在于，历史和传统并不是一个凝固的过去，它们还包含着现实及将来“发生”的开放性。无怪乎海德格尔从词源学上来考察，认为德语中的 Geschichte（历史）一词源自 Geschehen（发生）。即使是对历史和传统深恶痛绝的人，仔细追究起来，他们在许多方面仍难于斩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先人思想滋润起来的藤藤蔓蔓，甚至他们用以表示与传统决绝的语言或行动方式，也必然地带有传统与历史赋予的痕迹。当然也无可否认，在当时，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是一个“事实”，因此和它发生关系也是必然的。中国哲学之进入“现代”这个门槛也如同整个中国历史一样，是以西方的进入为标志的，无论是抵死守护国粹的人，还是竭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们之有别于孔孟程朱陆王之处，正在于他们必须采取某种态度面对近现代的西方思想。这样，中国哲学思想的相互碰撞、震荡、融通、契合便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情景中，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沈有鼎、谢幼伟、施友忠、唐君毅、牟宗三这一代哲学家登场了。如贺先生所说，在他们那里，“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



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和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的，即使是专治中国哲学而并没有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者，也不会不感受到那些泊洋过来的学问对自己的领域带来的冲击。贺麟先生早年曾留学西欧，在他看来，对中国哲学的调整是和对西方文化吸收、转化、利用、陶熔分不开的。所以他在书中将绍述的主要线索确定在西洋各派哲学流入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的冲击和各位哲人在中西哲学的这种交汇中所起的作用上面。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使命，不仅规约了这一代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构成，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心态结构、治学方式、处世之道、政治信仰等等许多方面，它们截然不同，又似有某种暗通之处。下面只是从贺先生书中提到过的哲学家中择出几个自以为有些典型意义的人来，作一点狗尾续貂式的发挥。除思想的分析之外，我还想说几句的，是由思想而及人方面的话。

在中国现代思想家中，胡适称得上是一位鼎足人物。他的“暴得大名”与他以传统文化的否定者身份出现是分不开的。尽管有人将他视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确，但自1923年以后他的确屡屡发表主张“西化”的言论，并且当后来无争议的“全盘西化”派主要干将陈序经教授在经过“甄别”之后，声称胡适的思想“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之一支流”时，他竟如蒙受不白之冤，断然出来剖白自己是“完全赞同全盘西化的”。不过，认真追究起来，在他身上更鲜明体现出来的，倒毋宁说是两种文化的不协调乃至尖锐冲突。他虽被认为是“西化”论者，但肚子里的“国货”绝不比“洋货”少。意味深长的是，他之所以后来要公开鼓吹“全面西化”，乃是因为他信奉中国古代先人们说过的一个道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他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位是“化”不掉的。因此为了达到期望的以西方文化的朝气和锐气来打掉一点老文化的情性与暮气之目的，他以为“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情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到折衷调和上去”。（《独立评论》第一四二期“编辑后记”）而这样将纲领与真正欲达到的目标截然分开来，也许只有奉信实用主义哲学原则的胡适先生才会做得这样坦然自得和无滞碍。意味深长的是，从哲学角度来看，他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恐怕还得数《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尝试着引入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等新的方法来改造以清代考据学为代表的传统治学方法，并且提倡非儒家的诸子哲学，以减轻儒家定于一尊所带来的束缚与禁锢。单单这种研究本身，就表明他绝不竟至于做到如口头上不惮于说出的那样，将传统的价值统统归于虚无。不过有一点很明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估、整理或再造所取的尺度是从西方文化中引伸出来的，这一外来文化只是“施于人”，而没有受到应有的质疑、批评和调整，这样一种文化哲学观上的偏差也导致了胡适诸种主张中蕴涵着的另外一个文化哲学观方面的偏差，即传统只是消极的受动者，失去了积极创生的功能。由此，文化的批评及替代更新与文化的继承及发扬光大这两方面就被完全割裂乃至完全对立起来了。

作为一个哲学家，涉猎极广、到处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先生算不得深刻和思辨，实用主义的态度也成就不了严谨庞大的哲学体系。胡适先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作为也和他做的学问一样，证明了他中西两种文化氛围中分别受到的熏染并未能天然浑成地成为一色。譬如他曾想离政治远一些，只一心

钻到故纸堆里去，但又按捺不住时时过问政治，甚至还去当官做了大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接受了西方观念，却又声称：“吾于家庭之争，则从东方人。”一个洋博士终生维持着一场典型的旧式婚姻。这恐怕并不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妥协性一类的缘故，似乎还应该从那一代知识分子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另一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胡适一到北大便成了炙手可热的新派人物，而与他差不多同时进北大任教的漱溟先生开始还只是与新潮流不甚相干的讲授印度哲学的一位讲师。后来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此声名大噪。梁任公将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称学术界的这两部著作真算得国民的一种荣誉（《评胡适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贺麟先生亦谓该书“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梁先生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这类口号的，但做学问也已不尽是旧式儒生的路数。他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唯意志主义，还有印度的佛学、中国的儒家思想等都曾先后发生过兴趣。梁先生在比较东西文化的异同时，并不执著于孰优孰劣的意气之见，而是主张，中国现在需要西方的“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但世界未来最终会走上中国之路，“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比西方人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本书第11页）考察一下梁先生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成也是很有趣的，他的视野依陆王心学而展开，其间又染上了西方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颜色，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又在佛教唯识宗中找到了与西方唯意志主义理论和儒家之良知说的相契合之处。自始至终，生命、“心”的世界在梁先生的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

当时许多新创出来的哲学体系东西诸说杂揉，难免给人以支离、杂驳、不严谨之感。梁先生的学说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当然，梁先生做学问是极其真诚的，真诚到“信奉佛法时，便决心出世，独居茹素，过佛家的生活。后来因他的思想折到儒家一路，便随之改变生活，结婚肉食，发挥儒家思想，以解答当时甚为迫切的东西文化问题”。（本书第9页）他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研究与那些和现实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问题连接起来，因而常常在还来不及为自己的新见作出严密地论证和梳理时，便又舍旧求新去了。那时中国的哲学家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创造出的诸种体系，往往给人一种不沉稳的感觉，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学问的功底其实并不浅。我原以为，要成就抽象精深的哲学体系，应该少受一点现实的干扰才易于“入境”，而梁先生却不是这样洒脱心静的做学问法。据他自己说来，“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无论如何，把做学问的真诚和做人的真诚熔铸在一起的梁先生，其人其学问在历史上都留下了让人回味的重重一笔。

在那一代哲学家中，也有做很抽象的“纯”学问的人。金岳霖先生便是一个。

金先生是很典型的学院派哲学家。他所著的《论道》一书被贺先生称作“最具独创性的玄学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知识论》则被誉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空前的”、“体大精深”的认识论专著（张岱年先生语）。冯友兰先生后来在一篇怀念金先生的文章中曾写道：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

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他称金先生就是写这种技术性高、能读懂的人很少的专业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金先生这样类型的哲学家是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可以将这看作中国哲学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金先生在《论道》中提出了一套由道、式、能诸范畴组成的玄学系统。他在构成这套有独创性的系统时，用了许多宋明理学的旧名词，而内容主要还是与西方赫拉克利特、康德而来的那个传统接续起来的，在论证上也遵循了西方式的严密逻辑思维。所以，金先生似乎是在进行一项将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国化”的尝试。但这种“中国化”并不是一种简单复制或外在强加。且不说中国传统的哲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外壳，而本身就有意义的生命内在于其中，将从一种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植入到另一种文化传统之中（不是外在的、强迫性的取代）肯定会昭示出许多原来未有的新东西。金先生的创造成果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即它明明白白是中国学者做出来的学问，而不是西方学者做出来的学问，同时它明明白白是融汇了西方学术成就而成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哲学。金先生曾经指出过，传统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和认识论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杂芜不连贯。显然他的哲学力图要克服这一积弊。中国哲学家在今天该如何进入世界哲学研究的前沿，我以为金先生的成功是富有启发意味的。

一个体系的建造在现代哲学家那里，通常要求比古代哲学严密得多也繁琐得多的推理论证过程。这样，哲学的形式与欲通过这个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个哲学精神本身之间便有了一种分离的可能。从理论上讲，哲学家在生活中的根本态度是与他理论中要阐发出来的精神相一致的。但现在，这种一致性就没有那么显豁了。或者说，这给了哲学家一个在生活中游离于他的哲学精神之外的余地。他可以致力于哲学的技术性运作和训练，而不必非得像许多中国的传统哲学家和西方古代的苏格拉底那样，在生活中处处身体力行地将那个已并不那么简单明了的精神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金先生所做的技术性很高的学问使得他要超脱一些。但他并不追求也不一定喜欢这种超脱。他仍具有传统中国哲学家的“实践”精神，这也是西方古代苏格拉底式哲学家的信条，即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完成哲学理想的一部分。所以金先生感叹过，“哲学家与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

学院派的哲学家，其归宿无非是在大学或研究院里著书布道。但有一位哲学家的例外经历值得一提。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贺先生在本书中专门论及过的张铭鼎先生。西方近世大哲康德的思想之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张先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曾翻译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写过一系列绍述康德哲学的渊源、体系及影响的文章。张先生之看重康德，是因为他看重康德哲学中时时透出的理性主义精神，他认为康德哲学的精髓即在于，“他要依据着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但后来他就从哲学界隐去了。贺先生在书中亦为此感到遗憾。许多搞哲学的人都不知道，张先生后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恰巧由于我的老师杨一之先生与张先生是世交的好友，所以我得知了关于张先生后来的一些故事。

张铭鼎又名张铁生，30年代在柏林大学攻研哲学期间担任了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其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后来还担任过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建国后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过领导职务，1979年病逝于北京。我相信，像张铭鼎（铁生）这样优秀的哲学家之选择投身于革命肯定有出自哲学方面的理由作支持。或许他认定了，理性的最后召唤便是纯粹理性的扬弃，或者说理性的实践化。时至今日，我们固然不能忘记李达、艾思奇、沈志远等等当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不应当忘记张铭鼎先生这样的成为了职业革命者的哲学家。

最后还想说说贺麟先生本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和批判，是通过回到古代去寻找自己传统中那些被湮灭了的成份来进行的。在他们那里，“复古”倾向和“革命”倾向令人惊异地叠合在一起。贺麟先生在当时首先提出“新儒家”主张亦是出于相同的目的。西方人说“回到希腊去”，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都深深地植根于希腊文化之中。在贺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根，它的盛衰消长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同一不可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相反需破坏和扫除它的僵化和腐化部分，由此才可显出“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来。但贺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之能否由旧变新，由消亡转为复活，关键在于它能否“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所以在这里，中西文化的问题仍然是根本的一环。不过就哲学体系而言，贺先生的构思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而不是像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那样有了实实在在地相互紧密联系起来的各个部分。贺麟先生有一个观点却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民族哲学与西方的古典哲学从本质上说是能融汇贯通的、并进的、合流的，因为人类文化肯定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共同的目标取向。可以预料，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许多工作可做。不过贺先生本人在解放以后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体系构想，并且，他在研究译西方哲学大家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著述这一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得他作为自创体系的思想家这一面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立足于文化危机的现实，从离异、批判走向回归、重建，是许多东西方哲学家走过、今后也还会有人走的一条路。任何一种文化要保持自身的活力都离不开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之提出欧洲文化的危机问题正表明了哲学家的深邃洞察力。但批判并不是目的。所以尽管构造建设性体系的方案在今天是一个劳而无功且易授人以柄的费力气活，也总还有不少哲学家硬着头皮去干。世界在我们眼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传通交流越来越广泛和直接，在这个时代里，要关起门来洁身自好或自我陶醉肯定是难以做到的了。反过来，弃历史如敝屣，或竟至于幻想以一种外来文化传统来取代如此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像当年胡适之那样的虚张声势，那也是不自量力的一厢情愿。当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反省式的批评，揭露出它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负面因素来，同时有意地保持和增强它的开放性和可传通性，激发起它的活力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先生他们那一代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也是富有成效的。

当前，在各种场合被戴上“哲学家”桂冠的人，能数出的怕也不在少数，然而和贺先生他们那一辈学者相比，不少人的份量似乎很要打些折扣。譬如，贺先生书中论及的那一代哲学家，大多数无论中学西学，学养都是很到家的。

反观时下那些热衷于突破、创新，频频有“新观念”、“新视野”、“新构架”出世的“家”们，读书做学问的功夫就要逊色了。以为“前所未有”才意味着“面向未来”，其实是一个误会。须知历史本身从来都是面向未来的，甚至历史的批判之内在理由和根据也还得从历史之中去寻得。所以我总疑惑那些显不出多少根底来的林林总总的新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如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都不甚了了，对马克思学说也还陌生，恐怕也就谈不上如何正确对待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了。

（原载《读书》1990年第4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贺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定价3.15元。

## 当代西方美学思想一次成功的梳理与审辩 ——《当代西方美学思潮评述》评介

杨恩寰

看过李兴武新著《当代西方美学思潮评述》（以下简称《评述》）一书之后，又出现了读过一本好书所常有的那种心情，感到一种理性的满足和快慰，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唤醒，被驱动，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当代中国美学在改革和开放的大潮中似应实现双重任务：一是吸收当代世界美学研究成果，充实与完善自己；一是高扬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成就，走向并影响世界。二者相互渗透，对应发展，不可偏废。而目前，高扬中国美学不够，姑且不论；吸收外国美学又多有偏颇，似乎拿来则多，理辩则少，并不利于真正的吸收。如今译介，或全译或选择，洋洋大观，不可胜数，而理辩文章不多，著述更少，并且大多张扬肯定有余，批判否定不足，真正做到求是分析、正确评价者实在寥寥。由译介到吸收，理应经过理辩这一环节，恰是这一环节，相当薄弱。又兼当代西方美学观点纷杂，派别林立，对立、冲突、交错、重叠、渗透、纵横交织，相互纠缠，要想从中理出头绪，分清脉络，讲明关系，进而评论得失，决定去取，谈何容易？而《评述》却适时地做了这项艰巨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

《评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美学为理辩的指导思想，以奠基于实践的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相融合为尺度，对当代西方美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给以审辩。参照比较，详论得失，一分为二，不一味张扬，也不一律否定，强化了审辩工作。如在美的本体问题上，当代西方美学多有错误，或以美感取代美（自然主义美学），或把美视为想象（意识），对世界的否定、虚无化（存在主义美学），或把美归结为一种语言以取消美的客观本质（分析哲学美学），对美的本体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回答，《评述》均给以鲜明而彻底的否定。而在审美和艺术的问题上，当代西方美学却良莠混杂，功过参半，像对个体感性生命、本能欲望、无意识意向、直觉表现的张扬（直觉主义美学、精神分析学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像着眼于主体意识意向对审美客体的层次分析、对审美经验的过程描述（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像把审美经验视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最佳组织（自然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像对审美先见和审美期待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探讨（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都有某种合理性，并非一无是处。对此，《评述》以历史（美学）与哲学（美学）相结合的眼光加以审辩，既指出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什么，又指出它们提供和说明了什么，从而把它们的功能得失，贡献与局限，一一道出，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吸收提供了依据。

如上的审辩是以梳理为基础的，为要梳理必须深入各家各派纵向承续、横向渗透交织而成的网上的线和点，抓住它们之间的结合细部。就是在这里，《评述》敢于登堂入室，一览真面，剥笋锤钉，步步深入，探寻究竟，在细微处见功夫。柏格森主张借艺术直观人生，其直觉理论取自叔本华，而体察生命冲动又取自尼采。《评述》认定审美（艺术）以直觉面对人生是一种“综合取向”，清理了它的思想渊源。直觉概念意义颇为含混，当代西方美学对它并没有一致的规定和使用界限，在叔本华为纯然（超意志）观照，在柏格森为直观（现象）本质，在克罗齐为表现与创造。同是表现与创造，克罗齐

认为它是心灵赋予物质（感觉、印象）以形式，而科林伍德则认为表现的是情感，创造却凭想象。《评述》对直觉、表现概念的辨析，明确了它的多种含义和使用范围。深层心理作为审美（艺术）的动力，弗洛伊德说它是个体本能冲动、无意识欲望，荣格进一步说它是集体无意识原型（模式）。《评述》探寻了审美的深层心理动力学的演变。对审美经验的研究，茵加登通过审美经验过程三阶段的分析，重视审美客体（文学作品）并强调审美经验对审美客体转为审美对象（经验中的）的创造功能。《评述》以为这是对胡塞尔现象学张扬先验的自我即纯粹观念的偏离；而杜夫海纳扩大审美客体（包括自然与文化）与审美知觉（包括读者或观众）的范围并强调审美经验是二者的融合统一。《评述》认为这又是对茵加登的偏离。对美的规定，在萨特那里并不清晰。《评述》经过一番综合、发掘、阐释，认为萨特所谓的美其实就是自为（自由意识）即想象对自在的否定或虚无化，亦即非现实（想象）对象的具体性，从而厘定了萨特的美的概念，并找到它与现象学美学的关联。伽达默尔认为历史作品（包括审美作品）是人的存在，对历史作品的解释就是实现人的存在，从而提出审美先见（受历史文化影响）作为审美解释的前提；而历史作品作为人的存在又源自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的存在这一命题，审美先见后来又在姚斯那里演变为审美期待（趋向未来），就这样《评述》在伽达默尔那里找到了存在主义美学与接受美学的联系中介。诸如此类的细部考察，微观探索，在《评述》中比比皆是，或辨析，或厘定，或探源，或追索演变，或寻求中介，一一钩沉，使各家各派的美学观点更加确定而彰显，且考察翔实，分析入理，常有精彩之论，令人不时击节。

《评述》能深入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从总体上对当代西方美学进行宏观把握。当代西方美学确已突破传统美学那种单一课题的哲学研究，引进或创设了如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解释学等多种方法，增强了科学实证因素，致使有人预测美学将走向科学。多元化方法的引进或采用，加强了对美学问题的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研究，拓宽了美学研究的领域。《评述》肯定了这个事实，同时却又指出在这多元渗透、多重变奏中，仍然有一个主题，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人本主义，就是说当代西方美学大都高扬人本主义，这一洞见符合实际，大致不错。所谓人本就是以人为本体、本位，去探求审美现象的本原和本质。而人是个体又是群体，《评述》认为当代西方美学更重视或张扬个体，当然有的也注意到了群体，如荣格、杜威、列维——斯特劳斯、姚斯等等。作为个体，人是一个复杂结构，有外在行为活动结构，又有内在心理活动结构；在内在心理活动结构中，有深层本能情欲、需要欲望、无意识意向，有表层认知、意志、情感，有高层实践理性。《评述》认为当代西方美学更重视和张扬个体感性生命本能、原始情绪、直觉体验，换句话说，就是重视和张扬非理性、前逻辑的东西，当然也有顾及到理性的，如科林伍德、杜威、杜夫海纳等等，因而总是把审美（艺术）与感性、生命、直觉、意向、情感、经验这类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东西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本体论问题加以研究，尽管回答五花八门，却总离不开个体感性这一基本倾向。《评述》抓住了当代西方美学这一主题，这一基本倾向，无疑是把握了总体。这一总体的宏观把握并没有也不可能证明当代西方美学已完全脱离哲学而成为实证科学，反而证明当代西方美学不是从某种哲学出发就是又回归或上升为某种哲学，仍具有哲学性质。到目前为止，当代西方美学中的研究课题，哪怕是审美经验及其对应物艺术，仍然没有脱

离哲学探讨，其终极本质的回答仍然是哲学的。由此可见，《评述》那样不惜笔墨评介各家各派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或它的哲学结论并不是分外之举了。

经过从微观探索到宏观把握的梳理与审辨，《评述》以人本主义美学这个主流为纲，各学派为目，各学派代表人物为基元，按照各家各派的先后承续关系和内在逻辑联系，编织成一个凝结着研究思路和成果的有序结构，把当代西方美学思想有层次有系统地展示出来，使读者得以看到一本脉络清晰、审辨透辟、结构严谨的好书。

《评述》尚有未尽人意之处。一是把符号论美学排除在人本主义美学之外值得考虑。其实符合论美学所研究的课题情感符号（形式），如同其他符号（逻辑的、结构的）一样，都是人的存在与活动的形式，都是人的创造，仍是人本学的。二是为了观点和体系的需要，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和内容的安排，有时还带有强制性。三是论述行文有时重复，个别词语还欠推敲。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4期）

《当代西方美学思潮评述》李兴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定价6.20元。



## 读《中国传统思想探索》

金景芳

曹德本同志所写的《中国传统思想探索》一书，我读了以后，觉得有三大优点。

第一，他这部书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下写的。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根据大量的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二，中国传统思想经历的时间长，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人物、思想又特别复杂。曹德本同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剥蕉抽茧，苦心探索，得出公允、正确的结论，足见他对中国古代文献、历史和哲学有深厚的功力。第三，他经过精心探索，对中国传统思想概括出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的特点，一是重人伦的特点。关于民族的特点，带有普遍性。关于重人伦这点，曹德本同志真正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我研究中国古代史，觉得原始社会重视血缘关系这一点，毫不奇怪。及至文明社会，我觉得当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时，帝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很值得注意。尧创立新历法，其目的主要不是在知天，而是在利民。当时实行朔政制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春秋》文公十七年有“公四不视朔”的记载，《论语·八佾》说“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夏传《夏小正》，《礼记》存《月令》，以及封建社会历代有所谓“皇历”，溯本穷源，应知都是帝尧之时。《尚书》有帝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这一事实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孟子·滕文公上》也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但此也，《孟子·离娄下》也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还说，“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又，《周易》是讲什么的呢？《系辞传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系辞传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也就是《周易》实际上是讲天地人，而其归趋则在人的“定吉凶”，“生大业”上。我们在讲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时候，只从自古以来的尧舜和《周易》的思想，就可看出中国传统思想是重人伦了。

（原载 1991 年 4 月 10 日《光明日报》）

《中国传统思想探索》曹德本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出版，定价 9.00 元。

## 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

刘万泉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现当代哲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上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如何从理论上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规律，是摆在现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由赵德志、王本浩两位青年学者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一书，便是一部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开山之作。

《七十年》一书的最重要特色，是它的开创性。这首先表现在它是国内目前少见的、试图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国前的 30 年发展和建国后的 40 年发展统一起来进行考察的一部著作。一个时期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从“五四”讲到新中国成立，或者把建国后 40 年的哲学发展作为独立的内容加以叙述。其中，很少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迄今 70 年代进行系统考察的，而《七十年》的一个特色正在于它从“五四”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莅临一直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时期，把建国后 40 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视为“五四”后 30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继续，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更高层次的跃进。关于这一特色，正如南开大学方克立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说，由于这种全面的考察，“本书大体上反映出作为中国现代哲学之主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来发展历程，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本，开创之功不可没”。

《七十年》一书的开创性，也还在于它是一部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未来命运的一部著作。近年来，一些倡导儒学复兴的海外华裔学者，竟然提出儒学必将成为未来世界主导思想的观点。这一观点，涉及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未来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二者将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另外，在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国内也有些学者，经常议论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或儒家化的问题。我们承认传统儒学在今天仍有某种价值，也不否认儒学中的封建糟粕确实残存在一些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使他们的思想行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我们能否由此得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进程与方向，或者马克思主义已经封建化了的结论？对于这些目前思想战线上的尖锐问题，《七十年》一书以其坚实的根据、缜密的论证，给予了明确的否定的回答。作者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种开放性，既表现为它能够吸收一切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也表现为它能够不断地对新的思维成果、新的科学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开放性，保证了它能够在内容上、形式上不断自我更新，永远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从已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的传统中寻找出什么“永恒价值”，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中寻找出能够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精到的分析，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五四”迄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景式画卷。它的出版刊行，对于帮助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威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无可讳言，《七十年》一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它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论之甚少，对建国后哲学发展的叙述也失之简略。我们期盼着今后在这方面有更精深研究的佳作巨著问世。

（原载 1991 年 10 月 14 日《光明日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赵德志、王本浩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2 月出版，定价 5.50 元。

## 历史哲学的报春之作 ——《历史与民族精神》读后

李晓晶 江渤

在世界，历史与哲学的边缘学科——历史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始于18世纪。中国历史哲学产生的更早，但只在近代才有划时代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奋斗图强，摸索救国救民真理，先后产生了代表各个时期先进思想的历史哲学。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以公羊三世说为特征的历史循环论的历史哲学；有严复、章太炎、孙中山、胡适、梁漱溟、张东荪、钱穆、冯友兰等为代表，以进化论和复古论为特征的进化论的历史哲学；有郭沫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以唯物史观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这些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史学家、哲学家对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思想、道德、宗教等的各项方案和主张，对中国革命起过很大的影响作用。历史证明：先进的、成熟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保守的、不成熟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可见历史哲学的研究和自觉运用对革命、建设意义之重大。然而近几十年，在历史哲学这块科学园地里涉足者甚少。近日偶读李成溪的专著《历史与民族精神》甚喜。

此书采用评传式写作方式，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历史哲学加以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史料丰富，褒贬有据。尤其作者对历史哲学，采取了溯本求源、纵横深入的方法，从政治上、文化上、古今中外历史哲学的比较上加以研究和探讨，这就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历史哲学的内涵和真谛。

从政治方面来考察，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阐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章太炎等之所以早期崇尚进化，后期倾向复古；以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屡起屡伏，最终失败，皆因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与政治上具有先天的软弱性所致。又指出：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反作用”的明证。

从文化方面来考察，按学科划分，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并没有局限在历史范畴之内，而是包括了与历史关系最密切的文化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有什么性质的文化形态，就有怎样的统一，有什么性质的文化形态，就有怎样的历史哲学。作者从这一观点出发，阐述了中国近代文化交流结合、双重文化影响之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过程，其历程为：要求变法改革，以御侮图强为目的的，属于封建阶级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历史哲学；要求改良与革命，以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为目的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基础上，形成两种对立的历史哲学，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史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哲学；要求社会革命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目的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哲学。

从比较方面来考察，书中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进行了纵向比较，在比较研究中既找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根源，看到了其发展，又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进行了横向比较，这样既有利于回顾与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又有利于思考发展中国当代历史哲学的改革进程，从而把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广阔天地里，将以无限的生命力兴起与发展。

（原载《博览群书》1991年第11期）

《历史与民族精神》李成蹊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定价5.00元。

## 《易经》逻辑思想新探索 ——评《易经新论》

何应灿

周山著的《易经新论》（后简称《新论》），是探索《易经》逻辑思想的一部新作。

近年，中国逻辑史界曾经讨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源头在哪里？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导源于邓析、老子、孔子和墨子的逻辑思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源头始于《易经》。这后一种观点，虽然胡适于本世纪初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中提出过，但这一课题至今依然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新论》的问世，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

《新论》从现代逻辑、辩证逻辑的角度，重新审视《易经》，提出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和看法。

1.《新论》认为，《易经》是一部帮助人们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工具书，是一部关于推理的书。并认为，中国古代先人和贤哲们之所以重“类比”、重辩证思维的这种定位的传统思维特点，盖源于此。

2.《新论》全面分析了《易经》的符号系统的逻辑建构及其概念体系，概述了这个符号系统中的对象语言、句法语言和自然语言。认为，《易经》的主体是六十四个符号组（即别卦卦体），它们是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各类事物情况的高度抽象，也是人们进行“比类取象”推导的根据；而卦、爻辞则是对卦体的一种例解，供人们据象类推时作“举一反三”的参考，相当于传统逻辑中“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有死”是对三段论AAA式的例说一样。因此，人们在运卦推演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卦爻辞所涉及的那一种具体事物或情况进行推演，而必须进行全面的辩证的“举一反三”的类推，得出相应的最佳结论。否则，如果完全按着卦爻辞的内容进行推算，就会导致“一例求之”、“一类取之”的简单推化，其结果就难免要囿于一隅，蔽于一曲了。

3.《新论》用现代逻辑、辩证逻辑眼光，揭示了《易经》独特的七条推理规则。《易经》既然是关于推理的书，它就要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独特的推导方法，告诉人们关于他们行动方向和可能出现的结果，使人们采取正确的途径，避免错误，以便“趋吉避凶”达到成功的目的。这七条推理规则是：自然递进律、爻位当位律、对应律、三段律、二段律、整体律和变爻律。《新论》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推理规则的基本内容、职能及其规范作用，同时也指出，上述推导规则“相互之间是可容、相通，而又往往同时交叉运用的”。正因为如此，才使《易经》符号系统的推演过程，罩上了一层又一层光环，显得特别深邃神秘，“玄而又玄”。

4.《新论》概括了《易经》推理体系的三大特点：即辩证性、形象性和灵活性。认为，《易经》推导系统，比较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三段论和亚氏之后的归纳逻辑，自有其不足之处，但也有其自身明显的优越性、辩证性，它不仅可以通过一个卦体内的阴、阳爻的构成情况及其爻辞得到体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卦体之间的“非复即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揭示。《易经》推导的辩证性特点，构成了炎黄子孙进行辩证思维的逻辑框架，成为华夏文化理

论思维的最重要的特色；形象性推导，即“寓意于形，又望形生义，触类旁通”，这又是《易经》符号推演系统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思想家较多重视并擅长类比推理，其源盖出自《易经》形象性的定势思维；灵活性是指推演过程中符号组的灵活转换。《易经》的推演功能是多方面的，在同一别卦中，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推演和符号组的灵活转换。当然，这种转换也是有一定章法，按推理规则进行，而不能随心所欲。诚如作者指出那样，《易经》所具有的这种独特风格的推论形式的灵活转换，既使人们呆板思维趋于活跃，同时也会损害逻辑推演的严密性，从而为江湖术士主观地应用灵活性的诡辩留下了可乘之机。

5.《新论》对《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做了有重点的阐述。首先，它充分肯定了《易经》对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易经》对老子、孔子、惠施、公孙龙……直至朱熹、王夫之等古代思想家逻辑思想的深刻影响，很有见地，发人之未发。这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启迪的；其次，揭示了《易经》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易经》与古代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自然科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遍及于古代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等学科领域。《新论》从天文和医学这二门学科的典型材料出发，论述了《易经》作为思维推理的工具书，其符号推演系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中医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再次，它论述了对《易经》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认为，在重新认识和评价《易经》的文化价值以及在科学发展中的实际意义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它的科学的辩证的合理因素，也要充分注意它的缺憾与不足，既不要轻易否定，也不能盲目推崇。

6.书后所附的《易经》今译，也很有特色：（1）注重意译。略去繁琐的文字训诂，努力揭示譬例背后的人事论，以便能使读者有效地“触类旁通”；（2）力求卦辞与爻辞之间释义的连贯性，以求一卦的整体性；（3）译文亦多有新意。如对“乾卦·九四”，“或跃在渊”，评释为“如临深渊”之意，乃前人所无。

最后，《新论》全书逻辑结构严谨，文笔清新流畅，议论活泼，侃侃而谈，论之所至，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玄之又玄”之时弊，阅读轻松，催人读不释手。它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易学专著，也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科普读物。

（原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

《易经新论》周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定价3.10元。

## 《易经》是中国最早的逻辑书 ——读《易经新论》

李建钊

周山同志的《易经新论》，文字晓畅，浅中有深，平处见奇，是“易学”研究中的新葩。全书的论述体现着“《易经》是中国最早的逻辑书”这一观点，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有一定意义。很值得一读。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逻辑书？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易经新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肯定的答复。它排除了历来研究中，把《易经》作为卜筮书、哲学书，以占筮为形式的政论书，是作者奉使、恋爱、被囚和求救的自叙书，以及社会进化史的种种看法，跳出传统的氛围，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倡《易经》是一部指导人们思维活动的工具书，是关于推理的书，是中国最早的逻辑书。给人们以耳目一新，启发人们向新的途径去进行探索，是极为可贵的。

《易经新论》敢于冲出陈规，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三段论与《易经》的卦爻符号的逻辑方法作对比，指出卦爻符号是抽象的“空架子”，即“公式”，有如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中的“ $M—P, S—M, S—P$ ”的符号公式，而卦爻辞则是解释卦爻符号“公式”的自然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推理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典型事例”，“起着举他物而以明之的作用”。因为卦爻辞的内容是对卦爻符号的一种具体例说，所以“卦爻辞内容可以由不同的人去编写”。这正如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法，解析三段的例子可以不同，而出现了不少版本的三段论逻辑著作。《易经新论》还进一步把卦爻符号的六十四卦，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六十四个可能式相比，认为亚氏的六十四个可能式中，只有AAA、AII、AEE、IEO、AOO、AEO、AAI、OAO、EIO、EAO、EAE十二个结构式是有效的，而卦爻符号的六十四卦却能运用特殊的推理规则，把每一个结构式灵活地转换成特殊的推理规则，把每一个结构式灵活地转换成有效式。这比亚氏的三段论的推理式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推理模式。

《易经》的象数思维模式所运用的运数比类的逻辑方法，是中国逻辑的特点。《易经新论》紧紧抓住这个特点，肯定了卦爻辞的逻辑价值。《易经新论》概括了推理的七条规则：自然递进律、当位律、对应律、三段律、二段律、整体律、变爻律。对每一个规律都用具体事例作了解释，使读者能从中理解据卦推理的思维活动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有效性，以及这些规律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证。这种阐释比其它解释的著作要明白晓畅。在对“三段律”的解释中，特别指出：《易经》的“三段律”，即是天、地、人的“三才律”。即将六个爻分别放到三个不同层次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而不是将三个层次串通起来，由此及彼地推演，因为三个层次之间并不存在大前提、小前提这样的关系，更没有前提与结论的关系。这样，既说明了《易经》与亚氏三段论推理形式上的相似，又具体指出其实质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易经》的推理规则相互之间的相容相通，同时又交叉运用，这样的推理体系，有辩证性、形象性和推理形式转换的灵活性的特点。这是亚氏三段论推理所不具备的，这正是我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

《易经新论》还论述了卦爻辞对我国历史、哲学和文学的价值，这对《易



经》研究者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原载 1991 年 12 月 2 日《韦讯报》)

## 创建选择学理论框架的力作 ——推荐“选择学研究丛书”

白文韬

选择，这个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活动，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已成为当今多样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成为编织社会与个人生活之网的最富有决定意义的活动。

对选择问题，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把选择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过程。马克思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作为自己学说的科学基础，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论证了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都是历史的选择，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更迭的历史规律的高度，阐发了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强大作用。

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赋予选择概念更加深刻的含义。正在蓬勃兴起的系统科学各个理论，更是言必选择。因此，从整体上研究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关于选择的一般规律，建立起独立的选择科学体系，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应时代之需，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选择学研究丛书”，包括张卓民、宋曙著的《一般选择学》、陈昌曙、远德玉著的《技术选择论》、马成立著的《信息选择学》、武斌著的《人格选择学》。这套丛书，把选择作为专门对象来研究，创建起选择学全新的理论框架，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尚属创举，为我国的选择学理论研究作出了拓荒性的贡献。

之所以说“选择学研究丛书”创建了选择学的理论框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令人瞩目：

一、以丰富的科学材料，对各门学科的选择现象作了翔实的实证考察。丛书的作者们首先从人们较为熟知的各种选择现象入手，有头有尾，深入浅出，逐步揭示出选择的普遍性。作者用简单而鲜明的事实，贯穿丛书，使理论阐述和实际说明相互照应。从而，使人们领略到选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为选择科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其重要标志就是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孕育成熟，并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丛书的作者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和现代科学中有关选择理论、原则的搜集、整理、加工、推导、综合、提炼和概括上，特别是对选择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选择的类型做了区别和解释，对选择主体、选择对象和选择环境及三者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选择规律的基本特征、选择过程的构成要素、选择的一般规律、选择的基本原则，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从而，构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选择科学的体系。

三、一门科学理论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看它是否能够得到实际应用，而要应用就得有一套可供操作的程序、原则和方法。丛书的作者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可贵的尝试，提出了选择方法论三条原则：即主体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和优化原则，同时还在现代决策科学的各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经验判断法、数学分析法、试验法和综合评价法等。这样，就给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各种选择问题面前，提供了可供选择和操作的方法论原则和手段。

开创一门全新的选择科学，难免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诸如，这套丛书对自然选择、社会选择、思维选择的共性与区别论述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类社会的选择方式的演化过程缺乏总的分析。另外，对与选择原理相应的一般方法述及得也较少，等等。这些都将在丛书的继续出版中得到补充和完善。

（原载 1991 年 12 月 5 日《辽宁日报》）

“选择学研究丛书”张卓民、李长工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包括：《一般选择学》张卓民、宋曙著，定价 5.00 元；《信息选择学》马成立著，定价 4.50 元；《人格选择学》武斌著，定价 6.00 元；《技术选择论》陈昌曙、远德玉著，定价 4.45 元。

## 嫁接在形式逻辑上的新枝 ——评《海商法逻辑学》

刘明凯

谢翔宝、于世成所著的《海商法逻辑学》，是形式逻辑与海商法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由于该书尚属国内外海商法逻辑学的第一部，因此，填补了海商法逻辑学这一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形式逻辑百花园再添一株新芽。

本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形式逻辑与海商法学两个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两者的交界处开拓了新领域，建立一门新的逻辑应用学科。这是值得称道的。

海商法是用来调整海上运输中发生的以及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的。随着各国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海上运输中发生的以及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对于从事海事司法工作和其他一切与海事业务有关人员来说，如何订立合同，研究与讨论海事原因、性质与责任，编写海事声明、报告或起诉书，对海事进行调节、仲裁或审理，等等，都需要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海商法，应用严格的推理，进行论证和反驳。而这是海商法学本身无法加以解决的，因此，必须在知识的百花园中寻找新的支撑点。本书的作者大胆地将海商法学嫁接在形式逻辑学上，这无疑大大拓宽了海商法学和形式逻辑研究的领域，对从事海事实践的司法工作者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给人们正确思维找到了一个“支点”。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体现了海商法逻辑学作为形式逻辑应用学科的学科特点。作者“披阅十载”，收集了大量的海事案例，精心加以研究，在阐述形式逻辑的理论、规则时，能够结合航运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由浅入深地多层次地介绍与解释了逻辑方法，从而能引导读者自觉地将逻辑原理和知识与国际航运业务紧密结合起来，提高思维的认识和表达能力，以及论证与反驳能力。而且，这些案例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正如培根所说，新生的婴儿总是不美的；我们同样不能苛求这部书稿十全十美，因为她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比如如何从海商法逻辑学的自身特点出发反驳海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和辩护词等作为海商法逻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是今后应着手研究的。尽管如此，这部“敢为天下先”的著作必将为海商法学界瞩目。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5期）

《海商法逻辑学》谢翔宝、于世成著，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定价2.55元。

## 一部珍贵的财经史书 ——读《骆耕漠早年文录》

洪炳堂 杨全山

《骆耕漠早年文录》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书中记录了旧中国破落的经济状况，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和部队的供给制度，同时也记录了作者以“骆驼耕沙漠”精神进行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成长过程。

骆耕漠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青年时代就投笔从戎，投身大革命洪流中。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骆耕漠同志被投入监狱，在七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学习了当时仅有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译著，自修了政治经济学，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开始学习列宁的“伊索寓言”式曲笔，联系当时的困难当头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的实际，写了大量的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主要是经济时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破落的国民经济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现象。书中把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记录、数字资料 and 情况分析重新展现出来，必将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向前。

本书共收录了骆老从处女作《美亚工潮始末》开始到建国前夕《新区初期的部队供给工作》共16篇文章。内容既有经济时论，也有建国前夕广大解放区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使读者有机会重新阅览三、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史料。其中《美亚工潮始末》、《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等前12篇文章，作者通过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有关工厂工人、煤矿工人，以及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遭遇，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等篇中，作者通过对国民党时期的大量统计资料加以重新分类、整理、换算，以及分析研究，有理有据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经济掠夺和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状况。后4篇文章是作者在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山东、豫皖战场上从事财经工作时写成的。特别应该提到的《工业日本和农业中国》、《中日经济提携》两篇文章，发表后曾产生很大影响。骆老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尖锐地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之所以搞什么“农业中国”、“经济提携”，其目的是要大量地掠夺我国的资源，使整个中国变成一个专门替日本工业生产廉价原料的农场，使他们可以同英国争夺市场，并垄断中国的煤铁生产，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变成销纳日本过剩工业品的广大市场。作者还从“中日经济提携”、“怎样实现提携”、“提携”的惨痛成绩和今后的展望四个方面，深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提携”的实质。骆老站在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地预示了历史的必然，他指出：“不过中日经济的真正提携，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假使我们和日本国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使日本的政府机构‘脱胎换骨’，那么，中日经济的真正提携就会很快地实现，同时所谓东亚和平才能真正地确定下来，人类才能踏上真正的幸福的阶梯。中日两国的人民，现在就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而当代的中日两国人民正本着睦邻合作和长期稳定的方针，进行着

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使真正的中日经济提携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书中各篇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面貌。作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理论性文章，现在读来仍旧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受益匪浅。读者不但会被书中的流畅的文笔、清新的语言所吸引，更会因作者的构思别致、见解独到而惊叹。特别是书中对大量史绩、数字资料的分析及其理论成果，以及所反映的骆老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治学作风，无论是对今天我们从事的科学研究，还是高校的财经教学工作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原载《财经问题研究》1987年第11期）

《骆耕漠早年文录》骆耕漠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定价2.10元。

## 向企业经营者推荐一本新书 ——评《厂长负责制问答》

杨俊生

徐凤臣同志著的《厂长负责制问答》一书，对于当前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深化企业改革，无疑是比较及时而又具有积极意义的。

改革要加快，理论要跟上。作者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系统研究，以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指针，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全国试行厂长负责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思想认识、理论观点及实际问题，以通俗活泼的问答形式，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又颇有见地的回答；对于已经实行或准备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党、政管理干部和工会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从论述企业领导体制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入手，运用了从历史到现在、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外纵横结合的表述方法，全面地展开了关于厂长负责制问题的对话。第一章论述了企业领导体制与厂长负责制的关系，分析了企业领导体制与国家机关等上层建筑部分的不同点，它具有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三结合的特点，因此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实行厂长负责制，既是反映在企业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变革，又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群体劳动过程的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从而说明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深远意义。第二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企业领导体制的沿革及经验教训，同时介绍了国外一些国家企业领导体制的历史与现状，论述了划分企业领导体制类型的根本标志，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公有制企业领导体制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用两点论观点分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历史作用及弊端，说明了厂长负责制与一长制的异同点。第三章集中地分析了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理论依据，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厂长负责制问题的论述，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协作劳动、企业性质、两权适当分离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开放、搞活、允许竞争等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本理论依据。第四至第六章重点回答了在突出厂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地位和起中心作用的前提下，为什么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强化行政指挥系统和加强民主管理，进一步阐明了党政工“三位一体”和突出厂长的地位与作用，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企业领导体制。第七章至第九章分析了实行厂长负责制怎样推动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着重说明了对企业内部完善经济责任制、加强参谋信息决策系统及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问题。最后四章研究和回答了怎样发展和完善厂长负责制的问题，指出了厂长负责制对于盈利或亏损企业都适用。在实行厂长负责制新体制下，对企业职工和厂长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阐明了怎样当好厂长和职工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也是发展和完善厂长负责制的根本条件。

作者第一次把模拟研究方法引进对企业领导体制模型的研究与分析中，用六幅简单图形说明了不同企业领导体制的异同点，使这部理论性与应用性较强的专著具有了文图并茂的特点。同时，资料丰富，语言活泼，并恰当地引用了一些成语典故，借以阐明较深刻的道理，使全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作者始终强调厂长负责制与民主管理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国内外实行民主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并辟专章论述了厂长负责制与民主管理的关系问题，探讨了民主管理发展的历史趋势，突出论证了企业决策、指挥、监督三权结构及互相制约关系，明确提出了民主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思想。因此，本书对企业党政干部，尤其是对各级工会工作者的学习将会起到一定的启发和补益作用。

（原载《当代工人》，1987年第12期）

《厂长负责制问答》徐凤臣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定价2.10元。



## 在我们改革舞台上 ——评《企事业改革家列传》

赵含坤

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张劲夫同志为之作序的《企事业改革家列传》，是我国宣传改革家的第一套大型系列丛书。首批出版发行的《机械工业卷》、《有色金属工业卷》、《化学工业卷》、《轻工业卷》、《航空工业卷》、《水利电力工业卷》、《商业卷》等，作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0 周年的礼物奉献给广大读者，其他各卷陆续出版。收入书中的企事业改革家，是有关部委根据编委会规定的条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的；传记文稿的撰写人大都是有经验的编辑、记者和有成就的作家，以及熟悉改革家的人员。他们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采访，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出了质量较高的文稿。又经过分编委会和总编委会反复讨论修改定稿。因此，不仅书的内容充实，事迹真实，而且文字比较清新鲜明，生动活泼，有很强的可读性。

《企事业改革家列传》大型丛书，以具体确凿的事实和生动朴实的文字描绘了中国改革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场全面深刻的改革为人们提供了广阔施展才能的舞台，造就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改革家，而他们又在改革舞台上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革活剧。张劲夫同志为丛书写的序言说：“这套书反映的几百位企事业改革家，虽然处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各自的特点，但他们都具有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顽强奋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刻苦学习、立志进取；依靠群众、尊重科学；不怕困难、艰苦拼搏。他们在改革中诞生，在改革中成长。记述他们先进事迹的文字是朴实的，然而读起来仍十分感人。”

企事业改革家对搞好企事业改革起着关键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优秀的企事业改革家，也就建立不起现代化的企事业。为企事业改革家立传，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翔实材料，介绍企事业改革的成就，总结企事业改革的经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希望我国几百万企事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能够像书中的改革家那样，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地把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

入传的企事业改革家的事迹，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和教育。

首先，要认真学习 and 弘扬企事业改革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我国一大批热情、积极、忠诚于改革的先进分子，率先学习并坚定不移地在企事业中贯彻和实践党的基本路线。虽然，他们从迈开改革第一步起，就伴随着种种磨难和新生的阵痛，但是他们始终没有驻足踟蹰，而是团结广大职工，勇敢地冲破束缚企事业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秩序、旧传统，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一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端正了企事业发展方向，增强了企事业的活力，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而使那些萎靡的企事业转而充满生机，逐步振兴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

其次，要认真学习 and 弘扬企事业改革家苦干实干，奋力拼搏，勇于献身的精神。写入书中的不论是厂长、经理，还是院（校）长、所长，无一不是

改革的勇士。他们身处经济建设第一线，居于宏观和微观管理的结合部，对旧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有着切肤之痛，对建立新体制有着最强烈的要求。他们胸襟博大，无私奉献，敢为人先，脚踏实地地投身到改革之中，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为企事业改革拼搏献身。在他们的带领下，底谷的企业摆脱了重负，前进中的企业更上一层楼。许多企事业冲破了自我封闭的束缚，脚步已经迈进世界大门。改革家们在发展横向联合、外向型经济和参加国际大循环中发挥了勇敢积极的作用。

再次，要认真学习 and 弘扬企事业改革家依靠群众，尊重科学的精神。书中介绍的改革家，是全国企事业千百万立志改革人物的代表，他们善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广大职工群众从本企事业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规章。他们具有远见卓识，认真贯彻执行政策法规，既能大胆果断决策而又坚持科学、民主作风。他们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从改革企事业经营机制，改造落后生产力入手，及时抓住关键性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企事业产生新的转机，逐步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书中总结的不少带有规律性和方向性的经验，是他们坚持科学态度和群策群力的创造相结合的硕果。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对企事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颇有裨益。

最后，要认真学习 and 弘扬企事业改革家坚定信念，战胜困难，开拓创新，不断前进的精神。改革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充满着新旧思想、新旧体制、新旧矛盾的斗争。改革家们坚信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方针，是企事业繁荣发达的必经的途径。因而，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不畏艰险，敢当大任，勇开先河，积极进取，求实探真，开创出适合企事业发展需要的新路子、新体制。在书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改革者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拳拳赤子之心的跳动。正是大批优秀企事业家和改革家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头，率领广大职工立志改革，坚韧不拔地进取，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谱写出光辉夺目的篇章。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写进书中的改革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也不是完善无缺的，我们的广大读者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经验，夺取新胜利！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完成改革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展望前程，企事业改革任重而道远，今后的改革任务更艰巨，既要坚定信念，一往无前，又需要审时度势，探索前进。通过为改革家立传的形式，历史地回顾和总结企事业改革走过的历程，十分有益于我们认清形势，有益于我们推进未来企事业的改革。愿各条战线上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以及广大职工都能认真读一读这套丛书，从中受到启迪，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念，增强勇气，像书中改革家们那样，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改革实践中去，作一个改革创新的排头战士，把我国的企事业改革步步引向深入。我们相信，人们将会为那些创造赫赫成就的企事业改革家编撰《企事业改革家列传》续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9 第 3 期）

《企事业改革家列传》本书编委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1990 年出

版。包括：机械卷，定价 6.95 元；化工卷，定价 4.90 元；航空卷，定价 4.60 元；商业卷，定价 5.70 元；水利电力卷，定价 4.65 元；有色金属工业卷，定价 4.70 元；林业卷，定价 7.50 元；石油卷，定价 7.00 元；地矿卷，定价 5.50 元；建设卷，定价 6.70 元；医药卷，定价 7.90 元；航天卷，定价 8.80 元；纺织卷，定价 6.00 元；电子卷，定价 8.80 元；科技卷，定价 7.80 元；邮电卷，定价 8.00 元；军队企业卷，定价 13.00 元。

## 理好财的一把钥匙 ——读《现代会计与理财》

杨福君

会计论著对一个不熟悉会计专业的企业家或经营管理人员来说，简直就是一堆干巴巴的专业词汇或数字表格的排列，阅读起来实在令人费解，更不用说会使人感到赏心悦目了，要看懂并加以应用，那就更难了。但是《现代会计与理财》却是一个例外。由美国 R 史蒂芬·海斯和 C 理查德·贝克合著、刘连英译、谷祺教授审校的这本书，打破了会计理论著作固有的那套格式、标题和编排次序，以其独特的格调和体裁，描述一个企业家如何发现和追查被盗走的 20 多万美元的会计帐簿案件。通过这个企业家采用各种方法追查发生事故的过程，使其熟练地掌握了财会基本知识来控制其他类似事故的再度出现，从而使读者像阅读故事情节书那样的感到引人入胜。

《现代会计与理财》的出版将引起许多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兴趣。全书以企业家约翰·尤斯追查公司帐簿被盗窃为主线，论述了会计各种帐表的处理，资金的来源和运用；解释了资产、负债、业主资本、收益、销售成本和营业费用的课税含义；描述了怎样确定资产的价值、折旧、贷方税额和呆帐费用；说明哪项旅费和交际费可以冲销，需要什么样的正当证明和单据。除上述内容外，它还论及贷款、比值、保本销售以及如何使企业获得较多利润的财务技术。所有这些，都是生产经营者在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知识，特别对那些需要掌握会计技术和实用信息而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会计细节的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

会计是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它的目的就在于提供经营管理活动具体经济效果的财务资料。这些资料，经常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经济信息。人们常常把会计称为产业语言，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各种经济信息。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企业有了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关键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的正确与否。因此，一个企业家为了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对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求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适应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要求，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会计资料是经营管理的基础，也是开辟财源之道。《现代会计与理财》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把理好财的钥匙。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不必也不应该对一切问题都事必躬亲，但他应当掌握和了解企业经营的财务效益状况。作者正是根据这个要求，对全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既概括了财务会的理论和方法，又具体阐述了现代会计的主要内容，阅读起来生动有趣。例如，作者在论及一向被认为枯燥乏味的企业财务报表时写道，企业最广泛使用的财务报表是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前者表示企业收进（收益或所得）、支出（成本和费用）、资金和净利的汇总，后者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和实有资金的汇总。作者以行驶着的华北快车和摄影记者的镜头来给予说明。他写道：“当华北快车穿过乡村向前驶时，普通摄影师给列车拍了个快照。这是华北快车在某一瞬间的图像——与资产负债表类似，它显示企业在特定时日有多少资产，欠债多少，以及业主投资多少。”“另一方面，电影摄影师与列车并排行进，从列车离站时起，直到驶

抵终点站为止，摄成电影，类似损益表。它计量一段时间内以销售收入抵付成本和费用，它显示企业整个周期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在这里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在企业中记量什么和说明什么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作为一本会计专业著作，它的最大特点是写得深入浅出、朴素、幽默，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它所欠缺的是对某些理论问题的阐述过于简单。实用性强，实例较多而理论性和系统性则不足。

（原载《财经问题研究》1989年第8期）

《现代会计与理财》[美]R 史蒂芬·海斯、C 理查德·贝克著、刘莲英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9年2月出版，定价 2.70 元。

## 金融百花园中的奇葩 ——评《现代实用金融辞典》

卢汉川

《现代实用金融词典》（以下简称《辞典》），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当前金融方面罕见的一本好书，堪称金融百花园中一株瑰丽芬芳的奇葩！

《辞典》内容新颖。它立足于改革，服务于改革，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以指导经济工作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开篇，不仅全面纳集了有关货币和货币流通与使用、信贷、外汇外资管理、利息和利率、信用合作、基建投资、保险等方面的传统词汇，而且着意把金融市场、国际金融、证券交易、金融信息、信托咨询和稽核审计等新业务的词汇也都搜集整理，做为它的重要内容。金融事业也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国际金融的实践，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新的金融词汇，而且给许多传统词汇赋予了新的涵义。《辞典》的作者们既全面搜集了新的金融词汇，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理解，对传统金融词汇作了新的解释。因此，读了这本《辞典》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读者的思想确有很大的启迪。

《辞典》内容全面。全书共分 21 部分，收入 5094 个词目，既包括了各个金融部门的传统业务和新业务的各项内容，又涉入了财政、税务、外贸、国民经济计划等部门与金融工作密切相关的词汇，而且把市场机制、价格、价值等方面的部分词汇也作为重要内容选入。这就创造性地形成了从古到今，从金融基础理论到各专业基础知识，纵横交错有机结合的多元性金融理论知识体系，使读者阅览此书，便可对整个金融理论体系有一个全貌的了解。因此可以说，这本《辞典》是一部“金融百科全书”。

《辞典》非常适用。我看了这本书后，突出地感到，本书作者的独具匠心，富于开拓精神，他们处处为读者适用着想。在收词上，坚持以实用性为主，实用性与知识性结合；以内涵用词为主，金融内涵用词与外延用词结合；以现代同汇为主，历史词汇与现代词汇结合，词义不稳定或见词明义的词汇一般不列。在解词上，坚持了“科学、简明、实用”的原则。一词数称或数解的，采用其中常用的科学的名称和解释。其他名称一般在释文中表述，对其他解释的是非不予评论；对相关词目，分别作独立词解，一般不采用“见某词”的作法，这就减少了读者查阅的麻烦。对中外都使用的词汇，为方便读者，根据需要有选择的附以外文。在内容选列上，也坚持了实用性为主的原则，除主体金融知识外，还选录了有关金融法规、计算机知识和传统的珠算知识；并把各国货币一览用表格形式录入该书，使读者能对各国货币名称及其辅币进位制有个概要的了解。

《辞典》是由一批著名的教授和有多年实践经验的金融业务专家编写的，既反映了我国金融历史沿革及其演进，又体现了现实经济活动、经济科学和金融事业的发展，是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完美结合的范例。

此外，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独具风格，美观大方，深受读者欢迎。

（原载《农村金融》1990年第2期）

《现代实用金融辞典》王纪元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  
定价 9.50 元。

## 评陈栋生的《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

郭万清

陈栋生的《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布局》）一书，对经济布局理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它对研究我国宏观布局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建立和完善经济布局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布局》一书收入了作者近年来有关布局问题的论文和讲稿。与一般论文集所不同的是，该书所收入的文稿在内容方面有较强的内在联系，编排合理，读来有自成体系之感。全书共三篇。第一篇绪论，从总体上研究布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布局规划的内容与方法，总结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并提出指导我国经济布局的系统对策；第二篇为产业布局篇，从产业部门的纵向角度研究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和综合运输网布局的特点和配置条件的要求；第三篇从横向角度研究在特定空间内，由多部门集聚形成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地域经济综合体的发展与布局问题。

《布局》的作者长期从事生产布局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在该书中，读者既可看到我国布局实践的大量生动案材，看到若干典型部门和地区的案例研究，又可看到布局经济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对布局演变规律的深刻揭示。

《布局》一书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布局理论的局限，在经济布局研究对象、制约布局的因素、布局形成机制、地区优势和比较利益、布局效益的评价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

### 1. 关于经济布局的制约因素

生产布局过去主要是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地理学的分支，经济布局理论只重视自然、地理条件和技术因素在布局形成中的作用，忽视资金、市场、信息、历史文化传统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布局理论对布局演变过程的科学说明。《布局》一书突破了这一界限，把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作为影响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这些差异不仅包括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生产协作条件和动力、运输、通讯等硬环境的差异，也包括社会文化传统、智力开发程度、价值观念特别是商品经济意识等软环境的差异。

### 2. 关于经济布局的研究内容

传统布局理论从狭隘的生产观点出发，只研究物质生产部门布局，不研究科技教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布局；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又主要研究工、农、交通部门布局，忽视商业和通讯系统的布局。《布局》作者认为，我国传统布局研究中，“对商业、物资流通系统的布点与网点配置的研究很薄弱”，“对科学研究、教育与信息系统布局的研究则近乎空白”。作者强调指出，“加强上述诸方面的研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在书中关于经济区划、贫困地区发展、海南岛开发等问题的研究中，作者都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布局予以充分的注意。这就大大丰富了布局理论的研究内容。

### 3. 关于经济布局运行机制的研究

重视经济布局运行机制的研究，是《布局》一书在布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传统布局理论侧重于对布局现状的描述性分析，缺乏对经济布局形成与变化机制的深入探讨；同时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只研究集中统一计划体制中



的生产布局，从而无法揭示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布局的内在机制和客观规律。《布局》一书则提出，“健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前提”。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对传统体制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认为“行政性和实物化的产业布局形成与调节方式，从信息、决策和动力结构看，都有其内在缺陷”。“使生产力布局最基本的参数——区位成本严重失真；各种非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左右产业布局的主要力量”。“按条块隶属关系配置资源势必肢解产业的内在关联，形成相互隔绝的封闭或半封闭系统”，“只有资金增量的配置，基本上没有资金和要素存量的变组与再配置，造成生产能力闲置与短缺并存的局面”，此外，“畸形的价格结构，大一统的物资和财政体制，扭曲了比较优势的分布，抑制了地区发挥优势的积极性”。作者认为，“无论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直接安排和管理全部生产力布局，还是全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力布局，都难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为此，“必须重构生产力布局的形成与运动机制，总的思路是：国家制定生产力布局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通过要素市场的经济参数，引导企业和各投资主体，围绕国家生产力布局目标，自主作出投资区位的选择”。作者的这一观点对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布局问题，颇有现实意义。

#### 4. 关于地区优势和比较利益的研究

10年改革以来出现了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热”，发挥地区优势、扬长避短等概念成为人们的常用语。但地区优势的科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扬”什么“长”、“避”什么“短”，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使地区战略研究因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而难以深入。《布局》一书在这方面吸收了国外学者的成果，提出许多重要观点。作者认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一指导地区发展的原则，其理论依据是劳动地域分工学说。劳动地域分工的基础是地区间的比较成本（利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选取与其它地区比较成本（利益）优势差幅大的产业为优势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选取与其它地区比较成本（利益）劣势差幅小的产业作为优势产业”，按上述原理构建的开放型地区经济模式使“每个地区都着重发展能更多、更好地利用本地区供应充裕、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产业、部门），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并通过区际交换相互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用节省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满足同样的社会需求，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这就是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地区经济结构模式”。如何认识经济优势的内涵？作者认为“经济优势是商品经济中、市场竞争中的概念。一个地区某种产业取得优势地位，表明它的产品运到消费市场，其完全换算费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它地区，在价格和质量上有竞争力”。作者批评“现在一些地区的发展战略，往往把自然资源作为分析的起点。……似乎尚未跳出小商品经济的圈子”。指出“当代经济的特征要求我们的战略思想要以市场为出发点，即市场——资源——商品”，作者列举日本和我国温州为例。“从矿产资源看，日本是个资源小国，但由于它利用对外投资参股，采用大型海轮以廉价运费取得了矿石和能源的供应，克服了矿产资源贫乏的不利条件，成了经济大国”；温州“一不近原料，二不近市场，但通过‘腿长’（推销员）、‘信贷’（信函）等营销手段，克服了上述不利条件，成为全国性的若干日用小商品基地”。这一分析对深化地区发展战略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布局》一书的作者，还对布局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和其理论体系的构想；

关于产业均衡与非均衡布局；关于如何评价布局效益；关于我国经济布局对策；关于地区经济结构一般模式的三环同心园结构和关于地区结构的动态分析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值得所有从事宏观经济布局和地区经济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教学的同志一读。

（原载《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4期）

《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陈栋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定价3.50元。

## 一部开拓性的经济理论著作

——评宋则行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汪祥春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任务。宋则行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一本密切结合我国国情、阐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力作。

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首先碰到的一个“拦路虎”，就是研究对象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怎样合理组织生产力，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它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斯大林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是生产关系，把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排斥在外。这样，就存在着对象与内容不一致的问题。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作者首先根据经济学的发展史指出，政治经济学只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代名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宏观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都应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接着，作者根据马克思的原意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组合方式。如果离开了对生产力组合方式的分析，就无法阐明经济运行规律和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组合方式（即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则是研究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生产力的组合方式以及实现这一组合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以上这些独到见解，都有充分的论证，使人信服。应当说，这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本书的体系结构也独具匠心，它是围绕着社会总生产（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及其调控这条主线而展开的，其明显好处就是与本书论述的中心问题密切结合，并为之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保持社会生产和需求在结构和总量上的平衡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价值规律调节而自发实现社会生产和需求的平衡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人力、物力、财力），自觉地求得社会生产和需求的最佳平衡，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因此，研究社会总生产和需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平衡及其调控，就成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本书的体系结构，除了这条主要之外，还有其它线索。例如，先侧重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实际因素的分析，然后引进货币因素，对货币供求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先研究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总供求，再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总供求；先对社会总生产及其构成、总需求及其构成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入规范分析，考察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总量和结构平衡。这些体系结构上的安排都是非常合适的。

本书除了在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上有所创新外，还有不少创造性的观点和分析。例如：1.关于社会总生产的门类划分。既从社会生产过程的先后衔接程序，又从产品的经济用途着眼，把社会总生产划分为三大部类，即：中间产品生产、投资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这既便于对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进行对应的分析研究，也便于从社会生产过程的先后衔接程序发

现产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2.在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部类的基础上，重新推导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及其客观条件，并提出“社会最终产值”这一比“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更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3.提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基本公式以及分别列入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出流入以后的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公式及其实现条件，等等。这些新的观点和分析，是本书主编在经济学园地上多年辛勤耕耘的果实，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上也有应用价值。

本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适当地采择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的宏观分析所使用的若干数量分析工具和观点。例如，在阐述货币流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时，采用了现金和活期存款共同构成货币供给量的定义，并运用“货币乘数”来说明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机制，借鉴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流通所运用的手段来说明我国调控货币流通量应当采取的措施；在分析汇率调整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总供求平衡的作用时，借鉴了西方国际收支理论中的“弹性说”和“吸收说”的论述。等等。这些采择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科学成份的做法，对于研究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颇有裨益的。还应指出，本书引入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数量分析方法和学说，都经过消化吸收，不仅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而且注意到了它们与现阶段中国国情的结合。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本书为这项工程奠定了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在草创时期，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调控实践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宏观经济理论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原载《经济纵横》1990年第9期）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宋则行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年7月出版，定价3.50元。

## 体系的新构独到的见解

——读宋则行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

戴园晨 诸建芳

宏观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我国直到 80 年代后期才有一些宏观经济学的著作相继问世。宋则行同志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书，浏览之后，获益良多，促使我们对此书作些评论和推荐。

一、体系结构自有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应当形成什么样的体系是颇费斟酌的事情。一种做法是套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体系，但西方的经济运行与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有许多不同，套用之后往往使读者感到难以运用；另一种做法是逐一从我国实际出发讨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各个问题，不追求体系的完整，这是笔者曾采用过的，但后来再读时便感到作为学科建设终究是一大缺憾。现在读到此书，感到较之前两种做法有颇大进展。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怎样使生产力诸要素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到最佳组合，以取得最佳宏观经济效益，其中心内容是怎样自觉地调节和控制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平衡。作者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内容构筑全书的体系结构，展开全面系统的分析。全书在开篇阐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前提之后，立即转入正题。首先，分别考察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在这里，作者逐一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的内涵、实物构成、产业部门的划分、产业结构、地区分布、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社会再生产、经济增长模式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率等问题，阐明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的总量、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增长规律。随后作者考察社会总需求的内容及其形成，并对社会总需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作进一步的分析，阐明社会总需求变动的规律。在分析社会总需求和总生产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在封闭条件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公式，以及社会总需求变动对社会总生产的作用机制。

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关系日益货币化，货币不只是起价值尺度的作用，货币自身的运动以及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作者引入货币因素对货币流通、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在宏观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在实行对外开放条件下，进出口贸易、资金流出流入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作者又引入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金运动因素，进一步阐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公式。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要顺利运行，客观上要求社会总生产与总需求保持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但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平衡并非能够自发实现，而需要国家进行自觉地调控。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调控机制进行分析，全面阐述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调控的内容、手段、中间环节以及调控基础等。

本书是一本教科书，采用这样的结构来阐明宏观经济的基本理论，可以给读者以清晰新颖的同时又是体系完整的概念。本书为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提供了新的蓝本。

二、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见解。例如，本书是按照物质生产体系来阐述宏观经济理论的。在部门划分中不能采用一、二、三次产业分类法，然而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时，作者把社会总生产划分为“投资品生产、消费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三大部类（第41页）。这种划分较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和列宁的农、轻、重划分法更具体和实用，它克服了两大部类划分和农、轻、重划分在划分范围上未能覆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欠缺和“在分类统计上难以付诸实施”的不足（第36页），而且，它“便于显示社会生产过程的先后衔接程序，从中发现哪个是关键性的而又一时不易克服的薄弱环节，即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是卡脖子的稀缺生产部门，而社会总生产的协调发展，正是要建立在这些关键性的稀缺产品的供应量及其增长速度得到解决的基础上”（第38页）。作者的这个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原理，在实践中有利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在现代生产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便于对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和相互适应进行对应的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或生产部门结构）中的薄弱环节”（第40页）。再如“社会最终产值”概念。社会总产值指标、国民收入指标以及近年来开始采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在使用中都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难以精确衡量国民经济实力和进行国际间比较，为此，作者提出“社会最终产值”概念（第56页）。社会最终产值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新创造价值，它克服了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三个指标的不足，更具科学性。1. 它从社会总产值中剔除了中间产品价值，不存在重复计算。2. 它既包括新创造价值，又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比国民收入更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3. 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在理论界有不少争议，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又是不可缺的指标。现在采用的社会最终产值在计算方法上同西方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由各部门的增加值加总而得，二者的区别是计算口径不同，后者把科、教、文、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军人、警察等所有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包括进去了。社会最终产值加上这些部门的增加值则可与西方国民生产总值作对等比较。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颇具匠心的设计思想，证明社会最终产值是一个有用的综合性指标。

三、采取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1.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著作中一般采用规范分析，在宏观分析研究中则采用实证分析。本书兼取两者之长，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并用。作者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及其作用时，采用实证分析法，描述和说明社会总生产的总量、结构比例及其实现条件、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及其对社会总生产的作用机制，以及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公式及其实现条件等。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以实现社会总需求与供给之间总量和结构的平衡。2. 理论分析与数量分析并用。作者在对某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努力采用数量分析法，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证。例如，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时，作者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增长率（ $g$ ）与积累率（ $s$ ）、资金—劳动比率（ $t$ ）、劳动生产力（ $p$ ）和劳动生产力增长率（ $p$ ）之间的关系，而且用数学工具推导出经

济增长的理论模式： $g = s \cdot \frac{p}{t} + p$ （第100页）。3. 马克思主义经济

主义经济理论方法与西方宏观经济学方法并用。作者在书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如在分析社会总生产时，用舍象法暂时舍象社会总需求

方面的问题，在分析社会总生产和总需求的平衡公式时，暂时舍象开放型经济条件。同时，作者多处采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分析法，如在分析投资需求增长对社会总生产的扩张作用时，借用45°线图示法和“投资乘数”这一数量工具；在对投资需求变动与社会总生产增长的相互关系作长期分析和周期波动时，采用“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对货币、外贸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时，采用了“存款乘数”和“外贸乘数”。

四、十分注重中国的国情。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结论时，特别注意它们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例如，在分析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决定因素时，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即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居民家庭收入越少，全部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开支所占的比重越大，随着收入的增加，全部消费支出中用于食物的开支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作者认为，就较长时期内收入水平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而言，恩格尔定律对于我国也是适用的。但是，恩格尔定律发生作用有几个前提条件：1.要以完全的商品经济为前提，即居民对食物等消费的需求必须以货币收入的形式来满足；2.要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例如食物价格不变，食物本身的构成不变等；3.“食物支出”应当规定统一的含义，在各种收入水平下都以这种含义标准来衡量。上述前提条件在我国现实经济中并不完全具备，加以我国居民收入除了名义的货币性工资和奖金收入之外，还有相当多的非货币性的实物收入和隐性收入，例如低房租、高补贴、高奖金及额外收入等，因此，就短期分析来看，实际情况可能与恩格尔定律不一致。本书中所述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而用于食物支出的比重却反而上升，其中消费水平较高的上海市，恩格尔系数反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就在于此（第168—169页）。作者这种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近几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不顾中国国情，盲目搬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行为已经成为流弊。如有人盲目套用凯恩斯消费理论，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观点，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样做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一旦被采纳，变成现行的政策措施，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几年我国从放松对通货膨胀的警惕到1988年公开推行政策性通货膨胀，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其教训是深刻的。

近些年来，我国在组织宏观经济运行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诸如，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与短缺并存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剖析；从凯恩斯学派发展而来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方法，只限于流通过程，旨在说明的不过是流通中的数量关系，需求管理政策强调的是调节需求水平，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往往是资源闲置和短缺（或通货膨胀）相并存，从资源闲置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短缺（或通货膨胀）看是需求过旺，如何分析这种特殊现象需要作更深的挖掘。总之，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宏观经济理论问题正待人们去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人来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原载《经济研究》1990年第7期）

## 乌家培主编《宏观经济控制论》读后

王宏昌

古代的政治家已知通过一定的政策来恢复稳定与发展经济。如汉初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到汉武帝初年经济就完全恢复“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又如宋朝提倡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长期坚持的抑商政策是发展经济的一大障碍。经济学原是在讨论经济政策中形成的，所以在早期称为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探讨价格、利率、地租、汇率、税率等杠杆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作用。那时虽无经济控制论之名，已有经济控制论之实。1948年维纳出版世界上第一部控制论著作，总结出为动物和机器共有的通信和控制的规律。控制论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经济中的通信与控制问题，经济学也对普通控制论的发展作过贡献。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经济控制论。

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是极复杂的系统。从控制论看，测量复杂性的单位是变异度。例如现代商品和服务的品种极多，也就是变异度极高。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及其他组织，其数量以亿计，变异度又极高。各个主体之间的物质和信息联系的变异度更高。了解和控制如此复杂的系统是很困难的，而把经济学和控制论结合起来将对人们有所帮助。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讨论和实验经济改革。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问题和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一些国家的旧体制重视物资平衡而忽视宏观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往往超过经济增长率，以致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强烈。可是人们不治本，不加强宏观控制而治标，管制物价，配给消费品，分配生产资料，希望集众多微观控制可以代替宏观控制。根据政府规定的商品价格编制物价指数，令政府感到物价稳定。此种反馈信息并不来自经济实际，而是一种镜象作用。从光源射出光线到平面镜上又反射回来。配给消费品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分配生产资料可保证重点项目，例如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通过分配取消了一部分次要的需求，重要的需求仍能得到满足，经济理论称之为配额均衡。镜象的物价稳定和配额均衡给人以太平无事的安慰。从此经济步入受抑制通货膨胀的困境，而且愈陷愈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约描述和分析受抑制通货膨胀最为生动和全面，并且概括为“短缺经济”。其主要问题在于价格信号扭曲，价格机制失灵。而价格机制是一种负反馈自动控制。它是几千年来人类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控制。人们弃自动控制不用而代之以手动控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觉察到手动控制有其局限性，希望恢复自动控制。可是长期忽视宏观控制使社会货币总量与现行政府规定的物价不相容，而涨价又非群众所能接受。深陷抑制通货膨胀困境的经济想摆脱困境非常困难。

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屡见不鲜，却非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特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要求避免资本主义常见的痉挛现象，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讲求宏观控制的稳定发展的经济。宏观控制是计划经济的首要内容。尽管经济自由主义者对鸟笼经济颇有微词，我们仍认为它是切合目前中国实际的譬喻。没有宏观控制等于没有鸟笼，只有用线绳拴住每一只鸟的腿才不致于飞走。有宏观控制就是有了鸟笼，我们可以为群鸟松绑使之在笼内自由飞翔。



加强宏观经济控制是我国朝野一致的呼声。如何实施宏观控制是涉及多方面的极复杂问题，不是几篇文章所能说清。从教学角度看亟需有一半内容充实的教材，供财经院校、干部管理学院讲授以及广大的经济工作者自学。

《宏观经济控制论》这本书是根据 1988 年 5 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经济控制论研讨会的决议，由乌家培、黎诣远、吴承业、于清文、张金水、龚德恩、谢方组成编委会集体编写的。全书分为绪论，控制论基础，宏观经济控制模型的作用及其建立的步骤，总需求系统，总供给系统，总供求控制，财政控制，金融控制，价格控制，劳动控制，产业结构控制，地区经济控制，对外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控制体系，经济控制论的发展前景共十五章。

西方经济学把总量的研究作为宏观经济学，包括生产，总就业和失业，物价总水平及其变化率，经济增长率等。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各个商品和要素市场，一般均衡，以及福利经济学。在这样的划分下，产业结构属于微观经济学范围。这与我国的习惯不符，故本书对宏观控制采取广义的解释：“宏观控制是指政府对国民经济全局的管理。”

第二章“控制论基础”简明易懂地介绍了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何谓系统及经济系统，信息与经济信息，控制与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能控性、能观性，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及最优控制理论。

第三章阐述宏观经济控制模型的一般原理。从第四章至第十三章依次讨论宏观经济控制的各项具体内容。例如第四章讨论总需求系统，先明确供求范畴的内涵和描述供求状态的量纲，然后分别考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最后考察总需求函数。第五章讨论总供给系统，从企业生产函数，讲到总量生产函数，成本函数，供给函数，最后讨论潜在总供给与实际总供给。这些内容凝聚着经济学界多年研究的成果，有很强的知识性。对于每一节一般先作文字阐述，然后写出数学表示，对于错综复杂的系统则绘制方框图，使读者一目了然。

“绪论”中说：“本书虽然是教材，但对一些理论问题在介绍不同观点之后都有编写者的倾向性意见。因此，选用本书的教师不必拘泥于本书的结论，而应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本书作者确有不少独立见解对读者当有启发。例如第七章指出凯恩斯说的财政赤字指当年支出超过经常性收入的部分。而我国有些主张搞一点财政赤字的人士是指当年支出可以超过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之和，可称为“超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第八章指出“在实施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所有措施朝同一方向使用”。第十章主张全额工资制，取消各种明贴和暗补。

在本书前面十三章的基础上，第十四章提出宏观经济控制体系的设想。受控对象是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控制器是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局等。控制器向受控对象传达各产业结构高度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结构协调化方面。这是在市场调节和机制未能较好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计划调节机制无可推卸的重任，也是我国推行产业结构政策比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且具有更明确内容的原因。如果忽视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只是强调产业结构成长过程的协调原则，并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确定产业结构政策的选择基准，则必然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只能在低层次上去实现平衡，这将使我国迟迟不能摆脱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格局，最终将失去产业结构协调化的经济意义，同时也就否定了我国推行产业结构政策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结构政策肩负了双重任务，必须把产业结构的协调化与高度化内在地结合起来同时加以推进。不论是短期的结构调整还是长期的结构成长，都应当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可以有所侧重，但决不能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否则效果都不可能理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几度急于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而忽视结构协调，结果当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不能不停下来进行调整，但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产业结构的相应转换，只是在原有的结构层次上去追求暂时性的平衡，结果又给下一轮新的不协调留下了隐患，因此使产业结构不断地在高度化与协调化之间摇摆和波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这些教训使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与协调化问题统一起来，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得到有效推行。

（原载《经济文献信息》1990年第8期）

《宏观经济控制论》乌家培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定价7.40元。

## 《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学》评介

刘敏世

《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学》一书出版之后，在民政系统特别是社会福利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具体说来，这部书之所以能起到这样显著的良好作用，就一个方面而言是因为它适应了全国福利生产形势发展和福利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和迫切需要。众所周知，我国社会福利生产发展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福利工厂的基本属性确定为企业并实行了企业化管理，从而促使各地福利工厂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基本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毫无疑问，《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学》的问世，对于适应和满足强化企业管理的需要，从而为福利生产的发展找到出路等方面，将会充分发挥出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书自身具有相当高的内在质量且又独具特色之故。从这部书的指导思想看，它是以现有福利企业管理落后作为发展福利企业的出发点，立足于为当前福利生产登上新台阶、更上一层楼服务，并紧紧抓住了力图为从根本上全面地提高福利企业管理水平提供根本条件这个核心问题。它还专章阐述了福利企业的涉外经营、劳动人事管理、福利企业诊断、残疾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以及福利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颇有新意的一些内容。这些确是异常新鲜而又十分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这样，这部书也就既充分体现了福利企业的性质：有明确的企业性和明显的福利性；又充分适应了加强福利企业管理的迫切需要：有理论的引导性和业务的指导性。

自然，在福利企业管理上有不少新的课题和某些管理方面的特点，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热诚地期待着这部书再版修订时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补充。

（原载 1990 年 8 月 18 日《辽宁日报》）

《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学》闵真、张九赋、杨庆信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出版，定价 6.70 元。

## 现代化建设没有坦途 ——评介《日本·走向现代化》

卢 松

十余年前，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曾以《日本名列世界第一》一书，向世界揭示了一个后进工业国迅即走向现代化的奥秘。自那以后，各国都开始注重探索日本成功的经验及可供本国借鉴之处。由金明善、徐平二人合著的《日本·走向现代化》一书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目前国内尚不多见的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和介绍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专著。

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亚洲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明治维新以后，仅在百余年时间里，它就走完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年走完的路程。1987年，日本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发展，得益于战后美国的扶持与大量经济援助，得益于50年代之初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各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由于事实上充当了侵朝战争的桥头堡和后勤基地而大发其财。同时，日本的发展，也得益于战后相对稳定的国内政局，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通观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全部过程，你会发现它所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鲜花铺就的坦途，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动荡和痛苦的过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现代化行程，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政治上的立宪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极力扩张和国内市场窄小的矛盾，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思想文化领域的文明开化政策同保守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日本的现代化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日本·走向现代化》一书，在全书三大部分“起动与挫折”、“改革与复兴”、“成功与反思”中，始终没有忽视对日本现代化行程中所遇矛盾和阻力的考察和分析。作者指出，日本现代化的发展并非呈现为稳定的平行线，它呈现于人们的“不是一幅十分清晰明快的图景，而是或明或暗的复杂交错的外貌”。应当说，作者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它不仅忠实地描绘了日本现代化历史的图画，而且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构成日本现代化行程巨大屏障的，首推封建主义残余，尤其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崇尚武力为特征的军事封建主义的残余。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按照欧美“现代国家模式”，对政治体制等诸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天皇专制的体制，集立法、行政、司法与军事统治权于天皇一身，同时又给军部以种种特权。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军部法西斯不仅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元凶，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把日本现代化的战车拖进了战争的泥潭，造成了日本现代化行程的中止和断裂。

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共发生过五次危机，循环的周期一般为8年左右，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中期，共发生了六次经济衰退的危机，循环的周期缩短为4年左右。尽管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经济危机给社会生产力的冲击也不同程度的有所变化，但是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分析的那

样，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制约着的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并没有因现代化的实现而消失，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依然存在”。

以追赶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型现代化时代”，在日本现已结束，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终结。现今的日本同 100 多年前的日本一样，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国内外的许多学者认为，现在的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看来，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鲜花铺就的坦途都不会存在。

作者开明宗义，本书是一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但不拘于一般的历史叙述，而是力图对日本“赶超型”现代化的规律作一些探索。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日本历史的熟悉，也需要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原载 1990 年 9 月 13 日《辽宁日报》）

《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徐平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定价 14.00 元。

## 正法直度敦风励俗

——《违反财经法纪问题 1000 例》书荐

罗国英 姜兆滨

在著名财会审计学家王文元教授主持指导下，鲁言、吴颖主编的《违反财经法纪问题 1000 例》，甫经问世，即成为畅销书。这部专业工具书，何以畅销不迭，依笔者所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鲜明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它针对的是图谋私利和小团体利益的违法违纪者，是妨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各种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其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广大财会、财政、税务、审计、物价、金融工作人员对违反财经法纪问题的鉴别能力，提高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洁己奉公和抵制违纪行为的自觉性，堵塞漏洞，预防和纠正各种经济错弊。所以读者来信称道：“这是一部严明法纪、敦风励俗、顺乎民意的书，也是为改革开放清道、服务的书。”

较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它源于现实生活，又应用于现时实际工作需要，较好地解决了如何把理论与实际融为一体这个难题。正如读者来信所说“实惠实用”是这本书的一大优点和特点。它取材实——书中事例无一杜撰，都是根据现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加以归纳之后概括出来的；论断实——每个案例都是以事实为基础，依法论断，实事求是；用途实——它开宗明义是以财经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为服务对象，特地按现时查处违法违纪问题的实际工作需要而编著的；内容充实——全书有 1000 个实例，涉及到各行各业，并附有相关的现行财经法规 51 个，内容相当丰富，无泛泛空谈。

选题立意、体例结构具有新意。它全部用实例说话，每例一题，每个例题又自成一体，文字简练，使读者一目了然。故而读者写信称道：“这是在财经学术论著中少见的一种全新形式。”还有的读者在信中说：“把上千个案例，从揭露作弊手段、认定违纪性质到结案处理，浓缩为 43 万字（每个案例只有 430 字），足见编者和作者在表述方式、归纳概括、文字处理等方面，都是刻意求精、求新的。应该说，这是此书的一个独到之处。”

这部新著的不足之处，主要是个别案例的“处理意见”不尽妥贴，尚有值得推敲的地方。笔者以为，写实固属重要，但牵涉政策、法令方面的问题，更应写准。只有写准，才更具有权威性和实用价值。

（原载 1992 年 1 月 30 日《辽宁日报》）

《违反财经法纪问题 1000 例》鲁言、吴颖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定价 12.00 元。

## 加强管理会计研究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评介《管理会计》

毕梦林 秦振华

黄正毓、郭宝柱主编的《管理会计》是冶金高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管理会计课程以来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物。我们特向冶金院校和冶金企业的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学科，80年代初期才在我国高等院校开设这门课程。该书的出版对加强管理会计的教学研究，推动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以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会计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经营要素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围绕企业的资金、成本和利润三个中心问题进行分析，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预测和决策、规划和控制的信息系统，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当前，在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管理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强内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成本控制，消化原材料能源的涨价影响，努力降低成本；对企业未来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对企业经营活动加强事前规划和日常控制，使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和高度的适应能力。管理会计应用科学管理方法，对财务会计和有关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日常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是改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工具，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的出版发行，适应了我国企业深化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满足了冶金高等院校经济管理和财会专业教学的要求，不仅对人们提高管理会计认识水平和推动管理会计的应用将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对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结构严谨，系统性较强。新兴的管理会计内容广泛，目前又众说纷纭。作者紧紧围绕管理会计如何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目标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个核心，抓住管理会计在规划与决策、控制与执行中的作用这条主线，把全书内容有机的统一起来，使该书结构严谨、层次清楚，既突出了重点又加强了系统性。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并吸收了国内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关著作的精华，构成了自己独有的体系。

二、博采众长，具有创见性和科学性。该书作者对中外关于管理会计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应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其精华，重新进行理论构筑。特别是对一系列基本概念、重要观点、主要方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探讨，对有争议的问题大胆予以探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该书具有创见性和科学性。

三、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了适用性。该书是在作为内部教材试用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积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密切联系实际，突出了适用性。书中列举了大量应用案例，每章后附习题，深入浅出地阐述概念，应用举例说明分析问题，便于读者学习理解和应用。如在第八章的全面预算中，通过典型案例、八个表格讲述其理论和方法，不仅使读者加深理论学习，而且也能掌握编制概算的具体方法，有利于提高读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精心选择案例，并与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使该书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书内容新颖，深度和广度符合教学大纲要求，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但是，该书并不尽善尽美，由多位作者合作的书稿在统编中仍留有斧痕。经过修订再版，该书将会更加完美。

（原载《北京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管理会计》黄正毓、郭宝柱主编，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定价3.48元。



##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力工具 ——《管理会计》的特色

陈玉清

《管理会计》一书是在内部教材的基础上，集作者多年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本书不仅是冶金院校经济类专业的适用教材，而且是冶金企业管理者的有益读物。

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经营要素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成本特性和量——本——利分析为基础，围绕企业的资金、成本和利润三个中心问题进行分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预测和决策、规划和控制的系统信息和方法，并通过建立责任会计制度来加强对财务成本的控制和考核。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八五”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务必抓好抓实。在当前搞好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艰巨任务下，《管理会计》一书，不失为冶金行业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工具。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我国高等院校于80年代初期开设了这门课程，不少经济管理者对其还不够十分了解。无疑，《管理会计》一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学习管理会计，加强对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推动管理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系统性。该书作者以实现企业经营利润目标为核心，以管理会计在规划与决策、控制与执行中的作用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同时，还吸收了国内外管理会计的成果及有关著作的精华，使该书结构严谨，系统性较强。

二、实用性。作者注意把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与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大量应用案例、章后习题，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该书内容新颖，材料丰富，方法实用。

三、可操作性。该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突出了应用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在第八章中，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利用八个表格说明编制全面预算的方法，使读者容易了解和掌握有关理论，有利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本书的高质量表现为外观质量与内在质量的统一。《管理会计》一书在作者撰稿、编辑加工和出版、校对过程中，注意了系统质量控制。但是，这部由多作者合作而成的书稿在统编过程中仍有斧痕。希望通过教学实践和企业实际应用，不断总结提高，在修订再版中能予改进，使该书的质量能更上一层楼。

（原载《冶金经济与管理》1992年第1期）

##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有益探索 ——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

王琥生

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今后十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除过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以及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近几年经济研究工作者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对如何建立这种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做了大量探索，由张今声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在这些有益探索中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和有鲜明实践性特点的著作。

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建设中，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宏观调控目标，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做好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综合配套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运行。为此，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不仅应包括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计划、控制、监督、组织，而且还应包括对社会需求的管理、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总量平衡和财政金融政策、汇率政策等等。因此，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是涉及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管理科学，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的作者们以勇于探索的精神，敢于向新开阔的领域进军，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这部教程由总论、功能篇、运行篇和综合篇构成。全书结构严谨、文字简练，融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于一体，集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于一炉，以国民经济系统总体协调和总体效益统领功能研究和运行分析，使总量考察与结构分析相得益彰、浑然一体，尤其是以下几点给人印象至深。

首先，该教程从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把管理理论与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比较深刻、系统地阐明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功能，即：决策与计划、控制、监督、组织等几个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把完善国民经济决策体制和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不断完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系，强化国民经济监督，以及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组织机构等等，对加深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功能的认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会有重要作用。

其次，该教程吸收了近几年国内外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深入探索，就消费需求的形成和调控、投资需求的适度规模和投资的调控、经济的适度增长、控制“过热”的对策、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总量平衡和财政货币政策等等国民经济管理中十分重大的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剖析，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控制经济“过热”的对策中所提到的若干见解。

再者，全书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国民经济管理作为一个大系统，强调系统的总体协调和总体效益，对各项管理活动的系统协调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剖析。目前在实际国民

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调控所以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重要原因是没有把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将系统的总体协调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面既有现行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方面的原因。因此，在深化体制改革中通过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强化总体协调机构和总体协调职能，是实现总体效益的重要保证。本书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对全面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无疑会有重要启发。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3期）

《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张今声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3月出版，定价4.90元。

## 企业家的本色 ——读《走出困境》

潘承烈

《走出困境》的作者徐孝纯同志，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北京达美集团的总经理。他以达美集团的发展为背景，在总结自己多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对关于中国企业管理发展，中国企业的未来，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全书分为六个专题（改革、人才篇；产品开发篇；古为今用篇；专业理论篇；集团篇和未来篇）向读者介绍了改革开放浪潮中，作者身为企业领导人在企业内部实行的多种卓有成效的管理改革，展示了达美集团从北京印染厂发展为一个集纺织、印染、服装为一体，兼产电子医药产品，实行科研、生产、销售相结合，拥有 222 家企事业单位，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本书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增加等方面，论证了作者的“工厂靠产品，产品靠科学，科学靠人才”的管理基本思维和论点，阐述了人才培养与使用、产品开发与市场研究对企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作者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在机械化大生产的现代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必要性，论证了企业间的横向联合是在现代变化多端的商品经济市场中企业保证安全，寻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付诸实践，使达美集团成为具有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经济效益显著，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的大型企业集团。

许多企业在市场疲软面前踌躇不前，达美集团像所有企业一样，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在困难面前，达美集团通过集思广益，认真研究，制订了面向国际市场、面向未来，增强内部管理，加快产品品种结构调整步伐，适应消费市场，引导消费市场的多种发展战略，终于使企业渡过难关，并在新经济形势下，探索、寻找了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

徐孝纯同志的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于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反过来说，无论是达美集团或者其它企业，其成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不是党和国家确立和制订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方向和方针，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功的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家们的脱颖而出，也就不会出现我国经济这十年来的显著发展。我们相信，在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将会有更多的如徐孝纯同志这样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并会有更多的《走出困境》这样总结企业发展经验的好书问世。

（原载 1991 年 4 月 18 日《辽宁日报》）

《走出困境》徐孝纯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定价 4.50 元。

## 中国经济学史的一座丰碑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评介

宋玉平

由经济日报社主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以其列传人数之多——108位，篇幅之长——190多万字，规模之大——共计5册，而引起海内外的注意。为这套书撰稿的作者都是对经济学素有研究的行家，这样就保证了这套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套传略虽然工程浩大，文章繁多，但在结构上保持了统一体例，风格一致。每篇传记均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叙述了经济学家的主要生平和经历，一部分介绍了经济学家的治学方法，学术思想，以及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首先，作者在介绍经济学家的生平事迹时，择其主要的生活经历和活动，将我国当代经济学家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了追求真理，历经磨难，矢志不渝的生活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以《新人口论》而闻名中外的“百岁老人”马寅初，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在马家（五马俱全）的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考取美国公费留学生攻读工科。但马老目睹美国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第二年转而攻读经济学。1915年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而对当时旧中国的时局，他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由于两大势力的压迫，即军阀和外国”。他还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抨击国民党当局，以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身陷囹圄。

1949年2月，马寅初先生在中共安排下，辗转由香港来北京，回到人民中间。新中国的成立使马老欣喜若狂，焕发了青春，他不顾古稀之年的高龄，曾先后三次到自己的家乡浙江视察。经过对农村人口问题的考查，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生产的观点，这一观点最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7年7月，马老著名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新人口论》发表时，适逢1957年反右派斗争，加之当时“左”的思潮鼎盛，唯心主义猖獗，马老受到了学术乃至政治上的围攻，不仅被撤职，而且很快在政治论坛和学术论坛销声匿迹，遭受不公正待遇达十多年。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攻击，马老表示“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为了国家的命运和人民利益，我什么都不怕，……我不怕孤立、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马老还曾多次就当时刚出现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问题，反右派扩大化问题，经济建设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问题，以及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问题，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和尖锐的批评。马寅初老先生的一生，堪称“平生嫉腐恶，人民同呼吸”（许德珩《悼念马寅初先生》）的光辉典范。

此外，这套传略中收录的《因材施教遍地桃李——陈岱孙传略》、《为真理而献身的光辉榜样——孙冶方传略》、《青山不负夕阳红——蒋一苇传略》、《刻意求工业绍箕裘——刘国光传略》、《拼将余生著新说——熊映梧传略》也都写得非常精彩，值得一读。

其次，这套传略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是一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当代基本

经济理论的精萃。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集中笔墨重点介绍了经济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所取得的成就。

这套传略对立传人经济思想的介绍叙述简练、详略得当、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其他诸如董辅祁的“中国经济成长论”、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尹世杰的“消费经济理论”等，在这套传略中都有较详尽的论述。如果读者要了解其中一位经济学家的主要经济思想，只要翻阅一下这套传略便可一目了然。

第三，这套传略不仅记叙了立传人的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从整体上将我国各个时期的各种经济思潮从思想上和学术上反映出来了，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论坛上的几次大讨论，在这套传略中都有较充分和集中的叙述。这套传略对中国经济学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阐述，内容丰富，线索清晰，观点明确。如果将其中相同的一些经济理论和观点加以综合整理，便足以是一本以理论观点为体系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如果将其中在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加以集合，并将他们的经济思想进一步拓展，无疑是一本以“人”为篇章结构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

最后，这套传略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例如，施复亮曾与陈独秀、陈望道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任东京小组的负责人，只是由于一件极偶然的小事，施复亮没能成为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陈翰笙、王亚南、沈志远、薛暮桥、许涤新等都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参与了许多上层社会活动等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公开，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当然，这套传略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立传人的生活经历写得不够丰满；由于各篇传略是由不同的作者执笔，水平不等。然而，无论从这套传略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评价，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经济学史的一座丰碑。

（原载《博览群书》1991年第4期）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1—5卷）经济日报社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包括：《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定价4.10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二），定价4.10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三），定价6.20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四），定价7.50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五），定价9.40元。

## 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一项基本建设 ——评《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学》

钟 文

《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学》一书是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全书》之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史上又一部巨著，也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的一本教材。编写出版《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学》，对推进有色金属企业管理现代化，增进全社会对有色金属工业的了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正如袁宝华同志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学》的出版发行，是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可以看作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一项基本建设。”

近年来，关于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但这些书籍大都是写管理共性的，具有行业管理特点的却很少。这就很难满足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尤其是有色金属工业与钢铁等工业相比，不仅品种众多，工艺也要复杂得多。因此，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更需要具有行业特色的管理书籍。该书在解决上述问题上作了初步尝试。全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原理、管理现代化方法、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科学技术管理、安全管理、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地质勘查管理、矿山企业生产管理、冶炼企业生产管理、加工企业生产管理、机械修造企业生产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等内容。该书与同类管理书籍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色；

### 一、突出了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的行业特点

有色金属工业的行业特点比较多，一本书要把这些特点全部反映出来也非易事。本书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写管理。比如联系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环境污染严重、废弃物多，以及综合回收利用程度要求高等实际情况，专门撰写了《环境保护与综合利用》一篇。二是联系生产过程或生产工艺写管理。本书采取了工艺概写，管理尽量详写和实写的方法，在简要介绍生产过程或工艺流程后，突出阐明生产过程或工艺流程各环节中的管理。三是联系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写管理。

### 二、内容新颖

该书在内容的组织上，既注意讲清企业管理的现实问题和管理方法，又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和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超前发展的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相应措施，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说明问题，力求科学性与新颖性的统一。比如对企业活力与企业素质、企业领导制度、管理现代化成果的经济效益评价、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发展趋势、现场管理、工序质量控制、办矿新模式、合资企业管理等新内容、新方法，书中都以重笔作了阐述，使该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新颖性。

### 三、具有可操作性

该书在内容上既体现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又使书中的内容便于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1. 语言力求通俗易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都可基本读懂。2. 写工艺流程或有难度的管理方法，都写明工艺操作方法或管理方法案例分析。该书比较重要的章节都有典型的案例分析，使读者能够触类旁通。3. 采用图解法，凡是能用图表表述的尽量采

用图表示意，力求简明清晰，该书图表占全书内容的 10% 以上。

#### 四、侧重量化管理

该书在坚持定性管理与定量管理统一的同时，更侧重于定量管理，从传统定性描述转到现代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定量计算上来，能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都用公式、图形来表述，该书的各種管理公式近千个。

当然，该书还有不足之处，如有的地方论述还不够充分贴切，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平衡，这都有待于改进。

（原载《冶金经济与管理》1991 年第 5、6 期）

《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学》王恭敏等著，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定价 45.50 元。



## 读《中国审计大辞典》有感

章迈 鲁言

审计在我国还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由张鸿杰、贾丛民等同志编著的《中国审计大辞典》一书，为这门新学科的建设，做出了有益贡献。

这部审计辞典，就笔者所见及的，是迄今搜集词目量最多，比较系统而全面的审计工具书。该书共选收审计词目达 3000 余条，其中半数以上是“首选词目”，可见编者手头掌握着大量资料。学术界对辞书的编写有句名言，叫“辞若不全，典又何及”，说明词目选入量多少，是评价辞书的首要前提。词目不足千条，也称为“典”，就有些牵强。

该书编审人员达 200 余人，既有审计部门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也有审计专业方面的教授和学者。书中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审计实务”，大都由中央各有关部委的审计部门负责人参与编审。该书总结了我国几年来的审计理论和实践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辞书是项颇见功力的活，释词要求做到义项完备、辨析准确、书证圆满，以“正名辨物，赏新析疑”，为学术界所共识。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仍以“社会审计”一词为例，该书对该词的解释，为一词五义，包括：社会委托审计；社会责任审计；社会会计审计；社会结算审计；社会宏观审计。这反映了编者具有厚实的功力，熟悉和精通国内外审计知识和学术动态。

世界名人、意大利学者斯卡利洛认为：“编辞典，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艰辛。”我国著名学者则讲过：“傻子才去编辞典，编辞典不是人干的事情，而是‘圣人’干的。”编辞书一要面面俱到，二要一丝不苟；如有半点疏忽、逃避和虚伪，必将露出破绽。《中国审计大辞典》的问世，是全体审计人员多年来不辞劳瘁、辛勤实践的总结。而学术问题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审计事业的发展，该书在收词和释文等方面，仍需继续做些推敲。

（原载 1991 年 3 月 18 日《辽宁日报》）

《中国审计大辞典》张鸿杰、贾丛民等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定价 9.00 元。

## 西方会计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西方会计丛书”（第一辑）

徐政旦

厦门大学余绪缨教授主编的“西方会计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受到了我国会计审计学界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一套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和审计的丛书。

### 一、从会计的历史演变来认识其发展规律

西方会计和审计的历史渊源已久，它有着丰富的内容。丛书主编认为要全面、深刻地了解和客观科学地研究现代西方会计和审计，首先必须对其历史或者说对其在各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演变过程有所了解。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方会计丛书”的每本书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会计和审计中有关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受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丛书中由费文星撰写的《西方管理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一书，就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源流。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概述了从19世纪后期至本世纪50年代早期管理会计产生的背景、形成管理会计雏形的各种著作以及早期管理会计的两大支柱——标准成本和预算控制。这些内容提供了现代管理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概况，使读者认识到管理会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内容将进一步发展。又如，由王文元和郭子健编著的《公司会计》，论述了西方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及其特征对西方公司会计产生的影响，为读者了解西方现代公司会计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这些历史的介绍便于我们寻求和总结会计审计的发展规律以把握其发展方向。

### 二、阐述西方会计审计的现状，以供我国会计审计改革的借鉴

介绍西方会计和审计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读者了解它们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各书在让读者了解西方会计审计历史的基础上，展开了这些学科内的一些新观点、新内容、新方法的阐述。在阐述过程中，作者们首先把产生这些新观点、新内容、新方法的西方现代社会经济特点作了介绍，以便读者加深了解西方会计审计的现状，并使读者认识到现代西方会计审计中哪些方法在我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进程中可加以借鉴利用。其次，丛书不仅介绍了一些国家的会计审计理论和实务，而且还概括地介绍了一些国家会计和审计的特点。例如，李宝震和郝振平撰写的《国际会计》和《国际审计》，对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荷兰、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秘鲁等国的会计审计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对我国会计审计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三、从基本知识的普及中提高丛书的实用性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地对外开放，会计和审计实务部门的工作者迫切地想了解当今国际上一些会计审计的惯例和做法，以适应他们在涉外业务中的需要。“西方会计丛书”为了满足实务工作者的需要，对西方会计审计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作者尽可能以通俗的形式进行介绍，使实务部门的同志读后能掌握其基本内容，并在实务中加以运用。例如，由曹冈编著的《本—量—利分析》一书，应用了大量通俗易懂的例子，说明将混合成本分解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本量利分析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又

如，由羨绪门编著的《西方管理审计导论》一书，对如何实施管理审计的基本方法作了较为详尽介绍，以便实务工作者掌握使用。

#### 四、阐述各国会计审计研究的新动向，有助于我国会计审计的理论研究

在当前我国会计审计改革的过程中，从事会计和审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各国专家学者对会计审计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从而更好地指导实务部门的工作。在这方面，丛书择要介绍了西方会计和审计学者在一些会计审计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以及目前在会计审计实务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新课题。例如，《国际审计》一书，介绍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在需要什么样的审计这一问题上所持的一些主要不同观点，诸如：可信性观点，经管责任观点，四因素（利益的冲突，重要性，复杂性和时空限制）说，管理者理论，社会控制观点，跨国公司观点等。又如，《国际会计》对目前世界各国会计界均在重点研究的外币折算问题，通货膨胀会计问题，转让价格确定问题，国际税务中的会计问题等，用了较大篇幅予以论述。作者不仅介绍了西方会计界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而且还论述了这些观点方法的不足之处及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论述也是我国会计审计理论界正在探索研究的问题，因此对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综上所述，我认为“西方会计丛书”（第一辑）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既反映了我国老中青会计审计学者对西方会计审计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会计审计理论界的学术观点，因而是一套全面反映西方会计审计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多得的著作。我期待着“西方会计丛书”的进一步成功。

（原载《现代会计》1991年第12期）

“西方会计丛书”第一辑，余绪纓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包括：《西方管理会计的产生和发展》费文星著，定价2.35元；《西方管理审计导论》羨绪门著，定价1.90元；《国际会计》李宝震、郝振平著，定价3.05元；《国际审计》李宝震、郝振平著，定价2.65元；《公司会计》王文元、郭子健著，定价4.85元；《本—量—利分析》曹冈著，定价3.90元。

一本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专著  
——读《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

高鸿业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是一本难得的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翔实材料，严谨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全面而系统地评析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观点，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观点。这在我国经济学界尚属开拓性之举，填补了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块空白。

—

该书由八章组成，第一章导论，介绍该书的写作目的；第二章对李嘉图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转化问题，及斯拉法体系进行系统的阐述，并加以比较；第三章评述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依据斯拉法体系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第四章评述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关于价值、价格决定及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分析、转化问题的分析，以及他们关于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同冯·纽曼一般动态均衡体系相沟通的理论观点；第五章评述了庞巴维克、萨缪尔森、卡特勒、沃尔弗森等人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评，指出了其企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庸俗性；第六章阐述了包括多布、斯威齐、曼德尔、德赛、内尔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观点；第七章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分析；第八章总的评论，几点启示，对否定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批判，理论分析的一点尝试——转化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该书作者强调，对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以及其它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与研究。并且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研究上，一般说来，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应该发掘西方经济学界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分析，像马克思对待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那样，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西方经济学界各种理论观点和理论分析，并在对其错误观点予以批判的同时，指出其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方面。这应该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或一大优点。

二

该书强调，要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要从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的高度，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概括的意义，去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贯穿于该书的一条红线，并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标准。

作者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是揭示剥削劳动的理论和利润来源的理论。它把两个层次（价值层次和价格层次）的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结合成一个总的社会过程。这是马克思胜过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

作者高度评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观点，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始终认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其他学派的理论所不曾提供的洞察力，劳动价值论是说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内在结构的钥匙。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立场上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现象。他们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中的阶级对立、收入分配上的阶级对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关系。

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们以及转向新李嘉图主义的米克一致认为，斯拉法体系优越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用斯拉法体系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此，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虽然斯拉法体系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可以应用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但它没有探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原因。

伦敦经济学院的森岛通夫和伦敦大学的凯特弗里斯也主张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移植到冯·纽曼的一股动态、均衡体系上，建立所谓“马克思——冯·纽曼体系”。他们用数学方法证明，在遵循严格的假定条件下，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一般是能够成立的。但当涉及到联合生产、技术选择和固定资本折旧等复杂的情形时，马克思用等式方法对价值的论证就不能成立了，而应该代之以冯·纽曼的不等式。并以此作为他们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据。对此，作者认为，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质的方面，只着眼于数量分析。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数量分析方法，却总不能改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概括这一基本事实。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以为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计算方法就可以不要劳动价值论了，这种看法也未免失于偏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个不必要的弯路，只有离开劳动价值论，借助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解决价值和分配问题，并把马克思的“转化问题”说成是借助于一块橡皮解决的问题。作者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萨缪尔森的全部数学证明仅仅在玩弄一套数学游戏，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价值分析的根本理论意义。马克思转化理论的深刻意义在于证明，价值是价格的本质，工人阶级不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作为资本家总体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无论如何不能仅仅用一块橡皮所能办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就是，要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残存的属于旧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何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的发展。作者认为，用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分析来解决商品的实际定价问

题，是把马克思的抽象分析的理论研究任务同具体地确定商品价格的任务混淆起来了。马克思在商品价值的分析中，把价值归结于人类的抽象劳动，并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商品的价值量，并不是要为商品的实际定价确定一个标准，而是要揭示商品的价值同价格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说明价格在本质上是什么。至于具体地确定商品的价格，则要根据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甚至人们的偏好、收入状况、商品本身的差异，在确定商品价格的时候，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仅仅从确定价格考虑，只要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就够了，这既可以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的分析，也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价格决定的分析，无需分析价值量决定本身。

应该说，这种见解是深刻的，独到的。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无启发性。

### 三

该书另一突出之点，是它强调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中应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意义。这使该书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著作的理论特色。

作者用相当篇幅论述了斯拉法体系，指出，斯拉法体系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工具。斯拉法的生产价格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虽然，斯拉法提出，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不是普遍可能的，但他的有时期劳动的分析，却为生产资料还原为有时期劳动确立了一般原则。斯拉法体系中的生产价格和马克思论转化中的生产价格都担负着分配剩余或剩余价值的任务，生产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影响着剩余的分配。这是二者的共同点。不过在斯拉法那里，生产价格和分配的关系是通过一组方程直接表现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则要通过一系列的转化程序。这是二者的差别。这种差别反映了两种理论在分析上的根本目的的差别。斯拉法理论分析的目的是确定生产价格和利润，而马克思的理论分析的目的则在于揭示价值、剩余价值同其转化形态生产价格、平均利润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如果我们把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也不妨应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去直接决定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

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和转向新李嘉图主义的米克，则进一步证明了斯拉法体系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

该书作者也很重视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的“价值决定不等式”方法。像斯蒂德曼在《按斯拉法看马克思》一书中所证明的，在涉及到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在价值决定上就会出现负值和价值不一致的情形，并以此作为其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由。在现成的马克思的书本中是无法找到反驳斯蒂德曼的充足理由的。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根据冯·纽曼的不等式和线性规划方法，求得最佳解，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难题。因为，按照他们的分析，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必有一种使用劳动量最少的过程，用线性规划方法确定使用劳动量的最小值，就可以确定联合生产的产品价值。这对于解决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贡献。

作者对以新古典传统批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认为，在他们的分析中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例如，他们提出，要在价值决定中考虑需求的作用，需求是生产发展的制约因素，它在价值决

定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作者认为，鲍特凯维兹及其以后的一系列经济学家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论述，也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在经济分析中采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的问题，作者的论述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在经济科学中，总有一些共同的经济范畴，而处理这些共同的经济范畴当然就可以采用共同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就说过，他的生产价格就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然价格’。实际上，马克思的平均利润、成本等概念，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平均利润、成本等概念也没什么区别。……马克思的经济学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据区别并不在这些数量关系的分析方面，而在本质分析方面。在本质分析方面，马克思胜过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在数量分析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很有可能超过马克思。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们最注重数量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代又一代潜心于数量分析的研究，在这方面必然会取得一些成就。既然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些较为准确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些较好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呢？”

#### 四

综观全书，除了上述之外该书还有如下重要特点：

1.全面性。该书在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中，涉及面很广。从横的方面看，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界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从纵的方面看，可以向上追溯到斯密和李嘉图，向下论及到最近的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历史跨度很长。对每种理论观点都进行了跟踪分析，搞清了其来陇去脉或发展线索。在对各种观点的评析中，既指出其理论错误，又肯定其在科学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既有纯理论分析，又有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既有对各种理论观点的系统介绍，又有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

2.准确性。该书准确无误地、原原本本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各种理论观点。在对各种理论观点的评析上，分寸也把握得很适当，做到了言之有据，以理服人。这体现了作者对待理论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材料新。该书所涉及的材料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L·米克曾写过一本《劳动价值论研究》的著作，相比之下，杨玉生同志的这本《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更现代化。米克在他那本著作中论述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较早的一些理论观点，内容显得陈旧。而杨玉生的新著则论及到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内容新颖，并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系统地概括与归纳，从更高的视角加以评析，这就使得该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新性。

（原载《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1期）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杨玉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定价5.00元。

## 汇科海之巨流还历史之本貌 ——《李约瑟文集》编后谈

冬 风

《李约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汇作者半个世纪之研究成果，集7卷30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及未完成的各卷之精华，一经面世，便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刻的考证和独到精辟的分析，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文集》的出版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福音。我们相信，它将有助于唤起我国科学家对科学史在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

李约瑟，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文学院院士，剑桥冈维尔和卡耶斯学院院长。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多年来致力于中英友好，悉心研讨中国科技史，名闻遐迩。博士前半生研究生物化学，是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后来的生活使他“皈依”中国文化，进而转向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李约瑟文集》是世界上首次出版的李约瑟博士的论文和演讲集，其内容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即中国在历史上有哪些科技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何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比西方有效并领先；为何中国后来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为何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

18世纪以来，欧洲曾出版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作品和译作，但绝无系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论著。汉学家研究中国多重文史而轻科技，西方科学史家不懂中文，对中国一知半解。一般西方人知道中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人文科学发达，或许有些技术发明，除此便不甚了了。有人认为中国人懂技术而无科学可言，即使有科学，他们也不相信会对西方产生影响。中国科学史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所忽视。

李约瑟认为轻视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观点是肤浅的，不少是出于误解和无知。他以确凿的史料和证据，较全面系统地对四千年来中国科技发展作了历史概括。他认为，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几乎在所有科技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爆炸物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例如，西方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出现于1819年，而中国宋代数学家秦九韶1247年便已提出同样方法，早于西方572年。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天象观测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载，公元1600年前有581项慧星记录，对太阳黑子及其周期和超新星有最早的和系统的考证。浑仪是近代天文仪器的先驱，而中国元代郭守敬是近代赤道式天文装置的创始人。时钟过去认为是欧洲人14世纪发明的，但1090年中国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机构中就有机械钟。由于时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所以中国这项发明有重大意义。

作者指出，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和磁感应性了。我国航海磁针的应用比任何国家至少早两个世纪，后来于12世纪传到西方，导致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13世纪以前，西方尚不知硝石为何物，中国9世纪已用它制成火药，10世纪时火器的硝烟已弥漫于中国战场。炼丹术则打开了化学世界的大门，发展了化学设备，而它也起源于中国。

笔者曾有幸拜会李约瑟博士。在谈到12世纪中国关于火箭的发明时，博



士寓意深刻地说：“这无疑是人类发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许有一天，当太阳比现在冷却了些的时候，人们就要去太阳或其他星球上生活，那时我们只能依靠火箭和推进剂。也许第一个到达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火箭就是中国制造的。”

作者在《文集》中谈到，1380年前欧洲人还不懂铸铁，而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早于前者一千余年。与冶炼有关，中国东汉杜诗的水排是最早的水力鼓风机，约于1200年发展了活塞风箱，其结构与往复式蒸气机相仿，“中国风箱是往复式蒸气机的祖先”。与造纸关联的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值谷腾堡（1400—1468）时代。这些发明都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

此外，中国人对生物进化思想颇多贡献。公元前3世纪《庄子》中有物种变化思想。1406年的《救荒本草》是食用植物学的杰作。西方从18世纪起才出现类似作品。作者进而指出，在医学方面，中国是唯一具有连续性著述传统的国家，从商代疾病记载直到近代，史不鲍书。如维生素B与脚气病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直到免疫学的先驱——天花预防接种法的发明，对人类健康事业均有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念，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从弗朗西斯·培根以来直到当代西方学者，常议论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的深刻影响，却不知其故乡在中国。《文集》无疑为各国知识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它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从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交流史的角度，理清了中国与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印度等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中国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来考察，并给以应有地位，在东西方各文明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在这部《文集》中，作者还通观全局，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角度研究并解释诸如为何在西方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发出灿烂的科学之光，后来近代科学又为何兴起于西方而非中国等重大问题。他分析了中西科学传统、社会体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地理环境诸因素对各自科技发展的影响。他对史料考证精密，在处理实物及考古材料时能佐之以现代研究方法，每篇文章都能提出新观点、新内容，使全书结构井然，言之有据，从而得出周密结论。

作者指出，传统中国之所以没能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中国科学长期停留在阴阳五行说的古典范围内，没有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用于自然探讨中，因而处于达芬奇水平，而没有升至伽里略、刻卜勒水平。当需要出现这类人物时，阻碍科学进步的其他因素已在起作用了。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西方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便不难知道西方近代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形成而同步发展的。西方国家相当分散，内有城邦割据，封建统治较不稳定；又多属海洋国家，依靠对外贸易，商品经济发达。得势的资产阶级终于摧毁封建制，他们的商品利益要求了解物质属性和数量关系，赖有科学支持并为此提供帮助。当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时尤其如此，这就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反之，科学的发展又要求学者必须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而当伽里略等人把数学方法和系统实验纳入自然研究时，则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迅速发展起来。

中世纪中国是亚细亚官僚封建社会，在大陆国家内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以水利农业文明为标志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者奉行抑商政策，

商人受官僚钳制，商品经济得不到足够发展。官僚封建相对稳定，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平衡机制，吞得下不利于它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火药在西方起了捣毁封建制的作用，但对中国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以其特有的速度前进，而各种因素却使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使其不能像文艺复兴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期那样迅速发展。

那么为什么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比西方先进呢？《李约瑟文集》告诉我们，中国封建制比希腊奴隶制或欧洲封建制来得好些。中国没有欧洲那样长期的黑暗时代，语文和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有着丰富的典籍流传。如果后来中西社会、经济环境互换一下，近代科学就会产生于中国而非西方。

在对上述分析作出结论时，作者认为，中西历史各有其骄傲与自卑的一面，不必为过去而烦恼，要着眼于未来。今天的科学是国际性的，无中西之分，是人类共同财富和互相交流的共同语言。以往各文明的科学已流归近代科学之海，即所谓“江汉朝宗于海”。而中国科学是股巨流，贡献最大。

总之，正如周谷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李约瑟文集》概括了从古至今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不，是整个中国的科学文化史。他所提出和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无疑填补了西方汉学和科学史领域中的空白，为今后几代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科学的统一预兆了人类未来的政治上的统一，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两千年前《礼记·礼运》篇中表达的‘天下大同’的思想终将取得胜利。”——李约瑟如是说。

（原载《出版工作》1987年第9期）

《李约瑟文集》潘吉星主编，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定价12.35元。

新颖实用 电工良师  
——评《实用中小型电机手册》

彭友元

《实用中小型电机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囊括了近几年中小型电机更新换代的新产品，全面提供了用户急需的技术数据。因此《手册》将对推广新产品、贯彻我国的技术政策起促进作用。

《手册》从说明电机基本常识和选用电机要领入手，系统地介绍了目前国内生产的常用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交流变频调速装置、同步发电机、直流电机和分马力电动机等特点和用途，以及电动机的选择、起动和制动、控制和保护、电机的运行、安装、维护、常见故障与修理、改制和重绕的基本常识和计算，电机制造和检修中的试验和设备，常用电工材料等内容，同时提供了在电机选型、维修方面有参考价值的技术数据。如此丰富的内容集于一书，要求《手册》的作者与编者，选材合适，剪裁得体，编排得法。该手册繁简适宜，阅读和查找方便，是一本新颖实用的工具书。

我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活中，经常与各种电工手册打交道，总觉得有关中小型电机的内容，在各种手册中显得有点支离破碎或者东抄西拼，内容比较陈旧，用起来不怎么得心应手。很多电机维修人员和设计院所的同志，常常来信询问有关中小型电机的选用和维修问题，为此，我购置了一大堆手册，作为“老师”，介绍给全国读者。但“老师”太多，“人多嘴杂”，各持所见，使“学生”难以适从。如今有了《实用中小型电机手册》，有关中小型电机的选用和维修问题，一览无余，数据可靠，使人信得过，学得懂、用得上。案上有此《手册》，不必寻师千里之外，咫尺求教，开卷有益。所以此《手册》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广大电机科技人员和维修工人、经销人员、设备动力人员的良师益友。

《手册》的另一特点是“手册味”浓。全手册以图表为主体，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两者相映成趣，有恰当的好处。《手册》中还给出老系列的数据，就维修而言，这是完全必要的。可以查找我国中小型电机的“家谱”，新老成员历历在目，使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当然，本书若能补充一些试验统计数据，如空载电源、空载损耗、机械耗、绕组平均温升、实际堵转电流倍数、堵转转矩和最大转矩倍数、电机的发热和冷却系数、绕线转子绕组的电阻等，则对电机选用计算更为方便。

（原载《中小型电机》1988年第5期）

《实用中小型电机手册》陈碧秀等编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年12月出版，定价 29.95 元。

## 一种特殊的解答 评《科学技术史新论》

李晓晶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却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这一“李约瑟难题”吸引了许多科学技术史家投入其精力、时间与才华，提出了种种解答方案。在丰富多彩的科学技术史学领域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仍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史家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公论。

刘志一撰写的《科学技术史新论》重于“论”而疏于“史”，剖析了“李约瑟难题”，他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进行特殊的解答，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在这部专著里，作者首先论述了东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出东方人形成的思维是唯物辩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特征是：注重宏观观控、定性把握、应用效益、横向联系、群体共存、情感交融、经验积累、因果关系等。明析了西方人形成的思维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配观。其特征：注重微观分解、定量分析、理论思辨、纵向深入、个体独立、理智控制、实验测定、元素分解等。而形成这种差异迥然的思维方式根本所在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体质，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或变异造成的。

为什么西方有古希腊文明，中世纪却突然衰落停滞下来呢？经过十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期”，到文艺复兴突然兴旺起来了呢？作者在探索中提出：人类社会在远古时代就已产生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东西方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东方人走在前面，西方人在近代又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进。目前双方正处在“交汇”期间，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优势正在显露出来。21世纪的东方人将重新接过“接力棒”，把人类科学技术推上一个新高峰。再过若干世纪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优势又再一次从东方人手上接过“接力棒”前进。历史就是依着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永恒地发展着。

本书通过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所造成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活习惯、民族心理、行为方式等种种明显差异，及由这些差异所构成的东西方文化特色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深刻阐述了几千年来，东西方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交流，相互影响和促进，但由于人种的差异还没有消灭，民族还没有融合、同化，各自的思维方式还在以潜意识的模式，时刻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语言、行为，影响着我们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揭示出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及其制约性、规律性、潜在能量的巨大效益和局限性。认识到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民族心理史等各门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各自的优缺点，以消除近百年来形成的“西欧中心论”和“中国近代落后论”及西方人的狂妄自大和东方人的民族自卑等偏见。

对“李约瑟难题”这种特殊的解答，是引导大家都来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去、现在、未来，关心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自信、自爱和我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

（原载，1990年5月3日《黑龙江日报》）

《科学技术史新论》刘志一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定价4.00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科技探索道路上的经验总结  
介绍林声新作《中国科技道路新探》

焦明志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林声同志的新作《中国科技道路新探》作了序言，高度评价这是作者对科技工作又一个新的贡献。

林声同志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新作，是他二十多年来在组织领导科技工作中辛勤耕耘的智慧结晶，字里行间，留下了他在科技探索道路上的一个个清晰脚印。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与林声同志接触较多。林声同志虽已年近花甲，但他精力充沛，其勤奋精神无不令熟悉他的人自愧弗如。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探讨和总结工作经验，并把这些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和概括，形成自己的观点，以指导工作实践。他在二十多年组织领导科技工作中，尤其是从1984年以来在辽宁省科委主任、省长助理和副省长的领导工作岗位，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组织管理和领导科技工作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法。《中国科技道路新探》就是他在过去已发表的上百篇文章中，精选出的一部分，经重新改写、整理后成集的。

这部新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科技工作的管理和改革。全书分五大篇目：科技方针政策篇；科技体制改革篇；科技兴农篇；科技兴企篇；人才与科委自身建设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科技工作的各个领域。通览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

宋健同志在序言中指出，要重视对科技工作自身规律和组织领导经验的探讨和研究，他写道：“这项工作对于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本身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对科技工作自身规律和组织领导经验进行探讨与研究，就是对中国科技道路进行探索，这对当前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也是林声同志把此书献给读者的本意，其目的是在科技道路探索过程中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翻阅全书，感到很有新意，新就新在它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科技工作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个突出特点在全书五大篇目的数十篇文章中都得以充分体现。例如，对“星火计划”、“一二三工程”建设、选派科技副县长、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和创建科技先导型企业、厂办科研所、科技扭亏，以及科委自身建设等这些科技战线几年来开展的实际工作，他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总结，阐述了其重要意义和作用，并提出了继续做好这些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基本设想，使人们对这些工作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些工作能够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林声同志这本书有新意，还在于他对做好科技工作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新思考。这不仅反映了他勤于思考的作风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还反映出他对科技工作的理解和挚爱。他在书中提出的“要重视科技政策的研究”，“软科学研究是实现领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和保证”，“引进国外智力是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要战略措施”，“谈科技与金融结合的

重要意义”，“科技竞争与经济滑坡”，“要重视科技人员的继续工程教育”及“发挥综合职能作用，抓好全方位的科技宏观管理”等等，都是值得各级领导、科技管理干部认真思考的问题。林声同志看到了这些问题，想到了这些工作，这是他对探索中国科技道路的贡献。

林声同志的新作中还有“增强海洋意识，向海洋进军”，“专利工作要面向经济”，“实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等内容。这些科技工作的新任务，是摆在科技战线面前的新课题，也值得我们重视、思考和进行积极探索、开拓。

（原载 1991 年 2 月 14 日《科技时报》）

《中国科技道路新探》林声著，东北工学院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定价（平）5.00 元，（精）8.60 元。

## 《动物行为学》评介

赵季龙

涂长晟、季建明所著《动物行为学》一书，采用了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四个问题，即动物行为的原因、发生与发展、进化、适应功能作为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贯穿始终，在清晰的脉络中，广泛运用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增强了理论深度，对有兴趣了解动物行为的读者，也提供了较丰富的内容。

动物行为学是 19 世纪末、本世纪初，始建于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汲取大量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面有益的成果，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70 年代，动物行为学的方向开始转向社群行为学和人类行为学，并与社会学有的问题相渗透，为行为科学研究开辟了广泛领域。

《动物行为学》的出版在填补我国普通动物行为学研究空白的同时，对比国内已有的行为学著作，著述上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从遗传、进化、生态和生理等角度，深入探讨行为现象的原因和发生发展。选取资料及实验例证，主要取国内外七、八十年代最新研究水平。

其特点是：运用严格实验例证和系统阐述，使一些其它书籍中“尚无定论”的问题获得了较清晰的解答；为掌握行为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了解当今发展的前沿问题提供了翔实材料。例如，“遗传对本能行为的影响”问题，即本能行为是否由基因直接控制，是否符合遗传规律等问题。书中选取了一个蜜蜂清理蜂巢的行为为例证，出色地证明了少数基因的相互作用能影响和控制相当复杂的行为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该书的最后一章，直接提及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并且很自然地站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立场上，加以客观阐述。学术界关于类似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仍然是提高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即适应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人类才能达到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状态，“人们的行为受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的影响”，并且具有改造主观客观世界的的能力。如果把无论人类发展总体上的趋势和个体行为的动机目的，都归结为对周围自然环境的适应，即提高适应度，则未免过于偏颇。但是，前一种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人类放回到自然科学研究的系统中，从生物学高度，把人类看作生物进化历程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从动物行为学所探讨的课题中，可以找到很多对研究人类有益的启示，如：神经系统与激素系统的作用，本能行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动物的摄食、繁殖和社群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等等。人类科学从动物那里获得东西最多的莫过于心理学，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在实验动物身上获得的证据，来说明他们各自见解的正确性。但是在动物行为学本身还尚未成熟，没有形成自身系统的时候，心理学家们所能获得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一一对应式的、没有广泛基础的资料，显然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诸多心理学流派中，更多依赖于动物行为学基本原理的要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对比动物行为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发展的历史，问题



会更加明确。行为主义心理学从本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到 40 年代末的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已达鼎盛，而当时现代遗传学还未建立。1963 年，著名动物行为学家廷伯根在他的《动物的行为目的与方法》一文中，提出动物行为学必须回答的四个问题，才标志着现代动物行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熟。斯金纳的观点，当时只停留在用神经系统作用来解释行为的基础上，而不可能扩展到现代遗传学意义上的进化和本能的水平。

动物行为学本身的日臻成熟和蓬勃发展，给人类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参照系。不仅对某些相关专业有重要意义，也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原载《博览群书》1991 年第 6 期）

《动物行为学》涂长晟、季达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定价 4.00 元。

## 一部填补空白的战史专著 评《明清战争史略》

渤海鸥

《明清战争史略》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佳作。

明清战争直接关系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的兴亡，并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交织在一起，它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反映，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之一；研究它既可汲取各种有益的经验教训，又可能受到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以前对此并无一部专门的著述，《明清战争史略》填补了这项战史研究的空白。

这部书所写的战争上起 1618 年后金与明朝在抚顺首次交锋，下迄 1662 年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永历政权的覆灭。行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战争涉及的方方面面为纬，对这场持久大战，做了全面系统的纪实和深刻的剖析，不仅把明清之间萨尔浒、松锦两次大决战和辽沈、扬州、山海关以及南中国等多次规模大小不同的战斗，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又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农民军、吴三桂和清朝几种势力的厮杀；同时，还兼顾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及人心向背等社会条件，如实地反映了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诸多因素，读起来有如置身烽火连天的古战场，又自然而然地理解了这一切的社会根源，领悟了其间的历史启示。

作者在书中还贯穿了这样几个基本观点：一、明清战争的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明清两政权尖锐对立的结果，这一长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二、明清战争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双方争夺对全国的最高统治权，明清都是封建性质的多民族的国家政权，他们之间的争夺，绝不是民族战争，而是由谁来完成统一全国的问题；三、明清战争与明清两个朝代的兴亡同步进行，虽然战争必有破坏，但由于清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避免了国家长期四分五裂的状态，有利于国力的增强和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侵；四、明清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一次武装斗争，这场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策略多为其它战争所不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能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可取的借鉴。

本书按照明清之战的三个大的阶段——从清（后金）在辽东发动战略进攻开始，中间经过清在辽西一段的战略相持，然后转入清朝灭亡南明的战略总攻击——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五章，把一场历时半个世纪、内容复杂、变化多端的战争，写得不仅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而且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详略得当、要而不繁，令人启卷必求竞读。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6 年第 6 期）

《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李治亭、丘莲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7 月出版，定价 3.55 元。

## 勇于追求 奋斗不息 读《马叙伦》

### 府东堤

江渤同志所著《马叙伦》一书，读后使人深受教益。该书以精炼的语言展现了我国现代民主革命家、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马叙伦一生的主要业绩和思想品德。书中史料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作者灼见匠心，既对某些内容作了较集中的专题性撰述，又着力于马叙伦一生的20条综缕贯，突出了他为救国救民和发展教育科学事业，勇于追求，奋斗不息的主要特点。该书将会进一步激励知识分子和青年，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精神。

马叙伦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少年时，他目睹帝国主义的欺凌，清政府的腐败，萌发了爱国革命思想。青年时代，他努力探索真理，追求光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中，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参与领导挽蔡斗争和北京教育界的“索薪”运动。1921年6月3日，北京上万名教职员、学生向总统“索薪”请愿，他和李大钊走在队伍最前面，遭军警镇压，他虽头部受重伤，但素志不移，坚持斗争。“九·一八”后，他坚决主张抗日，积极在教职员、学生中进行爱国活动，遭到学校“不抵抗”派的压制和打击，他不顾个人安危，联合北平文化界爱国人士，继续坚持救亡复土斗争。抗战胜利后，他已年逾花甲，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大量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扩大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为阻止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他率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毒打，身负重伤，其革命意志仍毫无动摇。1947年，国民党当局发布了“勘乱”总动员令，特务每天都在监视他的行动，并进行威胁恫吓，他身处险境，毫不退缩，公开声明：“如果拿什么激烈的手段对付我”，“我是求仁得仁又何怨！”在给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信中，他明确表示：“捕杀不辞，驱胁无畏。”他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经过不断的追求和奋斗，他由反清反帝，追求救国道路，到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后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坚信“大业终期在耦耕”，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群众，才能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因而，中共中央给予他以很高的评价，指出：“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

在教育上马叙伦也是一个勇于追求，奋斗不息的楷模。书中作为一个重点，反映了马叙伦在4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不断探索民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重振教育而奋斗的精神和业绩。他曾在小、中、大学任过教，四次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还做过校长、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及代理教育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了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在长期教育实践中，他不断地总结经验，从而丰富了教育理论。在旧中国，他反对封建教育，积极赞助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支持和推广民主办学，教授治校。他还主张“激浊扬清，独立而不倚”，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原则选用人才；他针对旧中国军阀政府挪减苛扣教育经费的时弊，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实行教育

特税等主张。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他提出：“教育是政治的一环”，“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主张青年要向书本和社会两方面学习，以获得全面知识，改造旧中国。尤其对高等学校论述较多，他主张分为研究院和大学两级，大学实行多科联立；按地域合理布局；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充实师资和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学校长选任学术界负有资望者，三年轮流调任，以造成教育部门纯洁之风；以及提出对教师采用聘任制等。在新中国，马叙伦作为一位卓有成就并享有很高威望的老教育家，不断进取，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奠定社会主义教育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老教育家的一生，无论其教育主张，还是其办学的实践经验，都将是我们现在和今后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借鉴。

马叙伦一生中，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他的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全书30卷，240余万字。从民国初开始撰写，由于参加革命活动，多次间断，但他断而复续，锲而不舍。为精益求精，曾三易其稿，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直至1957年问世。此书结束了数百年来盛行的《说文》运动，被誉为《说文》发展史的“冠军”。马叙伦博学多才，贡献是多方面的，书中均有涉猎和发掘。

马叙伦在学术上成就巨大，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然而，他的成才非同一般，他没有受过学校的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艰苦的自学成才之路，十分令人感佩！

本书通过马叙伦这一典型，钩深致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许多历史特点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阻遏的趋势，以及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书中还从许多侧面，生动地表现了马叙伦的廉洁奉公、刚直不阿等高尚品格和风范。这些都给人以深刻启迪，堪为来者之师。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书林集评》）

《马叙伦》江渤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定价3.00元。

## 评《女皇武则天》

赵秉忠

《女皇武则天》从武则天的家世、童年，写到女皇之死。全书遵循唯物史观，把传主人置于广阔的大唐具体历史环境之中，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字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地写出武则天一生不寻常的经历、业绩及其性格特征。全书以叙述描写历史事实为主，不做长篇大论的评论，富有历史文学色彩，可读性极强。

作为人物传记，这部书突出武则天的刚毅性格。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出身于一个普通富有的“寒人”家庭的武则天，如何竟成了一位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女皇？该书细腻地叙写了武则天成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揭示了武则天的超人本领、胆识、气质和谋略。

武则天被唐太宗选入宫时只有14岁，在入宫之前，就受到其父良好的启蒙教育。入宫后，她内心的打算是：“要当自己命运的主人，要在这个陌生的天地里当一个强者。”她第二次回宫时在思索：“怎样才能在这个敌手如林的宫廷站稳脚跟？”她认真地体察着周围人的情绪，下决心要较量一番。一个普通的妃子，想实现夺取皇后的桂冠，绝非易事，她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著者对武则天的胆识、韬略、手段，作了深入细致地挖掘和描述。

武则天经过近30年的苦斗，在她61岁时，实现了神都摄政。此时此刻，在胜利面前她没有高枕忘忧。“在她看来，皇权就是要用铁的手腕来维护，即便是错杀无辜，也无所顾及！”她踏过李唐皇族的尸体，于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在神都洛阳的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当上了中国唯一的女皇。著者在总结了武则天所走过的崎岖道路后指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女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仅此一点，就是可使她无比自豪了。”

著者对武则天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既肯定其业绩，也揭露其弊端，给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武则天称皇后与高宗共同执掌朝政，承袭太宗遗风，把先帝开创的贞观盛世延续下去，发扬光大。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武则天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史称“建言十二事”。著者评论它是“切中时弊，堪称富国强民之策”，这十二事大都见诸实施。

武则天派人选文学之才，组成“北门学士”，令其修撰书籍，参与朝政，打破了宰相垄断朝政的局面。她还不拘一格地搜求人才。“不仅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也不避仇怨”。为选拔人才她发展了科举制，国内贤良之士多被任用，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了广泛参政的机会，如赫赫有名的宰相狄仁杰、张柬之、李峤、唐休璟等。

武则天也很懂经济，她把推行均田制作为“建国的根本大计”，要求各级官吏都要重视农业生产，省徭薄赋，不夺农时。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武周朝的耕地面积扩大了，实现了五谷丰登，人口繁衍，户口较高宗时增长一倍，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

武则天还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她奖掖诗歌创作，改革诗风；参与朝会，不可无诗。在武则天的提倡下，诗文创制有了很大发展，“佳篇丽句流播远近，知名诗人接踵而至，为通向开元时期的唐诗发展的顶峰开拓了道路”。

武则天又十分重视总结文化遗产和本朝文化成果，“她广召文词之士入宫修书，前后撰书千余卷”。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

武则天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成功地抵御了外侮。天授三年（692年）十月，威武军总管王孝杰率军击败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设立安西都护府，屯兵镇守。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又于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置北庭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分辖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女皇为了巩固边疆，加强了军事实力的建设，继续实行府兵制，提倡戍边军队实行屯田，等等，这些措施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著者介绍了武则天的诸多业绩，但没作垄断的评价，只是再次重复了如下事实：

“女皇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经济较为发展，文化得到发扬。同时，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正常的，国家是统一的，边疆形势基本稳定。它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国力未坠，人心稳定。特别是她，一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生活的女人，居然端坐于最高的位置上，雄视八方，号今天下，不管是战功赫赫的武将，还是满腹经纶的文臣，都俯首于她的裙裾之下，口呼万岁，洗耳听命，而拥有六百多万户的国家也以强大的身姿傲立于当时的世界上。”

武则天虽为明君，但不是完人。她偏私武姓家族，大封诸武，打击李唐子孙大贬李唐诸王，这实属为下策。此外，武则天利用酷吏，鼓吹告密，这虽说出于打击政敌的需要，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一些卑琐小人投机其间，大加利用，导致冤狱遍于国中。至于武则天重用男宠，任其所为，干预朝政，更是昏聩的表现了。

本书尚有欠完美之处，如对武则天矛盾性格的揭示和分析，还不够深入。读者对女皇既慈祥大度，又残忍狭隘；既知人善任，又利用酷吏；既英明进取，又允许男宠干政等这些心理状态和矛盾现象，尚不能用矛盾的统一性给予回答。其次关于太子弘之死，著者持毒死说，看来有进一步考证之必要。再有，本书第一版在校对印刷方面，出了一些差误，也显得美中不足。

（原载《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

《女皇武则天》吴枫、常万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定价4.20元。

## 一本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好书

简评《“九·一八”事变史》

高虹

“九·一八”事变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这段历史，人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合著的《“九·一八”事变史》一书，较完整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引起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关注。1985年5月，日本新时代出版社给辽宁人民出版社来信，请求出版日文版《“九·一八”事变史》。1986年8月10日该书日文版在日本发行后，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广泛好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周刊读书人》和《近邻》等报刊，或做报道，或发书评，都对此书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九·一八”事变史》“是中国方面编著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第一部通史”，“是一部实事求是的书”；评价此书“重视史料，以事实为根据，进行精湛的论证，然后得出正确的观点”；说“此书的出版（指日文版）将有助于消除日中两国对于日中战争史认识上的分歧”；它“对日本的研究工作者、众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是最好的文献”。

笔者认为，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观点正确，见解独到。为了说明“事变”的起因，作者对日本当时国内形势及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揭示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源在于它的既定国策和内在矛盾。又如该书除了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几次抗日战役一章以外，还专辟一章写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本章以大量事实证实了东北人民在极端困苦险恶的条件下，在残酷的战场上，长期英勇奋战，重创了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斗争胜利所作的贡献。这一研究成果谱写了中国抗日斗争史的新篇章。以前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历史往往被忽视。该书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因此，中国人民应该是14年抗战，而不仅仅是8年抗战，从而充分肯定了东北人民14年抗战的历史地位，并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提前了6年。这一章中还明确指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是三种而不是两种，对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战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新的见解已逐渐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再如，作者在对张学良的评价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该书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节中，以大量史实论证了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制订者，而张学良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并指出：“从‘九·一八’事变期间他的言行来看，他和蒋介石是有所不同的”，他是主张全国抗战的，并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局部抗战。因此，把他说成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材料丰富，考证清楚。该书选用了丰富全面、真实可信的中日两国的历史资料，充分利用了战后日本公布的新材料，其中有相当份量的第一手资料。翔实而丰富的材料为该书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柳条湖事件的真相”一节就是其精彩的部分。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吸收了同行的新说，纠正了“九·一八”事变铁路爆破地点的地名错误，明确指出是“柳条湖”而不是“柳条沟”。这一重要订正，现已被国内外史学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所承认。日本现在出版的学术著作、辞典、年表等，几

乎全部改为“柳条湖”。现行的15种日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也全部改称“柳条湖”。同时,本节对柳条湖事件爆发的时间、铁路爆破的部位以及关于柳条湖事件中国士兵尸体的伪证等问题,都拨乱反正,考释清楚,使读者了解了当年现场的真实情况。又如“东北四省区的沦陷”一节逐一论述了四省区是怎样沦陷的及沦陷的具体时间。以前人们往往是含糊其词地说日本几天或三个月占领了全东北。作者经认真考证分析后提出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的时间为4个月零18天。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评价客观,分析透彻。该书第八章、第九章写的是“九·一八”事变的国际反响和历史教训。这里第一次对国际联盟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评价,既指出了国际联盟的性质,国联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和软弱无力的行动,又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作出公允的评价。

该书的第四个特点是感情炽烈,引人深思。该书字里行间渗透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深深地感染着读者。这对于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和激发全体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所起的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该书的日文译者日本爱知县丰川市的早川正先生是一位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学者。他过去曾在伪“满洲国”工作过,战败后回到日本,对自己在中国时的言行感到追悔,因此投身促进和平、进步和日中友好的活动。他精通汉语,当他看到中文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一书后立即到处宣讲,并怀着对中国人民赎罪的心情,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这与日本一些无视历史、歪曲历史,通过不同方式为其过去的侵略战争粉饰甚至翻案的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日本新时代出版社来信称:“关于这段历史,在我国也有许多研究书类、记录、历史年表和个人回忆录。其中多数记述者们怀着深刻的反省,承认日中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可是未必没有反面立场。这一方面的书籍的存在也是事实。谈到这个问题,贵社的立场是公正的。发行《“九·一八”事变史》一书之事,对促进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人民会记取“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世代友好下去!

(原载《日本研究》1988年第1期)

《“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定价1.05元。



## 对中国封建结构的新探索 评《中国封建结构探要》

王海晨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探讨，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可是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断代史和专题史上，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全面宏观研究的著作，却很少见，代表性的只有胡如雷同志著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但它重点研究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未涉及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李桂海同志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采群芳，从斗争形态、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比较宏观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封建结构的问题，写出了这部《中国封建结构探要》。从中国封建结构的复杂和丰富的内涵上说，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显然很难概括和容纳中国封建结构的主要问题，但经过作者的选择和舍弃，还是力图从框架结构到内容上，尽量把主要问题都概括进去。所以它作为一部比较全面研究中国封建结构的著作，读后不但使人对中国封建结构有一个全面而又明晰的轮廓了解，而且由于书中对结构的研究多寓于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因而读起来也并不感到枯燥和乏味，而是感到层层深入，有欲罢不能之感。

这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斗争形态的多样与复杂；第二章，经济组织的封闭与隔绝；第三章，政治制度的呆滞与僵化；第四章，思想意识的凝集与对抗。从全书的这一整体结构看，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块划分的写法。但是作者在具体的分析研究中，强调了研究每一问题的特殊性，即使一些常见的老问题，也因选择了新的分析和研究角度，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因而得出了不少与传统看法不一样的新的见解。

对斗争形态的研究，过去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上，它当然是封建社会的主体斗争形态，但并不是唯一的斗争形态。有一些斗争，如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民族之间的斗争，它们都与主体斗争形态有关系，但并不完全是主体斗争形态的附属物，它们都有自己的斗争特点和规律，从某些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封建结构的发展。其它如封建制与奴隶制残余形态的斗争、封建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斗争，尽管与主体斗争形态的关系较为疏远，有其特殊的斗争特点和发展规律，但也对封建结构的发展产生过独特的影响。这几种封建主体斗争形态之外的斗争，过去历史学家很少给以独立的研究，并从封建结构的宏观上予以考察。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不但花一定的篇幅研究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体斗争形态，而且还分节专门研究和探讨了统治阶级内部、民族之间、封建制与奴隶制残余和封建制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斗争，并具体分析了它们对封建结构的不同影响。这无疑对认识封建结构中斗争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封建经济的研究，过去一般比较重视所有制的问题，所以封建社会土地的占有和兼并，一直是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所有制问题虽然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但是在封建经济结构中，土地的占有关系并不是一切经济问题的产生根源，不能把土地占有的分散或集中，作为解释一切封建经济活动和变化的钥匙。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封闭与隔绝，它并不完全是由土地的占有形式决定，而与土地的经营、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商人与商品经济的兴衰，关系可能更为密切。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商人力量

和商品经济所以没有得到稳定的发展，并成为突破经济封闭和隔绝的力量，与土地占有的关系并无直接的关联。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如果重点放在土地的占有关系上，很多重要的问题都难以说清。作者根据这种认识，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探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而是重点从土地的经营、小农经济的特点、商品经济的兴衰、封建“垄断”与商人经营的斗争以及封建“存储”等问题上，探讨了封建经济结构中的封闭与隔绝问题，这对于读者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与封建经济的繁荣、周期性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及重建、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艰难等问题，从多种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思考线索和见解。

政治制度的呆滞与僵化，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点。对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过去一直放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上。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比较早，而且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积两千年之久而不衰，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根深。它在封建社会虽然一再受到农民起义和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冲击，但却一再反复得到重建和加强。是什么原因使它经久而不衰呢？过去历史学界多从经济结构上寻找原因，如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土地的可以自由转让和买卖等。这些经济问题虽然都与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强化有关，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作者在书中运用某些系统与结构的分析方法，从封建政治结构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自身的振荡、调节、瓦解和重建的分析，探讨了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发展强化的原因，并对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中的官僚制度、宗法家长制及等级制等问题，从结构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分析，使读者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呆滞和僵化的特点，能有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是作者企图运用一些新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探讨某些历史问题的尝试，它是否成功，读者自可作出评断。

封建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与政治经济问题重叠的程度大，传统的研究重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及其表现。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当然是一个贯串始终的重大课题，但它并不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特有的凝集点，也不反映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个性问题，作者在书中从思想意识形态的凝集和对抗的角度出发，选择了爱国主义、集权思想、重农抑商思想、平均主义和皇权主义作为突破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了剖析。从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特点看，这些问题并未全面包括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像儒家思想、佛家和道家思想等，在书中都没有专门的论述，这无疑是一大缺陷。但书中选择的这些问题，过去研究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但这些问题不但对中国封建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还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对缩短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从历史中认识和解决现实的某些思想意识形态中的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仍保留了大量封建主义的东西，而现代中国的革命，又是在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封建主义思想仍有较大的残留。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包含有如何深刻认识和彻底清除这些封建主义的残留上。要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不了解过去的封建社会是困难的。李桂海同志著的这部《中国封建结构探要》，为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2期）

《中国封建结构探要》李桂海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  
定价3.90元。

## 新意迭出的《康有为大传》

徐彻 高虹

著名篆刻家吴昌硕曾给康有为刻过一枚朱文小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27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康有为的生涯。

《康有为大传》是细致全面描写康有为人生的又一部力作。可以说，这是一部新意迭出的专著，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观点新。在这部新著中，作者在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及执著的求实精神，就戊戌变法与康有为评价等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诸如康有为是一位消极的改良主义者，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康有为发动维新运动的理论主要是今文经学，还是进化论学说；保皇会是个反动组织，还是个群众性的爱国华侨组织；康有力发表《大同书》是为了反对民主共和，还是为资产阶级指示出路；康有为晚年是一位时代的落伍者，还是封建余孽，等等。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怀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把康有为放在世界的大背景里和历史的大潮流中，高屋建瓴地进行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侧面的综合考察，从而客观而公允地提出了康有为是一位伟大的旧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近代中国维新改革的思想家，对于保皇会亦即中国维新会，作者指出，它在海外团结华侨、热爱祖国、进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辐射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名词，如“据乱”、“升平”、“太平”等，把他们演化成为封建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作者认为，这是为了穿上古人的服装，演出有声有色的现代活剧。不能设想，用封建主义思想范畴内的今文经学，可以发动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催生婆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进化论；对于《大同书》，作者也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指出它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作品，而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卓越佳作，比《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具有更浓厚的世界意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客观时代课题和经济发展的深刻的内涵。上述这些新观点都是紧紧围绕着康有为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主旋律爱国与改革而逐步展开阐明的。康有为一生的政治实践有不少挫折和回流，学术研究也不乏主观和武断，但回响在康有为思想各个领域里的都是爱国主义的旋律。

资料新。作者追踪着国内外学术界对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研究的最新步伐，获取了最新信息，掌握了最新成果。如对故宫档案珍品《杰士上书汇录》的引用问题，作者指出，长期以来被视为信史的《戊戌奏稿》，近年来我国台湾学者黄彰健根据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有关资料进行审核，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均非真折，而是康有为在政变后的伪作或补作。虽然不能把《戊戌奏稿》一概称为伪作，但篡改之迹甚为明显，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就成了问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的学者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找出了康有为戊戌时期的奏折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陈凤鸣在《故宫博物院刊》上著文，对此详加评介，并与《戊戌奏稿》相比较，为研究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思想和百日维新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

资料。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孔祥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这篇文章是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资料，检讨异同而写就的。文章认为《戊戌奏稿》“在许多地方有原则性的改纂，不能反映维新派在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作者正确地运用了学术界的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认为《戊戌奏稿》中许多折子所反映的大都是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的政治主张，而《杰士上书汇录》才是记录康有为戊戌维新时期政治主张的可靠信史。此外，如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否有兵围颐和园、诛杀西太后之密谋的问题，近百年来一直是个谜案。作者在本书中运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的研究成果指出：“虽然事后康有为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多次矢口否认，反说这是袁世凯捏造的‘无根浮言’，至狠极毒的离间之计，‘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但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有其事，应该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烟云，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写法新。本书在写法上力求创新，努力写出康有为的特点和个性。作者不仅写出了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康有为，也写出了作为旅行家、书法家和诗人的康有为。本书不仅有对康有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动的深刻记叙，而且也对他色彩斑斓的家庭生活、个人爱好等作了生动抒写。本书用相当篇幅着意写了他的国外活动。而这些活动在过去出版的几种传记中往往语焉不详。如写道：“四过苏伊士运河，九至柏林，十一次过德国。尼罗河畔、阿尔卑斯山中、多瑙河流域、喜马拉雅山区、乃至寒冷的北冰洋中，都留下了康有为的足迹。”这些记载对从不同侧面了解具有浓厚世界意识和开放性格的康有为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作者有的论断也有可商榷的地方。如把“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一个范畴并称是否合适。“改良和革命”是一个范畴，“爱国与卖国”是一个范畴，把“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一个范畴加以论断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淆。

读完此书，掩卷沉思，感到康有为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结晶。他的思想和理论尽管有种种缺憾，但他的根深深扎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里。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3期）

《康有为大传》马洪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定价8.80元。

## 一部真实、质朴、生动的传记 评《张学良将军传略》

郭维城

在过去 50 余年的岁月里，对张学良将军历史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有不少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之中。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相继发表了关于张学良的有关史料和在台湾的生活概况。但是，作为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关于张学良的正式传记在国内一直没有出现。

非常庆幸，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合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以下简称《张传》）一书的问世，促进了对张学良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为加强海峡两岸人民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起到良好的作用。

《张传》在出版前，曾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并交我审阅。我做为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曾跟随他参加了“西安事变”，对他的思想和事迹有所了解。因此，我高兴地承担了审稿工作，并对书中部分章节做了修改和补充。《张传》作者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着力捕捉张学良将军真实的思想脉搏，考察其爱国思想和实践，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论。

张学良出生在东北，他年幼时，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他虽然出身于军阀家庭，但是，他的思想和性格，却与其父张作霖不同。从他生长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爱国主义观念。他的启蒙教师马宏久、杨景镇、宋文林、白永贞等人，向他灌输的就是这种传统思想；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又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倾心欧美的民主政治，在讲武堂学习，他又受郭松龄“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影响。因此，他对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素怀恶感。他曾说：“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

《张传》除了对主人公作了翔实生动的叙述之外，还对各方面与张学良及其重大事件有关系的人物做了恰如其分的评述。书中涉及到的各类重要人物有数百名之多，重大历史事件数十余件，从这个角度看，《张传》堪称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上一幅悲壮的画卷。

史料丰富、翔实，立论公正，文字质朴流畅，是《张传》具有的显著特点。作为以真实史料为基础的完整的张学良的正式传记，是对张学良研究的重大成果。书中引证和参考了国内外数百种报刊、图书、档案资料，有些资料是鲜为人知的，特别是引证了大量的第一手采访资料。这是《张传》独有的特点。如对张学良出生日期和 1928 年 6 月 18 日由滦州返回奉天为父治丧的日期等史实不仅作了调查研究，还核对了档案史料，订正了某些史料的失实之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张传》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该书其文真实，其事可信，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张传》的作者对史料的鉴别和整理下了很深的功夫，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书中关于张学良将军生平活动的一些重要事实的记述，所引证的史料都较为准确、翔实。作者对各种资料的鉴别和取舍也比较得当，既如实地叙述了张学良的生平事迹，又进行了公正的分析评论，使读者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上，去理解和认识张学良的功过是非，做到了史论结合。不难看出，作

者通过对张学良将军大半生曲折的旅程的叙述，融进了深厚的热爱和崇敬之情。但并不以感情论事，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评论历史上的是非，这点也是《张传》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处。

《张传》是张学良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它的出版必然引起海峡两岸广大读者的注目。本书是在张学良家乡沈阳出版的，而主人公至今还幽居在台湾岛上，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憾事。《张传》的出版表达了东北家乡父老对张学良将军的景慕和思念之情。

史有不能尽书者，古今中外皆然。当前写史或轶事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传人而借以寓己，传奇而借以哗众，有亏史德，诚可忧虞，本书未见此疵，实堪嘉许。

（原载 1988 年 5 月 18 日《光明日报》）

《张学良将军传略》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3 月出版，定价 8.50 元。

## 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乔还田

美籍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依我看，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

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由于他平生行事善独辟蹊径，多出常规，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并由此成为一位囚徒……所以，要真实再现其传奇生涯，确非一件易事。而事实上，多少年来，人们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张氏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国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说他是草莽之辈；还有人说他是一位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作者对张氏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乃至他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诚如王海晨在译后记中所言，通过本书，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深刻感觉到在为摆脱民族危机而斗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清楚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

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凡对张学良生平行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于1928年、1936年导演的东北易帜和西安兵谏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幕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两幕惊人之举系着张氏一生的荣辱与浮沉，使其成为一位超世绝伦的传奇人物。对于这两桩事，本书作者用大量篇幅作了客观的论述。以西安兵谏为例，书中分五章依次考察了这一事变得和平解决的过程。以往大陆学者的解释，多注重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而本书则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之所以释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首要条件是，张学良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与此同时，也不能漠视几位国民党要员所起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除何应钦、戴季陶力主军事讨伐外，冯玉祥、于右任等曾给张学良打电报表示：“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至于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更是不惜身家性命，亲赴西安说服张氏释蒋。总之，在作者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决非一种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看本书时，最感兴趣的内容恐怕莫过于有关描述张氏被囚之后的文字。人们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张学良作为一代雄杰是被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囚禁的，而且一关就是50多年。此间，特别是被遣送到台湾后，他是怎样生活的？他在想些什么？蒋氏父子对他怎样？如此等等，人们渴望解开这些谜。恰是在这方面，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作者为了深入了解张氏晚年的幽禁生活，她不仅亲自采访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及其他友人，还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学良本人直接会面（可惜未能如愿）。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畏风险、不怕吃苦的学者性格，使其得以在书中以凄楚的笔调，道出张氏幽禁岁月中的悲愤、凄苦、孤独，以及与赵一荻风雨同舟的坚贞，乃至晚年的思乡念友之情……

还应看到，由于作者走笔能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这一点，是国内多数史家所不及的。

当然，本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杨常事件”的论述似显太单薄。实际上，张学良在1929年1月10日以“阻挠统一”罪处决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作者对此应作更深层次的探究，写得再深入、具体些。

（原载198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美〕傅虹霖著、王海晨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定价12.00元。

## 多彩的历史画卷 珍贵的纪实佳传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译后

王海晨

吾辈经世之经验不可谓没有，然而涉世毕竟不深。每每遨游于书林之间，总希图从他人的历史中悟点什么，以补自身之缺憾，以拓人生之新途。有幸动笔翻译美国学者傅虹霖女士著述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英文打字稿，不觉感悟良深。

美国研究张学良的著名史学博士，张学良第一任夫人于凤至好友傅虹霖女士，三访台湾，两叩少帅家门，五抵香港，七赴大陆，费10年之功，花数万美元，行程数十万里，遍访天下活着的历史见证人，采撷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文档资料，著成此书。笔者生在辽宁，长在辽宁，在大学读书期间，又专攻史学，对发迹于辽宁的张学良有所了解，但真正认识到这位传奇人物是近百年风云史上最多彩多姿、绝伦逸群的民族英雄，却始于动笔翻译本书之时。翻译过程中，心灵常被书中内容所打动，常被书中文笔所折服。纵观全书，有以下几点最值得赞叹。

其一，史料翔实珍贵。傅虹霖女士曾亲自访问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同事和部下；亲自查阅过台湾历史档案馆、党史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德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大陆和海外公开出版的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专著及其他史料也几乎一览无遗。傅女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李宗仁回忆录》英文作者唐德刚教授之高足，治学十分严谨，对史料搜集与辨伪极为重视。书中引用史料许多为首次公开发表。如张学良与汪精卫个人恩怨与政治分歧，国内学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傅女士从西德国家档案馆里查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秘电，揭开了张汪不合之谜。张学良今日之如何？国内外炎黄子孙引颈而望。傅女士在本书中真实地记述了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囚禁50年之悲愤，与世隔绝半个世纪之凄苦，与赵一荻风雨同舟之坚贞，晚年思乡念友之情怀……一直写到1988年1月14日吊祭蒋经国。晚年之张学良，大陆学者难以知其详，述其细，更显其史料之珍贵。

其二，立论公允自然。在中国，有了张学良与没有张学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没有张学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但张学良是复杂时代造就出来的复杂人物，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蜚声遐迩，影响极其复杂。而且，这位本来复杂的人物后来又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与政治对立及其它原因，又被人人为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人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以讹传讹，说他是历代风流小生也只能望其项背的花花公子；有人以意逆志，以升量石，说他是只凭感情办事的草莽之辈；也有人说他是冠绝时辈的国之功臣，功垂竹帛的民族英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峡两岸持不同政见、受不同影响的人心目中有各自的张学良形象。本书作者，虽属炎黄子孙，但长时期身居异国，学问精深，爱国之情亦甚笃，肯干、勤干，亦有条件翻查各国、各党、各派所记载的各种观点的历史资料。她对各方记载进行比较鉴别，不人云亦云，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真者而用之，由博返

约，比较中求真实，真实基础之上立观点，并把张学良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记述与剖析，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再现动荡的社会风云、动荡之中张学良的复杂心理活动及其伟大壮举。正因为作者如此辨真伪、解疑窦、重史实，使我们能在本书中窥见张学良的真实足迹及中国历史的主动脉、多彩的历史画面。一幕幕写得语之有本，言之有据，无虚美之辞，无隐恶之笔，立论公允自然，述事重因果，立论讲史实。重因果，立论自然公允，讲史实，结论理当自然。其事核实，使闻之者诚信，其论公允，令读之者心服。

其三，文笔凄楚动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由于他的业绩绝世超伦而受到世人的瞩目。然而，他们功绩越惊天动地，人们也就越不甘心于只了解他们建功立勋的一面，人类固有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搜寻大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全部生活。本书主要写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作者在写政治生活的同时，特别注意挖掘影响一个人政治观念的其它方面，如张学良的多重性格，坚贞爱情给他的力量，感情对政治的作用，政治上的失意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等。因作者对史料极熟，用起来若掀髯抵掌，如数家珍，笔锋又常带感情，写政治不板面孔，述过程不平铺直叙，发议论不唐突生硬，叙心理活动不矫揉造作，形象生动、明快流畅的语言总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发出共鸣，读来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而且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情溢满纸。

（原载，1988年7月18日《人民政协报》）

## 立足未来 回首以往 读《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

戴鸿麒

大凡研究历史的论著，不外乎从三种论述立场出发撰写：一是立足过去，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二是立足现时，把历史看作为今天所借鉴；三是立足未来，为推动历史发展而去认识历史。三者各有自身的观察角度和价值坐标。如果说，第一种方法是“纯学术的”；第二种方法是“实用的”；那么第三种方法则冠之为“辩证的”，它把历史当作文明进化的自然运动过程看待，超越了前两种方法的局限性，在研究视角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比之高出一筹。《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一书，采用了第三种研究方法，从而使该书在众多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专著中，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是一本融知识性、现实性和指导性为一体的论著。

就知识性而言，该书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内容涵盖民族性格、家庭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宗教、艺术、哲学，以及近代社会变革、当代改革和未来展望诸方面，宛如引导读者步入一座收藏丰富的中国文化博物馆。

在考察中国社会的原型与演化时，该书抓住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政治原则为社会结构的目标导向这一主线，列举了姿态各异的文化表征，并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综合分析了以重生意识为主体的民族性格特征；以宗法亲本关系为依据的家庭结构形式；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模式；以专制集权为支柱的政治管理体制；以“意境”追求为象征的艺术精神；以服从现世生活为主旨的宗教观念；以倡导实用理性为根本的哲学思想，使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该书进而告知读者，社会结构的目标导向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体系的基本构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实质上体现了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

就现实性而论，《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一书没有停留于展示传统文化现象，以引发读者感慨。它更多地涉及为人们所敏感的改革问题，从而突出了此书的现实意义。该书开宗明义：回顾历史，了解国情，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当前的改革。作者指出，当今我国正在展开的社会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旨在实现现代化，其基本条件包括：1.生产要素（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2.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非对称扩大关系；3.个人及企业具有实体性地位；4.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制度化；5.社会结构围绕经济活动原则组建。此外还需要相应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以其排斥商品经济、排斥个人实体地位的社会结构形态，同工业化的本质要求相对立，顽强抵御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通过如此比较，使读者能更加明确当前我国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艰难性。

就指导性而言，作者把中国社会置于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大背景前加以认识，客观地展示了我国面临世界经济挑战的严峻局面，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案，社会生活格局的变化趋势，意识形态的改革方向，以及在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冲突、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背景下诱发的社会心理动荡。在此基础上，就中国改革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

世界局势变化对中国改革的促进作用作了科学预测。由于作者立足于未来的视点高度，鸟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昨天和今天，旁涉中外，贯通古今，因而使读者思路顿开，广受启迪。

该书不仅以其严谨的逻辑力量，更以其强烈的情绪力量震撼人心。读者不由自主地受到急迫的改革图强愿望和坚定的民族自信心之感染，这也许正是作者撰写此书的最终愿望。诚如作者所言：“……只要我们拂去遮蔽民族文化的历史尘土，光大其根本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裔，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又去能动地开创历史。振兴中华，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在担当如此重任之际，首先需要认识自己，然后才能超越自己。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2期）

《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陈建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定价 7.85 元。

## 《英国近代史纲》评介

宋 华

《英国近代史纲》（以下简称《史纲》）是一部系统地阐述英国近代历史的专著。它叙述了从 1640 年到 1914 年期间的英国历史状况。

《史纲》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近代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战争、殖民扩张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诸方面问题，作者以崭新的史料和精辟的论述，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并给人以深刻的理性认识。

《史纲》以英国的政治为中心叙述英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阐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近代议会制度的形成与完善、辉格党、托利党的形成以及这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是如何操纵英国的政治，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英国政治的变化和政策的转换。围绕政治发展的主线，《史纲》对英国每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其它列强国家的矛盾冲突都作了详尽的说明，多方位地探求英国政治变化的原因。《史纲》以英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把英国近代诸方面的问题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全书的内容浑然一体。

在阐述英国政治发展时，《史纲》介绍了历届内阁的更替，披露了辉格党（自由党）、托利党（保守党）为争夺内阁权力而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揭示了两党政治的资产阶级实质和议会制度的弊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作者并不是完全否定的，而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限制了专制，使“英国国王必须遵循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统治，不能独断独行”，同时又指出，“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政权落入议会中在下院占统治地位的多数党之手”。（《史纲》第 88 页）

对历届首相的生平与政绩，《史纲》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史纲》中还大量地列举了议会通过的种种法案，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法案，均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对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英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史纲》的作者对英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结论。例如，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前提条件问题。还在 1980 年由王先生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一书中，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时曾提出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的关系问题。当时只作了一般性的表述：“发明机器必须吸收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伟大科学家牛顿的机械学的创立为机器的发明解决了机械理论和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先行，随后是发明和采用新的机器，于是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世界近代史》王荣堂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9 页。）对这一问题，王先生作了进一步研究，《史纲》以充足的材料证明了从 17 世纪后半期，英国在科学研究上，已由理论科学向实用科学转变，“科学的中心开始从伦敦向工业发达地区转移”。（《史纲》第 153 页）“18 世纪中期，各种学会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人在新教学院受到教育，毕业后结合自己的工艺兴趣，建立了提倡本地区工艺和科学的学术组织”。“这些更注重实用的人们组织自己的科学团体，建立自己的学校，广泛吸收世界各地的先进技术，使英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更加普及，科学运动日益高涨，并为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近代工业化的新型的科技人才”。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史纲》中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的

成熟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重要前提之一。”（《史纲》第155页）这一结论深化了人们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提的认识，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史纲》记述了近代英国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事件，作者以史实为根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论。如对英法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分析。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何以击败法国？《史纲》对双方的情况以及战争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作者总结说：“在七年战争中，英国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固然威廉·皮特首相起过很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英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英国的经济形式比法国先进，才使英国获得胜利。”（《史纲》第146页）作者肯定了皮特个人的作用，同时又指出“经济形式”对战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史纲》不但史料丰富，而且在史料的运用和剪裁上，表现出作者高超的驾驭本领。仅举一例，在“宪章运动第二次请愿书”一节中，作者选出下面一个历史片断：“签好名的第二次请愿书被作成巨大的纸卷。这个纸卷如果展开，其长度约有九公里。5月2日，这个巨大的第二次请愿书用三十个人抬着，并在长约五公里的游行队伍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送到议会。”资产阶级是如何对待人民的请愿？作者引用了一位议员的发言：“我反对普选权……我认为文明是建筑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个明显要严重和系统地侵犯财产安全的阶级，这样太危险了。”（《史纲》第289页）这段史料的选用把第二次宪章运动的规模、工人阶级要求实现“请愿书”的决心、以及资产阶级的顽固态度和恐惧心理形象地留给了读者。在纷繁的史料中，作者剪取了一个个精彩的历史“镜头”，具体而又深刻地揭示出近代英国的历史面貌。

对《史纲》我们给予肯定的评价，但并不是说此书十全十美。就全书整体而言，对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的英国历史写得较为简单。另外，对英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写得还不够完善。作为一部完整的英国近代史似应填补这一部分内容。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作者正准备这样作。《史纲》后记中写道：“史纲的内容偏重于英国政治史，而文化史较少，以后有机会，我还想把文化史也充实进去。”

（原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英国近代史纲》王荣堂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定价4.50元。

## 清王朝“龙兴东土”的新探索 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那荣利

郭沫若曾说过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清人入关并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确是件奇事。”其实，清朝何以能够入关，并进而取得全国政权？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奇事。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这半个多世纪的清入关前史，只不过是明末历史的一章，可中外学者却对之有着极大的兴趣，努力开垦着这块颇有价值的土地，孜孜以求，从未中辍。近几年来，又有诸如《明清战争史略》、《清朝开国史研究》、《清朝兴起史》、《努尔哈赤传》、《努尔哈赤评传》、《清太宗全传》等大部头的清入关前史的专著问世，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锦上添花，硕果累累。尽管如此，面对充满生机的清开国史园地，史学家们仍有未足之感，因为这里仍蕴藏着无数令人神往的研究课题。就以清入关前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来说，在此之前，系统的论著根本没有，就是专题论文也只不过屈指可数的寥寥几篇。就这个意义上讲，《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张晋藩、郭成康合著）一书的问世，填补了清史学界的一项空白。

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地反映清入关前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史学专著；是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索，对这一课题作出的全面概括和总结；是从国家制度史的角度，为读者展现的一幅入关前清朝勃兴的历史风俗画。通览全书，觉其特点有三。

第一，资料丰富，使用得当。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求实精神，搜集、占有并利用了百余种资料，其中大量的是第一手资料。资料中，有难以查阅的官方档案，如《满文老档》、《盛京刑部原档》、《历朝八旗杂档》、《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等；有诸如《清实录》、《清朝通典》、《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专书；还有许许多多的时人笔记、折奏、文书等。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直接取用了一些满文材料，如满文体的《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大清会典则例》等，并利用了一些存于日本及台湾的原始资料，吸收消化了一些大陆、台湾、日本学者们的科研成果，使得全书内容翔实丰富。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者疑而必考，信而后述，材料的使用上繁简得当。如文馆出现的时间，作者就以神田信夫的《清初的文馆》一文为据，一笔带过。而作者为纠正辛丑年建四旗之误，则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大量史料，对比校讎，给读者一个正确答案。

第二，观点准确，论述精辟。作者以其扎实的学识功底，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据，以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对入关前的清朝制度，以简明的文字，深入浅出的笔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书中阐明了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八旗制度，乃是努尔哈赤奠定的基本原则；外藩蒙古的军政制度，则是由皇太极一手擘画；清代的内阁、军机处等，起源于清初的文馆、内三院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清王朝独创的秘密立储制，则和努尔哈赤设计的“八王共治”政体有极大的关系。作者在阐述清初的法律制度问题上，高度地总结出了努尔哈赤在法律思想上的五大特色，即：1. 严守法度，公平执法；2. 荐贤任能，信赏必罚；3. 严惩罪犯，区别用刑；4. 偕众公断，严格诉讼；5. 重教化，明



法度。努尔哈赤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皇太极，使皇太极 1.坚持“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2.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3.强调“国家之法，不遗贵戚”；4.率先垂范，以示法必信，令必行；5.统一立法权，划一执法；6.宽待归附“新人”；7.重视法令的宣讲和刑罚的实效；8.初步揭示了人民生计与吏制同犯罪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法之不行，自上坏之”。努尔哈赤总结了明末法制废弛，国力衰微的教训，注重强调制定法令法规，使国人有所遵循和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与国家活动，养成包括权贵在内的畏法、守法的风气。努尔哈赤身体力行，长子、女婿等犯法，皆治罪不误。皇太极更是严于律己，注意以国法为重。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精辟地阐明了清初皇帝的法律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法律思想的全部内容及其法令法规得以贯彻执行的关键所在。

作者指出，清一代的皇帝，在不断变更祖制的同时，还有着根深蒂固的“法祖”观念。原因之一在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能够审时度势，依时势之需，来建立适合国情的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各种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初皇帝确实值得后来皇帝效法。

第三，涉猎面广，层次清晰。全书以国家的建立、中央官制、八旗制度、蒙古地区的军政制度、立法、行政管理法规、民事与经济法规、刑法、诉讼制度为章，将 1583—1644 年间的与清朝国家制度、法律制度有关的全部内容，进行了全面透彻，层次清晰的剖析和总结。作者在把握了清初制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对清初所有制度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全方位地进行了分析考察。大的问题如八旗的创立、八旗的组织机构，八旗的作用等；小的问题如口角罪的概念，口角罪隶属犯罪的范畴，口角罪治罪的方式等。其他诸如满洲勃兴的原动力是否来源于建州女真原始还原性？它与女真文化，乃至蒙古、契丹文化究竟存在哪些继承关系？汉族文化对这个民族的复兴起到了什么作用？类似的与清初制度有关的内容，人们都可以从该书中得到启示或解答。

作者还精心编制了许多简表，使读者对许多问题，一目了然。

总之，这部资料丰富，观点准确，涉猎面广，有考、有叙、有议的史学专著，确实给人以很好的启迪。尽管入关前的清朝制度很不完善，但作为统治者却能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出一系列具体而又实际的措施，使得清朝在明清对峙中，充满着勃勃生机。一个国家或政权必须有一套适合时代与国情的法律规范，使所有人皆有法可依，按法规办事，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由此观之，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其问世所产生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读完该书，人们会自然地从中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色的清初制度中看到，一个初时“兵不满百，甲仅十三”的集团，到入关前之所以发展成拥有铁骑十余万，版图有东北、北部（蒙古）的强大国家的真正原因，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清人入关”绝非偶然，它是一件合乎情理的“奇事”。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张晋藩、郭成康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定价（平）6.60 元，（精）9.35 元。

## 满族研究园地的一朵新葩 ——简评《满族家谱选编》（一）

张 涛

谱书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潘光旦先生在《中国家谱学略史》中指出：“谱系之学，由来已久，古者帝王诸侯之世系掌于专官。”民间私修家谱之风亦很盛行，一直沿续到解放前。解放后谱书受到了冷遇，民间珍藏的家谱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更没有家谱汇编的专辑出版，使大量珍贵史料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因此，由李林同志主编的《满族家谱选编》（一）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是国内编出的第一部从民间搜集的满族家谱专辑。家谱即一个家族的历史，亦称宗谱。国史难以巨细无遗，家史则能细致入微，可以补充国史的不足，两者并用，相得益彰。《满族家谱选编》（一）的出版，为研究满族姓氏、迁移、人口、土地、风俗、伦理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在编写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本书所选满族家谱均完整地记述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如《白氏源流族谱》共有一函三册，谱书为石印，书表微黄，由夹书板保护，保存较好。其主要内容有谱序、世系、重要成员的传记及家族的大事记等，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白氏的源流、迁徙、修谱原因、族人的支派、人物的事迹等；同时也记载了白氏的祭祖、祭天地的规矩、钱粮的支用章程、土地房屋的典买、祖茔沿革等情况，内容翔实，可谓白氏家族的一部发展史。

二、本书所选满族家谱均是满族中的大族及重要家族，具有代表性。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在始祖索尔火以下二十世谱系中，记载了本族男丁 563 人，其中在清代供职者达 173 人，有后金五大臣之一的安费杨古，有清初大学士达海以及顺治年间任盛京将军的业克书，其他的还有尚书、员外郎、笔帖式及关防官等，再如满洲八大姓氏之一的《盛京开原关氏宗谱》，记载了费英东四世孙硕木科的世系及其事迹。硕木科先随祖、父从龙入关，定居北京，曾任户部尚书。康熙四年（1665 年）到开原驻防，任开原城守尉，其子孙分别任防御、骁骑校等官。足见这两个家族在清代的社会地位是十分显赫的，对研究清代八旗王公贵族的兴衰史，很有参考价值。

三、本书所选满族家谱在某些方面补充、订正了正史资料的不足与讹误。如《永陵喜塔腊氏谱书》中记载：喜他拉（喜塔腊）氏始祖昂果都理巴颜是明代中期人，而且世系清楚，到努尔哈赤时期正是第六世。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却载昂果都理巴颜，世居尼雅满山地方，国初来归。“国初”清朝官书中是指努尔哈赤时代。谱书纠正了官修史书错误，弥补了史书不录之处。

四、对满族民俗，本书选入的谱书均做了详细记载。如《富察氏谱本》记载了满族的祭祀过程，并且说明了祭祀的来龙去脉，史料价值很高。《谱本》记载：满族祭祀有内祭、外祭。内祭祭祖，外祭祭天，即祭梭龙（索罗）杆子。祭祖时供祖宗板子，祭天时备小米、高粱，祭祀后撒在入门东边，让乌鸦吃，以谢先祖出征遇难救驾之恩。《谱本》中有关祭祀的记载是研究满族风俗难得的珍贵资料。

五、本书所选满族家谱的立谱时间都很早。如时间延续最长的《章佳氏

族谱》，从其始祖到十九世，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到现在约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是谱书中时间跨度较长的一部，比较罕见。

六、本书所选满族家谱，有些还揭示了满族皇亲、国戚之间的复杂且鲜为人知的关系。如《福陵觉尔察氏》就记载了其先祖曾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毗邻而居，原系红带子，后因触犯努尔哈赤被抽了红带子，降为陈满洲。据清朝会典记载，1635年，“定显祖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宗室束金黄带，觉罗束红带”。《永陵喜塔腊氏谱书》记载：五世祖阿古都督是显祖宣后之父，即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以及阿古都督的前后各代和他们在清朝身居要职的史实。这就补充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史料中只记载：阿姑（古）都督长女奚塔喇名厄墨气是努尔哈赤父塔石夫人的记载（卷1）。作为外戚的还有《章佳氏族谱》中的章佳氏，《族谱》中载：三世祖罗塔女儿哲因格格，次女詹泰格格“聘与太祖皇帝正宫皇后”。《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清太祖庶妃五人，分别为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其中兆佳氏拟为章佳氏。章佳氏做为皇帝外戚，在清朝授官封爵者甚多，成为满族中较大的一族。

七、本书所选满族家谱是国家、省、市级图书馆所没有收藏的，全部来自民间，是历史资料的珍本。解放以来，由于我们对家谱的价值认识不足，加上“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家谱这一珍贵的民间资料遭到严重损失，能完整保留下来的已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还是在偏僻的地区由满族农民冒着风险收藏的。本书编者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从1985年起在农村开始了满族家谱的搜集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整理出300余部家谱，并精选出19部编成此书，从而更显现出了本书的价值。

减如我国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所说：“家谱之重要性，在于明其历史上时间之演进与空间之播迁，汉族如此，满族尤然。合之数县数省，则满族开始壮大及其发展之全部过程，得以据实直录，传为信史。……以卒其业，史界乐观其成。”《满族家谱选编》（一）的出版，其意义在于：首先，为研究满族史和清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为其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近些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搜集、保管及研究家谱的重要性，其史料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它是研究微观历史与考证史实的宝贵史料，是编史修志的可靠素材，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参考材料。其次，《满族家谱选编》（一）对在比较研究满族史、清史方面也有重要作用。比较研究是历史领域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如《那氏族谱》中在祭祀礼仪中，对领牲、祭祖、祭梭龙（索罗）杆子、换锁线等做了详尽记载，并绘出了所用物件图示，这就对了解和比较研究满族各姓氏的风俗差异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再次，满族家谱的挖掘也有其具体的应用价值，它为民族工作者，为满族研究，为恢复满族本来面目，为加强民族团结而服务。同时它又是国内各满族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华裔人士寻根问祖的一把钥匙及重要依据，并有助于开展国际交流。第四，因为满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满族家谱的挖掘，有助于繁荣民族文化和对满族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

《满族家谱选编》（一）李林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定价 3.30 元。

## 评《恭亲王奕訢大传》

高虹

恭亲王奕訢是晚清政治中的风云人物，是洋务派在中央的总代表，又是长期与慈禧太后合作的满族政治家，同时也是诗人、收藏家和书法家。他在咸丰、同治和光绪三朝，先后协助咸丰皇帝和慈禧太后执政30年。但由于当时的体制决定，他的执政完全隐没在皇帝或太后的背影之中，这就为对他的研究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致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传记迄今尚未出版。董守义撰著的《恭亲王奕訢大传》，多层次全方位地叙述并评论了奕訢的一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结构严谨，纲目清新，行文流畅。在作者笔下，奕訢的功绩和罪过，优点和缺点，骄傲与屈辱，作风与志趣，政事与私事，爱国与卖国……一齐展现，有着缤纷的色彩，客观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

视点高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该书把奕訢放在世界大趋势面前来考察，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常常有别于一般中国近代史的现行结论。例如，已往的史学著作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日益买办化，实行媚外妥协外交路线；而该书认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奕訢等人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对工业浪潮的巨大威力开始有所认识，因此，一方面努力调整中外关系，一方面竭力剿灭人民起义，并努力学习西方长技以积蓄国力，从而倡导了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以这样的视点看问题，作者认为，咸丰十年奕訢等人提出的统筹全局并酌拟章程六条是中国第一份比较系统的近代化治国纲领。

由于视点高，于是在一般人眼里视为无足轻重的事情亦被发掘出了重大意义。例如，奕訢指示崇厚在天津聘请英国教官训练官兵，这是第一份推行近代化的练兵计划；创办同文馆并开展大辩论是在开创近代教育并为全面改革扫除思想障碍；购买并遣散“阿思本舰队”事件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建立海军的努力（其遣散是因为不甘心让英国人控制海军大权）；同治末年主持的关于造船问题的辩论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次关于工业化道路的大辩论，等等。

此外，作者发现奕訢的思想认识经常比同时代的其他有识者早半拍。例如，咸丰帝在世时，他就有意于实行“借师助剿”，但因曾国藩、袁甲等反对而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在他任议政王时才得以推行；又如，同治五、六年预备修约时，他已经在考虑接受西方国家关于修铁路、架电线的要求，闪现出迎接世界工业浪潮的可贵火花，但又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员对洋人尚怀疑忌而确定抵制方针，使之宝贵的火花一闪即逝了。

观点新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作者认真地扒梳史料，因而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例如，一般人认为“自强”思想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提出的。该书说，在曾李之前，郭嵩焘先提出“自强”，但没有留下文字材料。而奕訢关于“自强”的倡议不但写成了奏议，而且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方针，曾、李、左等人不过是“自强”思想的接受者并进而光大之而已。但是，作者又指出，字面上“自强”的提出尽可有先后之差，但在清王朝内忧外患迭加的形势下，这种思想早就呼之欲出了，这是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意识，可见作者并不为标榜而持偏论，立论仍是客观的。此外，对于奕訢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交涉、中日台事交涉等问题，没有像一般史学著作那样过多地指责，而是分析他的思想认识，他的政治处境和后顾之忧，从而说明他的决策比起

顽固派的大言高论是更为稳健的。

挖掘深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例如，人们都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给予极高评价，但左宗棠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人们尚未深究。该书则指出两点，第一，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是奕訢在中央进行调和，并坚决支持左宗棠而收底定之功的；第二，在左军粮饷匮乏的情况下，是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频催蒙古、青海等处协济粮饷，并且不顾沈葆楨的反对而批准左宗棠借用外债采办军火的。又如，人们称颂曾纪泽改订伊犁条约，取得了近代外交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说这是由于曾纪泽唇焦舌敝斗争的结果；而该书则指出，在国内，奕訢等军机大臣一面调兵对俄示威，一面也苦心疏导清议派官兵的激昂主战情绪，为曾纪泽的赴俄谈判创造对话气氛，这两方面都是曾纪泽所需要的，过去，人们对后者显然是忽略了。再如，该书指出，奕訢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成为保守派代表了，他阻挠变法维新，但主要是阻挠政治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至于军制和科举制度的改革，他不但不反对，而且还曾有积极的规划，从而也使读者对奕訢的认识比以往有所加深。

跟踪快是该书的第四个特点。作者能积极跟踪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扬弃以往史学的无根之谈。例如，关于胜保参与辛酉政变一事，过去有说胜保带兵北上实行“兵谏”，对肃顺施加压力；近来又有人著文说胜保并未带兵北上。本书作者采纳后说，而且进一步指出胜保在八大臣面前表现“驯顺”，起到了麻痹政敌的作用。又如关于慈禧谋杀胜保原因，作者也是吸收了史学界新成果的。

取舍严是该书的第五个特点。作者取舍史料，跟踪史学最新成果的态度是严肃的，有分析比较。例如，近年关于辛酉政变的论文中，有人说，当热河的八大臣与两宫太后处于相对峙局势时，七王奕訢倾燥地叫嚷，而被“老五爷”奕訢“喝止之”。本书作者断定此“老五爷”应是绵愉，无论从辈份讲，还是从对政变的态度讲都不可能是奕訢。又如，关于密谋政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热河密札》的使用，历来注家颇多，有章士钊说，邵循正说等，其说不一。作者较多地采用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俞炳坤先生的疏证，而对于无法断定其可靠性的问题仍暂时存疑。又如其他若干宫廷事件，时人笔记歧异很多，作者必指出其不实之处以驳正之，而采用更接近事件的记述。这种在比较分析基础上的取舍史料，比起抡起板斧武断地弃取要慎重得多，科学得多，反映了作者严肃治史的精神。

写法活是该书的第六个特点。该书结构富于变化，纲目并不强求一致，有的严肃方正，有的错落有致，有的含蓄凝炼，有的直抒主题，形式完全从内容出发，充分表现内容。读者仅从纲目上就可以找到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章节，了解到奕訢的某一个侧面。该书避免了以往史传严肃枯燥和传记作家任意渲染的弊病，借鉴了外国传记和中国文学传记的写法，因此该书既保有史家厚重确凿的风格，又吸收了文学家曲折迭宕、隽永生动的笔意，令人读来感觉余味无穷。同时，该书又富有哲理性。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也可以作为半部中国史读。作者以多方位的视角阐述了对于中国近代史、晚清宫廷史以及奕訢个人生平的独到见解。对于人们立足现实，反思历史，展望未来给予极大的启示。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恭亲王奕訢大传》董守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2 月出版，定价 9.00 元。

## 读《张之洞大传》

来新夏

清朝后期能够翻云覆雨的政治集团是湘淮两系，而举足轻重的人物则并称曾李；但另一位与晚清政局相始终的重要人物张之洞相形之下却显得落寞。马东玉同志所撰《张之洞大传》（以下简称《大传》）正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作者在《后记》中自称“我的本意是想对这一重要的历史人物给以客观公允的评价”。因此，他殚精竭虑，广搜博征，破除陈说，独抒己见，力求对传主作出评价，如称张之洞“干大事、干实事”，“锐意改制”，“认真布防，极力备战”，“中国近代史上举办近代企业坚持最久的一个企业家”；推崇张之洞是“爱国官员”，“近代著名教育家”，“堪称中国近代企业家和教育家”等等。这不仅使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得到新的评价，也反映出作者不依违于已有结论，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钻研精神。

《大传》征引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据其所附《参考书目文献举要》统计，用书达148种，包括资料82种，专著66种。所可贵者，这些资料大都为习见而非偏冷，体现了作者运用史料的基本功力。因为读已见书较之读未见书为更难。

这本《大传》的另一特色是可读性强。作者以其清新流畅的笔触把张之洞这一人物写得真切饱满，栩栩如生。作者不是孤立地刻划传主本身，而是详尽细致地描述传主的事业背景，使传主自然地显现其作用，引发出应有的历史评价，如在举办洋务一章中，作者用了百页篇幅将所办军事、纺织、重型、铁路、机器铸币与金融业等五大业所属部门都一一加以细腻的考察与评述，这不仅廓清了对张之洞办洋务的异议，也把近代史上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历史展示给读者，从而在此事实基础上分析了传主举办企业的思想和目的，给人一种自然、深刻和可信的感觉。另外作者还善于编织情节，如争废崇厚的《里瓦吉亚条约》一事中，传主在争议的10个月过程中曾单独上疏20篇，如依序胪列奏疏内容则将枯燥乏味，但作者将20余篇奏疏编织进废约、谈判的复杂斗争中，寓论断于叙事，显得明快得体。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矛盾存在于统一体中，优点往往包含着弱点，《大传》的特色中似乎还有一些可商榷处。

传记作者主观上都想写得公允，但常常由于笔端流露感情，使钟爱走向偏爱，于是肯定其应肯定者，而讳避其不足。广东的“闹姓”赌捐本是影响科考，祸及社会而屡禁难正的弊政，张之洞为筹措经费，公然开禁，势必遭人讪笑；但作者却曲谅其事是“取之于赌，用之于公，又涓滴不入私囊，做到问心无愧也就可以私自安慰了”。为传主作了一定的辩解。

征引习见资料，固然可见功力，但如对有些习见史料能追溯原始而加以征引则更能增其学术价值。如自丁名捕《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转引的《新疆图志》则是一本并非难得的书。又如《翁文恭公日记》便无须转引自《张文襄公年谱》，而《清代七百名名人传》似也可改用其它价值更高的史料。

作者为烘托传主而多着墨于背景的描述，以致时有枝蔓，如“继统之争”一目记吴可读“尸谏”案，当时张之洞只作为清流派一员而写过一份《遵旨妥议折》，只是其宦海一生中的一个泡沫；但作者却用了七页篇幅详述“尸



諫”始末，不免使人有渲染敷陈之憾；书中写中法战争对刘铭传、刘永福的本身历史都叙述较繁。

研究历史以评论人物为难，评论人物以评论近代人物为难，尤以评论人们熟知而又有异议者为更难。作者知难而进，尽多年积累之功，成三十余万字之作。总观全书，立意创新，史料丰富，记述完备，评论有据，至于不足，当为一得之愚，小疵固难掩大醇。

（原载 1990 年 2 月 21 日《光明日报》）

《张之洞大传》马东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2 月出版，定价（平）5.05 元，（精）8.25 元。

##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初探

傅朗云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是中国东北地方古文献中的典籍文献。

《通谱》八十卷，弘昼、鄂尔泰、福敏、徐元梦等奉乾隆皇帝弘历之敕纂的一种谱牒。其发端可追溯到清初，雍正十三年（1735）即已着手，弘历继康熙玄烨积极提倡文治，宏扬传统文化，几乎同时督促以鄂尔泰为首的写作班子编纂《八旗通志初集》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两部大书。根据近几年来东北史学术界的意见，这两部书都属于东北古籍。《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始于雍正五年（1727），至乾隆四年（1739）成书，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1744）才竣工。

《通谱》所辑录的是除了清朝皇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所有满洲姓氏，记其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官阶、勋业等情况，全书共录姓氏 1114 个。每姓氏中以勋业最著者居首，逐个立传，计收 2240 人。事迹不显著者仅有简记，附载其后，称为“附载”，计收 4938 人。两项共收 7178 人。立传或附载者，其有业绩的子孙亦附记于后，加上所记子孙，收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约两万有余。由此可知，该书的资料价值很高，是各类图书馆和教学科研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此书自修成以来，只有乾隆朝武英殿刻印过一次。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部在武英殿刻本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辽沈书社于 1989 年年末影印，字迹清晰，墨色浓郁。书后增附新编的姓氏人名索引，检索方便。

笔者从东北民族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古文献学两个专业的角度，探索我国古代罕见的少数民族典籍文献《通谱》。抛砖引玉，试图为深入研究祖国传统文化做一点微薄的奉献。

### （一）

清代的八旗制度是辽、金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开创的军政合一、兵民一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具体地说是在金代女真民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基础上重新建制、不断扩大、不断完善的一种制度。早在明代后期，建州女真的首领就已根据当时军事需要，建立了牛录制，用汉语说就是父子兵。明万历二十九年（1901），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每旗（满语称“固山”）下辖五参领（满语称“甲喇”），每参领辖五佐领（满语称“牛录”）。当时所有满州民族成员都分隶于各佐领，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太宗皇太极，又将降附的蒙古人和汉人分别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早期的八旗制度兼有军事、行政、生产等三个方面的职能，后来才削弱其生产机构的职能。作为一种军事机构，八旗军队和绿营兵是清朝两大军事系统。作为一种行政机构，八旗的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所有八旗成员统称为“旗人”，与州县所属的“民人”均以不同形式受清王朝的统治和役使。清朝政府在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编置的佐领和在蒙古各部编旗设佐的措施，也都是八旗制度的推广。《通谱》是满

洲各族的共同谱牒。

民族学家和民族史学家都忽视对“民族联盟”的研究。在中国东北地方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以人多势大的民族为领导民族的民族联合体同中原王朝建立关系的传统，肃慎、邑娄、勿吉、靺鞨、室韦等民族联合体都曾是代表一方的民族实体和政权实体。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变换民族联盟从称谓到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往往是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满洲”是东北地区传统的民族联盟的专用名词，最早见于《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后金天聪九年（1635）东北反明势力发展到足以控制关东局势的时候，清太宗皇太极郑重宣布：“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于‘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由此得知，“满洲”这个族名在以往的历史上存在过，但由于时代遥远，所以曾一度湮没无闻。只因为当时未曾考述清楚，至使后来众说纷纭。大致有讹“建州”为“满洲”说，“满洲”缘“曼珠”说，或缘“满住”“建州”合词说、“蛮主”音转说、“满节”（或“满饰”）音变说。傅斯年于《东北史纲》云：“‘建州’之称既远在先代，‘满洲’之称尚不闻于努尔哈赤时。两字若为一词，只能（是）‘满洲’为‘建州’之讹音，决不能（是）‘建州’为‘满洲’之误字。”（第5—6页）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满字取满住第一字，洲字取建州第二字，州边加水，成洲字。”（1952年版第875页）此两说颇具代表性。

关于“满洲”的考释，最早见于《满洲源流考》一书：天男娶三姓女“居长白山东鄂多里城，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珠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名）而非地名，章章可考也。”皇太极时尚且“无知之者”，弘历时却“章章可考”，其实是章章可疑。第一是建号“满洲”究竟是族名，还是国名，或是地名？“满洲”、“满珠”、“曼殊”三个词的出现孰先孰后？“曼殊”是藏语还是梵语？“满珠”是满语词还是汉语词？音同或音转是用的哪个民族的语音？没有一条考证清楚。

皇太极所谓“统绪绵远”究竟远到什么时代？考《清太祖满洲实录》卷三云：“太祖命额亦都领兵一千往窝集部内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将其路长康古礼……等尽招服之，令其举家，先赴满洲。”所述“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和“满洲”都是地名。又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首称天女降生布库里，至三姓娶妻建国，“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起码是在努尔哈赤时期有知“满洲”一词来由之人。皇太极却说“无知之人”，其意是指“满洲”之为族称“无知之人”。如“满洲”和“辉发”同古，明末东北满汉先世但知“辉发”部来自黑龙江畔，其实古辉发国早在辽金时期就称“回跋”或“回霸”国，曾被契丹人视为女真民族的一个特殊支族，该支族的一支后来又进入野人女真境内，定居黑龙江畔。拙著《东北民族史略》曾探索“回跋，也作回霸、回怕、回怕里，

实为 发一名的演变。……发族同 族结合的 发族，音转为回跋，隋唐以前就有这个族名”。（第 138 页）明清之际的“满辉”族，分布在黑龙江下游，也是野人女真的一支。“满琿”族，当是远古时期长白山的“满节”或“满饰”族同发族结合成的一个民族，形成于何时何地，有待详考。但知“发族曾与别族结合而有满番、真番、莫番诸族”（《东北民族史略》第 138 页）。秦汉时期的东北地区有“满丽”、“满番”等族称，这就启发我们朝更为悠久的东北民族的历史进行探索。

满族、朝鲜族、鲜卑族、契丹族的族源神话都曾直接或间接追述到尧舜民族联盟的历史时代，其中满族族源神话实为“玄鸟生商”神话的演绎。炎、夷、依（即殷）为同音词，夷人后称东夷、九夷和东北夷，其中“九夷”的民族实体又有新老之分。老九夷各族见载于范曄《后汉书》，以尊尚和图腾分黄、白、玄、赤、蓝、阳、于、方、吠等夷族，黄夷后裔有黄头室韦和黄头女真，玄夷有玄菟，赤夷有乌桓，于厥里族的先世，也包括于夷。吠夷即犬夷，以狗为图腾。宋代学者邢 的《论语疏》则为“玄菟、乐浪、高丽、满饰、皂舆、索家、东屠、倭人、天鄙”。后人谓“高丽”为“高夷”，“满饰”为“满节”，“皂舆”为“扶余”，“索家”为“索离”，“东屠”为“东胡”，“天鄙”为“鲜卑”。《后汉书·东夷列传》序以“吠夷”居首，有“风夷”而无“蓝夷”。一般学者以《论语疏》中“九夷”为“新九夷”，依秦汉时期的分布，新九夷从大兴安岭经吉长地区至鸭绿江畔，汉代称“辽东属国”，即秦汉时期东北郡县界外民族地区。故“满洲”源于“满饰”或“满节”。古汉字“满”亦写作“𤝵”，是一种山犬。“满饰”族即“吠夷”，信仰狗图腾。满族神话和风俗，都有视狗为神的传统。又证以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主体民族“于夷特”，约当六千年前到达美洲，以一种山犬为族神。当今民族学界和民族史学界所考证的图腾制度和图腾文化，在近年出土的辽西牛河梁女神庙文化和辽东后洼图腾文化中极为丰富的资料可供研究，距今五、六千年，是满族先世吠夷、于夷等原始民族的文化遗迹。北魏拓跋鲜卑族的民间传说可追溯其祖先的历史长达一百代，二、三千年之外，是因为那个时代北方民族的“瞽史”们尚保持远古讲史的传统，不像满族“神谕”严重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皇太极所说的国号，族称皆为“满洲”的沿革，才能够得上“统绪绪远，相传奕世”。

## （二）

“满洲”是明末清初东北地区的民族联盟的称谓。今天的满族先世，正支是明代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野人（东海）女真构成女真民族整体，以女真为族名的许多下属小民族的后裔既有我国东北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苏联北方小民族的一部分。

建州女真是由元代女真族中的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长期融合而成的。最早居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一带，明初南迁，两部首领先后受明朝皇封的建州卫指挥使和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明正统七年（1442）才辗转迁徙，定居辽东，分封建州右卫指挥使，遂有“建州三卫”之称。后又划分为浑河、栋鄂、苏克苏护河、哲陈、完颜、鸭绿江、朱舍里、讷殷等部。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有个姓爱新觉罗、名努尔哈赤的民族英雄，以十三副遗甲

起兵，在短短的十三年内，将建州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进而对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各地逐个征服或号召归服。皇太极明确以“满洲”为族名后，为了加强统治又将满洲各部划分的“弗（老）满洲”和“伊彻（新）满洲”，凡黑龙江、乌苏里流域各部均入“新满洲”。根据《八旗通志初集》的《八旗满洲谱系》所收新满洲姓氏有139个，占满洲姓氏总数625个的五分之一。八旗满洲姓氏中不仅有今满族同胞的祖先，也有达斡尔、鄂伦春、锡伯、赫哲、鄂温克、蒙古等兄弟民族的先世，甚至境外的那乃人、尼夫赫人、乌德盖人、阿伊鲁人等民族成份。所以说清代满洲氏族是一个民族联盟，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

《通谱》所收爱新觉罗以外各姓氏的原籍，充分证明上述民族联盟这一命题的准确性。《通谱》载：“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甚繁，散处于苏完叶赫、讷殷、哈达、乌喇、安褚拉库、蜚（或作裴）悠城、辉发、长白山及各地。”（卷之一）“纳喇，为满洲著姓，其氏族散处于叶赫、乌喇、哈达、辉发，及各地方。虽系一姓，各自为族。”（卷之二十二）“兀札喇，为满洲一姓，其氏族，散处于乌喇、萨哈尔察、黑龙江，及各地方。”（卷之三十）“穆尔察，为满洲一姓，其氏族散处于绥芬等地方。”（卷之四十三）“额苏里，为满洲一姓，其氏族散处于黑龙江等地方。”（卷之四十九）“喀尔拉，为满洲一姓，其氏族散处于辽河等地方。（卷之五十三）“那木都鲁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族散处于那木都鲁、绥芬、浑春，及其各地。”（卷之二十一）“精奇里，为满洲一姓，其氏族散处于精奇里乌喇等地方。”（卷之三十六）“图克敦，为满洲一姓，此一姓世居达呼里地方。”（卷之五十六）“乌颜齐，为满洲一姓，此一姓世居乌喇达呼里村地方。”（卷之六十三）仅以上几个姓氏分布地域和名称，即可窥见“满洲氏族”内涵外延之深之广，远非一个单一民族所能概括得了的。如卷之四十六所载鄂卓氏，以叶赫为中心地，却已东渐辉发、哈达、黑龙江等地方。其中正黄旗人札色里、佳克丹二人原籍牙克萨即雅克萨城，在今黑龙江上游苏联境内，改名阿尔巴津。卷之三十六所载精奇里氏，散处于精奇里江各地，精奇里江即今苏联一侧的结雅河。首领巴尔达齐，顺治时同族众弃土内附。《清太宗实录》始称“黑龙江索伦部落头目”（卷二十三），进而称“索伦部落萨哈尔察地方额附”（卷二十八），居塞布奇屯。《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载称：“以巴尔达齐自井（精）奇里乌喇率兄弟来归，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其同来萨哈连、钟敏、额讷布，俱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图占、席岱、堪齐奇、堪褚堪、查里穆，俱为拜他喇布勒哈番。”（顺治六年乙丑八月丙午条）这些人都是达斡尔族先世。

前引兀札喇氏，又记作“乌扎拉”、“兀扎拉”、“吴甲喇”，不仅满族有此姓氏，达斡尔族、赫哲族中也有。据黑龙江下游的赫哲族民间传说，乌扎拉氏最初居住在乌苏里江口一带，后来沿江下航自建村屯，或与乌耳奇人杂居。另一传说，来自黑龙江上游，或来自松花江流域的乌扎拉洪科地方。考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地方流行的传说，当是该族姓得氏之源。《西伯利东偏纪要》称：“乌扎拉部，在今伯利（今哈巴罗夫斯克）下六百里……麻宜美斯克地方，其处有山，华人称‘金山’。对面北岸为波兰侯温，出口处有山产银，华人呼‘银山’……银山有乌扎拉地方名……乌扎拉村当即其处。”俄人马克《黑龙江旅行记》详载走访乌扎拉地方的情况，“在这段阿穆尔河河谷，到处流传一种迷信传说：银山上有神居住，它们守护藏在山中的宝物，

因为它们暗中作法，从事任何事业都要遭到失败，任何前来此山的人，特别是那些想要找到埋藏在山中的富源的人都要遭到不幸”。（第三章）以山名氏，顺理成章。其他叫“乌扎拉”的地方无此类神话传说。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七年癸酉冬十月乙酉（1633年11月27日），“是日，兀扎喇地方虎尔哈名绰奇者率四人来朝，贡貂、狐皮”。（卷十六）九年六月丁未（1635年8月11日）“征兀扎喇部落，俘获甚多。”（卷二十三）又崇德三年六月辛丑（1638年7月20日）“兀扎喇部落井璫、马考、扎奈、桑吉察等来朝，贡貂鼠、猓狸獬、水獭等皮”。（卷四十二）据《通谱》卷三十所载，距建州女真较近的兀喇、萨哈尔察等地方的乌扎拉氏人均于“国初来归”，黑龙江地方的乌扎拉氏人多在“天聪时来归”。世居黑龙江地方的乌扎拉氏才是正宗。故沿黑龙江的赫哲族、达斡尔族均有乌扎拉氏。自辽末金初，黑龙江流域土著民族相继西迁，将其姓氏带至松辽平原，满族、锡伯族、蒙古族才有了乌扎拉氏各家族。

《通谱》卷六十二在“正蓝族有名位希姓”条下，收录的“绰络氏”“世居黑龙江地方”。赫哲族的“绰各乐”即此姓氏，远古时期从黑龙江下游的亨滚河迁至博朗湖畔乌扎拉山下定居，从而和乌扎拉氏结为亲族。他们同费雅克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清初附入乌扎拉氏，故其姓氏不显。

综上所述，满洲正宗姓氏本身，就是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流域土著民族的大融合。究其族源，上起阿尔巴津，下至亨滚河，遍布整个黑龙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广袤地域。尤为重要是《通谱》所附姓氏，首先是“附载满洲旗分内之蒙古姓氏”，其中的大姓博尔济吉特氏，“其氏族甚繁，散处于西拉木楞、兀鲁特、札鲁特、克鲁伦、把岳忒，及各地方”。（卷之六十六）其族人多是“国初率部属来归”的，不少人当了额驸，和满洲皇族联姻。萨尔图氏，世居扎鲁特，后迁叶赫，因九国联军被建州女真军击败而加入满洲八旗。蒙古姓氏甚众，多世居今辽西地区和内蒙古东四盟境内。也有散居今辽东和吉林省境内的人户。

其次是“附载满洲旗分内之高丽姓氏”，大部分是中朝交界处的高丽居民。有“率子弟来归”受封的，也有被俘充当奴隶——包衣的。如韩云，“正红旗人，世居易州地方，国初同弟韩尼来归，授二等轻车都尉，编佐领使统焉”。（卷之七十二）金氏·新达里，“正黄旗包衣人，世居易州地方。天聪元年，率子弟来归，授为通事官。时有新归附高丽通事官登纳米，密致书，输我军虚实，导其王发兵，水陆并进，已为内应。新达里觐获其书，奏之，置登纳米于法，遂以其家资赐之。又睿亲王家人恩尼比者，亦高丽人也，常往来高丽，致书其父，潜蓄异志。新达里复覘获其书，恩尼比亦伏诛。崇德二年，从征高丽，遇伏兵，以计败之。大军进至岗花屯，太宗大皇帝谕令勿伤其国王妻孥，新达里仰体圣意，善为保全。太宗文皇帝优加赏赉，以俘获高丽人户分编佐领，特命新达里统之，兼内务府三旗火器营总管事。后从征松山，奋勇追击，斩获七十人，得马四十匹，又歼海滨叛贼有功，复蒙赏赉，后以疾卒于官”。（卷之七十二）这是一位十分忠诚的清朝官员。

卷之七十四以后各卷均“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多是世居沈阳、辽阳、抚顺一带的汉人，也有来自朝鲜的汉族人户。所有尼堪（汉人）姓氏人户均为满洲的包衣，类似奴隶。被谱人以军功和职业受封者极少，多以子孙荣升而光宗耀祖入谱。

通过《通谱》入谱姓氏人物的得姓授氏沿革及其籍变迁综合分析，详辨

各姓氏人户原来的民族成分，对今后的民族识别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通谱》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产物。以“野人”、“夷狄”世居东陲的少数民族君临华夏，居然国富兵强长达一个半世纪。满洲民族的最高统治者为维护本集团的长远利益倡导名门大族立传建档的手法，大修谱牒。首先肯定官掌族姓之必要，批评秦汉以来古制不存，家牒乃作。六朝及唐虽注重谱牒，却又动辄疏舛。到了两宋，谱学遂绝。故仿《元和郡姓》之例，敕纂是编。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的族谱学的研究并日臻完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当时的东北亚大陆，除朝鲜人有自己的谱牒外，其他土著民族很少有自己民族的文献。今天赖有此长编巨著，保存了许多民族的珍贵史料。在海外华人兴起寻根热的年月，为增进炎黄子孙的团结，加强中华民族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通谱》的出版，更具有一层现实意义。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3期）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弘昼等编纂，辽沈书社1984年12月出版，定价60.00元。

## 一本别开生面的人物传记 ——评《郭嵩焘大传》

徐 彻

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以下简称《郭传》）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研究丛书”之一。做为人物传记，别开生面，值得一读。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曾历任翰林院编修、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等职。1875年9月被任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6年底赴任），后兼驻法国公使，1879年初离任回国。郭嵩焘的政治活动恰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相始终。从一个旧式的封建士大夫，到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位中国驻外公使，他的一生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大变动。郭嵩焘热心研究“洋务”，因此受到当时舆论的猛烈抨击，但其却始终不悔。晚年他在《戏书小象》诗中写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相信历史会对自己做出公正的评价。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在研究洋务运动时，对郭嵩焘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几年来，钟叔河、熊月之同志写了有关郭嵩焘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研究郭嵩焘的人多起来了，但迄今尚未见到关于研究他的专著。《郭嵩焘大传》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空白。作者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探讨了郭嵩焘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影响及其历史地位。其中有关郭嵩焘对西方的整体认识、对涤荡社会陈规陋习和改造旧的“人心风俗”的大声疾呼、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个人人格和独立意识的追求等等，很多方面是人们论述不够或完全没有论及的，作者在书中则做了全面、系统和较为深刻的研究。这些，无疑大大丰富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内容。

《郭传》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突破了旧的格局，复原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精心选取大量具体生动的史实，使郭嵩焘的思想、性格、私人生活、在官场的窘迫与不合时宜等等，无不表现得栩栩如生。很多议论（当然不是全部）就寓于生动的史事描述之中。

《郭传》的成功还在于，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写，而不是单一追寻他在政治舞台的表现，使人物个性鲜明，而不政治脸谱化。作者在搜集资料时，不仅注意了中外官方档案、文书和时人文集、年谱、专著，而且特别广泛搜罗有关的私家笔记、日记、信函、稗史等，经过严格筛选，以补充正史的不足。在写史时，又适当插写了有关的宫廷见闻、官场内幕、趣闻逸事及东西方不同的习俗、风土人情等等，增强了读者的直观印象。如第一章写到郭嵩焘参加“大挑”时，顺便介绍了这种特殊考试方法。使人捧腹之余，回味出科举考试之弊端百出。第四章写郭嵩焘卸广东巡抚任回家，则与闽浙总督颜伯焘罢官归里相对照。其间大官的骄奢、豪奴的巧取、小吏的左右逢迎，跃然纸上。第八章的很多内容，如郭嵩焘参观英国皇家医院、在茶会上与巴西国王相遇、参加“男女混杂”的跳舞会、日本人在英国的穿梭外交等，读来无不兴味盎然，同时使人深感到中西文化的遇然不同。第九章中禁烟公社一节，王闿运在公社例会上介绍的四川尊经书院学生吸食鸦片的骇人情况，使人读后感慨万千。全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郭嵩焘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不仅专业人员可将它做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书，一般读者也可从中获得许多新鲜的历史知识和启示。



作者研究郭嵩焘的目的，在于通过剖析这个人物，充分揭示晚清社会政治腐败、长期封闭、顽固守旧风气对民族生机的窒息，为现代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全书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对鸦片战争前举国上下的愚昧无知、战后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及洋务思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洋务思潮与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承接关系与区别，研究了洋务思潮的庞杂内容、进步性、反动性及与后来的维新思想及洋奴买办思想的关系。对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三次大论战，作者更不惮其详，既写了论战的全过程及争论焦点，又做了较为深刻的总结和论证。对郭嵩焘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谬误之处，作者都做了详尽论述。很多提法是颇为新颖、深刻而发人深思的。

全书文字生动活泼，史料极为丰富，很多章节可以自成专题。如第一章中《夜郎自大的天朝》与《稀里糊涂打了败仗》合在一起，便可做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专题研究。第九章中的《铁路之争》，全面介绍了60—90年代围绕铁路问题的中外之争、清廷内部之争。这些章节为大专院校讲授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完整成型的专题材料。总之，《郭传》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达到明显的高度，有某应有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写法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创造，为传记的撰写提供许多有益的思路。当然，开辟一条新路是不容易的，《郭传》也难免有美中不足之处。做为一部学术专著，个别地方尚嫌论述不够深透，有些提法也还有可斟酌之处；大量的史料固然使内容十分充实，但有些篇章则显得引文略多。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郭嵩焘大传》曾永玲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定价（平）4.70元，（精）7.90元。

一部有助于增强国本意识的好书  
——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

谭 译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一书确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关于日本侵华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报刊上就有所揭露，事后的各种著述中也不断有所记载。但是这些揭露和记载大都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有些则囿于见闻和作者的主观条件还不免有失真和自相矛盾之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一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这本书内容丰富。全书收入记述日军暴行的各类文章 71 篇，洋洋 47 万言。从时间上说，上起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下迄 1945 年抗战胜利，长达 50 余年；从地域上说，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四川省，北起黑龙江，南到台湾，广及日军到过的所有地区；从暴行的类别上来说，包括烧、杀、抢掠、奸淫等各个方面，其中特别着重于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对人口密集城市的狂轰滥炸以及“大讨伐”、“大扫荡”、制造“无人区”、“集团部落”、“万人坑”、“三光政策”、残害“劳工”、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等令人发指的罪行揭露和记载。不仅如此，编者在取材上还注意了典型化。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暴行是罄竹难书的。例如，光是“万人坑”的遗址目前全国已发现 80 余处，其他各种惨案，更是数不胜数。限于篇幅，当然不能都收进来。编者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重点叙述。80 余处“万人坑”只选择了两三处，各类惨案也只是选择典型性较强的百余起，以记事本末的体裁，进行详细、真实的记载，给人以历历在目之感。有的惨案，还是第一次着落笔墨，日军在台湾、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所犯下的罪行，过去除当地人之外，鲜有人知，书中却进行了重点记载。对于全书各篇文章中涉及到的史料，编者都进行了认真的核正和考订，体例也力求统一和规范化。像这样比较全面、系统、典型而又翔实地记载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暴行的书，目前国内尚不多见。可以想见，这部书的问世，一定会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们的热烈欢迎。

这本书的好处还不仅在于它对部分专家学者有用，更在于它对广大青少年及至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有帮助，是一部有助于增强国本意识的好书。中国今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这种历史的选择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列强对中国人民侵略、掠夺和奴役了 100 多年，中国人民也不屈不挠地与之抗争了 100 多年。积此 100 多年的经验，中国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之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也讲什么“共存共荣”，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而实际上无刻不在想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变成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附庸国。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本固而后枝叶才能繁茂，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特别许多青少年，他们对历史上中国人民经受的苦难缺乏直接感受，不懂得社会主义选择的珍贵；他们涉世未深，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也缺乏警觉性和分辨能力，因此对他们尤其需要进行增强国本意识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一书，帮助我们重温我国人民过去的血泪斑斑的悲惨历史。书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中国一旦失去主

权，一旦沦为列强的附庸，那将是怎样一个局面！总之，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会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增强我们的国本意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心同德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然，作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这本书，还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在经济掠夺方面，还没有集中篇幅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采取所谓“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我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掠夺也是极其惊人的，他们对我国生产设施的破坏，对于珍贵历史文物的掠夺和毁坏，也有大量的事实，应该有所揭露和记载。此外，在史料的摘引、编排的技巧等方面也有需要进一步提高之处。

（原载 1990 年 7 月 12 日《辽宁日报》）

0《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禹硕基等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定价 8.00 元。

## 评《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

刘远图

一个偶然的机，得以及早拜读辽宁大学历史系孙克复教授的新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

外交史研究，问题很多，难度很大，在我国至今仍是薄弱环节。甲午外交史亦是如此，充斥房间和图书馆的多是国外学者的著述。虽然，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写作了大量有份量的论著，成就斐然，但多属政治与军事方面，或作为某方面的专史或通史的一部分，全面的系统的甲午外交史专著，迄今未见。因此，孙教授的新著不能不说也是这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

《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资料丰富。研究甲午外交史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资料——即中方和日方资料不可或缺。过去不少中日学者写作甲午战争史的一个通病，是中国学者多使用中方资料，日本学者多使用日方资料，即或是使用对方资料也极其有限，且还多是个人著述，因而所提结论难免失误或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该书则不然，中日文资料并重，并以双方的档案资料为主。作者谙熟中文资料，诸如《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李文忠公全集》、《翁文恭公日记》、多卷本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中收录的资料等，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新著中系统地、大量地使用了《日本外交文书》中搜集整理的日文档案资料。这在我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中尚不多见。大量的中外档案、文献的对照使用，使本书的结论具有坚实的资料基础和很强的说服力。

其次，在写作方法上，继承王芸五先生等的写作传统，注意让史实说话。30年代，王芸五先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写成了《六十年来来的中国与日本》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出版了新版。王书的重要特点是寓论于史，大段征引原始资料，只在简短的提示或分析小结中点明作者的结论或观点。这是我国传统史学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写作方法。

最后，充满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揭露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线。新著在深刻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同时，用铁的事实，血的语言，无情地鞭挞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另一方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屈辱投降、低首下心、摇尾乞怜的丑态，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则给予深情的讴歌和崇高的评价。如台湾军民反割让的不屈斗争，新著写道：“总计日军在乙未侵台战争中的死伤人数，比在甲午战争中死伤的人数多了近一倍。台湾人民的英勇战斗，不仅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同时向全世界声明，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侮！台湾人民乙未保台斗争，用鲜血为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谱写了绚丽的篇章。”这些笔尖带着强烈感情的评述，深深地感动读者。

当然，该书还有值得商讨之处。例如，新著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的结果，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有时却离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所执行的远东政策。甲午战争的爆发、进程和结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和西方列强的远东政策交汇和冲突的集中反映。充分地揭示和论证这种交汇和冲突，是甲午外交史课题的症结和难点。处理得好将极大地扩展本课题研究的视野，展示出更加宽广的国际背景，从而使某些重要的问题得到更深刻的说明。又如，本书重视资料，注意让资料说话，但作为外交史、特别是甲午战争这样复杂的外交史，它本身受着国际环境和形势的严重影响和制约，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重大行动的背后都包含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它国因素的作用，完全以大段（或整段）资料的引述来代替客观过程的综合分析，难免失之过简，把复杂的多边、多角、多元的外交过程简单化了。提示和小结对读者固然有所帮助，这里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作为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甲午外交史的专著，似乎就显得有些缺乏厚度和力度了。

（原载 1990 年 9 月 20 日《辽宁日报》）

《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孙克复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定价 7.80 元。

## 总括一朝史事 卓有学术创见 ——评白新良的《乾隆传》

程 坦

白新良同志的《乾隆传》一书，是近年来国内几部清朝皇帝传记面世之后，又一部新作。该书以乾隆帝的生平经历为主线，将清代乾隆年间政治、经济的盛衰、军事征战的成败、文化事业上的功过等内容贯串一体，成为总括一朝史事的清史著述，并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由于作者功力深厚、治学严谨，使本书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取精用宏，清理出大量的历史事实。本书征引的历史资料，首先是雍、乾、嘉三朝《清实录》，其中《清高宗实录》集中地记述了乾隆朝的史事，是本书基本的史料依据。但是实录作为官书，有其片面性和有所讳饰。因此，作者广泛查阅了乾隆帝诗文集、《清三通》、《朝鲜李朝实录》、部分清人文集、方志、笔记、档案资料等等，广征博取，精心抉择，使全书内容丰富，记述准确，并且清理出乾隆朝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例如关于八旗事务，一般论著仅见及乾隆帝解决八旗生计的经济措施，而本书通过掌握的大量史料，阐明了乾隆帝“扩大八旗仕途”的种种做法，排挤了汉人的入仕机会。再如阐述了乾隆帝积极推行积贮备荒的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果，亦为前此各种清史著述所未论及。与此对应，作者还发现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乾隆晚期社会危机的形成，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劝垦田地政策废止，水利事业废弛，积贮备荒制度也遭到破坏，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经济根源。其他如劝垦田地、对外关系、压抑臣权、乾隆前期镇压各地人民的抗租、抗粮、反科派斗争等等，本书都作出了史实上的最新发掘和清理。

第二、内容全面，提供了客观而科学的历史认识。乾隆帝一生从事了多方面的历史活动，他发挥的历史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起。撰述这种复杂历史人物的传记，最忌将某些方面的史事片面铺张、疏略其余，繁简失宜而淆乱真相。值得称誉的是，《乾隆传》虽篇幅不大，仅40余万字，而最突出的特点则是内容全面。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记述乾隆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政令与活动，完整地反映其历史形象；其二是兼及功过，不夸饰亦不隐没。在《乾隆传》中，记述了乾隆帝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发展生产、巡幸全国、“十全武功”等等历史活动，这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并没有大事铺张文字、过细描绘。而对于整顿科场弊端、镇压人民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对外关系和闭关政策等等，均立有专题予以论述。至于乾隆前期掀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则专设一节，文化事业上的功与罪则专立一章。这种布署，十分妥善，反映了乾隆帝生平事业的多样性内容，没有畸重畸轻之失。尤其可贵的是，本书不仅叙述了乾隆帝励精图治、锐于进取的政治作为，也揭示了他晚年的骄傲浮夸、倦怠政务；不仅叙述了严惩贪官的事实，也指出了在惩贪问题上的局限性与某些姑息宽纵行为；不仅叙述了蠲免钱粮的一系列举措，也揭露其奢侈挥霍的生活作风；不仅叙述了他处理前朝政治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宽宏大度，也指出了不断强化皇权专制的措施。即使是边疆用兵的所谓“十全武功”，作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哪些起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哪些属于穷兵

黩武。对于征剿准噶尔叛乱，作者肯定其历史性功绩的同时，也批判了战争中肆意屠戮当地人民的野蛮行径。总之，作者对乾隆帝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不同方面，不同历史作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运动，皆作客观、全面的记述，并且予以鞭辟入里的分析评论。这样，本书就将乾隆帝的历史形象完整地展现出来，是非、功过清晰明白，提供了客观、全面、科学的历史认识。

第三、精研极思、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关于乾隆朝文字狱问题，虽许多著述皆有论及，但均属平泛。本书则提出独到见解，认为乾隆十六年之前，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发生，乾隆十六年夏发生“伪孙嘉淦奏稿案”，使乾隆帝错误地感到存在一股与自己对立的势力，因而掀起文字狱的高潮。作者认为，乾隆朝的文字狱比康、雍两朝数量多、持续时间长，但却不像康、雍两朝那样收到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最终人为地扩大和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这些论点乃是作者的创见，大大加深了对清代文字狱问题的认识。

乾隆帝虽一度提倡程朱理学、任用理学名臣，但后来逐渐对之疏远。在打击张廷玉、鄂尔泰朋党势力之后，态度已发生根本变化，转而扶持考据学派，为考据学者的入仕和考据学风扩大影响开方便之门，这应是乾嘉学派迅速发展兴旺的原因之一。作者指出，乾隆帝扶持考据学派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将考据学作为粉饰盛世的点缀品。但以历史性眼光来看，当时扶持考据学也比提倡理学为好，乾隆帝扶持考据学派发展学术事业，应予以基本肯定。

关于清代的秘密建储，学术界已论及雍正帝是这个制度的创始者，似乎乾隆帝仅依例而行。而本书依据确凿的史料，指出乾隆帝初期因受儒学影响，并不赞成秘密建储，盘算着待皇子成年，“仍当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后来在政治现实中体会到秘密建储的好处，并编著《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批判公开建储之弊，将秘密建储的制度理论化，杜绝后世可能发生的逆转。本书在肯定秘密建储可起到稳定上层统治秩序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这个制度的消极后果。

由于本书内容涉及得十分广泛，其中也有一些文字失检和未遑详考之处。总而言之，《乾隆传》确为一部构思深湛、内容全面、文字精炼、卓有创见的上乘学术著作。

（原载《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乾隆传》白新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定价7.00元。

## 评《清代东北史》

赵中男

《清代东北史》一书，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六位清史专家合作编写。它的出版，是我国清史研究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叙述了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到清军入关的东北概况。第二章叙述了清入关后至鸦片战争前的东北概况。第三章叙述了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东北概况。第四章为清代东北的社会经济。第五章是清代东北的思想文化。

通览全书，我认为《清代东北史》在内容上有三个特点。

其一，史料丰富而翔实。书中全面叙述了清代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独具特色的东西。如清初在东北建立的各种统治制度，清帝的东巡，平定布尔尼叛乱，边地少数民族，封禁政策及其后果，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活动，东北的旗地、民地、蒙地及其相互关系，东北的农业、工商业及民族工业，东北的思想文化等。书中这些丰富的史料和许多经过研究的统计数字，为人们了解清代的东北和进一步研究这一领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二，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代东北的许多问题加以梳理、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有些值得商榷，但绝大部分是公正、深刻的。后金对汉人实行较为落后的统治政策，激起了下层汉人和某些投降后金的上层官吏和将领的反抗，作者指出这种反抗斗争是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实质是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的斗争；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人们评价不一，作者则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尽管袁崇焕处理皮岛善后事宜有不足之处，然而从关内关外总的形势来看，对于后金的防御力量是比以前加强了；评价清帝东巡，除其积极的政治意义外，作者还指出每次东巡都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仅护驾军队即达数万乃至十余万，沿途的道路、桥梁、行宫要征用大批民夫重新修整，庞大的巡行队伍，沿途必然骚扰，因此，每次东巡虽然减租免赋，但对于沿途的百姓来说，仍然是一场灾难；在封禁与反封禁问题上，作者认为，关内特别是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人口猛增、封建剥削和自然灾害的驱迫下，向地广人稀、物产富饶的东北地区流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趋势，并且必然与清廷的封禁国策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封禁与反封禁的斗争构成为有别于关内地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评价太平天国时期东北农民起义的作用时，作者指出，这些起义是在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它将大批清军牵制在关外，并且迫使清廷将关内清军北调，减少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从而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军横扫白山黑水，使柳条边的边门和封禁卡伦陷于瘫痪，为流民出关和进入吉、黑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日本“满铁”和关东州都督府对于侵略我国东北所起的作用不同，书中指出，两者在性质、地位、职权等方面有所区别，“满铁”是日本总管对我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关东州都督府则是日本政府对我国辽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中枢，两者紧密关联，相辅相成，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掠夺活动的两大支柱；在评价清末的“新政”时，作者指出，“新



政”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影响、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国内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对立物，同时也反映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甘沉沦、欲图振作，又不愿放弃封建特权的矛盾心理。“新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清朝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陷于危机的封建统治，消解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新政”往往徒具虚名，并且“新政”伴随着清政府和各级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社会动乱，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论述清政府的金融业时，书中认为，清朝官、私银行的发展，并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银行那样，是由于工业生产的结果，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在华贸易的发展、清政府财政的需要，以及内地财富集中于沿海口岸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许多官僚们觉得投资工业不如进行投资更为有利所驱使。从而在中国就产生了清官府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清代畸型的银行业，显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银行业；在清初东北一般旗地的生产关系这一问题上，作者指出，在吉林、黑龙江地区获得“赏奴”的大多数是八旗兵丁，这些人在应差之余本身也参加劳动，因而不同于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赏奴”在旗地生产中的作用只是自耕小农的帮工，这种奴隶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局部的、特殊的附属物。这种奴隶制的残余，也是东北旗地生产关系中最落后的部分；书中对于清代东北地区与关内地区的贸易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关内外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繁荣，也刺激了南方某些地区经济和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全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逐渐消失，而趋于平衡，其意义是深远的；在谈到满族包括八旗汉军女子的服饰时，作者指出，窄瘦的左衽长袍即旗袍，也是清朝所坚持到底的习俗，但特殊之点在于，这种装束仅限于满族包括八旗汉军在内，不论入关前或是入关后，从未在广大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有意思的是清朝强令推广的服饰制度曾遭到了巨大的反抗和抵制，并随着它的覆灭而被彻底抛弃；但清朝从未强求一律加以推广的东西如旗袍，却为许多汉族妇女所接受并一直保存到今天。类似的结论还有许多，从中可见作者研究问题的涉及范围并不限于清代的东北，许多问题和结论是带全局性的，因此，书名虽称《清代东北史》，其学术价值则不仅仅限于东北。

其三，作为一部断代地方史，书中将东北从时间、空间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间断限上，不是以1840年为断限，将清史与近代史截然分开，而是从明末清国建立至1911年清朝灭亡，跨越了近代史和古代史的断限来叙述整个清代东北的历史；空间上，书中不限于今天意义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而将东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的蒙古地区也包括进去，因为东三盟与东三省地理毗连，关系密切，而且在清末及其以后的时期内，东三盟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改隶为东三省的州县。事实上清代东北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如封禁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四种统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城镇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反抗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思想文化的变迁等等，都不可能以1840年为断限而将它们截然分开，也不可能将东三盟排除于这些问题之外，从而割裂这些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清代东北史》这种将东北在时间和空间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效果是成功的，它使全书成为一部全面反映清代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综合发展过程的断代地方史，而非一般的地理沿革

史、制度变迁史、革命斗争史、外国侵略史、民族关系史、经济发展史可比。这种研究的方法和效果，也为其他的断代地方史的研究和著述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先例。

书中五章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东北的整体结构来安排的，前三章主要是从政治上叙述清代东北的历史进程，从后金政权的建立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后两章则将清代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单列出来，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加以叙述，使人看清两者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及其特点。这样的章节安排既便于人们了解整个清代东北史的全貌，又便于人们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

《清代东北史》一书的下限截止于东北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前夜，叙述军阀张作霖勾结官府绞杀东北的辛亥革命运动，用张榕等爱国志士的鲜血换取了更高的官职；并叙述了东北出现军阀统治的某些社会原因，因而此书对于人们研究清末奉系军阀的兴起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六位作者都是多年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擅长领域。《清代东北史》一书的写作分工则基本上与他们的某些专长相吻合：对满族兴起史颇有造诣的李燕光、徐恒晋先生撰写清入关前部分；对清前期历史很有研究的杨余练先生撰写清入关后部分；对近代东北史相当熟悉的冯年臻先生撰写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东北；清代东北经济问题的专家王革生先生撰写东北经济；曾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张玉兴先生则撰写清代东北的思想文化部分。作者们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专长，同时又在现有条件下吸取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清代东北史的研究成果。此书是我国第一部《清代东北史》，书中虽然对清代东北史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时间、史料和研究水平的限制，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入关前的明清战争，未从军事史的角度写明它在整个明清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未划分战略阶段，未写明双方的攻守战略及成败的根本原因，即双方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因素；对整个东北的地理环境未作清晰的描述，清代的东北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区域，地理环境的作用及其与经济发展、政治统治和文化特点的关系，书中没有深入的阐述，实际上地理环境在清代东北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应是不容忽视的；书中农村封建经济一节，更多地叙述的是旗地、民地、蒙地的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有关农村农业经济的东西，如主要农作物、农产品、产量、耕作方式、与农民生活水平关系等，却涉及不多，更未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相比较，未写明清代东北农业的特点；思想文化部分，主要是文化，而思想则很少，实际上清代的东北虽然未出现过关内的一些大思想家，但在当时东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学术思想、流派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发掘，研究水平的深入，这一不足会得到弥补的。应该说整个《清代东北史》全书是一棵繁茂蔽日的大树，偶尔有几根枯枝也无损于整个大树的丰姿。

令人无比惋惜的是，《清代东北史》一书的主编杨余练先生在将整理完毕的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便猝然长逝了！其后张玉兴先生按出版社的意见继续修改此书，终于完成了杨余练先生未完的事业。回想当年同杨余练先生推敲《清代东北史》书稿的过程，杨先生渊博的学识，对书稿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清瘦的南方人的相貌，为修改书稿不辞辛苦地往来于出版社和五位作者之间，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杨

先生对清史尤其是清代东北史造诣颇深，在国内外清史学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他的去世，是我国清史学界的一个损失，中国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史学工作者，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作者。在《清代东北史》一书出版之际，谨向我所尊敬的先辈、清史专家杨余练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他的名字将与我国清代东北史的研究成果永远联在一起。《清代东北史》一书的出版，不仅是我国清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也是对杨余练先生的最好告慰。

（原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3期）

《清代东北史》杨余练等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定价9.40元。

读史可明智知古更爱今  
——《中国近代海军史》读后

余成龙

培根说过，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读完《中国近代海军史》我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强大的中国海军。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道理。“中国的海上舰队在1100—1450年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李约瑟语）但是，到了近代，曾作为古代海军发源地之一的中国，为什么海军发展步履迟缓，一再受挫？为什么会被外国铁甲舰一次次轰开国门，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落得个有海无防、国破家亡？追根溯源，《中国近代海军史》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细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我认为该书有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以史为经，自成体系。该书除绪论外，共16章。在绪论中，作者用精炼的笔墨，简要地回顾了我国海疆概貌和古代航海以及海防成就。在正文中，作者按历史发展的顺序，依次介绍了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师、清朝后期的近代海军、国民党时期的海军，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近代海军产生、发展、衰亡的历程。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近代海军无史的局面，填补了兵种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二是以论为纬，见解独到。作为历史著作，《中国近代海军史》不仅满足了向人们交代史实，记“流水帐”，更重要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每一阶段历史深入细致的研究，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总结，使人能“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上，能是非曲直，秉笔直书，优劣得失，娓娓道来。如对李鸿章进行评价时，作者既指出他对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覆灭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又指出李鸿章要求稍变成法，求富自强，对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颇多建树。

三是可读性强。在行文上，该书继承了中国古人治史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不是单纯地就史写史，而是夹叙夹议，亦文亦史，用流畅、细腻的文笔，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历史画卷。

读史可明智，知古更爱今。《中国近代海军史》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海军，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军队。

（原载1991年4月15日《书讯报》）

《中国近代海军史》胡立人、王振华主编，大连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定价（平）7.60元，（精）10.00元。

## 评《清代宫廷史》

阎崇年

宫廷史不可无书，但难以为书。这是因为，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海内外宾朋熙至紫禁宫苑，却苦于没有一部宫廷史著可读；且近百年学术史上这一空白，也亟需填补。然而，撰著宫廷历史，前人赍咨洋涖。盖鉴于宫禁森严，外人无由得入，官方记载伪疏讳饰，稗史野乘漏漫俚，鲜有研究者问津。虽史界前辈心史、援庵等还诸史事以真实，但宫廷史专著竟付之阙如，成为辛亥以来史林憾事。但是，《清代宫廷史》，由清代宫廷史专家万依、王树卿、刘澂鼎力合撰，以其职在故宫博物院，挥汗研冰地求索，翻检历史文献，查考清代档案，谙宫廷掌故，习大内典仪，既于宫阙建筑了如指掌，又于琳琅文物如数家珍，从而使这部专著博采精修，观点公允，史料翔核，信实可读，是一部宫廷历史的补白之著，也是一部清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清代宫廷史》一书，架构经纬，脉络分明。清代宫廷是清朝皇帝起居之所；也是清朝社会的神经中枢。清代宫廷系统仿如一个凝缩的小型社会，既设置众多职能部门，又具有自身鲜明特点。举凡社会诸多方面，宫廷无一不相涉及。通史著作，有例可援；而宫廷史著，实无先例。至若明宦官所为的《明朝宫史》和清奉敕所撰的《清朝宫史》，或记述宫阙，或重在典制，像是宫廷志，实非宫廷史。《清代宫廷史》的著者，则独辟蹊径，自创体例。全书纵向论述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末帝溥仪十二帝后，宫廷之初建、完备、鼎盛、转衰、没落和危亡的三百年间，帝后之政治昏明、治策得失、宫闱阴阳、礼仪繁简，分作6章13节，探索了清代宫廷演变的规律。全书横向阐述了每个时期宫廷的人物、事件、宫苑、典制、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分作123纲79目，经纬交织地展现出清代宫廷丰富多彩的画卷。著者创设的宫廷史体例框架，对断代宫廷史的撰著提供了镜鉴。

《清代宫廷史》一书，辨伪求真，去疑存信。治宫廷史的难点在于，剔除官修史书的伪饰，拂去野史笔记的俚。著者以深厚功力、求实态度和严谨方法，从浩繁的文献、档案、谱乘、碑传、方志和文集中，披沙淘金，爬梳推求，廓清历史真象，还宫史以原貌。举如著者不囿于日人陈说，提出清宫雏形不始自费阿拉，而肇自天命元年（1616年）有宫殿、有礼仪的赫图阿拉这一可信论断。著者在“坤宁宫祭神”一节中，对著名学者失楔《北京宫阙图说》书内“坤宁宫”二百余字的论述，纠其疏误达十处之多。著者还对慈禧家世及入宫，据原奏折及内府档册，澄清了野史与口碑“而传”的疑窦。此外，于孝庄文皇后之下嫁、乾隆帝之身世、同治帝之死因等历史争讼热点，均检核史料，细致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

《清代宫廷史》一书，突出满洲文化的特色。中华五千年来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只有元朝和清朝。元朝宫阙虽已荡然无存，清朝宫殿却保存至今。清代紫禁宫苑虽为明代创建，但清定鼎燕京后更体现了满洲文化的特色。清帝“首重满语，崇尚骑射”，满洲文化必然辐辏于宫廷。书中记述的满洲文化在帝后心理、妃嫔宫女、八旗禁卫、宫苑建筑、宗教祭祀、宫规礼仪、冠服佩饰、节令习俗、内廷膳食、宗室教育、音乐舞蹈以及春蒐秋狝等方面，都濡以浓笔重彩。著者深入研究并详细论述了作为满洲文化之集大成者——满洲宫廷文化的特点及其表现。这对满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

值，并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原载 1991 年 4 月 24 日《光明日报》）

《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刘潞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定价 11.50 元。

## 《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评介

胡玉海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前夕，沈阳出版社出版了由姜华宣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以下简称《概要》）。《概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年来召开的重要会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这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部好书，除对现实具有指导、借鉴作用外，又要有自己的特点。《概要》一书有如下突出特点：

一是全。这本书内收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大大小小会议近四百次，是迄今为止最全的一部。所介绍的会议次数之多，和每次会议记述之全面，为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这将有力地促进史学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是准。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年来，经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也走过辉煌壮丽的历程，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伟业和经验，为了准确地说明这些，作者不是有则必录、平均编排，而是有选择、有重点。如选编了 1935 年一年内的 16 次会议加以介绍，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党所面临的困难，斗争的艰苦过程，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58 年，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时期，《概要》中收编了一年内的 17 次会议，反映了“大跃进”发动的全过程，也揭示了其原因，这对人们认识和抵制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深。史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向人们讲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已走过的历程，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原因，为什么必须走过那段历程，向人们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来指导今天和未来。《概要》克服了一般工具书简单地介绍知识的写法，而对每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内容作详尽介绍，并有恰当的评价。

四是实。《概要》对史实如实记录，秉笔直书。为了全面反映党的历史，对有争议或是历史“热点”有关的会议，既不回避躲闪，因循陈说，也不因人废言，闪烁其词，妄加推断。而是以事实为依据，认真研究，如实评述。

（原载 1991 年 6 月 27 日《辽宁日报》）

《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姜华宣等主编，沈阳出版社 1991 年 4 月出版，定价 18.00 元。

## 《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的特点

何 沁

姜华宣、张蔚萍、肖牲编的《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是一本富有特色的工具书。它的特点是：

一是选题新。这本书是以介绍党的会议为主题内容的，而党的会议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各项工作的布置和检查，党的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党的组织和人事的变动等等，都是通过党的会议来实现的。弄不清党的会议情况，要了解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按历史顺序系统地介绍党的重要会议，就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70 年的战斗历程。这不仅有助于党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者查阅有关会议的情况，同时也有助于一般读者学习党史。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实用性已超出作为一般工具书的应有价值。

二是内容全。所谓全，是从两种意义上讲的。首先，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这本书搜集了从党的诞生以后一直到 1991 年 1 月，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重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局和中央直属各部门的会议，还有中纪委会议、中顾委会议等，共 400 余次会议。可能还有遗漏。但相对地来说，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党的会议的实际情况。其次，与同类性质的书，以及和一些党史工具书中对党的会议的介绍比较而言，这本书对党的会议的介绍，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的一本。

三是介绍细。这本书对每次党的会议的召开背景、概况、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都尽可能作出准确的介绍和简要评述，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本书作者从动意编写到成书，用了大约 10 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材料，对以往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进行鉴别和考证、去伪存真而成此书。因此，应该说这本书是作者党史研究新成果的结晶。

（原载 1991 年 8 月 14 日《人民日报》）



## 民族正气歌 ——读《中华英烈传》

王 羽

秦晓鹰主编的大型系列丛书《中华英烈传》，给火红的七月献上了厚礼，也为全国广大青少年的暑期读书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这套丛书共分五卷八本，记叙了1840——1949年这100多年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奋斗牺牲的200多位民族英雄的故事。翻开设计思想独特、肃穆凝重的封面，阅读那些带血的文字，便仿佛回到了中华民族的艰难岁月。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林则徐对祖国前途的慨叹、谭嗣同豪壮的诗篇；也可以看到陈天华舍身蹈海、秋瑾的大义凛然；更可以感到李大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刘胡兰在血染的铡刀前脸不变色的无畏与勇敢。

200多位英雄，用他们的伟大一生谱写了两百多首英雄的赞歌；两百多首悲壮的战歌汇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正气歌。

这些英雄与烈士虽然各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每个人都有迥然不同的身世与人生道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热爱。无论是以死报国的邓世昌，还是南苑抗战牺牲的佟麟阁、赵登禹；无论是酷刑下骨碎身裂的江竹筠，还是魂泣白山黑水的赵一曼，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是他们在任何处境、任何打击下支撑信念与意志的坚强支点。祖国，是他们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对祖国生生死死的眷恋，才使他们永远保持住一个爱国者、一个革命者的伟大尊严。书中谈到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30年代在美国邮寄信件，邮局小姐有意侮辱中国人。吉鸿昌十分气愤。事后，他专门写了个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英烈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在这200多烈士中，有许多是贫苦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出身的革命者，他们在英勇就义前，常常遇到数不清的人生诱惑，或金钱或美女或官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用崇高的人格力量，打退了种种诱惑，保持了一种灵魂的纯洁与精神的清白。方志敏烈士这样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那西餐大菜，宁愿吞咽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也正是因为这样，杨靖宇将军才能在没有任何粮食的艰难中坚持战斗，直到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剖开他的肚子，发现里面只有草根、纸和棉絮！

在这些英雄烈士中，也有不少出自旧社会的股富之家，甚至豪门大户。如果按照陈旧的人生规范生活下去，他们根本就不必忍受风霜雪寒，更不会导致最后的牺牲。但是，革命理想使他们背叛了家庭，走上了摆脱中华民族苦难的斗争之路。抛弃了小我，为了大我，舍弃安逸，选择牺牲，不去考虑个人的命运，而为天下人的快乐而抗争。

烈士已经长眠九泉，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人格，永远值得今天的人们缅怀、纪念和学习！感谢《中华英烈传》的编者和出版者做了这件为前人立传，为后人引路的好事，这实在也是一件造福民族、惠及子孙的大事。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这套丛书的语言特点。它不像一般的历史书，

而是在保持科学性、准确性的基础上，力求生动活泼，适合广大青年的阅读心理和习惯，尽量做到引人入胜，故事性强，有利于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震动和启迪。

（原载 1991 年 8 月 11 日《中国教育报》）

《中华英烈传》秦晓鹰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4 月出版，定价 35.00 元。

浩歌千秋英灵永存  
——推荐大型丛书《中华英烈传》

黄金娣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五集八册大型丛书《中华英烈传》已经问世。这套由薄一波题字，李德生写序的丛书，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0 周年献上的厚礼，也是向全国少年儿童奉献的又一部精神食粮。

这套丛书以浩瀚的篇幅，丰富的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 1840 年以来，中华儿女闪光的足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书中用洗炼的文字，记叙了烈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祖国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感人故事。所选英烈的历史分期为第一集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第二集从“五四”运动以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四集为抗日战争；第五集为解放战争。中华英烈数以万计，本书仅收入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 237 名英烈。编写同时又侧重于东北地区青少年的乡土教育，把在东北较有影响的烈士，如陈镜湖、任国桢、吴丽石等选入书中。这部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和思想发展做了如实的叙述和具体分析，尊重事实，力求准确，通俗易懂。同时在撰写过程中还弥补了过去某些传记中行文简略及存在局限性等不足问题。书中还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被国务院定为民族英雄的为抗日而战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将领，如佟麟阁、张自忠等将军，反映了编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原载 1991 年 8 月 3 日《辽宁日报》）

## 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应答 ——读《血泪的回忆》

彭定安

他们，年近百岁华诞的寿星，年过古稀或年近花甲的老人，正当盛时的半百中年人，共同回忆那历史上难忘的一页：“九·一八”。由这些曾经经历苦难与耻辱的人所写的回忆，其可读性和真实性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有关东北大地数千万同胞一夕之间沦为寇仇之奴的血泪回忆，这里有沉痛、苦难、悲伤和仇恨，有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思考。口碑历史，向来为我国治史者所重视。因此，这些亲历者的真实回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不过这些含着血泪的文字，却不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价值。这是一批仍然活着的亲身经历这场巨大历史事变的人们所忆所记所感。几位当年张学良将军的高级部属的回忆，道出了已逝的过去的历史深沉的背景和悲痛；那些来自当年的平民百姓而又是幼小孩童的追思，则论述了那至今仍然刺痛人心的悲惨与苦难；那些当年北大营的守卫者，诉说“九·一八”之夜在敌人炮火轰击中不能报以枪炮的迎击而只能奔涌悲愤的眼泪，至今充满了悔与恨；那些当年白山黑水间活跃着的抗日义勇军战士的缅怀追忆，既有反抗战斗的豪情，又有历史的反思；尤其感人的是那些“九·一八”同龄人的回忆，他们都痛苦地道出了内心的悲愤：生下来就没有了祖国，就是亡国奴！

这些篇章，不只是历史的教材，而且是寓教于文的散文。这不仅是因为作者中不乏著名的作家、编辑，而且因为文章具有真情，又经过若干文字加工。编辑出版此书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成果。历史都是现代人以现代意识所写的对于历史的重述。我们今天来追叙和重叙60年前的“九·一八”，就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顾昨天，就是站在时代的峰顶来俯瞰历史。我们不仅看到昨天，而且看到了今天和明天。今天已经远远超过了昨天；明天将比今天更好。

至今仍然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在沉默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面对世界发言，语重心长，高瞻远瞩。将军之言，集中在两点：昨天心在抗日，今天日本勿再侵略；昨天深受侵略，今天仍要警惕。这本《血泪的回忆》，好似将军之言为历史的与现实的注脚。

回忆之文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对于历史回声的现实的应答。历史的回声在说：落后就会挨打；现实应答在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富足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

（原载1991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血泪的回忆》鲁野、关家鹤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定价3.50元。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九·一八’事变丛书”评介

袁间琨

一套印制精良的“‘九·一八’事变丛书”摆在我面前，翻阅起来，爱不释手，心情十分激动。这套丛书总计 250 多万字，并附有 300 多幅珍贵历史图片，是一套集方志、史著、资料三类为一组的大型专题性丛书。据我所知，在这类专题性丛书中，它尚属国内所首创的、唯一的一种，弥足珍贵。

这套丛书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因由、发展和后果，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事件发生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侵略手段和目的，散布了许多谎言，制造了众多假象。二战后，一些帝国主义的辩护人和一些别有用心政界人物，仍在企图掩盖历史真相，达到复活军国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揭示“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仍是爱好和平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各国二战时期，一批档案资料的公布整理出版，一批公正的学者对二战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使人们了解二战的历史真相有了进一步可能。这套丛书承担了记录“九·一八”事变真相的历史任务。林声主编《“九·一八”事变图志》以前志、本志、后志三个部分，概括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因、过程和其后影响；而马越山编著的《“九·一八”事变实录》则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发展和结局为主线，总结了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纠正了国内外一些歪曲史实的错误观点，是一部有新材料、有新创见的学术著作。这套丛书是真实记录“九·一八”事变历史真相的传世之作，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套丛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近现代由于政府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饱受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其甚者为日本帝国主义。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唤起民众，忘我奋斗，抗敌御侮，捐躯疆场，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外驱强敌，内除国贼，改天换地，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迈向世界强大国家之列。时至今日，发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仍是我们自强不息的根本。“‘九·一八’事变丛书”正是为适应这种教育目的，对创深痛巨的历史事件，剖析因果，吸取教训，来启迪、振奋、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如顾明义等人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就是这样的好教材。特别是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真实地记述了无数东北爱国军民，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爱民、爱家的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在白山黑水之间。

这套丛书是对东北爱国军民抗战作用和抗战地位的肯定，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军民的抗敌斗争，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史上具有怎样的一种评价，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学者们虽然各有各的学术见解，但他们较为重视的是看重于政府的正式抗战。由于东北军受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命令的制约，放弃了大片国土，一直没有以政府军的名义进行抗日斗争，因而出现了否定东北爱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否定它具有的抗战地位的论调。这种认识，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是有负于东北爱国军民的。我特别看重《“九·一八”抗战史》绪论中关于东

北爱国军民抗战地位的论述：“‘九·一八’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一抗战中，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的爱国官兵的英勇无畏的抗日行动，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准备了必要条件。它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史册上，为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世代所铭记。”这种看法的创见性和勇于探讨性，正是这套丛书学术价值的所在。

史料的翔实和珍贵性也是这套丛书的明显特点。“‘九·一八’事变丛书”除方志和史著外，还有两本资料书，即《“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他们以“九·一八”事变前后史实为主线，选取了辽宁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大量档案和满铁的档案，以专题为主线，编辑成书。中方档案中保存“九·一八”前后，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的大量原始档案，其史料价值颇高。但由于数量大，整理不易，这次发表的是其中的精选档案，仅此一点即称珍贵。何况，还有一些是首次发表的档案，更加重了它的珍贵性和使用价值。满铁，即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19世纪初，日本利用日俄战争后，侵占中国东北南部，设立铁路机构的机会，建立了一个名义上是铁路的管理机构，实质是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为此，他们花大力气加强对东北各方面的调查，并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积极参与了事变的策划和执行工作。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与它有着密切关系。战后它所保留下来的大量档案资料，被辽宁省档案馆所接收。这次以“九·一八”事变为主线，整理发表了满铁秘档，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中日双方档案集中在一套丛书中，首先提供给史学界研究利用，这就更加增强了丛书的学术价值。这种不同凡响的做法，也提高了丛书的使用价值。

（原载 1991 年 9 月 19 日《辽宁日报》）

“‘九·一八’事变丛书”王充闾、林声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包括：《“九·一八”事变实录》马越山编著，定价 16.50 元；《“九·一八”事变图志》林声主编，定价 38.30 元；《“九·一八”抗战史》谭译主编，定价 19.50 元；《日本侵占放大四十年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定价 27.00 元；《“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编，定价 24.70 元；《“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定价 23.50 元。

## 拓宽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 ——读“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李 侃

一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开始组织“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这套大型丛书已陆续出版。读了已出版的几种，有些感触想说一说。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与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民情，而国情与民情又都与历史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但是它又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完全从头开始。因此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

前一个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偏重于宏观的论述，或者就某一个学派（如儒学）、某一种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对这些地方文化，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整理，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和领域的拓宽，为地区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值得高兴的是，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将包括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文化也会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没有根或断了根的文化，也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不免于枯萎的。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良知，也

有悖于历史的科学精神。因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涣散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因此，出版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通过对祖国各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但是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而当今之世，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祖国优秀文化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心，则尤为重要。

对古代地区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付出艰苦的劳动，何况万事开头难。我赞赏“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作者们勇敢的开拓精神，和他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所做的有益尝试。也赞赏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和气魄，热心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精心组织、大力支持“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出版。像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对古代地区文化的研究在开始的时候，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世界上哪里会有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事物呢！

（原载 1991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包括：《台湾文化》胡友鸣、马欣来著，定价 4.50 元；《齐鲁文化》黄松著，定价 5.30 元；《吴越文化》张荷著，定价 5.50 元；《三晋文化》冯宝志著，定价 4.70 元；《巴蜀文化》袁庭栋著，定价 5.90 元；《荆楚文化》王建辉、刘森森著，定价 6.00 元。



## “龙”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浅议《龙的踪迹》

田久川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挺进到 20 世纪的今天。

龙的历史，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密不可分。纵观《龙的踪迹》全书的脉络和具体论述，可以清楚看出作者执笔之前早已在构想中明确：要探寻龙的踪迹，必须与探究中华民族形成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同步进行，而不能孤立地去寻龙说龙，使“龙”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史料发掘上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深度。

在论述“龙”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与方法。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肯定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热情洋溢地赞颂龙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于龙曾被巫教主利用过、曾被帝王垄断过的“那段不光彩的历程”，则予以历史的客观的剖析，深刻揭示了这一历程演进的原因及其危害性。

《龙的踪迹》内容甚为丰富，论述的层次极分明。全书 30 个专题，探讨了龙的起源、龙的原始形象及其变体、龙崇拜 的广泛化；阐述了原始龙族的来龙去脉，从蛇图腾到龙图腾的飞跃，龙的巫术意义和乘龙升天的奇妙幻想；科学评价了原始龙对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正确说明了祈龙求雨的真相；探讨了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龙与王权的关系和人龙关系的转化，着力戳穿封建帝王制造“真龙天子”的政治骗局；论证了王充对龙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考和他同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及其历史局限性；再现了封建统治者一心要独霸其龙而又难以“唯我独龙”的戏剧性历史现象，龙与农业文明长期停滞的内在联系以及龙与儒、道、佛教的关系；分析了龙与造型艺术、龙与民族团结、龙的凝聚力与渗透力以及龙对外国的广泛影响等问题。

书中有许多不囿于成说的新见解，而且十分精到。例如，关于中国古史的改朝换代，作者指出其“龙凤递代”的格局并列表显示之，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语言流畅，生动活泼，读之令人于心悦之际而诚服其论，集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之长，值得借鉴。

（原载 1991 年 10 月 17 日《书刊导报》）

《龙的踪迹》王维堤著，大连出版社 1990 年 1 月出版，定价（平）3.00 元，（精）4.90 元。

## 心系中国革命的美国女性 ——评《史沫特莱传》

李可可

史沫特莱女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是中美两国人民和妇女的光荣，是中美友谊的象征。史沫特莱女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康克清  
1990年6月题

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她，一个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的美国人，一个生愿为中国人民战斗，死愿葬身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女性，她就是蜚声世界的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活动和主要成就与中国有关，她的几部传世之作《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写的都是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国这块热土吸引着她，使她如醉如痴地眷恋着这块土地。《史沫特莱传》真实地记载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反映了她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和特殊贡献。

这部译著，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叙了史沫特莱从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偏僻农村的小姑娘，成长为享誉国际的著名作家、记者，为穷苦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献出了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直到客死牛津的坎坷曲折、艰苦奋斗的一生。这部著作是美国作家麦金农夫妇在多方支持和帮助下，追踪史沫特莱的足迹，访问她的好友和旧日对手，积累了大量资料，孜孜不倦勤奋工作14年的研究和写作成果。它令人爱不掩卷，读来一气呵成，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通过史料展现价值，当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必须占有充足的史料，而史料的多寡、价值的高低，则构成研究的深浅轩轾之分。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体现出鲜明的特点——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体现和表明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从1928年史沫特莱踏上中国的土地，一直到1941年离开中国回国，她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进入解放区，接触红军，宣传红军，宣传解放区并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康克清、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等人进行广泛的接触，对所得的印象做了详细叙述。例如：史沫特莱在延安，利用6个月的战争间隙，接触、采访延安的红军指战员，并与毛泽东、朱德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写出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一书。书中还通过史沫特莱在延安宣扬妇女解放，组织教跳集体舞、交际舞等情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延安生活。所谓史料丰富，还体现在史沫特莱与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徐志摩、杨铨、胡适、陈翰笙等人的交往，以及她与鲁迅、茅盾共同战斗的经历中。

史沫特莱通过茅盾与鲁迅结识后，由于双方可以用德语交谈而很快成为朋友。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她始终站在鲁迅一边，与鲁迅密切合作，翻译他的短篇小说。在鲁迅生肺结核病期间，她经常带着极珍贵的维生素、鱼肝油和营养品去看望鲁迅。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不愧为中国左翼

文化工作者的真正朋友。

书中还记载了史沫特莱与斯诺、艾黎、斯特朗、费正清等人的合作与友谊，这更是鲜为人知。在中国，她曾对后来中国的西方人马海德、白求恩等有较大影响。马海德就是被她那对中国人民苦难的精辟分析和西北红军的故事所吸引、感动，下决心留在红军根据地，并从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兢兢业业工作了一生。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有意识地避免了纯史学研究的枯燥，在丰富生动的史料中展现出史沫特莱的人物价值，这不能不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叙事议人，以事见人。对人的印象和评价，往往是通过具体实事来体现的。人物的性格构成塑造往往离不开脍炙人口和生动感人的事例。从大量真实、生动、感人的事例中，突现她这个“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思想、性格及其为穷苦人求解放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形成、发展和不断升华的过程。

“回想她之为作家、记者、革命者、中国之友、妇女运动家、国际主义志士哀乐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其中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可说是20世纪同辈人物中所罕见的。”茅盾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史沫特莱的性格特征。本书正是循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足迹，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感人的事例，展现了她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思想的个性特征。

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接触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杨铨、徐志摩等一些高雅的诗人、学者和作家。她多次出席一流的宴会，在月光下乘坐人力车。不久，她就感到，这种生活不是她的追求所在，很快清醒过来。她开始寻找在中国的合适位置。这时她得到了两个人的真诚帮助，引导她正确把握自己和正确看待中国的现实，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踏下了第一步坚实的脚印。

一位是共产党员陈翰笙，他指导并帮助史沫特莱对中国无锡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使她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及穷苦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尖锐矛盾，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有了最初的直观的认识；另一位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她带领史沫特莱对中国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从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的剥削压榨中，看到了中国工人深受苦难和压迫，使她感悟到，为中国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甚至献身是有意义的。从此她的思想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期她写出了《徐美铃》、《缫丝女工》等一批反映被压迫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史沫特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在日军对上海实行大轰炸时，她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积极参与报道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侵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时，史沫特莱在张学良总部每天作40分钟的英语播音，宣传抗日。她还多次营救我党地下工作者和领导同志。她曾与路易·艾黎一起乔装打扮，护送被敌人追捕的陈翰笙夫妇登上去海参威的苏联货船；多年后在1984年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身为中国社科院顾问的陈翰笙还讲到，“史沫特莱与我最熟，是我的救命恩人”；史沫特莱还与艾黎一起保护了担负共产党与张学良联络员工作的共产党员刘鼎同志。她以实际行动树起了一座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雕像，留下了一个个光辉的足迹。直到她客死牛津时，仍然向往着中国，是在

赶赴中国的路上，是应新中国的邀请，应共产党的邀请而来的。她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中国人民，骨灰永久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在她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国翻译出版了这部《史沫特莱传》，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让中国的子孙后代了解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部书是向中国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难得的教材。正如茅盾指出的，“她（史沫特莱）写的作品和写她的作品，应该是教育青年一代的极好材料”。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可以从这个“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的美国女性的言行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6 期）

《史沫特莱传》〔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定价 8.80 元。

## 有益的尝试

——读《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

### 盖 壤

《小学生文库》是东北三省有关出版单位协作编辑出版的一套供小学中年级孩子阅读的百科丛书。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品德教育类 10 本书，已经在全国发行。小读者们终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读本了。

鲁迅先生曾指出：“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 10 本书，正是为孩子们提供的一些内容新鲜的好作品。品德教育读物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帮助读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这就必定涉及一些思想理论上的问题。但是，对九、十岁的孩子讲理论，是不容易讲明白的。10 本书中，除《德育谚语》外，都是用故事来说明道理，用观点带故事，道理寓于故事之中。

孩子们是喜欢听故事的。故事里的道德思想，是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很适合儿童的思维特点和阅读兴趣。翻开这些书的目录，从小题目上看，一个个故事是独立的。像《讲故事谈学习》一书，就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陈景润摘下数学王冠上的明珠》这样的小故事，主题思想很明确。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它是用来说明“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这个问题的。故事按观点站队，为说明道理服务，要想搞得恰如其分，做起来很是繁难，像在大海里捞取规格大小都正好合适的珍珠，要很费些心思的。10 本书的作者，经过精心地选择和编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套书通过故事来体现德育方向。它既选了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故事，又选了普通劳动者的故事。现在小学生中间有一种现象，就是每谈理想必称“家”，很少有说长大当工人、农民的。书中故事说明了：不论专家还是普遍劳动者，只要具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精通本职工作，都有榜样的作用和道德的力量。

在故事的选择上，各书对中外古人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介绍了一批中外科学家和先贤名人的故事。如书中提到《王冕学画》、《周处改过》、《哥伦布决心去东方》等故事。这些人的道德体系是应当摈弃的，他们某些具体的优秀品质，又是可以作为新道德的养料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的知识性。书中故事凡是真人真事，一般都讲明了是哪朝哪代，有什么作为。这套书里写到的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农兵英雄模范、少年英雄和古今中外的先贤名人的故事以及民间故事、儿童故事、寓言故事等，共约三百多个，是关于历史和人物知识的集结，内容厚实而丰满。

思想品德教育读物是教孩子为人立世的，总要讲点道理。只有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就很难形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也不能圆满地回答小读者在品德修养上提出的“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问题。这套书没有长篇大论地讲道理，而是注意了怎样给孩子们讲道理的艺术，基本上做到了把道理讲得简明得体、通俗明白，不等小读者感到厌倦，就把它打住。更深的道理，则留给高年级读物去讲。

为了国家的振兴，中华民族涌现过无数的仁人志士，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相结合以后，又涌现了成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英烈和当代英雄。用先辈们的高尚德行陶冶后辈的心灵，是必要和可能的。这套书尝试着这样做了，尽管做得比较匆忙，有的故事选得不够新，文字还不够活泼，有些故事和道理的结合上还不那么顺理成章，全套书的总体规划，还有待系统和准确；但是，总算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是可喜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愿这套书为培养新一代美好的思想品德，起到有益的作用。

（原载《辅导员》1983年第5期）

《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定价12.10元。

## 一块急待拓宽的领域 ——评介《教学评价技术》

文安平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教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而且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评价被高度地重视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没有评价，就没有教育；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有成效的教育；没有先进技术参与下的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现代化的教育。

那么，什么是教学评价，什么是教学评价技术，教学评价技术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利用教学评价技术？《教学评价技术》一书，给读者提供了解决这些迷津的钥匙。

作者指出，所谓教学评价就是对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教育过程和它的后果以及对各个与之有关的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教学评价技术就是研究如何运用先进技术实现科学的教育评价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手段的理论领域。作者认为，教育评价的关键是要做出有关价值判断。

本书共分绪论、教学评价的设计与组织、教学信息的收集技术、教学信息分析处理技术、评价结果与决策五个部分。“教学信息的收集技术”是本书所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作者指出，信息的收集工作，是进行教学评价的准备工作，它决定了教学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收集学生的学习反映信息，有两个重要的基本指标，一是要快，即迅速、及时；二是要准，也就是误差小，水分低。

在本书中，作者详尽地阐述了测验法、观察法、调查法等几种主要方法。作者指出，测验法是教师通过让学生写论文，理解、解释某一资料，解答试卷等方法来了解该学生的文字水平、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作者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把每一学生的学习反映或行动一一地记录下来；教师通过上述的测验，可以从各种评价目的出发获取各种必要的资料，这样也便于教师因材施教。作者强调，在使用测验法时，由于被观察者深受外来压力的影响，情绪波动很大，所以，那些自发性的积极态度和兴趣指向等不可能充分表现出来，因而所收集的信息不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接着作者又论述了观察法。作者写道，观察法是在教育的自然场景下了解观察对象的方法，它与测验法截然不同，被观察者像往常一样地活动或学习，教师利用眼、耳、鼻、舌、身去直接获取有关资料，即通过和被观察对象平等地对话、谈心观察。这样做不会使被观察对象产生或感到任何的压迫感，故而收集到的情报资料自始至终都是被观察者的常态表现，都是自然的、真实的。作者还提出了第三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即调查法，就是通过调查问卷、调查表等形式收集一些有用的评价的资料。

“教学评价的设计与组织”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作者谈道，要完成教学评价的设计工作，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评价什么，从哪些方面评价，需要些什么资料。同时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明确评价目标并确定具体的评价目标；确定评价对象的样本选取方法；进行测量工具和收集技术的设计和准备。这些都是顺利完成教学评价的必要条件。作者还认为，教学评价的组织亦是教学评价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这是涉及到专家咨询、

人员培训、经费的合理使用、技术和手段的准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论述了“评价结果与决策”这一问题。作者指出，评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决策，如果没有决策或不能决策，证明评价是徒劳的。但是我认为，在这部分中，作者对评价和决策的关系、如何利用评价来进行决策，以及如何把评价结果运用于决策等一些问题没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或许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除以上所述内容外，本书还介绍了具体的评价方法、技术等问题。

总之，《教学评价技术》是一部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书，它不仅注意理论的高度，且更注重评价方法的实用性、有效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最新专著。而教学评价技术作为一块急待拓宽的学科领域，则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

（原载《成人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教学评价技术》张家全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7 月出版，定价 2.25 元。



根·青松·民族精神  
——《革命烈士遗书选读》读后

林 声

从沈阳到大连整整视察了一天高速公路工程，我实在是疲惫了。但是我翻开《革命烈士遗书选读》的时候，我被烈士们的民族浩气所吸引、所激动。面对这用血和泪铸成的遗书，我的眼睛湿润了，在模糊的字里行间，不时跃出烈士们的伟大形象。“饮弹从容向天啸”，“再世当为天下雄”，“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赶快成人来安慰地下的母亲”这些震撼大地的声音，伴随着棒槌岛的海涛，在我耳边阵阵响起。我的心随烈士的呐喊和大海波涛起伏不平，彻夜不寐，实在睡不着了，索兴起床伏案疾书，向广大读者和孩子们推荐本书。

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夜深岛静，我仿佛看到这 51 篇遗书立了起来，变成 51 棵高大的青松挺拔岛上，浩气凌空。而她的根深深深扎在烈士鲜血染红的桃花盛开的土地上，扎在我的心里。

《淮南子》中有这么一句话：“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高大的松树所以能万古常青，是因为它有盘根错节的根。被誉为“沙漠勇士”的黄柳和“海洋卫士”的红树林之所以能在风沙的袭击和盐水的浸蚀中生存，也是因为它有发达的根系。革命烈士所以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是因有着爱国主义的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是因为有它的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的骨气、民族的魂；这个根就是光荣的革命传统，就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要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坚持进行传统教育，不抓这个根基，是危险的，就像烂了根的大树，迟早要被大风吹倒的。

今天，当我们前进中遇到一些风浪的时候，正需要有青松的风格，黄柳的精神。要从革命烈士遗书中获得营养，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祖国大地上，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心同德闯过难关。在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同时，也必须治理好精神环境。我们希望有一股清新的海风来推动层层海浪，冲刷一下沉积在岸边的污染物。我们欢迎多出版一些像《革命烈士遗书选读》这样的好书，以鼓舞人们战胜困难的斗志，并为孩子们开拓一块永恒的绿洲。

康启昌同志是一位优秀的老教师，又是一位散文作家。出于对孩子成长的由衷关切，她从大量的史料中搜集、编纂了 44 位烈士的 51 篇遗书。烈士所处的战争年代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和平时期相距虽说半个世纪，但斗转星移，地覆天翻，如今的孩子对烈士斗争生活的背景多有渺茫。烈士遗言，言简意赅，文字质朴，玉振金声，内涵极为深邃，当代孩子恐怕也有理解消化的困难之处。康启昌针对这一情况，以其教师的耿耿丹心，殷殷教诲，以其散文家形象生动的笔触对每篇烈士的遗书都作了深入浅出的简释与剖析。思、情、理、趣皆有佳境。尤其是文中的抒情部分更高一筹。编者向孩子们坦露胸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陶冶孩子们的心灵，行文流畅，语言如银线穿珠，朗朗上口，很适合于诵读和讲演。我觉得这更是这本书的出类拔萃之处。

编者在《致少年朋友们》中说：“烈士生为革命理想而奋斗，死为革命后代树立闪光的航标。他们是不朽的人！他们一生为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生活是清贫的，但是他们用生命谱写的遗书、遗嘱都给我们留下了闪烁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诗篇。这是任何数字都无法表示的精神财富。”是的，烈士的遗书是我们进行传统教育的无价之宝。当前商品经济呼啸发展，在改革开放洪流中，泥沙俱下，忽视传统教育的现象是令人担忧的。在新形势下，如何对当代的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乃是强国富民的根本所在，我们只有抓住这个根，才会有挺拔常青的树，才会有哺育人类生存的绿洲。

我相信《革命烈士遗书选读》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孩子们的喜爱的。

（原载 1989 年 5 月 22 日《辽宁日报》）

《革命烈士遗书选读》康启昌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 3 月出版，定价 1.65 元。

## 辩证地对待儒学 ——兼评《中国儒学辞典》

魏鉴勋 高虹

儒学始于孔子。孔子开创讲学之风，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被视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学成为正统学说。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但仍以孔子为最大的圣人，说明玄学仍属儒道之融合。南北朝时代，儒学仍占主导地位。在宋代，张载、二程建立了关洛之学。他们对于先秦儒学义理的领悟较汉唐诸儒前进了一步。关洛之学传至南宋，号为“理学”。经历南宋、元代到明初，朱（熹）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学说。明代中期，朱学受朝廷尊崇，王（守仁）学在民间流行。明清之际，儒学又有重大的发展。但是比起西方的近代学术是大大落后了。“五·四”时期开辟了中国思想学术的新领域，儒学的正统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儒学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学说，一方面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支持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兼顾广大人民的生存需要，企求人民安居乐业。因而长期成为封建时代占统治的思想。今天，时代变了，我们的任务是辩证地对待儒学，对它作出理论的总结。

为了用简明的方式阐释儒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具体内容，综合、总结我国近年来儒学研究的新成果，批判地继承祖国的这一传统的文化遗产，并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一些线索，为初学者提供方便，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儒学辞典》。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为该书题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语，此儒学通义也。”张岱年先生为该书作序。他说，儒学曾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孔子肯定了人人都具独立的意志，人人都具有本然固有的价值。儒学提出的这种人格价值的学说，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学不谈鬼神，不重视生死问题，因而不是一般所谓宗教。然而儒学却在长期的历史中起了维系“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虽然具有类似宗教作用，却又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这是儒学的一个显著优点。同时，儒学却没有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这是儒学的一个严重的缺欠。因此，对于儒家学说进行科学研究，是今天学术工作者的一项严肃任务。

这部辞典收入词目 2200 余条。词目按人物、典籍著述、学派书院、概念词语四部分排列。选词原则为：以儒学为线，凡是能够反映儒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五·四”运动以来对儒学的批判继承、特别是近年来儒学研究的新成果，包括儒学学派的重要人物及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学派、书院、典籍以及阐释儒家典籍有创见、有影响的著述；反映儒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典章制度乃至宇宙观、人生观方面的重要概念、命题、词语等，均尽力收入。释义立足于文化与历史知识，突出学术思想。为了使辞典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注意了资料性、理论性与科学性之统一。在观点问题上，尽可能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反映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对有歧义的问题，或以一说为主，或两说并存。对某些人物或著作的释义，不求全面，只突出其儒学思想或对儒家、儒学之评议。

第一、贯通古今，脉络清晰。该辞典的宗旨在于通过词条写出中国儒学发生、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与基本过程。因此，作者在选词立目上，不但列入了古代的儒者和儒书，而且还收入近现代乃至当今研究儒学的著述和学者，人物如顾颉刚、梁漱溟、蔡尚思等。著述的词目有《论语》、《二程全书》、《清儒学案》等典籍和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经注、集解，还有近年出版的《孔子评传》、《孔子思想体系》、《评孔纪年》。就名词、概念的词目，收入了儒学发生、发展、演变、衰落以及后世研究儒学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如：儒墨显学、儒家八派、儒法斗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倒孔家店、新儒学、第三期儒学等都立有专目阐释。这样，不论从人物、著述、问题或者名词、概念等哪一个方面和线索，都能看出儒学发生、发展、演变、衰落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一部以词典形式写成的简明的中国儒学史。

第二、史料翔实，实事求是，观点准确。从该词典的条目与内容两方面看，对于一般不愿评论的人物与著述，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以客观地叙述与评论。如人物中为蒋介石、戴季陶立了目；对于在“文革”中批孔有过重要影响的杨荣国先生也给予了平实的历史评价。在著述的条目中，对有争议的杨荣国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赵纪彬所著《论语新探》等书，都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给予了历史的评述。多数条目史论结合。对存疑的问题，作者根据实际情况，或者择善而从，或者两说并存，供读者鉴别选择。

第三、集中择写儒学观点，对于其他问题则存而不论。该辞典为了突出儒学这个主题与主线，对于许多入目的人物和书籍，不是作全面的评介，而是只就其中的儒学思想进行简明的叙述。例如，《十批判书》、《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哲学大纲》等书，只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儒学观点，对其他问题则基本不涉及。例如在人物条目中，对古代的司马迁、近现代的胡适、郭沫若、范文澜等，也是只评介其儒学观点，不论及其他。因此，这部辞典的儒学色彩更加明显，同时，也就更具有专业性。

第四、注意概括和总结近年来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部辞书给人的突出印象之一，是把儒学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叙述，并根据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化史讨论的新进展，通过不同的词条重估了儒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既肯定了它的积极的一面，又揭示了它的封建性糟粕，对它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该辞典不仅吸收了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还为一些新成果独自立目。例如，《孔子评传》、《宋明理学史》等专著或文集。该辞典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专门评介了近年来拔地而起的中年学者，例如张岂之、李泽厚、张立文、冯天瑜、庞朴等人。为了反映国内儒学研究的新动态，还立专目评介了《孔子研究》杂志，介绍了“孔子基金会”和“中华孔子研究所”。这对于一般读者，特别是海外读者，是十分需要的。

第五、体系严正，方便读者。过去的辞典多数是以词目第一字的笔划多少编排的，该辞典则是按照词条内容的内在关系，运用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编排的。全书分成：概念、语词、人物、典籍、学派、学说等几大部分，每部分内部再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或者笔划多少前后排列，这样就形成一个以类相从的体系（书首目录）。读者若查寻同一类的词，或者意义相近的词，见词目表便一目了然。书后还附有按笔划排列的检索目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第六、规模适中，可读性强。该辞典属于中型工具书。文字流畅、通俗

易懂、深入浅出，对难懂的古汉语字词均做了简注。总之，这部辞典内容比较完整，观点比较新颖，收词范围宽而不杂，对问题的叙述要而不繁。通过它大体可以了解儒家文化的过去与现在、儒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各方面的问题，是一部独具特色，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

《中国儒学辞典》赵吉惠、郭厚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定价11.50元。

儒学万宗 一书总览  
——评《中国儒学辞典》

吕绍纲 金景芳

随着国家文化生活的振兴，近年来有一大批新编辞书问世。就我们所接触到的看，很有一些优秀之作，既满足了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宝库。由赵吉惠、郭厚安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是我们见到的所有优秀之作中更具特色的一部。

《中国儒学辞典》顾名思义是一部专业性辞书，它和人名辞典、地名辞典、成语辞典一类综合性辞书不同。综合性辞书只管搜集辞条，按笔画为序编排起来就是了。专业性辞书首当其冲的是分类，划定涉及界限。这项工作看来容易，实则不易。界限划大了，不该包括的包括了，便会使编出来的辞书不伦不类；界限划小了，该包括的没有包括，就要名实不副，起不到辞书的作用。《中国儒学辞典》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它包括人物、文献、词语、学派和书院四类。翻开书翻来覆去地看，从先秦到当今，儒学所占据的地场不过这四大方面，这四大方面也无不含有儒学的内容。书的编排也极合适。全书 2200 多词条分类排队，每一类中按出生和出书先后编次。读者可以当辞典用又可以当书看，可谓横看侧看均可，成峰成岭皆宜。

编一部专业性辞典，架构框架确定之后，更难处理的是选择词条。专业性辞典的词条不像综合性辞典那样广为搜集即可，专业性辞典除了少数大部头巨著之外，一般总要有所选择，尤其《中国儒学辞典》不过百八十万字，要想把两千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儒学人物、文献、词语、学派学院诸方面内容尽行囊括，是不可能的。单说文献一项，儒家的著作简直浩如烟海。古人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儒家关于六经的书多得难以计数，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大约 1600 种，《四库全书》以后至今不知更有多少种。这还不算子部、集部中与儒家有关的书。儒家人物从古到今多得很，各史《儒林传》里收入可观的一批，之外还有许多虽不专治六经却与儒家学派紧密相关的各类人物。《中国儒学辞典》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词条选得慎，选得精。入选词条有一定的原则。人物，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凡属儒学大家，或者构成儒学发展史一个环节的，一概不漏。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要选入。黄帝是华夏祖先，选入亦有必要。对今人的选择尤其煞费苦心。选入蒋介石、戴季陶，表明编者具有明确的辞典意识。辞典的工具书价值，要靠它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保证。最难选的是概念词语部分。这方面的东西多而杂，有的现成有的不现成。《中国儒学辞典》的这部分词条选得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能够反映儒家学派的思想面貌。近年来国内儒学研究渐兴，热心儒家研究的人多了，也出现了一批儒学研究的新成果，还成立了像中国孔子基金会那样的儒学研究团体。《中国儒学辞典》积极审慎地将这些新东西连同本世纪初以来涌现的儒学人物和儒学现象吸收进来，是可贵的。

撰写释文是编纂辞书最艰难的工作。主编者和撰写者的功力和社会责任心要在这里接受最后的检验。《中国儒学辞典》释文撰写得很有特色。首先，他们心中藏着一把尺子，即一切释文都贯彻儒学这个中心。与儒学无关的不写或者只是略提而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如此，会把一部专业性辞典弄

成杂凑。这一点也很难为，因为几十个人的编写队伍，思路不容易协调一致。词条中有些人物不是专门治儒学的，或者名气主要不在儒学方面，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则着重介绍他们的儒学见解和儒学成就。近代以来专门治儒学的大家越来越少，对这些人的释文也是如此处理。胡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诸家，只评介他们的儒学一面，基本不及其他。李大钊词条释文只介绍反映他马克思主义儒学观的几篇文章及其对孔子的基本态度，写得扼要简明，具有代表性。对于文献部分的处理同样遵循这个原则。像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及古代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古人的一些集部书，都不是专讲儒学的，释文只介绍它们的有关儒学部分。

《中国儒学辞典》的释文撰写得平实无华，据实说话，读起来令人觉得可靠可信。以往的旧辞书多有一个特点也是弱点，就是只罗列史料，排比前人成说，而作者绝不折中。近年以来又有些辞典急于发表自己的议论而根据不多。儒学是意识形态的学问，没有一点论是不行的。《中国儒学辞典》释文的作者们处理得较恰当，既介绍史料又不罗列史料，既发议论又不空发议论。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或择善而从，或诸说并存。比较难处理的是政治上的反面人物，他们却也处理得很得体。曾国藩、蒋介石、戴季陶等条的释文，只是客观地介绍其关于儒学方面的政治、学术思想，不加品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影响也有争议的人物杨荣国、赵纪彬及他们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语新探》，写得也公道、实在，并无旁生枝叶之处。如果我们说这部辞典释文的作者们心中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不为过的。

这部辞典的释文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它们在评介儒学人物、儒学文献、儒学词语的时候，都不忘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和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化史讨论的新进展。释文之中渗透着批判继承的精神，它献给读者的都是真东西，精华和糟粕揭示得也清楚。

辞典的文字，要求要言不烦，规范准确。这部辞典的绝大多数释文是做到了的。而且话说得都很顺畅。虽然文白间错，但是并不觉疙瘩。有些释文还颇富文采，饶有生趣。有些生僻难懂的古代词语还加了简注，便于阅读。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3期）

## 多领域语体研究的新成果 ——读《公共关系修辞学》

周家筠

近几年来，语体研究在我国修辞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1985年6月在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一次语体学术讨论会；同年8月的中国修辞学年会以及1986年7月的华东修辞学年会均以语体为中心议题；从1986年起，《修辞学习》杂志还开辟专栏，讨论语体问题。几年来，公开发表的语体论文逾百篇，还出版了论文集《语体论》及多种语体研究专著。尽管语体研究在修辞学界方兴未艾，但语体学在我国毕竟还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对各种类型语体的特点作全面、具体、深入研究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由吴士文、唐松波教授主编、11位专家教授共同撰写的《公共关系修辞学》一书，则是一部从多个领域去研究语体特点的专著。它涉及面广、内容扎实、实用性强、写作严谨。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修辞学界已开始比较深入地向着功能语体这一领域进军，而且，它还将推动90年代甚至21世纪动态功能语体研究的大发展。

该书名为《公共关系修辞学》，这“公共关系”一词，在学科上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的手段使自己与公众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一种活动或职能”。（居延安《公共关系学导论》）此书所指的“公共关系”显然不是严格的学科上的含义，而是泛指人们在各个交际领域里与公众的交往关系。因而，“公共关系修辞学”即指人们在各个交际领域里与公众交往活动中的语言修辞问题。既然是公共关系修辞，就必须涉及多个领域。本书言及的交际领域修辞，计有行政、法律、外事、新闻、科技、商业、教育、体育卫生、日常口语、演讲等10个。

为什么要进行多领域的修辞研究，本书“前记”说得清楚：“现代的社会，交际范围日益广泛，修辞学已不只应用于文艺领域之中了，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各个领域之中，所以，对诸多领域的修辞问题做不做探索，关系到更多的人。特别是从事公共关系的人，能否真善美地表达信息，能否有效地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这段话可视作本书的写作动因，也阐明了进行多领域修辞研究的意义。

多领域地研究修辞，从许多方面拓宽了语体研究的范围，这是此书对语体研究的具体贡献。首先，本书跳出了以文学语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窠臼。长期以来，我们的修辞研究兴趣多在文学语体领域，这样既不能全面反映我们的语言运用实际，对人们的语言运用起指导作用，又束缚了修辞学研究的手脚，也使修辞偏于所谓积极修辞的研究。作者以交际领域为着眼点，冲破文学领域这个窄窄的范围，进入了一个宽阔的天地，去研究诸如法律、商业、外事、教育……等等领域的语言运用问题。这样就使修辞走进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使人们感受到了修辞的实用价值，明白了修辞不只与文学家有关，而且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密切相联，修辞学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其次，本书突破了“词语锤炼——句式选择——辞格运用”这种“三维式”的修辞研究体系。修辞研究最实际的意义是指导语言运用，而多年的实践表明，“三维式”体系由于脱离特殊而重要的语境——语体，就不能全面反映我们的语言运用实际，也就难以讲清修辞规律。为什么？因为各种不同的语言



应用领域，对修辞都有不同的要求，怎能用一种模式去框住丰富的语言实际呢？所以，“三维式”实用价值不大，难于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充分认识到语境对修辞的制约作用，特别重视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交际目的和内容对修辞的重要作用，于是根据不同交际领域，把不同语体运用不同的语言材料和语言手段而形成的语言特点揭示得很充分。这样的研究成果对语言运用和语言规范才具有真正的指导作用。第三，多领域地研究修辞为语体分类打下了基础。本书不是以语体为纲设题，而是以交际领域为纲设题编写的。但是在“引言”中作者明确指出修辞多领域与语体是有联系的，“有联系，是说多领域是多种语体形成的必要条件”。（第35页）就因为不同交际领域所用言语特点不同，就成了不同语体存在和相互区分的根据，也就成了语体分类的依据，所以，从多领域去研究修辞，客观上就为语体的划分提供了语言事实根据。不同领域的语言特点研究得越细，语体分类就越容易、越科学。本书对10个交际领域的语言运用特点进行了单独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某一语体类型的语言特点作了全面细致的描写，无疑，这对语体分类作出了具体贡献。

多领域地研究修辞，突破了以书面语体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充分重视了口语修辞的研究，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们深知各种交际领域不都是书面形式进行交际的。比如日常交往、演讲、教育、商业、广播等领域主要用或多用口头形式进行交际，而法律、外事、新闻、体育卫生等领域则既用书面形式，也用口头形式交际，因此，他们在多领域的修辞研究中书面语和口语并重。本书每一领域都涉及了口语和书面修辞，尤其重视口语修辞的研究，还设专章论述日常口语修辞。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口语修辞，作者之一的潘庆云就曾经说过：“语体学固然不可忽视对书面语的研究，对各种使用情境中口语的研究更不容偏废，因为注重口语研究乃现代语言学区别于传统语言学的本质特点之一”。（《语体论》第56页）在“日常口语修辞”一章，作者强调“口语能力是一个人进行交际、贡献才能、适应社会最基本的一种能力”。（第510页）他生动地阐述了口语修辞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中，随时需要我们讲几句适当的话，以求得思想感情的交流，意见的沟通，事情的解决。比如当一个人正处于烦恼、愁闷或忧伤、痛苦之中时，你及时用适切的话语进行安慰，便会使其从不佳的心境中解脱出来，振奋起精神。特别是对于心灵受创的失望者来说，成功的安慰，简直就是良药……”（第510页）从这些话不难看出他们如此重视口语修辞的原因了。

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是本书的又一特点。读完本书后，给人很深的印象是内容丰富。全书共11章，论述了10个交际领域的语言修辞特点，另加一个附录专论爱情修辞。作者们对各个领域的语言特点的阐述没有停留在表层浅层，而是作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有统一的要求，又不拘一格。每个领域都有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篇章结构的详尽描写，又有各领域特殊修辞的阐述。对这10个领域的各种类型一般都不作全方位的描写，而是选择重点进行阐述。例如法律修辞只论述了立法修辞、刑事侦察修辞、预审语言修辞；行政修辞主要论述行政公文修辞；商业修辞主要论述柜台营业用语；教育修辞主要论述教学语言修辞。重点论述的都是交际里常用的分支语体类型，很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书内容扎实，还表现在用例十分丰富。作者们从当代语言运用实际中搜集了各语体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例如行政修辞采用了

各级党政机关的各类公文材料，计为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批复、公函等 20 多种；法律修辞采用了各类法律材料，计有各种法规如刑法、婚姻法、宪法、环保法、刑事诉讼法，各类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起诉书、上诉状、现场勘察笔录、辩护词，共 20 来种 50 多例；外事修辞采用的语言材料包括各类书面形式如协定书、条约、照会、备忘录，口头形式如联大发言、祝酒辞、答记者问、讲话等近 20 种 70 多例。由于各领域的语言规律都是从如此丰富新鲜的语言材料中认真总结出来的，就使文章有血有肉，有论有证，有规律有方法，不论是内行还是外行读来都觉受益不浅。内行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写作的能力，外行可以获得各语体从词语、句子、篇章到标点的全部运用规律，用以指导自己的语言运用。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国际国内、各行各业之间的交际日趋频繁，人们与社会各方的接触越来越广泛，要求语言艺术具有巨大的威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从这点说，《公共关系修辞学》一书，对人们的语言交际是有帮助的。

本书虽是合作成果，但整体风格比较一致，这是难得的。不过，由于作者们各处一方，就难免有不够统一的地方。如少数章节的节以下小标题中，有的内容不明确，失去提示作用；有的概括不够，可以合并；还有的不是修辞方式排列入修辞方式之中。另外，由于排印错漏，影响意义理解的地方也不少，这是重印时须要改正的。

交际领域十分广泛，愿大家写出更多领域的修辞佳作，使语体园里鲜花盛开！

（原载《修辞学习》1990 年第 1 期）

《公共关系修辞学》吴士文、唐松波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定价 8.70 元。

## 中华古算光耀千秋

——评郭书春《九章算术 汇校本》

王渝生

郭书春先生以“十年磨一镜”的精神，完成了大著《九章算术 汇校本》。著名数学家、数学史家吴文俊、严敦杰先生作序，历史学家李学勤作跋，书法家启功题签。这是数学史界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

《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也是可与古希腊《几何原本》相媲美的世界数学名著。吴文俊教授认为：“《原本》开创了公理化演绎体系的纪元。其思想方法与方式，在数学的现代研究中占据着一种统治地位。”而“在我国，则《九章》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方法，阐扬了以算为主以术为法的算法体系”。并且“由于近代计算机的出现，其所需数学的方式方法，正与《九章》传统的算法体系若合符节。《九章》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架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决非过甚妄测之辞”。（《九章算术 汇校本》序文）严敦杰教授也有诗云：“若把《原本》比《算术》，此中翘楚是《九章》。”（《九章算术 汇校本》序诗）数学大师和数学史家慧眼双具，不可谓不具远见之明。

近年来，国内和国际数学史界都形成了研究《九章算术》的热潮。然而，《九章》传世两千年来，屡经转抄、注释、刊印、翻刻，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中，误文夺字在所难免，历代校勘挂漏尚多，有些地方因一字之差而失之千里，有些段落难以卒读而使古算精华湮没不彰，极大地影响了对《九章》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因此，校勘出一个好的本子，虽然是一件十分艰苦困难的工作，却成了《九章》研究的当务之急。

《九章算术》于汉代成书之后，注家蜂起。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公元 263 年曹魏大数学家刘徽的注。刘徽提出了许多数学定义，用演绎逻辑对《九章》的解法、公式进行了全面证明，创造了包括用极限思想证明圆面积公式和四面体体积公式在内的若干新方法，理论贡献尤为卓著。其后，南朝祖冲之、唐李淳风、北宋贾宪、南宋杨辉都对《九章》作过注释和研究，并各自有所贡献。北宋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秘书省首次刊刻了刘徽、李淳风等注本《九章算术》，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 年）荣 以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为底本刊刻了《黄帝九章》，但这两种刻本今已不传。自南宋到清初，则有鲍瀚之刻本《九章算经》（公元 1213 年）、《永乐大典》本引《九章算经》（公元 1408 年）和石研斋抄本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公元 1261 年著，约 1781 年抄）这三个不同的残本流传至今。清中叶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九章算术》，先后整理了三种版本（公元 1773—1777 年），其后由于抄录、排印、翻刻的精粗，又形成了十几个各有歧异的版本，广为流传，但其内容大都宗于戴本。戴震的校勘，“颠扑不破”的地方自然不少，然而“师心自用”之处亦甚多（钱宝琮语）。戴震自《永乐大典》辑录时衍脱舛误十分严重，在屈刻本、孔刻本中又进行了校勘学上不允许的若干修辞加工。这就造成了其后一两百年《九章》版本的混乱状况。戴震以后，李潢于上世纪初，钱宝琮于本世纪中，对《九章》的校勘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钱宝琮的《算经十书》校点本（公元 1963 年）中对《九章》的校勘标点，纠

正了戴校中的若干重大错误，指出了校勘《九章算术》的正确方向，其功不可殁。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钱校本在版本使用上有若干失误，对戴震从《永乐大典》辑录时的粗疏及后来乱施修辞加工没有认识，尚有若干不能尽如人意之处。郭书春先生以十年的功夫，悉心搜罗各种版本，研究了它们的异同及嬗递关系，纠正了前人若干误解。他以恢复《九章》古书原貌为宗旨，取南宋鲍刻本一至五卷、由新发现的烟雨楼藏聚珍版和四库文渊阁本对校而成的《永乐大典》辑录本六至九卷及刘徽序为底本，另取十几个不同版本参与汇校，一是剔除自戴震起二百年来人为造成的非校勘性版本混乱，二是甄别戴震、李潢等人的校勘，包括原文不误而臆改和原文舛误而校改失当这两种情况，三是继续校勘原文舛误的文字，得此汇校本《九章算术》，提供了各版本异同的全面资料。有效勘记 1730 余条，内恢复被戴震等人改错或加工过的不误原文 480 余条，为展现《九章》原书的本来面目，正本清源，作出了新的突破性的贡献，实在是可喜可贺。

郭书春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他重校《九章》的原则：“遵循我国几千年来校勘学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方法，掌握古籍衍脱、误倒、讹舛的一般规律；利用古文字学家关于古籍及古汉语字词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求对《九章算术》正确句读、理解古文古意，准确判断原文是否真正舛误。只能校勘确实错误的部分，并且尽量保留原文。对一时无法校改的地方，采取‘多闻阙疑’的原则，不可轻改原文。确实需要校勘并且已有成熟的校勘意见的地方，也要保留底本的本来面貌。”同时，要“认真研读《九章算术》本文及刘徽注、李淳风等注释，弄清它们的数学内容、逻辑方法、篇章结构、时代特点及其在中国数学史上的位置，以求对舛误之处作出合乎数理、合乎原意的校勘，避免以错改错，更要避免将古人未犯过的错误强加于古人”。他认为，当前校勘《九章》的重心，仍是像钱宝琮所做的那样，恢复被后人错校或加工过的不误原文。例如，《九章》卷三衰分章“今有生丝”问，刘徽注鲍刻本作“凡所得率知，细则俱细，粗则俱粗，两数相抱而已”，大典本基本同此，唯“知”作“如”，与下连续，亦通。戴震却不加说明地改作“凡所谓率者，细则俱细，粗则俱粗，两数相推而已”。郭校指出：“这种改纂，文字上可以读通，然仔细推敲，意思却发生了变化。方田章‘经分术’注中刘徽提出了率的定义：‘凡数相与者谓之率。’根据率的定义，刘徽在这里提出了率的重要性质：‘细则俱细，粗则俱粗，两数相抱’。这里刘徽是针对所求得的率说的，戴震的改纂失却了这个意思。至于改‘知’作‘者’，改‘抱’作‘推’，也是没有必要的。”“两数相抱”比“两数相推”更为贴切。又如《九章》卷八方程章方程术中，以中行求中禾之实时，下实中会出现“以法为母”的情况，刘徽注云：“以法为母，于率不通。故先以法乘，其通而同之，俱令法为母。”戴震将“其通”与上连读，改为“以法乘其实”。郭校指出：“‘其通而同之’，有时作‘其同而通之’，是中国古算术语，《九章算术》注中凡数见，原文文从字顺。”再如，《九章》卷九勾股章“持竿出户”向刘徽注大典本（杨辉本同）“满此方则两端之邪重于隅中”，戴震改“邪”为“廉”，郭校指出：“该句中的‘邪’字，其音、义均同‘余’”，“此条刘徽注是说弦方中勾矩与股矩的两端之余恰恰在弦方的两隅中相重合，其重合部分应满黄方。原文不误”。还有，《九章》卷五商功章方亭术刘徽注棊验法的最后总括用棊的情况时说：“用棊之数：立方三，涂堵、阳

马各十二，凡二十七，棊十三。更差次之，而成方亭者三，验矣。”戴震未弄懂其数学内容，将棊字与上连读，“十三”与下连读并改为“十二与三更差次之”，改变了刘徽的原意。郭校详细分析了此段用棊验法验证方亭体积公式的数学内容，指出“原文无论是古文还是数理均无讹误”。以上是郭校恢复原文不误而被戴震臆改的几个例子，可谓平了二百余年来的冤案。至于原文舛误，后人校改失当者，如《九章》卷九勾股章“户高多于广”问刘徽注大典本：“令矩句即为幂，得广即勾股差，其矩句之幂，倍为从法，开之亦勾股差。”戴震、李潢、钱宝琮都各有不同的校改，增字改易太多，失却原意。郭校则指出，矩勾之幂是 $b^2 - a^2$ ，“‘令矩句即为幂，得广即勾股差’一句无任何衍文夺字”，“下面的三句，只是‘倍’字下脱一‘句’字，余皆不误。‘其矩勾之幂，倍勾为从法，开之亦勾股差’是一个其根是勾股差的完整的开带从平方”，所言极是。还有一些字词，戴震以前的传本中，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戴震以后，尚有取舍不当者，如《九章》卷二粟米章今有术刘徽注鲍刻本“又完言之，知粟五升为粳米三升；分言之，知粟一斗为粳米五分斗之三”，“完言之”聚珍版、四库本作“究言之”，此或大典本原误，或戴震辑录时误抄，其后一直沿袭下来。郭校指出，鲍刻本“无讹误。‘完’，完整的意思，‘完言之’指以整数情形言之，与下‘分言之’指以分数情形言之对举，非常贴切”。此外，还有前人漏校的地方，如《九章》卷二粟米章其率术刘徽注鲍刻本“其率如欲令无分”。郭校指出，“此‘如’字，当作‘知’。‘如’、‘知’形似而误。袁分章‘今有生丝’问‘凡所得率知’之‘知’字，大典本作‘如’，可为佐证。因此，此条刘徽注当作‘其率知，欲令无分’。此处‘知’训‘者’”，清楚地表明其率术意在求整数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近 10 年来，郭书春先生发表了近 20 篇有关《九章算术》的论文，内容涉及《九章》的成就、特点，刘徽的极限思想、体积理论、率的应有、逻辑思想、理论体系，刘徽的思想渊源、籍贯，以及《九章》的版本和校勘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对《九章》进行汇校，“以科学的态度，绵密的功夫，将书中多少世代积存的种种疑难，逐次梳理清楚，实在是《九章》研究的一大贡献。他的这部汇校本，确能订正异同，使读者如校雠家所说，‘读此一本无异遍读各本’，成为《九章算术》最佳本子，也给今后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李学勤《九章算术 汇校本》跋）

在《九章》正文前，作者以 10 万字左右，介绍了《九章算术》和刘徽注，以及李淳风、贾宪、杨辉等工作，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课题最全面的论述，吸取了作者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成果，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九章》正文后，附录了唐李籍《九章算术音义》，历代关于《九章算术》的序跋，以及参考文献，是为研究《九章算术》的宝贵资料。

郭书春先生这项浩瀚的工程，得到了许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博物院、图书馆和出版社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为这所大厦添砖加瓦，情景感人。当然，这一名山大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校勘记中存疑者尚有二十余条，而已校条目中可以商榷处恐亦难免。我们衷心祝愿郭书春先生和数学史界各位同仁在《九章算术》的校勘和研究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让中华古算的瑰丽珍宝重现斑斓，光耀千秋！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 年第 1 期）

《九章算术 汇校本》郭书春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  
定价 15.00 元。

##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李文林

郭书春教授的《九章算术 汇校本》，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九章算术》不仅是中国数学史也是世界数学史上的光辉经典。由于它在数千年的流传中历经转抄、注释与刊刻，特别是经清代戴震整理之后，在版本上存在着混乱。因此对这部经典著作的不同版本加以汇校，以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传本，乃是学术界长久翘首以待的一项基础性建设。郭书春的汇校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郭书春的汇校是在他本人多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深入比较、分析了现有的各种《九章》版本和历代名家的注释、校勘，并且综合参考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欧洲与日本的学者）对《九章》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九章》研究、校勘之大成，同时又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校勘的规模与深度上都达到了目前国内外《九章》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的出版，是继钱宝琮先生校点《算经十书》之后中国古典算经整理方面的又一突出成果，必将产生广泛影响。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书林集评》）

## “文化热”、“西学热”的历史透视 ——读《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

王本浩

近年来，“文化热”、“西学热”正在思想界兴起，反思中国传统意识，评价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思考中国新文化、新哲学建构，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面对这样一股学术思潮，长时期内，人们更多地是就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意识和重新评价西方思想文化问题提出主张，而很少有人对这场思潮本身进行认真的思考。《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一书，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反思当代“文化热”、“西学热”的学术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的作者赵德志，有感于人们对当前“文化热”、“西学热”的各种疑难，依据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史实，对当前的文化讨论热潮进行了一番历史的透视。对人们所关切的“文化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该书的出版，对于人们解决西方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的关系问题，解决西方意识与作为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抵制“全面西化”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该书深掘了当前“文化热”、“西学热”的起因。当前的“文化热”就是开放后涌入的西方意识冲击的结果。这正如该书绪论中指出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引进。而西方思想文化，又在根本上与中国传统意识，与作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这种冲突也日渐加剧，从而必然引起人们去思考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意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作者认为，文化讨论中出现的“‘儒学复兴论’，直接就是对西方意识挑战的一种回应；而‘彻底重建论’，则表现了对西方意识的一种全盘迎受的态度；至于‘西体中用’论，在实际上更是要求把西方文化从总体上移植于中国”。（《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第7页）作者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把当前的“文化热”放到当今世界大文化的环境中，放到中西思想文化新的冲突的大背景中去进行考察，这就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层面去了解当前“文化热”发生的根源。

其次，该书探索了当前“文化热”中各种意见的理论渊源。作者对当代“文化热”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种种论争作了全面深入的比较，指出今天的讨论与历史上的论争，都是要解决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发源于西方，但同时又超越西方而具有世界意义的西方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是近代以来人们努力尝试解决但最终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是建国后应该继续解决但最终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今天的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讲，乃是历史上论争的继续。因此，这场论争一开始便是有重复着历史的某些特征；争论中的一些意见，实为历史上一些主张的滥觞。如作者指出的“在历史上的论争中，曾先后出现过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的‘回归古典论’，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坚持文明多元主义的‘中西融合论’……当今所谓的‘彻底重建论’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便有某种相通之处，而所谓的‘儒



学复兴论’，就更是 40 年代新儒家‘中西融合论’的直接继承了”。（《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第 9 页）作者的上述比较与追溯，并不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一简单的比附，并没有得出现实只是历史完全重复的简单结论。相反，作者仍深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几个重要不同。这就是：第一，论争的时代背景不同。第二，论争的性质、内容不同。第三，论争的目的不同。作者这种比较和追溯，既揭示了当今文化讨论与历史上中西文化论争的内在联系，又严格区分了两者几个方面的重要不同。这就使人们对当今的“文化热”以及其各种意见有一正确的认识与估价。

再次，该书分析了当前“文化热”中各种意见的得失。当前“文化热”中的各种意见，无论是“彻底重建论”、“儒学复兴论”，还是“西体中用论”，实际上都是试图借文化问题的讨论来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途径。那么这些主张各自的得失如何呢？作者从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对当前“文化热”中的各种意见进行透视、展开批评。在作者看来，当今的文化讨论与历史上的文化论争，既然同是西方意识冲击的产物，两者就必然遇到相同的问题。因而，对历史上论争的回顾，便可以帮助人们从中获得某些借鉴，供人们评价今天各种意见时参考。那么，历史究竟给人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呢？作者认为，历史上论争中出现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作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西方意识撞击面前作出的选择，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合理因素，也都各有偏颇。以陈独秀为首的一代新青年们，高度强调了西方意识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强烈要求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必须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保持同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也同时否定了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忽视了新兴阶级的需要，因而在实践上也就很难行得通。40 年代的新儒家，一方面注意到了西方意识的世界意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因而主张引进和吸收西方哲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传统意识的某些永恒价值，因而主张中西意识的融合应以民族的固有为本位。但是，他们并没有纳进新兴阶级的需要和新形成的民族精神，因而他们的融合工作，与中国社会的时代发展方向不尽相合。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历史经验，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根据中国新兴阶级和新时代本质与发展方向的要求，从输入的思想中剥离出代表人类思想文化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一方面又根据民族的新的精神要求和革命具体实践的需要，把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通过回顾与分析，作者最后逻辑地得出结论：经过“五四”后 70 多年的争论与探索，中国人民已经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中国唯一可能的现代意识。因而今天的文化讨论，应该集中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比较之下，所谓传统意识与西方意识的关系问题，还只是一个附属。今天的“文化热”中的种种意见，多围绕中西意识的关系来展开论辩，似乎与中国新时代的主题不尽相合。一句话，作者认为，在今天，我们要解决西方与中国传统意识的关系问题，更要解决西方意识与作为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而在这方面，历史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迎受，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它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作者贡献给人们的这本书是一部从历史的角度对当前“西学热”、“文化热”进行再认识的著作。因为立足于对现实的“历史透视”，

作者的笔墨多用于史，然而最终又是为现实指示出路，因此，作者在叙述史时又兼及到论。如此，本书便具有深入浅出、材料翔实以及立论新颖的特点。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章节只注重史实的叙述，分析评论的不够，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评论还不够展开。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是一部优秀学术专著。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

《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赵德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定价2.50元。

## 自古英雄出少年

——读纪实文学丛书《中华少年风采录》

高洪波（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刚刚举行了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我有幸获得了一套有意义的纪实文学丛书《中华少年风采录》。粗粗翻阅，便感到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壮举，同时也是报告文学园地中足堪自豪的一簇奇葩。更有趣的是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与我同名同姓，读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这位高洪波写在每本书前面的“编辑絮语”，感到亲切自然，内中充满着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于是认定自己也有义务为这套丛书做点工作。

宋任穷同志在《中华少年风采录》的序中指出：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又接着总结道：“英雄少年们走着平凡的路，却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我认为这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概括，在平凡与非凡的转换过程中，我们的少年英雄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在他们而言，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方式，无论是坦然卧铡的刘胡兰，无论是高歌就义的欧阳立安，也无论是60年代的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是新时期的赖宁，他们一步步走向崇高，走入伟大，但却在平凡之路上，踏出了闪光的足迹！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套丛书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少儿读物内一度失落英雄的空白，仅从11卷的卷名就可以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英勇就义卷》、《勇敢斗敌卷》、《舍己救人卷》、《舍身为公卷》。“勇敢”与“舍己”成为衡量英雄的重要尺度，我以为比较准确。另外几卷，如《身残志坚卷》、《助人为乐卷》、《勤奋学习卷》和《发明创造卷》，把英雄与杰出的内涵具象化，具象化为或与病魔抗争，或同自己的惰性决战，在战胜病魔或惰性的同时，小主人公的生命也得到了升华。值得一提的是最后3卷：《文化艺术卷》、《体育健美卷》和《优秀集体卷》，这3卷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一批杰出少年在文化艺术和体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早慧、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刻苦、他们的理想，在成功的星座上，展示了给小读者的却是另一种真实：孙佳星的歌声中饱含着对父爱的呼唤，王亚妮的图画纸上涂抹的是纯真和朴素，邓亚萍这位在11届亚运会“狠”得出名的乒乓球冠军，却小小年纪就品尝了竞争的坎坷……感谢报告文学作家们形象生动的描绘，把这些杰出少年的成长过程一一展现出来，我们才进一步明了宋任穷同志的精彩总结：伟大起步于平凡。

儿童文学领域里，报告文学从来不是属于“强项”，这固然是因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品种本身带有的时代感、新闻性和批判性限制了它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发挥，同时也由于缺少应有的倡导和园地。实际上报告文学是儿童文学领域中极其有实力的一支劲旅，因此透过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这11本书，也检阅了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从老一辈作家中的陈模，到中年一辈的萧道美、刘猛、马光复、须一心，直到新崛起的刘保法、孙云晓、王慧骐，都以充沛的激情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少年们立传，他们的笔端宣泄出的深情，的确值得儿童文学作家们学习。我们设若置身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还可以发现一批极优秀的少年英雄：岳云、夏完淳，属于有定评的英雄，自不待说；像18岁起兵的李世民、小小年纪智

擒鳌拜的康熙大帝，也不妨一书！此外还有智称大象的曹冲、雄视唐代诗坛的李贺、王勃，也都无愧于“神童”的称谓，当然写这些历史人物，需要别一种功夫，但我想作为“中华少年”这一名称的内涵而言，他们亦当之无愧。

总之，能读到这么些有意义的好书，我相信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件愉快的事。读好书如交好友，交友又贵交心，我的同名人、辽宁的高洪波曾希望“这套书能在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的作者、北京的高洪波没有理由拒绝他的热切希望，所以举双手赞成，并希望两个高洪波的希望早日变成现实。

（原载 1990 年 12 月 1 日《新闻出版报》）

《中华少年风采录》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定价 26.00 元。

## 各路英才迎面来

——读《中华少年风采录》随感

高进贤

一位领导同志在视察了中小学图书馆后，曾感慨地指出，可供孩子们读的书实在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由全国少工委编辑的11卷本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华少年风采录》正是适应了我国儿童的迫切需要，在金秋时节应运而生，的确是为孩子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正如该书责任编辑高洪波所说，编这套书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先要在全国挑选出一百多个人物和集体，在短期内撰写出170多万字，没有宏大的气魄，没有写作高手，是很难完成的。

这套丛书以生动的文学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建党以后60年间少年儿童中的杰出分子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在对敌斗争、思想品德、文化艺术、科技体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光辉业绩，是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缩影，是一次历史的检阅。

该书总的主题是弘扬革命理想，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各卷又各有一个中心，如《英勇就义卷》的11篇报告文学，分别写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与敌人英雄搏斗壮烈牺牲的11位小烈士的英勇事迹。作品以雄浑的笔调，饱满的激情，讴歌了这些小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质。作品通过起伏跌宕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示了令今天的孩子们感到新奇和生动的战斗生活，所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又如《勇敢斗敌卷》、《舍身为公卷》、《舍己救人卷》、《助人为乐卷》、《身残志坚卷》都是反映中华少年高尚品德及其拼搏献身精神的，但每卷又各有特色。《勇敢斗敌卷》表现了少年儿童在党的教育下为正义为真理而战的英雄本色，这些故事既写了他们使敌人胆战心寒的场面，也写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明创造卷》，这可能是当今少年最感兴趣的。全书记叙了11位小发明家的动人故事。这些小发明家热爱科学，勤于动脑，善于动手。他们立志成为把握未来新世界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从而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作家们从日常生活入手，写出了小主人公的思考，钻研；写出了他们美丽的梦想；写出了他们迎着困难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应该说，这本书是广大少年儿童热爱科学，立志成才的一个缩影。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革。作为反映少年生活风貌的文学作品，自然也适应生活的变革而有所前进和提高。过去有人把少年儿童要么写成高大完美的典型，要么弄成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概念化的影子。这些都不能真实地反映少年儿童的风貌。《中华少年风采录》的编著者在这方面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们特别注重故事的趣味性，在发掘孩子们身上闪光点的同时，还十分强调捕捉他们生活中有趣的、新奇感人的东西，力求使人物有血有肉，写出“灵性”，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这套由万里同志题写书名的丛书，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书对每个人物的生平和事迹都作了真实的介绍，从历史人物张六子、刘胡兰到新华报童，到当今的聂卫平、马燕红、刘倩倩，交口少年科学院等等，都有翔实的记载，即可作为少先队读书活动的优秀教材，又可作研究人物及历史

的宝贵资料。同时，该书还根据每个人物的照片资料绘制了具有造型特点的绣像作品，配在每篇报告文学的前面，为该书增添了光彩。

（原载 1990 年 11 月 10 日《中国教育报》）

## 《中华少年风采录》有风采

### 绍 凯

“多梦时节”、“十六岁的花季”——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用自己生花的笔墨流露出他们对少年时代的钦羨和思念。的确，少年时代对于大多数人的一生来说无疑是一段纯洁的时光，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与幻想的时代，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阶段。因此，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精神食粮，不仅对于他们的茁壮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全社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华少年风采录》便是献给少年朋友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

《中华少年风采录》含英勇就义、勇敢斗敌、舍身为公、舍己救人、身残志坚、助人为乐、勤奋学习、发明创造、文化艺术、体育健美和先进集体等10卷。作者们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60余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和平建设年代中所涌现出来的118位杰出少年人物或集体的模范、英雄事迹。当然，这种分类从逻辑上说可能还不够严整，彼此间难免重叠和交叉，但整套丛书的规模之巨大、涉及面之广泛，乃是以往所不多见的。这不仅反映了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宏大气魄，也体现出他们这样的思路，即少年的风采绝不限于那些叱咤风云的英模，更多的还渗透于他们日常平凡的生活之中。

的确，言及风采，人们往往容易情不自禁地、首先地、更多地想起那些在战争年代里，为了革命的事业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战士，如刘胡兰、谢荣策；想起那些在和平年代里为捍卫集体财产而奋不顾身的英模，如刘文学、龙梅、玉荣、张高廉、赖宁；想起那些奋力拼搏、为祖国而赢得荣誉，高高地站在领奖台上的健儿们，如高敏、杨文意、邓亚萍。不错，这一切当然是中华少年风采集中而突出的体现。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歹徒的凶残，面对大自然的威胁，面对拼搏的艰难，那些孩子们大义凛然、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情怀与行为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为他们树碑立传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中华少年的风采又绝不仅仅只限于这几个方面，因此，在《中华少年风采录》中就出现了诸如刘倩倩、王晓东、樊雯、仇学文、王翠兰、车晓兰、王玉梅、巴合提……等一大批或许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比之于那些英烈、模范、冠军，他们的知名度或许要小得多，他们默默地生活在平凡世界中，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作出了非凡的努力。然而，《中华少年风采录》的编者和作者却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平凡和缺乏足够的知名度而忘却这些同样可爱可佩的孩子们，一视同仁地捕捉住了他们的风采。应该说，这种思路不仅宏阔，而且有益。

拓展再现少年风采的思路固然重要，如何再现这种风采则同样不可忽视。一般人总是容易记住那些少年英模们那闪光的一刻，诸如志士们面对敌人屠刀时的临危不惧，英模们在大自然威胁面前的从容不迫，冠军们站在领奖台上的勃勃英姿……然而，这闪光的一刻并不是从天上突然降临的，也不是某种偶然的机遇之使然，在这闪光一刻的背后，总是有着坚实的支撑和扎实的铺垫；而且，这些战士、英模、健儿也绝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不可攀的神童，他们同样有着凡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那也不过只是由于他们平时更多地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和汗水。看来，《中华少年风采录》的编者是十分注意捕捉这种寓于成功背后的艰辛，那闪光的一刻在这些作者眼中似乎并不十分重要，他们无意着力渲染这闪光的瞬间，相反，对这闪光一刻的背后却倾注了大量笔墨。这样一来，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风采便活灵活现地凸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读来更加感到亲切和实在，从而也使整套读物更富于艺术感染力。

当然，还很难说《中华少年风采录》中的所有篇什的水平都很高，不平衡的现象也的确存在，但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推出这样一套规模庞大、内容清新健康的大型纪实文学丛书，来丰富少年朋友们的精神生活，这种举动无论如何是值得推荐和赞赏的。

（原载 1991 年 2 月 9 日《文艺报》）



## 学数学有了好伙伴 ——荐《小学数学智力趣题》

刘银娜

为了激发孩子对学习数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们的智力得到进一步开发，许多家长、学校和老师都做了有益的尝试，有的学校开设了“趣味数学”课，许多学校开设了数学兴趣小组活动。但大家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困难，就是缺少系统的参考资料。丹东市实验小学数学教师王桂荣等同志总结了 20 多年的教学经验，搜集、整理、编写了一套《小学数学智力趣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小学数学智力趣题》分低、中、高年级三册，供不同年段学生使用，每册分 10 个方面，近 400 多道趣味数学智力训练题。

这套数学智力趣题具有以下特点：1. 知识系统，层次清楚有序，每个年段的各种题目较多，使学生和教师有比较充分的选择余地。2. 选编的题目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科学性，适合小学生好奇、好动、喜欢探究的心理特点。3. 内容新颖，形式多样，插图生动有趣，直观性强，文字的叙述和内容安排也比较适合小学生的口味，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求知欲望。这些科学性和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选编的整套数学趣题，既考虑到不同年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又不完全局限于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对课本知识的加深、巩固和有益的补充。从实践经验看，整套数学趣题可以作为学生独立阅读的课外读物，也可以作为家长辅导孩子的教材，同时也是开展数学兴趣小组活动和开设“趣味数学”课比较好的参考资料，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师益友。

（原载 1990 年 11 月 24 日《辽宁日报》）

《小学数学智力趣题》王桂荣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 9 月出版，高年级用定价 1.80 元；中年级用定价 1.65 元；低年级用定价 1.40 元。

## 《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略评

王向峰

孙世哲同志的《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是本书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读者。

蔡元培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位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美学与美育思想都是自成系统的，但这个系统是内在的，需要有识者从多种著作中撷取。世哲同志在材料的归纳整理上，旁搜远绍，广征博引，达到了在丰富中求精赅的地步，所以读过本书之后，即可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美育思想有个宏观的了解，承认他们确是中国现代美育学的创始人；也能对他们的具体美育见解有个明晰的认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如其中关于鲁迅对各种艺术的见解，在材料的搜集上非常周详，而又能在论述中归纳出各门类艺术的美育作用的要点，有些统计数字，如鲁迅在国内看了多少部电影也计算得十分精细。

世哲同志在分析这两位思想家的美育思想时，特别注意把他们的美育观点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上来加以评价，这样既可以说明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之一的美育思想所以出现的现实历史条件所在，也能从原则方法上给人以所以如此的深入启发。如书中对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论述，就从1917年当时中国思想界泛起的把孔学宗教化的思潮分析起，并又对宗教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也对蔡元培的宗教观进行了分析。书中引证了蔡著中抨击宗教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一核心观点，然后用蔡元培以宗教与美育都“同立于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论断来证明，这就给人提供了美育何以能代宗教的认识逻辑，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伟大社会意义。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这一口号提出的历史性评述也是十分公允的，实事求是的。本书是介绍蔡元培和鲁迅的美育思想，但书中表现的却是作者视野中的理论思想，绝非那种侧重摘引堆砌材料之书可比。

书中把蔡元培与鲁迅“相提并论”，而这两位思想家的生平思想又并不完全一样，因此怎样加以比较，找出他们异同所在，却是一个实际难题。在这方面，书中许多地方是工到功成的。如本书第五章，在分析美育的社会作用时，从蔡元培、鲁迅的大量的具体见解中，归纳出他们共识的三个方面：“开发智力——审美的教育作用；陶冶情感——道德的感化作用；全面熔炼——心理的平衡作用。”接着便深入展开分析，使问题显得十分清晰明白。一般读者可从原著中直接探求到一时难于得到这种结果。

论述蔡元培和鲁迅的美育思想，应该说这是在他们二人的思想材料中划出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即美育思想的空间。问题是什么是美育？世哲同志开篇即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谈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如“美育是全方位、多渠道的教育”；是“以人类所有文明成果为教育内容的教育，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形式”等等。只是这些问题在书中的正文里，却因为受原著材料的限制，未能得以一一展开，这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交谈中得知，他还有在这方面的更进一步的宏远追求。我希望以后他能写出有关这个主题的更好的书。

（原载1991年1月22日《辽宁日报》）

《蔡元培鲁迅的美育思想》孙世哲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定价 4.00 元。

## 《国外大学 100 所》述评

张根生

《国外大学 100 所》是由《光明日报》驻外记者花了一年多时间，对世界五大洲 36 个国家 109 所著名大学进行实地采访，从各个侧面对高等教育的课程设备、课程安排、教育计划、教育手段、教育科研、未来 21 世纪人才素质等等情况作了生动具体的报道。正如本书编后中所说：“这是《光明日报》国际部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晶。”其中不少文章曾在《光明日报》开辟的“国外著名高等学府一瞥”专栏上发表过，引起高校师生的关注。这次成书又聘请了热心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几位著名的外国教授和专家为该书的特邀编委，他们为该书提供了宝贵经验。我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确实深有感触。

### 一、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是三结合关系系统一体

在《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中，许多世界著名大学所以能够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不断发展，取得新的进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重视教学，着力科研，不断用最新科研成果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比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农学院院长霍格伍德说：“这里没有哪位教师专门教书，或者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研究和推广相结合，推广和教学相结合的方针。只有这样，教学才能促进研究，研究才能丰富教学，而推广工作才能不断得到充实提高，促使科研成果尽快在生产第一线取得经济效益。”

这种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办学方法已取得较大成效。又如，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它是一所有近 6 万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推广和科研并重。大学的研究部门与生产单位相结合，向社会转让技术，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研究人员也在生产实践中汲取营养，推动生产和科学共同发展。学校还成立大学推广局，专门负责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

高等教育旧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不相适应，正如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经济系主任劳克斯教授说：“没有科研活动，大学就孤立于社会之外，教学便成了无源之水，事业就不会前进了。”因此，各国的著名大学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建立各种形式的高科技组织和基地，如美国斯坦福工业新村，日本筑波科学园，英国剑桥科学园区，苏联西伯利亚科学城等等。学生纷纷从传统的纯理论形式中解脱出来，使教学和科研结合得更密切，使高等教育能够发挥更大的科技优势作用。比如，英国瓦瑞克大学，该校的办学方针是在保证教学的前提下，科研是学校工作中心，且成立“制造系统组”组织，它专门负责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由于“制造系统组”发挥了作用，为企业提供科研服务，发展新技术产品，使该校的科学园以突出的科研成果与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园齐名，成为英国的高校楷模。另外，瓦瑞克大学建立的“技术意识计划”，又将最新的知识和科技对科技型公司、企业领导层进行知识转让，以提高他们管理和决策能力。他们回厂后，便使用新知识进行管理，碰到问题又反馈到“技术意识计划”，计划负责人再将解决方法补入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又促进管理人员再来学习，从而形

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大循环。又如，泰国最大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的朱拉隆功大学，该校的科研方针是实行基础、应用和行动三结合，提倡科研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通过向社会服务，学校丰富的智力资源变为生产力，推进了社会进步；反过来也使教师积累和发展了自己和专业专业知识，充实和加强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又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在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方面创造出自己的经验，他们具体做法：一、大学成立商业联络办公室，推动大学的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增加学校收入。二、成立“工商管理革新中心”，开展有偿咨询服务。三、建立基金会，等等。大学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吸收了资金，增加了教科经费，另一方面，使教学科研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既丰富了学术人员的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总之，正确处理教学、科研、服务三者关系，是体现一个现代化大学是否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中充分地介绍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 二、高校课程设置向综合方向发展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要求培养科技人才相适应，但是，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不是单一学科专业所能达到的，从世界许多著名大学的教育改革实践来看，必须摒弃以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采用机动灵活的课程设置，实行综合性的专业教育，以适应当代自然科学的不同门类交叉渗透及边缘学科出现的要求。《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中，对课程设置的改革介绍了几所大学的做法。一种是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电信学院，日本长冈技术科大等高校，他们的做法是：一、把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相结合，要求学生在头两年中必须学好基础课，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三个领域中规定了必修课和选修课。二、文理科结合，要求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文科基础知识；要求文科学生，具备一定的理科基础知识。另一种是，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它根据科技人才主义的设想，制定教学计划，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文理知识兼备，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改革的具体做法上主要有以下四点：一、“主修资格测定计划”。要求学生三年级时，完成一项主修科目的工程计划，以测定学生解决主修科目范围内的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并写出一篇论文。二、“相关资格测定计划”。要求学生四年级时，完成一项把主修科目与社会问题相结合的计划，以测定学生把学技能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能力，并写出一篇科技与社会的论文。三、“文科学力计划”。学生必须在人文科学领域，如艺术、文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选择一个方面，至少选修五门课程攻读，并写出一篇内容充实的研究论文。四、“学力考试”。该校负责制定计划的威廉·格罗根教授说：“我们要使学生培养本身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学校提供教学、资料和指导，而学生的才能，必须从其自身内心中发挥出来。”因此，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改革必须打破传统的单一模式，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加速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科技人才。

## 三、高等学校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基地

《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中，很多著名大学十分注重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未来 21 世纪准备人才源。因此，各国政府为了自身的民族和国家

的利益，对高校培养高质量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已成为普遍的要求。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说：“大学的教育目的永远是施教和诱导。”他还坚持认为“学校的课程既能开发学生的智力，又能把他们的行为诱导到德行的轨道上，这无疑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又如，英国爱丁堡大学，要求学生不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强调进行全面教育。该校副校长史密斯爵士说：“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学科，为的是丰富他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的思想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以便对事物有分析批判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后成为真正有用的公民。”又如，联邦德国亚琛莱法技术大学，它是主要培养工业工程师的高等学校。该校十分重视学生必须是既有先进的专业知识，又能动手运用知识，从事实际生产的技术人员。所以，只有书本知识，不会实际生产的人，他们称之为“只生有两只左手的人”。联系我国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非常低，一般还要经过若干年的锻练，才能慢慢地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的实际，工科学生如何避免培养“只生有两只左手的人”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 四、高等教育广泛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

高等教育广泛地进行合作和交流，已成为当代教育国际化的世界潮流。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比如，法国高等商业学校，该校教员中有15%是从外国聘请的；外国留学生占学生总数1/10，每年还组织国际讨论会、报告会，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又如，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开放，已经成为该校一种传统。1980年全校每四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外国留学生，1985年达到1/3。该校同世界各国有着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和交流。同30多个国家的42个城市的大学签有正式合同协议；同100多个国家的128个城市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各种形式的交流。该校还同我国上海交大、北京清华签订了合作培养博士生的协议。又如，挪威特罗姆瑟大学，该校的口号：“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她特别强调教学、科研和国际化。为此目的，采取以下措施：一、同其他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固定联系，互通情报，共同研究某些课题。二、支持和鼓励教师和科技人员同国外相应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建立联系。三、规定教师和科技人员每工作四年，便可享受公费到国外从事一年的学习和研究。又如，日本京都大学，为扩展师生眼界和吸进新鲜空气，历来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该校每年接受430多名外国著名学者和教授来校任教、讲学、研修或从事联合研究。与此同时，每年派80名留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到世界著名大学学习，校方按文部省规定予以资助，学成回国，充实学校教学科研力量。京大还与九个国家的11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学校关系。总之，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本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和人、财、物支持外，还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国际性的横向联系，吸收世界上教育和科技最新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改变我国教育落后面貌所必需的。

#### 五、高校管理体制

### 1. 要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许多世界著名大学，所以能久负盛名，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这与“名师出高徒”是分不开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师资阵容强大，在全校 1700 多名教师中有 1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3 名普立策奖金获得者，48 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77 名美国国家艺术科学院院士，15 名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同时，还采取公开招聘和实行聘请合同制，不搞教师终身制，保证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又如，土耳其比尔坎特大学，该校“实行教职员聘请合同制，两年签一次，期满后，校方可根据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学生的反映和本人的意愿，决定留用还是解聘。同时，教师也有选择继续留校还是离校的权利”。合同制在学校里起到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作用。学校要留住优秀的教师，就要提供优厚的待遇、先进的教学设备；教师想呆下去，就得不断吸收信息、新知识，不断更新教材，这样才能大大提高教学质量。所以，高校必须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才能培养造就出大批高质量的人才，这也是被所有世界著名大学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 2. 以法治校，严格管理

高等学校是一个国家科技文化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很多世界著名大学对学生的培养提出严格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对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明文规定。一年级本科生必须住在学校内。二、三年级本科生搬出学院后，规定住所不得离开校中心 6 英里；出版报刊，应向校方登记注册，并呈报编者姓名；在校内举行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 48 小时前取得学校当局允许，对违反校规者，由学校“纪律法庭”予以审理，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停学、开除等处分。又如，瑞士洛桑旅馆学院，对学生实行严格的考勤和考核制度，无故缺勤 10 次的学生受警告处分，14 次缺勤者取消其大考资格，行为不慎者要开除学籍。因此，学生都发奋读书，酗酒、吸毒、嬉皮士等现象在该院完全杜绝。有些大学还实行以优淘劣，以考促学的规定。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关系十分密切，很值得我们在高校工作的同志思考。

### 3. 后勤管理社会化

《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中，对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社会化亦作了详尽的介绍。由于大量后勤管理工作有大学生服务中心或大学生服务部承担，使学校、系领导有可能集中精力抓好教学和科研。比如，联邦德国波恩大学，由大学生服务中心负责学生的用餐、住宿、贷学金发放及课余生活的管理。该服务中心有职工 300 人，要为 4 万学生服务，服务中心一年内总支出在 2500 万马克，这就说明服务中心工作高效的工作水平。服务中心办的食堂是非营利性的，学生一份饭，至少有一罐主食（米饭、面条、土豆或面包）。一罐色拉（生菜）、一盘荤（肉、炸鱼）、一碗汤、一盒酸奶或水果，学生只付成本费。这样一份花色饭菜的价格只相当于人民币 0.12—0.26 元。真正做到了价廉物美，营养全面。其次，国外大学一般不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但对住宿有困难或外国留学生由服务中心帮助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贷学金，毕业后分期归还。除上述工作外，服务中心还承办学生旅游、购书、治疗等事务。总之，学生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在学生服务中心（或服务部）找到有关部门，或为你提供咨询，或直接帮助解决。国外高校这些好经验，可供我们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借鉴。

《国外大学 100 所》一书的内容远非以上几个方面，但是，国外这些好的办学经验，是人家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教育实践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照抄硬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吸取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经验加以利用改造，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

（原载《教育与管理》1991 年第 1 期）

《国外大学 100 所》本书编委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定价 4.90 元。



## 数学哲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简评《数学哲学引论》

徐本顺

近年来，我国的数学哲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系列专著、译著、论文相继问世，在活跃学术研究，推动数学教育改革方面，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前同志的专著《数学哲学引论》，是数学哲学领域里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这部力作很有些特点，在此略加评述。

第一，该书在介绍国内外数学哲学研究状况方面，涉及内容全面而系统，引证材料丰富而细致。它廓清了数学哲学的整体面貌。以往人们谈到国外数学哲学研究，大都着重评论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三大派。也有些论著讨论过哥德尔、托姆等人的“新柏拉图主义”、拉卡托斯等人的经验主义和普特南的数学实在论等论点。《数学哲学引论》一书运用哲学上关于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的原理，分析了数学哲学流派演变与数学思维发展的关系，指出各主要派别所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数学在其思维活动中与主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把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同科学数学化方面的哲学观点联系起来，把数学与心智的关系同数学柏拉图主义、约定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把数学与经验的关系同数学经验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把数学与逻辑的关系同逻辑主义联系起来，把数学与直觉的关系同直觉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把数学与形式化的关系同形式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把数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数学哲学观联系起来。然后，又从数学思想发展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讨论了各数学哲学派别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使数学哲学各派别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简明清晰地表述出来，一目了然，易于掌握。这对于想初步了解数学哲学的读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这本书的确起到了“引论”的作用。另外，该书在介绍各数学哲学派别观点时，参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比较深入透彻的分析，作了比较确切的概括。著名数学家徐利治先生读了该书手稿后，曾认为“内容题材选择恰当，阐述分析透辟，文笔也极为流畅，引证文献尤为细致，作为数学哲学的“导引”(Introduction)在国内还是第一本好书”。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

第二，该书对各数学哲学派别的分析和评价，比较客观、全面，并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见解。比如，在评论数学哲学中逻辑主义派别时，指出要把哲学上的是非问题，数学哲学上的是非问题和数学上的是非问题区别开来。逻辑主义者主张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具有先验性，在哲学上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然而他们主张把数学归结为逻辑，这只是看待数学与逻辑关系的一种观点，涉及数学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不是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至于类型论是否有死偶，则属于数学上的是非问题。与此类似，对于直觉主义、形式主义等学派的观点，也应注意区别三种不同性质的是非问题。又如，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万物皆数”的观点是否属于唯心主义的问题，该书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当时对“数”的理解，是感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的混合物。当时主观和客观等哲学范畴尚未明确分化，因而不能绝对地说“万物皆数”的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这些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对西方数学哲学中各派别的分析和评价，应该采取一种唯物辩

证的态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各数学哲学派别的本质特征。在这方面，《数学哲学引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该书不仅对各数学哲学派别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探讨，而且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正面回答各数学哲学派别提出的问题。这项工程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分析研究西方数学哲学流派的观点，并不单纯是为了就事论事，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取其中合理成分，为我国的数学哲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发展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数学哲学。《数学哲学引论》的每一章，都在分析详述西方数学哲学派别观点的基础上，对各数学哲学派别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比如，该书提出，数学的现实定义并不等同于它的具体应用。应用上的成功或现实模型的建立，并不能等同于对数学真理的实践检验。数学发现中的实践活动同数学应用中的实践活动是有一定区别的。又如，该书对直觉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直觉思维某些基本规律具有辩证逻辑特征，特别是数学直觉思维对简单性、对称性、统一性、和谐性、美感等特点的理解，不仅具有辩证思维特征，而且可以找到认识论上的根据。该书对数学认识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对于数学对象、逻辑对象和时空形式三者关系的分析，对于数学思维活动中各因素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读者可能对这些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赞同，但这样一个探索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应该大力提倡。我国的数学哲学研究，需要越来越多的在国际性学术交流中自成一家，具有我国的特色，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成果。我国的数学哲学工作者应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数学哲学引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希望它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在推动数学哲学研究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载《曲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数学哲学引论》王前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定价4.00元。

## 学术精神揽萃 ——评《周谷城文选》

李万庆

《周谷城文选》收录了作者自 1924 年到 1989 年 60 余年在各个历史时期多种学科领域的主要代表论著（长篇专著除外），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学术发展过程。

收入文选最早的论著是写于 1924 年的《生活系统》一书。这部哲学著作，可视为作者整个学术思想体系最初的哲学基础。它是有感于“五四”以后的不少青年，不去接触和了解社会生活本身，却来侈谈“人生观”而作的。作者认为，现在不可再蹈前此的错误了，即不去“先把生活本身弄个明白”，却“笼统含糊把什么人生观毅然决然地提出”。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构成其一生学术思想之本。

正如作者在此著 1989 年新版“序言”所说：“《生活系统》是我廿余岁时写的，讨论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颇像生态学，实则是批评温德心理学的。温德以为人的心有三方面，曰：知、情、意，以为知情意是并立的三种。我则不然，以为心只有一个，然在时间的进程中，可有不同的三阶段。”作者在对温德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新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打破了温德所谓人脑是情、智、意三者并存的整体，而认为情、智、意是人脑三个连续的过程，并将人类的科学生活、艺术生活、信仰生活三者分别与智、情、意相对应。“科学的生活，是以我御物的生活，我与物相竞争的生活”。而艺术的生活即自然的生活，是“物我浑融的生活，不知其然而然的生活，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所谓“信仰的生活”即在福、祸多变的社会，必须立住一种信仰，“依着信仰，向着走去”。这三种生活不是并行的，而是前后相续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过多种生活，而只能过一种生活。因而这三种生活只能构成前后连贯的循环。

这种科学、艺术（自然）、信仰三者的轮转关系，这里说得很明白。

由我们研究的结果看起来，生活之全体，是变动不息的。其状态是时时变换的。物我浑然一体之境，有时不能不折入痛苦难堪之境。痛苦难堪之境，绝对不能不折入纯粹思想之境。纯粹思想之境，绝对不能不折入信仰之境。信仰之境，绝对不能不复入物我浑然一体之境。生活是这样轮转一次，便是进化一周。轮转不已，便是进化无穷。这样，便完成了他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知是“物我分显之境”（科学），意是“心理行动均有定向”之境（信仰），情是“物我浑融一体之境”（艺术）。这正好是一个正、反、合的命题，所谓“无差别境界”即是一个合题，它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但这一“无差别境界”却曾受到误解和围攻。其实作者解释得很清楚：“‘无差别境界’的提出，是反对艺术无冲突的，故曰：无差别境界，不仅没有艺术创作，而且没有一切创作的活动可言。‘反对者把这个用意搁在一边，专门来谈‘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境界的本身到底有没有。这样讨论也是可以的。照我看，不矛盾的境界是有的。”作者认为，各种矛盾一旦解决了，都有一个暂时的不矛盾阶段。宇宙不是一块铁板，是由不矛盾与矛盾构成的。因此，“不矛盾或无差别境界在自然界或社会中或历史上都有地位。”（见《关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我认为，应把他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完

整动态系统来了解，才不至于曲解人意。收入文选的《所谓意境》是两年前所写的一篇短文，他说，凡存在变化之物，均含正、反、合三阶段。正指社会现实，反是对社会现实劣习弊端的批评、改造。反掉缺点、毛病得到一种较原有现实更高、更好的现实，“这样的新东西，就是理想，就是合。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就成为历史；在艺术作品实现，就叫做意境。”由此可见意境就是一种艺术境界，一种“物我浑融”的无差别境界。这正是周先生早年将生活分为科学的、信仰的、艺术的即智、意、情这样一种前后相衔接、循环无穷的动态结构，对用以解说“意境”的新创。以往的各家多从静态来界定意境，唯独周先生却从事物辩证发展的正、反合题上来解释它，这种动态结构的认识，使一个被搞得复杂化的艺术问题，得到了通俗的解答。

由此看来，作者的学术思想，几十年来虽得到很大的发展变化，但他在《生活系统》中所建立的这个循环动态结构的哲学体系却是一以贯之的。

收入本书的“各篇皆争辩之作”，读后不仅深入了解了作者的观点，而且也对各家之说及争论的大背景有所了解。至于收入本书的《史学与美学》一编中的美学部分，则是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延时已久的美学大讨论中，作者的又一争辩之作。在这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无差别境界”的大论战中，作者独对众矢，坚持一家之言，这种学术胆识，是值得钦敬的。我们不必都去同意作者的学术观点，但这种独树一帜的学术品格足以昭示来学。

（原载《读书》1991年第3期）

《周谷城文选》周谷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出

## 一部有理论力度的著作 ——《大教育引论》评介

杨春岚

《大教育引论》一书从理论的高度对大教育产生、发展及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力度。

这部著作的理论力度首先表现在作者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握上。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随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的。对教育发展规律如何认识，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改革以及教育未来模式的理解和实施，而且关系到对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中作用的认识与发挥。作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把握与论述了教育的发展走向，认为教育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历史，并据此分析了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在我国教育理论界首次提出了教育发展三段论，即学校教育产生以前的低级形态的大教育阶段，学校产生以后把教育局限于学校内部的小教育阶段，由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大教育体系组成的一体化特征的大教育阶段。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从教育自身的发展出发去认识教育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特别是作者对三个阶段教育发展特征的分析与概括，是比较正确的，全面的。

作者认为，在学校教育产生以前，人类社会教育主要存在于生产、生活过程中。因此，这个时期的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开放性，教育时间、地点、对象等都没有任何限制；终身性，由于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进行的，生产、生活伴随人的一生，教育必须是终身的；多样性，无论教育形式、方法、手段，还是教育内容，都不是统一的，而是多样的；同步性，教育与生产等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步进行；分散、个体性，教育是分散在家庭、采猎场等地，由父母、师傅等个别传授的。学校的诞生确实是一项革命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把教育的职能完全委托于学校，并用一纸文凭把它固定下来，教育逐渐变成小教育了。其特征正好与低级形态大教育相对立。主要有：封闭性，把教育只局限于学校内部进行；单一性，教育只成为学校教育，不承认其它形式教育的价值，对自学尤其如此；阶段性，教育成为人的一一生中一个特定时期——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滞后性，教育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并且是为已知的情境培养人才的；集中、统一性，教育对象集中在学校，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规格。总而言之，是统一进行的。

作者认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即由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转型时期。现在看来，小教育的局限正在突破，大教育体系已露端倪。大教育特征与低级形态大教育极其相似，但其本质不同。这些特征主要有：终身性，大教育是面向人的一生的教育；开放性，大教育是个开放的系统，学生可以在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系统中纵横移动；多样性，大教育无论在形式、方法、手段、内容上，还是在结构、规格等方面都是多样的；超前性，大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或者说，是为学生适应未知的情境而进行教育；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个体与集体相统一性。由于作者能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教育的发展规律，并比较科学地概括出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对我们正确认识教育这一特殊现象，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部著作的理论力度还表现在作者对教育未来模式的探讨上。众所周

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未来学的兴起，人们逐渐感到，由于整个社会发展变化速度的加快，人类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都必须随之改变，变“后”社会为“前”社会，变以“过去”做“参照系”为以“未来”做“参照系”。这种改变必然要求人们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未来进行探索。同样，教育也不例外。人们为了使今天的教育能培养出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教育学家、未来学家以及其它社会学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教育的未来，对未来教育的模式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本书作者可谓独辟蹊径，并有独到之见。首先，作者运用了社会历史分析法与趋势外推法，对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趋势外推。其次，作者对教育发展的未来模式的概括，是由小教育向大教育发展。具体说来，大教育的发展又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一体化。这是因为，只有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实现一体化，教育才能最终成为面向全人类、全社会的教育，大教育体系内的各系统之间才能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并发挥出更大的效益。需要说明的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一体化，并不是要取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另外建立一种新形态的教育，而是强调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也不是排斥大教育的多样化，只是指大教育三大系统之间的连续性与协调性，以及所追求的目标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二是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一词是哈钦斯在 1968 年提出来的，尔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 1972 年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法，并把它做为教育的未来模式与未来的社会形态，进一步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关于学习化社会一词，从提出那天开始，学术界的理解就不尽一致。有从终身教育角度理解的，认为它是终身教育得以保证的一项措施；有从社会体制方面理解的，认为它是社会对每个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由取得学习、培训机会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也有从教育自身理解的，认为它只是一个以学校教育系统为中心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现代教育网络。本书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更为简单，他们认为，所谓学习化社会，就是教育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教育化相结合，是大教育发展的最高形式，也是在未来社会中教育完成的最后形式。因为，在未来社会中，只靠教育系统已经远远承担不了社会赋予教育的使命，整个社会必须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也只有到这时，大教育才最后被完成。当然，对这种教育的未来模式的探讨，从目前看，只是一种趋势外推。教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使用的结果。

虽然这部著作是目前国内较系统论述大教育的专著，在很多地方具有独到的见解并匡正了教育理论界在大教育问题讨论中的一些歧见，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从总体上讲还略显单薄，有些地方也论述得不够充分。衷心期待作者能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

（原载《大连教育》1991 年第 4 期）

《大教育引论》巩其庄、郭长征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出版，定价 2.35 元。

## 字字真诚在 娓娓述国情 ——读“国情丛书”

王 淦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贡献了一份很有份量的礼物，即“国情丛书”。

这套丛书共 18 本，每本都在 10 万字左右，没有令人生畏的厚度，也没有故作高深的门面。作为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丛书，它的外部形式就很容易唤起青少年读者的亲切感——亲切了才谈得上吸引，吸引了才谈得上精读，亲切感是第一步的成功。在精神食粮丰富，接受者有很大选择余地的今天，能一下子就唤起对应读者的兴趣，这并不容易做到，但越是内容好的书又越应该做到。书的形式，尤其是合于对应读者情趣的形式，具有关系到读者数量多寡和阅读效果好坏的重要作用。这是我读“国情丛书”而想到的。

形式是入门的向导，但也有些书，形式不错，内容平平，那就是“绣花枕头”。“国情丛书”不属于此类。读它的内容，会感受到一种吸引力，使你不容易也不愿意脱出去。你会生出登高望远之感，能从中获得博览兼收的喜悦。这 18 本书，各谈一个构成当前国情的重要问题，如《粮食：生命之泉》、《交通：贵在先行》、《生态：家园故事》、《文化：风采中华》、《体育：热血春秋》、《法制：社会天平》、《民族：兄弟同舟》等。这里的每个问题，都以其实在性和重要性摆在人们面前，也可以说，它们都是那类跃入人们关注而费人思索、逼人思索的问题。它们是现实的，但又绝不是短期的。这套丛书的主编能把这些问题汇总，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又能把这些问题给予比较明晰的梳理和解答，这离不开通观现实的眼力，也离不开体验现实的敏锐和剖析现实的思维深度。而这里更需要的是气度与勇气。国情，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畴，此一时彼一时，不容易拢住；它又是切近于眼前的，很难看得很透，想得很细；更有些问题，比较复杂或者敏感，很可能谈得蜻蜓点水，或者问题提得很大，内容却空空。这些疑虑，我接触这套丛书时曾产生出来，也可以说，是带着这些疑虑读的。现在，疑虑散去了，总的感受是这套丛书谈了这么多问题，有如此大的气度，名为“国情”，确实不虚。

读这套丛书，我很感佩作者们的凝炼功夫。一般来说，这套丛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和生活有很多纵横交错的联系，历史的、现实的，表层的、深层的，每本书写上 20 万字也不为多。可是其中竟颇有几本书的作者能够游刃有余于 10 万字之中，而且谈得周详细致、深入浅出，这可不容易。比如其中《文化：风采中华》这本书，广阔地展开了新中国 40 年文化的宏伟画卷，分为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影视、曲艺、出版八篇。八篇中的内容，作为历史发展过程，都很错综复杂，潮起潮落，东而又西，它们是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探索的文化缩影。作者们将其发展变化的主脉勾画出来了，并且抓住特点，突出重点，铺展得很自如，概括及评价也较精当。如对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 17 年的文学创作，作者概括说：“17 年的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收获最大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多（特别是在长篇小说领域），而且影响大”，然后便梗概地介绍最有影响的几部长篇小说，并予以简要的评价，真可以说是惜字如金。而近 10 年来的音乐，其变化幅度之大几乎如朝云夕霭，专家们也为其难于把握而搔头，作者

却敢于知难而上，拢其脉络，提其纲领：“10年来音乐艺术现状的最大特征之一，是通俗音乐的兴起和迅速发展。音乐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与人们构成广泛而直接的情感和心灵交流，同时成为人们自娱、宣泄感情、表达思想采取的最常用的一种手段。音乐因此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赢得了极为广阔的文化市场。”这称得上是分析10年音乐状况的破的之语。接着，便进行通览，说它是起于对港台流行歌曲的模仿，激昂于“中国味”的注入，如西北民歌的粗犷，东北民歌的幽默，人们在通俗音乐中奔泄着激情。同时，作者也严肃地指出10年通俗音乐浪潮中的误区，令人清醒与深思。毫无疑问，这种凝炼内容的功夫，来于对内容的充分占有和纵深透视。这一特点，在《人才：第一资源》、《教育：大厦栋梁》、《科技：强盛之路》、《生态：家园故事》等几本书中也很明显。

写这类切近于现实的书，有两点是最怕的，一是怕学究气，一是怕油滑。学究气导致僵死，油滑导致浪荡。那样的话，书就全毁了。“国情丛书”没有这两怕的问题。作者们，如该丛书主编之一陶铠在“总序”中所说：“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报告文学或纪实专访的新闻记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平时广泛接触社会或部门实际，在多年工作中对情况和材料多有积累，且能发挥职业的特点和优势。”作者们的职业特点，使他们获得了与当代生活同步和深刻地理解生活的优势，他们的材料多是第一手的，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与理解也都是基于现实生活。比如《卫生：走向健康》，谈到环境污染问题，作者引用了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五大城市1980—1989年的大气监测信息，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大气污染与身体健康的必然联系，有很强的震动性，令人警醒。再如《教育：大厦栋梁》谈及文盲问题时，作者由列举现象到提供统计数字，把文盲这一社会癌症的现实严重情况，触目惊心地向读者展示，再以此为据进行分析，找其原因看其危害，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黄牌警告：“现实已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要治穷先治愚。在脱贫以后，如果愚昧的灵魂不再接受现代文明之光的照耀，那么，不仅难于继续发展，而且终有一天仍会回归到贫穷、落后，而且还会酿成民族的巨大痛苦和灾难。”这样的述说，不由人不信服。

最后还要说几句的是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国情，是国人生存的现实，是人们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根据。同时也是人们规划自我，创造新生活的出发点，不了解国情则难免行为混乱，实践盲目，尤其是面对当前社会变革的大局，国情教育绝不可少。在此以前，这方面的书不多，零星地见到几本，也不具有真正的“国情”规模。由此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是适逢其时，为急需进行的国情教育提供了教材。这是丛书编委、作者及出版部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很好的体现。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4期）

“国情丛书”陶铠、关家鹤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包括：《生产与消费：超越温饱》詹国枢著，定价2.50元；《粮食：生命之泉》郭庆著，定价2.20元；《土地：深沉呼唤》张敢明等著，定价1.80元；《矿藏：地下警告》方向明著，定价2.30元；《交通：贵在先行》张国荣著，定价2.40元；《水：神州血脉》何东平著，定价2.10元；《电：寻找平衡》包月阳著，定价2.00元；《人口；魔力世界》张胜友著，定价2.20元；《生



态：家园故事》吴锦才著，定价 2.20 元；《科技：强盛之路》卢继传著，定价 2.60 元；《教育：大厦栋梁》唐旬著，定价 2.40 元；《文化：风采中华》曲志红等著，定价 2.10 元；《体育：热血春秋》朱丽、于长洪著，定价 2.20 元；《卫生：走向健康》周科尧等著，定价 2.40 元；《法制：社会天平》牟信勇著，定价 2.30 元；《人才：第一资源》甄源泰著，定价 2.00 元；《国防：巍峨长城》王普丰、樊昊著，定价 1.90 元；《民族：兄弟同舟》王海征等著，定价 2.30 元。全套定价 39.90 元。

## 向教育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评《教育功能论》

石 愚

由傅维利同志撰写的《教育功能论》一书，是作者长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的一部专论性学术著作，是在我国教育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勇于向教育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结果。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和同行，我想就本书的内容及学术观点进行简单评述，一则阐述本书的学术价值，二来向教育理论界的同仁们推荐这本书。

### 一、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两大主题

尽管作者沿着自然、社会、人以及时间动态发展几条线索，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当代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这些功能的途径和方法，但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围绕着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这两大主题而阐发其理论观点的。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最基本的关系”。而教育恰恰在人与自然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作者运用大量资料说明，在人与自然之间，教育具有帮助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以及人类认识成果和个体发展成果的非遗传性，必然使帮助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责任历史地落到教育身上”。教育在人与自然间的第二个作用，是促进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认识到，人归根结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受其生存发展受自然界其它因素的制约，人类的任何改造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举动，都不能超出自然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否则必然会受到惩罚。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的社会功能表现出来的。它包括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控制人口增殖和影响人口质量的功能等等。

教育的经济功能也就是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在当代之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就是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它可以把任何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相应于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

第一，传播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受教育者形成适应和拥护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及政治活动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完成青年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第二，选择和培养专门的政治人才，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完善和发展。

第三，教育系统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或社会活动方式，对社会现实的各种政治变化和发展产生影响。

关于教育的文化功能，作者有比较深入的阐述。而最为重要的是提出教育传递和保存文化的发展阶段说。即从人类的发展史看，教育传递和保存人类文化的功能，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除了少量文化特质在物品或者简单图画上凝结之外，绝大多数文化特质完全依赖口耳相传或者演示和模仿的方式而获得保存和传递。第二阶段，人类文化除了在物质

和图画上的凝结，以及通过简单的口耳相传之外，还依赖文字记载和学校教育这两种途径获得保存和传递。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进入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第三阶段，人类通过包括教育在内的多种途径传递和保存文化。教育侧重于帮助人们掌握浩瀚文化海洋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和工具形态的文化特质（如语言、文字）。尽管出现了录音机、录像机等现代化保存手段，但教育保存和传递文化的功能是永恒的。

此外，教育还具有活化文化的功能。任何文化（如作品、史诗、典籍）都是以载体的形式储存着，要把这种储存形态的文化转化为现实状态的文化，只有通过教育。

## 二、教育的永恒性与教育功能的变动性

教育具有各种社会功能，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高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人类有可能通过生物技术“移植”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是否还具有永恒性？

作者通过大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实验证明，先天的物种行为模式，能够通过遗传基因的形式保存和传递下来。但是，人类比其它任何一种动物都更能应付自然界的复杂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和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相比，用生物技术的方式使人类获得知识和技能是相对低级的。为了不断创造新知识，使客观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就必须通过教育使人类掌握新的学习方法。因此，作者断言，不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教育都具有永恒性。

相应教育的永恒性，作者提出教育功能不是固定不变，永远停留在一个发展方面和一种发展水平上的观点。教育功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动发展的。

## 三、教育效益的奥秘——对教育功能的深层次论证

以往的教育理论著作，往往给人以枯燥乏味的感觉，即论证的繁琐性、理论的空洞性和操作的不实用性，加之简单罗列，重复引证，更使人望而生畏。但《教育功能论》一书，虽然涉及到教育理论的方方面面，但立论公允，论证缜密，而且将以往枯燥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给人一种贴近的实用感。作者对教育效益奥秘的揭示，更是这方面的经典例子。作者富有说服力地论证阐明了教育之所以能产生高效益的深层机理。

（一）教育可以缩短人类获取知识、技能的基本路程，并能大大增加受教育者所获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作者以历史为线索，说明人类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产生）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例如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砾石文化维持了近300万年，而在文字出现的6000多年历史中，人类却实现了从青铜器到宇宙飞船的过渡。而这主要应归功于教育，没有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系统教育，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能在原有基础上简单重复，不可能有质的飞跃。

（二）教育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加快人的智力、个性和能力的成长速度。

通过教育，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理论界所熟悉的“人力资本”理论。但除此之外，教育的巨大功能还在

于充分发掘人身上的各种潜力，使人类的智力、个性和能力加速成长。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量的剧增，使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吸收、选择大量信息的问题。而只有教育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可以综合调动各种影响因素，在人的智力、能力、身体和个性发展的最佳期内（主要是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促进人的发展，并可靠地按照社会的需要把握住人的发展方向。

### （三）教育功能具有不守恒性。

在揭示教育奥秘的同时，作者还科学地提出，教育功能具有不守恒性。即人们在教育方面获得的收益，常常大于教育方面的投入，二者之间并不守恒。

教育功能的不守恒性，更说明了重视教育，将有限的资本投向产生最大效益的教育部门的正确性。说明了培养创造型人才、高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尽管一个高技术人才所花费的培养费可能几十倍于一个初级人才，但是，他所创造出的价值和效益可能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几万倍于一个初级人才所创造的，说明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性。教育尽管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运用不当，仍然会产生负作用。60年代后，由于盲目扩大高等教育数量，造成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大学毕业生失业，就是一例。

发展教育一定要把握好“度”，作者对我国教育投入“度”的论述，不啻是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决策提供了一付良方益剂。

（原载《现代小学教育》1991年第4期）

《教育功能论》傅维利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定价3.40元。

## 人·家庭·家庭文化 ——《新编家庭生活实用大全》的特色

李葆春

人类的生存繁衍，构成了几千年来文化生息不绝的发展史。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又促进了人类自身文明的推进，使得关于人的探索和再创造，成为文化不容推卸的使命。

注重内守而外和的中国传统文化心态使得中国人更侧重于对怡情养性，自然适意及家庭和谐的追求，所谓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种追求，绵延至今，历久不衰。在当今的图书热中，家庭文化一直是出版的热点。随着生活方式的日益科学化、现代化、艺术化，人们也更加迫切需要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适应现代家庭生活的书籍。由白杉、夏溪主编的《新编家庭生活实用大全》一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该书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介绍了现代生活所需要了解的各种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于加强人的自身修养和提高文化素质很有裨益。在众多的家庭生活类图书中，该书之所以能独蒙青睐，其主要特色在于突出了全、新、实的主旨。

首先，全。该书从现代家庭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入手，具体罗列了近千个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知必解的小问题。比如，在“婚姻家庭”项目中，共包括了“恋爱结婚”、“夫妻关系”、“家庭教育”、“家庭管理”、“社交活动”等5个方面的内容，而在这些篇目之下又包含了107个具体的小问题，围绕人的成长过程，对于婚前婚后一个家庭所面临的缔造、发展、完善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给予了详尽的解答和热心的忠告。把家庭看作人在社会中生存、奋斗的堡垒，把家庭文化看作探索人类文化奥秘的一个窗口，使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化，把个体人生放在文化发展史这个永恒的大座标中去考察。

其次，新。该书所介绍的各种知识，力求推陈出新，配合新型文化观为读者提供生活现象的新概念、新观察、新理解。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使现代人较之古人有更大的可能去追求生活的艺术。在现代人眼中，生活是由我们自己托起的一片晴空，生命是一次庄严而神圣的旅程。追求生活的时代化，注重家庭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新的内涵，是该书的又一特色。

再次，实。家庭生活用书，所注重的乃一“实”字。该书处处贴近生活，体现现实生活的各个真实侧面。它所提供的各种常识、良策，乃千百年来人类的切身体悟，经验之谈，是人类探索家庭文化奥秘的智慧结晶，对于解决诸般生活疑难均有指导作用，读来使人受益匪浅。书中内容颇为详实，力求让人们能切实体会生活的纷繁，掌握生活的艺术，领略生命那深值眷恋的魅力。

全书除了在养生防老、饮食菜肴、家庭和睦、居家自娱等方面略有偏重外，同时顾及全书的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一问一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厚积薄发，实可谓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文化书。

（原载 1991 年 11 月 25 日《书讯报》）

《新编家庭生活实用大全》白杉、夏溪主编，大连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定价（平）7.20 元，（精）13.00 元。

## 开发少年儿童创造力的有益探索 ——评“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

端 延

“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套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其可贵之处在于它触摸到了未来世纪教育的核心——创造教育。

本世纪以前，人们对自身的创造能力熟视无睹。直到 30 年代以后，首先在实业界发起对发明方法、创造方法的经验研究，随后，学术界才开始对创造能力的注目。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应把培养创造性人才作为 21 世纪教育的中心问题。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已把此建议当作国家发展的战略。我国教育界也有人开始认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实在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难得之举。

把孩子们在学校中使用的课本与“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相比较，会发现彼此有许多不同。前者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和思维的结果。后者则注重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而对思维过程和方法的学习必然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思维结果和方案的成倍增加。

“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中的第一册《大脑发动机》，把大脑比作发动机，以有意识的思维训练代替传统教育中对思维技巧的忽视；在后几册中，这种思维方法的训练又逐渐提高了层次和难度。

学习数学、学习语法，大都是掌握逻辑方法和理性方法，培养孩子的左脑功能。“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中的第二册《想象王国漫游》，第三册《联想的彩练》，突出了右脑功能，即非逻辑思维的训练，意在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发展形象思维能力，使儿童得到全面发展。

贯穿于“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始终的，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创造性感知的训练，这是创造性思维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书以很多篇幅强调了让孩子解放五官，解放头脑和四肢，保持天真和好奇，在感知阶段寻求新的角度，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大概算得上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吧！

在培养创造品质的基础上，教给学生一些创造发明的方法，使少年儿童的创造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更实用的价值，这便是该系列书的另一番用心。《发明创造的金钥匙》，结合孩子的年龄和知识特点，荟萃了实用、短小、精悍、易懂、易学的发明创造技法，是少年儿童搞小发明和小创造的好帮手。

另外，在全套书中，作者还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全书用故事穿针引线，把深奥的创造原理深入浅出地引伸出来，语言生动，标题新颖，尤其是本书的插图幽默活泼，给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书中的“动脑筋”练习题别开生面，便于读者在有趣的练习中学会操作这些思维技巧。“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是具有社会效益的好书。

（原载 1992 年 2 月 15 日《辽宁日报》）

“创造性思维训练系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包括：《大脑发动机》张治中、罗玲玲编著，定价 1.50 元；《想象王国漫游》罗玲玲编著，定价 1.55 元；《联想的彩练》王滨编著，定价 1.35 元；《跳过障

碍》罗玲玲编著，定价 1.35 元；《发明创造的金钥匙》王滨编著，定价 1.50 元。



## 函授英语的好教材 ——评介《美国英语听力教程》

刘红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飞快发展，特别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各行各业对外语专门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迫切。这个庞大的外语专门人才队伍，仅仅依靠大专院校培养的学生是远远满足不了的。因此，举办各种广播函授英语教育实是一项有益之举。而目前广播函授英语教学又急需一套实用性强、易为人所接受的好教材。由汪榕培等编著的《美国英语听力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就是根据函授教育的需要和特点编写的一本适用的好教材。

该书共分五个单元，每单元四课，每一课有两段 400 个左右单词的听力短文，短文之后有 10 个紧扣教材内容的问答练习题。每一单元之后都有一个配套的复习练习，并附英文歌曲一首。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适于广播函授教学

近一二十年来出版的各类教材诚然很多，但多为应考性用书，并不适用于广播函授教育。《教程》考虑到广播函授学生的工作需要，以五个单元的篇幅，集中训练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又考虑到广播函授学生大都为在职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或多或少会和外国人发生联系，所以听力训练上不必像传统听力教学那样分成“Statements”、“Dialogues”和“Passages”几部分，只要求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能够听懂一段文章内容即可。《教程》从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原则、教学内容、练习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听力教学路子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很不相同。这是《教程》与国内外其他听力教材的一个重大区别。

### 2. 内容以情景为纲，安排全面，系统性强

以情景为纲可以使学生比较注意针对一定的语言场合情景来理解文章内容。所以，《教程》在选材上注意选用了语言地道、情景逼真的文章，甚至是选自真人真事的实地采访录。当然，一本听力教程不可能包罗万象，不分巨细，也不可能把美国所有风土人情陈列无遗。重要的是，总体构架应系统科学、内容翔实、安排妥当、便于教学；文章文字应该流畅、浅显易懂。《教程》在着眼于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能力的同时，还尽量注意使学生能适量增长语言知识和美国文化背景知识。《教程》在选材方面基本达到了这些要求。

### 3. 突出美国英语之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区别越来越大。《教程》课后的生词全都采用美国英语注音法。注释除对一些语言现象作必要的解释外，还提供了一定的背景材料，以使学习者了解美国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在材料的选择上，编者十分重视使用真实、能够反映美国历史与现状的材料。如

《美国城市的今昔》、《最壮丽的州》、《美国餐馆》等都是学习者学习了解美国实际情况的最可靠的材料。

我作为一名英语教师衷心地祝愿每一位参加学习的同志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期望《教程》在教与学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一本比较理想的广播函授听力教材。

（原载《博览群书》1992年第11期）

《美国英语听力教程》汪榕培等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定价4.50元。

## 揭示人物心灵的底蕴

——浅评连环画《谁之罪》的人物刻画

张 有

以张志新同志英雄事迹为题材的连环画《谁之罪》，通过对张志新形象的刻画，深刻细腻地揭示了张志新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平易、淳朴、善良，具有丰富感情的，同时又是一位刚毅坚强、为捍卫真理而视死如归的活生生的英雄。

作为造型艺术的连环画，除了生动的故事情节之外，还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感染读者。艺术形象的感染力量，不仅在于外形的肖似、逼真，更重要的是通过形象的刻画，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连环画《谁之罪》就是一部形神兼备的好作品。

作者一开始就把张志新这一人物置于武斗狂热的漩涡之中：嘈杂、蜂拥的人群，林立、闪光的兵刃……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作者着意刻画了张志新的一双冷静、沉思的眼睛，借以表现张志新与这种宗教狂热格格不入的稳重端庄的性格，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悲剧。

接着作者着重表现了张志新的冷静思考。第十一幅，是张志新思考的高潮。经过仔细的观察，面对着祸乱横飞的现实，张志新一声长叹：“今日中国将断送何人之手？”作者透过一双焦灼的眼睛，细腻、准确地刻画张志新矛盾冲突的内心世界。

在绘制唇枪舌剑的批斗会之后，作者又苦心构思，十数次易稿，画出了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幅精湛的画面，来作为这一段矛盾冲突的总结和概括。第三十五幅，张志新低头抚摸她的镰刀，第三十六幅，张志新手拿野菜坐在土坎上。这两幅出人意料的构图，只有非常熟悉张志新的杜连仁同志才能构得出来。文化大革命前，因工作关系，作者与张志新有过多次接触，对她的性格特点比较熟悉。因此，在这里他没有公式化地去表现张志新的所谓“英雄状”，而是抓住了张志新生活中最平易、最常见的动势表情，来揭示张志新深沉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在批斗会上，她阐明了全部观点，似如万马齐暗的严冬响起了春雷。在这幅画上，我们看到的是张志新疲惫地坐着的姿势，然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她内心深处有如翻江倒海似的狂澜。

作者从不满足于一般化、简单化的图解文字，而是不断以充满感情的笔墨向张志新心灵的深处探求，着重刻画张志新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的美。大雨滂沱之中，张志新回答一位难友的关怀：“人活着，总得有个坚定的信仰，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还要为社会有贡献。真正的人就是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不管风狂雨骤，怎么也不动摇！”被捕后，她关心每一个所谓政治犯的难友，帮助她们坚定信念，学习文化，甚至帮助她们缝补衣服。

张志新在严酷斗争面前舌剑唇枪、大义凛然，可是一张离婚书几乎使她心碎。作者通过第八十六、八十七两幅画，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张志新骨肉离散的痛苦，她抓住了铁门的栏杆，目光茫然若失，亲人的笑脸日夜萦回在脑际，晶莹的泪珠挂在腮边。但是，正像作者在谈这一段构思时说的那样：“张志新毕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英雄，当她回到宿舍，经过反复斗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终于战胜儿女常情，她辩证地认为，坏事变好事，

剩下一个人更利于专心致志地进行斗争。”这样一个构思的足迹，既符合生活的真实，也符合人物的性格及其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一深刻的构思和精细地刻画，使现实生活中的张志新和思想解放先驱的张志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才是有血有肉、情操美好的具体的“人”，这才是闪烁着生活光彩的英雄形象。

最后，第一 四幅，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同志为了党和人民，为了捍卫真理，把满腔热血洒在她所热爱的土地上。整个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但是睫毛上却闪着泪花，腮边挂着泪水，嘴唇像是微微颤动，两只手轻轻抬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画呢？在谈这幅画的构思过程时，作者的声音哽咽了，他谈到了一个孩子被母亲错打了以后的委屈心情。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作者的这一思路，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幅画丰富的内涵，以及张志新就义前复杂的内心活动。这些可视的形象让我们联想到张志新的内心波澜并未平息，她为捍卫真理可以牺牲生命，但是她蒙受了莫大的委屈，母亲总不至于杀死自己的儿女吧！“生我的是母亲，教育我的是党，让历史检验你女儿的言行吧”！正是上述的这些极其丰富的内涵，使得这幅构图饱满的画面，像一首悲壮的交响曲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久久不能平静。

通过对上面几幅画的分析，我觉得《谁之罪》在人物的心里刻画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作者从形到神，从实到虚，向人物的心灵深入探求，去发掘人物美好感情的底蕴，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张志新这一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

（原载辽宁美术出版社《造型艺术》，1981年第4期）

《谁之罪》（连环画）孙均等文、杜连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定价0.16元。

春色满园 日见芳菲  
——《造型艺术》读后

陈尊三

美术的繁荣和发展固然表现在又多又好的作品问世，但是不能忽视理论上的探讨和对中外遗产的借鉴与研究。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的《造型艺术》丛刊，注重了这个问题，所以出刊以来，受到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的欢迎。在已出版的四期里共刊登了21篇文章和一些美术作品，包括“画家评传”、“技法理论”、“技法漫谈”、“专题论文”、“作品评介”等栏目，及翻译国外的宝贵资料。

“画家评传”和“作品分析”，对于汲取前人经验起着明显的借鉴作用。如第一期杨仁恺的《试论高其佩指头画的艺术成就》一文，没有泛泛的介绍高其佩其人其画，而是着重分析了他颇具匠心的指头画的特色，以及对后人的影响。给人以艺术上的启发。

《阿道尔夫·门采尔的 轧钢厂 》是一篇宝贵的翻译文章。它详细地介绍了这位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如何以他第一手的速写资料为基础，成功地创作举世闻名的巨作。从叙述中不仅让人了解画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同时还告诉人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孙世昌在《严冬寓春的 寒鸦图 》这篇评介文章中，敢于质疑前人已得的结论，而提自己新的看法。

在“画家评传”里，如《格里高莱斯库与巴比松》、《德加一生及其作品》、《周昉的 簪花仕女图 》、《东山的世界》、《画家劳特累克简介》、《杰出的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等文章和译文中，也都从各个角度介绍了画家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油画学习笔记》是老油画家费以复同志多年来从事油画实践的经验之谈，从作画步骤、观察方法到用色用笔无不细致入微地加以阐述。

《构图原则与构图因素》是连环画《白求恩在中国》作者之一的顾莲塘同志写的一篇心得。文章简明通俗，深入浅出，文图并茂，条理清晰，读后使人对构图原则与构图因素有所了解。

译文《黄金截》以若干幅世界名画为例，向我们介绍了构图的优选法。

拉普切夫的《钢笔画》一文，是苏联老一辈画家多年实践的结晶。它被列入苏联高等美术学院学生必读书目之一。作者在这里着重地探讨钢笔画技巧方面的种种规律，最精采的是作者通过对诸如伦勃朗、梵高、戈雅、古尔布兰生、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钢笔画作品的分析，是独具慧眼引人入胜的。

在专题论文中，李浴教授的《谈谈裸体美术》是一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它从文艺理论角度，回答了社会上的种种非议。

《略论中国古典画论中的现实主义》是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作者摘引了中国历代古典画论中的一些典型论点，整理归纳，去粗取精，终于摸出其现实主义脉络，使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古典画论中看出一条现实主义的主线。

王向峰同志在论文《艺术的形象思维》中，阐述了艺术形象思维的方法、对象、功能的特殊规律。

《造型艺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成果。当我们将这四期刊物作一个粗略的巡礼之后，顿时心情振奋，有如春日登山之感。放眼四

望，一派生机。《造型艺术》恰似一座新开辟的花圃，有经霜后又发新枝的老树，也有茁壮成长的幼苗，现在已是春色满园日见芳菲了。但距离长成茂林佳卉、硕果累累的佳境，尚需一段时日和继续不断的努力。

（原载《美术之友》 1982 年第 1 期）

《造型艺术》丛刊，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每册定价 4.50 元。

## 探索者的回答

——略评《摄影技术 200 问》

浦漫湘

《摄影技术 200 问》，像一位稳健而又机灵的引路人，把我们领进了摄影技术这个有些“神秘色彩”的世界。过去，偶然读过一些摄影技术方面的文章，大都是分散在报刊杂志上，还很少看到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摄影技术和技巧的书。这本书是从大量的日本摄影技术资料中选择的，并结合国内摄影新兴工业的特点，从镜头、快门、相机结构、附件、摄影技巧、用光技巧及闪光灯、彩色摄影，暗房技术等九个方面编写组合而成。在这里所回答的 200 个问题，多是摄影技术专家、摄影家在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中，获得的总结；而这 200 个问号，又恰恰是许许多多摄影工作者在向摄影技术和摄影艺术深度、广度探求的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问题，书里引述的资料是新的，涉猎的内容是新的，介绍的器材也是新的，而且还附有 120 多幅“画龙点睛”的彩色和黑白范图，令人耳目一新。在艺术领域中，一些艺术形式，不论是音乐或是绘画，都以它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直接向人们说话，而摄影这门艺术确是通过相机来表达它的语言的，那么，照相机对于摄影家来说，不恰恰如同一个骑手和一匹骏马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吗！倘若一位摄影家不懂得相机的结构和性能，就像一个企图驾驭骏马的人，根本不懂骏马的性格一样。当前，摄影已从黑白发展到彩色摄影。相机的小型化、电子化、全自动化是我国摄影发展的明天。《摄影技术 200 问》的编译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对于日本先进的相机器材和彩色摄影作了着重地介绍和论述。同时，也涉及到 35 毫米相机为什么能成为当今的全盛时代，以及我国摄影新兴工业中，都生产哪些高级相机和小型相机及其应用等等。

艺术总是跟随着时代的音响前进的。人们要求摄影作品反映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渴望在反映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要求在拓展祖国壮丽山河和自然界的景象中，开阔视野，得到美的享受。有的摄影工作者苦于不能用相机表达他眼中寻找到的和心中感受到的美；比如，有的人不知拍了多少象征北国风光的雪景，却都没能拍摄雪的洁白晶莹，望着底片上平庸无光的灰白色而一筹莫展；又比如有的摄影者，不能抓住“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的最好瞬间，追拍、捕捉动感很强的人物近影，或自然景象中含蕴的神态与风采。在《摄影技术 200 问》中，回答了从一年四季太阳光怎样变化，不同天气里如何能拍摄出人物、自然风光等许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摄影技巧问题。怎样拍摄晴、阴、雨、雪，怎样拍摄早霞、晚霞，怎样拍摄日出、日落、远山、夜景，以及怎样拍摄婴儿等等，都有专家和探求者实践积累的第一手经验可资借鉴。土地，是以它的肥沃和生产而被估价的，书籍，是以它的内容与符合社会需要而来评说的。因此，当《摄影技术 200 问》问世之际，希望广大读者在实际应用中给予适当评价。

（原载《美术之友》1982 年第 3 期）

《摄影艺术 200 问》于海寰编译，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2 年 3 月出版，定价 1.50 元。

## 真实历史的艺术再现 ——评长篇小说《黑色的土地》

刘烈恒

在异彩纷呈的文苑中，不少作家把注意力投向具有地方特点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用以展示我们民族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在此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民族精神，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艺术探索。刘大海同志的长篇小说《黑色的土地》就是这样一部引人注意的作品。

—

《黑色的土地》描写的是东北人民特别是辽宁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活斗争。这是现代史上东北人民最痛苦的一页。从20年代初期开始，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军阀就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狗咬狗的火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接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把人民推进殖民地的深渊，使千百万人民辗转挣扎于死亡线上。作品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真实地展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着力表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命运。它以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个农村寒羊屯为中心，通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和活动，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的描写，透视出风波迭起的时代风云，反映了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皇姑屯炸车、张学良“易帜”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作者努力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在集中笔力描写寒羊屯的变迁的同时，力求勾勒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尽量通过寒羊屯人们的眼睛或者亲身经历事件的演进过程，把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时代、社会同寒羊屯这个具体环境联系在一起，使寒羊屯的各种人物的遭遇命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广的社会意义。

“九·一八”事变是作品重点反映的历史事件。这是个震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它是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大暴露，也是东北三千万人民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备受蹂躏的悲惨历史的开始。《黑色的土地》艺术地再现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始末，因而它格外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但是，作者并没有孤立地去写这一事件，而是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发展激化中写出事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在揭示矛盾的具体描写中，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的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所造成的贫穷羸弱状况，另一方面，又处处使人感觉到侵略者覬覦的目光和已伸出的魔爪，随时准备猛扑过来。作品中关于本庄繁在官邸里阴谋策划挑起事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描写，颇为真实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从而比较清楚地写了“九·一八”事变的客观形势。同时，把写事变和写寒羊屯又紧紧扣在一起，既写了事变在寒羊屯各类人物中引起的反响，又通过寒羊屯人们眼中见到的东北军撤退，大学生流亡和议论国联调查团、参加抗日救国军等描写，反映了各种社会势力对事变的不同态度，展现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交织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于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生活的沈阳地区的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富于强烈的真情实感，并从对历史生活的回忆中，受到启迪，昂奋起来，走向新的起点。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人是生活的中心，也是艺术描写的中心。在《黑色的土地》里，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众多人物形象。作为一部在历史真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的长篇小说，根据艺术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在人物的刻画上也相应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对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是作为时代背景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囊括进作品的，所以就着重于事件过程的交待，对其中的人物，只求概貌上符合历史的真实，没有向深处开掘，人物随事件的发展而出现，随事件的结束而消失，而寒羊屯，则是作者着力展开艺术描写赖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环境，因而对其中的人物就细致描绘，着意刻画，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命运，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对于赵万兴、赵春海、赵胜一家三代人的描写，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个特定时期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命运和他们必然走上的历史道路，从中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外敌面前敢于反抗强暴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传统性格。

赵春海，是作品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农民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凝聚了我们民族的质朴、醇厚、谦和、知礼和追求正义、不畏强暴的性格特色。对父亲，他那样恭顺，对宝黛，他那样体贴，面对屠海山强占地垄的不义之举，他敢于据理力争，直至上书告状。官司没有打赢，就毅然放火烧了屠海山家的柴堆，然后愤然出走。这些，生动地表现了他执拗倔强敢闯敢斗的性格，比之父一辈，他更有锐气。投军后，虽然一时还辨不清是非，但却保持着质朴正直的品德，不趋炎附势，不残害人民。“九·一八”事变后，他终于认清了日本侵略者是真正的敌人，所以当唐司令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号招募兵员时，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寒羊屯的十八人中已有十七人逃离队伍，只有他抱着一心打日本的信念独自留了下来。当他一旦发现这个救国军的“抗日”不过是骗人的招牌时，便离它而去。经过辗转的奔波，坎坷的苦寻，才找到了韩占江所部的抗日队伍，最后成为杨靖宇率领下的抗联战士。赵春海的生活道路，在那个历史时代是颇具代表性的。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造成了农民的自发反抗性，民族危机的加剧，唤起人民投向抗日的战场，他们的革命也从自发性走向自觉性。作品在塑造人物上，没有随意拔高，而是尊重历史，正视生活，真实地表现了二三十年代东北地区的农民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因此，赵春海的性格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品中的赵万兴，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也是个性格较鲜明的人物。他是寒羊屯中的小户人家，完全靠自己劳动过活，一遇天灾人祸，生活便失去保障。他正直、善良，有骨气，但也保留着旧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不理睬赵春海带回来的“鞑子”姑娘宝黛，甚至拒绝她进家门，反映了他们的种族偏见，但宝黛的贤慧、能干，终于使他受到感化，从而转忧为喜，变怒为笑，主动为他们完了婚，这些又揭示了他心地的朴实善良。对屠海山、赵满仓等大户的骄横自得，他不亢不卑；对疯狂肆虐的日本侵略者，他表现出一种更富于韧性的抗争，神原政雄打他，他一声不吭，对关东军养马场占地钉下的木桩，他比别人更坚决地一次次拔掉，尽管这种反抗是简单的，但却表现了他对敌人的无比憎恨。特别是对儿子赵春海参加抗日队伍的行动，他更是热诚支持。他爱儿子，担心儿子有闪失，但只要听说儿子在打日本，心里就坦

然了。因此，当宝黛提出要去找春海时，尽管他的内心交织着犹豫和担心，终于还是同意了，表明了他的深明大义和爱国热忱。赵万兴的形象，概括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共同特点；他不是革命者，更称不上是英雄，但他的思想性格中，却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因而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作品中写到的一些其他人物，如屠海山、赵满仓、宝黛、王二毛、杨子雷等，也都有一定的性格，他们分别体现着那个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某些特征。

### 三

《黑色的土地》是反映30年代前后东北地区的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上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是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鲁迅说：“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可以看出，作者是很熟悉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沈阳一带的风光景物和民情风俗的，因而写来真切，形象，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情趣。在风光景物方面，关于沈阳的福陵、昭陵、八门八关、柳条湖、北大营、东大营、皇寺的喇嘛庙和街市商号、露天市场等的介绍以及高粱的红脸儿、豆子的炸瓣儿、谷穗的耷拉头等描写，都勾起人们的无限乡思；而春海成亲的礼仪、豆腐房炕头的夜话、娘娘庙前的雇工、求雨的场面、奉天落子的曲调、抓蝥蛄的情景等风俗民情，尤使人感到亲切而为之动情，甚至在秋收季节，庄稼院里吃的那高粱米小豆干饭、大葱大酱拌豆腐、豆油拌咸萝卜，也极具地方风味，仿佛历历在目，清香扑鼻。这些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色彩与情调。作者按照艺术构思，力求把这些与人物行动、故事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绘出一帧帧富于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风俗图画，以表现“时代的生命和情绪”。

《黑色的土地》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建设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学，除了表现某一特定地区的整个自然环境、各种社会关系以至更大范围的时代背景外，最重要的是写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各具特征的风俗民情。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是作家创作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潜入生活海洋的深处，善于发现和把握那些最有特征意义的东西，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才能形成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

这部小说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表现历史事件和塑造人物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上还不够贴切和谐；写历史事件固然可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但更主要的还应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因此必须从写人出发去写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中，这两者往往处于若即若离状态，造成游离感和割裂感，影响了作品开掘生活的思想深度。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显得功力不足。由于故事情节的发展缺少大的波澜，很难为刻画人物性格提供有力的契机；又由于较多着笔于人物的外在东西，对其内心世界和感情领域探掘不深，所以主要人物形象就显得单薄。对宝黛这个人物，开始已写出一定的性格特色，本可以进一步刻画其性格的发展，使之更加丰满，但后来却把她游离于情节之外，不仅影响了形象的完整性，而且给人以模糊之感。

(原载《春风》小说双月刊 1983 年第 2 期)

《黑色的土地》刘大海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6 月出版，定价 0.78 元。

## 难得的勇气 ——评长篇小说《叛女》

洪 钧

献给

为了新生叛逆没落，  
为了光明叛逆黑暗，  
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们。

这是邢院生写在她的长篇小说《叛女》前面的一段献辞。力透纸背，耐人深思的献辞，引导着读者结识了书中的一群叛女，并从这群叛女的身上，听到一曲浑厚、深沉、充满着勇气和力量的赞歌，一曲颂扬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敢于反抗、敢于叛逆、不为黑暗势力所屈服的赞歌。

《叛女》通过为人们所陌生的环境，写出了在一个在人们看来并不陌生的故事：清末民初，出身于两江总督之家的贵族姑娘润格，尽管她美丽、善良、聪慧，多才多艺；尽管她身居深宅大院，又有着不愁吃不愁穿、饭来张口、水来洗手的优裕的生活条件，然而，她并不快乐，也不幸福。当她年幼的时候，得到的是与野蛮的禁锢相差无几的“保护”；当她长大成人，需要爱情，需要在心灵上有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时，命运能够给予她的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男人和一个阴险毒辣的婆婆，从而使她从一个火坑跌进了另一个更为阴森可怖的陷阱。血腥的桎梏，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她作出了强烈的反抗：毅然决然地放走被认为是疯癫而又禁锢十年之久的丫头——秋菊。当她得知自己是一直寄予幻想的父亲强奸了买到手的逃荒女所生时，才切肤地认识到她所栖身的深宅大院是多么龌龊，她所面对的生活是多么腐败，她所崇敬的人又是多么卑鄙多么狰狞！世界的黑暗，窒息得人们实在是难以喘息，然而，要冲破黑暗的人，并不能立刻寻找到光明。润格出走之后，依然是前途渺茫，走投无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寻死不成，只好靠卖艺为生。一个女人，在荆棘丛生，蟒蛇横行的社会里卖艺，常常会迫不得已地卖掉自己的灵与肉。这样，命运又毫不掩饰地向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还是挣扎着以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活下去呢？刚直的润格终于选择了后者并同革命者江放和其他几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妇女一道，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当中，从而真正地体味到人生的伟大意义。

《叛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家庭，“漆皮剥落的朱红廊柱”，“古老的深宅大院里特有的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一些人的生活习惯和与时代大相径庭的着装打扮，这一切，都是对这个腐朽、没落家庭的直观写照。在这个家庭里，托方夫人是一个淫威十足而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统治者。她的丈夫两江总督托方，因为逆历史的潮流而动，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严正的判决，致使托方夫人得到的只能是丈夫那颗被装在煤油桶里的人头。虽然不是托方夫人所生，但却被她攫为已有的小姐润格，以其刚直的性格和不可侵犯的气势，常常使专横跋扈的托方夫人忐忑不安，胆战心惊。所以，当润格要出嫁的时候，托方夫人不得不在润格身上采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进行威逼和笼络。不同的地位，决定了托方夫人同润格的关系，必然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润格的强烈反抗，正是

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叛女》中的托方夫人，是腐朽、罪恶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的贪得无厌，她的嗜杀成性，她的腐朽无能，在作品里都做出了出色的描写，因而生动、逼真地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封建贵族家庭中的死硬派的典型形象。

作者对托方夫人的描写，更加生动地衬托出小说的主人公润格。

老来无子，在托氏家族的统治者看来，是最大的缺欠，女孩不能传宗接代，更是他们不愿意改变的偏见。尽管如此，托方依然把润格视为掌上明珠，托方夫人还是谋杀了润格的生身母白颖，并瞒天过海地把润格据为己有。这本身就形象而又入木三分地说明了托氏一家的贪婪、自私和残暴。托方为了填补因为膝下无子而产生的空虚，把润格当做男孩一样教育，结果在润格身上，却形成了胆大、任性、无所拘束、无所畏惧，甚至随意嬉笑的性格。这种放松，使润格比一般深闺大院里的小姐们更能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底层，从而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善良的同情心。小说开始时的润格已经不是为托方所娇养的润格了，这时的润格更为聪明、美丽、亭亭玉立，如同她的母亲白颖一样楚楚动人，又加上托方家的优越条件，使她说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过人。正因为这一点，她也深为托方夫人所惧怕。

润格从托家嫁到奎家，表面上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实际上却不然。在这个家庭里，奎老太太是托方夫人的代理人。丈夫奎啸龙整日吃喝嫖赌，肆意挥霍，可以说无所作为自甘堕落的八旗子弟身上的劣根性几乎被他占全了。作者对八旗子弟的代表人物奎啸龙的描写是生动的，维妙维肖的。这个人物，如同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封建统治阶级末代的堕落行径，与此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想得更多更广。润格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所寄托的幻想破灭了，唯一能够牵动她的就是孩子。同样，还是因为孩子，才使她在奎家母子所代表的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面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地位的变化，唤起了润格身上早已凝聚的反抗精神，不过这种反抗，仅仅是一种“大家闺秀”式的反抗，是润格式的反抗，反抗的结果，便是决裂，对婆婆的决裂，对丈夫的决裂，以致发展到对整个家庭的决裂。如果说润格的出走是对封建势力的一种叛逆的话，那么，这仅仅是不自觉的叛逆，或者说是朦胧中的叛逆，即便她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悲惨命运后，她的反抗也没有跳出个人的圈子。这样写润格，看来不那么“高大”、“完美”，但这一点恰恰是真实的没加粉饰的润格，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为了解释某种概念而患上了“贫血病”的润格。写好人，好得不能再好，这是神化；写坏人，坏得不能再坏，这是鬼化。无论神化或是鬼化，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鲁迅在评论《红楼梦》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如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引自《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不必讳言，已经为曹雪芹所突破了的写法，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一些人，一些作品。从这一点看来，《叛女》在写法上的无拘无束，也说明了作者的追求和勇气。

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奎老太太，作品也给予了充分的展示。这个人既有托方夫人身上的阴险、毒辣、愚昧无知的一面，也有不同于托方夫人的一面。总的看来塑造得比较成功。如若求疵谈来，我以为作为托方夫人在奎家的代理人，奎老太太未免有点过于托方夫人式了，而对这个人物的个

性的展示，仍嫌不足。

奎老太太的专横和暴虐，引起了润格不自觉的反抗，润格从不自觉的反抗，过渡到自觉的叛逆，必然要经过许多的坎坷，许多的痛苦。作品中的江放正是润格这种坎坷、这种痛苦的见证者、同情者，并对润格挣脱坎坷、排除痛苦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他的正直干练以及不屈不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赢得了润格的信任和爱情。但江放不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他也有自己的追求和苦闷，这种在执着的追求中产生的苦闷，正是每一个向往真理、追求正义的青年不可避免的苦闷，当他一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找到了革命的队伍，就会化苦闷为力量，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江放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润格，终使润格的叛逆行为变成自觉的有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的重要标志，就是她对人生的认识：“人生在世，不能浑浑噩噩地活着，要生活，要清醒地生活。”润格不仅是这样说的，她也是这样做的。

《叛女》除了为我们塑造了托方夫人、润格、奎老太太、奎啸龙、江放等人的形象之外，还有义和团失败后被禁锢的红灯照姑娘奇侠，有因家境贫困靠卖艺为生后来参加了革命的路拾遗，有“二·七”大罢工工人的后代，有被深锁在王府大院里的婢女和被迫为太监小妾的孤苦无告的少女等等。这些人物，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不管是贯串全书的，抑或是走走过场的，作者都倾注了自己的笔墨和心血，因此，也是鲜明生动历历在目的。尤其是其中的润格、奇侠、路拾遗等女性，更以异乎寻常的叛逆性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组成了一群令人耳目一新的叛女形象。

如前所述，特定的环境，常常是作家用来展示人物的生活，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叛女》中润格等人物性格的形成，就没曾离开她曾赖以生存尔后又与之决裂的封建贵族家庭，没曾离开为她的命运铺设出种种坎坷的社会。但是，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更是必须明确的、含糊不得的。这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除了取决于特定环境的设置之外，还与时代背景的选取不无关系。《叛女》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书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活动着，这就必然使作品产生更为广泛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不必讳言，《叛女》也有她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全书的前半部紧凑，后半部写润格同江放结合后失于松散；写贵族家庭生活时，有色彩，有特点；写党的地下工作时就显得捉襟见肘，笔力不足；写城市生活，特别是写老北京的生活时，绚丽多彩，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拍案叫绝；写农村生活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平淡肤浅；还有，当作者涉及到某些知识性的材料时，往往与人物的性格、行动照应不够……这一切，无一不是同作者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应当说明的是，《叛女》是作者的第一部书，是身为医生的作者，在“文革”期间因为反对江青的肆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书稿被抄没，又在牛棚里，用一只笔尖在水泥地上磨了又磨才重新写出来的。作者不为自己的逆境所动摇，不为“四人帮”造成的动乱所迷惑，这本身就说明了她对未来的憧憬与信心。然而，作为一位与文学艺术无涉的医务工作者，能用小说这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表达自己对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评价，并且毫不气馁地通过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背景，塑造出一群富有叛逆性格的妇女形象，这又足见作者有着令人钦佩、实为难得的勇气。

（原载《春风》小说双月刊 1983年第2期）

《叛女》邢院生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6 月出版，定价 0.80 元。

## 历史上第一本满族民间文艺集 ——评《满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

〔日〕太田辰夫作  
白希智译

在中国广阔的疆域里，居住着 56 个少数民族，其中几个主要民族均建立了自治区和自治县，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勿用待言是得到了继承和尊重的。当然，这些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间文学，但是历来被作为重点采集和记录的仅是西南几个少数民族。至于满族民间传说和故事除了在伪满时期有过一些采集之外，似乎是没有值得提及的东西。对于满族来说，是否没有自己独特的民间文艺呢？笔者对此早就是有疑问的。

满族民间文艺之所以迟迟未能搜集有着各种原因，诸如满族是以东北和北京为中心，散居在各地，由于多是与汉族杂居着，没有建立像自治县那样的组织；在文化上也汉化的很厉害，自己民族的原来语言几乎忘净。除上述一些原因之外，也必须考虑到，清朝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它必然地要遭受中国人民、尤其是汉民族的反感，因此，民国成立以后，满族本身普遍有抬不起头的思想。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中苏争端而普遍地认识到，获得中国广大疆域的满族，曾经在保卫祖国边疆的完整有过功绩，从而对满族进行了新的评价，因此，满族抬不起头的日子逐渐过去了，满族历来被说成有 260 万人口，但最近推算约为 500 万。这并非是满族实际上增加了人口，而是迄今为止隐秘了民族成份的满族人们，鉴于满族这棵残树又回生起来，自己又恢复了原来的满族成份。

满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尚不清楚，似乎这是作为中国民间故事挖掘整理一个方面着手的，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可能出于民族意识吧？不了解什么地方搜集工作最为繁盛。1978 年决定大学里进行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开始编纂了教材。由此，编纂了定名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全五册），因为全部是搜集记录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所以可称得上是划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代表作品选集。但是，以五册的少量篇幅容纳 56 个少数民族作品，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说是样本而已。其中满族作品收入第一册，而满族民间文学，只不过是编了三首歌谣、五篇民间传说故事。

另一方面，辽宁省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编纂满族文学史，成立编委会，进行认真研究讨论，拙著《满洲文学考》也被翻译成中文（译者白希智），从已编印的《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学术年会材料二十三》来看，可以想像是如何认真地进行研究探讨的。

因为满族文学史在此之前是不存在的，对它的编纂有各种困难问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论述，只就其中一个问题，即所谓对满族文学这个问题持何种观点，一般地说作者是满族，他的作品自然可称其为满族文学。但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与满族文学名字相适应的满族的满族文学又是什么呢？笔者就其构成条件，试列举出两个方面：一、反映满族的社会、生活、风习、语言；二、反映满族的精神、思想观点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完满达到的作品，过去似乎是并不太多的。



《满族民间故事选》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吉林、黑龙江分会联合编辑，1981年10月由辽宁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它是为以上所说的编纂满族文学史民间文学部分提供材料，所以也是满族文学史编纂工作的一个部分。

该书共搜集了五十一篇民间故事（包括传说和名人轶事），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所收入的五篇相比，是超过它的十倍。由于是精选出的优秀作品，所以是值得满族夸耀于中外的大事情。同时，又由于是老舍夫人胡絮青写的序，满族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的书名，所以也不能不说是创历史性的第一本满族书籍。本书没有能收入的一部分作品，已在别处得到发表，比本书更早些时候出版的《镜泊湖民间故事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编）就是一例。

该书第一部分：清朝开国的传说（从长白仙女吞食赤果开始，到清始祖出生等有名的传说）和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第二部分：以特殊物品作主题，时间地点不固定的民间故事。如：转着圈歌唱的玉杯、石人（人形石头）、寄托希望的桦皮篓故事以及北极星的传说等；第三部分：关于地名的由来，地方的特征等。如：牡丹江名字由来，齐齐哈尔为什么好刮大风等；第四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名人轶事的故事。如：百花公主误杀了忠贞的将军；铁索罗王和铁木其王的争风吃醋（这是非常有趣的）。皇帝选妃子，选中了黑皮肤的渔民姑娘的故事；第五部分：是剩余的八篇，均为优秀作品，似乎都是有名的篇章，因而不忍割舍。

在这里，笔者就满族文学应当具备满族文学的两个条件进行一些探讨。本书收入的51篇，全部是反映满族的社会和生活风俗的。满语在本书中都有注解，这可能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其次，所谓满族精神应如何看待？迄今仍是个难题，不便于简单作出结论。但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此即是肯定的人物性格和言行的具体表现，以这样观点来观察分析这些主人公的时候，可以了解到满族是相当勇敢、纯真、善良而富于正义感和持有牺牲精神的民族。该书所搜集的各个篇章，不单单限于是流传于满族之间的文学作品，而更应看作是与满族文学这个称呼相一致的优秀作品。

（原载日本《东方》杂志1982年5月出版）

《满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定价0.76元。

## 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 ——评介长篇小说《高粱红了》

王德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公然地撕毁了“双十协定”，急急忙忙地从“山上”跑下来摘“桃子”，疯狂地发动了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从海陆空三路大举向东北运兵，强占了許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东北工作的重心明确地指出：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蒋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镇和广大农村，认真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由于解放区逐渐巩固和我军游击战发挥的强大威力，向东北之敌发起了总攻，终于在1948年底取得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高粱红了》这部巨著，比较全面地描写了东北解放战场的面貌；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这部小说由《乌云密布》、《战鼓催春》、《紧锁关山》三卷长篇组成，由花城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乌云密布》，写的是1946年10月，东北的蒋军以十多万美械装备的部队，向我辽南解放区进行了猖狂进攻，企图北渡松花江，占领整个东北。由于我军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依靠群众，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保卫临江，开展敌后游击战，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计划。《战鼓催春》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1947年夏季攻势为背景，着力描写了大华山和梅河口之战。《紧锁关山》则以1948年10月塔山阻击战为内容，展示了当时我军与蒋军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战局。

辽沈战役的战线拉得很长，范围也很广，从哪里写起，写什么？是要用一番匠心的。锦州是联结关内外的战略要地，打锦州便是辽沈战役的关键。而锦州西南方向的塔山阻击战和东北方向的黑山阻击战，又是能否打下锦州的关键。塔山阻击战先于打锦州前四天开始，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我军终于取得了胜利，随之解放了锦州，东北之敌犹如秋风扫落叶，注定了他们必然要覆灭的命运。所以作品写塔山阻击战，是反映辽沈战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

《乌云密布》、《战鼓催春》、《紧锁关山》三卷既有连续性（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又可以单独成书，（主要故事的具体内容不同）。《高粱红了》这部三部曲，通过对战争生活的多方面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命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高亢地讴歌了人民的正义战争，无情地揭露了阶级敌人和一切黑暗势力的反动本质。对我们正确认识战争，正确认识革命的历史，正确认识我们今天面临的建设任务，是很有益的。

繁荣和发展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今天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在一部分人中，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人中，缺乏为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我们的人民，当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事业，也是十分需要的。因此，《高粱红了》这部小说，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提倡共产主义的精神，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高粱红了》一书中的林玉生，是作者着意描写的英雄人物。林玉生从一个穷孩子

参加八路军，在党的教育下，在战火的考验中，成长为一个智大勇、屡建功勋的人物。不仅在战场上二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敌人的营垒中，也同样表现出不惧艰险，具有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气概。辽沈战役打响后，为了争取敌人投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赤手空拳深入虎穴，不为敌人的威吓所吓倒，不为敌人的捆打所屈服，沉着冷静，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浩然正气，最后终于战胜了敌人，迫使敌人放下屠刀，弃暗投明。

林玉生这个人物，既是我军优秀指战员的典型，也是我军群众工作的模范。刚刚解放了热水屯，封建势力还很顽固，这个屯子里住着两户出名的人家：一家叫王财神，是有钱有势的恶霸地主；一家叫马建寿，外号叫做“猪见愁”，是穷苦的贫雇农。王财神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猪见愁”，并利用“山神事件”，勒索和迫害“猪见愁”。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林玉生带领着工作组进了屯。林玉生觉得“山神事件”背后有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群众的落后和迷信，点邪火，煽阴风，放暗箭，以求一逞。林玉生便抓住这件事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发动群众，向敌人进行斗争，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对王财神进行了清算。“山神事件”的正确解决，拨动了热水屯所有人的心弦。工作组进屯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把全屯搞得轰轰烈烈，支援前线的运输队、担架队迅速地组织起来，不少青年小伙子积极报名参军，坚决要求拿起枪杆子，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同时组建了村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由于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注意走群众路线，所以在辽沈战役的时候，才能动员起几十万民众参军参战，最终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只有依靠军队才能进行战争，我军也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巨大力量。小说通过林玉生这个人物，形象地体现了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作者在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时，对普通人物的描写也没有忽视。《高粱红了》这部作品，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其中不少是写的普通群众。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好似默默无闻，但显露出来的崇高品德，却是光彩照人的。高缀子这个人物的形象，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缀子的家住在辽东的一个山窝里，母亲早已去世，她带着弟弟帮助爸爸度日。在一次战斗中，蒋军的一个匪连长闯进屋来，刺死了她的爸爸，就在缀子即要被糟蹋时，人民解放军班长刘福带领三名战士冲了上来，营救了缀子。可是，缀子连他在哪个师团，哪个连也没有来得及问，刘福他们就匆忙地离开了。刘福的形象，却牢牢实地印在了缀子的心坎上，水也不能把它洗去，刀子也不能把它刮掉。在缀子看来，刘福是她的恩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仇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她对刘福由感激思念之情，萌发了纯洁的爱情。

缀子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决意投奔光明。她翻山越岭，冒着战火的硝烟，一定要把刘福寻找到。

在战争的岁月里，缀子要找到刘福是很难的。对刘班长的恩和爱，对敌人的仇和恨，使她产生了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克服了多方面的阻拦，女扮男装，参加了支前的担架队，随后又参加了解放军，在野战医院里做护士。功夫不负有心人，缀子与刘福最后终于见了面。

作品通过这些爱情的描写，形象地塑造了一个美好、善良的青年妇女形象。

高缀子这个人物，全书开头不久就出现了，一直贯穿到结尾。她对刘福

的爱情，作品中时隐时现，从未中断。从小说的结构看，缀子是一条副线，它与战争那条主线相辅相成，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从艺术技巧上看，它造成了许多悬念，引人入胜，如果缺少这样一条副线，一个战争场面接着一个战争场面写下去，作品就会单薄得多，容易显得枯燥，削弱它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塑造缀子这个普通人物的形象时，没有写她有什么惊人的作为，也没有描写她气贯长虹的气概，而是通过她的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对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她勤劳、纯朴、坚贞、热情等崇高的品德。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注意了对普通群众的刻画，让英雄人物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之中，红花绿叶相衬，使人感到可亲、可爱、可敬、可学。

《高粱红了》在写好几个英雄人物外，还描绘了许多军内外群象。如洪大憨、黄万金、杨锁柱、高秋英、初大哥、穷神爷、马大爷、酸菜大嫂，还有“老革命”等等。这些人物都是普通群众，但他们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使人肃然起敬。在作品里起到了众星捧月的艺术效果。

作者一方面热情洋溢地歌颂先进人物，同时也注意对后进人物的细致刻画，从而使作品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作品中的排长王洪林，就是一个典型的后进人物。他觉得丹东一失守，整个辽东几个县都要随之丢掉，战争要比抗日时期艰苦了，思想上的厌战，使他对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惯，什么排长、党员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的军事防线被敌人攻破了，王洪林的思想上的“堡垒”也随之被摧毁了。所以，在撤退途中，才能够被一个寡妇、敌匪特所引诱。王洪林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战士，为什么会上一个女特务的当呢？作品告诉我们，这是由他主观因素决定的。王洪林出生在山东半岛的农村里，父辈兄弟三人，只有他这样一个男孩子，全家对他非常溺爱，把他看成是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家里其他人吃糠咽菜，唯独他能吃上五个铜子儿买来的肉包子。虽然他已经十六、七岁了，还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成天游手好闲，什么活也不干。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姐姐被糟踏死，叔父被抓去当了炮灰。在这种强烈的家庭仇民族恨的冲击下，他愤然地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八路军。由于战火的磨炼，使他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改变他在家时养成的不良习惯。但是，日寇投降后，他随部队进了城，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旧病复发，滋生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因此，在我军不利的情况下，便悲观失望，产生了颓废情绪，终于上了敌人的圈套，这是毫不奇怪的。经过组织的耐心教育，王洪林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革命的斗志，在一次掩护部队后撤的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的脖子被敌人子弹打穿了，鲜血直流，湿了衣裳，仍然抱着滚烫的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后来他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引诱下，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本色。

作品对王洪林这个后进人物的转变，作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写，是颇为感人的。实践证明，反映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描写我军内部的落后面，不但不会给军队脸上抹黑，相反，它说明我军不仅能战胜外部之敌，也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之处。作品里写落后面，对扩大题材的广阔性，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加深主题思想的深刻性，都是完全必要的。我军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但它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必然反映到军内来，从而形成军内的各种矛盾。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矛盾事物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没有落后，就没有先进，没有先进，

就无所谓落后，因此我们创作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写先进人物的同时，也写落后人物，这是事物本质规律的体现，也是文学作品故事情节的需要。作品的故事情节，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物矛盾关系发展的历史。当然，我们在作品里写先进和落后两个方面，既不能平分秋色，也不能正不压邪。写落后人物是为了更好地烘托先进人物，更好地服务于塑造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

我们写军事文学作品，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四化建设，有利于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有利于我军建设和打击敌人，用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作者正是从这一原则及指导思想出发，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艰苦的创作，把《高粱红了》这部长篇巨著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部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结构还不够严谨，语言还不够精炼。但瑕不掩瑜，这部长篇小说，无论在主题思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技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原载《作品》1983年第7期）

《高粱红了》肖玉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定价7.50元。

## 追求美的表现 ——谈三本书的封面设计

鹿耀世

春风文艺出版社李勤学同志几件较出色的书籍封面设计，使人耳目一新。

先看《北海道纪行》。在湛蓝湛蓝的天宇之中，一座银白色的纪念塔巍峨耸立，拔地入云；一只秀丽的鸽子正振翅高飞，迎着鲜红的太阳……在那塔座似的黑色块中，镌刻着“北海道纪行”一条书名。整个设计立意新奇，对比鲜明，显示了设计者对创作素材进行提炼、夸张及装饰构图的功力，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再看《岳飞传》。在一片浓黑的底色之中，上悬一轮圆月，下立一员捻须仗剑的武将，右侧是“岳飞传”三个沉雄有力的草字。近几年这类历史小说的封面上，多是大动干戈的写实图画或刻板的单幅人物白描，而讲究立意和构图，生动揭示书稿特性的佳作较少。《岳飞传》的封面设计，以劲健、准确的勾勒，塑造了岳飞忧国忧民的生动形象，以简洁、洗炼的构图，体现了苍凉悲壮的满江红词意，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白衣侠女》的封面，则是在一片沉着的翠绿之中飞腾起一个手握利剑全身素白的俊美女子。她秀眉紧锁，聚集着对强敌的蔑视和仇恨。她的头巾和披风高高扬起，宛如娉娉起舞的白莲——而这部小说就是描写清代中叶白莲教农民起义的。这幅封面，设色蕴藉沉着，线描娴熟洒脱，人物造型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封面设计是书籍装帧中重要的表现形式，无论构图繁简，都要符合书稿特性，具有装饰匠意。李勤学同志的一些封面设计较好地体现了这些要求。

（原载 1983 年 11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

《北海道纪行》韶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2 月出版，定价 0.52 元；《岳飞传》（上、下）刘兰芳、王印权编写，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5 月出版，定价（平上）1.05 元，（平下）1.25 元，（精上）1.65 元，（精下）1.85 元；《白衣侠女》王占君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8 月出版，定价 1.05 元。

## 燃烧吧，永不灭的火焰 ——评《老战士摄影》

浦漫湘

我深深地喜爱着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也不止一次地被专题摄影画册拨动过情丝，然而，唯独《老战士摄影》画册使我热泪滚滚，心潮澎湃。

这部画册是从1982年在北京举办的《老战士摄影作品展览》展出的作品中选编的。它汇集的200幅作品，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历史，概括了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展示了这期间各个重要阶段的战斗生活，集成了一幅幅可以连接起来阅读的史诗般的画卷。那一幅幅现场感十分强烈的作品，重如千金，在我眼前熠熠闪光；那一场场战斗胜利的纪实，宛如一阵阵惊天动地的春雷，在我的四周隆隆滚荡。一幅幅作品，就是一份份燃烧的激情，使我深深地被画册中强烈的革命精神所打动。那一张张记录历史脚印的珍贵照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前人是怎样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为了拯救祖国，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我们从祖国的前天和昨天中，吸取使生命之树常青的营养，自觉地闯出一条闪光的路，奔向明天！

人们常说“摄影和绘画作品一样很难言传，需要观看”，这不论是过去无法变更的生活表象，还是将来永远不会重现的特有瞬间，那强烈的没有半点虚假的现场环境，那浓郁的战斗生活气息，使你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之中，恰好是“极奇特处极稳健，极雄厚处极含蕴”。作品内容丰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战斗性，达到了化景物于情丝，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功力。《八路军骑兵向华北挺进》、《威震华北的八路军铁骑兵》、《在高高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我军突破敌人的外围防线》等等不胜枚举的作品，恰切地表现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特点，深刻地反映了那一代军人的精神风貌。《抗日时期的民兵训练》、《指点逃敌目标》、《踊跃参军》、《担架队》、《子弟兵的母亲》等主题近似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战争年代，人民是革命战争的坚强后盾，人民是革命战争胜利保证的史实。《占领总统府》、《进驻拉萨》、《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等作品，是伟大胜利的见证，是敌人最仇恨的时光。看到这历史变革的纪实，谁能不想起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百年来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以及今朝翻身解放的新社会的来之不易，从而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战士摄影》画册中老战士们用摄影机谱写了数不清的真实、质朴、感人，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表现了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战役中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朱总司令、彭司令员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深入前沿阵地，率领千军万马指挥战斗的战无不胜的气概和气壮山河的风度。画册中出现最多是那些不知姓名浴血奋战的普通人，无论是冲锋杀敌的指战员，还是敲钟唤醒人们崛起奋斗的农村妇女，或是向边区参议会献礼的老人，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这些作品，蕴藏着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凝聚着深沉不竭的战斗力量，是热血、激情、理想、信念、智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和无穷创造力所汇织的最美妙的交响曲，是伟大中华民族性格和风貌的真实写照，也是一部极丰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

教材。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老战士摄影》画册的众位老摄影战士们，在火与血、爱与恨的燃烧之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以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张底片摄下一个珍贵的瞬间，为历史留下这永恒的不灭火焰和文献性的资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画册显示出来的纪实性摄影的重要功绩，是这篇短文概括不了的。在画册出版之际，本文仅能起喜鹊登门报信的作用，并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开拓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笔者最大的宽慰和希望。

（原载《中国摄影》1984年第2期）

《老战士摄影》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定价20.00元。



## 学习古典画论 发展传统绘画 ——评介《中国古典画论选译》

黄复盛

中国画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中国古典画论是我国历代画家创作经验的总结和艺术探索的结晶。中国古典画论具有丰富、深刻的美术理论内容，学习、研究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古典画理论，是发展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古典画论选译》，专门选择古典画论中有关绘画技法方面的论述，全书分为山水、人物、花卉草虫三篇。

这些论述是从大量的古典画论原著中精心选择出来的，是古画论中有关技法方面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点。经过语译以后，明白易懂，较好地解决了一般读者查阅资料和语文方面的困难。该书选编的内容侧重于技法理论，对于中国画的学习、创作都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这是一本帮助读者直接、迅速地了解中国古典画论部分主要内容的普及读物，也是一本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古典画论的基础读物。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是人类绘画艺术中的两大体系。在长期绘画创作、欣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古典画论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和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既具有中国艺术的特点，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至今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中国古典画论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有待于今后美术理论家和各方面的学者密切合作共同探讨。

例如，关于人物画中的传神问题。每一个人不但具有自己特殊的形象，还具有特殊的“精神风貌”。书中的译文写道：“比如说吧，现在有一个人，他以前是个胖子，现在却变瘦了；以前皮肤是白的，现在变成黑的了；以前无髭须，现在却多髭。猛一看，你也许不认识他了，待走近细细一看，就立刻恍然大悟似地叫道：这不是某某吗？你为什么又终于认出来了呢？这是因为，这个人的形貌虽前后改变了样子，但他的精神风貌并没有改变。所以画人物时，你把形貌画得尽管有点误差，还是可以的，如果把这个人物的精神画走了样子，那就看不出你所画的到底是谁了。”

这种遇到了早先熟悉的人、由于外貌改变一时辨认不出来、很快又恍然大悟、又惊又喜分外亲热的经验几乎人人都有。但是，从绘画理论的角度把这种现象提出来，加以分析，并初步作出人物形象与神态存在的某种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联系，这就难能可贵了。这是中国古典画论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范畴。

当然，在造型艺术中，怎样准确地、全面地认识把握一个人的“神”，这是一个复杂的艺术科学课题，一直到现代也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地得到解决。但是，这肯定是一个能够引起人们深入思索和浓厚兴趣的问题。唤起人们的兴趣，给人们以启示，鼓励并指导人们继续探索未知领域，这就是传统知识的巨大价值和力量。

关于画面题款问题。有人说有的画需要，有的画不需要。实际上还应该补充一句：有的画很需要。有的画没有题款，根本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许多中国画面上画龙点睛的题款，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绘画、诗文、书法、

印章的完美结合，加强了艺术感染力，给人以多方面的艺术享受，使作品的艺术水平发生质的飞跃。有的人可能认为，现代绘画作品不再需要题款了，其实不然。有一个现代派画家的作品，画面上画着一只烟斗，画中题款是“这不是烟斗”。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才引起了读者的思辨，这幅画才具有“博论”性质。

《中国古典画论选译》选译清代画家布颜图一段检讨自己年轻时不注意学习题款的话：“可惜我当时太糊涂，不理解，终于没能继承这些前辈的事业，辜负了先生的一番教导。”这些话应该引起现在学习中国画的青年的注意。

总之，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读者认真阅读以后，一定能够从中汲取许多绘画知识，得到许多启发、教益，一定能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国画艺术传统。

（原载《美术之友》1986年第2期）

《中国古典画论选译》许祖良、洪桥编译，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5年8月出版，定价1.65元。

## 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朱鸣冈作品选集》题记

李 桦

艺术是时代的号角，是生活的反映。自原始人的崖画、古代的壁画和卷轴画，以至今天各种类型的美术作品，莫不记录着人类的历史，把社会文明推向前去。人们重视美术创作，就是因为它既是人类的精神产物，又有反过来给社会以极大影响的功能。南齐谢赫说：“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个观点的。

时代不断地前进，艺术也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艺术当然不同于封建社会的艺术，但是重视社会功能这个观点是可以批判地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存在决定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便是以这种思想为依据而展拓开来的。

“五四”以后，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美术领域里，提倡木刻版画，这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是件大事。他说过：“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就是他为革命而提倡木刻的。这门新兴木刻的兴起，体现了中国现代革命的需要。它是时代的号角，是生活的反映，在历史上显出了它的社会功能。50年来，它已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今天的画坛上，它是朵灿烂的鲜花。这是许多老木刻家们长期努力耕耘的成果，朱鸣冈便是其中的一个。

朱鸣冈自40年代初即参加了新兴木刻运动。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出于爱国心，毅然放下了平时画花鸟的画笔，拿起木刻刀，刻起木刻来了。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他抛开了文人抒情写意的趣味，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他开始用刀锋反映人民抗战的意志，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同情在反动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的生活，忠实地记录下历史的面貌，如《敌机走后》、《囚》、《跋涉》、《小公务员之家》、《发饷之日》等，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朱鸣冈这些最初的木刻，技术虽然还不成熟，然而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已坚定地踏上了现实主义的大道，向前迈进了。

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在40年代的后期，朱鸣冈的木刻有了新的发展。他在台湾的短短两年中，刻了许多木刻。这些作品尖锐地暴露了那个反动社会的黑暗面，表达了对勤苦市民生活的同情，如《三代》、《朱门前》、《迫害》、《食摊》、《争取生存的空间》、《准备过年》等，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时，他已克服了仿效西方多用阴刻排线的繁琐形式，而逐渐创造出一种基本上是阳刻，使画面明朗化，节奏分明，线条有力的新风格。这表现他的木刻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他原来掌握的国画传统手法，有助于这种木刻风格的形成，又由于他有较扎实的写实基础，他的木刻非常易懂，深受群众的喜爱。

全国解放后，朱鸣冈的木刻艺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画面上那种忧郁沉痛的感情，为开朗明快的情绪所代替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新社会，新生事物，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去，深入汲取人民新思想与新感情的养料，创作了一批面积较大的黑白木刻和套色木刻。如《战地黄花分外香》，表现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天下无难事》，表现新工人放下手中的铁锤，拿起双簧管，吹奏出人民歌曲的新生活。《宪法公布了》，

表现人民欢呼第一部人民宪法诞生的喜悦心情。《老当益壮》和《田间学习》，表现新农民改天换地，为了发展生产而学习的积极性。《在化学实验室里》，表现科技工作者的刻苦钻研的精神。而《精益求精》，则表现成为工厂主人翁的工人们聚精会神地搞技术革新的干劲。这些作品都充分显示出作者热爱生活，充满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激情，有力地反映了各条战线上的新主题。从形式上说，朱鸣冈不满足于小幅的黑白木刻，而发展了油印与水印的套色木刻，又不满足于过去重视明暗的表现手法，而发展带中国风的阳刻线画的手法。这时，朱鸣冈的探索精神是旺盛的，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朱鸣冈木刻艺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抗战时期，他的木刻还未摆脱西方的影响，以细致阴刻线条的小幅黑白木刻为主，尚未具有自己的特色。第二个时期是 40 年代后期，他在木刻上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创作画面明朗、以阳刻为主而带有中国风的个人风格。第三个时期，是解放以后的 30 年，他开始刻大幅套色木刻，而章法与刀法更臻圆熟而平稳，这时还表现有两种形式的变化，一种仍然用过去精雕细镂的稳健刻法，一种则大刀阔斧、豪迈不羁，都各有所取。不管其形式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以及从严谨到豪放，单色到套色，和从小幅到大幅，其创作态度一贯是严守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的。它们紧密结合着生活，运用写实手法，而又充满感情，是很有感染力的。

艺术是时代的号角，是生活的反映。欣赏朱鸣冈的木刻，可以听到这号角声，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的缩影。这绝不是个人抒情写意的自我表现，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艺术创造。看了这本选集，读者们也许可以理解“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意义吧。

（原载《美术之友》1986 年第 3 期）

《朱鸣冈作品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出版，定价 25.00 元。

## 简明实用的技法教材 ——评介《海景油画技法》

林福厚

如果对大海没有认真细致的观察，没有长期的绘画实践，特别是没有科学的表现方法，要想准确地描绘千变万化的大海，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满足学画海洋的学生、业余爱好者、专业画家的需要，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的海景画家约翰·鲁滨逊著的《海景油画技法》一书。

约翰·鲁滨逊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漫长的海岸就是他幼年时画画的地方。他的作品，在小学时就获奖，到了中学，在全国学校的艺术比赛中又不断获得全国奖。后来他正式学习绘画，曾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艺术学校、加州奥克兰工艺美术学院和旧金山州立大学深造，以后一直从事海景画的研究，其绝大部分作品在俄勒冈州林肯城林肯艺术博物馆长期陈列，全国私人收藏他的海景作品达 1500 多幅。

该书包括：天空、远景海洋、波浪、海面、礁石、光线以及海景的综合描绘等内容。这是继作者第一本著作《海景油画》的续篇。本书更全面、深入地总结了作者画海的经验和技法，以精练的文字和大量的图例，采取划分步骤的方法（每个课题分三至四个步骤），结合图例，直观和形象地阐述了海景画的各种技法，例如：怎样使海水呈半透明状，怎样显示水下的礁石，如何表现波光粼粼的效果，怎样画海水冲击礁石，怎样表现海上的暴风雨、积云和层云，如何表现波涛、激浪、激浪泡沫、白帽浪、浪卷和浪花，怎样表现海上的光闪烁、炽热光和月光。这些都是作者根据多年来从事海景画研究的经验和习作写成的，阐述的方法步骤，具体实用，给人以可贵的启示。本书为画海景的入门向导，它将帮助你创作出高质量的海景画来。

该书由吕双明翻译，吴介琴校勘。吕双明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现在交通部展览工作室任美术设计师。吴介琴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早年留学美国。此书译文注意了中文的习惯术语，语言通俗流畅，深入浅出，对于海景画的爱好者提高表现技巧和增长见识，当有所裨益。

（原载《美术之友》1986 年第 4 期）

《海景油画技法》〔美〕约翰·鲁滨逊著，吕双明译，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5 年 9 月出版，定价 7.60 元。

## 墨花盛开的新园

——贺《书法艺术》丛刊问世

北山樵

解除“左”的禁锢之后，书法艺术蓬勃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书法热”。众多的人挥毫临池，习书不辍。有的恪守大法，功底扎实，有的时出新意，锐志探求，在近年的国内外展览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成为我国书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后继有人。但与这种形势相比，反映中青年书法家成长和作品的刊物则显得有些不足。为了宣传中青年书法家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求的成果，辽宁美术出版社创办了《书法艺术》丛刊，开辟了重点为中青年书法家服务的园地。现在第一期已与读者见面了，这不仅符合中青年书法工作者的要求，也符合老一辈书法家关注后学进步、希望书艺继承发展的夙愿。

从第一期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的几个特点：

1. 重点介绍、推荐中青年的作品，开辟了“中青年书法家作品选登”专栏。每期介绍十数人，选登作品两幅以上，并附小传与近照，拟定每期集中介绍一个省的书法家，使读者对一个省中青年书法家的功力、风格和流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一期介绍了江苏省尉天池、徐利明等十二位书法、篆刻家和他们的作品。

2. 开辟“古代优秀碑帖、墨迹选登”专栏，将鉴今与学古结合起来，因为继承古代优秀传统，对于中青年一代练好基本功是至为重要的。第一期集中介绍五代著名书法家杨凝式几件作品，以九面图版的篇幅将《韭花帖》、《神仙起居法》等大字印出，配以中年文物工作者萧燕翼同志的研究文章，对中国书法史上一代豪杰——杨凝式做了全面介绍。

3. 实践与理论并重。这一期的《书法艺术》，除了选登古今书法作品之外，还特别组织了两篇较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一篇从理论上阐述书法艺术的本质，属于书法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探讨。一篇论草书艺术表达时意和法的关系，作者有较深的草书造诣，文章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实践，是具有一定深度的好文章。

4. 编排上有新意。开本的设计、版式的安排、栏目的编定、份量的分配等，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通览全书庄重大方，疏朗明晰，给人以清新之感。

《书法艺术》丛刊问世，为我国书坛又增加一个强有力的馨香园地。祝愿这个墨花绽开的新园常盛不衰，不断开出灿烂的繁花，为活跃和促进我国书艺的发展作出贡献。

（原载《美术之友》1986年第4期）

《书法艺术》丛刊（一），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定价1.85元。

## 启开摄影艺术殿堂的钥匙 ——《摄影技艺》评介

邓 濯

当你漫步在垂柳含翠、红桃吐艳的公园里，并为周围的景色陶醉的时候，当你目睹在生产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令人感奋的场面的时候，你一定想用照相机捕捉这一瞬间的情态。但是，假如你还不具备有系统的摄影知识，只是靠着懂得一些有关照相机的粗浅原理，要想按动一下快门就拍出具有最佳效果的摄影作品，那是不可能的。我国摄影家毛松友所著《摄影技艺》一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为意欲提高摄影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及艺术修养的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了启开摄影艺术殿堂之门的钥匙。

毛松友同志早于 1932 年在《晨报》任摄影记者时，曾参加过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欢迎英国文学家萧伯纳的摄影采访。1934 年秋，他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负责摄影报道。抗战爆发后，他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上海沦陷前夕，他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拍摄了大量战区难民和流亡儿童的照片，其中一部分曾于 1940 年在莫斯科展览。全国解放后，他以大量新闻照片报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他的作品《节日的火焰照北海》于 1960 年在匈牙利举办的国际影展上获奖。

《摄影技艺》一书便是作者从事摄影工作以来不断探索研究摄影造型艺术、随时总结实践经验、并通过实践检验研究成果、从而系统地归纳出来的一部新作。它从取景的艺术、照片的构图、摄影的用光、色调的表现、色彩的表现、滤色镜的作用、广角与望远镜、光圈与快门的运用等八个方面，详尽阐述了摄影方面的艺术和技巧。例如书中在摄影构图方面强调主体的技巧一节里，讲解了“画面上主体是否突出，是一幅作品的成败关键，一般采用宾体作陪衬以强调主体。宾体是主体以外的一些景物，它从属于主体，而且和主体有密切的联系；宾体可能较多，但以简洁为主，凡与主体无关的宾体，应尽量排除，才能达到鲜明集中的效果”。又如在色彩与感情一节里阐释了“我们研究色彩与感情的联系，恰当地运用它们在摄影创作中表现思想和抒发感情，并通过感情色彩转化为画面上的意境，最后以诗情画意的艺术效果去感动观众，作品就会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和形象的生命力”。在全书中不乏这类精当的阐述。

《摄影技艺》的出版，对提高摄影爱好者的拍摄水平及加强摄影理论知识修养，无疑地具有裨益作用。

（原载《美术之友》1986 年第 5 期）

《摄影技艺》毛松友著，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出版，定价 1.10 元。

## 一本美丽新奇的诗集 ——《朦胧诗选》简介

邓荫柯

《朦胧诗选》在全国第一届优秀畅销书评选中获奖，是对近年来关于“朦胧诗”和“崛起论”旷日持久的论争的一个公正总结。朦胧诗这个被攻击、挞伐、“清污”的灰姑娘，从厄运中挣扎奋斗过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终于站稳了脚跟，大踏步登上诗歌艺术之宫的殿堂。这个富于戏剧色彩的文学现象，深刻反映出时代不可逆转的进步和当代人文学艺术观念的更新，以及文学事业走向开放的大好形势。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是我国第一本公开发行的朦胧诗创作选本，收入朦胧诗创作代表人物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李钢、杨炼、傅天琳、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等二十六位青年诗人的二百余首优美抒情诗，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为诗选作序《历史将证明价值》。全书大致概括了这个诗歌流派创作的基本成就，勾勒出当代朦胧诗创作的基本轮廓。

“朦胧诗”不是一个准确的、科学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绰号。几年前这个名词出现时，带有某种贬意，如今这个名称已大致被大家接受，是指以上述青年诗人为代表的、以追求朦胧含蓄的意象和力求深刻细腻地表现诗人内心世界为主要特征的、风格相近的诗歌创作流派。朦胧诗又被称为“崛起派诗歌”、“新诗潮诗歌”、“象征派诗歌”，都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名称。朦胧诗出现在“四人帮”统治的后期。当时一些知识青年出于对社会上的邪恶的憎厌，对祖国命运无法言喻的关切，对假大空的帮派文艺特别是虚伪空洞的所谓诗歌的鄙视，寻找到这种隐晦曲折地传达心声的诗歌艺术形式。他们的诗歌创作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意象派、象征派诗歌和中国30年代以朱湘、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象征派诗歌有某种渊源关系。不管是得之于过去中外诗歌传统的影响，还是出自他们的独自领悟，他们都是既继承了传统，又赋予这种诗歌以崭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其中北岛在《回答》这首诗中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纵使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我就作第一千零一名”，就是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中最坚定的声音，是正义的呐喊和反抗的誓言。

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青年诗人继续用这种形式的诗歌控诉那噩梦般的十年的罪恶，抨击阻碍时代前进的“四人帮”余毒和种种旧观念、旧思想的枷锁，呼唤春天的重归，呼唤思想的解放，深刻而丰富地表现了思索的、奋进的、充满痛苦和憧憬的一代青年人在时代变革前的心声。顾城的《一代人》中的两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集中概括了他们走出长夜后沉着而昂扬的人生态度。这一时期，他们的诗歌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江河的《纪念碑》、《我歌颂一个人》，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都以对时代和生活深刻而又高瞻远瞩的概括，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这些青年诗人不但痛恨蔑视十年浩劫时瞒和骗的帮派诗歌，对前十七年那种过分注重政治功利性，相对地抹煞艺术个性，表现领域狭窄，艺术形式单调的诗歌艺术也表示厌倦和焦虑，于是在拓宽诗歌艺术的表现内容和丰富艺术技巧上作了可贵的、大胆的尝试，他们对诗人内心世界精微而细腻的探



索发掘达到了往昔不曾达到的新的深度。其中青年诗人舒婷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个敏感、深沉、感情丰富的姑娘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了如此坦率而完美的揭示。她的著名诗篇《双桅船》、《致橡树》、《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神女峰》等，把自己的憧憬和惆怅，悲哀和欢乐，爱情的甜蜜和痛苦，在时代前进面前的兴奋和喟叹，都如此信任而温暖地交给了读者，使人惊叹，使人共鸣。

朦胧派诗人的艺术风格有近似之处，又有千差万别的不同。一般说，他们的作品都比较含蓄、委婉、隐晦、曲折，常常用一些象征、暗示、通感、时空交错的手法，注重意象的创造，追求朦胧美、散文美，不注重甚至有意打破韵律、节奏的和谐和句式、章法的严整均齐。他们的作品中，又鲜明地体现着个人的特色，如北岛的诗冷峻厚重，绵密深沉，情绪多较凝重。舒婷的诗委婉典雅，清丽细腻，语言流畅，较为易懂。顾城的诗奇峭幽婉，想象丰富奇特，神采飞扬。江河的诗庄严博大，富于历史感。梁小斌的诗较为朴素自然，明亮纯净。杨炼的诗气势磅礴，富有神秘奇绝的韵致。这是一个才情焕发充满生机的艺术创作群体。

朦胧诗作为诗坛上一支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流派，写出了新时期青年一代对历史、现实、未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理想，同时也反映出新一代对诗歌的新的变化着的审美要求。朦胧诗创作的队伍，欣赏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是中国诗歌不断发展变化，趋向多样化的可喜动向。本书编者在编选时，比较注重将较为易懂，不过分晦涩的作品选入，以扩大加深和读者的思想交流，注意选入社会生活内容较强，思想感情较为明朗的作品，以倡导诗人们在注重内心世界揭示的同时，注意反映广阔的、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可说是为读者与诗人搭桥的有情人。

我们衷心地向读者推荐这本美丽、新奇的诗集。

（原载《博览群书》1986年第5期）

《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定价3.40元。

## 开拓性探索

徐光荣

摄影广告，是运用摄影艺术造型手段对商品进行宣传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社会变革，必将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对沟通产销、繁荣经济、促进竞争以及开拓国际市场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刘立宾同志的新著《摄影广告的艺术构思与表现》，就是对这一新领域进行开拓性探索与研究的可贵的结晶。

马克思曾经指出：广告画面应该使“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摄影广告对读者来说，既是审美活动又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摄影广告的形象不仅需要具有美感，而且常常还需要使读者产生生理上的舒适，快感和生理上的亲切，可信。这样，就对广告摄影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有较全面的摄影艺术修养，又要比一般摄影更深刻，以及丰富的艺术构思与表现能力。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商品广告竞争中，创造出别具一格、出奇制胜的作品。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迫切需要，作者围绕摄影广告创作技巧这个中心，从艺术构思到艺术表现，从理论阐述到实践运用，结合中外广告摄影中多种技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与研讨。全书上下两篇，上篇谈摄影广告画面的创作，下篇是谈摄影广告的综合创作（图文关系、广告标题、正文、口号等）。在上篇中，作者论述了广告摄影师的修养、摄影广告的主要美学特征、摄影广告画面的艺术创作过程、构思要点、主题的选择、创作忌诫等，其中，特别以较多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摄影广告画面的艺术创作技巧与主要表现形式。

在广告摄影画面上，作者既要表情达意，也要涉及到结构章法和摄影语言的具体运用。这三方面在摄影画面的构思与表现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刘立宾同志从情与理、虚与实、和谐与对比、形似与神似、夸张与变形、节奏与旋律、线条影调色彩与感情、人与物等关系中，从想象、含蓄、情景交融、动静交错、比喻等手法与意境的创造上，多角度地探讨了摄影广告画的艺术创作技巧。作者在谈这些技巧时，涉猎广泛，将论点、论证与艺术广告摄影的许多富有代表性的实例，恰到好处地融汇于一炉，文图互相补充，互为丰富，读起来感到特色突出，内容充实，既有独到的见解又较为系统。如在谈到广告摄影的想象手法时，作者为论证广告摄影奇想造成的新鲜感、奇特感，附有一幅《催热剂》广告画，药针注入未成熟的西红柿中，把看不见的促使素质转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鲜明地形象化了，既使人赏心悦目，又产生强烈的说服力。为说明摄影广告意境的创造，作者附上《锁》的广告画，在两扇大门的铁环上加上一把大门锁，门上大书“一夫当关”，背景衬以威风凛凛的门神，画面创造出一幅森严、避邪、刚正的意境，有力地佐证了意境创造的重要性。

在广告摄影师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摄影广告画面的表现形式。作者从指导实践的需要出发，对这些表现形式与手法也做了较为精当的提炼。他分主体式、陪体式、寄体式、情节式、寓意式、悬念式、夸张式、连续式、集锦式、对比式、特技式，详尽地阐述了各种表现形式的特色与运用，极富实用价值，加之文图配合得当，更加相辅成趣。

刘立宾为完成这部开拓性论著，用心积累了大量国内外摄影广告，书中 200 余幅插图以及附在书后 150 幅彩色摄影广告，都是匠心独运的摄影广告佳作，作者特别为书后的彩色摄影广告做了精彩而简洁的说明，妙语颐人，使读者受益匪浅。

（原载《美术之友》1987 年第 1 期）

《摄影广告的艺术构思与表现》刘立宾著，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出版，定价 3.90 元。

龙庭亦是豪游地 海月边霜未觉愁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评介

戴逸

收到《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样书，一口气读下去，兴味盎然，不忍释手。这是一部好书，选注者张玉兴同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欢迎和赞扬。

清代前期，有大批“免死减等”的罪犯被流放到东北各地，主要是沈阳、尚阳堡、宁古塔以及伯都讷、船厂、卜魁、瑗辉、三姓等地。流放的人数达十几万人。那时候，这些地方开发的程度低，人烟稀少，环境艰苦。有人描写去宁古塔途中“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噪。行者或踣其间，或僵马上”（《吉林通志》卷一百十五）的情景，流放的罪犯大多是专制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来到陌生的、艰苦的环境中，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而顽强的奋斗，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带到东北，为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流人中有一些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南方，因种种罪名流放到边疆，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废吟咏，留下了许多诗篇。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曾着重介绍了他们被发遣的背景、戍地、流放生活以及诗歌创作的情况。古语云：“诗言志，歌永言。”诗歌是心声的记录。这些不幸遣成的骚人墨客，将自己惊险艰难的遭遇，思慕哀怨的感情，奇特新鲜的见闻都形之笔墨，托于诗歌。就像因丁酉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兆骞所说：“由来才士，半多飘蓬，自古羁人，偏多篇翰”。（《方与三其旋堂诗集序》）“由来志士，遭此穷途，未有不凭柔翰以消忧，托长歌而申恨者也”。（《孙赤崖诗序》）他们居然在流放地结下诗社，相互唱和。如函可和尚与左懋泰等在沈阳组织“冰天诗社”，参加者达33人。宁古塔则有“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亦饶有佳况”。（吴兆骞：《寄顾舍人书》）吴兆骞评论流放诗人说：钱德维（钱威）“议论雄肆，诗格苍老”；杨友声（杨越）“诗甚清丽”；苕中三钱（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兄弟）“才笔特妙”；姚琢之（姚其章）“诗如春林翡翠，时炫采色”；张坦公（张缙彦）“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陈雁群（陈志纪）“唱酬亦富”。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的这些诗章，不同凡响。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离乡背井、颠连困苦的流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接触到众多的贫苦人民，而且万里远戍、跋涉山川，见多识广，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敏锐，眼界更加开阔，感情更加强烈，笔墨更加精警。他们作品中反映的自然界和社会界，更加真实、宽广和深刻。他们的诗风，或沉郁、或哀婉、或激昂、或悲怆，吐露了生活中的酸辛与不平。从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在清朝高压政策下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可以认识到东北各民族劳动和斗争生活，可以欣赏那里山林川泽的雄浑壮丽，也可以领略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

尽管流人的诗作，有许多精彩的篇章，但是过去却并没有很好搜集、选择、刊印，致使很多流放诗人湮没不彰。他们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大多数人殁于戍所，少数人即使被赦回乡，也多在潦倒中终老一生，因此许多诗作

都散失不传。例如，本文前面所举吴兆骞评论过的八位流放诗人，多数人的诗作早已不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沈德潜编《国朝（清）诗别裁集》，收集清初至乾隆初年诗作者达九百余人，其中仅有流人诗作者12位，选诗50余首。在清廷大规模禁书、焚书之前，情况已如此，可见流人诗作散失之严重。民国年间，徐世昌辑二百卷本的《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人达6100余家，是迄今最宏富的一部清诗选。该书还特别注意收辑一些不甚著名的诗人及一些流传稀少的诗作，但流人诗作者也只收了18位，共录诗70余首。50年代，邓之诚先生编辑《清诗纪事初编》，只收流人诗作者12位，录诗10余首。在这三种诗集中，上引吴兆骞所评论的八位诗人，一位也没有。可见流人诗的遗漏散佚是十分严重的。

玉兴同志有感于流人诗的重要及其散失的情况，决心搜集、选录东北流人的诗作，并加注释，以期给大家奉献一部反映清前期东北地区历史事件和社会风情的诗集。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完成了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这是一部有份量、有水平的资料性、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辑佚钩沉，搜罗丰富，考证精当。本书选流人诗作者48位，诗588首，另附六位赴戍所探视者56首诗，共计收诗人54位，得诗614首，成为迄今为止搜罗流放诗人及其诗作最丰富、最完备的选本。这里既选有名家巨子，也有行迹不著的普通文士。其中有从经过多方搜寻发现的传世诗集（现共发现19位流放诗人有传世诗集）中选录者，而大部分诗人之作却是从方志、笔记和其他人的诗集、文集中仔细搜寻得来的。这种“披沙拣金”的办法需要翻阅很多书籍，付出长期艰苦的劳动。这部分诗篇所选虽少而用力最多亦颇繁难。玉兴同志还用了一番考证核对的功夫。如本书所选左懋泰诗七首，除一首选自函可《千山诗集》卷二十“冰天社诗”中外，其余六首均注明选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修《铁岭县志》。查今通行的《辽海丛书》本以及民国年间重修本《铁岭县志》，虽然这六首诗均赫然在录，却都有明确标识：其中三首为“佚名”或“失名”，另三首为“木斋李呈祥”，并无左懋泰之诗。但玉兴同志认真琢磨发现这些版本的《铁岭县志》中所载之诗夺误甚多，而标明李呈祥作的六首诗中的后四首，在其《东村集》中却查找不到等疑点，进而查阅康熙十六年原刊本，终于发现通行本及重修本的排印之误，从而检得左诗七首（本书选六首），同时又寻绎出其他人一些诗作。于此可见辑佚勘校工作中所下功夫之一斑。

由于选注者的悉心搜辑，目前所能见到的流人诗作者大都汇集此书，这是远远超过前人成就的丰硕成果。

其次，选取审慎，内容充实。玉兴同志经过长期努力共发现50余位流人诗作者，近万首诗作。经过仔细斟酌，详加推敲，去粗取精，共收录48人的500多首诗。选录的原则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凡有作于戍所之诗或反映流放生活之作者，均当选录之例。凡无诗集行世者（此类情形中诗人较多，存诗甚少），酌情放宽选录的标准，不因诗少而遗漏一位流人诗家，做到以诗存人；凡有诗集者便认真选择。此类情形，作者虽少（占总数五分之一），但存诗甚多（占流人诗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故本书所选之诗仅为现已发现的流人诗作的二十分之一。但“尝一脔知一镬之味”（《淮南子·说山》）。本书基本上荟萃了流人诗作的菁华，注重了选录反映各方面情况的诗作，使各种内容、各类体裁、各种风格具备。多而有绪，繁而不紊。

本书以形象化的语言记录了清代前期动荡的社会。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众多的人物活动与思想变化，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史事，在这里都有反映。不论是流人的怀念故国，抨击时弊，抒发愤懑，哀叹不幸，还是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描绘风土民情，讴歌边疆壮丽河山，赞颂各族人民抗俄御侮的斗争，等等，都质朴无华而感人至深。这种写实手法正是清初的诗风。因而本书所选之诗多有“诗史”的价值。其中选录较多的函可、季开生、丁澎、吴兆骞、方拱乾、张贲、戴梓、方登峰等人的诗作，在记录反映清代前期社会风貌方面尤为突出。不少诗人虽因存诗无多而选录较少，但所选之诗无不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东北边疆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俗画，正是春华秋英，千姿百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读完这部诗选，谁也不能不承认流人诗作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均为人们全面了解清前期社会以及欣赏借鉴提供了方便。

第三，存史证史，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它着重注意收辑证史、存史的珍贵史料。如反映清初于辽东推行招民垦荒授官条例与流放宁古塔的郑芝龙被械离戍所情景等诗篇，便是目击者记录的第一手材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言》中叙之甚详，此不复赘。这里仅就反映流人思想感情变化的诗篇加以说明。

流放，这本是一种严厉的惩罚，被流放者或单车就道，或全家、全族遭遣，无不经受种种困难而愁肠百结，痛苦万状。本书所选诗作对此有大量生动的反映。但艰难困苦的环境却又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从本书中人们又可以看到一些诗人出人意外地对戍所风情，边塞生活给予某种肯定的评价，甚至表现出眷恋之情。特别突出的是与清廷对抗意识最为强烈的函可终于吟出“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自嘲》）“无罪还应出塞来……不到天山眼不开”（《寄江南诸同社四首》其四）的豪语。江南才子吴兆骞也发出了“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赠人》），“漫道射雕多健卒，只今文士习弓刀”（《秋日杂述》其四）的强音。他们大多是在风光旖旎的环境中成长的，骤然投身到新的、艰苦的环境，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发生强烈的变化，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突破了文人传统诗的框框，在题材、风格、情感、观点方面产生了飞跃。这就是函可之所以由昔日的“浊世佳公子”（戴遵先）《和北里》），成为抨击现实，刚强不屈的“缙流高品”，吴兆骞所以由只知吟赏风月的倜傥才子成为激昂慷慨的边塞爱国诗人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艰苦的戍所生活反倒成就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伍崇曜在《秋前集跋》（《秋笈集》是吴兆骞的诗集）中说：“梅村诗原评称汉槎极人世之苦，然不如此，如《秋笈》一集，其人恐不传。天之厄之，正所以传之也。”这是严酷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辩证法。

第四，注释详尽，考索透彻。选诗难，注诗更难。本书对所选的每位流人诗作者的生卒年、爵里、字号、身世经历、突出事迹以及著述情况，均考索详备，予以简明介绍。对所选每首诗章的背景、用意、内容，不论时事旧典，均加注释，征引丰富，交待明确，甚便读者。

任何一篇著作都有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来说即使篇章的内容十分明白，但历时久远，背景和原委湮晦不彰，不经解释，后人难明究竟，甚至完全不解其意。面对古籍，人们有时会发出“无人作郑笺”的浩叹，可见注释工作的必要。恰到好处的注释，往往会消除由于时代造成的隔膜，沟通古

今的思想，丰富读者的知识，启发今人顺利地理解古籍的内容。陈寅恪先生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分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柳如是别传》页七）要做到这两点，一般说来注释者需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透彻的研究，以及广博的文史知识与对典籍的轻熟掌握能力。注释好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不仅检验注释者的学识水平、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功力，更检验其对流人所处的特殊背景与行事的研究深度。相对来说，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大家知道，清入关伊始便推行高压政策，兴文字狱。一般学人士子多不敢秉笔直书，写诗著文多用曲笔，以隐晦的笔法反映周围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的真相就模糊不清了。而流人著作，由于其人的悲惨遭遇，行踪泯灭，更使人们理解的困难加深一层。因而欲探求流人诗作的真谛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考索。

本书在注释上，特别在“今典”的注释上较有特色，反映了选注者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功力。如对左懋泰、陈掖臣、吴达、罗继谟、董国祥等人的简介；如指出方拱乾《感时》与张贲《宁古塔纪事（二十首之十七）》是咏叹郑芝龙的悲惨遭遇之诗；函可《寿陈令公二首》及李呈祥《再呈陈明府》是歌颂在辽东招民垦荒、关心民间疾苦的代表人物陈达德之诗；吴兆骞以及何世澄、杨宾等诗中所赞美的李召林侍御，即当年揭发吴三桂罪状的福建道御史李棠，等等。虽然仅寥寥数语，却无不是经过认真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倾注着注释者的大量心血。

本书在旧典注释上，认真考索的态度也同样值得称道。在大量征引文献、广备异说的同时并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为参稽。如左懋泰《异石》中“逐五湖”条注释，指出据《吴越春秋》所载越国灭吴之后，西施为范蠡所携，“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是历来相沿的成说，左诗取意本此。同时又据古本《吴越春秋》及《墨子》等书，说明较为真实的情况是：灭吴之后西施被“沉江”而死。戴遵先的《和北里》“心史”条注释，据引《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六《井中心史歌·自序》说明《心史》（又名《铁函心史》）传为宋遗民郑思肖所撰，藏于古井，于明末被发现。这件事曾是明清之际在文化界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致相信，并无异词。戴诗亦奉此说。接着注释者又指出，自康熙年间陆续有人攻其伪，而坚信者又证其真，可谓疑信参半，真伪难分，三百年来迄无定论。方拱乾《游东京城旧址》的“东京城”及“乌禄”条注释中，纠正了清初以来以渤海国的上京为金朝上京的谬误。再如，本书对许多诗中出现的“混同江”的不同指谓，都一一做了说明。这种深入探讨不停留于一般征引，更增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对读者当能很有裨益的。

历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清史研究如何深入下去？掌握史实，全面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搜集资料、考证史实，要多渠道、多方面地进行。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中不仅有许多值得领略、鉴赏的艺术妙处，更有值得史家充分利用的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玉兴同志披荆斩棘而编成的这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为人们研究清史、认识清前期社会、进行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史料，同时也为人们全面深入地研究这方面史料开辟了途径。

做为开拓之作，本书也不无可议之处。一是搜集还应继续，选目还应扩

展。作者曾拟名此书为“初编”，即寓有需进一步充实完备之意，所选之诗人及诗篇虽远远超过前人，但仍嫌不够，钩沉索隐，尚待来日。有些资料，如方志、诗集、笔记之类尚大有挖掘之潜力。个别篇目还有斟酌去取的必要。二是注释功夫虽然用力甚勤，但还应加强，特别在略读者所熟知、详读者所未知方面尚可改进。当然古籍注释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科研工作，任何高手也难免出现疵漏，但多下苦功夫，尽量争取完善还是可以办到的。希望续编时在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更臻完善。

总之，我认为《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是一部成就斐然的拓荒之作，是研究清诗和清史的一份可喜成果。熔文学选本与历史教材于一炉，使二者相得益彰，可雅俗共赏，而有功学林。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欢迎。

（原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张玉兴选注，辽沈书社1988年10月出版，定价6.15元。



## 诗圣千载有知音 ——评《杜诗鉴赏》

沈国经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和同时代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构成了我国诗歌史上最耀眼的一对双子星座。杜甫生活的时代，是唐朝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杜甫亲自经历了唐代最大的一次战乱——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真实地、深刻地、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被后人称之为“史诗”。从诗歌艺术上说，杜诗继往开来、润泽后世。一千多年来，历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几乎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建国以来，对杜甫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度。对杜甫的诗歌进行赏析的文章也不少。但是，对杜诗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分析与鉴赏的专著却尚未见到。夏松凉同志所著《杜诗鉴赏》一书，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缺。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杜诗，提高他们对杜诗以至其他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加深他们对祖国文学遗产的热爱和珍视，进而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将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对于推动杜诗的研究，滋润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本书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 一、体例完整，结构严密

全书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杜甫传略》，对杜甫一生的思想、创作及杜甫所处的时代，作了概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杜甫其人。后一部分作品鉴赏，除介绍作品的背景、思想意义外，更着重于杜甫的艺术技巧、艺术手法的分析和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与探讨。前后两部分互相结合，能使读者对杜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 二、选材精当

全书共收杜诗 92 首。从创作时间上来看，上起杜甫的青年时代，下迄病逝于江湘之前，基本上概括了杜甫一生的经历。其中既有像《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三吏”、“三别”这样一些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有像《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这样最能体现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独特成就的别开生面的组诗。这 92 首诗歌，从体裁上分，五古 16 篇，七古 11 篇，五律 23 篇，七律 38 篇，五绝 3 篇，七绝 1 篇。这些诗篇都是杜甫的代表作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能够代表杜诗的全貌。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赏析，不但可以使读者了解到杜甫的思想、品质和崇高的人格，而且可以使读者具体明了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

### 三、总结前人之成果，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于杜诗的研究，古今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今天

研究杜诗，要做到正确地继承前人成果，辨别真伪，择善而从，又能在一些方面超越前人，诚非易事。

本书在这方面确有成就，也有创见。作者在分析和论述中，既归纳、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在许多地方指出了前人的不足，纠正了前人的疏漏讹误之处，发前人之所未发，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很值得称道的，也是本书对杜诗研究作出的新贡献。这里不妨举出几点。

如《缚鸡行》这首诗：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诗的题材很小，写的是一件小事，结尾含而不露。前人对这首诗的含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就事论事而看不到言外之意，认为这首诗说明杜甫晚年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怜惜生灵，不忍杀生。有的认为这首诗是表明一种超然物外，在是非面前无可无不可的消极处世的态度，这又是把杜甫当成老庄的信徒了。有的则故意深文周纳，随意发挥，曲解原意。本书作者认为上述解释都不妥，指出这首诗的主旨在于曲折地揭露并慨叹封建官场中人们互相倾轧、升沉得失不由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一种现状。诗人是被眼前的琐事触发而引起深沉的联想，并用含蓄影射的手法表现出来。本书这种分析，是符合杜甫的经历和当时的心境的，毫不牵强，令人信服。

又如《客从》这首诗：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  
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须。  
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这首小诗，写得若有其事。前人虽有的指出它的主旨在于刺重敛，但却没有人指出它并非实有其事。本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分析，正确地指出这首诗在创作手法上是受了左乐府的影响，即用虚拟和象征的方法，编造了一个寓言式的情节，来隐射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搜刮诛求，表达了对人民被压榨的痛苦的深切同情。这是很有见地的。

再如《登高》这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称颂，曾有人誉之为“古今七律第一”。但是，对于尾联两句，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意尽语竭”。有的甚至从尾联两句气格稍嫌衰飒而对全诗加以贬抑，认为它只不过是“封

建社会文人的叹老嗟卑之作”。本书作者指出，这种评价不够公允，是未顾及全篇，更未顾及杜甫全人。本书通过具体的论证，说明这首诗决不仅仅是杜甫个人“叹老嗟卑”的感情抒发，而主要是包含着时代的苦难和广大人民的辛酸。这样看，才是对这首诗以至杜甫的公允平正的评价。

其他如对《佳人》一诗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哀江头》一诗主题的论述，对《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思想意义的论述，对《古柏行》一诗篇章结构上不同看法的分析等，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 四、着重艺术技巧，分析细致入微

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提高对杜诗以及其他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这本书在分析作品时，特别着重于对杜诗的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的分析和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与探讨。

比如，对《兵车行》、《丽人行》这两首著名的七言古诗，本书不仅从思想内容上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而且专门就这两首诗在章法布局、结构安排上的特点，像铺陈渲染，纵横开阖，疏密相间，曲折有致，在句式上的长短组合，声韵上的灵活变化，以及这些特点与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密切关系，均作了详尽而透辟的论述。读者读了本书对这两首诗的分析，不仅能对这两首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明晰而透彻的理解，而且能够对七古这种诗体的规律与特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由此举一反三，对于其他七言古诗，也能够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

本书不仅对这两首诗，对于其他各种体裁的诗，均有专门就艺术手法而作的分析与探讨。比如，由《登兖州城楼》、《对雪》、《秦州杂诗》之一、《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禹庙》等诗而谈五律与七律。由《绝句二首》、《八阵图》而谈绝句。由《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谈五古。此外，还有就一首诗、一句诗、一个字而专门谈杜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与一个特色。如，谈炼字、谈炼句、谈用韵、谈章法布局、谈环境的描写和心理的刻画、谈时间与空间的跨越与转移、谈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谈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等等。可以说，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本书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分析之详尽周密，特别体现在对大型组诗的分析上。杜诗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大型组诗，像“三吏”、“三别”、《羌村三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是杜甫在艺术上的独创。这些大型组诗集中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深厚的艺术功力。这些组诗内容深刻、词藻精美、脉络连贯、首尾照应、结构严谨，每一组诗都是一个严密而优美的整体。本书不但对组诗逐篇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且从整体上进行论述，说明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艺术形象，又互相联系，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五、运用比较的方法

本书在分析鉴赏中多处运用比较的方法，即将内容和题材相近的诗加以对比。有的是同杜甫自己的诗相比，有的是同其他诗人的诗相比。通过各种比较，使读者更好地鉴别出作品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比如，在分析《宾至》这首诗时，同杜甫另一首欢迎客人的诗《客至》

相比较。通过比较，使读者了解到，虽然两首诗同样是对客人表示真挚的欢迎，但是由于来客的身份不同以及与诗人交谊的深浅不同，因而两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气氛也有所不同。

又如，《月夜》与《所思》，这两首诗都是写相思之情。但是，由于所思念的人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因而，感情表达的侧重点与角度有所不同，呈现的意境与情调也不一样。

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首诗，是诗人同友人高适、岑参、储光羲一同登临远眺所作。本书在分析这首诗时，就把它同另外三位诗人同时所作的三首诗加以比较。这样一比，就使读者了解到，尽管这四位大诗人是同时眺望同一景象，但由于各人对社会生活的特定感受不同，他们在面对同一景色时的体会与联想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而笔下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情调也迥然有异。这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对生活简单的模写与复制，作家与诗人可以即景生情，也可以借景抒情，两者都丝毫不违反艺术的真实性。

又如，在分析《野望》这首诗时，将它同杜甫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写的同一题目的另外三首《野望》加以比较，使读者从中体会出诗人在写景抒情上手法的多样化而又各尽其妙。

## 六、注释详尽准确

注释，对于一个诗词选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全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注释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书的质量。这本书的注释十分详尽、准确，它对于帮助读者理解诗的内容，扫除词句上的障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书在注释中，不仅注意了汲取前人及其他杜诗选本注释上的长处，而且纠正了前人和今人的一些讹误。比如：对《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中“黄阁老”的解释；对《丽人行》中“翠釜”、“逡巡”的解释；对《蜀相》中“开济”的解释等。

## 七、文笔优美、洗练

赏析文学作品的文章，本身的语言必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倘若文笔呆板枯涩，即使观点正确，内容可取，也很难吸引人读下去，更谈不到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了，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本书的语言不只是准确、洗练、优美、流畅，而且讲究修辞上的对称排比，音韵上的抑扬顿挫。尤其在分析一些抒情诗篇时，常常运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为我们再现伟大的诗人杜甫于一千多年前所创造的艺术境界。

总之，这本书对于研究杜诗的人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更是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的良师益友。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7年第1期）

《杜诗鉴赏》夏松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定价7.90元。

一部很有特色的鲁迅作品研究专著  
——评杜一白同志的《鲁迅的写作艺术》

臧恩钰 李春林

在近期鲁迅研究“行情”看跌、鲁迅研究著作出版更为困难的情况下，杜一白同志的《鲁迅的写作艺术》一书的出版，是难能可贵的。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说它“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在对鲁迅创作的艺术分析中，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对读者阅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学习写作者向鲁迅学习写小说和杂文，是都有好处的”。诚如李先生所指出的，这本书，对于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鲁迅著作的艺术造诣，从而促进鲁迅著作的普及；对于引导读者向鲁迅这位文学大师学习写作艺术，提高写作水平，都是大有益的。研究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论著虽已很多，单是研究其艺术方面的著作也已不少，但像杜一白同志这样从写作艺术的角度入手来全面而具体地考察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总结和发掘鲁迅写作的艺术规律、艺术方法和技巧，实在并不多见。它有自己的新角度、新的见解、新的写法，因而它确是鲁迅作品研究史上很有特色的专著。

鲁迅著作是我们民族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写作艺术，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杜一白同志的这本书，旨在发掘鲁迅艺术宝库的丰厚贮藏。因之，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讲鲁迅写什么，而是讲鲁迅怎样写，诸如标题，题材，主题，开头，结尾；人物命名，出场，肖像，对话，心理；环境，景物等等，都在作者的探讨之列，都要加以总结提炼，揭示出各方面的妙处所在。这样，这本书就不仅是鲁迅研究者的益友，而且必将是阅读鲁迅著作和学习写作的广大青年读者的良师。它是鲁迅博大精神和艺术遗产同广大读者之间的桥梁。它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进一步探寻鲁迅写作艺术宝藏铺垫了一条可喜的路径。

作为全国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杜一白同志主要是谈自己研读鲁迅著作的艺术体验。因而，全书新见迭出，极富启迪。如开首第一节“标题的艺术”中所谈鲁迅小说标题的民族特色问题，就还无人论及。而对《伤逝》这一标题与小说主人公全部性格的必然联系的分析，尤为精采。“人物的命名”一节也分析得全面、细致，许多观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人物的出场”一节由四铭的脚步声分析出其身份、体型、年龄、身体状态……盘剥不止，丝丝入扣，令人叹服。这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四铭性格的理解，就是成熟的作家也会从杜一白同志对《肥皂》这篇小说的分析中得到启示。再如关于次要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问题，作者也结合鲁迅作品提出了新见。通常说次要人物可以反衬主要人物，本书却将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丰富、补充作用置于两者关系的首位。作者以《高老夫子》为例，指出作品对次要人物黄三描写的成功，不仅在于鲁迅以甚少的笔墨就勾勒出一个给人较深印象的人物，尤其在于他对主要人物高尔础起着丰富和补充的作用，“小说中，高尔础设若没有黄三、老钵那些狐朋狗友，他的形象照现在就要逊色得多了。”有些论者认为高尔础与四铭为同类人物，但前者没有后者塑造得成功。看来此种观点的偏颇，是由于单纯分析主要人物，忽略了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丰富、补充作用造成的。

在论述杂文的部分，作者提出鲁迅杂文的艺术力量首先在于“炼意”的

成功这一新鲜见解；并指出鲁迅杂文的创作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经纬相织”。结论准确而极富形象性。鲁迅是难以伦比的讽刺艺术大师，这在他的杂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而作者用了两节文字阐发鲁迅杰出的讽刺艺术，对鲁迅杂文讽刺手法的总结、概括、发掘得似乎还从来没有这样周全过。仅通过词汇的运用制造不合谐这一手法，本书就指出有七种之多。也许有人称之为微观研究吧，可是它有意义，富启迪，不仅是我们欣赏鲁迅杂文的向导，而且是学习写作杂文的指南。但这种微观研究却被某些人所忽略，其实，这种微观研究并不比某些大而空的宏观研究省力些，它不仅需要对鲁迅杂文极为熟悉，研究精深，而且需要较高的文学理论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作者还力排众议，提出鲁迅杂文的语言风格在总体上是“明快”的这一观点，而且论证有力。这样分析，会破掉那因袭已久的鲁迅杂文“晦涩难懂”的谬说对某些读者的影响，诱发他们对鲁迅杂文的兴味。作者在《寓理于日常生活实例》中又指出鲁迅杂文“具有极大的群众性，可接受性。”如此立论，定会起到宣传、普及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这也正是鲁迅研究者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于有争论的问题，本书并不回避。或在驳难中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或在肯定争执双方各有合理性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全面论述。如关于《故事新编》是否是历史小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否定《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者的重要论据之一，是该书许多篇章穿插了现代生活的内容，而又以《理水》为突出。因而他们不承认它是历史小说，而只是“讽刺文学”。作者就从这争执最大的作品入手，提出“我们判断一篇作品是不是历史小说，不能单从描写的份量上看，而应当从故事的中心人物与情节的主线上看”。依此对《理水》进行剖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关于鲁迅提出的“画眼睛”的涵义，究竟是指描画肉体眼睛，还是要求抓住事物的根本特征，人们看法也不一样。作者不胶着于不同观点的区别，而是认为两种说法都可取，在此基础上立论，把鲁迅小说“画眼睛”的高超技艺，分析得淋漓尽致，简直是牵出了鲁迅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在读者面前走过亮相，大大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并从而理解了鲁迅“画眼睛”命题的全部涵义。

本书许多章节还将鲁迅作品同中外古今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阐发出新意。如作者认为《祝福》中祥林嫂死于鲁镇举行祝福大典之时与林黛玉气绝于宝玉、宝钗新婚典礼之际极为相似，并由此得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受过《红楼梦》的影响的结论。作者还从兼为悲剧大师和喜剧大师的角度将鲁迅同莎士比亚作比，认为他们都是罕见的世界天才。这些观点都使人耳目一新。

杜一白同志在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在写法上为了避免长篇论文往往容易产生的沉闷感，我有意地采用了较为活泼灵动的短文形式，在表述上也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明畅易解一些，以期在青年中获得较多的读者。”这本书的写法确实新颖别致。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谈小说，下编谈杂文。上编又将写现实的小说与历史小说分开阐述。这极便于读者阅读，学习。而每一部分小标题虽未冠以序数，但却自有内在的联系，虽层层递进而又互为补充之势，分则独立成篇，合则浑然一体。全书在散漫不拘、挥洒自如中又有一个内蕴的主线——鲁迅写作艺术的神髓——相贯穿。仅看标题，就会引人入胜。作者的笔调也时有变化，行文风格与所要论述的内容相统一。在有些章节（如谈主题、题材）作者又在行文中露出严肃、庄重之气，使读者

于不知不觉中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有的从理论阐述开篇，有的从具体分析作品入手，姿态各异，都具魅力。在“短小精悍”一节，作者以极亲切的笔调开端，密切联系今天长风日盛的实际，指出：文章怎样才能做到短小精悍，鲁迅的杂文提供了楷模。作者先分析鲁迅的“短小精悍”之作，然后以极简约的语言，总结、归纳出达到短小精悍的要旨。此篇不过一千四百字，也正是“短小精悍”之作。作者所要论述的内容与所采取的笔调、方法、篇幅，高度统一、和谐。这种评论文字，本身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作者行文又能在严谨中有俏皮，叙述中绕有风趣，如在“人物的命名”中作者写下了这样的佳句：“我甚至猜想，说不定〔子君〕这个名字还是走出旧家庭以后她自己改取的呢。”这同时也体现出作者行文的分寸感，表明作者思路既开阔，用语又准确。是“猜想”而非断定。有些比喻也生动、形象、妥贴，使读者读起来兴趣盎然。例如在论述鲁迅杂文的风格是明快与含蓄互相辉映，互为补充时写道：“须知，高明的果农是绝不会用甜美的芳香的菠萝来排斥余味无穷的橄榄或者以后者代替前者的，否则，水果摊上的品种就未免太单调了。”这段文字真可谓奇绝妙绝，把抽象的“明快”与“含蓄”形象化了，感觉化了。再如作者对鲁迅杂文渐次推进的章法极为赞赏，说这样最后亮出的中心思想易于为读者所信服和接受，“这种情形，就正如瓢泼大雨不免易于流失，而纷纷细雨却能够渗透到泥土的深处一样”。像这样形象化的论证还有不少。本书用两节文字谈了鲁迅杂文比喻的妙用，作者也是得其三味的。杜一白同志刻意经营鲁迅研究多年，在人格、治学态度方面都受到鲁迅先生熏陶，文风方面也不例外。我们读《鲁迅的写作艺术》时觉得很多地方的行文都吹拂着一股或令人神怡或令人微醒的鲁迅风。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名为《鲁迅的写作艺术》，但作者绝不拘泥于谈艺术，在行文中不时同时又是很自然地谈及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思想认识路线问题，深入生活与学习理论的问题，等等。该书不给人以偏执写作技巧而忽略其它重要方面之感。例如，作者在论述鲁迅杂文艺术成就时，强调鲁迅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指出鲁迅杂文的妙趣的产生，离不开鲁迅深刻的思想。作者并且就着“深刻的思想”继续开掘；在产生深刻的思想之前，要有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做为基础；而在深刻的思想后面，又有正确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指导，在驾驭。作者在行文中力避片面性，充满辩证思想，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如谈标题的重要，但最后又强调上乘作品必须从题到文皆好；在“以古喻今”节中，既强调知识库存的必要，又明确指出政治热情的重要。作者崇敬鲁迅，但这并未影响他研究的科学性，如说鲁迅小说景物描写还不能称为“最高范本”，这是很有胆识的。作者在论析中虽对当前文艺状况未着一词，但在正面阐述鲁迅写作艺术时，字里行间仍露出对当前创作的关注，对某些不良倾向的忧心（这在自序中则是写明了的）。这正体现了一个严肃、正直的文学研究者的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足见他绝非为研究而研究。

作者在序中强调借鉴本民族精神伟人的艺术经验之重要，并且在具体论述中不时涉及鲁迅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作者也未忽略鲁迅对外来文化素养的吸收，书中曾多次首肯鲁迅的“拿来主义”。如开篇就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从题目到内容都受到了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同《狂人日记》的创作一样，都是鲁迅“拿来主义”最早的实践之一。在“鲜明的民族风格”一节，作者通过自己的论述也明显地揭示出，鲁迅的民族风格并非封闭的体

系，鲁迅曾多方面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从外国文学宝库中“拿来”了不少好的经验。鲁迅与别人不同之处，是他没有数典忘祖。作者的具体论述充分表明，鲁迅的艺术遗产既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又是广泛汲取世界文化艺术成果，博采众家而酿出的佳蜜。我们学习鲁迅本身，既是学习本民族的光辉遗产，又是吸取整个世界先进文化素养的乳汁。但作者在自序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另外，由于作者采取分别可以独立成篇的写法，所以个别例证有重复现象，这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吧。更主要的是由于鲁迅创作的博大精深所决定的；同一例证，既可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又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

《鲁迅的写作艺术》是杜一白同志继《鲁迅思想论纲》后的第二部鲁迅研究专著。如果说《鲁迅思想论纲》以先纵后横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鲁迅思想发展全程和博大精深的各个方面；那么这部专著则从写作艺术这一特定角度摄取了鲁迅全部小说及杂文创作，使我们神游于鲁迅的艺术世界，领略到起初也许并未领略得到的风光。面对于那些对鲁迅作品尚不十分熟悉的人，如若拜读了这部专著，一定会唤起他们尽早进入这一艺术王国的兴味。

（原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鲁迅的写作艺术》杜一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定价2.50元。



## 一枝独秀的奇葩 ——读《明清楹联选》

栾祿璋

沈阳市故宫博物馆李仲元同志主编的《明清楹联选》，已与广大书法爱好者见面了，同时也受到了书界的好评，称之为“一枝独秀的奇葩”。

“楹联”是我国独具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起源很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大多认为它是从桃符上题写对偶联语开始的。据《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记载，十国后蜀每年除夕之夜，蜀主孟昶便命学士撰新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除夕之夜照例书写桃符，蜀主孟昶不满意学士幸寅逊拟的新桃符词，便亲自挥笔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孟昶所书写在桃符上的这副联语，可以说就是我国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的一副春联。

楹联也叫楹贴或叫对联，俗称对子。它是诗文中对偶句的演变，是文字与书法的结合，也是书法艺术在装饰上的运用。楼阁厅堂的门户、楹柱、墙壁等处有楹联装点，可使环境美化，显得庄重高雅，所以至今流行不衰。

明、清楹联，不仅从内容上反映了那一时代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尤可宝贵的是，它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时期、主要是清代书法艺术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清代，崇尚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倡之于前，臣僚百官随之于后，竞相追摹，蔚为风气，一般士大夫也蜂起相从，形成了一派纤巧清俊、端丽秀媚的书风。其间，不为时风所诱，能独具慧心，另辟蹊径，远宗晋、唐，继承古法而斐然有成，格调高迈，令人眼目一新，这是一种时代的风气，也是清代书学的一大特点。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楹联选》基于此，从沈阳故宫博物馆所珍藏的大量明清书法楹联近千件作品中，精选其中二百副，不仅注意书法艺术体例，同时又考虑用词美妙，令人喜读，耐人寻味。为使读者了解、收藏，又分别对于各书家加以简介，作为国内外对楹联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欣赏、研究之用，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楹联艺术资料。

在这批楹联艺术作品中，有许多是情文并茂、辞书兼优的作品。从内容上看，许多楹联注意健康、有益涵养，如：张玉书的“志欲翔千仞，功须惜寸阴”，主张立志高远，珍惜光阴，方可成功。徐三庚的“胸无畛域心常坦，腹有诗书气自华”，说明心地磊落无私的人，就会坦然自安，学习诗书的人，谈吐风度就高尚典雅。还有阮元的“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黄易的“梅花香有骨，松叶静无声”；孙星衍的“材茂行絜达于从政，建功立事可以永年”等等都是。更多的是描写美好景物，抒发闲逸心情，或友人交往，按照受联者的地位、特点，彼此交情而撰写的楹联。这些内容都反映了那一时期人们的观念。书中所选编的明代楹联较少，其中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的作品较为突出。董其昌书以清捷秀畅见长，此联仍是本来面目，可以窥见其功力之深厚，笔法之圆熟。陈继儒以行草作联，行笔流畅，气势贯通，极具洒脱之风致，是极其少见的佳作。袁崇焕、史可法都是明末抗清戌帅，一个含恨受戮，一个不屈而死，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楹联，极为罕见，也足见宝贵了。

清代楹联作者众多，所编选的都是见于传、志的著名人物。有的是名垂

海内的一代书法大师，如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有的是名垂画史的画家，如查士标、高其佩等。有的是淳儒硕学、诗文宗师，如王士禛、朱彝尊、洪亮吉等。有的则是历史名人，如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

书家之作，多以深厚功力、高妙技法、独特风貌见长。画家、诗人、学者之作，不拘法度，信手挥运，以表现修养，表现个性，表现气质。总之，翻开这本《明清楹联选》可见所有楹联艺术品具有众多的面貌、各异风格和不同的表现手法，真、草、隶、篆都有表现，并注释文、原件尺寸、书者介绍，洋洋大观，堪称琳琅满目、气象万千。装帧讲究，封面也具特色，实为书家及楹联爱好者不可多得、时供揣摩的好书。

（原载《美术之友》1987年第2期）

《明清楹联选》李仲元主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定价30.00元。

## 值得珍惜的成就

——介绍《全国连环画获奖作品选》

(1963—1981年)

姜维朴

这是一本记载着建国以来三十余年连环画艺术成就的画册，也是历经风雨、来之不易的画册。

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是在1963年举行的，距今已二十余年了。第二届评奖是1981年1月揭晓，距今也有四年多了。这本获奖作品选集，所以未能及时出版，是与我国的整个文艺事业所走过的曲折路程分不开的。1963年第一届评奖时，本来准备出版一本获奖作品选集，但是评奖不久，文艺界“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严重，选集的编辑出版也就搁浅下来。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之中，连那次评奖也被作为“黑线”的罪行而遭到反复的“清算”。

第二届评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行的，连环画的编创出版从十年浩劫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评奖期间，评委会认为要编辑出版一本获奖作品选集。但是，等到1981年夏《选集》编好后，据说由于其中否定“文革”的作品有所谓“消极影响”而被阻止下来。我们应该感谢辽宁美术出版社，在获奖作品选集久罹厄运的情况下，毅然地承担了这项出版任务，使这本画册绝路逢生。今天重温这些获奖作品，回顾这本画册来之不易的经历，倍感记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何等重要。

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是文化部与中国美协于1963年春季举办的，同年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了授奖大会，共有53部美术作品获绘画奖，27部文学脚本获脚本奖，14位连环画工作者获连环画工作劳动奖。第二届评奖是文化部、中国美协、国家出版局于1981年1月5日——13日在北京举办的，2月18日举行了授奖大会，共有27件美术作品获绘画奖，33件文学脚本获脚本奖，19位连环画工作者获连环画工作荣誉奖。如果说，第一届评奖是检阅建国十余年来连环画艺术很快取代了旧连环画，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所取得的胜利成就，以及随着新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的发展所显示的强大艺术生命力，那么第二届评奖，则检阅了连环画艺术在历经“十年浩劫”之后，破除“左”的思想禁锢，所取得的新的发展和提高，并以其倔强而茁壮的生命力，展示了宏伟的前景。

连环画艺术的历史告诉我们：它是由于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而不断发展、提高起来的。如果失去群众，也就失去它的艺术生命力。正由于此，真正献身于连环画事业的作者，深知熟悉群众的重要性，因而通过深入群众，体察群众的需要，品尝群众的甘苦，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向群众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并力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已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新连环画与旧连环画的严格区别。

谈到群众性，并非意味着停留和局限于某种陈旧的表现手法。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的连环画艺术，固然要坚持通俗普及的特点（以儿童为对象的作品还要适合儿童阅读的特点），力求更多的群众易于和乐于接受。同时，还必须体会群众对于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日益发展的新的要求，从而促使连环画本身在新的时代里不断创新，又不去迎合社会上那些逆时代而起的落后的需求，保持连环画艺术与时代一同前进的活力。通过两届评奖也说明：

连环画所以取得如此明显的进步，是它能够根植于人民之中，而又不断争取在百花竞艳中发展，在相互比美中提高；它坚持民族艺术传统，而又广取博收，不拘一格，从各方面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连环画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来表现故事内容的。因此，塑造艺术的典型形象，是连环画创作的重要课题。（即使有些童话神话题材，在创作上是以动、植物的形象来表现故事内容，也要赋予这些动植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以尽力达到典型化的要求。）在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不少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范例。如第一届评奖获奖作品中的《山乡巨变》里的农民亭面糊和刘雨生等人的形象，《我要读书》里的高玉宝和教书先生的形象，《鸡毛信》里的海娃，《东郭先生》里的东郭先生等形象，已经早就为读者所熟悉，而且长期以来在连环画创作上起了示范作用。第二届评奖获奖作品中的《白求恩在中国》里的白求恩及一些八路军指战员的形象，《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和赵大叔等农民形象，《十五贯》里的况钟、娄阿鼠的形象，《伤痕》里的女主人公晓华的形象，等等，都因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和富有典型性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连环衔接的画幅和具有文学特点的语言相结合，是连环画艺术特有的表现形式。连环画脚本作者和绘画作者要塑造好艺术的典型形象，就要掌握好连环画这些基本的艺术规律。我们从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有不少作者（包括绘画和脚本作者），善于运用连环画的艺术规律，苦心经营，巧妙构思，在画幅的有节奏的连环衔接中，去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故事内容中的矛盾冲突，从而达到艺术的感染说服作用。举办连环画创作评奖，就是要鼓励这种在艺术创作上不惜付出辛勤的劳动代价、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有些获奖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几经失败，从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才获得了成功。如荣获一等奖的《山乡巨变》，就是作者三下农村，几易画稿，才创作出的值得载入美术史册的佳作。可惜在我们大量的连环画出版物中，这样的好作品还是很少的。因而，这种创作态度就更值得提倡和鼓励，以使好的传统发扬光大。

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一届评奖中有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今天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作品或在刻画人物形象上，或在艺术手法上，或在深入生活去猎取创作素材进行艺术提炼上，仍然有着值得借鉴之处。连环画既然是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艺术，就应该肩负起反映新的时代、塑造时代的典型艺术形象的任务。这样，连环画才能与人民息息相通，才能更好地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回避现实，脱离生活，只会使艺术停滞不前，以致倒退。我们应该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作者们到现实生活中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新的时代的作品。

五十余年前鲁迅先生曾为连环画的革新而大声疾呼。当时鲁迅先生对于连环画艺术的殷切期望，如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当然，时代对连环画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编创出更多的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能深入穷乡僻壤的优秀作品。连环画创作队伍应该出现更多的如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的“伟大画手”，使连环画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卓越贡献，也给世界人类的进步文化事业增添异彩。

这本选集由于篇幅所限，编入的获奖作品每件只能选入少数几幅，好在原作都已出版问世，我们还应通过其他方式多方面地将过去的优秀作品介绍

给广大读者。愿这本选集的出版，有助于连环画工作者互相学习，珍惜已有的成就，砥而前进的信心，进一步去开创连环画艺术的新局面。

（原载《美术之友》1987年第2期）

《全国连环画获奖作品选》（1963—1981年），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定价5.20元。

## 岁月流逝 光辉永存 ——介绍《沙飞摄影集》

罗光达

为纪念著名摄影艺术家沙飞对革命摄影事业的卓越贡献，辽宁美术出版社特出版《沙飞摄影集》。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省开平县人，生于 1912 年，1950 年逝世。

沙飞 1935 年在上海从事业余摄影时，就受到鲁迅的进步文艺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促使他决心作一个前进的新闻摄影记者。由于他爱好摄影和木刻，使他有机缘参加了鲁迅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与木刻家林夫、曹白、陈烟桥、黄新波等的谈话，聆听了鲁迅的教诲，并拍摄了谈话时的一组珍贵的照片，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的轩昂气质和对新兴木刻家们的爱护与关怀。十一天后鲁迅不幸与世长逝，沙飞怀着极大的悲痛，拍摄了鲁迅先生的遗容和上海各界群众向鲁迅遗体告别、千万人送葬的悲壮场面。这些记录这一伟大人物历史性事件的珍贵照片，署名沙飞，在上海《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中华图画杂志》等刊物广为刊登。为此，沙飞被上海美专勒令停学。

沙飞在早期的摄影实践中，就认识到摄影不仅能供观赏，而且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作用，因此，他明确指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武器。”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闲阶级把“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沙飞作为一个摄影新天地开拓者，独树一帜，横冲直闯，大声呐喊，身体力行，决心为涤荡旧摄影中的一切污泥浊水而奋斗。从此，沙飞以摄影机为武器，深入社会的底层，把镜头对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老盲人、被奴役的女佣、瘦骨嶙峋的流浪儿、衣衫褴褛的母亲等一大批暴露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平现象，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人民苦难的生活。

不久，沙飞又到粤东的南澳岛，拍摄了《南澳岛——日本南进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等作品。这是我国较早用摄影表现国防题材的作品。这些揭露日本入侵南澳岛、提醒国人警惕日寇侵略的照片，先后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上海《生活星期刊》和《中华图画杂志》上。

1936 年 12 月和 1937 年 6 月，沙飞在广州长堤和桂林初级中学先后举办个人影展。这两次影展得到了进步人士陈望道、邓初民、千家驹、尚仲衣等的资助和好评。当时的进步报刊和广大观众都认为沙飞的影展改变了旧影展的面貌，一扫过去影展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奢华腐朽生活作点缀的风气，使广大观众视觉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有识之士认为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沙飞苦心开辟出来的。这两次影展，扩大了革命摄影艺术的影响，他无愧为 30 年代杰出的左翼摄影艺术家。解放后在北京举行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会上，又展出了他 30 年代拍摄的一部分作品，刘澜涛、杨成武、郑天翔等领导人观看时，都十分赞赏这些作品，杨成武说：“这些照片都很珍贵，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是珍品，很有价值。”

1937 年底，沙飞到八路军中采访，聂荣臻对他用照相机作武器参加抗战，倍加赞赏，并批准了沙飞的参军要求。这样，沙飞就成了人民军部队第

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从此，沙飞如鱼得水，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和饱满的创作热忱，与部队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拍摄了数以千计反映伟大人民战争史诗的作品。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我有机会见到聂总，带了一些沙飞拍摄的战争年代的作品请他观看，他看了以后，很高兴地说：“这些照片拍得都很好，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你们要好好保存。”

为了发挥照片的战斗作用，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战斗非常频繁的敌后方创办了以照片为主的大型《晋察冀画报》，很多国际友人和国统区进步舆论热烈赞扬“这是一个奇迹”。

沙飞在革命摄影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丰富了他的革命摄影理论。他进一步指出，摄影是“负有新闻报道责任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是锐利的武器”。摄影要从反映和传达两个方面增强抗战力量，激励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指出必须坚持摄影的思想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他说“不坚持真实的原则，主观地布置补拍所得到的新闻照片，……就会失去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作用”。他认为真实反映现实，不是为反映而反映，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拍摄，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摄影作品主要注意画面的形式美，同时也要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即作品的内涵美，才能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沙飞拍摄的许多作品，都像优美的图画、雄壮的乐曲、豪放的诗篇，使人激动、振奋。

《沙飞摄影集》的出版，无疑将是一部形象生动抗日战争光辉历程的缩影，也将是一部敌后抗战史的形象教科书。沙飞的革命摄影理论和他的摄影珍品，将永留人间。他对解放区摄影事业的开创发展，对革命摄影队伍的培养壮大所作的卓越贡献，将永远在中国摄影史册上放射光彩。

（原载《美术之友》1987年第3期）

《沙飞摄影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定价13.00元。

尽睹异国绘画风采  
——我国第一部用原作制版的世界  
美术系列画集出版

子 木

沐浴几番春雨，生机更加盎然，大型系列画册“世界美术作品选集”，为我国美术出版园地增添了丰姿硕果。这套精美的画册是由世界美术作品选集编委会编辑的，目前已经出版了《英国水彩画选》、《法国绘画选》、《苏联现代绘画选》、《澳大利亚风景画选》、《非洲美术作品选》、《法国近代绘画选》等六册；据悉，《美国绘画选》、《亚洲绘画选》和《德国绘画选》等，将陆续问世，以飨广大读者。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世界各国推荐来华的美术展览也日益增多。它们或综合概括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美术发展的面貌，或专题介绍一个国家的某种著名美术流派。其中有许多是各国政府、人民和艺术家们花费巨大代价选送而来的艺术珍品，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友谊和美的享受。过去，由于历史条件所致，虽不断有彩印世界名画问世，但多为翻版之作，这对广大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编者有鉴于此，格外珍惜来我国展览原作的机会，充分利用原作资料，编辑出版“世界美术作品选集”，从而改变了基本依靠复制品介绍外国美术的状况，为我国图书出版填补了一块空白。

这套精美的画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可以尽睹异国绘画杰作的艺术风采。《英国水彩画选》自爱德华·戴斯的袖珍之作《奥尔斯湖景色》起，64幅作品，概括了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其中包括18世纪末亚历山大·柯仁斯首创的“泼墨法”作品，颇有中国水墨淡彩的味道。及至当代画家威廉·吉尔的大写意《风景》的鲜明色彩和泼辣笔致，已近乎抽象艺术了。当然，像汤姆斯·希费的《渔夫村舍》、约翰·弗雷德里克·路易斯的《哈利姆生活》、威廉·亨利·亨特的《迎春花与雀巢》，以及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康斯特布尔、特纳等大师的作品更引人入胜。这些杰作，充分显示了1750—1850年间水彩艺术在英国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同时，也使读者从这样一个雅致的领域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堪与油画争衡的水色淋漓、轻快透明的艺术魅力。

《苏联现代绘画选》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刻画深刻的人物肖像和充满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从科林的《恩·德·泽林斯基科学院院士肖像》、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格拉西莫夫的《游击队员的母亲》、格里·米哈依诺维奇·科尔热夫——丘维列夫的《钟情的人》与《荷马》、普拉斯托夫的《骑自行车的姑娘》、谢洛夫的《村里的消息》，乃至莫伊谢延科的《姐妹们，母亲们》，这数十件油画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在革命年代的斗争精神和建设生活，同时，也使读者看到像亚布隆斯卡娅的《冬天》和《亚麻》中所显示的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的巨大变化。

《澳大利亚风景画选》，是一部澳大利亚风景画的发展史。读者从画册中可以看到自从64岁才移居到澳大利亚的格洛弗《帕特代尔风光》、亨利·詹姆斯·约翰斯顿的《影绰黄昏》、威廉·查尔斯·皮奎特尼的《内皮恩上游》、汤姆·罗伯茨的《悉尼米尔森一角》、福克斯的《海德堡》、麦卡宾的《古



老的花园》与《柯林斯大街》、哈森的《暮色山丘》、波恩的《巴瑟斯特山脉的暮色》等等，都洋溢着质朴的艺术魅力，表现出对自然的惊人的观察力。在这幅幅风光秀色之中，画家们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独特的阳光和空气”、“神秘地笼罩着未曾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澳大利亚辽阔的国土”，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的艺术创作经历了特殊的发展、演变过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法国为轴心的欧洲美术，在以往现实主义蓬勃发展和伴随着与学院派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印象主义美术运动，从而将绘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革新建树方面，显示了它的巨大进步意义，对世界美术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近代绘画选》便是集中展示印象派大师作品的一个窗口。它介绍了马奈、莫奈、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德加、塞尚、梵高、修拉、西涅克，乃至毕加索、马蒂斯等印象派、新印象主义、后期印象派以及立体派、野兽派等著名画家自1873年至1927年间的作品，荟萃了这个时期诸多流派的艺术风貌与绘画技巧。这些画家的作品，以往多从复制印刷品上见到，因而难以尽睹原作风采，而这部系列画集的特点正是在于以世界各国名画原作资料制版，并特意拍摄刊印了大量的局部特写，油画作品的丝丝笔致清晰可辨，调子层次丰富，色彩准确真实，可供专业读者仔细琢磨。因此，它一经问世，即在我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为画家和艺术学徒们视为具有很高参考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

诚然，艺术必须植根于民族的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绘画毕竟是那里和那个时代观念形态、艺术水平的反映。我们借鉴和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目的仍在于创造和繁荣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的绘画艺术。

（原载《美术之友》1987年第4期）

“世界美术作品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包括：《英国水彩画选》，定价24.00元；《法国绘画选》，定价28.00元；《苏联现代绘画选》，定价27.00元；《澳大利亚风景画选》，定价24.00元；《非洲美术作品选》，定价20.00元；《法国近代绘画选》，定价23.00元；《美国绘画选》，定价59.00元；《德国绘画选》，定价89.00元。

## 考古材料与政治权威 ——评《美术·神话与祭祀》

顾国泉

近来，理论界对政治权威又展开了讨论，从中既有新的学术创见，也有老的论题复述，但不管如何，政治权威确实是政治学中的诱人的旨题。不过，假如谁问政治权威的萌芽形态怎样？政治权威的渊薮状态如何？恐怕极少有人能完整地解答。对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

有一位学者，一位美籍华人学者，他有资格，并且有份量地阐述这个学术难题，那就是张光直先生和他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而这些“城市构筑其实是一种政治行动，新的宗族以此在一块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新的权力中心”。由此可见，中国城邑的早期形成，不仅仅是建筑文化的意蕴，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威的涵义，它表明“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正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由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系统中彼此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发现。

张先生接着又探索到另一个研究层面，他说道：城邑、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尽管组合了一幅理想化的政治结构图，但深究之后，却发现它的平衡终究是脆弱的。因为，氏族内部的宗族分化为许多等级，它们日益分散，并相互间的地位差别也在日益缩小，也就是说，“亲族制本身已不能严格维持层序体系，不得不把其他因素引入这个平衡面中来”。照张先生来分析，当时古代中国处于宗族分散、城邑割裂状态，因而对维持众多竞争者的政治平衡砝码，便是以“功”（merit）为基础的价值评判。统治者为了夺得真正的统治权，就让“天命”来裁定权力的归属，同时也让“上天”给权力予以道德辩解。像殷商把“功”作为统治的基础，这就产生了儒学理想的萌芽，并且又演化了古代中国权术的始端。张先生分析道：政治王朝的覆没是由于君王无道，失去了政治资格；而新王朝推翻旧王朝而确立功业，是符合民众心愿的行动。他精辟地阐明道：“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化，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这恐怕也是一个独辟蹊径的发现。

张先生对中国青铜时代这一段历史素有研究，因而他能够随着青铜时代这条脉络来探寻更有意义的东西。他判断道：如果青铜是古代中国稀缺资源运用方式的缩影，那么中国文明的肇始和政治文化的开端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角。由于青铜器制作十分困难，而且耗资昂贵，同时必需要有一个手工业网的保障才能完成，因此只有组织成强大政治力量的民族才能办到。作者明确地论述道：“青铜及其复杂的工艺，可能曾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古代中国的权力政治所追逐的主要对象。”这是一个洞若观火的发现。

古代中国政治权威兴起的意义，一方面使中国文明演进到新型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政体走向了封建性的文化形态。另外，古代中国的财务攫取主要凭借政治权力，而财富又是获得和保持这种权力的条件，也就形成了如此的模式：统治者首先树立政治权威，而后才能行使政治权力，因此，张先生就推断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文明的最初集聚，是通过政治手段（国

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

(原载《读书》1987年第4期)

《美术·神话与祭祀》[美]张光直著、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定价1.80元。

## 从进宫到做皇帝绘声绘色 ——长篇小说《则天女皇》

王德昌

我国唐代的武则天，作为女皇公然称帝，登基坐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间是空前绝后的。仅在这一点上，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羁绊，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冲击。武则天名曩（即照），乳名媚娘，山西文水人。其父武士彠，是一个木材商人，家庭富有，善于结交。隋末，李渊当太原太守时，武士彠力劝李渊起兵夺取天下，待李渊做了皇帝（唐高祖），便拜他为光禄大夫，转升为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后死于荆州都督任上。十四岁的武则天与母亲送灵柩归家的途中，经过长安时，被其父旧友推荐到宫里，做了唐太宗的才人（正四品妾），因其貌美才俊，二十六岁到感业寺当尼姑，大约过了一年多的寺院生活，又回宫做了太宗（已死）的儿子高宗的妻子，晋升为昭仪（正二品妾）。三十二岁被封为皇后，开始参与朝政。三十七岁时，高宗因病“不能参政，百司奏表，皆由天后（武则天）详决”。四十岁时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垂帘听政。公元690年古历九月九日那天，武则天称帝即位，号称“金轮圣神皇帝”。她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歌颂了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对未来的信心。诗曰：“蜜桃人所种，人定胜天工。月照九霄碧，时来四海红。春华明旦旦，秋实乐彤彤。万古生机在，金轮运不穷。”八十一岁时宫廷政变被囚，不久就病死了。武则天在位期间，对中国进行了强而有力的统治，提出过不少改革主张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当时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则天女皇》是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政协委员王丕震同志（纳西族）的力作。这部传记体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武则天一生的历史故事，着重写了武则天入宫到做皇帝这段生活内容，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具体描写了武则天利用庶族地主官僚排挤和打击贵族地主官僚的势力，如何一步步取得胜利的过程。

这部小说，既写了武则天道貌岸然地在官场上的活动，也写了她个人的私生活；既写了她的聪明才智，也写了她的狡猾毒辣；既写了她的冷酷和专横，也写了她那情意绵绵的情感；既写了她的积极方面，同时对她的消极方面也予以应有的揭露。作者根据史料和传说，多侧面地塑造了武则天这个人物，形象比较鲜明，故事娓娓动听，语言简洁生动。该书内容丰富，矛盾错综复杂，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看到初唐时期，一幅幅有声有色的历史画面。

（原载1987年5月10日《新书报》）

《则天女皇》王丕震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定价1.85元。

## 为通俗美术修史

——读薄松年的《中国年画史》

李 松

美术史家薄松年新著《中国年画史》有几个可贵的特色：

一是将年画的发展置于中国绘画史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考察，清楚地说明了年画创作的特殊贡献。作者将中国年画的发展史从萌芽时期到“十年动乱”前分作四个历史时期：战国、两汉时代的年节驱邪纳福门画为其萌芽形式；两宋的节令画奠定了传统年画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明清是年画艺术的繁荣时期；从解放区的新年画到解放后年画的发展，是年画的新生时期。这样一个对年画史总体的把握符合年画发展的自身特点。五代两宋和明清，是包括年画在内的通俗文学、艺术发展的两个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原因首先在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不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引起重大的变化，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提出了直接的要求，促成了小说、戏曲和通俗题材绘画样式的发展。从直接表现城市生活、歌颂工商业繁荣景象的《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到民间年画的《姑苏万年桥图》、《三百六十行》等，在绘画发展史中是题材内容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扩展。其次，宋、明时期木刻印刷业的兴盛，也为年画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条件。作者从美术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两宋与明清时期的年画艺术：“（宋代年画）使绘画从庙堂、书斋扩大到城市市民之中，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引人瞩目的进步现象”。“（明清）值得注意的是风俗题材的年画勃兴之际，正值明清卷轴人物画日渐衰颓之时……不少风俗年画中表现了对劳动的赞美，对劳动生活的歌颂，在热情地塑造底层人民形象等方面却是其他绘画中极为少见的。”这些，正是民间年画对于绘画史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此外，近代年画中那些表现反帝、爱国内容的作品，刘明杰、杭穉英等爱国的年画家，也都是在画史上熠熠生辉的。

二是将年画的发展置于社会民俗发展演变的广阔环境中，考察、研究题材及风格样式演进的内部、外部原因。例如书中关于门神的产生和演变，就广泛运用了文献、考古资料，民俗史、宗教史、小说史的材料，论述了门神的起源和它是怎样由山上的神祇演变为现实社会中的将军；钟馗、秦琼、尉迟敬德、刘海、岳飞、穆桂英等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跨进门神行列的？在守护家门、迎祥这一共同含义下，他们又各自分担着什么角色？钟馗何故从厅堂神像变为“后门门神”？其间都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就此而言，它不仅具有年画史的意义，也具有着民俗史、文化史的意义。

三是作者在考察年画的发展时，对同时期的戏曲、小说等艺术门类作了综合性的研究比较。作者薄松年建国初期曾在河北省的白洋淀地区从事农村文化工作，他非常熟悉各种戏曲形式，懂戏，也爱听戏，能编能演能说能唱，那本领是许多同辈美术史家望尘莫及的。这对于年画史的研究是极为有利的条件。因为过去在农村，农民在有条件接受与亲身从事的各门类艺术形式中，戏剧的影响最大。包括年画在内的许多民间艺术总是要向戏剧讨题材和借鉴表现形式。在戏曲艺术发展最盛的明清时期，小说戏曲题材在年画中占有很大比重。戏曲从小说中汲取题材，年画又从小说戏曲中寻找借鉴，当年画艺术成熟之时，又反过来对戏曲产生影响。例如昆曲《嫁妹》中钟馗的种种亮

相，内行人称作“门神架子”，它反映了两种艺术在形象创造上的相互借鉴。由于作者对戏曲艺术十分内行，所以在第三章分析明清木版年画艺术成就的小说戏曲题材年画部分，条贯缕析，娓娓道来，写得十分精采。

四是在史的记述中，注意了对创作实践的研究，特别在余论部分，详细论述了作者自己对年画的革新，如何向民间艺术学习借鉴的意见。作者强调提示：年画在近、现代美术发展中，不仅作为重要的新兴美术形式出现，而且对现代版画民族形式的创立和美术作品大众化的探讨起过很好的作用。这一历史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原载《美术之友》1987年第5期）

《中国年画史》薄松年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定价2.50元。

## 唱给朝鲜的金达莱 ——评牟心海的《情海集》

李万庆

歌咏中朝友谊，盛赞伟大的朝鲜人民的文学作品，自 50 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常写不衰的主题。但是，像牟心海同志这样以“访朝诗抄”的形式呈现给我们整本的《情海集》，在近年来却不多见，这本身就证明着它出版的价值和意义。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以鲜血而结谊，这情志已载入史册，催人永念。心海同志于 1983 年 7 月访朝，并随访随写，很快结成本 66 首诗的专题诗集，说明了诗人的兴致和效率。不仅如此，我们确实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好诗，透露出心海同志不逊的诗才。

《情海集》可以称之为一个歌颂英勇而光荣的朝鲜民族、盛赞中朝友谊的乐章。它是由“万景台散曲”、“平壤短笛”、“板门店剪影”和“友谊路上”四个组曲构成，整部诗集有一个内在的有机联系。“万景台散曲”是集中写金日成将军所开创的革命传统的；“平壤短笛”是重点写朝鲜停战 30 年来巨大的建设成就的；“板门店剪影”是着眼于表现朝鲜人民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信念的；而“友谊路上”则落实到对中朝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讴歌。其中，我尤忘不了那首以叙事的形式来抒发中朝人民友谊的《写给故事的歌》。

综观这部诗集，给我一种真挚而又淳朴的感受。因为诗人描述的是亲身见闻的事实，发出的是一种真理的声音，而真理是最朴素的，它不需要艳词丽句的装扮和遮掩；又因为诗人是用一颗真挚的心来说话，而以真挚的情感说出来的话本身就是诗。当然，我不是说诗不需要锤炼；恰恰在炼字、炼句和炼意方面，我看出诗人所下的深细工夫。这些诗不仅铅华尽洗见真情，而且在新诗的格律化方面，也作了很有益的探求。

“访朝”的题材是不少人写过的，心海能独出机抒发人所未发吗？我在心里盘算着。可是，当我把《情海集》捧在手中，诵读再三的时候，我向诗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我的眼前浮雕般地凸现出朝鲜民族既勇敢坚定又善良勤劳的性格与魂魄。由于诗人将朝鲜民族的性格和魂魄投射在朝鲜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描述之中，就使这些“访朝”诗作，区别于一般的山水诗、游览诗，而是在对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描绘中都凝聚着这个伟大民族的神魄，并使这神魄成为提摄整部诗集的核心。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至少是重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显明越好”。心海的诗正暗合于这一艺术规律。从万景台诞生过金日成元帅的“草房”，到平壤的“凯旋门”；从大同江上发出巨大电力的“烽火闸门”，到三八线上英雄的村落“板门店”，我们看到一个威武不屈从战争年代迈向和平建设时代，挺然而立的朝鲜民族。

在对朝鲜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抓住事物的基本特征，进行喻象化的抒情，是《情海集》中某些好诗取得成功的关键。喻象化是从具体转化为抽象，即从写实走向象征，增强诗的哲理含量，扩大诗的张力的一种抒情方式。在《是劳动还是艺术》一诗中，诗人选取了朝鲜妇女喜欢以头顶着包裹、盆罐等物这民族习俗，加以巧妙地构思。诗人从朝鲜民族顶物的动作中，发现这个民族既勤劳朴素又能歌善舞的民族性格特征。不仅如此，还从“顶”的动作引

发开去，全面地展示了朝鲜人民的性格。请看，朝鲜妇女顶物的动作是多么优美：“顶呵，顶——翩翩起舞”，“顶呵，顶——舞姿婀娜”。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的是这些具象的动人情景，我们至多欣赏到一幅漂亮的《顶水图》；然而诗人却作了这样的抽绎：“不管头上有多重，顶的是那么公正”；“不管暴雨和狂风，顶走灾难与战争”；“不管年老还是年轻，顶一个新天地诞生”。于是，从具象走向了抽象，“刚直不偏”、“坚强不屈”、“立于世界之林”这种朝鲜民族的性格就获得了具象与抽象的统一。在《能把两半捏成团》这首诗中，仅仅用了两节、八行诗，就塑造了这样一种伟大民族性格：“同人民军战士紧紧握手，那手是那么有气魄，能把高山劈两半，能把大江抓起来。”“那手是那么有力，几乎使人奇怪，但人们又深信，能把两半捏成团。”这首诗写得既朴素又精炼，传达的是一个民族的神魄。它写的虽是同人民军战士“紧紧握手”的瞬间感受，却又把它升华为对一个民族性格的硕大造型。把高山劈为两半，把大江抓起来，这种超现实的手法，本质地体现了朝鲜民族的力量、毅力和决心。心海同志采用喻象化的抒情方式创造出一批难以忘怀的好诗，这不仅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审美需要，而且说明喻象化的抒情并没有过时，它仍应在不同风格流派的诗歌多元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对喻象手法的利用和改造，将会进一步丰富诗歌的表现手法，改变有可能又走向另一种单一化的趋向。看来要推进诗歌创作的发展，故然不能忽视抒情方式的改造，但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在是否有真情，抒真意，倘有巧妙的构思和立意，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会写出好诗。

心海同志的诗，给我另一个深的印象是炼意的功夫，往往一字之酌会达到境界全出的效果。比如《目光的语言——在毛岸英遗像前》这首诗，诗人对岸英烈烈士遗像的不平凡的笑脸作了这样的描写：“扑过来了你那亲切的视线，如同双手把我们紧紧拉到你的胸前。”为什么烈士要扑向我们，原来烈士希望我们“为友谊填写新贡献”。这诗的立意构思都十分不凡；倘这首诗采取的是见了烈士的笑脸，想到我们应该为中朝友谊作出新的贡献的构思，则难能脱俗。

一首好诗的效果，不在形容词和副词而在具象动词和名词，“视线”一般用“投射”、“注视”来搭配，仅用一个“扑”字就把全部身心的热情和力量都倾倒过来，使我们由眼神看到了扑的动作，况且这“视线”又转换为“双手”，“把我们紧紧拉到你的胸前”，这种概念的转换，创造了岸英烈烈士猝然扑出像外的动感效果。具象动词不仅应用在对人物的描写之中，而且还大量应用在对山川、风物的描绘之中，如写朝鲜的山是绿的，用了“绿在我眼中闪耀，绿在我耳边撒娇”。闪耀形容“绿”，生机盎然，带着釉彩；“撒娇”形容“绿”的可爱和稚态可掬，都是从具象展开的喻象化描写。特别是《春天的使者——写给朝鲜的金达莱》这首，诗人是这样来形容作为英雄性格象征的金达莱花的：“此刻是你吻着我的目光，虽没有举起红伞，仍显出青春的模样。”好一个“吻”字，这构成了全诗的“诗眼”！不说我看到了英雄的金达莱，反说金达莱“吻着我的月光”，这种反观的视角不仅写出了朝鲜人民的热情，而且这种以触觉代视觉的通感性，以物拟人，是炼字、炼意与喻象化抒情相结合的一个好例。

心海在这本诗集中还有意识地探索新诗的格律化问题。这部《情海集》基本是由字数大体整齐押韵的半格律体和格律体所组成。大体的整齐和押韵是为了达到易记或易唱的目的。《情海集》中，几乎所有的诗都实现了格律



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押韵；并采用四行一节为基本建节的体式，兼及两行及五、六行一节的体式。其中，《赞妙香山》、《致东林瀑布》、《江水情高昂》等是七言或五言的现代绝句，其中，我尤为惊喜地看到《是劳动还是艺术》这首诗，不仅立意高远，而且达到了比较高的格律化，从每一节看句子显得参差不齐，富于变化，但从全诗来看基本上达到每节相对应，句子字数相当，这种从繁富中求单纯的格律形式在《它一代一代去指教》等诗中也有突出的类似表现。

《情海集》如以上所述，有不少好诗，整体上突出了朝鲜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特点。但是，也有些诗还缺乏开掘，写得比较平淡；在表现手法和抒情方式上，以喻象化来抒情，虽与题材基本适应，但却感到缺少创造和变化，显得过于单一。显然，这对于迅速成章的这部诗集来说，要求有些高了。但我深信诗人会沿着已经拓展出的创作道路，向读者献上更新更好的诗章。

金达莱是朝鲜英雄性格的象征，也是友谊的象征。愿这支献给朝鲜的金达莱，飘过鸭绿江，飞向朝鲜人民的心窝，带去中国人民美好的祝福。

（原载《诗潮》1987年总第15期）

《情海集》牟心海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定价0.95元。

## 点亮文化的圣火

——张我军和他的《乱都之恋》

龙瑛宗

1987年8月侨居于芝加哥的张光正先生，委托适巧旅美的台中诗人恒夫，转送一本白话诗《乱都之恋》给我。打开一看赫然是中国大陆刊印的出版品。

《乱都之恋》一书原先早已绝版，再领略不到她的全貌了。谁能想到，在她刊行六十年后的今天，这本写于北京、台北两地，出版于台北的白话抒情诗集，酷似一位浪迹天涯又渺无音讯的游子，历经坎坷，终于安然地回到了家乡——北京！

十年前，张我军先生的次子张光直在台湾编定《张我军文集》，交由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部《归来》的诗集，则由其长子张光正在北京编校，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重版发行。这巧合，不知是亲人阻隔的悲剧，还是手足同心的美谈？

《乱都之恋》这个白话诗的题目，据作者我军先生自己说：乱都是北京，因为那时正值奉直开战，北京城内外人心颇不安。“乱都之恋”便是“北京之恋”。

威海卫的连山一直向后退了  
船底下渐渐地发出沙沙之声  
雄赳赳地向着茫茫的大海去  
去呀！去呀！  
远了！远了！

（一九二四年于黄海之上）

六十年前的轮船，载着青年诗人雄赳赳地而且沙沙地向台湾宝岛驶来。诗人发出叹声，叫着远了，远了。究竟远了什么呢？原来他把爱人留在乱都。那个异乡姑娘，就是光正、光直的母亲，而他们的父亲当然是板桥出身的张我军先生。

张先生在世时，曾经对我说：“孩子如果想进台大医学院的话，相信考得上。不过，我从来没有干涉过孩子们的开学问题。我知道不少台湾的爹娘，强迫自己的子女去念医学院，将来做摇钱树。”张先生的见解与众不同，虽然张先生因癌捐躯，但是，他的儿子继承父志，专攻不会赚钱的考古学，努力炼成杰出学者，为中国学术界扬眉吐气。

在此，我们抄袭一段光正先生的文章：

去年底（民国七十五年），在北京召开的张我军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许多发言人都提到父亲青年时代创作的，台湾出版的第一本白话文诗集——《乱都之恋》。可是人事沧桑六十载，虽有不少人谈论过它，可是除了早年刊登在《台湾民报》上的一篇诗集的序以外，阅读过全集的人怕是凤毛麟角了。关于这本薄薄的、浅红封皮的小册子，母亲和三个弟弟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楚，有好几本一直与家里的藏书放在一起。随着全家从北京迁回台湾，在台湾又搬过三次家，父亲的藏书和遗物越来越少。据弟弟们回忆，那几本《乱都之恋》却一直都在。它们的失踪是在母亲和弟弟相继离开台湾后，同寄存在别处的两个箱子一块不知去向的。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两年前我在编辑《张我军选集》时，为了找到这本诗集，遍访过北京、上海的各大图书馆和资料室，有人还到重庆、广州、厦门找过，而台湾和海外也早就有人在多方寻觅，结果一概踪迹杳然，我从此就不抱太大希望了。

最近，一本原版《乱都之恋》的全文复制本，传来北京，送到我手上，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喜出望外之余，我觉得万分的感谢和庆幸。

找寻台湾第一部白话诗的，并非北京和上海的热心人士，而是台湾的人士。功劳者是台北的黄天横先生，其次是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戴国辉先生，第三才是我。

回忆民国三十九年，我是合作金库信托部存款课长。有一天，信托部副理陈传标抓着我，你调为出纳课长职务。这个消息令我跳高三尺，我从来没有算钞票的经验。怎么办？我便跑到理事办公室找朱昭阳先生，告诉他我宁愿做办事员，不愿做出纳课长。朱先生问我，你想做什么呢？我希望在研究室工作。后来，真的做办事员了。

那个时代的研究所主任，就是张我军先生。他知道我派在研究室工作，便大喜道：“人事当局好有人情味，雪中送炭，派了一个编辑人才。”我到农会将业务现况写出来，我军先生帮我修改那些日文味道的词句。

嗣后，看了我的同学，多升为分行副理，独我一个人办事员。我肚子上的不平虫，一齐抬起头牢骚起来了。于是向诗人主任泄气，主任说：“你的事情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我会向谢国城君说明一下。”当时的谢国城氏是合作金库副总经理兼台湾棒球协会主干，而谢氏私人委请我，为了台湾棒球界做些事并编排棒球杂志。就这样地我的写作由日文转换为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便是鼎鼎大名的张我军先生。

民国三十年代，在台湾能写漂亮白话文文章的，只有国语日报洪炎秋和合作金库张我军先生。洪炎秋氏和张我军氏均是北平留学回来的。我自三十九年仲夏至四十四年冬天，一共五年间，跟我军先生一块儿工作。讵料他患了可怕的癌症，断魂于台北寓所，随即焚化，焚化后灵骨也由我捡起。这是台湾新文学的一段秘话。

今天，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再度重作台湾新文学，肯定它的时代价值。我们应该缅怀台湾文坛的先觉者，如赖和、张我军、叶荣钟诸先生。而他们留下来的著作，也应予深读且仔细欣赏。

（原载 1988 年 1 月 19 日台湾《新生报》）

《乱都之恋》张我军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6 月出版，定价 5.00 元。

## 运动的人体与人体的运动美

李秀忠

这些年里，国内各出版社出的不同版本的人体速写五花八门。由于读者对象不同，需求不尽一致，这才有了不同层次、不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当然，这其中“萝卜快，不洗泥”的货色也是有的。目前，人体速写已经由短线紧俏产品走向长线，这就要求作品的高质量，否则将有碍于人们的视觉享受。

《人体速写技巧——著名美国插图画家罗伯特·弗赛特的人体速写》一书，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罗伯特·弗赛特对人体速写的研究成果和他的作品。全书文字不多，散在于诸多的画作之中，读文品画，颇有几分惬意。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多角度、大动作地调动模特儿，以鼓励描绘者的艺术冲动，并使情感奔放起来，把由此而产生的想象和创造力与娴熟的技巧结合起来，使课堂的学习生活和人体速写习作充满活力，是罗伯特·弗赛特课堂人体速写教学的主导思想。在他的速写中，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激情、活力，到处可以体察到那种因激情难捺所产生的意象手法和迅捷的速度。确切地说，在弗赛特笔下，在他的眼中、心中，模特儿是充满了活力的、最可使人激动的、与画家一样伟大的艺术家；她们的每一个动势，每一个局部都是生命的宣言，都是运动着的、充溢着诗与歌。他反对以医学的眼光和概念来解释人体艺术中的现象，并且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人体速写走向歧途，永远找不到艺术的门径。所以，他的速写人体是眼、心、手合一的艺术表现的产物，是生活的升华，是运动着的人的精神的颂歌。而这一切又归结为一点，即：他人体速写没有丝毫的记忆痕迹或所谓的经验之嫌，而是由直接观察得来，是视觉感受的结晶。

罗伯特·弗赛特的人体速写，是跳跃着的。他手中的笔随模特儿的姿态的频繁转换，随人体的节奏和律动变化，随作者的视觉感应和心理波动而起伏迭宕，轻重缓急地运动着。他以变换线条轻重的清新手法，捕捉对象姿态的活力和精神，用轻线突然转化成重线的手法，显示人体姿态的吃重点，而不是去追求解剖学中的骨骼转折或关节的硬度；在生动娴熟中流露出准确性，不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准确性中去追求艺术上的生动。这一符合艺术本质的人体速写观念，决定了弗赛特的人体速写的开放性和扬扬洒洒的大家风范。他的这一观念是当前我国人体美术教学特别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也正是我国人体美术速写及创作应当吸取与充实的。

因为基本观念的不同，或者说弗赛特对人体美术的理解与认识比我们更为明确或坚定，因此，展示给我们的作品是清新的、充满感情的和扩展着生命活力的。在他的画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体艺术的世界，而不是一大群普通意义上的裸体的人。他的速写来源于直接的视觉感官，不是靠理念中的理解、数据把握或经验的记忆，所以他笔下的速写人体才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就为艺术家的想象和再创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其实，弗赛特人体速写本身已经从习作脱化出来，从一动笔就已进入了创作的境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评价的话，可以说，对接受他的主张、理解他的作品的真谛是困难的。

《人体速写技巧——著名美国插图画家罗伯特·弗赛特的人体速写》一

书中还涉及了弗赛特人体速写教学中许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他的速写工具的随意性，多样应用和大量的背景、环境与人体的烘托、对比，线条与调子的默契天成等实践和研究，都是十分引人入胜、令人感动的。这样全面涉及一位画家的单项研究成果和学术介绍，无疑会受到社会的欢迎。我想《人体速写技巧——著名美国插图画家罗伯特·弗赛特的人体速写》一书定会得到美术工作者和与美术有缘的广大读者的钟爱。

（原载《美术之友》1988年第1期）

《人体速写技巧——著名美国插图画家罗伯特·弗赛特的人体速写》  
〔美〕霍华德·门斯著、王弘力译，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定价3.90元。

## 明净淡雅的佳作

——荐《谭云森水彩画选集》

张克让

辽宁美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王信水彩画选集》、《水彩肖像画法》、《英国水彩画选》，又在《造型艺术》出水彩画专辑，都受到广大美术工作者、尤其是水彩画爱好者的欢迎。

该社出版的《谭云森水彩画选集》，是一本明净、淡雅的水彩画佳作，读者自然是乐意先睹为快的。

西方水彩画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我国水彩画曾有一个发展繁荣阶段。近几年水彩画在我国画坛上已经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画种，并引起国际画坛的重视。

谭云森是从事多年美术编辑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对推动、发展我国的水彩画事业非常热心。早在50年代他编辑的《关广志水彩画选集》影响甚广，80年代初与曾善庆合著《水彩画技法》一书也十分畅销。在他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副主任期间，由他编辑的《水彩画选辑》连续出版八辑，由于是八开活页选辑，无论是人物、风景、花卉都可以作为水彩画教材，因此很受欢迎。

谭云森同志192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城市贫民家里，14岁参加革命，在重庆《新华日报》作过排字工人，当时出版在报纸上的刊头画和充满抗战生活的木刻画深深地吸引了他，对美术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抗日战争结束后，党组织送他去延安学习，1947年入晋冀鲁豫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教师王式廓、罗工柳等同志指导下，进步很快，初步掌握了绘画基础。全国解放后，长期在人民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繁忙的编务工作，使他抽不出完整的时间作画，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曾尝试过油画、国画、版画和水彩画，最后认为水彩画最适合自己的兴趣。数十年来，谭云森同志避开干扰，潜心钻入当时被人们看不起的小画种——水彩画中苦心经营，虚心求教，向中外的水彩画传统学习。老水彩画家关广志的作品，以及古元同志的水彩画对谭云森都有较大影响。

谭云森同志硬是忙里偷闲挤时间画水彩，有时利用外出组稿和考察的机会深入生活，进行实地写生，这对一个水彩画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经历实地写生才能表达出作者对景物的激情，把自然景观高度概括、提炼，集中反映到画面上。他的《西双版纳景色》、《北京郊区农村村头》、《傣家庭院》、《鸟鸣山更幽》、《黄山慈光阁》、《避暑山庄苏堤》等都是写生传情之作。他那明净、淡雅的色调，活泼轻松的笔触，给水彩画注入了清新的生命。欣赏云森同志的作品使人心旷神怡。

他的静物花卉作品《瓶花》、《芍药》、《丁香》等同样是那么隽秀、清爽，色彩画得干净透明。

云森同志的水彩画，在吸收西方水彩画精华的基础上，又把我国传统水墨画技法糅进自己的创作当中。所以他的水彩画既保持了西方水彩画透明、淋漓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写意画的特色，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云森同志虽已到离休之年，每天在忙完公务之后仍抽出时间把过去的速写、画稿加以整理，重新构思进行创作。我们祝愿云森同志的新作问世。

（原载《美术之友》1988年第1期）

《谭云森水彩画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定价13.00元。

## 中国首帝的悲歌

——长篇历史小说《秦始皇》面世

王德昌

长篇历史小说《秦始皇》，是王丕震同志继《则天女皇》后又一部力作。写秦始皇的著作较多，但以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是少见的。作者采纳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认真地艺术提炼和精心地创作构思，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秦始皇的出生、幼年、当太子、成婚、继王位、征服六国、称皇帝、巡行、被刺、死于沙丘，他那一生的全过程。本书人物众多，形象鲜明；故事曲折，情节生动；语言朴素，充满着古香古色的气息。

秦庄襄王之子异人，做为人质禁于赵国，与赵姬婚配有子，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出生的问题，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讲的，异人质于赵都邯郸时，有一名巨贾吕不韦，为了巧取秦国政权，赎买一名妓，待其有孕，借机转嫁异人，出生的小子取名曰政，后来经过吕不韦去秦游说和重金收买宫闱要人，最终使政登上了王位。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了，但追其源未必准确。早于《史记》成书的《战国策》，并没有此种记载，可见司马迁是根据传说而写成的。秦的称霸，使得六国的贵族，对秦始皇的诽谤和反抗，一直未有停息。荆轲的行刺，张良的伏击，项羽的起兵，都带有这种因素。作者在《秦始皇》这部书中，既保留了这个故事的神奇性，又否定了它的真实性。吕不韦是秦国的多年宰相，妻妾多人，一生从未有过子女，根本无生殖能力，该证据最为有力，使人哑口信服。这一方面反映出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高度的创作技巧。

这部长篇是以秦始皇这个人物为主线的，同时写到了秦宫的内部矛盾和其他六国的利害冲突，还描绘了当时各国的形势和社会风貌，以及秦征伐六国的悲壮场面，从而使读者认识到产生秦始皇这个杰出人物的时代背景。没有秦几十年治富的国力，就没有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没有秦连横策略的正确，就造成不了秦能各个击破的条件；当时人民由于战乱而思治的心情，这也是秦能胜利不可忽视的因素。秦始皇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识大局，当机立断；听纳谏，勇于改错；排众议，消除内奸；重策略，亲疏有别；会用人，知人善任；创新业，大胆开拓。综合以上主客观情况，才能在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大统一的局面，开创出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首次出现自命皇帝的最高统治者。这些史无前例的创举，都不是奇怪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对以后中国各代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该书对秦始皇的前期描写，主要表现他是一个“明君”，他从做皇帝开始就变成一个“暴君”了。秦始皇为显神威，出巡四方，到处刻石歌功颂德，东临泰山时，树一巨碑，高于顶巅三尺多，碑身与山峰对峙，虽碑上无字以铭，但其炫耀功名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唯我独尊，信谗言排忠谏，专横暴虐，欺凌万民，穷奢极欲，迷罔鬼神；他不顾黎民生死，苛政如虎；他不惜一切资财，大兴土木，结果国祸民殃，反抗义旗风云而起，最后落得一个灭亡的下场。作者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秦始皇这个人物，作出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论功指过分明，是非清楚，可以称



其为是一个历史的镜鉴，使广大读者能从中汲取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益。

这部长篇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是从七雄鼎立到秦亡前这段历史，共有四十年的光景。大约经过十年的激战，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诞生了，虽然已时过两千多年，但它所产生的文化和所形成的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发生着影响，因而对秦始皇的研究，今天仍然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原载《玉龙山》1988年第1期）

《秦始皇》王丕震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定价1.78元。

## 大自然色彩给予人们的启迪 ——读《彩色摄影与美术设计》

栾祿璋

《彩色摄影与美术设计》一书是由中国流行色协会会员、专业工艺美术家白文明、朱景辉二同志合作编绘的。他们多年来深入长白山区，从探索林木、苔石色彩，扩展到研究以往不为人们注意的自然界的许多新课题，这些新课题扩大了实用美术设计素材的新领域，开拓了认识色彩和应用色彩的新途径。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们多年来对北国风光色彩研究、考察、探索与实践的结晶。书中主要是通过他们考察、搜集到的美的形象素材，借助于多功能照像机所抓拍到的色彩照片分析出的色谱，以及在自然形和色的启示下设计出的大量实用美术作品，进一步说明长白山自然色彩对美化现代人们生活所起的积极作用。他们是在做着投石问路的试探，但是对于我国工艺美术设计界尚处于起跑线上的今天，确实显得十分可贵。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从商业信息和市场学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伴随着商品输出的激烈竞争，工业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造型日臻完美，尤其是装潢造型、装饰色彩更是不可忽视，人们对于美的需求，显得越来越强烈。突出在纺织品、服装面料方面，花色品种、时装款式的日新月异，花样翻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欧美许多色彩学研究权威力图使自己的预测左右形势，研究“流行色”已成势不可挡的新潮流。研究中外所谓“流派”已成新课题。抓住“流行色”的研究，开拓色彩研究的新领域，探索广阔的大自然色彩素材对实用美术学科色彩应用的新蹊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彩色摄影与美术设计》一书就是从北国所特有的雄伟的高山、辽阔的大海、茂密的森林、绚丽的鲜花着眼，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发掘美的素材，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传统的绘画方法，老式的写生技巧，始终感到力不从心。直到现代，摄影技术的发明，摄影器材的完备，才真正满足了这种要求。读过此书，就会看到作者致力于运用摄影手段探求设计素材，从而开拓了设计新的领域。

在彩色摄影机的镜头下，大自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因其富有巧自天成的装饰性，人们只要运用设计手段，即可成为佳构。科学同艺术相结合，会使精神和物质产生飞跃。运用彩色摄影的许多特点，补充、简化和取代了传统的设计程式，直接由彩色照片获得人们肉眼无法见到的效果，从而得到有益的启示，从中分析色彩组合，构思设计出新的图象。作者从大到巍峨的山峰、锦绣的原野、茫茫的林海和滚滚的江流，小到岩石的结晶、树皮的肌理、苔菌的斑痕和红叶的色彩中，吸取营养，构成美的设计。这些设计除把纺织品装饰图案作为重点外，并囊括了衣着眼饰、鞋帽箱包、室内装饰、家用电器、书籍装帧、包装装潢以及汽车喷漆等等许多领域。在模拟设计上，跟踪时代新潮流，把握流行新款式，既不争奇骛怪，又要刻意翻新。不是鲜花，胜似鲜花。在国际艺坛上抽象派处于显赫地位的今天，他们通过摄影所获得的新形象、新色彩和所构成的新设计，真不愧于艺海波涛中的弄潮儿。

每次浏览此书，总是爱不释手，每回似乎都有新收益，总为作者新颖的立论而叹服。那既有地志博物性的考证，又有游记性的采风，笔调活泼流畅，而又不失其严谨的条理，引人入胜。融科学性、艺术性、知识性、欣赏性、

技法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加上全书全部彩色精印，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它使人们洞察作者隐于设计作品中的创作激情和审美情趣，从而得到美的享受，引导你目不暇接地看到璀璨晶莹的奇石，罗列于幽厅雅舍之间，有如身穿时装、仪态翩翩的美女，漫步于佳花瑞木丛中，仿佛把你带入风光旖旎的花丛芳甸，呼吸到奇葩异卉的馨香。

《彩色摄影与美术设计》一书，是实用美术工作者以及广大有志于实用美术设计工作者很好的参考书。也同为服装设计、工业品造型、装饰、商品包装装潢各界爱好者，特别是兼爱摄影的人们的一本有益的技法理论书。

（原载《美术之友》1988年第2期）

《彩色摄影与美术设计》白文明、朱景辉编绘，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7年6月出版，定价 13.00 元。

## 郭建尧和《相思柳下的怪老头》

郭 风

郭建尧同志的儿童小说《相思柳下的怪老头》里，还收入另一篇小说《榴梿果的故事》。我想趁此机会说一些想法。

少年儿童们在阅读《西游记》、《鲁滨逊漂流记》以及《木偶奇遇记》以外，当然也期望读到描绘他们自己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包括学校、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小说作品；他们期望能够看到作家的笔是怎样描绘、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兴趣的事物的。也许囿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我的印象中，我国从事儿童小说的作家为数不算大多，像盖达尔那样以毕生的力量从事儿童小说创作的作家，似乎更是使人有凤毛麟角之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小说的出版和儿童小说作家的成长，总是使人感到喜悦。

郭建尧同志对于儿童小说的创作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他以业余时间在这个领域内进行探索。当然，他也为少年儿童写一些报告文学、散文乃至诗歌，但就我看来，他的主要成就还在儿童小说方面。据我所知，他大约是在1956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那时他还很年轻。由于他较长时间在中、小学校任教，较长时间与少年儿童生活在一起，他选择儿童文学，其中特别是儿童小说的创作做为自己的人生奉献，是很自然的。他相当朴实，因此，他在探索道路上步履艰辛地前行，以毅力、勤奋和信念，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结出一点一点成果；是的，未必每年丰收，但日积月累，他的创作仓廩里逐渐丰满起来，其中也有硕果。

还有几句话要说。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内，郭建尧的作品似乎并不是以描绘幻想世界见长，似乎也不太常出现奇特的笔致以及奇特的想象力。虽然，这些在文学创作中以及在儿童生活中都是需要的，在文学创作中有时是很重要的，而对于建尧同志来说，他似乎更喜欢，或者说更擅长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世界的描绘。我要指出，建尧同志笔下出现的儿童世界，具有特定的时代的强烈色调和德育的强烈意识；看来，这可能是他开始走上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以来，信守不渝的一种自我制约和文学准则。譬如说，50年代至60年代，厦门前沿炮火连天，我们的少年儿童也投入火线的战斗中去（例如，送炮弹），或在地洞内上课（洞外空中，时或有炮弹飞过的鸣声）。建尧同志当时也投身前沿，与学习、战斗在炮火中的少年儿童生活在一起，写出不少描绘前沿少年儿童战斗事迹的小说以及报告文学，在国内一些儿童文学报刊上发表，受到小读者和家长的欢迎，也受到儿童文学评论界的注目。显然，建尧同志有一个见解：通过我国少年儿童自己的先进思想和行动的艺术概括，对少年儿童进行自我的品格教育，是儿童文学的崇高职责。我个人也认为，儿童文学可以有各种功能，而发挥它的德行教育的功能当是作家首先要念及的。

儿童小说集《相思柳下的怪老头》可能是建尧同志的创作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50年代末期初次走上我国文坛至今，近三十年的耕耘，他应该得到报偿：在收获期间摘取佳果。这篇小说所出现的情节、故事是如此地贴近现实，而这又是如此为人们所关注的当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但其中又似乎含有某种当代的浪漫或传奇色彩，乃至某种悲剧意识。四十余年前因被抓壮丁而远离台湾花莲县木瓜村故土和妻女的高山族台胞夏爷爷，因思乡病重

在厦门鼓浪屿疗养院休养。他的行动有些痴痴呆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怪老头。一日，他在叔庄花园的相思柳下见到鼓浪屿小学的五年级生小蓓（她在采兔草），因为小蓓长得很像他背离故乡时的女儿阿莲，所以夏爷爷十分喜欢小蓓，但小蓓开始时一直逃避他。后经护理夏爷爷的护士、高个子阿姨向小蓓讲明了夏爷爷的底细，于是，小蓓从此时常到疗养院夏爷爷的病床前，给思乡病重的老人以慰藉。这中间穿插一个情节：小蓓一日捕到一只飞到她家中的台湾信鸽，这只信鸽终于成为信使，它飞越海峡，把夏爷爷的信息传递到木瓜村的亲人，也从木瓜村把亲人——妻子和女儿阿莲的信息传送给海峡的这一边的、在鼓浪屿疗养院的夏爷爷……但夏爷爷却终因骨肉之不得相聚，病情继续恶化而溘然长逝！小说不仅揭示了夏爷爷情深而善良的心灵，不仅塑造了像高个子阿姨这样的品质高尚的医务人员的艺术形象，更极为生动地通过小蓓的艺术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活泼、聪明、富于同情心、热爱生活、科学和忠于祖国的新一代少年儿童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更由于小说触及我国人民十分关注的海峡两岸骨肉的团聚和台湾的复归问题，它的意义便超出一般儿童小说的规范。

《相思柳下的怪老头》还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它被安排在大海的波浪和南方的风景中来展示情节的发展。但作为儿童小说，小说又具有儿童生活的独特情绪。我以为，在谈论这篇儿童小说和郭建尧同志的其它作品时，这些特点是不应该忽视的。

（原载 1988 年 2 月 27 日《文艺报》）

《相思树下的怪老头》郭建尧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出版，定价 0.80 元。

相思柳青 榴梿果实  
——评郭建尧儿童中篇小说集  
《相思柳下的怪老头》

林培堂

—

累累榴梿果，青青相思柳，是生长在鼓浪屿上的两种亚热带植物。《相思柳下的怪老头》、《榴梿果的故事》，是发生在鼓浪屿上的两个儿童中篇故事。两篇故事，合为一册，取前者为书名，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就是郭建尧的第一个儿童中篇小说集。

郭建尧是鼓浪屿人。鼓浪屿是音乐家的琴房，诗人的五彩笺和画家的调色板，是驰名中外，令人向往的海上花园。取鼓浪屿为铺展故事的特定环境，作者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情景”为小说三要素之一，在儿童小说中尤为重要。郭建尧这“取景点”选得好，奠定了他两篇小说的基础。

郭建尧曾当过26年中小学教师，他熟悉儿童生活，持之以恒坚持儿童文学创作。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趋附时尚，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而恪守他的启蒙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苗凤蒲的教诫，几十年来坚持从生活出发，老老实实在地笔耕于这块小小的园地。从当年的海防前线少年，到今天的特区新一代，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形象始终饱含着时代的风采。

在熟悉的环境中驰骋熟悉的生活，这是郭建尧的这部儿童小说集和他的其他儿童作品的成功之处。然而，这还不够，儿童文学评论家贺宜说过：“一百个儿童文学作者必须有一百颗真正热爱儿童的心。”儿童文学作家如果和孩童没有这样一种天然的感情缘份，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来。

郭建尧大概就具有这种“天赋”；或者说，他是深谙个中道理的。在《相思柳下的怪老头》中，倾注了他对孩童们的爱，跃动着他的一颗不泯的“童心”。

二

两篇故事说来并不惊险，更无离奇之处。作者的写法也不标新立异，纯粹的传统手法，有头有尾，娓娓道来。这种写法也许不足引起新潮评论家的青睐，然而却实实在在为一般小读者们所接受。孩子们称之“好看”的标准，在于有没有“故事”。《相思柳下的怪老头》不仅题目吸引人，故事也颇具魅力。小朋友郑小蓓偶遇一位“怪老头”，几番被堵截，尔后一经接触，进而了解到这位台胞“怪老头”的悲惨身世，便由害怕变为亲近，在另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她和同学李惠利用放归的台鸽为怪老头和家人取得了联系，怪老头却无法与海峡对岸的家人团聚，饮恨病逝了……另一篇《榴梿果的故事》说的是流落海外的侨胞送子回国寄读，儿子的班主任却是自己往昔的同桌。国内外遭际的强烈对比，课内外生活的同时展开，同学、师生间，新老两代人的情感交错缠绕，使得故事情节委婉曲折，引人入胜。

当今，海峡两岸、海外侨胞题材可以说是抢手的“热门货”，然而有影响的佳作却不多见，至少在小说创作领域里可以这样说。究其原因，大概由

于题材一经“时髦”，便有如时装的流行，千篇一律。抑或有别出心裁者，虽能臆造杜撰些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却失之真情，撼人而不动心。《相思柳下的怪老头》中的两篇故事的情节虽属平常，却不平淡。贯串于故事的情节线索，缘于“事”而动于“情”。作者精巧地将“风情”与“人情”拧成一股股“钢筋”，浇铸在情节结构的“楼层”里。以诗情画意的鼓浪屿特有“风情”来牵系情节的发展，使故事更有实地感，也更具真实性；以海峡隔岸、异国游子对亲人、对祖国的“人情”来反映现实，贯串情节，使故事更有感染力，也更具蕴涵力。这是两篇小说异曲同工之处。分别来看，两篇小说在情节构筑中亦有不同之处。《相思柳下的怪老头》的人物关系较简单，矛盾冲突不那么强烈，其“风情”的渲染烘托更充分些，散文韵味也更浓郁些；《榴梿果的故事》中有师生之情，有同学之情，有父子、母子之情，有老一辈的恩怨，也有新一代的情谊，其“人情”的刻划濡染更深刻些，情节结构也更严密些。同时，该篇还涉及到教育心理、教育方法等发人深思的社会现实问题，较全面地展现了学生的课内和校外生活，人物性格的对比差异也更显著些，也就更具有思想深度。

前一篇显得明丽透亮，后一篇却较之厚实凝重。虽有差别，但两篇小说从环境到写法，从内容到题材，从形式到风格，应该说是和谐统一的，我想，本地小读者读到此书，一定倍觉亲切，仿佛故事就发生在身旁；外地小读者读到此书，也一定能为书中动人的风情和故事所吸引，向往着去鼓浪屿找郑小蓓、吴晓明、陈秋霞、王大有等小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逼真如实地描绘了鼓浪屿的“风情”之外，还成功地刻划了许多小朋友们所喜爱的小动物的可爱的形象。如《相思柳下的怪老头》篇中对小兔子、小金鱼、小黑猫，尤其是对台湾飞来的小灰鸽的描写，不管是外部形态，还是生活习性，都写得准确生动，栩栩如生。这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留心观察。固然，这些小动物的出场是小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需要，但有了它们，无疑也增加了小读者们的阅读兴趣，使作品更富有魅力。

### 三

前面提到，“风情”和“人情”是贯串两个故事的情节线索。“风情”和“人情”不是抽象的陈述，也不能靠一大堆杂乱的形象来堆砌。它们应该攀援依附于某个最有特征性的实体，以托物言情，更集中地表现和深化作品的主题。这就是象征手法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

不言而喻，“相思柳”和“榴梿果”便是两篇故事的情系之物，这在小说命题上就已点明。我不知道，是先有相思柳和榴梿果的联想，才有作品的构思；还是先有作品的构思，才找到相思柳和榴梿果来作为作品的“主题道具”。不管如何，作者精心地以这两种亚热带植物来点题，除了可以鲜明地表现这两种树木的生长地——鼓浪屿的“风情”外，更主要的还用于寄托和表现作品主人公的“人情”。为此，作者不遗余力地挖掘这两种树木的内在涵义，作者的感情便有了抒发的对应物，作品的立意便有了提炼的凝聚物，整个作品也就奠定了三分的成功。

相思柳和榴梿果，顾名思义，一为“相思”，一为“留连”。取“相思柳”隐喻海峡两岸亲人的相思之情；取“榴梿果”寄托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留连之怀，作者的本意显而易见。如若作者只是牵强附会地将其为“商标”贴

在题目上，如“插图”夹于作品中，尽管对其外表形象描述得多么详尽，也会令人有附庸之感。然而，我们看到，“相思柳”和“榴槿果”是那样贴切地融于作品之中，与情节的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主题的层层剥脱中含蓄委婉地显露出它们的内蕴。选用这两种象征物，不仅在于树名的联想，作者还通过人物的口中，交代了有关这两种树木的美丽的传说。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听来饶有趣味，内心情绪得到升华；小朋友们因此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并在理解主题上得到更大的启发。飘渺的传说在现实生活中赋予新的意义，现实生活因传说故事的串联比照增加了历史感。美丽的传说和现实的生活有了这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人物的情感便腾跃了时空的距离，发思古之幽情，系今日之寄托，作品也变得更加空灵剔透。

相思柳的传说虽然美丽动人，在人物情感的渲泄和内心体验上更带有暗示性，稍嫌不足的是还只停留在“触景生情”的阶段，未能在情节发展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榴槿果，不仅有其象征寓意，同时还通过它的移植过程，将几代人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历史的见证，情节的纽带。榴槿果真正走进“故事”里，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戏胆”。由此可见作者的精巧构思之一斑。

#### 四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却不可多见。从这个意义来看，《相思柳下的怪老头》一书的出版，堪令我们拍手庆贺。郭建尧同志能坚持走自己的创作路子，长期以来在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创作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辛勤笔耕，更显得不简单了。

（原载《厦门文学》1988年第3期）



## 诗在文中 意在言外 ——读于宗信散文集《红豆吟》

鲁 野

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诗人尤甚。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诗作多以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超越经传。杜甫、李清照、陆放翁那些苦战乱、忧黎元、求安定、盼统一的诗作历来脍炙人口。当代诗人以爱国主义为题旨咏诗赋句者也很不少，但选材角度各有千秋。专以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切盼祖国统一为主题的诗人为数却不甚多。

著名诗人于宗信先后出版了《祖国你好》、《台湾诗情》等数本诗集。

散文集《红豆吟》与其他诗集的选材倾向完全一致。我预想，只要祖国的统一大业没有实现，于宗信的第八本第九本或诗或文的集子仍将不改初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切盼祖国统一的思想是于宗信诗文中一柱擎天锲而不舍的主题。

诗人所作的散文，同样具备当代文学观念中散文的诸种要素。除此，于宗信的散文则以诗情浓重为最，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整体框架都从诗歌那里得到借鉴。

由于散文形式灵活，因而散文在接受其他艺术形式的渗透方面表现着极大的宽容。来自于诗歌渗透前人已有，绝非始自当代于君，然而于君却自有其独特的渗透方法。首篇《鼓浪屿上黎明的歌》取材于鼓浪屿的黎明。作者踏着露珠在鼓浪屿漫步，巧遇南国一位歌手，这位歌手正在对浪高歌，唱的恰巧是《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的歌词又正是于宗信的获奖作品。匆匆巧遇情投意和，如果被小说作者写成散文，很可能悬念宕出。于宗信则毫不渲染巧遇的离奇，倒是任其情节淡化而有意于心理色彩的勾画。从昨夜“枕着一阵阵如鼓的涛声”，到今晨兴致勃勃攀看日光岩，轻笔淡墨之中流露着对鼓浪屿的柔情：“在一片片亚热带林木中掩映着一幢幢别具风格的别墅住宅”，“没有车喧马叫，没有市声喧闹。这里有的只是一阵阵拍岸的浪波。只是一片片馥郁的诗意，一层层新绿”，“一曲曲音乐”……

一种流动状态的美和严格取舍再三剪裁而形成的玲珑与清朗，有如郑板桥笔下的疏竹与瘦石。诗歌常见的韵律的脉动感，一唱三迭的节奏感等如水乳交融一般被诗人巧妙地运用于散文中，可收诗在文中意在言外之效。

《花情》通过流传在福建漳州一代的一个水仙花的故事表达了慈母思子之主题。这种主题的故事我们辽宁也有，如熊岳城望儿山的传说。但作者将其引进散文不是凭借故事的新奇，而是取其一脉牵肠挂肚的柔情。引用，不免有一番复述，作者的复述文字渗进了诗歌的情境美。“她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西溪边”，“思念的泪水一滴滴落进了河里”。对于花仙的描述，也洋溢着诗情：“只见水面上的浪花分开，走来了一位妙龄美丽的少女，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裙，乌发上别着一只碧绿的玉簪”，“果然翠叶挺秀，白花盛开，室内飘满清香……”语出平淡，力避诗家语、律赋语的刻板，但溢于词表的对水仙花的赞美之情却给读者带来共鸣。使作品既保持了散文语言不施粉黛的自然，又给语言难托的花容寄以无限精美的花魂。母亲终于在这“缕缕香气”中看见了她日夜盼望的儿子的面影。慈母念子得到了安抚与慰藉。读者则在这袅袅香气中见到了海峡两岸骨肉团聚的希望。这都是诗的意境对

散文积极渗透的成功。

《红豆吟》共辑散文、散文诗一百一十余篇，笔者恨无挥天抹地之笔，不能一一评述，只愿散文界文友读之品之赏之评之。

（原载 1991 年 4 月 29 日《辽宁经济报》）

《红豆吟》于宗信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5 月出版，定价 4.40 元。

## 面晤过渡时期的画家们 ——《画商詹伯尔日记》读后

李宝义

爱好美术的朋友们几乎尽人皆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高峰突起，后来又有 19 世纪欧洲美术的辉煌成就，这些都引人注目，影响深远，迄今仍为画坛人物所常常乐道。其实，就世界美术活动的发展而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过渡时期，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时，印象主义及其派生的新印象主义和后期印象主义，仍有大师多人健在，自 1905 年马蒂斯等在秋季沙龙展出被晒为“野兽之笼”的油画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布拉克和毕加索创始的立体画派、意大利的“未来派”、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走向幻想的苏黎世“达达派”等等，即后来被称之为现代艺术的思潮，此起彼伏。近年，不少朋友对此颇感兴趣，甚而产生一种求知欲，想了解一下现代美术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画家们的创作心态。为此，我向朋友们推荐由著名翻译家李嘉熙教授和夫人文佩琳教授合译的一部力作——法国《画商詹伯尔日记》。它为关心绘画发展史的读者们提供了认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些画坛英杰的机会，它像老朋友一样为我们引荐面晤过渡时期的绘画大师，有如身临其境，引人入胜。

作者雷奈·詹伯乐 1881 年生于法国，他继承父亲创业的艺术品商店，专事收购和转售美术珍品，广交画家朋友，他的日记从 1918 年 2 月写到 1939 年 9 月。因此，“自塞尚第一幅天才作品问世之后在美术界引起之革命性变化，乃至新艺术风格又如何风行全球，均为作者所亲历目睹”。以往的理论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诸多绘画流派的介绍，但是关于画家的种种翔实材料毕竟不多，尤其是他们的创作环境和心态，更鲜为人知。这部日记价值正在于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文笔，栩栩如生地记述了布拉克、卡萨特、福兰、洛朗森、马内、马蒂斯、莫奈、毕加索、雷诺阿、苏丁、于特里约等数十位艺术家。他们当中有的自 19 世纪中叶就活跃在法国画坛，此时已步入暮年；有的则刚刚崛起，独树一帜。作者从不同机遇、场合描述了画家们的形象、性格、气质、家庭、境遇，乃至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主张，多侧面地反映了 20 世纪初法国画坛的真实情况。

正如赫伯特·里德在原序中所言，“它部分属于文学，部分属于历史”。和李嘉熙教授的另一部著名译作《德拉克罗瓦日记》一样，同属世人公认的优秀的美术文学作品，译者以其流畅、准确、优美的文笔表达出原作的文学格调。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把两部日记连续起来阅读，那么你就会发现，译者的文思相映，使人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领略其丰富的内涵。《画商詹伯尔日记》中，记述最多的是作者好友福兰等人，而材料的丰富莫过于印象派坚守到最后的三位大师：德加，当时刚去世不久，作者从他的遗作展览和友人追述的轶闻中回顾了他的人生；雷诺阿，病魔缠身，作者初访时，只见“两个女人用一种类似担架的东西把他抬来了”，“两条腿都弯不得，全身都弯不得”，但他的精神健在，仍能侃侃而谈，并且让人用绳子把画笔绑到手上坚持作画，“在他的两只眼睛里，目光还是那样亲切，眼珠儿还是那样机灵，青春的火花仿佛还在放射着光芒”；莫奈，此刻年逾八旬，虽身板硬朗，面无斑痕，但是，“那在捕捉光辉的自然的最初印象时显示了他的天

才”的慧眼，已目力不济，总是背光而坐。当他在乡间画室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成为亲眼看到印象派真正胜利的唯一印象派画家之时，新的、又一代画家正才华涌出。我们在半个世纪后探究詹伯尔撰写日记的心迹时，他关于新潮的理解与同情，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切。人们似乎刚才知道，和后来成为表现主义代表人物的苏丁同时入法的，还有另一位俄罗斯人明契利。詹伯尔和曼陀、戴第尔对他的天才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推崇他具有与鲁本斯、弗拉戈纳尔及德拉克罗瓦同样的内在素质，“很可能是未来的雷诺阿，甚至还要超过”！可惜他在饥谨的困境中为艺术奋搏，只活了27岁。詹伯尔在日记中充满师友情谊的那篇追念，凄楚动人。

《画商詹伯尔日记》，可谓轶事荟萃。它从那些人物、作品的细微末节中，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即画坛正从19世纪的波峰向20世纪过渡，从而世界美术活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观念上的突变。它，像一个行色匆匆的游客，似乎迄今仍未走完自己的途程，但，它在那个纷华的年代确已出现，并且出发了。詹伯尔有一段真实的记述：在鲍姆路一所深藏奥秘的小房子，门上有一块不显眼的小牌子，上写：“为现代文明而奋斗”，“我仁立于每一件展品之前，尽力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概念，尽我一切努力去了解罗森堡先生的创作意图，然而仍无所得。”难得的是，尽管作者钟爱传统绘画大师夏尔丹，却不排斥诸如布拉克等新秀，并尽力真诚地予以扶持，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炼成一位有见地的美术鉴赏家。正当壮年成熟期的詹伯尔，在日记中让读者了解到众多的历史人物的同时，也使读者认识了他自己。他和儿子都曾投身于法国抵抗运动，后来又遭德寇的折磨，危殆狱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伴随毕生孜孜求利的商贾活动，他能在所及的圈子里增进一种适于才华涌出的氛围，和为世人留下这份数十万言的日记。詹伯尔于1945年辞世，终年64岁。

（原载《美术之友》1988年第4期）

《画商詹伯尔日记》〔法〕雷奈·詹伯尔著，李嘉熙、文佩琳译，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定价4.30元。

## 评《马和艺术》

黄复盛

著名画家、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许勇先生编绘的《马和艺术》，系统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画马的基本知识和技法，介绍并论述了古今中外表现马的著名绘画、雕塑作品的艺术成就，还附有作者大量画马的速写作品、作画体会。《马和艺术》不单是有重要价值的技法书、工具书，更是具有高度价值的艺术珍品集锦，是一部精辟地阐述关于马的艺术历史和艺术理论的学术著作。马从有历史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马在美术创作历史中的突出地位，表现马的美术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书中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读者将会从自己的条件、需要出发，从中获得多方面、多层次的教益。

许勇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喜爱画马、精于画马的画家。我们简略地浏览一下他那些形神兼备、生动感人的画马作品，就会留下鲜明的印象：《出工之前》中膘肥体壮的红鬃马，《收复台湾》中郑成功乘骑的昂首扬鬃的洁白战马，《春天的道路》中奋蹄跋涉的挽车群马，《白求恩在中国》中奔驰渡河的野战军马，《嘎达梅林》中冒着硝烟烈火冲锋陷阵的义军铁骑……那一匹匹矫健骏马，那一队队动人的马群，对于许许多多马的艺术爱好者来说，许勇先生的画马技巧令人陶醉、倾倒。《马和艺术》这部书是许勇先生 30 多年来关于马的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结晶。

《马和艺术》中的论述文字十分精练生动。精密的研究、精细的分析、精心的思考与精湛的技巧相结合，集中表现在精辟的论述之中。比如，这本书在阐述画马头部技巧的开头写道：“世界上没有两个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同时也没有两匹形象完全相同的马。画马也应该在生活中选取具体模特儿，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马的形象。”从理论上理解、赞同这段话并不困难，但在艺术实践中，能够做到深入地观察和准确地表现每一匹马的造型特征，那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了。不过，正如本书所表明的，只要具备高度的技巧，并准备付出艰苦的艺术劳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人们可以说出老马与小马的形态差别，可以说出奔跑马与负重马的形态差异，甚至可以说出昂古罗阿拉伯纯种马与蒙古纯种马的形态差异，可以说出古希腊雅典区底农神庙檐壁上的浮雕马与中国陕西醴泉唐太宗的昭陵前浮雕马的造型区别，那么能不能简明扼要地说出中国汉代陶瓷艺术中的马的基本造型特征呢？我想，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困难的，即使对于一般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或许也不能随口而答的。书中写道：“四腿叉立，胸两侧肌肉鼓起，目突鼻张，双耳耸立，尾巴高举，静中寓动，气宇轩昂，这就是汉马的特点。”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各个艺术家创作的千姿万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马的形态中，如此简练明确，如此肯定准确地把陶瓷“汉马”的造型特征概括出来，若无大量细致的观察、分析，没有长期深入的思考、体会是做不到的。书中这样简明而准确，平易而深刻，令人顿开茅塞的论述几乎俯拾即是，只要正确地加以领会，读者就能根据各自的需要，从中发现、吸收多方面的艺术营养。

《马和艺术》特别出色之处还在于，它不单介绍了画马的技法，而且以

作者自己的大量作品作为画马范例。不论是临摹中外历代大家名作或精美的艺术摄影，还是作者自己的写生，都表现出许先生对于马的造型的深刻、独到的理解和令人赞叹的高度绘画技巧。

书中的“作者速写”部分也是十分精彩的。“作者速写”包括“草原部分”和“农村部分”。“草原部分”是从作者多次到内蒙古草原深入生活时画的大量速写中精选出来的。优秀连环画《嘎达梅林》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战马形象，就是在这些速写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书中写道：“蒙古马——它矮小，但强悍……经得起大草原的风雪。”这就是作者心目中蒙古马的形象，也是作者作品中蒙古马的形神概括。许先生不但善于描绘立卧行奔各种姿态的马，喜怒悲惊各种神态的马，动静安危各种情境中的马，而且对于许多往往不被人们注意、转瞬间就消失了的马的特殊状态，也能准确生动地描绘出来。基本情态准确，关键细节鲜明，用笔不多，意趣无穷。作者笔下的几幅“汗马”，确实能使读者感到它们在长时间奔跑之后“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呼吸仍很急促”，“汗水浸湿每一撮毛……”。作者还以精练的线条，画出了《套马手——驾驭草原的人们》，《套马手——富有魅力的生活》，这些作品把人们带到了草原的生活气氛中，使你仿佛听到了人的呼喊，马的嘶鸣，闻到了草原尘埃中特有的干草气味……

“农村部分”中画马的速写，突出的特点是令人感到亲切。例如《长途马车》和《集市上的车队——辽西农村给我以亲切的印象》，朴实深刻的速写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表现出了巨大、深厚的感情力量。这是作者与农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密切联系的表现，是作者把高度的绘画技巧与平凡的绘画题材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表现。从这些描绘 20 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人们会自然感受到以米勒为代表的那种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精神……

如果说许勇先生画马的创作方法是不断地观察、描绘马的各种神态，不断开掘生活中马的形态的各种美的因素，长期以来是沿着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前进的，那么，这部书最后的作品《双马——它们竟能如此默契》，《双马——没有什么比观看飞驰的骏马更使我陶醉了》，则充满了激情，具有鲜明的写意、浪漫艺术特色。所以我想，正如在这部书中作者广泛搜集了各种有成就的表现马的作品一样，许勇先生画马的技巧也是多方面的，很难把他的全部技巧归属于某个画派、某种画法之中。这也许就是艺术上应该追求的博大精深吧。

许勇先生在画马方面的卓越艺术成就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本人的体会是：“其动力来自对生活和自然的爱和激情：我热爱矮小膘悍、驰骋在辽阔草原的蒙古马，热爱身负重役跋涉于田间、土道上的农村马……”为了表现它们，作者“或长时间伫立在塞外的寒风中，或夜以继日地呆在马棚里……”他“用画笔追逐过牧民的坐骑、农民的车队和欢蹦的小驹……”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超过责任心。”

在生活和艺术实践中，作者许勇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赶过车，用过马，马成为他的好朋友。在创作中，他多次深入农村和草原，长时期地接触过马。他说他的老师是“汉代石刻和唐三彩、鲁本斯和德拉克洛瓦”；他的课堂是“北方农村的牲口棚、大车队和辽阔的蒙古草原”。

罗丹说：“尊重传统……对自然的爱好和真挚，这是天才作家的两种强烈渴望。”读完了《马和艺术》这部书，我们可以说，许勇先生对于罗丹大师的告诫，实践得十分认真、彻底。

（原载《博览群书》1988年第5期）

《马和艺术》许勇编绘，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定价8.50元。

沃土植根 墨海弄潮  
——《辽宁美术家作品选》评荐

子 木

这是一部荟萃 46 位中青年国画家近年创作成果的画册。

回顾辽宁画坛，50 年代初赵梦朱教授等前辈来东北执教，传授国画传统技法，于是，桃李盈门，门生辈出。近 10 年来，辽宁的中国画艺术又取得了长足进步。画家们在广阔的领域中开拓，在深邃的意境中求索，为新作频添了丰富的内涵，一改千幅一面的状况，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方面都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新貌。这部画册编入的 185 幅作品，标志着辽宁的中国画艺术步入了一个满园春色的新阶段。

当你翻阅这本画册之际，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王绪阳的《渔家女》、许勇的《老人像》和女画家吴秀楣的《金秋》等，它们都洋溢着涓涓的乡情。这正是画家们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结晶，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掌握了北方人物的气质与个性。艺术家的情怀迥异，追求的意趣和表达手段也多种多样。王义胜的《晨风园》、杜连仁的《铁流》、孙玉敏的《天天向上》、周永家的《待月圆》、孙晓东的《少女像》等，都充分显示了各自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辽宁中国画艺术展现出多风格、多流派的态势。像宋雨桂的山水《花泉》、冯大中的《长白初雪》、陈忠义的《涛吟》、孙世昌的《林海月色》、项宪文的《涧鸣山月醉银林》，以及马书林的花鸟画《鹅、鹅、鹅》、刘东沅的《庭院角落》、杨德衡的《戏水》等，都突破了传统格局和程式，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独具特色的关东国画气质，并与地方特色融为一体，有一种雄浑、博大之风，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总之，这 46 位中青年画家的实践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在关东这片金色沃土上，中国画独特艺术语言的发掘，方兴未艾，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原载《美术之友》1988 年第 5 期）

《辽宁美术家作品选》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出版，定价 34.00 元。



## 心心相印 情文并茂

——读康启昌、鲁野的《心心集》

### 春 容

在散文出版发行较为艰辛的时日，《心心集》得以出版，确是件可喜可贺的美事。《心心集》的作者系满族作家鲁野、康启昌夫妇。“‘心心’是两颗心。在浩瀚无垠的文学星海里，确实跳动着两颗心，两颗互相激励的心。在他们即将接近人生跑道的终点之时，那两颗心仍在追求”。作者的自白让我们了解了《心心集》的创作心迹，更是欣赏理解它的一把钥匙。

《心心集》的主体是作家作为自然之子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对游记文学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以对民族习俗、民族人物、民间传说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表达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独有的民族文学观念和文学特色。凡站在时代前列和文学思潮之中的作家，他们的心胸都应是博大开阔的。其民族意识中的第一位必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感，对自身的族属看得并不很重。但是从创作多样化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角度讲，少数民族作家有权寻求表现民族特色的独特之处，创造出非他莫属的佳品。康、鲁二位在创作时始终渗透和流溢着民族风味和浪漫主义情调。《心心集》中有近 20 篇作品直接或间接书写满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情趣爱好、民族心态和民族精神。《嘎拉哈的故事》（康启昌）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嘎拉哈”是满语名词，即指猪的跖骨。满人自古爱养猪，习食猪肉（猪肉、粉条火锅是一吃俗）。作品所记的是与猪有关的闺中玩俗。猪多嘎拉哈多，满族少女便将嘎拉哈油光着色，作为闺中热门玩具。“表姐”是个会“描龙画凤、画啥像啥”，“飞针走线做啥像啥”的巧姐儿。她有多副油光锃亮的嘎拉哈，并有出众的舞技：

她把“马头”高高抛起，简直能碰到棚顶了。借此机会她从炕上拣起一子衔在口中，又拣一子轻握手中，把嘴上衔着的那子取下也轻握手中，再去接空中那个“马头”，那叫“打口子”。表姐玩起来，眼风灵活，手指敏捷，腰姿轻舞，神态悠然。

可是到了“我”的小女儿的时代，那玩法却大不相同：

她们用拳头大的花皮球做“马头”，蹦蹦跳跳，充当马头的皮球上下弹跳；哗啦哗啦，孩子们灵活的小手敏捷地抓子、接子。皮球“蹦蹦”好像小鼓；抓子“哗啦啦”又酷似数来宝用的碎嘴子。节奏鲜明，清脆悦耳。妈妈叼着一支旱烟袋，站在她们身后观看，发现孩子们的玩法同六十年前她的玩法大相径庭……

两段文字细致而有节奏地再现了少女玩嘎拉哈的动人舞姿，充满了新鲜活泼的闺中情趣。但作家没有将笔停留在介绍一种民族游戏的生活表层，而是自然地把嘎拉哈多少和这游戏的兴衰作为透视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聚焦点。闺中趣亦蕴含着时代的大主题，包容作家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精神。此外，《蚕乡新歌》、《秦皇岛感怀》（鲁野）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北地区、满乡人民独特的生活习俗以及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融洽的新风貌。

满族文化中有许多优美动人，充满浪漫色彩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诸如“天鹅仙女”、“萨尔浒”、“完达与女真”，凤凰山、箭眼峰、长白山池、珍珠姑娘等等。这些神奇美丽的传说构成了满族从崛起繁盛至衰竭变异的一部形象的史诗，成为满族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独特的“文化圈”陶

治了康、鲁二位凤凰山的儿女，使他们从为文初起之时，便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和远大的理想。《圆明园的黄昏》、《天池惊春》、《绿色的玉》、《凤凰山漫话》等篇章都是将满族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融入山光水色之中。其中不乏对这个具有独特而复杂历史命运的民族深切的反思，也有对新时代满乡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热情讴歌。大山因传说而更为神奇，湖水泛起浪漫色彩而更诱人。当他们的浪漫主义笔调与社会问题相撞时，便即刻转换了形态，成为在理想导引下的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涂抹生活的“牧歌”在《心心集》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历史的反思和人生的哲理却篇篇可见。这正是康、鲁二位作家游记作品不同凡响的又一突出特点。

（原载《民族文学》1988年第5期）

《心心集》康启昌、鲁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定价1.35元。

## 两岸文学交流的产物

### ——略论《现代台湾文学史》的三点特色

武治纯

由中央民族学院、辽宁大学、吉林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北方十五所高等院校联合编撰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是高等院校台湾文学教材建设的一项新成果；是新时期方兴未艾的两岸文学交流的产物。大陆新时期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已经从初创阶段的开拓耕耘进入了开花结果的收获季节。《现代台湾文学史》正是这一片新园中新收的果实之一。这本书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现代台湾文学史》，大体上具有以下三点最为基本的特色。

#### 第一，贯穿了现代台湾文学的本土性特色

大陆新时期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大多是从海外华人文学的桥梁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台湾岛内的文学发展面貌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了解。《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纵览了从“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将近70年的台湾新文学历史画廊，确认了台湾乡土文学是现代台湾文学的主流，并向大陆读者评介了8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关于为台湾文学正名的讨论，从理论上把台湾乡土文学正名为台湾文学。这是一个符合现代台湾文学实际情况的结论，既体现了台湾作家一贯的“认同土地，服膺人民”的文学精神，也更为确切地反映了台湾文学总体的构成，尽管海内外研究界对台湾文学已有百花齐放的提法，例如“现实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边疆文学”、“华文文学”等，都不过是某一种美好意愿的表达，还是这个“台湾文学”的名称简洁、概括，名正而言顺。

因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的书林中，首次以《现代台湾文学史》专著的面貌出现，表明我们确认作为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台湾文学，理应具有其相当的特殊的定位。

近百年来，台湾的作家队伍随着历史发展也有所变迁。

现代、当代台湾作家队伍的组成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力量，其主要部分是台湾本省的乡土作家，他们具有光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学传统，在日据时期，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战后，由于语言的障碍、政治的高压，受到了挫折、压抑，甚至埋没，60年代中期以后，爱国进步的乡土文学传统得到了复苏和崛起，在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把乡土文学提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恢复了在台湾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当前大陆关于“台湾作家”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本省籍作家和抗战胜利后由大陆迁台的作家，以及在台湾开放形势下长期旅居海外的一部分作家。我们认为，台湾文学的总体概念也是由这样的三大部分作品构成的：台湾本省作家的本土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主体，大陆迁台作家落地生根的文学作品、旅居海外而不失其台湾本土性和中华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则是台湾文学的两翼。从《现代台湾文学史》的章节目录即可看出，具有杰出代表性而被列为专章作家的共有十六位，台湾本省作家占居其九；大陆籍台湾作家及台湾旅外作家共占其七。

## 第二，尊重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多元性特色

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坛在包容多元化的文学思潮、尊重多元化的文学流派方面已有了与日俱增的共识，文学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多元化的新纪元。《现代台湾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关注了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一些难点、冷点、空白点和争论点。大陆近10年来已经出版了两百多种台湾文学作品，但对台湾文学研究成果的介绍显见不足，几近空白。为此，本书特别设置了台湾文学评论家叶石涛、尉天聪的两个专章，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评介，这对大陆读者全面了解台湾文学本土性与民族性相一致的特色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台湾文学中，散文创作是一个繁花似锦的缤纷世界，戏剧文学也具有其独到的艺术成就。但在大陆已经出版的几本台湾文学研究专著中尚付阙如。本书特为台湾散文和戏剧文学设置了三个专章，评介了梁实秋、柏杨等六位散文名家，以及著名戏剧家姚一苇的卓越贡献。

对台湾文学流派的研究和评介也突破和拓宽了一些领域。例如对50年代反共文学的研究，对现代派小说家中的“怪杰”七等生的研究，对白先勇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的研究，对80年代台湾政治小说和女性文学两大潮流的研究，以及对台湾言情派著名代表作家琼瑶小说的研究等等，本书的编者们都作了进一步探索的尝试。

## 第三，突出了现代台湾文学的理想性特色

现代台湾文学的优良传统是伟大的抗议精神，创作方法的主流是“批判性的社会写实”，这种抗议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内涵，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这一脉流在80年代的继承和发展，更加表现出当今台湾文学的崇高理想，也就是实现其“本土性、民族性、人类性”的统一。

80年代以来，台湾作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更多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视角转向人道主义的视野。不论是政治题材的作品、社会写实的作品，或者是挖掘人性的作品，大多从人道立场去观察和反映生活，尤其战后出生的青年作家更是如此，例如出生于1952年的宋泽莱在《台湾人权文学小史》的论文中强调指出：“只为着人的优美定义，作家才存在。”他的近作核能灾害预测小说《废墟台湾》，把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思考结合起来，把现实生活与未来命运的思考结合起来，把乡土与世界的共同性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把个人与群体命运的思考结合起来，表现出对人类前途的无限关切，使得台湾政治小说的层次大为提升。又如与宋泽莱同龄的青年女作家李昂，受到了台湾内外的较高评价，她的作品描写了人性解放的共同性主题，她的艺术风格具有了现代意识、民族传统、乡土特色、批判精神的统合性，既有严肃文学的思想深度，又有通俗文学的畅销效果，已经使她从古老的台湾小镇走上了当代世界的国际文坛。

意味深长的是近10年来，海峡两岸作家的创作主导思想，走过了一条心心相印、殊途同归的历程。大陆社会主义的人道精神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观念，“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刘再复语）新时期两岸文学汇流的发展，已经为两岸人民友谊的恢复与重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深刻的影响。文学理想是没有地域、人种、民族、国籍、社会制度的界限的，它的最高境界必然是世界大同、天

下为公的社会和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最后实现，都必然要归结于解放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现代台湾文学史》展望了台湾文学三座清晰而闪光的前进路标：扎根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它所指向的台湾文学的理想大道，那就是不断攀登台湾文学的新高峰，中国文学的新高峰。

（原载 1988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等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定价 9.00 元。

## 第一部《现代台湾文学史》面世

韩舞燕

有 60 万字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工作者心血的结晶。

在这之前，台湾曾出版了一部台湾学者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至于文坛呼声中的台湾文学史却尚有所待。现在，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现代台湾文学史》，初步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上的这一页空白，为各地研究工作者和大学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这部文学史由大陆的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和武治纯（特邀）四位主持的编委会承编，第一次详细地整理、介绍了从 2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的台湾文学运动的状况。其中，作者们把从“五四”运动开始至 1945 年台湾光复这段，称为现代台湾新文学运动时期；从 1945 年至 80 年代中期，称为当代部分，而从 1945 年至 1949 年这一段，称为特别时期。

整部文学史以台湾的文学运动为主线，在论述台湾文学运动发生的背景、提出的文学主张的同时，介绍了在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如，在 70 年代成为台湾文坛主流的台湾乡土新文学，作者们不但指出它是爱国的台湾文学，而且详论了它产生的背景，以及从 20 年代萌芽，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在 70 年代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学史对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旗手张我军，以及杨逮、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陈映道、黄春明等一大批台湾本土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设立了专章介绍。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文学史，并进一步了解台湾的作家，出版者还出版了与其配套的参考资料丛书。丛书的第一部《乱都之恋》，已经在 1987 年 6 月出版。这是张我军的作品，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在绝版 60 年后失而复得的珍贵资料。据悉，以后还要陆续出版一系列《现代台湾文学史》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丛书。

出版者的愿望是通过这部文学史及其配套资料丛书，使现代台湾文学运动犹如一幅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可以从中感觉到台湾文学运动和祖国文学运动的脉搏是如何一齐跳动的，会从中领略到台湾文学的风采和精华。也许它还能纠正一些人对台湾文学的无知和偏见。

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团体和个人一天天增多，由闽、粤、京、沪的一些文学机构和大学开始，逐步向全国推开。现在，全国已有三十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台湾文学课，东北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这门课程。在甘肃南部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台湾文学课的是一位藏族青年教师。

目前，全国已涌现出一百多位较有成绩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武治纯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对台湾作家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怀有一种诚挚的尊重和崇敬的感情。他觉得如果不把台湾文学的成果介绍给祖国大陆的同胞，不但对不起台湾同胞，也对不起大陆广大读者。他认为，文学是海峡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一座坚不可摧的心桥，他愿为这座心桥尽一点添砖加瓦的绵力。从 1974 年开始，他支着因脑血栓而偏瘫的身体，埋头研究台湾文学。他视力极差，仍顽强地一字一字地写下去，终于做出可观

的成绩。他已同几家出版社合作选编出版了二十几部台湾文学集子，以及几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和评介文章，海外有人因此称他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位拓荒者”。这次，他是被特邀参加这部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的。

编辑出版《现代台湾文学史》，得到了台湾和海外许多朋友们的帮助。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要编写台湾70年的文学史，困难很多，特别是资料匮乏。这些朋友就千方百计搜寻，辗转投寄。送来的有作者的小传、评价文章、剪报材料、小说原版等等，极为珍贵。由台湾旅美学者、作家组成的台湾文学研究会不但帮助搜集台湾最新出版的文学刊物，而且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交换过来，帮助出主意。《乱都之恋》绝版60年后得以重新问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乱都之恋》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作者张我军是台湾人，早年就读北平，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把新文学的理论和信息介绍给台湾同胞，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鼓吹者。因此，要研究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不可不了解张我军；要研究张我军，不可不研究他的第一本白话文诗集《乱都之恋》。可是这部重要文献自1925年底出版后，一个花甲年过去了，遍寻大陆和台湾各大图书馆都找不到。后来，还是经热心研究台湾文学的台湾作家和台湾旅日学者多方寻找，才终于觅得一本，又几经周折，转到张我军长子张光正手里。难怪辽宁大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这样写道：“由张光正先生将这部失而复得的《乱都之恋》提供我社作为现代台湾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第一本重印出版，弥补了台湾新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一部重要作品的欠缺，排除了多年来海峡两岸四处寻觅这部诗集者心头的遗憾。”可以说，一本《现代台湾文学史》充满着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炎黄子孙的亲情、人情、骨肉情。

主编之一的白少帆对记者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心通而百通。我们出版这部台湾文学史，正是要与台湾同胞建立一种正常的、应有的联系。”白少帆是台湾省籍人，五年前从法国到北京定居，现在是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他还说：“台湾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文学和祖国文学是肢体和母体的关系。现在，由大陆编辑出版这部台湾文学史，我很高兴，有一种被母亲抚励的亲切感觉。”他还表示，这部文学史“有待两岸、三方（指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世界）共同丰富和修订，最后共同来完成一部更加完善的《台湾文学史》著作”。

武治纯也告诉记者，在编撰这本书时，我们力求从全民族的眼光来看台湾文学，首先是充分尊重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及其艺术风格上的多元性。我们力求不脱离台湾文坛的现实，尽量避免非学术性的褒贬，避免以偏概全的缺失，体现更大的包容性。武治纯说：“但是，毕竟由于资料所限，而且没有机会与更多的台湾作家们直接交换意见，这部文学史难免有疏漏与错误，就算我们是抛砖引玉吧。”

两位主编最后都希望，通过这部文学史，能进一步加强台湾、大陆和海外炎黄子孙的进一步联系，为振兴中华文化而共同努力！

（原载《瞭望》周刊海外版1988年3月14日）

## 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

乌丙安

民俗学作为研究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一门人文科学，虽然比较年轻，但从国际范围看也已经接近一个半世纪了。如果从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会——英国民俗学会诞生的1878年算起，恰好是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间，国际民俗学的发展为五大洲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相互了解、共同进步起到了不容低估的科学作用。全球性的民俗调查，为全人类的移风易俗、共同繁荣和共享文明开拓了无数通道。越来越广泛深入的民俗学研究，给这门学科带来勃勃生机。

近年来，我国民俗学挣脱了多年禁锢，掀起一股强大的民俗热潮；民俗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在这时，我国第一部民俗科学史书——《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国民俗学诞生已有70年，作者王文宝同志用这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作为最佳献礼，总结了这70年间民俗学的艰难旅程。本书内容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及蔡元培发表《校长启事》支持歌谣学运动起，直到1987年7月民俗学在全国范围内走向繁荣之日止，概括了70年来全部民俗学的历史。

这部书的价值，首先应当从它的开创意义上谈起。为一门学科建史，从无到有，谈何容易！尤其是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不被学界注意。特别是在“左”的思潮横行的若干年中，民俗学是被遗忘了的冬眠学科，甚至被斥之为“反动”学科。一些30年代从事民俗研究的著名学者累遭批斗，被迫中断了研究。大量民俗学资料或散失，或成为禁品。从1979年顾颉刚等七教授向全国发出建立民俗学的《倡议书》起，到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诞生为止的短短几年中，这门学科已经走向了繁荣期，吸引了很大一批中青年调查研究工作者从事了民俗学的资料开发与理论建设工作，并取得好成绩，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国内外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大多数人对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缺乏了解，有些学者即使了解，也多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免失之片面。“五四”以来，最早为中国民俗学奠基的老一代民俗学者们，也因多年来对民俗学避而少谈，没有写出有关的历史评述来。就连1962年杨成志发表的《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和1979年汪玢玲发表的《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等很有价值的文献性文章，也还未能从民俗学全面历史的纵横中予以评说。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出版，首次为我国民俗学发展的70年做了全面科学总结，采用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评述，为中国民俗学镌刻了第一座丰碑。这部史书不仅为我国科学史填补了一项空白，而且它本身也必将载入下一部民俗学史的首页篇章。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作为一部科学信史，有它独具的特点。充分让第一手史料说话，是其中最突出的特点。科学史的大忌是主观臆断和先验观念。作者从一开始便排除了从印象出发和感情用事的偏向，深入查证最可靠的材料，辨认民俗学发展道路上比较零乱的足迹，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写出民俗学发展每个阶段的动向、状况和成就与局限。作者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准确性，一方面沿着我国民俗学活动在全国各地的行踪线索查找



最可靠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对与这些材料有关的当事人进行查访和研讨，对所有材料做出科学鉴别。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例如，作者在搜集“五四”以来的民俗报刊资料时，不放过任何细小的线索，特别对那些不被读者注意的各种启事、引言、编后、封面、题字、人名、通讯处等，都进行认真查实，找出史迹。例如，1924年出版的《歌谣周年纪念增刊》封面上的夜空、弯月、白云、银星和一首儿歌《月光光》是鲁迅设计以后寄给常惠的，封面题字是鲁迅请书法家沈尹默写的，封面蓝白套色也是鲁迅嘱托常惠办的。在这里鲁迅与民俗学活动的血肉联系，是从《鲁迅日记》中的线索查访到常惠本人得到证实的。又如，1944年初以顾颉刚为首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史料，作者通过与当年经手为该会执笔民俗理论稿的薛汕通信，得到证实，作出评述。在作者重点撰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民俗学发展阶段时，作者使用十分珍贵的资料，介绍了顾颉刚在86岁高龄时为民俗学的复兴所做的新贡献。作者引用了顾老填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登记表中意见和要求等栏的大段文字，引证了顾老当时给中国民研会负责人贾芝的长信全文以及作者亲自接触到顾老的二三事。一部学术发展史的作者能充分挖掘搜寻第一手珍贵史料写史，十分难得。正因为如此，才使这部史书把我国民俗学的发展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提高了这部史书的价值，增强了它的学术生命力。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把我国民俗学发展史的主流与支流有机地联系起来，把各个时期推动民俗学发展的代表人物的活动与民俗学工作者群体的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民俗学发展历史的画卷完整、和谐，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整体与细部的脉络都清晰。全书着重史实的介绍和史事的述评，不对人物进行全面评价，只让历史来作证。书中写到我国民俗学的发端与开拓期时，以北京大学1918年2月1日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为起点，突出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活动的主流，兼述了京、沪、厦等地民俗学的影响。书中述及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与开展期时，以1927年的全国政局为背景，突出了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及其《民俗周刊》的巨大贡献，兼述了杭州、福州、宁波、厦门、广州、漳州、汕头、绍兴、香港等地民俗学会和报刊蓬勃兴起的成就。甚至连山东、东北三省的民俗学活动都概述在内，构成了一幅半个中国的民俗学运动分布的鸟瞰图。对抗战时期，作者突出介绍了抗战前夕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恢复民俗学调查研究方面的努力，对“七七事变”后的沦陷区京、沪两地民俗学者的艰难作业，大后方川、桂、港地区的民俗学会的艰苦奋斗以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俗学活动，都做了符合历史真实的述评，形成了本书有血有肉、公允、精采的两大篇章。

作者在叙述建国以来民俗学走上新兴时期的历史时，十分注意全国各个角落民俗学活动的新生事物和新动向，甚至各地大专院校学生中的“民俗学社”活动，一些边远县印刷的民俗材料，都成为生动有力的历史明证。作者就是这样把难得的珍贵史料一件件串成了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作者避免了那种曾经流行过的以评论代史、以人物代史的方法，选择了以全方位史实再现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构想，写成此书，应当说是写科学史的良好尝试，值得学习和提倡。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的出版，不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目，而且必将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兴趣。本世纪60年代，日本老一辈民俗学家直江广治博

士就先后两次出版了他关于中国民俗学发展概况的著述。三年前，西德的两  
位青年学者也向欧洲简介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状况。相信这部书的出版会使国  
际民俗学界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我国民俗学的曲折历程，更有利于开展广  
泛的学术交流。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2期）

《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王文宝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定  
价1.95元。

## 人性与兽性的搏杀

——评杨大群的《人·狗·狼》

王 焜

杨大群的长篇新作《人·狗·狼》，有种悲怆中的凝重、深邃之感。你不禁要为祥发、霞云和刘淑娅的悲惨命运而哭泣和呼喊，同时也不能不为作品中的白鼻梁母狗而落下几滴真情的泪。

《人·狗·狼》描绘的是本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赫哲人与自身濒临的凄惨命运所展开的英勇搏杀。作品开篇向读者展现一幕残酷的现实：祖祖辈辈在黑龙江边生存的赫哲人，正面临一场灭顶之灾。赫哲人征服了蛮荒时代的大火，以后又征服了黑龙江和各种野兽，可到头来却难免来自人类自身异族的屠杀——人类自身兽性发作时的疯狂肆虐！作品点到这一至关重要的命题之后，并未浓墨重彩地去描绘赫哲人怎样遭受日本鬼子的宰割（作品中甚至连一个日本人也未出现），而是将笔锋一转，将浓墨“泼”到赫哲人的大逃亡上。沿着赫哲人大逃亡的轨迹追索，你会发现，人类自身兽性的发作在这里表现得更为具体、真实、深刻，也更为令人困惑。赫哲人的大逃亡，实际上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为了生存与狗、狼等动物在大自然中进行的一次血与火的角逐，人性、狗性、狼性在这非凡的角逐中各展其貌，令人荡气回肠。

对人性美的赞叹和对人类自身兽性的鞭挞，贯穿了整部作品。从作品中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和命运上，都可发现人性美的这样或那样的亮色。祥发和霞云冲出日本鬼子的包围后，带领七条狗和一副狗爬犁逃进了原始森林，艰难地度过了十几个春秋。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生下的儿女的存在本身，都是对人类自身最伟大的创造力的由衷的赞美，人类自身最崇高的生存意志和最顽强的生命力由他们做出各种姿态的痛苦造型。祥发几次与狼的惊险搏斗，祥发与霞云在沼泽地与洪水的搏斗，以及他们九死一生的几度转折，都无不倾注着饱满的充满了人性美的激情。即便是在作者笔下充满野性的刘淑娅，也有她那感人至深之处。她能经受得住日本鬼子的野蛮摧残，与狼狗群生活在一起——尽管她已发生某种意志和人格的变异，可她为赫哲人续后生子的欲念并没有消失，为此她宁可“借种”来完成萨满、族长和生育娘娘所赋予她的为赫哲人繁衍后代的义务。世界上，再没有比人的生命更顽强，比人类自身的生存意志更坚不可摧的东西了。作品在对人性美进行充满激情的讴歌的同时，也在最兴奋、冲动的一刹那揭去了许多遮住人性原色的粉饰物，将潜藏在人类自身最无价值的东西毫无情面地撕破了。

人类自身的兽性既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深重灾难，又将人世间的这一深重灾难转嫁到了大自然，大自然反转过来报复人类。作品尖刻而又不无讽刺地描绘了人类自身兽性对整个生态世界的破坏。祥发和霞云在吞吃了人类自身酿造的苦酒后，为了逃命和生存，投到了大自然——原始森林的怀抱。原始森林因为人的卷入，变得更加躁动不安，更加岌岌可危了。祥发逃进大森林后，第一次出去打猎便与狼群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狼群感到愤怒和不可容忍的是祥发侵占了它们的领地。的确，原始森林属于人，还是属于其他动物，这是上帝的安排，狼群既然一直是那里的霸主，它们当然容不得新的霸主——人的存在。一场以吃掉对方为目的的人、狼之争，从此便愈斗愈凶，愈演

愈烈了。更为可怕的是，日本鬼子得知残存的赫哲人逃进了原始森林后，一边用军队进行清扫，一边用炸弹焚烧掉一片片的原始森林，用毒药毒死一群群的野兽生物。但应该看到，祥发与狼决斗的胜利是人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的失败，因为整个生态世界由于狼和其他动物的一再减少将失去平衡，变得更加乘戾，对人类社会的报复也将愈来愈深重。

更令读者玩味不尽的是，当作品结束人狗狼在大自然中的角逐，暗示出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之时，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又回归到了作品开端时点到的那一至关重要的命题：他们可以躲过，可以战胜自然界中的凶猛野兽，却抵御不住、也躲藏不过人类自身兽性发作时那令全世界为之颤抖的枪炮声。当冻在冰里的小龙期待命运之神将它举起的时候，走过来“看天看地看大森林”的却是幸存下来的白鼻梁母狗。这一绝笔巧在不言中，将作品的凝重与深邃推向了更高的境地。

《人·狗·狼》所大声疾呼，热切期待和尽全力来赞叹的是人性美，是对整个充满人性美的世界的真诚呼唤。为了使人类自身更加完善，也使整个世界更加平稳、安然，人类必须在发扬自身光辉的同时，去认识、去反省、去克制人类自身的兽性。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狗·狼》的确步入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层次，它所展示的艺术画面和所塑造的充满人情味和人性原色的人物，是对我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一大贡献；我国文学殿堂里，因为增添了这样的佳作。也愈发显得充满了勃勃生气。

（原载 1988 年 10 月 17 日《辽宁日报》）

《人·狗·狼》杨大群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出版，定价 2.60 元。

## 当代历史的掠影百科全书式著作 ——祝《钱歌川文集》出版

刘万泉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海外华人学者的文集——《钱歌川文集》，包容了钱先生 1932——1987 年 55 年间的全部游记、随笔、小品及诗作，共 25 个专辑、750 篇文章、48 首诗，四卷精装本，约 300 万字。

钱歌川（笔名味橄）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文坛宿将，是杰出的文学家，是著名的英文翻译家和教授，也是一位具有拳拳故国情的爱国者。钱先生是湖南湘潭人，1903 年生于芷江（即 1945 年侵华日军受降地）。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又留学英国。30 年代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后出任我国武汉大学、台湾大学以及新加坡义安学院等院校教授，1972 年 70 岁时退休，加入美国籍，移居纽约，专门从事著述。钱先生自从 1925 年在上海开明书店的综合性刊物《一般》上发表小说《诞生日》，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坛，50 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向为世人所称道。

《钱歌川文集》是作者 50 年来思想、感情和行为轨迹的记录，是当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掠影，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通读文集中的全部作品，无不叹服其知识的渊博、涉猎之广泛和文笔之隽永。举凡地理人文、日月山川、鸟兽虫鱼、琴棋书画，作者都有精细的观察，精到的论述。意大利的古迹、瑞士的景色、新加坡的习俗以及巴黎的时尚、伦敦的风情……凡钱先生涉足的地方，都作了精彩的描画，使读者难以忘怀。国外有人评论说，钱歌川的散文，“内容博雅，文笔清畅，谈事无嬉笑怒骂，一览无余的犷态，恰如其笔名的含意，如嚼橄榄，深有余味”。

可以说，《钱歌川文集》是一部了解世界、研究社会、学习人生的书。当代中国的大事件，文集中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反映，并作出评价。作者描画的北京人心态、上海时象、台湾情状，虽然过去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但那以貌取人、用财物打通晋升关节、官吏的贪赃枉法、知识贬值等现象不是还时有表现吗？！文集中那些讲友情、说亲情、谈恋情的篇什，如今读来依然使人激动神往，无可否认，《钱歌川文集》是一部长知识、增见闻、温故并知新的书；是对青年人、壮年人、老年人都有益处的书。

我们还看到，《钱歌川文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处处透露出作者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片深情。此种情怀，洋溢在作者描述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态篇章的字里行间，表露于作者告白的行止举措之中。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钱先生从伦敦赶回重庆，以赴国难；抗战胜利后，他本想在南京作事，后应台湾大学陆志鸿教授之聘，执掌该校文学院。“树高千尺，落叶归根”。1972 年，他 70 岁由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移居美国，第二年携夫人归国观光。后来，他又将多年积蓄的养老金，拿出一部分在他家乡的湖南大学设立奖学金，以造就祖国四化建设人才；其余部分作为旅游费，以便回国观光，尤其要携带生长在美国的孩子归国，“让他们亲眼目击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雄伟秀丽的山河……培养出他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一部文集，悠悠赤子之心，拳拳故国之情，力透纸背，溢于言表。

（原载 1988 年 11 月，日《人民政协报》）

《钱歌川文集》（1—4册），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2 月出版，定价 81.00 元。

## 单纯·意境

——谈《北海道纪行》的封面设计

李勤学

有人说，单纯是视觉传达艺术的精髓。我同意这个观点。凡装帧设计者，无不想让自己的设计从书林中跳出来，这力量来自单纯，当然也要靠整体构思及形式美的感觉。

老作家韶华访日归来成书《北海道纪行》，书中满载着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特别是北海道人民的情感充溢在字里行间。书稿的内容决定此书的封面设计既要抽象又要具体，抽象到从整体中表现出中日友好之情，具体到北海道这一地方特色。

我在翻阅资料中，偶然发现一座位于北海道最北端的银白色三角形塔，她是那么有个性，那么庄重，使我联想到北海道人民的勤劳、热情、倔强和善良。

由此入手，蓝天、红日、银塔、白鸽便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那蓝天象征着安静与和平；那红日——红红的圆型颜色，给人以温暖和热力；那拔地而起的三角塔是北海道人的象征，也是日本最北端的意思。那翱翔于蓝天、红日、银塔之间的白鸽，它是友好的使者，抑或是和平的象征？随读者心意好了……

有意识地在矩形中放置三角形、圆形，这三个几何形令人感到死板，用自由形的白鸽组成一个活跃的点，打破这呆板与沉静，使整个构图活起来。色彩、形体尽量追求单纯、强烈。

我以为这种纪实的书还是采用具象加象征的表现手法更好一些。大实则俗，无意境；大抽象则空，会使读者费解。当然要因书而异，因人而异。

诗无韵味不成诗，音无旋律不成乐，封面设计如果不讲形式美，便不成其装帧艺术了！

（原载 1989 年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北海道纪行》韶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版，定价 0.52 元。

## 现代视觉传达艺术的基础理论 ——简评《构成艺术》

栾祿璋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应用设计在各行各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美术院校的构成教育，都将基础造型能力列为主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一些起步早的国家除上述者外，还有动态构成、光的构成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从事构成研究的人们深感这方面理论的不足。基于此，《构成艺术》的作者赵展泽同志，为了便于社会上从事各项设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及初学者了解和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结合本人的教学经验，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认真深入地研究，写出了这本系统的平面设计理论技法书。这对于从事现代应用设计的同志启发创造性思维，培养想象能力、表达能力和提高现代美感的审美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构成艺术》一书对平面设计中涉及到的基本形的变化、形式法则、空间形体的关系、形与空间的关系及构成方式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论述，结合图例，由浅入深地分析研究，运用二度空间的条件，平面构成的原理及其手法，以创造和表现各种新的形态。全书引用图例千余幅，并着眼于应用，从而促进设计人员对现代设计观念的理解，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同时也向从事这方面教学工作的人们提供了较系统的教材，实不愧为一册有价值的设计基础理论书。

（原载《美术之友》1989年第2期）

《构成艺术》赵展泽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定价8.60元。



## 小议《人体艺术摄影》

彬 蔚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研究会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展出期间，参观画展的人数之多，在国内艺术品展览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画家们在各自的创作中，运用不同的风格与手法来表现对人的外在美的热烈赞颂，试图让观众通过这些作品去认识人体艺术所蕴藏的无穷魅力，进而获得美感享受。这可以说是一次对封建传统意识的挑战。这次展览，在观众中产生很大反响，成为国内美术界一大重要新闻。

继之，全国一些出版部门竞相出版以人体为内容的艺术画册，形式有绘画，也有摄影，种类之多，不一而足，在社会上有很大销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流入，人体艺术已不再被视为异端，长期受到封建意识禁锢的人们，在人性意识上开始觉醒，他们对人体有更高层次的探索 and 追求。可是也应看到，其中一些文化素质差、欣赏情趣低的读者，只是抱着“猎奇”的角度，满足低级趣味的需求来买书，对此，有人担心人体艺术画册的出版对青少年读者的思想和情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这种状况，出版部门怎样通过介绍健美高尚的人体艺术来抵制充满性刺激的淫秽读物，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人体艺术的人性表现，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人们在欣赏人体美时，精神上应该得到自由和解放。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一直推行的是封建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实际统治者从不禁自己的欲），时至今日，民族习惯对人体艺术还不很理解，让绝大部分人都接受人体艺术，还有很大阻力。这就要求作为传播精神文明的出版部门，从普及和提高人们对人体艺术价值的认识入手多做宣传工作，既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人体艺术，冲破封建主义的精神桎梏，又要对萎靡、不健康的出版物加以抵制，从而使人体艺术成为健康向上的艺术品，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目的，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人体艺术摄影》画册，书中精选了20多个国家及地区50余位著名人体摄影艺术家的90余幅彩色佳作，作品中通过女人体丰腴柔美的体态与娟秀恬静的风姿，以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唤起读者对人类灵性的热爱；同时，也可作为美术爱好者临摹人体模特儿的范本。至于出版后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那就让读者来评价了。

（原载《美术之友》1989年第4期）

《人体艺术摄影》，辽宁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定价23.00元。

## 韵致丰涵的世界

——为《世界著名水彩画家》出版而作

李宝义

尽管画家们情思、手法各异，有的追求透明活力，有的崇尚覆盖特质，但，以水溶颜料为媒介的绘画，毕竟独树一帜，在造型艺术里创造了一个雅致的领域。

水彩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作为一个画科即现代意义上的水彩画，却是16世纪以后的事。它诞生在西欧大陆，发展在英伦三岛，演进成堪与浑厚、凝重的油画相抗衡的地位并日趋繁荣，固为其艺术特质使然，同时也是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画家们，几个世纪以来实践经验的结晶。

在我们的国度里，曾由于动乱的厄运导致水彩艺术的衰绝，一度为厚涂水粉画所取代。近些年，业经多方努力，水彩艺术群体如春笋般崛起，关于“水”的技法讨论，已为常见之举，以致整个“雅致领域”的开拓，也为美术界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所关注。在这种形态下，辽宁美术出版社积极介绍国外佳作，以企进步与繁荣，继《英国水彩画选》、《水彩肖像画技法》等名著问世之后，又推出了《世界著名水彩画家》作品集，为读者奉献了新的有益借鉴。

《世界著名水彩画家》介绍了21位名家画品，如约翰·布洛克莱（John Blocklev），他是英国皇家水彩学会会员、水彩蜡笔协会总裁，著有《向水彩挑战》和《水彩画的创作技巧》等，刊出的《石屋》和《安格斯的农舍》，均以厚重的色调渲染出他的强烈感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在美国康乃狄克州执教的查理斯·雷德（Charles Rcid）的人像和裸女作品《阳光中的立像》等，都十分精采，具有水色淋漓、细致微妙、轻快透明等特点，可以说笔致非常清晰，含蓄中见深邃，是艺术引人入胜之处。画家挥毫间水渍为妙，沉淀成巧，时而朦胧，时而晶莹，造就了内涵丰富的魅力，耐人寻味。雷德自60年代以来，在各种水彩画展中多次获头奖，足见他的艺术成就是公认的。《唐宁镇近郊》和《夏日的花束》等的作者菲利浦·杰米森（Philip Jamison），他的作画灵感大多来自家乡的西柴斯特，充满着恬静的幽思。查理士·迪玛斯（Charles Demuth）1925年作的《苹果与绿色玻璃杯》是一幅难得的杰作，以其曲线的主体和波浪折叠的布幔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组合，布幔的阴影使本来单调的圆形构成得以平衡，显示了作者惊人的构图能力。水彩画往往在貌似平淡无奇之中，富有雅俗共赏的意趣。正因为如此，这门艺术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从而激励众多的艺术家为之探索，这大概就是水彩艺术虽经坎坷而仍寓生机的缘故吧。

艺术欣赏者的心理是奇妙的。如今当人们由于几十年沉积的逆反心理，对写实手法一般感到厌倦之时，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造型准确，技法严谨的水彩画，却博得里手们的青睐。对于饱览过“水彩画故乡”妙品的读者来说，转首领略一番大洋彼岸的艺术风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会感到格外清新。魏斯遵循“生活不应和画家分离”的父训，卡纳山丘的农场和奥森家，成了他施展艺术才华的舞台。在这部画集中编入的魏斯的11幅作品，即已证明他在几十年间画了这里的一切，“描绘的东西虽然一样，但表现的启示却经常不同”。从40年代《前门台阶上的艾瓦洛》、《约翰奥森的

葬礼》、《巫婆之门》，50年代的《被踩的草》、《奥森谷仓的内部》，到60年代的《挤乳室》、《栅》，无不洋溢着一种生活的气息和幻漫的氛围。有人探究“他的画带有二元性：一部分带着极大的自由，另一部分陷入思考的控制，即从训练而来的”。但，我以为，如果说画家确乎不断造出得心应手之作，使他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那么，恰是他具备了驾驭干笔法和蛋彩画的娴熟技巧的结果。在这部画集刊选的作品中，应首推他的精采杰作《安娜·卡娜》。这幅70年代初的作品是画家数年观察的结果。卡娜对一切都似乎毫无反应的特质，活现于高度明亮的色调之中，魏斯自称“是我所有画中最多彩多姿的”一幅。成功来之不易，足足画了半个月，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从不敢想有完成的一天”。尽管他以往作画每当感受至深一气呵成，而且“从未感觉还要加添几笔”。

诚然，技巧性只是艺术修养的一个方面，但缺乏技巧的水彩画必然导致艺术性的丧失。水彩画就本质而言，是以水为媒介的光的艺术。大自然的光色既美妙又吝啬。“色彩，不论什么色彩，寿命只有秒把钟”。印象派风景画大师们为此成年累月地在户外作画，锻炼观察力，“在捕捉光辉的自然的最初印象时显示了他的天才”。可见，难以捕捉和善于表现是一个进取的过程，一切技巧和自由便在这个过程中生成。魏斯的道路还给我们另一方面的启示：所谓现代意识，虽与“抽象”有情，却并非与“具象”绝缘。

一部杰作荟萃的画集出版了，一个韵致丰涵的世界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原载《美术之友》1989年第4期）

《世界著名水彩画家》，辽宁美术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定价19.50元。

## 俊彩星驰映古今

李仲元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技艺精湛、匠心独运的画家，他们的创作成果犹如姹紫嫣红的异卉奇葩，把画坛艺苑点缀得五彩缤纷。他们的杰作，都是祖国文化的永恒瑰宝。随着岁月的推移，由于天灾、兵燹，大多数都已不复存在，而经历劫难仍能保存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了。历代王孙名士，不借重金厚货，对于这些绘画珍品，争相购藏。这在客观上对保存文化遗产确实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迄至清代，收藏书画更为风行。到了乾隆后期，天下珍迹几已搜求殆尽。到了近代，收藏的形式出现了变化，除一些私人收藏家外，具有大规模收藏能力的便是各级博物馆了。博物馆收藏名画方法手段自然比较先进，而且可以不时对外开放，以供赏鉴，这实在是一大进步。目前我国有许多大型博物馆收藏大量名画，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都出版过大型藏画集，使人们有机会看到其中珍藏，以饱眼福。沈阳故宫博物馆在名画收藏上，特别是明清绘画藏品是很丰富的，无论是数量或者质量，在国内都堪称上乘。这些藏画的来源有三：一是盛京皇宫的部分原藏，多有宫廷画家的名作，作品大多是加盖了皇帝御览印铃、收入著录的；二是博物馆间交流调拨的作品，亦多稀世佳品；三是从社会上征集，其中尤以著名收藏家捐献的名画最为贵重。如吴湖帆、刘海粟、孙煜峰等都有珍品捐献入藏。经过60年的收求征集、研究鉴定，辽宁美术出版社将其中精品编辑出版了《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选辑》，以飨读者。这本画集，凝结着沈阳故宫博物院数十年从事征集、研究工作的几代人的心血。

披阅一个博物馆的藏画集，可以从中看出其全部珍藏的概貌。这本画集也独具自己的特点，概而言之，大致有四：

一、画集收入的流派较多。大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格概貌。明代前期阙略，而中期的浙派大家戴进、吴伟、张路等的作品都有收入。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等人的作品都是具有典型风貌的精作。至于清代，四王以及吴恽作品表现了他们的清逸秀润的深厚功力。而朱耷、弘仁、髡残、石涛四僧的作品面貌各异，或简放，或劲健，或苍莽，或豪肆，都是对传统束缚的冲破，是一代新格的佳构。金陵诸家的苍润旷远，新安派的超脱枯淡，扬州诸家的作品或奇纵，或狂逸，或荒率，反映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和不同风格，较为难得。而宫廷画派的端庄严整的作品，虽不为历来的鉴赏家所重，但它毕竟是一个画派，有存在的价值。

二、画集收入了许多巨匠大家的代表作或不常为人所见的作品。如吕纪的《竹枝鸚鹄图》，便与他最典型的墨彩焕然、赋染精细的作品不同，这幅纸本墨笔小写意，清劲、超逸、精湛，确是极可宝贵的。丁云鹏的《达磨图》，浓眉虬髯，目光如电，一位面壁苦修、执着于禅宗的僧人跃然纸上，其他如髡残的《江寺孤舟图》、恽寿平的《孤月群鸟图》等都是非同一般的巨构。华岳的《万壑松风图》，以其雄大的气魄，豪健的笔墨，截取造化天地移入画幅，令人叹为观止。而郑 的《丛竹图》，在散乱、浓淡之间，将丛竹的风姿描写得淋漓尽致。郎世宁的翎毛，则以明暗法真实地状写了禽兽，将西洋画技法融入中国画中，别开生面，令人眼目一新。

三、画集收入了许多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作品。如戴本孝的《山水册》是他逝世前数月所画，是他的最晚一件作品，虽是绝笔之作，却是那么精致，而弘仁的《秋柳孤棹图》、《披云峰图》，前者是他逝世当年自赣返歙途中所作，后者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作品，这两件作品既可为研究他晚年活动的行踪，又可为研究他晚年艺术风格和技法频添佐证。谢时臣早年的《仿卢鸿草堂十景图册》、高凤翰游天池山的书画册，都是研究他们艺术活动的极好作品。

四、画集收入了一批一般画家的作品。有些也是稀见珍品。这些人的画迹，海内流传较少，集中收入的这些作品可资研究、鉴赏。如顾大典的《峦涧幽深图》，构图奇妙，墨彩和谐，他不宗一家，独辟蹊径的风格实不多觐。而周笠的山水册，精染妙钩，气韵生动，堪称册页中难得的佳构。可见虽非巨擘，亦有如此妙品。其他如谢彬、毛上贫、马昂等人，或画名不显，或画迹不彰，而收入的画幅都是可与一代名手相埒的精心之作。

总之，有了这些特点，都大大增加了这本画集的艺术价值与研究价值。百余画幅，将明清两代画坛的大致面貌勾勒出来，给人以完整鲜明的印象。前后延续了 500 年的诸家名作，犹如琼花玉蕊，永不凋谢。

（原载《美术之友》1989 年第 4 期）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选辑》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8 月出版，定价 300.00 元。

## 好书不厌百回看 ——读《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 绘画选辑》有感

杨仁恺

1989年4月在辽宁美术出版社雅集，偶然见到该社出版的几种大型画册，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选辑》，彩印四开精装豪华型本，令我倍觉惊异，同时又极感亲切。其所以为此，有下面几个原由。

第一，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前身是40年前的东北画报社，是建国前最早的一家美术出版机构，因为历年来出版过许多有名的各类美术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却从未见编印过如此精美的大型图册。它说明了摄影、印刷、制版、装帧等技术已臻于完善，才敢于攀登高峰，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我们为之庆幸。

第二，在当前全国出版界受客观形势的干扰，竞相发行质量有问题的图书，甚至极个别的出版机构为了牟利竟发行有毒害的黄色读物，而且屡禁不止。在此大气候影响下，辽宁美术出版社始终坚持大方向，实在难能可贵。该社还不惜工本，毅然编印出这样一部高、精、尖的画册，其气魄之大，殊堪嘉许。

第三，还要感谢从事具体制作这部大型画册的各部门的同志，据我所知，他们印制这样的巨型画册，起实并不是完全掌握了经验才接受任务的，而是逐步摸索，谦虚谨慎，向各方借鉴，终于突破重重难关，将一部极有艺术价值的出版物奉献于国内外广大读者面前。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赞叹不已。

第四，画册内容，片片珠玉，益之以印刷技巧之精美，读来如睹原作，不禁令我浮想联翩，回忆起前后几十年与之有关的人和事。由于编者在“前言”中语焉不详的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本画册之所以能够面世，除上述编、印人员外，更有默默地作出奉献、却早已被人忘却的关键人物，实在不应视而不见。因为忽略它的前因后果，则有悖于历史，有负于今人。

精美的画册必然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形式之考究，可以当即判断，然而内容却要认真推敲。收入沈阳故宫博物院图录的明清藏画，究竟应如何评价，它在我国绘画史上有何重要地位，搜集的历史情况又怎样，凡此种种，似乎在披览画册时有涉及到的必要，使读者于欣赏中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址是满人入关前所修建的宫殿，第一代努尔哈赤和第二代皇太极定都于此，第三代福临（顺治）迁都北京，于是沈阳即改作陪都盛京。当时宫中保存历代书画名迹为数可观，有清末宗族人士金息侯点编《盛京书画录》可资征信。袁世凯复辟称帝，段芝贵席卷宫中珍宝作为觐贺之礼，后存放于北京故宫午门古物陈列所。古物南迁，半数运往南京，抗战中又迁于贵州、四川等地。1948年来，先后运往台湾，此乃沈阳故宫藏画被劫运一空的始末。从此，沈阳故宫仅算古建筑群而已。

1948年11月从沈阳故宫博物院筹备处手中接管后改称沈阳故宫陈列所。50年代后期，当时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徐志为了多层次地开展文化欣赏活动，特拨款30万元，向国内外征集明清书画作品，藉以充实展出内容。徐志

当时和我商量，如何展开此项工作，委托我致书海内名家吴湖帆、刘海粟、谢稚柳、赵药农、惠孝通、孙伯渊、钱镜塘诸先生，请他们大力支持，忍痛割爱，献出收藏多年的绝品，共襄盛举。该馆原保管部主任袁桂兰多方奔走，不辞辛劳，数载之间，集腋成裘，成效显著，蔚为大观。

上述行政负责同志以及一些知名鉴藏家，他们对沈阳故宫所作出的贡献，功绩卓然，不能抹灭，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其中一大部分人士均已作古，追思往事，不胜感慨。

图录中收入不少明清佳构，均系受到国内外美术家的珍视、并广为征引的。如明代戴进《聘贤图》大轴，人物、树石、山峦描绘精致，韵味生动，为少见的传世杰作。沈周的《秋泛图》，气势沉雄，非一般应酬之作。吴伟的人物，别出机杼，风格挺秀，耐人寻味。唐寅的《杏花仕女图》，曲眉丰颊，不减唐人风姿。谢时臣的《卢鸿草堂十景图》，功夫深厚，细密灵活，有出蓝之妙。徐渭的《雪蕉梅竹图》水墨大写意，笔墨滞洒，蕴有磅礴气势，开扬州八家之先河。陈洪绶人物与沈灏山水画，各有独到风神。总之，明代作品中可记者尚不止此，限于篇幅，略陈一二，以窥一斑。

至于清代名迹，数量超越前朝，尤以初期作品比重偏大，如四王，吴、恽六家，不乏佳作。王时敏《群谷乔松图》，犹存明人遗规，而王鉴之《仿宋元山水册》，其名曰仿，实为本人得意之笔，至于王石谷（翠）、王原祁各轴，均具风貌，不失为大家路数。吴历、恽寿平各一轴，吴画精密，恽作嫌疲，稍损神韵。唯独四大画僧各选一轴入册，且均具代表性，艺术风格在宫廷画派之上，予后世以深远影响。与四僧同时之名家梅清、查士标、罗牧、戴本孝诸家作品，亦各以其才华和个性树立门户，光照当代。清中期扬州八家之作，除闵贞外，七位佳作入选，从中不难窥知我国绘画传统源远流长，暨明清历代前后发展演进之脉络，予读者清晰的感受和启迪。指头画家高其佩和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的作品尤具特色，丰富了清代绘画的内容。而华岳《花卉图》和《万壑松风图》两轴，同为 52 岁时所作，尤以后者气势雄强，引人入胜。

入选明清作品，尽管不到百幅，主要画家作品却基本具备，对从事绘画艺术的欣赏和研究，实乃裨益非浅。

画册在设计中，因调整横、竖幅版面，把作品的先后顺序作了局部调整，因而读来显得有些凌乱，这些只是美玉之瑕，无损于本身的光辉。好书不厌百回看，出于由衷的喜悦，撰此短文，呈献于读者和专家面前，伫候教益。

（原载《美术之友》1990 年第 6 期）

## 精湛的艺术 ——读《张甸摄影集》

光 辉

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摄影画册“辽宁摄影家丛集”——《张甸摄影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著名摄影家张甸，是一位既搞艺术摄影，又搞报道摄影的多面手摄影家，在国内外重要的摄影艺术展览或比赛中多次入选或获奖，因而蜚声国内外摄影界。

《张甸摄影集》从他 40 余年拍摄的众多作品中，选出 70 余幅（组），分为光影、探索、专题三个部分汇集成册。打开这本摄影集，人们仿佛走进一个万象纷呈的光影世界，这里有北疆傲雪的苍茫，小河流水的清雅，云蒸霞蔚的雄奇，湖光山色的秀丽；有工业建设的磅礴气势和人民生活的细腻情趣；有婷婷玉立少女的丰姿和饱经沧桑老人的容貌……它们以不同题材，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讴歌祖国的锦绣河山和蒸蒸日上的崭新面貌，给人以艺术陶冶和美的享受。

从《张甸摄影集》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位勤于耕耘的摄影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声震山河》、《客人来到草原》、《四老图》和《油田壮歌》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置身于生活之中，敏于观察，善于捕捉，常于平凡中捧现不凡的佳作；他在以纪实为主要特征的创作之中，富于创造，勇于创新，赋予被摄对象以感情色彩，塑出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从《水乡梦》、《真情》等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他近些年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与突破。他拍摄的《列车上的喜事》、《她唱出了社会主义好》和《阿斗探亲》等专题摄影作品，更是脍炙人口，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摄影艺术风格朴实而不拘泥，变化而不离宗，可谓别具慧眼，独具一格。

（原载 1989 年 7 月 13 日《人民摄影报》）

《张甸摄影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定价 79.00 元。



## 开年第一套

伍 杰

辽宁少儿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老少咸宜，可读性很强的历史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粗览之余，我认为这是1990年开年后第一套有价值的丛书，使我爱不释手。

这套书，如此受到青睐，使人从中得到许多启发。目前，图书征订萎缩，购销市场疲软，出版社叫苦不迭，出版家们忧心忡忡，都觉得出版形势严峻。何以度过难关，已成为出版家们的热门话题。这套书的出版，似乎给出版形势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出版并非没有出路，关键在如何寻找。

辽宁少儿出版社的同志，用实际行动作了回答，就是在目前出版社林立，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出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套书就有特色，特在有重点，有价值，有份量。一个出版社，一年没有几套重点书，几年没有许多有价值的重点图书，便无法立足于出版界，也无法受到读书界、知识界的重视。重点书是一个出版社的脊梁，人没有脊梁是不能活的，没有脊梁的出版社还算什么好出版社呢？辽宁少儿出版社的同志明确了这一道理，便把这套书作为重点书抓，下功夫恭请名家撰写，埋头五年狠抓这套书，经过精心编辑，一套15册的重点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初版3万套，一抢而空，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

全套丛书从炎黄的传说写起，写到“五·四”运动。有连贯性，系统性，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概貌。这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演义小说，很有价值。

全书还特在真实性与文学笔法相结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内容。凡是正史上有的历史事件、各类大事，在本书中都有记载，不过，它是纪实文学的手法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有艺术夸张，用文学笔法描写，细节有作者的想象，但是大事是忠于历史的。这样就使得历史的内容更为丰满，更为有血有肉，读了以后使人印象更深。如写秦始皇出巡，陈胜、吴广起义，都符合历史记载，但细节又写得很生动。

全书还特在不仅富有知识性，可读性也很强。讲秦始皇名字的来历，充分表现了他那种骄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特性，读来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写张良刺秦始皇就很生动，说张良并不姓张，而是韩国的姬公子，他结识了一位大力士，使的大铁椎足有120斤重，“力士按着姬公子的指点，运足气，猫起腰，俨如弓似的弯着身子，狠命将那120斤重的大铁椎掷了出去，心里说：‘好一个暴君，死去吧！你怎么活着就怎么死吧！’”这既是历史的真实，又像小说，写得活灵活现。写出了大力士的感情，写出了大力士的勇气，使人非读不可。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全书不失为一部使人爱读的通俗历史书。这套书也使我们认识到，通俗读物很有读者市场，很受一般读者欢迎，很多内容都可以用通俗的形式表现，写通俗读物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方面要扶持，要引导，要开拓，要发展。当然，那些冠以通俗之名的低级下流读物，是应坚决反对的。

《五千年演义》的出版，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今天，我们对中华民族许多有益的宝贵遗产，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应很好地继承。《五千年演义》的出版，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有力批

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套丛书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的好教材。

这套丛书的出版，还使人得到一个启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三万套丛书一抢而空，这在经济收入上是很可观的。读者为什么“抢”，因为书好，读者需要。两个效益的统一，只能统一在高质量的好书上。当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有背离的时候，许多学术著作，要赔钱才能出版，这就有待文化经济政策的调剂了。

希望这套丛书打开的窗口，能为其他出版社指出一条前进的路。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2期）

《五千年演义》盖壤、吴庆先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定价（平）80元，（精）115元。

## 读《五千年演义》断想

陶 铠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据史传而敷演成文，是演义的一大特点，它是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好形式。《五千年演义》，以历史发展之顺序为经，以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为纬，完整地以演义形式推出给青少年读者，此举功莫大焉。

以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并非《五千年演义》所首创。在此之前，断代的历史演义已有过几部，即便是连贯而系统的，也有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史演义》，其他如《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等。但我还是要说，《五千年演义》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这并非是无谓的捧场，而是确有其根据在。

其一，它基本上是一部信史。演义是以文学的形式写历史，从分类来说，它应属于小说类，允许虚构。但如果虚构的成份太多，就很难使人信服。尤其是对青少年读者来说，他们的历史知识不多，识别力不强，如若把虚构的成份当作信史，其影响匪浅。《五千年演义》避开了以往历史演义特别是某些断代演义中虚构成份太多的缺点，保持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虚构仅限于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即使采用一些传说故事，也剔除了某些封建迷信或虚无飘渺的成份。比较以往的演义，它对青少年读者的阅读更为有益。

其二，它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往的某些历史演义，因写于旧时代，往往都是以帝王将相、朝代更迭为主线，其间又有着浓重的封建正统思想的色彩，难免会使处于受启蒙状态的青少年受到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熏染，甚或误认为中国历史舞台上只是帝王将相在那里活动和主宰一切。这对他们历史观的形成会有消极影响。《五千年演义》则不同，它也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但它同时写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等各行各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就使青少年能全面地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到中国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而且更是全体劳动者包括在那个时代各个阶层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伟大人物所共同创造的。

其三，它的语言通俗流畅。这一点对当代青少年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以往的历史演义在语言方面常常文白相杂，有的地方晦涩难懂，青少年读起来拦路虎较多，而《五千年演义》却能一气读下去，不忍卒放。

《五千年演义》从华夏上古写到“五四”，那么“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也可谓丰富多采，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断不可缺。就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诞生这段历史，其间仅只 28 年，但中国确实经历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28 年中，历史事件迭出纷呈，历史人物风云际会，如能生动形象有滋有味通俗易懂地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演义》或《中国现代历史演义》，或在《五千年演义》、《民国风云》之后续一本《革命功成》，引起青少年学习中共党史或现代革命史的兴趣，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经过无数先烈的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如何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而诞生的，从而激发起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满腔热情，岂不更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因为至今尚未有以演义形式写这段历史的。诚然，以演义的形式

写这段历史，比写古代史、近代史难度更大，但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细微而缜密地选材，科学而又艺术地创作，恐怕也不是很难很难的吧！况且，做一次开拓性的工作，又何惧其难呢？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2期）

## 功德在焉 ——读《五千年演义》

官锦勋

大体浏览了一下大型历史丛书《五千年演义》之后，不由对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这套共 15 本 430 万字的丛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上好的精神食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用目前许多广告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味道好极了！”

反映我国历史的史书史料之多，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怎样才能把这五千年间凝聚着无限智慧与血泪教训的万千事件，以及多如过江之鲫般的可歌可泣可敬可卑的各种人物，简明而又不漏大事，全面而又不芜杂烦琐，生动形象有滋有味通俗易懂地呈现给孩子们，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初听说要编这样一部丛书时，我曾很担心与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史演义》雷同，出力不讨好。匆匆翻过这部新著后，我的担心解除了。这是一部全新的书，看问题的观点新，取材角度新，语言新。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纵览一切，既坚持以正史为主，也吸收了经过分析的野史与传说作补充；既写帝王将相，也写了各行各业的名人；既有朝代兴衰，帝王更替，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既强调了“实”，使之名副其实“信史”，也不排斥“虚”、在一些生活细节、环境气氛方面大胆然而有根有据地进行艺术虚构，使之具有根高的文学性。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是不太容易把头绪理得很清楚的，即春秋战国、南北朝与民国前期。这部丛书对这三个时期处理得也相当得体。《春秋战国》，从周平王东迁写到秦灭六国，时间跨度长达 549 年。它不仅以说故事的方式，有声有色地介绍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商鞅变法”、“合纵连横”、“长平之战”这类重大历史事件，还情趣盎然地介绍了管鲍之交、晏婴、伍子胥、孔丘、孙臆、屈原等人脍炙人口的故事。从《南北朝始末》一册，既可以概括地看到南朝宋齐梁陈各家的兴亡，也可以看到北朝拓跋珪、拓跋宏、高欢、高洋、宇文泰、杨坚的崛起，看到谢灵运、祖冲之、范缜、萧子良、贾思勰、萧统等人的业绩，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何以出家当了和尚。《民国风云》则以孙中山一生活活动为主线，贯穿了各地各时的风云人物，叙述了从 1894 年到“五四”这段变幻多端头绪万千的苦难进程。重点突出，繁简适当，情节生动，议论中肯。这样的作品，在给广大读者以可靠的历史知识同时，自然而然会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

我国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走向世界，在许多国家都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学科，有的研究专家已数以百计。这是值得所有炎黄子孙引以为荣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优秀“产品”能走向世界，却远远没有走向全国。实践无情地告诉我们，文化遗产再丰富再优秀，它也只为认识它的价值的人造福；却不会成为不认识它的价值的人创造财富的能源。

我们还有两亿文盲，其余的大多数也不能说已具有了很高的文化修养。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像《五千年演义》这样的作品，把古文化加以高水平的通俗化，送到人民的心上。

(原载 1990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

旧瓶新酒 开卷有益  
——略评历史丛书《五千年演义》

石 城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五千年演义》的历史丛书，为在青少年中普及历史知识，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用说书和平话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是中国一大发明。宋朝诗人陆放翁有诗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就是描写宋代说书情况的，后来文人把平活和说书的内容加以整理，进行一番文字上的加工，于是就有了演义。

旧时的演义，最有名的当推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其他还有《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和一些分散写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这些演义在民间影响很大，许多人的历史知识，最初都是从这些演义得来的。但这些历史演义思想观点比较陈旧，有些内容也不尽适合少年儿童。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演义，一共有15本，430多万字，是许多通俗读物工作者集体劳动的成果。这套书从炎黄传说写到孙中山革命，各本书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可以顺序浏览一遍，也可以抽取其中一本阅读，就当是消闲解闷，也是开卷有益的。

粗略翻过这套丛书，发现它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观点新颖。这套书摒弃了历史循环论、天命观和鬼神迷信这些封建色彩的糟粕，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来揭示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以是否推动历史前进和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这些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比如说施琅这个人，他是郑成功的旧部，归降了清朝，过去有人说他是汉奸投降派。但施琅在收复台湾，统一祖国这件事上却是立了大功劳。这套丛书对这样的人物加以肯定和赞扬。这就是值得称许的新观点。此外，这套丛书还大量应用了史学研究上的最近成果，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是系统全面。这套书既写帝王将相，也写农民英雄；既写朝代兴衰，也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行各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

第三是客观真实。这套书没有用“时髦”的政治标签去注解历史人物，而是按照当时历史情况，由历史人物现身说法，让读者自己去作评价。比如写武则天，既不抹杀她的政治功绩，也没有刻意抬高吹捧，隐没她的阴险毒辣和荒淫无耻，将她从当尼姑起直到爬上封建王朝最高宝座的一生，客观地向读者作一番介绍，尊重历史事实。

第四是通俗生动。给少年儿童看的书，故事性要强，语言要通俗规范。这套丛书在这些方面花了不少功夫。比如说唐太宗，怎样才能鲜明生动地介绍这个开明皇帝，作者重点描写了他与魏徵的亲密关系，通过两人在议政论事上的矛盾冲突，最终达到意见统一，塑造了唐太宗从谏如流、兼听则明的鲜明形象。读者一点也不觉得枯燥乏味，在兴趣盎然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还是要拿唐太宗的话来作本文的小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让青少年多知道一点自己国家的历史，这不但可以增加青少年的知识面，

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提高民主意识的需要。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像《五千年演义》这样的通俗读物面世，给青少年增添有益的精神食粮。

（原载 1990 年 5 月 10 日《澳门日报》）



尊重历史 繁简有据  
——读古继堂的《台湾小说发展史》

马兆政

古继堂所著《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不久，他又完成了《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著作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发行，必将引起海内外文学界的关注。

《台湾小说发展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从台湾曾被荷兰和日本长期侵占的特殊历史开始，探索了台湾文学曲折发展的道路，阐释了台湾小说发生、发展的历程：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台湾小说发展的关系；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状况；40年代末期，百万同胞迁台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乡土文学的发展和50年代猖獗一时的“反共八股小说”；60年代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乘虚而入和70年代乡土小说的再次蓬勃兴起；80年代现代派小说、女性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多元化的发展等。特别是对于许多很为棘手却又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对台湾的“乡土派”和“现代派”如何评价；对台湾文学如何分期；对众多的台湾本土作家和自大陆迁台作家的作品如何分章设节；对众多的文学社团和小说刊物如何理清其来龙去脉作出评估；对大批台湾的海外作家如何做出定位分析等，《小说史》的叙述和论证都比较客观而中肯。王文兴、李昂、琼瑶这样一些台湾作家，他们就像台湾文坛的敏感神经，一经触动就可能使刚刚平息下来的论争思绪重新翻将起来。即使对这部分作家作品的述评，作者也都力求平正。对张爱玲所作的定位分析即是很好的例证。张爱玲既不是生在台湾，也没有写过台湾题材的小说，实际上她根本没涉足台湾。然而她的作品又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作家。

《小说史》尊重历史事实，将张爱玲列入书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台湾的小说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接受了比较多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该著在论及台湾小说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时，充分论证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即是台湾小说创作的源泉。台湾小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文学全部发展历史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又处在东西方文化交叉的热点上，《小说史》宏观地审视台湾小说发展的全貌，同时，作者又用微焦镜头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时空效应作出仔细的辨析。

《小说史》在论及台湾女性小说部分更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台湾的女作家不但阵营强大，而且创作成就卓著，乃至出现了“阴盛阳衰”之论。作者对台湾有300多位女作家这一事实惊叹道：“一个不到2000万人口的省分，拥有如此众多、才华卓越的女性作家，恐怕不仅是中国文坛的盛举，也是世界文坛的奇观。”《小说史》中立章设节专论的就达十三位之多。她们是：林海音、陈若曦、欧阳子、琼瑶、朱秀娟、曹又方、施叔青、李昂、萧飒、萧丽红、廖辉英、季季、曾心仪。作者阐述每位女作家的成功之路时，笔触细腻，饱蘸感情。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不同倾向，以及她们在台湾爱情婚姻小说潮中的主力军作用，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and 评估，使人感到它还包有一部台湾女性文学史。

（原载1990年2月15日《文学报》）

《台湾小说发展史》古继堂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4 月出版，定价 5.60 元。

## 蒲松龄手稿《聊斋杂记》评介

郭守信

蒲松龄是清代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注重民间科学、关心治生实用之学的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总计不下数百万字，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集、诗集、词集、戏曲、俚曲、杂著等。因年代久远，他的未印著述大多损毁或亡佚，能流传至今者，可谓希世之珍了。因此，建国后对蒲松龄的遗作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直为蒲学研究者所注重。1955年北京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聊斋志异》手稿，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对蒲松龄遗著做了多方搜集，编辑出版了《蒲松龄集》。本文将要向读者介绍的是蒲松龄的又一部手书遗稿——《聊斋杂记》。这部书稿于1987年业经辽沈书社与辽宁省图书馆、邗江甘泉书画院和邗江古籍印刷厂合作，以柯罗版、宣纸影印成线装书籍面世发行。

这部书与蒲氏的其他著述不同，它是蒲松龄摘抄于他书中的关于治生实用之文，有农田树艺、救荒、蓄养、花谱及书斋雅制（包括造纸制墨、书画装潢、碑帖论列、审石辨玉、锻铁论铜和古窑器、古漆器、古铜器的鉴赏）共550余则，内容庞杂，博雅兼具。由于这是一部抄辑书稿，可能未被时人所重，故在蒲氏的遗书中，这部书稿终有清之世，迄于民国，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然而在蒲氏的遗书中，却只有这部书稿是自始至终与《聊斋志异》手稿在一起比翼联袂保存和传递着的，以至于幸存于今。

蒲松龄没世后，他的遗稿最初均藏于淄川城内玉英街蒲家祠。到同治初年，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因与族人纠纷，阖家出走，由淄川来到沈阳，遂将《聊斋志异》、《聊斋行乐图》以及这部《聊斋杂记》书稿，一并带来沈阳。其后，蒲价人将《聊斋志异》和《聊斋杂记》两部手稿传其子蒲英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蒲英灏时任统领，随左宝贵赴朝作战，回国后供职于沈阳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依氏知蒲英灏家有《聊斋志异》手稿，商请借阅，英灏先以半部借之，阅后，复以另半部相兑。而恰值是时，依氏有事进京，染疾而死，《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亦随之失去下落。1901年蒲英灏任奉天巡防统巡官，奉命带队镇守西丰，家属亦随迁西丰。英灏去世之后，《聊斋杂记》手稿和所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由其第五子蒲文珊先生收藏。到1948年西丰解放后，蒲文珊先生将这两部书稿先后献给人民政府。因《聊斋志异》久为世人所重，故该手稿于1955年即被影印出版。而《聊斋杂记》这部书稿不仅不为世人所知，即使是蒲氏后人亦因年代久远，更代传递，也弄不清其究为蒲氏何书了。

1951年春，辽东省政府接收此书稿时，只是一本残册，未见书名、著者及抄写年代，后由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其重新加衬装订，改装为两册，移交给东北图书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收藏。当时据捐献者的介绍，曾定名为《农桑经残稿》。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蒲松龄集》，收有《农桑经》，因此书稿内容与之不相符，故又将其改名为《蒲松龄杂著逸稿》。1979年编辑全国善本古籍书目时，又将书名改为《聊斋杂著》。1981年辽宁省图书馆在复制复本时，因尚不能证实其原来究系蒲氏何书，为慎重起见，据其内容博杂，改名为《聊斋杂记》。因是之故，辽沈书社在这次整理抢救古籍、影印出版此书时，也只得仍从是名，以待识者正之。

关于《聊斋杂记》一书的著作方式和资料来源等问题，经辽宁省图书馆康尔平同志的整理研究，已基本弄清。其资料来源，除摘录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葵、香兰、柘、伐木、耕田五则，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救荒部分食柏叶法四则，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器一则，元吾丘衍《学古篇》珍玩部分六则，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外，余则多来自明人杂著，如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项元汴《蕉窗九录》，曹昭、王佐《格古要论》，周嘉胄《装潢志》，杜绾《云林石谱》，邝播《便民图纂》，高濂《燕闲清赏笺》、《草花谱》，黄省曾《种芋法》等 10 余种书。此外，还有见于清谷应泰《博物要览》中的资料。于此可知蒲松龄的生平思想、学术观点、爱好兴趣，以及治生求实的精神和深汲博采的治学之道，为蒲学研究展开了新的视野。

从蒲松龄的遗著中，可知他除文学作品外，尚有“备乡邻之急”、“索解生产之谜”的杂著多种，如《药崇书》、《日用俗字》、《农桑经》等。这本来就已经反映了蒲松龄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致力于生产、生活实际等实用之学的学者。只是由于他以文学见长，又有一部笔墨生辉、文采四射的《聊斋志异》，为人喜闻乐颂，遂使他文名远播，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家，而他在治生实用方面的学识和成就却因此而不显。由于《聊斋杂记》的发现和出版，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资料，无疑对研究蒲松龄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是有着实际意义的。

从《聊斋杂记》所辑的内容看，几乎全部是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经验的实录，如“农事”部分是按月份记述农田树艺之事，计 127 则。正月就有种榆、种梧桐、插柳、种菠菜、茼蒿、山药诸法；二月种梨、秧槐、植枸杞、牛膝；三月种麻、麦、大豆、芝麻；四月种绿豆；五月插秧……一年十二个月依次记完，已是一部非常实用的指导生产的农事教科书。下册所记的锻铁论铜、诸窑器物，更是具有科学价值的手工艺生产知识。即使书中的一些占验和农谚，除个别地方带有迷信色彩，也全是历代生产经验的总结。我们知道蒲松龄是科举时代的文人，他一生多次参加科举应试，除中年一度离家做幕宾外，其余则多为人客馆，以教书为生，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农民或手工艺家。他没有专攻“科学”的实践，但却能对如此众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感兴趣，并不厌其烦地辑录成册。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作为文人的蒲松龄去致力于科技生产知识的纂辑？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把它和蒲松龄著述的《农桑经》、《日用俗字》、《药崇书》，以及他的大量悯农诗和俚曲的创作联系起来考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蒲松龄在前人《农训》和论蚕诸书基础上写了《农桑经》，在民间《庄农杂字》基础上写了《日用俗字》，一为农业生产教科书，一为通俗文化课本，都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他在《药崇书》序中写得明白：“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处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聊斋杂记》的写作目的当亦如此，是在备乡民索解生产之谜的强烈需要情况下执笔的。不过《药崇书》只存序未存文（全书已佚），而《聊斋杂记》是只存书未留序。我们可以从全书主要部分看出，他是想写《农桑经》续篇的。上册所见，按年中农事月令的体例编排，都是与《农桑经》一致的。不过他“志之不已”，又补充以工艺生产知识，成为“工农生产技术合集”了。这是由于他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又独好书斋雅制、玩赏器物的知

识，而这也是传播科学文化所必须的生产技术，比之“农事”虽不是乡邻之急需，但也是发展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知识，很有开启民智的作用。不过就全书来看，他的重点显然还是放在农田树艺、蓄养救荒上面。这和他长期贫困的塾师生活和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中形成的进步世界观，以及力求提高生产力，摆脱农村贫困的良好愿望分不开的。蒲松龄写过《记灾前篇》、《秋灾纪略后篇》、《恳减米价呈》等文章和描写灾情的《祷雨赋》、《旱甚》、《蝗来》、《捕蝻歌》、《蜚虫害稼》等大量诗歌，其中除了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饥苦而外，主要还是想求之于技术（如治虫、抗旱方法），以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不难理解，《聊斋杂记》正是为此目的而辑录的。它反映了我国17世纪一个知识分子、伟大作家的远见卓识和经世致用思想。蒲松龄之不朽，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还在于他是一位注重科学、关心治生实用之学，不断向自然科学探索的伟大学者。《聊斋杂记》的影印出版，为全面研究和评价蒲松龄的进步思想、也为进一步挖掘我国科学文化财富，提供了新的信息。

《聊斋杂记》没有记下抄录年代，但我们可以依据《农桑经》、《日用俗字》的写作年代推知它出于蒲氏晚年的手笔。《农桑经》和《日用俗字》两部杂著都写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作者56岁时。《聊斋杂记》当辑于两书之后不久，他60岁左右到70岁前后10年之间。他青壮年时期无暇及此，创作盛期（写作《聊斋志异》时代）中年老年交替的年龄段，也是顾不上如此大量抄书的（按书稿中个别地方及书额处，杂有另一人手笔，字迹拙劣，篇页极少）。而他致力于民间治生之学和用通俗语言写俚曲，都是在他乡居已久、阅历已深，对农村生活及乡农疾苦有深切体会，披阅较富而又有闲的晚年才有可能。所以说《聊斋杂记》的写作当晚于《农桑经》和《日用俗字》的成书，也是有据的。这两部书都是初级课本，编纂完整，有题名及序跋。而《聊斋杂记》独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它原来都是有的，前面的书名和序文都遗失了，留下的是个没有开篇的残本；一是它未来得及题名作序，还只是一部集结原始资料的稿本。看目前的残本，前一种可能性大些。因为它是一部经过编排、体例明晰的手辑稿，而且它的内容（如下册所记的“书斋雅制”、“书画装潢”、“锻铁论铜”、“审石辨玉”，都是高一级的论述）就解决“乡邻之急”来说，连“花谱”、“蔬谱”也没有“农桑耕田”更为重要，蒲松龄当然要把它放在《农桑经》之后去整理。故此书的辑成最早不会在《农桑经》之前，是无可疑议的。如果把这部《聊斋杂记》和《农桑经》、《日用俗字》、《药崇书》互相组合排列，恰恰是蒲松龄晚年献给故乡农民的一套“治生实用丛书”，而《聊斋杂记》当是其中最后的一种，也是最高层次的一种。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2期）

《聊斋杂记》〔清〕蒲松龄著，辽沈书社1987年4月出版，定价100.00元。

## 取千古之极 撷万国之宝 ——读《世界神话辞典》

高楠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我得到了一部《世界神话辞典》，它那精美的装帧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无心去查什么索引，只顾信马由缰地翻读下去，那斑斓奇异的神话世界以及广博的神话知识，真正地使我爱不释手了。

学术课题的解答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但随着一些课题的思索，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即课题的多角度突入，开掘到一定深度，便很难绕开神话这个共同的“结”。这个“结”又是一个裂变力极强的“核”，它裂变的巨大能量，如这部辞典的主编鲁刚在“前言”中所说：“作为文化因素，神话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类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就拿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那几乎是贯穿始终的“天人合一”的基本范畴，那阴阳五行万能万有的推衍，以及那自强不息的精神，韧性极大的血缘纽带等，差不多都可以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找到它们的初模。而只要把这些神话再与希腊神话作以比较，后者那巍峨的奥林波斯神系，众神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等，则又正为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希腊文明提供了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伦理的、崇人尚理亲和自然等众多方面的“原型”。近几十年来，世界学术界的不少名家抓住了神话与人类文明的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呕心沥血地探究，树起了以神话为基石的学术丰碑。人类学的巨匠弗雷泽，在他的名著《金枝》中通过以巫术为中心的仪式、神话和民间习俗的比较研究，确立了巫术交感原理。弗雷泽的神话研究启示了后来的一代学者，酿出了叱咤风云的“剑桥学派”。至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雅各布逊、乔姆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它们对于神话的热衷和取利于神话的学术成果，更是广为人知的事了。

然而，收集神话资料却不是一件容易事。神话类出多门，千姿百态，而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又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神话，这真可以说是繁星也散若群星。我曾对神话多渠道地做过收集，所得却相当有限。长久的渴求和寻觅，一朝得到了这样一部汇聚 5400 多个词条，广布为 10 个门类的《世界神话辞典》，我怎能不深为赞叹、爱不释手呢？它是我国对于世界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填补空白的大部头，同时，它也为我国人类学、文化学、美学、思维学、艺术论、哲学、宗教学等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蕴含丰富的宝库。

这部辞典具有很高的编写质量，它的内容覆盖面甚广，涉及到亚、非、拉美、欧等世界各大洲，并把重点集中在有代表性的几个大区域，如德意志、俄罗斯、希腊、非洲、印度、意大利等等，还汇集了不在少数的宗教神话。不少条目的内容是鲜为人知的。这使这部辞典的价值甚为可贵，称得上取千古之极，撷万国之宝。阅读者怀此一部，便通览世界的神话大观，或是研究，或是涉猎，或是引用，尽在其中。特别是很多重要条目，如“中国神话”、“日本神话”、“印度神话”、“希腊神话”等，都是概述了神话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称得上精粹二字。比如“希腊神话”，撰写者概述了希腊神话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纵与横两个方面介绍希腊神话的内容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了它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根据；对于庞杂的希腊神话内

容，撰写者一方面对之探本溯源，运用众多资料去追寻其独特的生态环境的根据，一方面立足于当代神话学的高度，对之梳理，揭示其内在结构，指出希腊神话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按其结构又分为六大系列，如神谱系列、特洛伊战争系列、忒拜系列、阿耳戈诸英雄远征系列等；撰写者还致力于揭示出希腊神话由盛而衰的内部规律，力求对之作整体的、科学的把握，比如谈列奥林波斯后期神话时指出它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是失去了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庄严性，二是走进了艺术创作的领域。在这类条目中，显示出了撰写者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归纳、综述的功力。“中国神话”一条，由袁珂先生撰写，他以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雄厚基础，对中国神话进行了很精辟的概述，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可分为物活论神话和万物有灵论神话两个阶段，图腾主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后一阶段的中心内容；撰写者又指出了中国神话片断零碎的特点，分析了这一特点的原因，一是中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二是受重实用、黜玄想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压抑；在此基础上，撰写者又由源及流，指认中国神话的“流”包括历史人物神话、仙话中的神话、佛经人物神话、民间流传的神话、地方志色彩的神话、神话小说六个方面。这类条目，具有根强的知识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辞典中神话故事的条目、神话事件的条目、神话人物的条目，则细密地编就了世界神话的网络，它们以国别神话条目和民族神话条目为纲，编织了极为丰富的世界神话内容。撰写者占有资料之丰、之细，是令人赞叹的。

正在我为《世界神话辞典》写这篇文章时，一位迷恋着诗神的朋友来了，他已是有了些名气的诗人。他惊喜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这部辞典上，并说他一直在索购这部辞典，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我问他难道这里也有诗的灵感？他啊啊地慨叹连声，说岂止有灵感，更有涌荡不已的诗的感情和取之不尽的诗的符号。接着他就谈屈原，谈庄子，谈李白、李贺以及郭沫若，断言没有神话的滋养他们的诗作就准会像停了电的日光灯。并且，他随手从这部辞典中翻出几个条目，说你看这能唤起多少原始生命的奇妙想象！若不是我正写着这篇文章，这部辞典就要和他一起离去了。

（原载 1990 年 3 月 11 日《辽宁日报》）

《世界神话辞典》鲁刚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出版，定价 30.00 元。

## 分类系统简明诠释简洁准确

——评《唐诗宋词分类描写辞典》

屈 陈

由关谨、朱炯远、张家鹏、王文衢四位同志主编的《唐诗宋词分类描写辞典》，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独辟蹊径，选目精详，分类明晰，诠释简洁，为我们了解掌握唐诗宋词中的名句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当要查寻某一类别的名句时更能显示出她的独特的功能，是一部非常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书。该书具备以下特点：

一、资料宏富，涉及面宽，内容上有新的开拓。编者非常注意“突出广泛性和系统性，以保证其应用价值”（见本书《前言》）。他们从《全唐诗》、《全唐诗外编》的5万首左右诗歌中以及《全宋词》、《全宋词补辑》的20800余首词作中精心筛选出6000个或在思想性上或在表现技巧上有代表性的佳句，其中既含有妇孺皆知的一些大家巨匠之名篇中的名句，也含有一些鲜为人道的中小作家乃至无名氏作者的锦言妙语，内容含量极其丰富。

二、分类系统简明，具有科学性，便于利用。该书在精选辞条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比较合理、系统、详明的分类。总设“绘景状物”、“场景记叙”、“人物摹写”、“情感抒写”、“谕理警世”五大类，每大类下设小类，有的小类下又分项，共64小类，246项。这样，读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位在计划生育部门工作的朋友知道笔者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问起古典诗词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条目。因从未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一时难以答出。待得到此书后，一查目录，见“谕理警世”大类中专门设有“节制生育”一小类。余如获至宝，忙按页查索，得四条八句有关于此的材料，在内容上亦各异，其中有规劝人要少生儿女的，亦有提出要带好子女教育的，还有优生优育，男女都一样的观点。若非此书，查找这样的四条材料恐怕也非得翻遍《全唐诗》不可。

三、释语简明准确，不但有很强的实用性、可读性，而且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本书一些条目的释语中不时可见编者的独到见解与学术功力。如大类“场景记叙”中有“节日场景”一小类，其中“中秋”一项中有这样一条：“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见668页）编者释道：“这首诗是初唐人李峤所作，是最早的中秋咏月诗。”这种结论看似简单，但需要掌握历史上有关中秋咏月诗的全部作品尤其是唐以前的所有诗作方敢下此论断。余曾疑于是论，查初唐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及中唐人徐坚的《初学记》这两部影响甚巨的类书，不但未得有关诗句，“岁时部”中就连“中秋”一条亦未设置，故编者的结论当是可信的。另外，本辞典的释语也简明洗炼。如对秦观《鹊桥仙》一词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解释：“美满、高尚的爱情贵在忠贞笃实，心心相印，而不表现在夫妻之间朝夕相伴，踪影不离。这是以反问句式说理，语气坚定，令人首肯，很有说服力。可以用来劝慰人们不要因与爱人暂时两地分居而痛苦。”（见1074页）第一句释义，准确简洁；第二句指出表现方法上的特点；最后一句阐明其对人之感情上的陶冶作用。言简意赅，无一赘词。另外，本辞典也注重思想教育的内容。“情感抒写”大类中设有“爱国忧民”一小类，共收辞条107个。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就会被众多诗人的炽烈的爱国热



情所感染，坚定我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信念。

当然，此书亦有尚未完备之处，如在内容方面有的重要条目漏选，在编排体例上也有欠妥之处，等等。虽属瑕疵，亦应指出。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唐诗宋词分类描写辞典》关滢、朱炯远、张家鹏、王文衢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定价13.10元。

## 一挥彩笔写青史 ——《皇太极演义》读后

宁殿弼

读罢《皇太极演义》，掩卷思之，那大凌河畔千军万马浴血厮杀的场面，那铁牢里被幽禁的一代名将袁崇焕的悲愤呼喊，那崇政殿前诸亲王争夺皇位的刀光剑影，一一犹在目前，心潮难平。

全书以清王朝的开创者清太宗皇太极一生文治武功为主线，描绘了明清两朝更迭期大大小小的战争，为许许多多际会风云的历史人物造像，折映出明末清初天翻地覆的壮阔的历史画面。书中摄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主要活动大都以信史为据，于史有征，同时又参照了《清朝野史大观》等轶闻、传说，在不违背历史精神的原则下作了大量的虚构和发挥。作者史实虚构之间把握了适当的分寸，并使二者有机统一，浑成一体，如划水无痕。所以读来既可以视为一部可靠的历史教科书，从中了解明清两朝的兴衰嬗变史，以史为鉴而知兴替，又可以当作一部历史故事书，从中获得审美快感，消遣娱乐。

满、汉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导致了清立明灭。关于这段历史的评价是连史学家也感到棘手的问题。本书贵乎作者能站在当代意识的制高点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审视历史的民族战争，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给予唯物辩证的公正评鹭。书中的历史人物各有其声容，各有其神韵，给读者留下历久难忘的印象。

在文体上，小说采用传统历史故事演义的章回体，将章回体的传统手法和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相结合，使该书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的艺术传统：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有致，悬念丛生，引人入胜，结构严谨，语言流畅。人物刻画以少胜多，以简驭繁。

该书作为满族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满族历史生活，必然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浑厚粗豪，雄强向上。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与满族的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的。小说对满族宫廷礼仪、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风俗的细节描写都准确逼真，声态并作。我以为不足之处，也许是限于篇幅之故，一些重要人物、场景的勾勒线条嫌粗些，缺少工笔雕镂，不少关节点着墨不足。此外，写征战杀伐篇幅过多，相对而言，写日常生活的篇幅偏少，因而情节显得不够摇曳多姿。

（原载 1990 年 4 月 4 日《沈阳日报》）

《皇太极演义》祝广仁著，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定价 3.60 元。

一份珍贵的财产  
——贺《李平凡画文集》获日  
中艺术交流中心金奖

子 木

中国创作木刻，和由此开展的新兴版画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谱写了美术同革命相结合、美术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恢宏史篇，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国际性。这部现代史的端倪，即见于鲁迅先生创办的、由日本内山嘉吉先生执教的“木刻讲习会”，可谓开辟伊始，便架起了中日版画艺术交流的桥梁。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版画界人士频繁地进行民间交往，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未曾间断，因此，在建设中国现代版画史料出版体系的时候，中日版画交流的内容是选题计划中不可缺少的，理应以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载入艺术史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辽宁美术出版社纳入现代版画史料体系出版的《李平凡画文集》，不是一部普通的个人文集，它所辑录的从1943年的《浮萍集三辑序言》、1945年的《日本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宣言》，到1987年的《中国群体版画为国争光》，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和新中国成立后中日版画交流活动为主体的84篇文章，是40多年来中日版画交流历史的见证，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本翔实资料。它从文化交流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头50年国际性的丰富内涵。著名版画家古元教授以《有源之水，奔流不息》为题作序，出版后受到国人的好评。不久前被授予辽宁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同时也博得外国友好学者，特别是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的高度评价。为表彰这一出版工作的贡献，1989年11月中国版画交流考察代表团访日期间，特将日中艺术交流中心金奖授予中国辽宁美术出版社。该文集的责任编辑李宝义也同时荣获日本麟馆美术馆文化贡献奖杯。由此可见，辽宁美术出版社的现代版画出版体系，在80年代中取得了可喜可贺的社会效益，为国内外读者所瞩目。

这部重要著作的编者，是李平凡先生的夫人周燕丽女士。他们相识于日本，50年代初双双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编者在后记中记录了成书的过程与艰辛，由于经历了十年浩劫，“两次被撬门抄家，我所保管的一切资料全部荡然无存了。因而这册画文集有关资料的搜集工作，确实用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熟悉编者的朋友会同我一样感到：周燕丽女士，与其说是这部书的编者，不如说是作者之一；她不是局外人，而是作者社会实践的当事人之一，是这部历史的见证人。

作者李平凡先生，天津人，1938年开始艺术生涯，1943年在日本创立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1945年扩大为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1948年8月，全木协理事会决议在日本筹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李平凡为责任代表。为了这项事业，他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下，40年奋力不已，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丰厚业绩即见诸于此书。正当这部书脱稿之际，1987年8月13日下午，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向李平凡先生赠授“日中艺术交流特别贡献纪念金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隆重举行。一小时后，中国版画家协会等方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欢迎日本国教育版画协会访华团的时候，又见到了李先生组织活动的身影。李平凡先生现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版

画世界》主编、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是著名的版画家。他的作品《我们要和平》1959年获莱比锡版画奖，中央电视台拍过专题片《李平凡画盘》。然而，了解内情的朋友却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艺术活动家。这些年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和艺术交流活动中。年逾花甲（六十有八），腰病常痛，迄今仍不辞辛劳，终日忙着为他人作嫁，在中日艺术交流的旅途上奔波。我以为用“坚实的路，友谊的桥”两句话可以概括这部文集及其作者。正如日本朋友小野田耕三郎在《诚实、真挚、坚韧的艺术家姿容》一文中所断言：“这本画文集，对于热爱版画艺术的日中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份珍贵的财产。”

（原载《美术之友》1990年第4期）

《李平凡画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定价12.00元。

## 十七岁，多变的春天 ——介绍《社会问题小说选》

佳 平

东京，傍晚6点。K会馆准备举行一次重要的商务性会议。一个少女从容地走到一楼大厅的沙发上坐下。一会儿，一辆大轿车停在门口，走进一位英俊魁伟的中年男子，他是梶川，少女走过去，两人小声说了几句，然后走向侧厅。不久，少女跑来告诉守门人：“我把他杀了，请叫警察来！”这就是《社会问题小说选》中《早春的故事》（赤川次郎著）的开篇。

接着，作品以第一人称倒叙的手法，向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冲野瞳生活在一个中层阶级家庭，成员有父母和姐姐。父亲在札幌工作，很少回家。一天，瞳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给冲野的电话，因瞳声音像妈妈，她误以为是打给妈妈的。于是她按约会地点去了P旅馆。由于她付饮料费钱不够，一个男人主动帮她付了款，从声音中辨别出，他就是那个要追踪的男人。以后，瞳以还钱为由找过梶川，从此开始了矛盾、迷惘的交往。小说的另一条线写了妈妈的活动，妈妈经常很晚回家。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是从札幌来的爸爸的相好，是来找妈妈摊牌的。但她仍以为梶川是妈妈的情人。她想：也许是妈妈太寂寞了吧？后来，一个意外的小情节使她明白了梶川是她姐姐的情人。姐姐由于流产，由于感情的绝望，竟然跳楼……瞳再次找到同样拒绝了她的梶川，于是，发生了前面的故事情节。

《社会问题小说选》中的另一篇作品《孤独的石林》是日本当代女作家三浦绫子的力作。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出色：一个女孩子凭借自身的单纯和美好，极力维护自己家庭的美满。当她发现妈妈一个人抽噎，一个人喝酒，而爸爸又一个人呆坐书房的时候，她不解、迷惘，甚至惊恐。由此，小说展开了委婉曲折的叙述。作品文笔细腻、优美，情节入情入理；主题深刻积极，展示了人性美的巨大魅力。

收选的另一篇作品《燃烧吧，黄花》为佐伯千秋所作。作品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写了一对少男少女生活和感情的经历，暴露了战争的恐怖和可憎。

赤川次郎、三浦绫子和佐伯千秋都是日本畅销书作家，尤其擅长写反映社会问题的青春文学作品，从艺术风格和作品特点来看，三位作家文笔流畅，构思新颖，描写逼真，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动人。在日本，这几篇作品吸引了无数痴心的读者。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原载1990年5月6日《辽宁日报》）

《社会问题小说选》王敏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定价2.75元。

## 哈哈一笑回味无穷 ——读庄大伟的《幽默故事集》

王瑞起

幽默是智慧的闪光，它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让生活充满笑声；它会让你对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让你笑着同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告别；同时，又可以让你在哈哈一笑中消除疲劳，驱走苦闷和烦恼。

庄大伟同志的《幽默故事集》，是他多年创作幽默故事的精选本。其中包括三个中篇和十六个短篇幽默故事。这些作品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比如《滑稽歌手吕品品的趣闻》，写了著名歌星吕品品在歌唱中打了一个喷嚏，一批歌迷掀起了一股模仿吕品品“喷嚏演唱法”的热潮。“喷嚏”竟领导了歌坛新潮流。于是，大街小巷充满了喷嚏声；商店里摆上了新产品——“喷嚏激发剂”；医院里排满了等待作“喷嚏鼻”手术的歌迷……工程师牛犇犇发明了一台“美容机”，竟然把所有的女人都变得和女子健美大赛夺冠者林森森一模一样，结果引出了一连串的笑话，造成了一片混乱。照相馆取消了女子照像业务，专门出售林森森照片；女式服装柜台前空前冷落，因为不管衣服是什么样式都分辨不出谁是谁；有些坏女人竟冒充他人乘机诈骗行窃……作者以极其幽默风趣的语言叙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其情节夸张大胆而又贴近现实生活，无情地针砭了盲目崇拜、一味模仿、追赶时髦的社会“流行病”，把生活中的美与丑拿到“放大镜”下给人们看。

《长脚罗丝的故事》、《诸葛皮皮的妙计》、《让大人们委屈一天》、《当没有？的时候》、《小迷糊长大以后》，写的都是青少年朋友非常熟悉的题材。这些时时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我们常常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然置之，然而经过作家的艺术处理之后，读者却会突然猛醒：啊！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原来蕴含着如此鲜明的美与丑呀！

这本集子所收入的作品，想象奇特、构思新颖、夸张大胆、寓意深刻、妙趣横生，读后令人忍不住捧腹发笑。然而，当你笑过之后，留下的却是不灭的智慧和哲理。

（原载 1990 年 6 月 30 日《辽宁日报》）

《幽默故事集》庄大伟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 6 月出版，定价 1.35 元。

## 展现古代人民爱情史心灵史的巨卷 ——读《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

钟林斌

《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共收入自先秦至清末的有关爱情婚姻的诗、词、曲近千首。入选的作品中有相当数量的民歌，包括诗经、楚辞、南北朝民歌、敦煌曲子词、明代山歌等不同时期的民歌中有代表性的优秀篇章。文人的作品收录 300 多家，除了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煜、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彪炳史册的大家之外，还有一大批言情高手。辞典还选入如汉武帝刘彻、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这类帝王的情诗。总之，从辞典选目可以看出主编眼界开阔，思想解放。

这部辞典的撰写队伍的阵容相当可观，有 30 位教授领衔撰稿，其中多位是学术界耆宿，如余冠英、周振甫、萧涤非、张震泽、霍松林等，恕不一一列举，老作家、老学者俞平伯先生也为辞典撰写了条目。老先生们积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倾注于某一名篇的鉴赏，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们的鉴赏文字本身就值得鉴赏。参加撰稿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亦多有发明。撰稿队伍的整齐，使辞典的编写质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辞典与鉴赏，似乎是难以相容的。辞典要求准确、规范、客观，而鉴赏则往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这部辞典努力使两者相互包容，既不失辞书的严正，亦富有鉴赏的洒脱。这是因为条目写作相当注重作品写作背景和本事的简明确切的介绍，尤其重视语义流变的考察，避免望文生义的弊端，从而给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撰写者如游人的向导，引导读者去领悟不易发现的意蕴，去观赏心灵王国的奇花异木。不妨以俞平伯先生撰写的《羽林郎》鉴赏为例，他先指出这首诗“陈古刺今”，“与《三百篇》之义相合”，然后引述《霍光传》、《窦融传》中贵戚豪门纵奴欺凌百姓的史实，以证明《羽林郎》如同汉乐府其他作品是“申诉人民大众的疾苦的”，接着对“很容易引起误会”的“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作出了独到的解释。

这部辞典装帧精美，封面有赵朴初先生题签，护封画为唐·张萱《捣练图》，环衬画为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典雅、优美。七幅插图均为古典名画，情韵无限，与爱情诗词辞典的总体格局极为和谐。

（原载 1990 年 11 月 20 日《辽宁日报》）

《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李文禄、宋绪连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定价 24.00 元。

## 一个活灵活现的雷锋形象 ——读《我们的朋友雷锋》

胡世宗

在 90 年代第一个春天即将来临之时，部队作家陈广生的纪实文学新著《我们的朋友雷锋》，给我们提早送来了三月的春风。

《我们的朋友雷锋》，着力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面貌清晰、亲切可爱的雷锋。

这部有关雷锋的新著有许多资料，特别是一些生动的生活细节是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比如关于雷锋母亲的身世，关于雷家当时的生活情形，作者的考证并不是多余的。当时有“女人下了田，肥田变瘦田”之说。但雷家男人不在家，公爹年纪大，雷母只好下田；下田又怕人说，只好夜间去干，夜里田间蚂蝗极活跃，只好认叮认咬。雷母平时干活，腰间总系着一条深蓝麻花布围裙，长长地拖在脚面上，做工极精细。围得时间久了，颜色洗淡了，又划了两个破口，该换条新围裙了。结果，雷母一夜之间把旧围裙浆洗了一遍，然后用深色布头剪成两只展翅的燕子，把它镶嵌在旧围裙的两个破口处，比新围裙还好看……从这些文字可看出雷母的勤劳、节俭和对生活无比的热爱。而这样一个女人丢下七岁儿子雷锋寻了短见，就尤其令人痛心。

作者写雷锋在鞍钢时，老工人李师傅请雷锋去他家过春节。包饺子时，李师傅老伴把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结果，李师傅吃到那枚硬币，大家说他有福。李师傅说：“我是一家之主，我是有福人，全家都有福……雷锋不是外人，我说全家有福也有他。”使我们看到老工人对雷锋亲如父子般的关怀照顾。

书中还写到雷锋刻苦读书，学跳交际舞，参加高跷队扮小姑娘等许多处于青年时代的雷锋的趣事、秘事。特别是写到易珍姑娘对他的亲近爱慕之情。雷锋为了不叫公家水泥被雨淋了，竟把自己的被褥抱去盖在水泥上。易珍在给他拆洗被褥时发现经雨水浸泡的棉絮太硬，竟悄悄把自己柔软的棉絮同雷锋的换了个过。易珍以为男同志再精明也有粗心的时候，没想到雷锋心里清清楚楚。雷锋想的是还年轻，谈这事是不是早？参军后继续互相关心……读了雷锋的这些在《雷锋的故事》里不曾写到或不敢写到的往事，让人觉得雷锋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青年人，他受到人们的崇敬包括姑娘们的爱慕是很自然的事情。

作者写这部书时不是冷静客观地旁述，而是把作者自己“摆进去”，把作者本人同雷锋的交往，同雷锋亲友、同学、老师、工友、领导的接触，即采写雷锋事迹的过程，有选择地“和盘端出”，给人以真切、热情、诚挚之感。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用优美的散文笔调来描叙一些美好往事。比如《可爱的红花草》一节，写被雷锋称为“健姐”的一位曾与雷锋姐姐相处的女大学生的回忆，情景交融，充满了诗意。

《我们的朋友雷锋》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有意义的新书。让我们把雷锋看做是有血有肉的朋友，而不把他看成是高不可攀的雕塑吧！

（原载 1990 年 12 月 26 日《新闻出版报》）



《我们的朋友雷锋》陈广生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  
定价 2.80 元。

## 《北方女孩》絮语

荒 原

最初解读王素英的散文还是在 1984 年。她描绘的辽南风情使我感到亲切，每读她的散文便让我立于温馨的春风里，谛听茅店鸡声乡俚软语。她那清新素秀的文字总让我觉得眼前片片青蛙株株桃花。如今，手头上有了她一本《北方女孩》，这是她 16 年来散文创作的撷英。

《淡淡的花椒香》讲了乡下一位小脚老太太和一包花椒的故事。这故事可归属于素素散文逶迤至今的主要母题——乡情（她在这一母题上作了至少二十几篇文章），这里却包含着真善美的品质，它给人的启示，给生活带来的欢悦。

1987 年以前，王素英写进散文的大多是这些“轻淡的、微小的”事物，是一个乡间女孩到现代都市读过几年书之后对童年与少女时代的顾盼回眸，以及此种纯情的延续（《故乡小景》）。想起儿时的恶作剧，彼此都觉得有趣，同时伴着异样的亲切感。斜雨迷濛，敲打着纯朴的记忆……（《小雨又飘来》）。能从这些平常琐事中发掘出美好的情致，让人从作者一己之体验中感觉到共通的趣味，这便是散文的妙处了。十几岁的女孩儿不肯用夹桃花染红指甲，却常把痴痴的梦境投向通海的小河。看着白鹅在河上中游，就恍然自己也成了只小白鹅（《小白鹅的梦》）。这情状倘若弃却了社会的背景，做为成年女子烟雨楼窗里的遐思，是不是有净化心灵的妙处？柔媚而不故作，充溢着女性的宁静，乡情童趣便成为现代人精神世界极为珍贵的一隅了。

如果说在素素前期的乡情母题创作中还较为充分的显示出与传统散文的因承关系，那么 1987 年以后，以“素素”为笔名发表的一批作品则表现为对往昔的超越。这种超越集中体现在一些短章和“女人书简系列”里边。

素素有些千把字的短章弄得极精致。已逾而立的年龄不比少女的罗曼，与年轮一同刻下的是人生的体验与沉重。素素却是以她成熟女性的情怀，把美与沉重本能而自然地调配在一起，从而让那些短章成了情与理合铸的微型“能量块”。从前她几次面对所敬爱的师长友人而忘记献上束美丽的鲜花。她为此苦苦自省：“我和许多人一样，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事做得很实。是不是我的素质里原本就缺少某种东西？”（《读一束花儿》）岁月带给了她把什么事情都想弄清楚的欲望，而弄清楚之后却是沉重。沉重使她知道了“春天里发生的有婚礼，也有葬礼”（《春之踪》）。短章并不好写，长文有时还可造些假，短章小品则全然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高低雅俗一目了然。

应该说，“女人书简系列”使素素的散文创作进了更高层次。收在书中的 8 篇作品都在强化着一种精神：现代大陆女性的新态。因为是书简，故事与语言便在“你”“我”之间织就情意十足的纽带。诗化的语言，真实的情感，入微而新鲜的女性心灵的展露，使这一组散文真正属于了今天，也使素素的创作从自我心灵走向了他人的心灵。

（原载 1991 年 1 月 22 日《辽宁日报》）

《北方女孩》素素著，大连出版社 1990 年 2 月出版，定价 3.50 元。

## 深情款款，道来似水流年 ——读素素的《北方女孩》

凤 子

最初，是被那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了香味儿的封面所吸引。淡紫的天幕下，《北方女孩》由大连出版社引荐，款款地向读者走来。随后你会出乎意外地发现在作者本身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情感渲泄面前，读者竟也会由不自主地一发不可收。套用素素化了的语言，我们这样发问：这是种温柔得让人无法拒绝的温柔，你能拒绝吗？

“一片清纯、一片温柔、一片女人味道”，也许这就是素素散文所追求的风格，说它们像花吧，好像少有鲜亮、浓郁，看得出作者在刻意把香浓的意境化淡；说它们似雾吧，却又真切地几乎可以触摸到那份情感。散文内容不拘，素素的《北方女孩》是以写人为主的。即便看上去纯粹为写月亮、写文竹、写姐妹楼，作者的笔下都少不了人影在晃动。《北方女孩》还有一个最鲜明也最吸引人的特征：那就是这本散文集几乎每一篇都选用了第一、二人称。这一下子就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不管你在哪种情绪下去接触素素的文章，你都会很投入。譬若在灯下说你说我，灯心如豆，而情深似海；宛如相隔千里的通话，虽然电话里淡化了情节，却具备了电传的磁力；如同迷惘痛苦里飘过来一句“怎么了？请放宽心”可以稀释一切。素素通过对人的描写来表达她的赞美和珍惜，哪怕是阐述她的孤独概念，到了她这儿也变成了美丽的孤独。《你的星座》里，素素描写的是一个残疾而又有作为的女记者形象，匆匆相聚，匆匆别离，“两个九年只见过两次面的女人，只靠可数的几封信和交换偶尔发表的几篇作品，互相就没有失去朋友”。这是怎样淡而又浓的友谊。友谊的定义并不在形影不离，思想与灵魂之间拥抱才是友谊的基石，可惜很多人却忽略了。当然“宇宙里，一颗星有一颗星的位置，大千世界远没有绝对的亲密，千千万万个孤独，组成了千千万万个星座，于是才有了永永远远的辉煌……”前面还有一点悲剧式的凄迷，到最后作者又笔锋一转把低调提高了。这里是否有惯性在起作用呢？《没有爱情》里那个一面之交的香港女商人，素素告诉她“女人不能没有爱情，季节来临时，你不要拒绝”。素素永远是乐观派，她的文章正如别人评价她的人一样——浪漫的现实主义。“等待很苦，等待的时候朋友会一个一个地来，也许爱情永不光临，但你就永远等待，等待最美”。难得的是素素的散文始终在赋予人依然倔强的勇气。一个人对社会宽容，那么生活在她的眼里便是美的，用真情去体会，似水流年里自有感人至深的内容。

作者来自北方，无疑传统在文章中的烙印强些。《北方女孩》没有现代化了的朦胧或象征，形式和内容哪个更重要，似乎还未来得及讨论这问题。一个为感情而南下深圳，结果感情失意，事业成功的北方女孩已站到面前。“你知道了生活不都是浪漫，终于用北方独特的灵性和气质，漂亮了整个南方”。也终于知道了，“来这儿原本就不是为了他，女人也可以冒险，既是冒险，那就永远不要沮丧”。素素的话既送给北方女孩，更是送给天底下所有女性的。生活的美，不只是被动地品尝才得到的，更多的是在积极的奋斗中获得的，只有那样，深情才会更浓。这深情在那篇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母爱的《平常心》中再也无法淡化了。作为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妻子，还是事业

中人的素素，没有抱怨，虽然“我感觉我背负的是座大山”，但没有沮丧，而是充满了自豪自强，乃至生活的点滴，都因这份自豪变得美丽，真正的女强人桂冠，并不是属那些仅仅事业有成者，而属于生活事业双丰收的母亲妻子们。

《北方女孩》里的一切全都来自生活中的平常琐事。有大有小，有远有近，不管是城市的、身边的，还是乡村的、域外的。作者都用全身心去领悟，撷取最美的奉献最真的，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即便是几岁孩童的话也不全是莽撞可笑的。生活是平淡仓促的，其中不乏激越和丰富。如果你献上一份真切的爱，掬上一捧诚挚的感情，那么世界在你的眼里变得像《北方女孩》这本书一样——美丽一些！

（原载 1991 年 6 月 10 日《书讯报》）

《北方女孩》素素著，大连出版社 1990 年 2 月出版，定价 3.50 元。

## 填补我国色彩学空白的巨著 ——喜读李桢泰先生的著作《色彩辞典》

乌密风

早就听说李桢泰先生著的《色彩辞典》要出版了，真正看见这部精装书，是在一次出版会议上。当时深感著成此书确非易事，为李先生的事业成就而欣喜。我与李先生共事 40 余年，早在 50 年代，他已着手研究，决心要在色彩方面做些工作。他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有的著作在“文革”前已形成了初稿，当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与我商讨，我对他的谦虚精神，坚实的文史与外文基础，以及他那种顽强的毅力，十分敬佩。不幸的是李先生本人，连同他的科研成果，均被浩劫摧毁。“文革”后李先生已接近 70 高龄，仍然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著书立说，终于完成了这一巨著。

李桢泰先生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教授，中国著名的色彩学专家。他 1941 年就学于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著名画家和色彩学家和田三造是他的导师，这对他毕生从事色彩学研究极有影响。李先生是中国流行色协会顾问、中国光学学会会员、中国颜色光学学会专业委员，1982 年赴日本东京作颜色光学学术考察。他精熟中外色彩的学术发展，对中外色彩学研究功底深厚，研究范围涉及到物理学、光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以及史学众多门类。加之他博览群书、识多见广、深入钻研、广征博引，从而使这本《色彩辞典》的论述、考证、色贴严密可靠。

色彩学这门科学，是一门具有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基础的学问，它涉及面很广。美术家总结出色彩表现对象的形体、结构、空间、位置、质感等的绘画色彩体系，以及色彩在美化人民生活上的装饰色彩体系。色彩学从古到今，都是人们离不开的一门重要的视觉科学，它关系到物质、精神两个文明，渗透到人类生活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色彩定名标准化、科学化在色彩研究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国内外曾有许多色彩学家作过专题研究。国际用的色彩表示方法（色立体）提供了科学的色彩体系，只要知道某种色彩标号，就可以从色谱中迅速正确的找到。解决了各种色彩系统性分类，对理解色彩的组织很方便，在使用色彩上考虑其调和对比关系也很有帮助。使生产、印刷、管理各方面用色方便，标准化。色彩名称用符号来代表，有时不能满足要求，要传达色彩所含的特殊气氛、色彩的感情，对色彩名称使用文学意义的色名，或科学化色彩体系定色名，是极为必要的。如传统习惯上用固有色定名，玫瑰色、橄榄绿、柠檬黄、胭脂、朱砂、石青、石绿、湖蓝，或者如现代以流行色的定名，珊瑚色、银影色、自然色、宇宙色、海滩色、敦煌色、唐三彩色，从而增加对色彩的新鲜感、亲密感。按光学化体系定色名，也是色彩学上常用的色卡名称，有红、黄光红、黄、黄光绿、绿、青光绿、青、青光紫、紫、红光紫等。除此以外，还有以象征性、趣味性定的色名。红色有谈红、绯红、猩猩红；黄色有卵黄、丹色、金茶、雌黄；蓝色有绀色、纁色、水色、空色等；紫色有薄紫、藤紫；灰色有红挂灰、豆灰、绯灰、鸠羽灰、葡萄灰等。还有按地区、习惯性定名称。总之，色彩的种类有千万种，色彩的名称也是多样、复杂的，把全部色彩用语言或文字来传达，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目前在色名上色立体与标准色贴同时存在。

《色彩辞典》收集了各门科学总结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科学、扼要的编排，并有多方面的色彩资料介绍和使用色彩的经验总结，是我国第一部色彩辞典。《色彩辞典》的编辑出版为我国色彩学科填补了一项空白。

《色彩辞典》色彩名称以八国文字注释，共有色卡 354 种，色卡按七色的轮排列。全书内容共分两大部分，除“标准色贴”外，附有“色名对照表”。“色卡解说”包括色名定义、外文色名、色彩事典、现代工厂染色、色彩性格等五个部分。

《色彩辞典》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它将为中外文化交流、繁荣贸易往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原载 《美术之友》1991 年第 1 期）

《色彩辞典》李桢泰著，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定价 500.00 元。

## 《曲式与作曲技法》评介

钱仁康

和声、复调、配器和曲式常被称为作曲技术理论的“四大件”。称为“技术理论”，说明这四大件既不是单纯的技术，也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指导作曲技术的理论。曲式是音乐作品的结构模式。在宏观方面，各种作品都有共同的结构原则和结构模式，如一部曲式、二部曲式、三部曲式、复三部曲式、复二部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奏鸣曲式、奏鸣回旋曲式等等；而在微观方面，则每一个作品又各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作品的表现手法和结构细节。如果分析一个作品不去注意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和结构细节，只是数数小节、画画aba, abca之类的结构图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一个作品的结构原则，也不可能起到指导创作实践的作用，而只能是一种无神实际的空头理论。当然，具体作品特有的表现手法，是和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息息相关的：但所谓创作风格，不管是时代风格还是民族风格，不管是一个乐派的风格还是作曲家的个人风格，说到底，无非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乐派或不同作曲家的表现手法的体系。

夏中汤副教授为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编的《曲式与作曲技法》一书，顾名思义，是一本指导作曲的技术理论著作，内容也确实能摆正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并做到了理论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具体表现在：

1. 分析音乐语言中各种要素（旋律线、节奏、节拍、调式、调性、和声、复调、音色、音量、速度、音区、织体和演奏法）的表现作用。不仅是开宗明义第一章的主旨，也贯穿在每一章的音乐分析之中。

2. 讲述乐段（一部曲式）、二部曲式、三部曲式、复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奏鸣曲式、套曲曲式时，分别阐明了各该曲式的表现功能和各种类别。过去音乐学家对曲式的分类，人言人殊，特别是回旋曲式的类别分歧最大。夏中汤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澄清了治丝益棼的现象，把回旋曲式分为严格回旋曲式、自由回旋曲式和回旋性二重曲式三类，以与变奏曲式的分类（严格变奏曲式、自由变奏曲式和二重变奏曲式）相对应，有其独到的见解。

3. 讲述以上各种曲式时，还着重阐明了整个曲式和曲式各部分的创作手法，寓作曲技术于曲式学之中。

以上所说，不过是《曲式与作曲技法》一书的特点和优点的一部分；因为书中除了欧洲体系的传统曲式学内容（第一至十一章）外，还把分析的对象扩大到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第十二至十四章）和本世纪的十二音音乐（第十五章），并介绍了奥地利音乐理论家申克的分析体系（第十六章），以适应今天曲式与作曲技法的教学需要。就是在前面十一章中，示范分析和分析作业也已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扩大到西方现代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拉威尔、巴托克、柯达依、米亚斯科夫斯基、普罗柯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恰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奥涅格、格罗菲、查卫士等）和我国现代作曲家（黄自、冼星海、马思聪、李焕之、丁善德、王云阶、吴祖强、瞿希贤、陈培勋、杨振雄、刘敦南等）的作品，从而使这本教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富于时代气息。

夏中汤凭其长期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有利条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音

乐文化有所了解。他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地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又不断地传到中原，丰富了汉族文化。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应该包括各族人民的文化。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研究，他终于找到了中华各民族音乐结构以及不同体裁音乐结构的共性与个性；“中国民族民间曲式大纲”三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我相信这本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点的、理论联系实际教材，不仅可以满足当前教学上的需要，并对发扬民族音乐文化有其深远的积极意义。

（原载《人民音乐》1991年第1期）

《曲式与作曲技法》夏中汤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定价3.70元。



挚着生活 为情造文  
——读鲁野、康启昌散文集  
《耐冬·黄叶》

汪 聪

这本题为《耐冬·黄叶》的散文集，是鲁野、康启昌伉俪继出版《心心集》之后不到一年时间编成的。对于他们的多产，我很佩服。听说，1981年以来，他们已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达二百万言，洵属可观。纵观他们的散文作品，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与表述，不管是借助身边的草木还是头上的流云，总离不开时代在他们心灵上着染的色彩。

康启昌钟爱我们的时代，她喜欢这个时代悠远广阔的碧空，天边的红霞，空中的白云；连那绛紫色、墨黑色的积雨云，她也不怀疑那是大自然的风采。《踩神像的人》是一篇颇有特色的记实散文。散文开头引用了一个踩神像的古代寓言故事，阐明神鬼惯于欺软怕硬，“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祸之”这个主题思想，接上就讲：“胡廷范就是走在前面踩神像的那个人。他不信神，不怕鬼，不听邪，不怕硬，不会说小话，不会低三下四，所以一切灾难就难以落到他的头上。”通篇紧抱着这个主线次第展开，饶有兴味。字里行间，那颗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农村改革事业的炽烈的赤心在腾腾地跃动。

作者对他人，尤其是对青少年经常看到长处，喜其从善，赞其向上。她是教师，教书育人在《萌动的心》、《香山马车夫》、《海滨小店》、《曝光的底版》、《大衣的故事》等篇中自然地转化为写书育人。没有那种枯燥的说教，也不是板起面孔耳提面命，而是以其与青少年息息相通的心灵，以冰心对小读者般的友爱，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她的心与一颗颗“萌动的心”同搏共振。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扇形黄叶》。康启昌从丹东市银杏树的叶片想到凤城的白果树，“我和小伙伴到庙里去玩，并不因为它不结果实而稍感遗憾，倒是那层层扇形落叶反而增加了许多烂慢的幻想”。由“小扇有风，拿在手中”的扇面歌谣，想到红叶题诗的故事，又从红叶题诗的宫女，想到石评梅所著的《涛语》中的诗句：“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想到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爱情悲剧。“我的感情也像眼前的小扇低飞，旋转、沉降”，“如今它黄了，不要说它老了、衰了。它黄而能韧，不脆不糜，不萎不枯。是啊，谁都喜欢绿色，说它是生命的颜色，青春的颜色，但绿是黄的过程，黄是绿的圆满的结局。我在这片黄叶上看到了绿的萌动，也看到了绿的挣扎；看到黄的忠贞，也看到了黄的笃实。何必悲秋吊春呢？”

鲁野的散文与康启昌的有许多共同之处，难怪他们自己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仔细赏玩，二者无论是在取材、命意，还是在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这又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相比之下，鲁野更重视散文的意境。讲究立意，是鲁野散文的一个特点。他在《散文不是导游图》中突出强调了立意的深邃。他喜欢韩愈散文中的哲理。

鲁野在《哑舅》中写了两个舅舅：二舅精明能干，长于辞令，在大跃进年代，雄心勃勃。而大舅天生暗哑，默默无闻，无法用声音表达思想，却把

一腔心血倾注于反对浮夸冒进的实际行动上。二舅由于头脑发热，浮夸蛮干，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牵累全村农民都要跟着他触霉头，受惩罚：“‘南陌依稀草吐芽’，漫山的野杜鹃已在春风中绽蕾欲放了。大自然四季更迭，一如既往；然而清河堡人却被这一年来的狂热折腾得由富变穷了。常年满登登的米柜，今年到现在已经见底了。在土豆成熟以前的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人们将怎样渡过饥荒呢？”作家故意在这里设下波澜、迭宕：“向国家要粮吗？嘴怎样张？手怎样伸？再说买粮钱又从何而来呢？严重的饥荒威胁着一向积极乐观的甬河堡人。”最后还是哑舅修的那座小池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浇水灌田，使小麦丰收，解决了村民的口粮问题。作家在哑舅身上着墨不多，却异常鲜明地刻画出一位朴实可爱的农民形象，令人记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古训。

在鲁野的笔下，活跃着各式各样的农民。如果说，哑舅这个典型反映了50年代的时代特征；那么，《带毛的旋风》中的胡廷义则是80年代农民中的佼佼者。他原是杨士乡科研村党支部书记，因为带领全村农民劳动致富，被聘为不吃商品粮的乡长。胡廷义会养鸡，当号召群众发家致富群众顾虑重生，不敢举步时，他就率先建起了个人养鸡场，先富起来给大家做样子；待到大家也想养鸡却缺技术、缺资金不会管理时，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养鸡技术，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就这样，这股“带毛的旋风”挟着他的科研村，裹着他的杨士乡，在沈阳市场上旋转，在辽宁大地上翻飞。比之哑舅求实的精神，显然鲁野更喜欢胡廷义的动人的胆魄。作家从一代新农民的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前景，民族的希望。

鲁野的另一类散文《晚潮》、《天池仙葩》等，托物寄志，展示了作者的襟抱。他立过战功，但始终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一兵，从不自视高人一头。他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但并未颓唐萎靡，而是竭力做生活的强者。他在游赏长白山天池时，看到在两千多米的高寒陡坡上，竟有山杜鹃与白雪为伴成片地开着花，心神为之一振。“这些比青松还耐折腾的小东西，冬天被埋在几米深的大雪里，春天它们又经受住寒风的袭击，绽蕾怒放。”“这些天池下的高山杜鹃才是真正的强者。它们的实用价值也许不如山下的那些青松，但是作为一种生命来说，它们不愧是这里一颗永不殒落的明星！”到此，已经是气完神足，文章本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偏偏又横生波澜，荡天一笔：“当年，火山爆发，熔岩倾泻，巍巍青山顿成火海。我俯瞰天池下那些伏在地面上的山杜鹃，不禁惊问：你们当时是何等处境？你们后来又是怎样从那凝固的岩浆中挺身而出的呢？那么多的高山生灵至今不见复生，独有你们没有被那几千度的高温岩浆彻底毁灭，而又重新萌发出来，使得那些植物学家都无法解释。你们的存在既是神话又是现实。”这么一引伸，就显得摇曳多姿，有余不尽。

纵观鲁野、康启昌的散文，除了前面述及的一些特色，我觉得还有几点值得提一下：一是在创作缘起上坚持从生活出发，为情而造文，真实地记录着个人感情和意念的轨迹；二是作者的意向与观念紧紧地扣住社会人生的演进与发展，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理性精神；三是热爱生活，积极乐观，充满着追求与向往。

实事求是地说，鲁、康二位的散文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无瑕可指的，比如有有的篇章显得不够精炼，稍有拖沓、散落之感。一孔之见，难得准确，姑妄言之。

（原载 1991 年 1 月 12 日《文艺报》）

《耐冬·黄叶》鲁野、康启昌著，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6 月出版，定价 2.60 元。

## 多彩的乡土画卷与爱国者的呐喊 ——评《伸到天边去的大地》与 《绿色的谷》

李树权

作家梁山丁，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但你只要一翻开东北沦陷期的文学创作，你就会认识他，了解他。一个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

在 30 年代沦陷区的文坛上，梁山丁是“乡土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以自己的创作，独树一帜于东北沦陷期的文坛。他为生活在日伪时期苦难的东北同胞，发出血泪交流的呼喊；真实地反映了日伪统治的时代，是个“抢掠、焚烧、压窖、扯票”的时代，揭示了沦陷区的人民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生动地描绘出东北人民 14 年来在“生死场”上挣扎的画卷。尽管这里还缺少阶级抗争和抗日救亡的画面，但从作者沉郁的笔墨里，却听到了一曲曲凄婉的哀歌；看到了一幅幅多彩的乡土风俗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以往逝去的苦难岁月，重又听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爱与憎的心声。下面，我以梁山丁的文学创作道路及其创作特色，作些评论和探索，以求识者的指正。

### 一、梁山丁的文学道路

20 世纪初，在我国沃土千里、辽阔富饶的东北土地上，诞生了一批乡土作家。到 30 年代，他们为了不愿做奴隶，在抗日战争的烟火里奔走，为民族解放谱写出血泪交流的诗篇，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东北作家群，于此同时，有一批东北作家，没有离开东北的土地。在祖国沦亡的日子里，他们坚持用文学来唤起人们的觉醒，正如作家田琳所说，在日伪统治下，“我们是在呐喊！但我们不敢高唱反满抗日的歌，以唤醒民众的觉醒”。梁山丁就是在“三千万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日子里，一直战斗在沦陷区的文坛的作家。也可以说，当东北作家群在流亡中唱着抗日救亡的战歌时，梁山丁是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以他轻声低吟的哀歌，来抒发他心底对祖国和人民爱的深情。我们读一读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伸到天边去的大地》和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就可以深切地意识到。

梁山丁是在“九·一八”的炮火中成长的。“九·一八”事变时，18 岁的山丁还是辽宁开原师范学校的一个中学生，那时他就喜爱文学，喜爱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编辑了《红蓼》文艺刊物。1930 年，他以家乡开原爆发的地户焚烧地主场园的事实为题材写了小说《火光》，发表在《现实月刊》上，这给他走向文学生涯带来了鼓舞和力量。1933 年，他在《夜哨》上发表《臭雾中》、《一个犯人》等小说。1934 年，他在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月刊》上发表小说《山沟》。1935 年，他在孙陵主编的《大同报·满洲新文坛》上发表了《怀着耐苦心的人们》。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东北作家肖军、肖红、罗烽、白朗、金剑啸、孙陵等。1934 年，肖军、肖红、罗烽、白朗相继离开了白色恐怖的东北文艺界。山丁则在沉默中思考自己的文学道路。

1936年，山丁针对日本人主张的“移植文学”，提出了“乡土文艺”的主张，指出：“一切暴露现实的作品，凡是描写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品，凡是描写东北人民生活的作品，都属乡土文学。”1940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风》，所收的9篇小说都以东北农村生活为题材，暴露了日伪统治下农村的衰败景象和农民的痛苦生活，是他乡土文学理论的成功实践，受到文艺界的好评。在这期间，山丁在长春主编《文艺丛刊》、《诗季》、《世界诗选译》。一直到1943年秋，山丁被逼离开长春去北平前，他先后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愁》、诗集《季季草》、散文集《东道纪行》、长篇小说《绿色的谷》。

1943年《绿色的谷》的出版，标志着山丁的创作已走向成熟期，是作者“乡土文艺”主张得到成功实践的佐证。小说以深沉的感情和浓郁的乡土色彩，再现了20年代至30年代东北农民血泪交织的苦难生活，暗示了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乡民，当他们被逼得无路可走时，就会揭竿而起。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小彪，当他亲眼看到农民的苦难时，竟将祖宗留下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在他的家乡狼沟，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因而《绿色的谷》是一部苍凉的北国农村交响乐，也是一幅色彩浓厚的乡土风俗画展。

《绿色的谷》的出版，使日伪统治者加深了对作者的迫害。作者不得不于1943年9月30日，离开故土东北，流亡到北平，遇到了东北作家李克异，并由李的介绍，编辑了《中国文学》，出版了短篇小说《丰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在疯人院》、《初恋》等，显示了作者爱国主义的觉悟得到了发展。在艺术上，山丁也日趋成熟，克服了早期小说中人物单一缺乏深度的缺点。作者能从人物的心灵深处感情的变化，来突出人的个性，并把人物性格的发展，放在整个时代画卷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如《初恋》中的青年学生苏懿贞，山丁将她对祖国爱的挚情与对生活爱的觉悟融为一体地去展示她执着而倔强的个性，使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到读者面前。如果说，《绿色的谷》中小彪个性的发展，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的形成，在小说中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生硬，那么在《初恋》中，苏懿贞的由于对祖国的爱促使她毅然地站起来与侮辱祖国人民的外国教员斗争，最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毫不顾惜地离开学校去走自己的路的过程，则写得自然，小说的语言也生动流畅。

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87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伸到天边去的大地》1991年由沈阳出版社出版。我们从这两部创作中，可以看到山丁在东北沦陷期创作的历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美学情愫。

是苦难的时代和东北寒冷的冰霜，把山丁锻炼成坚强的意志和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的性格，他以沉郁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使他的创作散发出浓烈的“乡思乡音”之情。

## 二、梁山丁创作的特色

### 一、在爱国主义的深情中唱出一串串的哀歌

山丁的小说，常常以沉郁的笔调，来吐露他作为失去祖国儿女的爱国之心。这和流亡在异乡的东北作家群，在他们的创作中，时刻在怀念沦为铁蹄下的白山黑水，并渴望早日回到自己家乡的爱国激情，是同一的心声。但是由于山丁生活在日伪统治的东北，因而他的这种深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或隐喻的语言，来抒发他的爱国之心。

如在《乡愁》中作者通过一个流浪在中国的俄国人尼古拉，在远离祖国的日子里，时刻对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的怀念之情，寓意着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孤寂而痛苦的灵魂。

在《绿色的谷》中，通过主人公小彪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深情，诉说了他为苦难的祖国不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发出了深沉的呼喊。他问自己，“用什么药才能疗治这根本不调和的症候呢？”当他没有找到真正使祖国富强的道路的时候，由于受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以此探索寻求祖国解放的路。最后作者让小彪站在家乡狼沟的岭上，兴奋地呼吸着充满了苦味的山风，就像他饮到了母亲的奶水，他觉得拥抱着他的绿色的山谷，正是他的母亲，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无限的沉醉。并让流亡在异地的工人，唱出了充满乡愁的歌：

我爱我那破碎的家乡，  
我不爱这锦绣的天堂。

我们从这些动人心弦的爱国深情中，看到了这里正流淌着作者梁山丁对祖国和家乡爱的情思！

在《黑市》中，通过东北同胞流亡在北平的乡愁中，抒发了生活在异乡的东北人民，时刻在怀念着家乡的土地和人民，哪怕是已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也日夜憧憬着那家乡的白山黑水，甚至要冲破死亡的黑夜，回到家乡的怀抱，显示了他们对祖国的爱是如此的深沉和炽热。

在《初恋》中，写了苏懿贞在历史课上，听到外国教师讲鸦片战争时，竟说那次战争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苏懿贞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从座位上站起来，愤恨地说道：“你们讲的完全是你们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希望听自己的历史。”当历史教员发怒而又傲慢地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可惜你们没有研究历史的人。”苏懿贞则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有研究历史的人。”“我们不听你们的谎话！”“你们是历史的骗子！”逼着历史教员狼狈地逃出了教室。显然，到1945年作家写《初恋》时，他的爱国主义的激情，在他的创作中，已从曲笔的描绘唱出一串串凄婉的哀歌发展到直抒胸怀的呼喊，唱出了壮怀激烈的悲歌，深切地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祖国和家乡无限爱的深情。也正由于这种感情激励着作者，不论是在沦陷时期过着没有祖国的日子里，还是在流亡北平的岁月里，一直以沉郁的笔墨，来写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以此来唤起人们的觉醒。

## 二、多彩的乡土风俗画

作者热爱祖国的深情，常常在热爱家乡的挚情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因而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常常呈现出一幅幅多彩的乡土风俗画。这是梁山丁创作的又一特色。

梁山丁对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有着无限的爱恋。在《绿色的谷》中，作者饱含感情的墨汁，把秋天的狼沟，写成“满山谷泛滥着一种成熟的喜悦”，“山坡上的庄稼已经割倒了，高粱捆码在阡陌中，好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军队”，“山野里飞旋着大蚂蚱，那些藏在草棵子里的叫蝈蝈，震着刺耳的翅鸣”。在场院里，“黄金似的黄豆从豆壳里挤出来，在西风中打旋、跌落”，山鹰“降落在河堤上，望着清澄的流水，扇了扇翅膀，咕咕地叫两声，又用它带钩的嘴啄它倦了的羽毛”。这是一彩幅色多么鲜明的东北农村秋色图。

清晨，“老榆树上的乌鸦在房顶上揶揄地叫着，鸽子拍着翅膀绕着院落转圈子，似乎对于吝啬的阳光作舞蹈，紧接着院内传来马群响亮的啸叫”。

这是充满着生意的景色，那乌鸦、飞鸽和马啸，加上清丽的阳光，哼着小调，农民带着欢笑或愁苦，走向田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展示了东北农民们在狼沟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生活的画面。冬天的狼沟，却是另一番景色：

“刮着骤烈的北风，风夹着雪，弥漫在山谷的道上，旷野上，田垄上，人家的屋脊上，寇河已经冻结了，雪在上面铺着，像羊毛似的闪着绒厚的光泽。河床狭窄的地方，河水呈着裂罅的龟纹。有人在冰上凿着窟窿，把铁杈插进去，捉着冬眠在河流底的鲤鱼。”

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粗犷的北国冬天的雪景：北风、飞雪、旷野、河床、铁杈、鲤鱼，还有农家窗镜上奇异山峦形状的冰花，构成了这幅北方山村由静到动的美景，令人陶醉，迷恋。也就在这样美丽的土地上，在那一望无垠的狭长的草甸上，那些流亡在异乡的工人，唱着乡愁的歌：

我爱我的家乡，  
我们的村庄，  
我的小树，我的草房，  
……  
我生长的燕赵地方。

读者可从作者一幅幅充满东北风光的画面上，看到东北大地的美与可爱，从那充满乡愁歌声的画面里，听到了那失去家乡团圆的人们面对大好河山，家乡一草一木的深切爱的思念之情。在《绿色的谷》里，作者写狼沟村的深夜狼嚎的画面，更能体现出东北山村荒凉粗犷具有“野”性的地方色彩。

“月白风轻的荒路上，一队蹒跚地立起尖耳的狼群，朝林家窝涌来。它们贪婪地张着饥饿的血红的眼睛，寻觅着，叫啸着……狼来了一大群，马慌了，……惊得乱跳乱跑……”

“狼群骚动了，一只母狼从狼群跑出来，它朝炮台瞪圆血红的眼睛，张大它的嘴，露着犀利的尖刀般的牙齿。

“枪弹打进那只母狼的嘴里，在一株杨树的旁边，它旋了两旋，倒下去了。”

“狼群退却了，前哨队向两旁哭丧似的叫着，纷乱地逃回山谷……”

在静夜凄凉的月光中，野狼凄厉地嚎叫着，袭击偏僻的山村，引起人喊马嘶的骚动和不安。作者以沉郁而粗犷的笔致，将这幅“狼袭图”异常生动地映现到读者面前。这样的带有原始“野”性的画面，真切地体现了东北荒村野岭的独异景色。山丁以浓淡相映的画笔，勾画出了这幅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它不仅具有浓烈的乡土色彩，而且还有独特的美学情愫。

在《绿色的谷》里，作者还对东北的乡土风俗，作了生动的描绘。那就是东北乡村的“跳大神”，东北胡子劫富济贫。尽管作者对跳大神的描绘，写得不如肖红的《呼兰河传》，写东北胡子也不如肖军的《第三代》，但从作者所描绘的这些画面中，也使我们看到了东北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乡土民风，真实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我们从这些乡土民情的画卷中，可以看到社会的趋向和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以及道德伦理关

系；看到了东北的旷野、山岗、河流、村庄、飞雪都充满了北国粗犷的美。然而，生活在这块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却在“生死场”上呻吟和挣扎。在这一幅幅乡土风情的画面里，渗透着作者多少的辛酸和眼泪。

### 三、为苦难的人民发出血泪交流的呼喊

具体、真实地写出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是山丁创作的又一特色。

东北沦陷时期，由于山丁生活在人民中间，了解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遭遇，痛恨敌寇的凶残狠毒，因而他以字字血声声泪的笔触，暴露了日伪统治者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王道乐土”不过是人间地狱。

在短篇小说《孪生》中，作者写了一个家庭复灭的故事。在日伪统治下，由于日寇怕义勇军和“胡子”的袭击，对农村实行“并村归屯”的政策，把散居的村民老九爷一家，从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聚到大马堡来居住。不久，九爷被活活气死。他的儿子铁柱，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带着母亲和妻子，偷偷地逃回故土的山沟之中，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但反动的衙门，却把铁柱突然绑走，致使铁柱的母亲、妻子以及刚刚出生的孪生儿子活活被饿死。人们读后，深深地感到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农民所遭受的沉重灾难。这比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所说的“苛政猛于虎”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这样血淋淋的画面，作者在《壕》、《残缺者》等短篇中，也有着深刻的揭露。

在《臭雾中》，作者写了屠夫陆大戈及琴子一家的悲剧，揭示了外忧内患的东北同胞，生活在一个“抢掠、焚烧、压窑、扯票”的时代。《山风》则写了种庄稼的人被粮耗子弄得破产卖地，过着民不聊生的生活。《织机》展示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画面。《碱性地带》写了在官员们的宴席中，正吃着百姓的血和肉。《猪》写了人像猪一样地生活着。

以上正是广大劳苦大众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悲惨遭遇。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命运是否好一点呢？让我们从山丁的短篇小说《在疯人院》中去看看吧！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揭示了诗人倪杰从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变成疯人的经过，诉说了他生活的时代，是“活人和鬼没有区别”的时代，是“人间和阴间一样布满黑暗”的时代。指出了那个时代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全被粘在一只大的看不见的蛛网上，无论什么人都很烦恼，老年人用暴力释放他们对于未来的烦恼”。这是诗人倪杰对那个罪恶的时代对他迫害的控诉，也是作者自己为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要冲破笼罩在他们身上层层网而发出的血泪交流的呐喊。

作者在《书》中，写了小学教师秦汶到偏僻的乡镇辛勤地教育孩子，培育祖国的花朵却遭到日伪统治者的迫害，甚至下落不明，失去了人身自由。在《革命》中，揭示了罪恶的社会，使一个纯洁的女青年学生，被逼走上摧残肉体的卖淫生活。

综上所述，在山丁的创作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沦陷区的人们，不论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都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处境。多少善良而勤劳的人民，在忍辱负重中生，于忍辱负重中死。当他们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像农民小白龙和大熊掌等，就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以“杀富济贫”来反抗日伪的统治。因而我们在山丁的小说里，不仅看到了在那沉重的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悲惨，日伪统治者所谓的“王道乐土”不过是人间地狱，同时也看到了中国



的农民是不可征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为寻求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强盛而默默地工作，哪怕他们的思想还有局限，但由于他们对家乡和人民的爱，使他们生命的火花能在时代的风涛中发光，从而反映了山丁对美的渴望和追求。

## 结 束 语

山丁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很有感慨地说：“今天的读者和评论家能理解那时创作的甘苦，作者就心满意足了。每一个在沦陷时期写作的人都经历过，作为异民族奴隶的痛苦。受殖民地统治最深的东北作家，是和失掉祖国的朝鲜、台湾遗民相似，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何年何月重见天日。我很理解陆游的那几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在东北沦陷 14 年中，东北作家创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鼓励评论家们实事求是地评价每一部沦陷时期的作品，认真地进行研究，真正理解创作的甘苦，不管过去的年代，还是当代，作家和评论家的相互理解，是繁荣文学创造的桥梁。古诗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笔者不敢说和山丁先生已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地，但当我通观了山丁的全部小说之后，可以这样说：山丁以他对祖国和家乡浓厚的爱的激情，真实地写出了沦陷期人们生活的痛苦与不幸，为我们唱出了一串串凄切的哀歌，展现了一幅幅东北乡土民情的多彩画卷，描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对暴力的憎恨，发出了“我爱我那破碎的家乡，我不爱这锦绣的天堂”的爱国者的呐喊。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说过，他的诗作之所以被人喜爱，是因为“在残酷的世纪里，我曾歌颂过自由，并为那些苦难的人们发出过怜悯和同情”。我觉得，山丁的作品，今天还能得到人们的喜爱和评论，其原因也在于此吧！

当我们肯定山丁先生创作成功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他的不足。他的创作只是暴露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因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作者只写了他们在“生死场”上“死的挣扎”，而“生的坚强”则不够，因而，这里主要是展现了苦难的时代苦难的人民苦难的生活，缺少强烈抗争的画面。读了这些作品，使人感到沉闷而哀婉，缺少积极向上，奋勇抗争的力作。

拿山丁先生创作中的乡土民情的画卷与肖红作品中的乡土民情相比较，我们会感到肖红在抒写人生的凄切和荒凉时，蕴育着生命的活力，使人感到人类是在“生的坚强”中去表现他们“死的挣扎”。山丁则是让人物在“死的挣扎”中去寻求生的希望，他们的生命往往是在残酷无望的迫害之中一个又一个地死去。

山丁的创作在他的“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思想指导下，侧重于暴露和真实地反映生活，没能在暴露的基础上，写出一个个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因而读后，在掩卷沉思中感到其艺术构思还稍显单薄，思想深度还有不足。犹如在闷热夏夜中的萤火，给人带来了火花的美，令人迷恋，但这美缺乏浑厚、壮丽。有的评论者说“山丁的作品犹如一把有缺口的利剑，一块有瑕疵的玉”。我认为是合适的。然而，瑕不掩瑜，山丁先生确是一位在东北沦陷时期有着光辉创作成就的爱国作家，是应该记入中国文学史册的。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2 年第 2 期）

《伸到天边去的大地》梁山丁著，沈阳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定价 6.00 元。

《绿色的谷》梁山丁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定价 1.70 元。

## 直拾趣兮纵撷情

——于洪乔《西窗烛》、《长河流月》读后

石 庄

捧读于洪乔的散文集和散文诗集，不禁想起“涉笔成趣”的古话来。这两本书中的作品，没有金刚怒目，没有剑拔弩张，没有急三忙四，有的只是脉脉的温情和娓娓讲来的趣事、趣闻和馨香的趣味。

没有谁限定散文非要这样写或那样写，但不知怎么，在相当数量人的心目中，散文又必须是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于是，产生了一个无形的“运动纪录”。这个纪录“破”起来很难，不仅仅靠勇气，而且还要靠实力。

于洪乔的散文作品似乎在做这种“破纪录”的尝试。他的作品不拉大架子，只是如数家珍般地话柳，谈人参，说花灯，吃酸枣可以叙情，吃螃蟹可以言爱，点点萤火能燃起滚滚思潮，块块碎石能勾起几许往事……他作的文章都是小题目，而这些小题目又是极狡黠的切入点，用一个个的“小”，组合成于洪乔笔下的再生世界。

轻巧，不等于轻佻。他的足迹遍大江南北，游踪所至亦兴之所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游旅顺口、虎丘、登万里长城、瞻仰中山陵、凭吊雨花台、临望江楼……这一系列访古探胜的佳篇，将如画的景观和独到的识见捧给读者，当然要吊爱山爱水的仁智者的胃口了。

喜欢于洪乔散文作品的的朋友都说他的两本散文作品《西窗烛》和《长河流月》，像是孪生姐妹。我倒以为，这两部作品像一个能工巧匠不同时期生产的两件产品，从《西窗烛》到《长河流月》，似乎经过了一个艺术上的冶炼过程，笔调虽然还是那样轻松，但含蓄了许多，深沉了许多，圆熟了许多，自我超越了许多。对情感的表露，一个是情窦初开，全方位袒露，一个是熟谙世事的温柔，让情感的闸门有张有弛。《长河流月》中艺术结构上经常出现的总是纵向的联想鲜见了，横向的扩展增加了许多。

于洪乔的散文作品给我们的启示，那就是——散文，可以言情，可以叙事，而且也可以写趣。从散文创作的历史上看，古代的散文，现代的散文，不乏如此风格的佳作。从每位作家创作的个性上看，也是要发挥自家优势，练自家拳脚的，为什么非要气喘吁吁地去像别人呢？既然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哪怕是优势的端倪，为什么不敢认可和弘扬呢？

（原载 1991 年 2 月 27 日《沈阳日报》）

《西窗烛》于洪乔著，大连出版社 1989 年 3 月出版，定价 1.60 元。

《长河流月》于洪乔著，大连出版社 1990 年 5 月出版，定价 2.40 元。

精筛细选 串串珠玑  
——评《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

孙明晶

中国古代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诗词浩如烟海。然而，以历代妇女诗词成集的却寥寥无几。张明叶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古代诗词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历代妇女诗词在古代诗词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是古代诗词中“不可忽视的一翼”，研究它，发掘它，对于了解古代妇女思想和生活状况有着很大价值。基于此，作者精心编选了这本集中国历代妇女诗词的名篇佳作，呈串串珠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

这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角度新。作者从研究发掘妇女诗词的这一全新角度来编选这本《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由于封建社会的妇女备受歧视，作为她们言志的诗作历来不为社会和人们所重视，绝大部分的妇女诗词，我们今天只能从各种类书、野史、笔记、方志等典籍中偶尔见到，因而使人们忽视了妇女在诗词领域里的成就。从这一点出发，作者广泛搜集资料，从古代诗词起源着眼，从真实可信的文学《诗经》着手，广收博采，汇成此集。

二是编选精。该书仅在30余万字的篇幅中，精选了281人的诗篇，97人的词作，容诗408首、词147首于一集。历代妇女诗词万余首，诗词作者数以千计，该书能从中精筛细选，做到了历代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均无遗漏，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该书中对每位诗词作者均附有文字精练的简介，诗句注释亦精当准确，读之使人明白晓畅，获益非浅。

三是采撷全。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巨型的妇女生活史的生动画卷，它展示出了从先秦到明清两千多年间妇女生活的各个侧面，涉及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活动与思想感受。该书所编选的不仅有“宫廷后妃、公主命妇、勋匡妻妾、民间闺秀”的诗词作品，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乐倡妓女”的诗词作品也一一收选。因此可以说，该诗词选是我们今天了解历代妇女生活动态的一部重要资料。

（原载1991年3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

《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张明叶编选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定价5.50元。

## 一部别开生面的书 ——评《中国俗语故事集》

陈蒲清

古今中外，很多优秀的寓言作品，往往被概括为成语和俗语而流行于民间，有力地丰富了本民族语汇。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成语俗语也发展为寓言故事。如：《左传·僖公十四年》有“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这么一句话，西汉末年学者刘向编著《新序》写下了“反裘负刍”的故事，便将它故事化了。《文子》和《史记·廉蔺列传》有“胶柱鼓瑟”这么一句话，东汉末年邯郸淳作《笑林》编了“齐人学瑟”的故事，也将它故事化了。这种故事化的现象，实际上是成语俗语的升华，使之更形象感人，也使之更富有智慧和哲理，盖壤同志的《中国俗语故事集》致力于使俗语故事化，使之升华，使之普及于民众，这种努力是值得赞扬的。虽然，从前也有些同志做过这种工作，但是，一口气写出435个故事结集出版，却是空前的。

寓言创作并非易事。个人以为，善于吸取民间智慧，包括从民间故事或民间俗语中吸取智慧，是克服寓言创作困难而取得成绩的一条成功经验。民间俗语和故事早已在民间生根，和民众有血肉联系，最容易被民众所认同。作者把它们加工提高，民众见了它，如见故友，自然感到亲切，又感到几分新鲜，当然乐于接受它，传诵它。盖壤同志《中国俗语故事集》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书中的435个故事，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利用民间俗语及其原有故事加工的，共有130多则。本书第一篇故事《骑驴找驴》便是这样。它早就活在群众口头上，用以说明“当局者迷”之类的哲理。在这一类型的故事中，历史故事（包括历史题材的小说与戏曲）所占比重很大，有100多则，其中三国故事便有30则以上。这些历史故事有的本来就独特，又大都经过民间长期口头流传过程中的群众性的加工磨砺，如《大意失荆州》、《坐山观虎斗》等，本来就有深厚的意蕴。当然，有些故事意蕴并不深厚，还算不上寓言，但也能使读者增添历史知识。这些故事，作者还可作更大的艺术加工。

第二类是利用俗语而创作的新故事，共有260多则，在数量和艺术创造方面都是本书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使群众能够接受，盖壤同志作了很多努力。个人以为，他在利用生物习性、利用史地知识、利用民俗方面，做得很成功，雅俗共赏，脍炙人口。《野鸡顾头不顾尾》、《墙头草随风倒》、《杀了雄鸡阻止不了天亮》、《蛇吃老鼠半年，老鼠吃蛇半年》等都巧妙利用生物习性来表达寓意。这些习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不用任何累赘的描写便可引发读者的性格联想。《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巧妙地利用历史知识传达通俗的哲理，给人印象很深。它写的是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的设计和组织者李冰及其儿子二郎的虚构故事，通过二郎在湖口打桩立篱笆的情节，非常自然地把谚语的前后两个部分合成一个整体，并揭示了这个谚语的哲学意蕴。《艄公多了撞烂船》则巧妙地利用了地理知识。艄公多了撞烂船，不可能发生在平静的水流中，只可能发生在急流险滩之中；一只船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几位艄公，只会有一种特殊情况下才会有几位艄公。天下急流险滩，为世人所共知的，当然要数长江三峡了。所以作者虚构了一位县官要过

三峡的情节，县官怕出危险，又不懂驾船技术，雇请五位艄公（三、五在汉语中常表示多数）掌舵便是很自然的了。这个故事与民间谚语妙合无痕，讽刺了不协作、权力分散、用人不专等社会现象。《犬无生日猪无年》等故事则成功地利用了民俗知识。《犬无生日猪无年》写猪狗相约互祝生日（腊月三十是狗的生日）和年节，结果肥猪在年关前被杀，黑狗在大年三十被套上爬犁赶集，最后黑狗望着空落落的猪圈叹道：“猪啊猪，你我身不由己，还打算什么过年过生日啊！”一语道出了奴隶地位的可卑，又因符合民俗而毫无生硬说理之弊。

第三类是作者自编的新俗语和新故事，共有 33 则。这类故事和俗语要扎根到民间去是不那么容易的，即使有一两句可能为群众传诵，那也是极大的成功了。如何使群众接受呢？个人以为，作者必须扎根现实，从而使自己跟群众有同样的生活感受与思想感受。如果能够这样，作者便可以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于是被群众所认同。盖壤同志正是这样作的，这 33 则故事大都立足于现实，有所为而发。《拍马的是为了骑马》、《仅靠嘴巴说话没有力量》、《田鼠留学——看见的听到的全是吃》等都是这样。其中最突出的个人以为首推《拍马的是为了骑马》。我国北方牧民，对好马表示赞赏，往往拍一下它的屁股。这便是“拍马（屁）”一词的原始来源。人们用它比喻对人说奉承的话，又引伸为阿谀讨好，这便是它的社会含义。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小人自己没有本事，也不想为社会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却善于钻营，通过吹捧拉拢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捞取地位、金钱、名誉等好处；某些或有权力或有能力或有名望的人，往往中其圈套。故事中的狐狸和马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则故事既紧扣了“拍马”一词的原始含义，又赋予了它现实的内容，“骑马”一词也是妙语双关，因此构思是巧妙的，自然的，符合群众的接受心理。我希望它能活在群众的口头上。故事中对狐狸和马的描绘也是出色的，语言和动作都富有特色，把生物习性与社会性结合得很好，这正是一则成功寓言的条件。

俄国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述寓言与俗语谚语的关系时，说了以下的精辟见解：“构成寓言内容的，是世俗的日常的智慧，家庭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日常经验的教训。有时，寓言也直接表露自己的目标，但却不是通过冷淡的说教，不是通过死板的道德箴言，而是通过戏谑的语句，这些语句逐渐变成了谚语俗语。”“俗语和谚语本身就是民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们是诗歌，或者更正确点说，是诗歌的开端，诗歌的最初的起点；而寓言，跟俗语和谚语比较起来，就是最高的体裁，最高的诗歌，或者说是达到了发展极限的再也不能往前进的民间俗语和谚语的诗歌”。（《克雷洛夫寓言》）盖壤同志的《中国俗语故集事》在寓言创作和寓言理论研究上的意义，也许正是这样，虽然它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如有些篇目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成熟，或者不符合群众接受心理）。

有人说，作品只有通过批评才能闪光。又有人说，作品在批评家的手中死去。为了使读者了解这本书，我写了上面这些话；为了不损害原作，我只举出了一些例子，请高明的读者自己发掘吧！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

《中国俗语故事集》盖壤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6 月出版 定价(平)  
7.00 元，(精) 9.50 元。

## 给俗语加上故事的翅膀 ——《中国俗语故事集》读后

朱靖华

我读了盖壤同志创作和编写的《中国俗语故事集》，颇有一番感触，很想就此发表一点意见。

文贵创辟。作者当是一位有抱负的“创开而昌大者”。他在“前言”中说：他创作了众多俗语故事，是“试图为俗语的本意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并要“给俗语加上故事的翅膀，使之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初读之下，我觉得作者这一创作意图是得到了贯彻和体现的。不宁唯是，我还认为，他的含辛茹苦的创作经营，应当看作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崭新的创造。

首先，创作俗语故事是符合语言发展史规律和客观社会需求的。因为“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它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就长期存在着了，各种俗语也在社会生活实践的需求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着。我们从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的三、四千年的历史文献中考察，其中所记载的历代俗语资料已是无比丰富和异彩纷呈；而到现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语言的不断相应演变，新的俗语及其故事也在不断诞生乃至蓬勃发展着。史实做出了见证，盖壤同志的创举，是有其牢固的历史传统背景做依据的。

其二，俗语虽然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但它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又与故事相伴相生。譬如说，我过去常爱读一些俗言、格言、谚语乃至歇后语，却时常为其原有的故事载体所吸引，如当我读到“方说曹操曹操就到”的俗语时，就马上想到了《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曹操兵败濮阳的故事；当读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谚语时，就想到了《东游记》中八仙渡东海时各显其神技的精彩情节；而当我读到“霸王请客——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的歇后语时，便立刻想到了《史记》中惊险的“鸿门宴”场面……因为那些故事具体生动而饶有机趣，情节离奇而富有智慧，读之往往启人心扉而发人深思，受到哲理情操的陶冶和感染。很显然，这许多俗语、谚语、歇后语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并能够得以广泛流传，正是由于它们是基于这些故事本身的机警感人和含蕴深邃的特质所决定的。因而从事俗语与故事的“共生互存”关系的研究，并从而进行俗语故事的创作，便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了。记得清朝有一位专门记述乡谚歌诵的学者李光庭，他曾在其《乡音解颐》一书的“自识”中精辟地谈到了俗语与故事的共生互补关系：“古之善于立言者，曰有物，曰有章。物，著实也；章，文章也。盖无实则事不足徵，无文则行之不远。文实兼备，乃能信今传后，卓然成不朽之著作，足以为立言者程。”所以，盖壤同志企图通过创作新俗语故事，做到“文实兼备”，以使之“信今传后”、“卓然成不朽之著作”的尝试，是颇具艺术眼光的。

其三，我认为盖壤同志在书中实际上是进行了两种崭新的创造：一是为旧俗语创造新故事（包括改写新故事）；二是既创造新俗语也创造新故事。这些作法，当是由历史资料本身的启示中得来者。在往昔，有的是先有故事而后被概括成俗语，如前面所举的三例便是；而有的却是先有俗语而后被人赋予新故事，譬如有名的“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俗语，它原出于五代人陶谷旧事，见《圣宋掇遗》，其中说：“陶谷奉使吴越，因食蝓蛄（梭子蟹），询其族类，忠懿（即钱俶，五代时吴越国君）命自蝓蛄至蟹凡十余种以进。”



谷曰：‘真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到了北宋苏东坡，他便根据陶谷这句俗语旧事在其《艾子杂说》中创作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著名故事：“艾子行于海上，见一物圆而扁，且多足，问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蛸也。’既又见一物，圆扁多足而差小，问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穴居海边沙窝的小蟹，螯足无毛）也。’艾子喟然叹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结果，“俗语”和“故事”相互映辉，相得益彰，被传为佳话。苏东坡创作这则寓言故事，是旨在引申陶谷“一代不如一代”的俗语，以讽刺宋廷宰相的一个不如一个，以发泄他对朝廷“奸佞充斥”的愤懑之情，使之尽列读者面前，出乖露丑的。在故事中，东坡还巧用了“螃蟹”的形象作喻，“螃蟹”是一种“多足”而“横行”的家伙，东坡便借此痛骂了当朝宰相都是些“横行霸道”的禄蠹蠢贼，这便又使其机智和犀利的文笔顿放异彩。东坡的艺术实践颇足借鉴，它说明，只要作者对俗语的深邃内涵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能通过典型形象“嫁接”动人机警的故事，就可以使俗语和故事同时产生巨大魅力，得到广泛流传。

我认为盖壤同志创作的俗语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达到了这个如期效果的。譬如《老鼠说猫最厉害》一则，其故事不仅充分体现了俗语的“一物降一物”的深刻内涵，而且文笔锋利、穿透，写得十分机警动人。作品仅仅抓住“猫吃老鼠连骨头都不吐”的贪婪凶残形象展开情节描写，突现出老鼠日夜担惊受怕的神经痛点，从而驳倒了山羊极说老虎比猫更厉害的看法。故事的妙处还在于它决不停留在老鼠和山羊的表面、空洞的争辩上，还异想天开地创造了一个老虎当检查团团长，来检查猫儿的捕鼠工作的精彩情节：但见猫儿亲自下厨房，为老虎做菜设宴，表现得似乎十分驯顺。山羊果然看见了猫对老虎的必恭必敬，而老鼠却惊恐地瞅着盘子里的菜肴——“那里装的是红烧鼠肉”！老鼠最后战战兢兢地痛下结论说：“猫能把老鼠皮剥光，给老虎做高级菜，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这画龙点睛之笔可谓动魄惊心，一针见血，它不仅极具说服力地说明了猫的捕鼠手段要比老虎更为凶残，还使我们似乎看到了老鼠那因惊诧而瞪圆的两只闪光的小眼睛。故事讲完，似乎意味未竟，它的翅膀似乎又导引我们升发开去，启发“实践出真知”的人生哲理，并使我们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某些欲壑难填、凶狠无忌的家伙们的凶残嘴脸，可谓简捷警策，妙笔生花。再如《螃蟹夹住鹭鸶脚——要脱不得脱》这则故事，也写得高视阔步、秀外慧中。故事写一只螃蟹想吃鹭鸶口中叼着的鱼，他满以为用力钳住鹭鸶的脚，鹭鸶一喊痛，鱼便落地，即可稳操胜券；但谁知，鹭鸶一痛，突然飞向天空。这时，等待螃蟹命运的便只有两条路了：“要么掉到地上摔死；要么等鹭鸶落在地上被鹭鸶啄死。”故事就这样在意想不到的谐趣中结束，写出了螃蟹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可悲下场，读之令人莞尔而笑，大有“鸟道行尽，天字乍开”的审美效果，显出作者胸罗锦绣的才华。

其他如《朝山的不是全为敬神》、《四两鸭子半斤嘴》、《兔子叫门——送肉来了》、《狼替兔子说话——存心不善》等等，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如果说，上面所举诸例是崭新创作的话，那么，书中另有一些则是属于替换旧故事、改制新故事并赋予新意者，有些写得也颇能新人耳目。突出的如《瓦罐少不了井上烂》。这个俗语原本是有其旧故事的，见清人王有光编撰的《吴下谚联》：“瓦罐不离井上破”条。其故事是说：隐士陈仲子“汲

井灌园”有方，楚王欲“聘治楚国”，“仲子辞”。仲子说：“吾为人灌园，常忧旱，不汲则不能救，汲之则此瓦罐不得离于井。蔬果诚荣矣，而罐恒破。吾治楚，楚之民，国之蔬果也，而王实其井。不汲则吾不得离于王，民诚荣矣，而吾恐为之罐也。敢辞。”很明显，这个故事所突现的是隐士远避社会和明哲保身的思想主题，读之给人以“看破红尘”的消极影响。盖壤同志摈弃了这个旧故事，而给俗语以“合乎情理的解释”，重新创作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宣扬“舍己为人”积极精神的新故事。他写道，老井对第一次前来打水的一个新瓦罐说：“兄弟！你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职业呢？你那泥做的小身子是多么的脆弱，我井口里的每一颗牙齿都是用硬梆梆的石头做的，不怕我碰坏了你呀！”瓦罐却回答说：“陶瓷师傅把我做出来，是让我来干点事情的”，又说：“人们需要我，在家里做饭的妇女，热天里铲地的农民，路过井边开赴前线的士兵，谁能不喝我打的水呢？能为这么多人解渴，我死也瞑目了！”于是，瓦罐拒绝了老井让它“到博物馆的橱窗里去，当一个供人欣赏的艺术品；或者到哪位画家的案桌上，当个洗刷颜料的罐子”，甚至“当一个尿罐子也比到井上来打水强得多”的良好建议，竟主动地去井上兴致勃勃地工作着。可是“有一天，瓦罐终于被井口的石头碰碎了”，在老井一阵“真可惜”的叹息声中，瓦罐最终坦然地说：“我对我的一生很满意。我现在不过是又重新变成了土！”一句凝练而蕴含丰富的结语，读之令人浮想联翩、无限低回，感到有一种“继往开来”的崇高精神在激励着我们。而且从艺术上看，作品情节涉笑成趣，亦庄亦谐，给人以美的享受。像这种探索俗语新意、改制新故事的例子还有一些，如《骑驴担担子，全在驴身上》、《宁做蚂蚁腿，不做麻雀嘴》、《羊披上虎皮——见到狼还是害怕》等等，也都写得别开生面恰到好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思维也好，语言也好，本身都不能组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第435页）所以，历史上的俗语故事，都是根据它们当时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产生，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故事在今天有些很自然地便失去了其社会效能或减弱了其社会效能，必须加以调整和改变，进行重新创作。盖壤同志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并做出了自己贡献的。

再进一步看，盖壤同志基于这一点，他的创作又很自然地过渡到既创造新俗语又创作新故事的实践当中。作者在“前言”中说：“因为语言总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新俗语的创造，应当是允许的。本书最后的33篇故事，就是试着以创造（或模拟）的谚语和歇后语为题写出来的。”这些新创造的俗语和故事也不乏机智和优秀之作，如《拍马的是为了骑马》、《朋友相好不用绳拴》、《被老鼠咀嚼过的文字，莫信》、《狐狸执法——理可以不要，肉不能不吃》、《傻狍子充师傅——不知自己的屁股白》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当然，“创始者恒朴”（陆机：《羽扇赋》），白璧中难免会有其微瑕。作者谦虚地说：“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了这部书”，“成败与否，应由读者去批评”。我作为一位读者，除了充满喜悦之情外，也有略感美中不足之处。这里不妨对作者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共同商讨和切磋的课题。

其一，创作新俗语故事，我认为每一则故事都应在准确地把握了俗语的主旨和含蕴之后再行创作，才能产生好的社会和思想的效应，特别是具有某种比喻性质的俗语。盖壤同志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有如前述，绝大部分是成功的，但也有个别故事具有某种程度的游离现象，譬如“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这条俗语，它的本意旨在讽刺低下的丑男子妄想占有高洁的美女，或引申出自不量力，想入非非，妄求办不到的事情的含意。但读了作者的故事，其内容却是写的一只聪明过度、身任“鱼塘总管”的癞蛤蟆，竟设狸让贪婪成性的狐狸骗过熊总督，以任狐计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狩猎，而又要他送一只剥光了皮的天鹅给自己吃的故事。我觉得这则故事与俗语之间，似有某种龃龉，而未能表达出它应有的艺术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就说过：“比之为义，联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但却有其关键一条，即“以切至为贵”。刘禹锡在其《因论七篇》序中也曾说过：“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其寓言之徒。”这均明确指出：寓言故事比喻的行文可以异想天开，但其旨趣则应归于适当。这些古代文论家和作家们的艺术经验，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借鉴的。

其二，俗语故事的社会应用，虽然是老少咸宜，但俗语在更多的情况下多是被成人所运使。因而在创作故事时，除加强其形象的生动性、趣味性等少儿特质外，还应加强其机智性、幽默性，特别是哲理性的成人需求。这也是我期望作者能进一步发展的一点。

以上意见，杂乱无章，未必正确。假如说其中有些果真算是“痼疾”，那也绝不掩饰全书的光彩。更何况，本人对俗语故事素无研究，又无实践经验，恐是不着边际、不辨菽麦之谈，盼仅供参考可也。

（原载《当代中国作家评论》1991年第3期）

怡情益智 雅俗共赏  
——喜读《中国俗语故事集》

石 城

一位英语教授曾经说过，愈多成语的语言，愈是历史悠久，也愈有生命力。我想这里所说的成语，应该可以扩大为成语和俗语这两大范畴。成语一般来自书面记载，俗语则多见于口头流传。如果将成语比作雍容华贵的名门闺秀，俗语就好像民间里巷的小家碧玉。成语和俗语，各擅胜场，极大地丰富了一个民族的语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语言文字丰富多采。近年来有许多人编写成语故事，做了很好的普及工作。但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俗语，则尚未见有人加以搜集整理，结集出版，更未见有人以俗语为题材进行加工创作。

不久前我读到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盖壤先生编写的《中国俗语故事集》，不禁喜出望外，拍案叫好。一打开就爱不释手，一口气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

《中国俗语故事集》收编了 435 篇俗语故事，少部分来源于古典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大部分则是作者以俗语为题材进行的再加工、再创作。这些故事通过典型形象、合情合理的情节，解释了某些俗语的含意和来源，生动有趣，富有幽默感，既能起传播语言知识的作用，又能够丰富读者的文化生活，怡情益智，雅俗共赏。

搜集整理容易，进行再创作就比较困难了。在这本收有 435 个故事的《中国俗语故事集》中，根据古典小说、戏曲、民间有据可查的传说编写的只有 114 个，而以谚语、歇后语为题材创作的就有 268 个，还有 33 个是以模拟谚语、歇后语为题材创作的，足见盖壤先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盖壤先生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和通俗文学工作，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才能驾轻就熟地写成这本洋洋 40 万字、涵盖生活各个层面的俗语故事集。

在盖壤先生的这本《中国俗语故事集》里，我们可以读到像“大意失荆州”、“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崔莺莺送郎——一片伤心说不出”这些人们熟悉的古典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里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有典有据，但盖壤先生仍然以认真务实的态度，用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笔调进行了再加工和再创作，娓娓道来，形象盎然，趣味横生，令人有痛饮陈年老酒的酣畅之感。而像“兔子不吃窝边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这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但又很难说出出处的谚语和歇后语，盖壤先生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写童话和寓言的娴熟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创作。这 260 多个谚语和歇后语故事，以及盖壤先生模拟谚语和歇后语所创作的 33 个故事，更有匠心，别具一格。这些故事也都有高度概括生活的形象性、幽默感，既能够令人佩服地为俗语的本意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也丰富了读者的精神生活。因此，总的来说，这本书既可以作为童话、神话、故事、寓言来读，也可以作为语言艺术来欣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旧的俗语、谚语、歇后语也会渐渐消亡，但却有更多的新的俗语、谚语和歇后语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交往中涌现。我们翻开元曲，可以看到“没肚皮搅泻药”、“山间滚磨旗”这样一些俗语，但今天的人们却是已经很少听得到了，代之而起的是“打肿脸充胖子”、“自画脸谱自封官”这一类更浅显形象的语言了。

俗语又具有十分鲜明的地方性。盖壤先生是北方人，他所选编的俗语故事，应该说多数是源自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普通话。其实在方言众多的南方地区，也流传着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语。比如广东人常说的“年晚煎堆——人有我有”、“马死落地行”，福州人常说的“食 糍料，叫 仔声”这一类俗语，就很生动形象，有许多背后还有十分有趣的故事呢。

搜集整理、编纂出版俗语故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俗语故事集面世，有全国的，有地方的，带给人们更多有益的精神食粮。

（原载《澳门日报》1990年11月2日）

## 对民族深层文化的发掘 ——评长篇历史小说《南北朝始末》

高 云

我认为《南北朝始末》写起来难度是很大的。

可是，作家阎德荣接受了前人的教训，运用新观点新技法，抓住主要事件主要人物，采用前伸后延、文史结合的方法，开合有序，议论风生，亦庄亦谐，反讽调侃，因而读起来不仅有珠联璧合的感觉，并且以其恢宏的历史观念，让读者对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予以哲理性的思辨。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期，虽然没出现过政治家大军事家，可毕竟不是历史的真空。小说中写到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拓跋珪、高洋等开国皇帝还是有些作为的，这些人物的作为在《南北朝始末》中，得到了形象、精彩的反映。对于政局不稳、世事动荡、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交流淤塞，结果是黎民百姓倒悬于水火之中。所有这些，在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折射。

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具体描绘，我们还可以看出作家善于从平凡的生活里捕捉光彩四射的艺术细节。有时，寥寥几笔，便能神情毕肖地为人物传神写照。如在描写北魏帝拓跋焘的趾高气扬时，写他“在大帐里抱着三岁的小孙子”接见义隆皇帝的使者。当使者献上贡品讲明来意时，他“坐在虎皮椅上，一边把着小孙子撒尿，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接着他拿过侍从给剥好的黄柑，“边掰着黄柑往孙子嘴里填”，边说，“你们皇帝必须将他的公主嫁给朕这小孙儿，否则我打过江去，他所有的公主都得给我这孙子作妾。”说罢，“还在孙子脸蛋上‘吧嗒吧嗒’亲了两口”。仅这几句，就把一个得意帝王的嘴脸，写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

人是复杂的。惟其复杂才真实可信。写历史人物亦然。这里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冯太后为例，她面对篡权的奸相能忍辱负重，可在关键时刻又能深思熟虑，刚毅果断地毒死了这个奸相，终于为十二岁的幼子保住了江山。可小说，没把这位大义凛然的冯太后写成贞节烈女式的人物，相反在“掌朝政柔情寄云冈”一章中，让我们见到的是位有血有肉、柔情似水、充满人情味的少妇太后。作家在这里为读者塑造了一位具有高品位审美价值的人物。

更可贵的是在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作者塑造的较为成功的不同性格的人物，不是一位两位，而是构成一个灿烂的星座，在相互辉映，光照全篇。

（原载 1991 年 3 月 26 日《辽宁日报》）

《南北朝始末》阎德荣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出版，定价 8.25 元。

## 执著地追求一种品格

——读肖平的散文集《金陵好大雪》

蔡桂林

新时期以来军旅散文虽没有像小说那样领过风骚，但它确如潜流运行，涌动着新的美学浪潮。这个印象，是我对一批军旅散文完成了一次整体性阅读之后得到的。这里，我想以肖平的散文集《金陵好大雪》，来窥观军旅散文的创作特点。

没有小我的无病呻吟，没有琐屑的抉微发幽，一点也不时髦，但一点也不动摇，执著地追求着一种品格，这便是肖平散文给我的最初印象。我以为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军旅散文作家的执著追求。散文集《金陵好大雪》通篇写军旅生活，写国门战士的英雄业绩和高尚情怀，字里行间时时会使每一个读者发现作者那双爱军人、爱生活的灼热的眼睛。这双眼睛在雪花纷飞的金陵古道上，看到了战场归来一个失去了双腿一个失去了双眼的战友，怎样互相借助着“看”盛开的樱花，赞美着战士心灵的美好和对生活的赤诚热爱；这双眼睛在战火纷飞的南疆战场，看到了一位突击排长为满足一位后方姑娘要一朵英雄花的要求，踩响了地雷，赞美着战士的爱心和情操；这双眼睛看到了很细、很密的江南雨中一位烈士的妻子坚定的身影，看到了老山朱氏三勇士，看到了将军的厚爱、连岛的风情、玉女峰的情怀……《金陵好大雪》便是从这双眼睛里闪烁出的情火，碰落下的热泪，泄露出的灵魂的声音。没有做作和矫情，没有醉心于生活表象，与某种程式化了的散文模式相比，这些作品显得俊美和潇洒，也因之升高了军旅散文的美学品位。

浓烈真情感的抒发是肖平散文的又一鲜明的特征。以往的军旅散文多人物的动作性描写，多事件性的过程描写，最后点旨，以致情寡味淡。肖平的散文中始终有一种真情流贯，使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被这种真情所包围，所牵引，走向胸怀开阔，感奋神旺。比如，《风雪夜归人》于强烈的比照中，写出了人情的美好，它明澈清纯，净化人的心灵；《温馨长存的记忆》写出社会各界对军人的深情关怀，于素朴平静的叙述中，流淌出醉人的温馨；单从《墓地上的婚礼》这个题目，你就可想象写出了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感情……这些篇章，是肖平心的辐射，情的结晶，折射的是时代“大我”的豪情，展现的是当代军人的高尚情操。

艺术表现上的多样性丰富性，在这部作品中也表现得比较充分。集子虽然共收了作者几年间的24篇作品，但艺术处置却各有特点。作为散文集名也是集子开篇的《金陵好大雪》，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一篇，布局精巧，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个艺术整体，谨严有致，形成了清丽纤巧的风格；《燕尾港书简》、《战地摄像纪事》等在结构上采取顺势行文，文体显得自由流动；《哦，我们的军营》等篇则侧重于夹叙夹议，使读者品尝到朴素之味；《雪的雕像》长于工笔细描，又使人领略到柔腻之美。这都说明了作者为文的开放性和良好的艺术潜力。同时也告诉我们：军旅散文并无固定之模式，它的生命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可以是悲壮凝重的，有浩瀚流转之势，也可以有活泼灵动之趣，可以低昂回旋一唱三叹，也可以明晰简洁一泻千里。要紧的是要有真精血横流字里行间，有大襟怀回荡文章之中。看得出来，作者能动地领悟了这些，并执著地追求着。

（原载 1991 年 3 月 26 日《解放军报》）

《金陵好大雪》肖平著，白山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定价 1.95 元。



## 不拘一格写大千

——《张大千艺术圈》读后

陈传席

近现代的著名画家中，我独对张大千不以为然。虽然在他去世时，我也写过文章以示纪念，其实是受出版社之托不得已而为之。但我却特爱读包立民先生所著的《张大千艺术圈》一书。作者把这本书送给我时，我正忙于自己一本书的校改，十分紧张，但又忍不住翻了一下，可是一翻却又不忍放下，一气读完，而且转过来又翻了一遍。首先是作者文笔朴实、流利清淡吸引了我。我读书，必开卷时有所乐，掩卷后有所得，缺其一是不为的。但时下很多美术方面文章，或文词隐晦生涩，或华丽浓艳，或故弄玄虚，或结结巴巴。内容如果不好也就罢了，我们不读就是了。如果内容尚好，不读又很遗憾，读了又费力难受，真是无可奈何，郑板桥《题画》云：“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写文亦然。文章或记事，或说理，或抒情，要使读者在文章中只见到事、理、情，不可给人留下满脑词句。文固然要通过词而见，但高明的作家却能“隐迹立形”，正如优秀的画家虽用笔墨作画，却能不炫耀笔墨，还要去其斧凿之痕。立民先生是记者出身，长于记事，读其文，张大千艺术圈中人和事、情和趣，跃跃然而现，却忘记其为文。这在目前乃是难得的文风。也许正和他的为人一样。他是一位热心、真诚、平和的人，他帮人办事、劝戒朋友，皆十分自然，决不故弄玄虚，决不使人感到难为情。不像有些人帮人办事，首先要反复叫你知道“你看，我在为你办事啊”，“这事不容易啊”。劝戒朋友，也要反复声明：“我在为你着想分忧啊。”这种人如果写文章必然要炫耀文词，空洞无物，好容易抛一点资料出来，马上就要大发议论。立民先生为文清新自然，丰富的资料，顺手拈来，一句一个内容，实实在在，没有连篇的空话和累赘的议论。这也许是我一气读完的原因之一吧。文固因人而生，爱其文却非因其人。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作者通过张大千和当时 20 多位著名人物的交往，生动地展现出近百年中国画坛盛事，以及近百年历史的变迁和旧中国文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如张大千拜师李瑞清、曾农髯，张大千受其母及其兄张善孖的影响和支持，与才子诗人谢玉岑，与著名文人叶恭绰，与国民党元老张群，与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与画家黄君璧、溥心畲、徐悲鸿、齐白石、吴湖帆、叶浅予、赵无极、毕加索等，与摄影家郎静山，收藏家兼诗人张伯驹，作家台静农，戏剧家余叔岩等人的交往，还有大千与他的情人李秋君、春红等。或排山倒海，或小溪流水，或汪洋恣意，或儿女情长，一个故事表现大千生活和性情的一个方面，统而观之，张大千一生的经历完整而全面。作者写的不是小说，但一个活生生的张大千形象便在人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了。如果要了解张大千其人的话，这就是一本最便利的书。如果要了解近代画坛上的重要画家和大事的话，这更是一本值得参考的著作，它为研究家提供了很多线索和资料。

作者自称，他现在做的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外围战”，“外围战”也是不可少的。研究绘画史，当然要以画为主，然而画是画家们的作品，因而研究画不能不知画家，画家的经历、思想、性情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了解其人才能加深对其画的理解。欧美学者的研究，是一开始直指画家的作品，

以画为主，这当然是更直接的方法，但是，他们为了研究画家的画，还要弄清画家和交往和生活道路，因而，立民先生这个“外围战”益显重要了。

当然，“外围战”是作者自谦的说法，我却认为这本书不但富有资料性，而且也有学术性，有很多内容颇能引人深思。我前时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画在世界艺坛上的地位，便得益于这本书中的资料。中国画本在世界艺坛上居于领先地位，20年代至40年代，留学法国的大画家都知道这一点。林风眠在法国时，他的老师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教授耶希斯对他说：“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美术》1989·6《“五·四”与新美术运动》）当时的世界著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都对中国的艺术十分景仰。常书鸿的老师就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不在巴黎，而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常书鸿就是在法国了解到中国艺术的价值，才毅然回国，投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韦利说要学会品味中国的草书要500年，西方最著名的美术史家兼艺术评论家贡布里希即认为韦利最懂中国的艺术……马蒂斯的画是学日本浮世绘的，而浮世绘又源自中国画，所以，举世瞩目的野兽派只不过是中国画的再传弟子罢了。然而现代人尤其是崇尚西方现代派的人都认为中国画不行了，落后了，为了使“中国画走向世界”，居然提出要用西方画改造中国画。他们认为中国画“不行了”的唯一依据便是：中国画在国际市场上售价太低。其他再也找不出任何根据，更讲不出任何道理。这真是笑语，艺术的价值居然是不懂艺术的西方商人所定。是商人的话重要，还是大艺术家的话重要呢？近现代举世公认的大艺术家莫过于毕加索了，我们看看包立民笔下《张大千与毕加索》一文中的记录，毕加索一见张大千便说，“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莫名其妙的是，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而且毕加索还抱出他的100多幅画，都是用毛笔学中国齐白石的画。崇尚现代派的人一提起毕加索，无不五体投地，他的每一句话都比圣旨还重要，那么，读了立民先生这段记录之后，又该作何感想呢？在《张大千与赵无极》一文中，立民先生又记载了赵无极年青无知时，对传统中国画不屑一顾，到了法国，他的认识提高，修养加深了，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画的伟大，于是他又开始由西向中的回归，致使他成为世界驰名的大画家。不懂艺术的商人、年青无知的人看不起中国画；艺术修养加深了，认识提高了的人，世界著名的大艺术家都十分崇尚中国画。中国画到底是落后了、还是先进呢？读了立民先生的著作后，也应该有所启发吧。

（原载《美术之友》1991年第3期）

《张大千艺术圈》包立民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定价11.24元。

## 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新著

——读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

——原型与流变》随笔

陈新璋

几年前，在文学界“方法热”热浪逼人的时候，我和许多同行都很想读到用外国文艺批评方法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诗词）的专著，以便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得到启发。但可惜得很，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似乎还正处在以理论上学习和理解那许多引进的“方法”之中，还来不及把它们自然而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去。近年来，这类著作才逐渐问世。虽然有的还显得粗糙和稚嫩，但总令人耳目一新，有所获益。读了王立同志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这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就更鲜明了。

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专著，王立这本书是在宏观研究意识指导下运用外国文艺批评方法的产物。近10年来，学术界颇多强调提高宏观研究意识，也有一些学者在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但无可讳言，这方面还有许多开拓的任务。王立同志这本书的宏观研究意识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古代文学史中，抓住颇能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这诸种基本关系，寻绎出十大主题，即惜时、相思、出外、怀古、悲秋、春恨、游仙、思乡、黍离、生死等主题，每个主题都从它的源头说起，理出一个发展变化的线索。这就超出了断代，孤立研究某家某作的界线，具有了纵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对十大主题的分析，既着眼于古代文学本身，又适当地涉及现当代文学，既立足于文学，又涉足于哲学、美学、民俗学、伦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具有了横的联系。这样，就把古代文学十大主题作为古今大文化氛围中的一部分来考察，从而避免了单纯就事论事的封闭性局限。

至于运用外国文艺批评方法方面，王立同志这本书主要是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也较多地涉及接受美学的理论。“神话——原型”理论是瑞士学者荣格提出来的。他在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个人无意识，也表现集体无意识，即民族传统心理的不自觉的流露。认为民族观念和感情从原始神话时代开始，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类型与模式，被人们无意识地继承着。后来每一时代的每一作品都是某种类型的具体反映，都可以从原始神话中找到它的原型。王立同志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时，避免了机械教条的毛病，并不一概把“神话”作为“原型”，因为中国古代神话远不如西方希腊等神话发达。如果处处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找“原型”，那就会发现有的并无什么类型依据。因此，对十大主题原型的寻绎触角伸向了古代文化的多个侧面。除了神话之外，歌谣、经、史等都多所涉猎，其中尤其是《诗经》。寻得“原型”之后，则沿流索变，以古代诗赋、词、文为主，延及戏曲、小说，甚至及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以悲秋主题为例，本书指出：悲秋，在《诗经》中“还仅仅以秋景及其音响来兴起抒情”，即仅仅是作品中用来渲染凄清的氛围而已，而《楚辞》则不同，宋玉是悲秋的始作俑者。一曲《九辩》，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动人诗句，

开始了中国文人自觉吟起的深沉而激越的悲秋咏叹调。由此，历代悲秋主题的作品络绎不绝，而且代有佳作可赞。在例举名篇佳作之后，概括地指出：“悲秋滥筋于诗，形成于赋，主要存在于抒情文学之中。”而“屈、宋悲的是政治失意，汉以后主题内涵迅速拓展，成为人们对社会、人生种种不可人意处抒发慨叹的一种固定表现方式”，并且绵亘不绝，饮誉至今。这样，对悲秋主题的原型与流变的叙述与分析，就带有了历史纵深感，具备了总结的意义。

王立同志这本书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的原型与流变中，不仅仅回答了“怎么样”，而且还探讨了“为什么”。譬如上述的悲秋主题，在梳理了它的原型与流变之后，还用大量的篇幅，指出悲秋主题的形成与秋的自然特质有关，与审美主体的社会性有关，与士大夫文人的心理有关。认为：我国特定的地域与气候，使得秋与春、夏、冬三季不同，它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自然界由生机勃勃、一片繁盛向萧索凋敝、满目苍凉演变的过程。作为自然界的审美主体，人们“在秋的这种特质中颖悟了自身的某种本质，将悲愁向秋景融入，又从秋景中升发忧思”。由于封建社会里不平事太多，失意文人的压抑感自然而然地集注于秋，将郁闷悲慨内化而结集于悲秋之作中，所以悲秋实为悲叹社会与人生。“浑浑噩噩，虚度终日的人是发不出真正的悲秋之慨的，悲秋是中国文人自我意识深化、外化的必然产物”。这样，就使对主题的探讨密切地联系到对自然、社会与文人心理诸方面，使之对读者具有较深的启迪。

王立同志这本书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古代文学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即哲学意义的扬弃的态度。对于古代文学传统，既不盲目崇拜，也不轻易贬斥，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十大主题的原型与流变所产生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本书努力加以发掘与肯定。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或副作用，本书也给予鲜明的批判。前者较多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者较好地吸收了同行的睿智与新见。例如论述怀古主题这一章，就专门写了“余绪余弊”一节，指出怀古主题对后世文学的负面影响：一是后人每多以既往的传统为价值参照系，在思想观念上不易超出传统的“楷模”，二是文艺思潮中复古倾向较突出，文学表现上自觉不自觉地师古拟古。后代文人这种潜意识的心理，便派生出文学题材、内容、表达中常见的意象、技巧、模式的渐趋固定僵化。作者引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从而指出：“怀古主题的存在与繁荣正是加剧了中国文人的怀故念旧心理，加剧了传统文化的僵化、保守、封闭机制。”毋庸置疑，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所以，本书作者对于怀古主题的扬弃，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王立同志这本书运用引进的西方文论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联系实际，颇多个人新见，值得一读。

（原载《语文月刊》1991年第4期）

《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王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定价3.80元。

## 审视曲艺发展的轨迹 ——评《中国曲艺史》

陈华幢

作为说唱艺术的曲艺，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并为其所喜闻乐见。在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曲艺艺术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曲艺艺术长期流传于民间，鲜有文字记载；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曲艺艺术被诬蔑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鄙词俚说”，很少有人去进行加工整理，这就为探索曲艺艺术历史源流带来了困难。从3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如郑振铎、冯沅君、关德栋等先生为曲艺研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曲艺艺术的新生，曲艺研究工作也有了发展。但无论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却都没有写出一部《中国曲艺史》来。倪钟之同志的《中国曲艺史》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的空白，也开阔了我们对文艺研究多方面的视野，是曲艺科学研究的新建树。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从一般意义上讲，如果不了解曲艺艺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就会缺乏曲艺的起码常识和必要的素养；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如果不熟悉曲艺发展的历史，就不能鉴往追来、高屋建瓴、得心应手地驾驭这门艺术。因此，一部优秀的曲艺史著作，既是初学临师入门的向导，又是博识家用之不竭的武库。关于艺术史的编著，在书稿的体例上，学者、专家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尝试。有的注重史的发展线索，材料翔实，但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属于叙述性的艺术史著；还有的注意艺术发展历程的“理论重组”，不以严格的“物理时间”为序，而着眼于艺术传统的论述，属于阐释性的艺术史。《中国曲艺史》的著者倪钟之同志，似乎力图兼取这两者之长，关注各种史学取向，既追求较为明晰的曲艺发展线索，注重每一发展阶段的史料描述；同时，又对主要曲种的艺术传统，著名的曲艺大师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分别进行较为集中的理论概括，作到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既入乎其中，摄取丰富的直接经验，又出乎其外，赋予史料以一定的理论色彩，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由近及远地审视曲艺的发展面貌，以便通过史的描述，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理论启示。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兄弟民族的曲艺丰富多彩。由于历史和民族习惯等诸种原因，舞台上演出的不多，以文字形式整理、保存下来，是解放后才开始这方面工作的。所以过去的一些有关曲艺史著述，在论及曲艺史上的曲种时，多半只涉及汉族的古今曲种，而对像藏、蒙族和柯尔克孜族的“三大诗史”（《格萨尔王传》、《江嘎尔》、《玛纳斯》），这样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之宏篇巨著很少涉猎，甚至没能收入著者的视野之内，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论著，充其量，只能说是一本汉族曲艺史，而不能说是中国曲艺史。倪钟之同志的《中国曲艺史》，根据现有的资料辟出专门章节对“三大诗史”加以评述，而且笔触所及，有对维吾尔族、哈尼族、壮族等诸多民族的说唱艺术的评介，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本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中国曲艺史！

我国曲艺艺术不仅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丰厚的基础，而且还有着优秀的革命传统。解放前，我国存在着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等几支曲艺队伍。早

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里，就出现过大鼓、快板、说书等曲艺形式。解放区的曲艺队伍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以反映斗争生活为突出特色，成为我国新曲艺的前驱；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曲艺作家和艺人虽然在重压下，却仍坚持着我国曲艺人民性的优秀传统。所有这些，倪钟之同志的述著，均有评介，这对继承曲艺艺术的民族的、优秀的、革命的传统，不断加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曲艺是一切说唱艺术的总称。研究曲艺的历史，无疑应该以曲种的发展历史为依据。只有对各个曲种的兴衰的原因做详实具体的探索，才能了解曲艺发展的历史趋势，掌握曲艺艺术的内部规律。但如果过细地追求曲种的沿革源流，就容易忽略对曲艺总的历史趋势的探讨，就不可能揭示出曲艺艺术的衍化与发展的规律。因此，曲艺史和曲种史的研究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作为曲艺史，应该概括曲种史的艺术特性，着重探索曲艺这一艺术门类与其他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努力解决文学史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取得曲艺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倪钟之同志的《中国曲艺史》，总体上来说，从曲艺的萌芽、孕育、成熟、衍化到近代曲艺的形成等方面着重概括了不同曲种的共性，探求曲艺这一艺术与其它文艺之间的关系，是一本对曲艺本体的规律特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揭示的好书。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4期）

《中国曲艺史》倪钟之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定价8.50元。

## 道出“说唱”古与今 ——《中国曲艺史》读后

张蕴和

我国的曲艺或称说唱艺术是地道的土产。它不仅生机勃勃地活跃在今日的艺术舞台上，而且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它不仅是我国文学艺术整体中的一员，也是这一整体的“母体”。但是与这一艺术自身相比，对它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却是相当薄弱的。而今，倪钟之先生积 30 年心血和前人研究之成果，经曲艺表演、创作、教学等训练与准备，拿出了洋洋 40 万言、完整系统地道出一部民族民间艺术的发迹变迁全部历程的力作——《中国曲艺史》。

曲艺说唱艺术不是我国古代“百戏”，但其杂多却为“百戏”所不及。把这样一种形同散沙的繁杂的艺术，看成是一形异质同、万变归一的整体，并企图描述出它的千余年变化轨迹，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书作者紧紧抓住曲艺的本来面目，遂使得这种描述清晰明了，一以贯之。在作者看来，曲艺的真相之一，在于它是演员以第三者身份向观众说唱故事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从这一规定出发，作者认为，隋唐以前，说唱因素虽早已存在，有时甚至发达，但终因那时的说唱因素或是混迹于文学或音乐的原始综合之中，或是以政治和宗教的宣传品或替代品出现，而未能形成独立。特别是作为一种大众性的表演艺术，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而广泛的观众群。只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艺术传统与外来文化艺术的碰撞，才使曲艺说唱艺术孕育而出，宣告形成。宋代的曲艺之所以繁荣，金元明的曲艺之所以出现稳定和变化，其实都是独立的说唱艺术特质及其观众群的发展、稳定与变化的结果。本书共分七章，将曲艺发展史划分成七个时期，实质上这就是曲艺萌生、孕育、形成、稳定、发展、变化的历史。不过在这条发展线索上，作者还抓住了曲艺的又一真相，即它的民间艺术属性。这不仅使我们看出曲艺由古及今的演变轨迹，而且还呈现出这门艺术的独特气质和品性。这点在先秦的说唱因素来源中，作者就给予了鲜明的描述，即曲艺是源自古代神话、民歌、优语与寓言的哺育，由于这一来源，使得曲艺在今后的走向中，必定沿着民众的情感、好恶、情趣相一致的道路产生和发展。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曲艺在唐代的形成中，固然与印度佛教大量传入我国而产生的讲经活动分不开，但是由转变中的俗讲产生的“变文”之所以成为标准的曲艺品种，并不是宗教活动的产物，而是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间说唱内容与形式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变文的出现不过是长久以来存在的民间艺术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的表现形式。作者还着重指出了文人学士对曲艺的参与和贡献是丝毫没有脱离民间传统的。

正因为曲艺是一门民间艺术，尽管有证据表明历史上曾产生了数量、品种繁多的作品和众多的艺术家，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却极少它的史料和遗迹。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残篇断简之中，也多有掩盖与歪曲。特别是越靠近近代，关于曲艺的史料越是难以发现。这种现象多史料少的情况是治曲艺史的一大难题。但本书作者并未视此为畏途，他在吸收大量的前辈、同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一靠自己的长期积累，二靠自己的切身经验，对曲艺史中的众多疑难问题尽可能给以明确解析和阐述，从而为勾勒出整个曲艺发展中的脉络奠定了基础。例如对于诸如先秦馨蒙与《成相篇》的研究，对北宋赵令畴

的《商调蝶恋花》非民间作品的论断，对明成化词话实为演出底本的解释，以及对子弟书作者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为数甚少的曲艺理论和少数民族曲艺的研究，都是极富价值和创造性的。在这类研究中，当史料过于缺乏时，作者就依据旁证和历史环境提供的参证，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如对宋代有无词话的讨论就是如此。而当材料稍显宽裕时，作者就不满足仅仅描述史料了，而是努力把握具体曲艺现象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出合乎史实与情理的论断。例如对宋代的鼓子词、唱赚、诸宫调以及明成化词话与《大唐秦王词话》的演变关系的描述。这使得整部曲艺史中散漫纷繁的曲艺现象之间产生一种严密的逻辑联系，同时也使得这种联系又具有一种历史感和说服力。

另外，作者虽无意于从文化演进的角度建构中国曲艺史，但他始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其发展中描述艺术发展的，特别是作者几乎在所有相关部分都详细讨论了祖国文学艺术传统以及外来文化对孕育曲艺的形成和促进其发展的实际状况，同时也深入讨论了曲艺对其他民族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简朴直笔的文风，无疑会对今后的研究者产生一种吸引力。

（原载 1991 年 10 月 6 日《中国文化报》）



## 喜读《黑白画理》

乌密风

我和王弘力先生相识很有一段时间了，在平时言谈中，很容易领会到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艺术家。他创作的连环画《十五贯》、《梦狼》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赞誉的。

王弘力先生还熟谙、酷爱东、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艺术，并融汇于自己的绘画创作、工业设计和理论工作中。他知识广博，经验丰富，无论是写实、具象、抽象、装饰等，都要在实践中认真消化，求得深刻理解，由于能深刻体验，致使他编著的《黑白画理》一书，具有独特的构思。该书全面系统地将视觉艺术理论形象化，是一部可供学习、研究、借鉴的美术论著。

《黑白画理》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型画集。有百余幅的图例和近10万的文字。收集古、今、中、外典型的优秀黑白美术作品，每幅作品后边都附有文字解说。这些图例的范围极广，从广袤无垠的自然界到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无所不包（从远古时代的崖画、壁画、彩陶、铜器、画象石、漆画，到19世纪的现代艺术抽象作品）。

《黑白画理》从美学理论的高度，将书中图例加以分析归纳，从而深入地揭示了形式的特点。他认为绘画形式明显的特点就是以造型形象所具有的形式感和形式美直接对视觉产生作用。目前出版的书，对于形式美问题的研究，多数是从美学理论上探讨论述，用艺术形象去说明美学理论的较少。因此，作者集几十年摸索、搜集、整理归纳、研究和自己艺术实践的经验，选择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以及杰出的绘画大师们的作品，去寻求、总结绘画艺术形式规律以及组成形式的各种因素。作者首先从千万年历史积淀的绘画作品中，精选出有代表性典型的作品介绍给读者。他没有从理论到理论，也没有单纯地当作资料来收集，而是两者有机结合。此书在第一小段“积淀”中的图例，既为读者勾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绘画发展概貌，使读者对绘画艺术形式规律有一个初步的全面印象，又为人们研究形式美起了启迪作用。书中所有的图例都有一段短文，作一些必要的定义解释。图例的选择精心细致，考证准确，具备科学性、典型性、系统性、广泛性、可读性的特点。所有的图，在题材、风格、手段、技法和样式、格式等方面，均给人一种美的感染。例如：作者选择的有上万年历史的西班牙阿尔玛加洞内壁画中奔驰的马车，为了表现马车快速的气势，画家采取“以少胜多”的概括手法，以纯化了的形体去表现众马快速奔驰，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马头、一个身躯、一条马尾和前后共十二条晃动的马腿拖着两个大小不同的车轮和两根缰绳，由一位上身赤裸驾车人驾驶前进。画家巧妙地突出驾车人的动势和那匹飞速奔驰、晃动着前后共十二条腿的马风驰般前进，气势雄浑，跃然壁上。青海省出土的一个陶盆，内沿的一条三组人物组成的边饰，是用横直线、弧线、斜线组成的连续图案，表现一群舞蹈着的少女。有趣的是人物的辫发向右摆动，衣裙则向左摆动，各组人物的手多画了一笔，便大大增强了人物的动感，画面安排得既统一又有变化，宛如一幕节奏有序的舞蹈表演。《汲水图》画家用的手法很独特，效果也很别致，画面上的一切自然空间的景物都处理成平面形象，如画中的池塘、水纹、荷花、人物、树木，既不用透视，也不见光影，这些景物形象，都像是压平了似的，极富装饰风味。《宫廷饮宴图》，画家

将现实中同一空间不同深度的偌大一个场面，用了几条横线，像楼房似的分为若干层，把宴会中的人物、器物等，按情节安排其间，使庞大的场面杂而不乱，疏落有致。其他还有甘肃敦煌、西藏的宗教壁画、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版面、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插图、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日本的文人山水画、浮世绘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新兴艺术流派的大量作品，介绍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貌。

王弘力先生还连续他讲述有关构成形式感的因素、构成形式美的法则和手段，技法及 19 世纪以来各种绘画流派的风格、表现手段与技法等共 18 个问题，如：明度、图地、线条、仿影、点绘、样式、构图、空间、视角、引向、动势、繁简、对比、象征、错觉、转换、变形、意象。

《黑白画理》这部著作，集千余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画派、不同特点的绘画作品，以及深刻透彻的论述。毫无疑问，《黑白画理》的问世，为丰富和扩展我们的眼界和艺术想象力、艺术修养，提高审美能力与艺术格调有着重大的价值。对我们国家的艺术发展繁荣，也有深远意义。

（原载《美术之友》1991 年第 6 期）

《黑白画理》王弘力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1 年 4 月出版，定价 19.20 元。

## 幽默诙谐喻世醒人

——读《中国历代幽默讽刺故事大全》

佩 华

中华素称礼仪之邦，民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在数以万计的典籍之中，记载了我们先人无数的幽默风趣醒世育人的故事。然中华古籍卷帙浩繁，犹如汪洋大海，再加上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因而使无数人望书兴叹，诚为遗憾。数年前，我曾与数位好友商量，搞一部幽默大全类的书，内容就从我国历代古籍中寻找。后因诸多缘由，也就无了下文。前不久，一位报社工作的朋友来到我处，拿出了《中国历代幽默讽刺故事大全》一书给我。看着这装帧精美、厚厚一册，我不禁慨叹：既为自己的无功而返惭愧，更为大连出版社出了这么一本好书而高兴。

朋友走后，我挑灯夜读，花了数天时间看完了全书。阅读时常常哑然失笑，绝妙处更是拍案叫绝。家人都说：“脑子出毛病了。”朋友又来电话说，看完了吧，请写一篇评论，我说，评论不敢，就写一篇读后随想记吧。

我看完全书，首先想到的是，唐麒、缪宏、赵谷怀、王国忠四位先生为我们作了一件大好事。他们四位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选出从先秦到清朝末年的 175 种书，然后再从中选出近 2000 篇构思凝炼、奇巧，妙趣横生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这一过程是将近八年之功。朋友，当你轻松一笑之时，不应该忘记四位编译者的辛劳。

其次，这本书在排列上也较为妥当。全书故事按产生的年代先后次序排列。全书分为六编。第一编先秦；第二编汉魏六朝；第三编隋唐五代；第四编宋元；第五编明代；第六编清代。并且在目录中注明了各种古籍产生的朝代及作者，令人一目了然。这样，就正如作者所说的，使这本书既起到普及作用，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

第三，这本《中国历代幽默讽刺故事大全》所选的书籍中也很有代表性。先秦著名的机智人物、杰出的政治家晏子著的《晏子春秋》，相传列御寇撰的《列子》及《庄子》、《孟子》，汉魏六朝的刘向撰的《说苑》，刘安的《淮南子》，陈寿的《三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特别应该一提的是，书中收录了三国魏人邯郸淳撰的《笑林》，共计 20 篇。《笑林》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原书共有三卷，篇幅短小，文笔生动，记录了数百篇妙趣横生的故事。内容以揭露时弊，反映矛盾，嘲讽丑恶为主旨。但非常可惜，由于诸多原因，这本书现已基本散佚。仅在鲁迅先生所著的《古小说钩》中存有 20 余则。《笑林》不仅开创了我国幽默专集的先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之后，在隋唐出现了侯白撰的《启颜录》，朱撰编的《谐噱录》等。书中宋元编中搜集了众多大学者、诗人、政治家的作品，如《艾子杂说》（相传苏轼撰），欧阳修的《六一笔记》，范正敏的《遁斋闲览》，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等，不一而足。幽默作品在我国的明清两朝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在书中也体现了，第五编明代、第六编清代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三，如明代乐天大笑生编的《解愠编》，冯梦龙编的《笑府》、《广笑府》，浮白斋主人编的《雅谑》等；清代石成金撰的《笑得好》，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游戏主

人编的《笑林广记》等，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写下了灿烂的一笔。

（原载 1991 年 7 月 29 日《书讯报》）

《中国历代幽默讽刺故事大全》唐麒等主编，大连出版社 1989 年 4 月出版，定价 14.00 元。

往事难忘 旧情如梦  
——读《撒哈拉的太阳——三毛作品  
精华赏评》

娟子

可以这么说，三毛在世间的亮相，似乎总有着精心的安排。如果记忆没有出差错的话，三毛作品在大陆走红当是在 1986 年左右。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学生中的女孩子们，总以拥有一本《雨季不再来》或《梦里花落知多少》或《撒哈拉的故事》等散文集为自豪，当然那漂亮的散文集书名首先就是一个引人的标志，如同书里那一篇篇漂亮的散文，这些标志将延续到今后。三毛及三毛的作品在中国影响了十年（包括台湾），而她在大陆的每次出现，总带来一片轰动效应，从五年前的三毛热，后来也曾传闻三毛死了，以后又有三毛认画家张乐平为义父，紧接着三毛回故乡大陆省亲，然后是《滚滚红尘》剧组在大陆拍外景，最后是三毛自杀。一个句号画得如此壮烈，以至让人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三毛总是想方设法让人记住她，大陆台湾两地（大概远不止两地吧）的新闻界围着她团团转，而三毛却超凡脱世，颇有“等闲之事云中笑看”的姿态。就整个三毛为人来看，她是追求潇洒淡泊的，否则她这辈子不会选择流浪生涯，事实上，大凡流浪的人必定淡泊、不羁。这点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外出旅游的感受上认同，出游在外，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别的方面总要少些拘束，多一点自然。于是三毛成了“自然之子”，并且因为流浪生活萍踪无定的特点，她的行动多了臆想性随意性。通观三毛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些，甚至有信手拈来的轻松。然而细看三毛的每篇散文或故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每篇都是作者浓郁而深厚的情感世界的外现，不管是前期的《雨季不再来》，还是中期的《哭泣的骆驼》，不管是悲伤的，还是诙谐的，三毛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达她的情感。叫人随她哭，跟她笑，这就逼得人惊叹不已，前后二者看似非常矛盾的风格如何在三毛的作品里如此统一，而且显得和谐？三毛之所以成为三毛，大概也缘于此。她乐于寂寞又不甘寂寞，想离群索居却又不愿让人忘了自己。

《撒哈拉的太阳——三毛作品精华赏评》是三毛作品精华集萃，编者细心之处就是在每一篇作品后都附加了赏评，因此作为这本书的书评，在此对单篇作品逐一点述，则显累赘。三毛的作品看的人多，评的人也多，对她的文章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看。而同书收录的三毛其父其母对三毛的回忆与怀念，倒是让人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了解三毛。三毛小时候很独立、很冷淡，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喜欢一个人去荒坟，看宰羊，在父亲不刻意的笔触下，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儿浑然出世，坦然离世。三毛的作品很多都充满了恋旧味，读过她作品的人可以看出，三毛常常是在写过去的故事，客观上，也因为三毛的经历和传奇太丰富了，以至于未来的东西与它们相比太逊色，也无从谈起，在恋旧味的气氛下，关于死亡的主题也若隐若现。三毛是信奉基督教的，一方面她认为人生苦短，颇有消极味，可另一方面，她的行为却是投入而又积极的，跋千山涉万水，问虚寒送温暖，到哪儿都留下她真挚和热情，也因为如此，三毛成了她母亲的女儿，大家的三毛。人们对她太亲近太熟悉了，掩盖了已露端倪的死亡气氛。用三毛的话说，投入生命的目的只是好玩。因为好玩，她可以我行我素，初恋不成功就甩袖远走他乡；

也因为好玩，她从此与流浪结缘；正因为好玩，她把写作融入生命，到最后她实现常人不能达到的境地；在生与死这一选择中，三毛从容地选择了死。说这是积极，似乎不妥，说这是消极，似乎更不妥。三毛本身就是极端矛盾融于一身的人。她把一生的传奇留给读者，也把无尽的迷惑留给了人世，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三毛这么想过写过，不尽的轮回概念许多人只是说说而已，三毛却用行动作答。撇开其他因素，单就勇气而言，三毛无愧为三毛。

如今，依然有人为拥有三毛的书而满足、自豪，关于她辞别红尘的原因人们已不像前阶段那么深究。在这时候，大连出版社出版了《撒哈拉的太阳——三毛作品精华赏评》。三毛是不想让自己受冷落的，从儿时就常埋怨父母轻视她，到为人偶像后依旧怕人淡漠她，是不是每个热情的人身后都有这种刻骨的孤独，何况乎作家。而此时大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像是在为她还愿，也像在追念往事，其实往事是难忘的，只是浓淡各异而已，不管是梦里的花落，还是盛开的玫瑰，不论是生存还是死亡，有一份情感为她保留，大概出书是最好的形式。

（原载 1991 年 8 月 12 日《书讯报》）

《撒哈拉的太阳——三毛作品精华赏评》杨子编，大连出版社 1991 年 4 月出版，定价 4.20 元。

## 努力开掘东北地域的内涵

——小谈杨大群的《铁头张关东闯荡记》

胡世宗

在文坛上，大群是我熟悉、敬重的兄长之一，他的长篇新著《铁头张关东闯荡记》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大群地地道道是东北这块油黑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是东北人民的儿子。他的老辈儿人是从山东来的。山东、河南、河北，是闯关东队伍的三个来源；流放犯、逃荒者、闯大运的人，是闯关东队伍的三个组成部分。对这“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大群十分熟悉。他从小就听老人讲过无数个闯关东的故事。他的《铁头张关东闯荡记》，是他酝酿时间最长、也是最下力气写出的一部长篇新作。他这部书，为我们展示了发生在东北大地历史上的传奇动人的篇页，为我们描绘了一卷关东乡土人情的风俗画，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曲折生动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我觉得这还不是他写这部书的主旨，他的主旨似乎在于透过早已垂落的远逝了的生活的帷幕，探寻东北人的性格及其成因。大群至今已有八百万字的创作之果。这八百万字几乎全是写东北人民生活的。他不断趋于自觉地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开掘东北地域的内涵。法国作家及哲学家西摩尼·威尔在她的《寻根溯源的必要性》一书中指出：“寻根溯源也许是人类最重要而最不受重视的需要。它还是最难以阐明的问题。人如果真正积极而自然地参加一个地区社会的生活，他就会生根，因为地区社会总是细心维护历史上的一些独特宝藏并且精心培育对未来的某些独特期望。”大群这部书表现了他对东北祖先的景仰和怀念之情，倾注了大群热乎乎的心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东北地区社会的某些“独特宝藏”及对未来的某些“独特期望”。

大群是个嗜好极少、生活极单调寡味的人，他的全部人生兴趣几乎只是伏案写作。他不钓鱼，不打麻将，不跳舞，不吸烟，不饮酒，但这并不妨碍他呼吸社会的、文学的新鲜空气，他总是积极吸取文学新潮中对自己有益的营养，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在《关东演义》创作间隙，大群曾写过一部不算厚的小长篇《人·狗·狼》，这本书问世后引起的反响甚至不亚于《关东演义》。大群在《人·狗·狼》中不很注重情节的繁密紧张，而有意在灌注诗的意蕴方面做了一些探求。这次写《铁头张关东闯荡记》，大群又做了新的努力。他历来强调雅俗共赏，而这部新书，他在注意到雅俗结合的同时强调以雅为主，在紧张的故事情节里着重刻画人物形象，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原载 1991 年 8 月 28 日《沈阳日报》）

《铁头张关东闯荡记》杨大群著，白山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定价 5.40 元。

## 小岛上有个大世界 ——读董天柚的长篇小说《鬼蟹岛》

王瑞起

读罢董天柚的小说《鬼蟹岛》，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思索了好一阵子。好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了。《鬼蟹岛》的故事并不离奇。师范学校毕业生江菊芬主动要求到偏僻的鬼蟹岛小学去教书，可是这个小学早已关闭，孩子们都跟着大人们干活挣钱去了；或进城去打工，或跟着大人们捣腾小买卖儿，年龄小一点儿的，则去海边挖沙蚕。赚钱，成了小岛人唯一的奔头。江菊芬为这些淹没在铜锈中的儿童深感痛惜，于是便挨门挨户地去动员他们复学。但是这些嘎古的孩子们和她兜来兜去，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最后，还是她那颗赤诚的心感化了这里的大人和孩子，使他们知道了人生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学校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从这场愚昧与金钱的斗争中，使读者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与四化建设的重要性。她决心要用手中的笔去反映这一现实生活。可是在讲求“经济效益”的今天，出书又谈何容易？她的这一良好愿望被“黑帆船”上的白虹鲛所利用，斗争仍在继续，而且更加复杂，更加艰险，更加曲折。最后，还是她亲自培养的觉悟了的孩子们挽救并挽留了她。

小说选择了偏僻落后的鬼蟹岛这一环境，用以表现商品经济泻入农村所带来的心理和观念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少年儿童所造成的影响，则更真实，更典型。作者把农村经济改革这个大背景，把这场改革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各色各样的心态观念统统浓缩在这个小岛上，并通过愚昧落后、目光短浅而又单纯朴实、不会“委婉”掩饰的农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尽管作品写的是一个大主题，一个纷纭复杂的大世界，但却是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编织了一系列颇能吸引孩子的故事，用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用儿童的思维方式去思辨生活，并把孩子面对社会世态的变化真实地刻画出来，引起孩子们的思考，引导他们走向人生，培养他们应付现实的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独具匠心，把一个愚昧与智慧残酷斗争的“学船启智”的历史故事，与上述这个主体故事有机地结构在一起，从历史走向现实，从而拓宽了读者的思维空间，加深了作品的思想蕴含，有力地表现了“教育兴国”这一重大主题的深刻意义。同时，也使作品更富于变化，增强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原载 1991 年 8 月 31 日《文艺报》）

《鬼蟹岛》董天柚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定价 2.50 元。



## 集历代六言诗之精粹 ——评《历代六言诗选注》

任雪芹

在我国古代诗苑中，六言诗虽不如五、七言诗那样绚丽多采，却也具有她独特的幽香。在我国历代诗坛上不乏六言诗名家。由于六言诗以双音步收尾，无单音步为之调节，读来远不如五、七言诗之流畅，但其诗所反映的内容与五、七言诗却相差无几，诗形也有独到之处，读后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享品味之乐趣。

《历代六言诗选注》精选了历代 80 位名家的六言诗佳作 121 首。上迄三国，下至清末，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有三国魏晋时的嵇康、庾信；唐代的王维、杜牧；宋代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这些诗是历代名家精品的荟萃。诗句无疑被当时的时代所牵引，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你漫步在这六言诗的长廊里，使你如跨入遥远的时代。在这里你可读到嵇康的《惟上古尧舜》，领略到这位“竹林七贤”诗人那饮酒清谈，议论时事，狂放不羁的风采；读到庾信的《怨歌行》，会感受到那苍凉悲慨之情；而王维的诗句与前者截然不同，具有一种超然之美，如《田园乐》（七首之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仔细琢磨此诗精采之处在于：作者在这里注意颜色和声响的艺术组合，使诗中有画，景中有声，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全诗充满了生气，鲜明地表现了雨后清晨山中自然风光的美妙情韵，给人以美的享受。此诗被后人誉为六言诗中的凤毛麟角。

在这六言诗的殿堂中，写景、写情，实为壮观，诗卷中充满了诗情画意。有人说：“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因此有的诗秾华繁采，有的诗幽韵冷香，有的诗则一切出于自然……他们流派纷陈，风格迥异，色彩纷呈，韵味无穷。

我国古今诗歌浩如烟海，而在历代编选的诗集中收有六言诗者为数甚少，即使收集也是寥无几首，更无六言诗专集，所以在诗坛上长期留有一块空白。大连出版社经过大量的翻检工作，辑百首于一集之中，使这些鲜为人知的六言诗，闪烁出华光异彩。诗评家周汝昌先生高度赞誉此集为填补空白之作，并欣然为本书题签。这部脍炙人口的诗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中国六言诗发展和艺术成就之窗。

诗集在作品后附以作者简介、注释和评析，为欣赏、学习、研究六言诗提供了方便条件。

（原载《全国新书目》1991年第8期）

《历代六言诗选注》壮子编，大连出版社 1991 年 2 月出版，定价 2.90 元。

## 愿你永远年轻

唐耀华

青春，对于人生无疑是最可宝贵的，是无法用货币一类的价值尺度来计量其价值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最易于流逝的。不是有一首歌叫“三十以后才明白”吗？到“而立”之年能明白青春的要义，懂得人世间许多惊天动地的伟业都蕴蓄着青春的伟力，还不迟；等到“不惑”之年才了然这个中奥秘，那就太迟了。古训中早有名言，“千金易得”，“寸阴难寻”，这是极而言之，无非告诫青年人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珍惜寸阴，否则“逝者如斯夫”，光阴是无法倒流的。青春已逝，哪里寻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愿你永远年轻”，只是愿望而已，年龄到了生理上的极限就不再年轻了；从心理上说年轻的时限还可以拉得更长些，但也不是无限的。然而，尽管“愿你永远年轻”，这祝福可以引起人们的愉悦，但远不如“趁你还年轻”来得实在，那个“还”字透着终有一天会不年轻的，一种时不我待、鼓舞人向上拼搏的劲儿特浓。所以，我说，《趁你还年轻》这书名起得真是棒极了。《当代工人》杂志早就办了这样一个专栏，专发年轻人写的散文，收入书中较有影响的散文，有好些篇是先在这个栏目里面世的。这个栏目的名称起得真好，办得也好，为推动散文的繁荣，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趁你还年轻》收录辽宁省 26 位青年作家不同时期写的散文。作家中的年长者与共和国同龄，年轻者才 19 岁，几乎相差一代。把差不多两代人的散文编在一个集子里，真是有意思极了，他们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反差是那么强烈，读来是没法不让人怦然心动的。

散文这种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完整理论框架的文学样式，具有极大的宽泛性和自由度，它负载着世事时风的嬗变，传递着心灵感悟的历程。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人格情趣和追求自由的灵魂，在形式灵活的散文审美由表层向深层运动的艺术表现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创作主体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追踪断续的生活，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觉点染生活流程的图景，在美的心态和灵魂的外化中，升华历史感受，因此，它最少矫饰，最具纯情。

收入本书中的散文，尽管艺术风格各异，对生活感悟的深浅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去矫饰，不做作，表真情。敢于向世人敞开自己的心灵，勇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不畏世言，敢爱敢恨，敢怒敢怨，敢笑敢哭，真实地倾诉自己心灵的絮语，片刻的思绪，描绘生活画卷，勾勒人物速写，在娓娓倾诉中，留下了时代、思维、情感乃至文体流变的印记。

人生经历不同，品味人生的苦乐艰辛不同，留在散文中的历史感悟也不同。时代风云，家庭不幸，上山下乡，回城谋生，无不磨砺着人生经验，心理上沉积着随时都可能喷发的情愫，常常使审美的触角超越理性的约制，伸向潜藏于社会深层的诸多原生态的文化现象，在这里，作家具有审美创造的充分自由。马秋芬写到酒厂体验生活的散文，竟从她“不走运的父亲”，家庭生活的艰难，每次只能花一角二分钱替父亲打二两烧酒开头；酒厂“出头曲好酒”时，忽然“想起了白发父亲那一丝可怜巴巴的渴望”，“我……眼眶里竟有了潮湿”。父女深情，以及父亲在 1957 年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在她幼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没有温馨、没有春天的童年生活的辛酸在她心理上积淀的情绪，激励着她在以后的生活漩流中拼死命地挣扎，顽强得

令人肃然起敬地拼搏，更深深地影响着她以后的创作。张真的《母亲，那天夜色很美……》是一篇让人欲哭无泪的好散文。他在冷静的叙述中，讲了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没有故事的故事，哀婉动情。父亲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改，母亲瞒着子女，以免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自己却忍辱负重，背着十字架，打发含辛茹苦的日月。作家发自内心的呼喊读来令人心颤：“母亲，人世间的讥讽您都是逆来顺受，可这种负罪感又降临您的孩子身上……有什么比摧残天真烂漫更残忍！”素素的《家枣树》以动情的笔调描绘了上一辈没有恋情却独具深挚相爱的婚恋。家居农村，父亲当兵离家，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奉献了青春，转业后在县里当公安，母亲不肯到县城过安逸的日子，甘心干农活搞家务抚养子女，打发艰辛却不乏温馨欢乐的日子，双亲把自己全部的爱都默默地献给了这个世界。魏丹的《永驻心中的》，品味人生冷暖，深蕴着哲理的思考，“爸爸是市里一个非常有权势的部门的领导”，他在世时门庭若市，去世后门可罗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她对生活的思索是深刻的：“人走茶凉！”“当然，凉茶也是有的。不过，也无碍。而且怕还有一点令人提神、清醒的功能呢，”我很喜欢刘元举的《我总想活得不平庸》，这是一篇凝聚着深沉的历史思考与时代意绪的佳作，读后为之动容，令人扼腕。巧得很，他也是从父辈的生活经历中悟出了人生哲理，父亲活得恭谨，工资很低，虽也有时“耿耿于怀”，但绝无非分之想，安于清苦，决不多取不属于自己的一分钱，尽管他是一位货币过手数额很大的会计师。这位父亲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使元举引以为自豪的。然而，生活的磨难，使元举悟出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真理：再不能像父亲那样生活了。他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格，却再不肯像父亲那样平庸地安于现状，而要活得更好。他十分理智而又无所顾忌地喊出了：“我不想平庸地活着，这是我从骨子里透出的喊叫。”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庸之道，“知足常乐”、“烦恼皆因强出头”的古训，在生活中像幽灵一样几乎无处不在，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们的头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构成了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很难见容于青年人冒尖的心态，尽管生活在变革中对这样的观念有所松动，可是，要喊出“我不想平庸”这样真正不平庸的话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篇只有3000余字的散文，所以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同样从生活中悟出了这样一个浅近的道理，我也不想平庸。然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要说喊出来，就连悄悄实践的勇气也没有，怕惹来麻烦，招来批判，“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是最现成的帽子。就因为缺少这样一点勇气，蹉跎了岁月，如今已是两鬓添霜，青春不再，一事无成，悔之何益。我真羡慕这一代年轻人，活得那么潇洒！

散文最忌模式化。散文的艺术意蕴存在于表面上信笔所至而实际上凝聚着具有原生美的潜在结构的律动中，也存在于审美触发无限延伸的生活形态的流动中，发散式的潜在结构能够促使艺术触角最大限度地伸向广袤人生的各个领域，或向一个焦点运动，或呈扇面延伸，从而形成一种追踪诸多文化层次的艺术律动，进而形成一种引发读者不尽想象的艺术张力。散文的原生美和表层结构的发散，看似对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自然景象有所触发，信手拈来随意敷衍成篇，其实是凝聚着作家对生活对大自然无限深情的拥抱，对人生文化背景的探究，散文的艺术感染力也在于此。黄世俊在《吻雨》中以炽热得滚烫的语言赞美大自然，讴歌“雨是生命的再生原”，“宇宙会有黑洞，岩石会风化，动物会绝种，人会死亡，独有雨永生，活得磊落，活得潇洒，

活得辉煌”。他以诗人的热情诗的语言称颂“雨成了人格化的活生物，蕴涵着一种崇高的情感与无穷的哀伤”。人与自然的融合、撞击，“足以使邪恶威风扫地”，美的情感、美的心灵升腾得更加斑斓绚丽，光彩照人。在这里，感性的顿悟，直觉的超越，使文化视域以最隐蔽的形式最自然的方法在感情的沃野上衍生延伸。李松涛在《猫虎缘》中表现的却是人与动物在日常生活的频繁接触中生成的难舍难分的感情。把人性与动物性（兽性）放在同一文化原生背景下探究其生存的奥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作家如数家珍般他讲述了他家养了一只叫“娇娇”的小猫，它那柔和的目光，温驯的性情，从容的仪态，斯文的叫音，整个一个活脱脱的知识分子形象，惹人喜爱。作家深情地说：“人有感情，猫也是有感情的”，继而娓娓讲述人猫之间在生活接触中形成的难以言说的感情以及它给全家带来的“毛茸茸的欢乐”。娇娇病了，给全家罩上了一层阴影。悉心治疗照料，也没能留住它的生命。在它生命垂危之际，还坚持着过完春节、元宵节，才悄然离去，把最后的欢乐留给人间。在这篇看似不经意的描绘却倾注了作家一片深情的散文中，没有着意经营的情节，没有故意编织的故事，也没有渲染逗人发笑的噱头，可以说叙述的语气太平淡了，平淡得读过开头都不想读下去了，但是，只要你多读几行，就会被牢牢抓住，非一口气读完不可。在那叙述的语气平淡得令人震惊颤栗的后面，却深蕴着远不是一种倾向所能概括的题旨，给人以深沉的心灵震颤与极大的审美愉悦。史晓鸥的《魂去归大海》对父亲的挚爱与催人泪下的追忆，向人们昭示，人间自有真情在。《秋逝》以清泉般的纯情向世人袒露自己的情怀，深情依恋如秋叶般飘逝的昔日恋情，“大滴大滴的眼泪泉水般从指缝泻出。我真想让我的哭声融进山呼海啸，我真想让我的泪水汇入长江大川”。这是何等情真，何等意切。是时代的悲剧阻隔了这纯真恋情的绵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岁就写就发表作品今年也才只有19岁的尔蜜的散文，那童真的心灵，美好的世界，小伙伴间纯洁的友情，温馨的家庭，情窦初开的“捉摸不透的歌”，都成为她笔下表现的对象。她的视界虽然有限，但绵绵情浓；她的文笔虽还稚嫩，但简洁清丽，平实而不乏意蕴。

读这样的散文集子，是令人十分愉悦的。在这里看不到“杨朔模式”的约束，看不到向单一题旨圆心运动的运笔筹思，作家们竭尽全力不使散文囿于难以超越和发展的樊篱，而是追求实现自我的真实情感真实的艺术品格，这是审美意识悄然与现代观念融合的结晶。可以说，这部散文集就是一卷心理意绪心灵感悟在现实生活中微妙变化的审美流程图，那笔触的委婉，情调的冷峻，旋律的深沉，色彩的鲜亮，憧憬的美好，忆旧的苍凉，以及闪动的泪珠，流淌的笑音，品格的朴实，无不留下了心态流变的轨迹，留下了历史律动的足音。我们也可以说，散文集大体上反映了辽宁省青年作家散文创作的概貌，它可以与全国同类选集比肩而毫不逊色。

中国是散文的泱泱大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采，绰约多姿。世事惊涛，风云变幻，山川风物，社会习俗，壮怀激烈，儿女情长，无不成为散文创作表现的对象。散文体裁的极大解放，为作家舒眉展眼，各显才华，各领风骚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心中有世界，笔下文思奔涌，一个精思境美，文采飞扬，眩人眼目的散文大繁荣，已经见其端倪了。

（原载《鸭绿江》1991年第9期）

《趁你还年轻》康启昌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定价 3.60 元。

## 歌者的绝唱 ——读《刽子手之歌》

安波舜

不记得已经读过几遍《刽子手之歌》了。

只记得 1987 年第一次读时，非但没有感觉到读梅勒的作品是“人生的一大快事”（美国《新港纪事报》评论），相反，倒生出些窘迫和凄凉来。因为面对梅勒“近乎完美无瑕的技巧”和“巨大的成功”，你几乎目瞪口呆无话可说。梅勒究竟离我们太近了，一洋之隔，倒不如古典作家可任意品评掩去些令人尴尬的比照。也许有碍于斯，也许是梅勒的成功在于“暴露的真实”，有悖于某种社会的需要，总之，国内散见几篇评介文章之后，大家似乎隐约抱定了沉默。

例如，梅勒先生也是一个“造反派”。他的经历在年轻的时候，也和我们一般中青年作家差不多。他生于 1923 年，1944 年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太平洋部队当过兵。那时候的美军装备比不上现今，和我们的上山下乡差不了哪去。再之后就是考入巴黎大学，再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像反战示威、竞选纽约市长之类。从他早期的作品看，梅勒无疑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欣赏无政府主义或者吸毒什么的。他的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失败和痛苦是注定的。如果说，后期现代派的作品中的痛苦和绝望，大抵都能分娩出高尚的本真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基督教文化使然，那么，《刽子手之歌》中加里为争取死亡权利和地狱里的爱情同整个资本主义法律的抗争，这一具有深刻反讽意义的悲剧与绝望，则是由梅勒悲枪庄严的理想主义和独特的同情心构成。同情心的“独特”是说，按一般的道德原则是维护人的生存权利，而梅勒却同情和鼓励加里对死亡的选择。这一惊世骇俗的英雄主义之举对中国人的生死观来说，当然难予接受，对讲求博爱与宽恕的西人来说更不可理喻。但是梅勒成功了。他懂得如何尊重读者，和他一道带着理想主义激情，去理解他们近百万字描绘的道德困境：既然加里已经对现存的世界绝望，并且相信灵魂不灭来世可以变个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他呢？这一“独特”的同情似乎有悖人道，但犹太教关于人的教旨是：人在伦理上有自由选择权，也负有责任。这一《圣经·旧约》的观点，也给基督教伦理学以重大启发。因此，作为犹太作家的梅勒有更充足更人道的理由发问，并使这一发问更具古典主义人道精神。

梅勒似乎也经历了一个浮躁的阶段。竞选失败，理想苦闷，成名后也打过离婚，甚至当众与糟糠之妻动起刀子。社会上多有谴责，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专利，在小说中剖白自己。例如在他 60 年代的小说《黑暗中的军队》中，他以主人公之便，迫不及待地宣泄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指向。尽管这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但强烈的主观色彩使后人读起来不敢恭维。这大抵和新时期文学刚起步时，最先抢向潮头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经历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梅勒并没有就此变得很灰或者玩性十足，在一己的情怀里营造那攥得出水的孤独，诚如那贩豆腐的小贩，一朝抛不出去便骂人不识货。

在长达百万字的《刽子手之歌》里，梅勒变得异常冷静和谦和，带着一个成熟男人那种忧伤而又低沉的调子，宁静而又壮观地叙述出上万个真实、生动、准确而又意蕴深邃的生活画面，近百个和主人公一起分享精彩的人物。

他用他的天赋和观察力，集中了无数个“表象下面有着潜在特征”的生活细节，使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获得思考本书以外的机会。你只能在梅勒的世界里徜徉，因为你不可能比梅勒知道的更多；你只能在被梅勒的天才覆盖，在他洪水般的真诚和同情面前安静下来，同他一起反复咀嚼加里和加里周围世界的精神痛苦和原始罪恶。同他一起去理解一个囚犯为什么“要带着尊严去死”，在刑前的几天里，安然坦率地签署出卖自己眼睛、肾脏、脑组织的合同，出卖自己生活经历和精神活动的版权。所有这些生命本能的痛苦积累，无疑调动起人们的文化本能，深入到精神痛苦的最深处，集聚着巨大的透破力，去完成对社会异化的超验批判。从而在人与社会的荒诞秩序，生命与灵魂的初始愿望，个体与群体的道德困境的思考中，体验出最纯正的悲剧快感。

说到底梅勒是在写人。写加里的生死和绝望，写他本人的痛苦和提问。但唯有真实才可能产生痛苦，产生悲剧，才能脱胎出高尚的宗教精神和完美的人性。但真实不是现实。这也许就是我们对现实理解上的偏差。现实的扭曲和异化，有时使人无法确定生活的空间和位置。于是梦幻和荒诞就成为后期现代派的主题，并由此产生出多变灵活的表现形式。说这一流派已濒临绝境，多少有些不怀好意。事实上，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刽子手之歌》或许能证明这样一个趋向：经验模式的传统现实主义和虚构模式的现代主义的渗透与互补，在更高的文学层次上获得空前的生命力。

人有时是要过瘾的。例如在高境界的精神领域内漫游。但过瘾的作品实属不多，《刽子手之歌》算是一部，但又是外国的。好在这部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于我们都有一些积极的意义，至少它沾带着现实主义的血缘基因，倒是不该疏远了才是。

（原载《读书》1991年第10期）

《刽子手之歌》〔美〕诺曼·梅勒著，邹慧玲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定价8.00元。

## 烈士墓碑上永久的敬辞 ——评唐晓波《铁山赤子》

李人韦

以从小在旅顺口老铁山下长大的金伯阳——1935年我党的《八一宣言》曾誉为“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那可歌可泣的一生为题材的传记《铁山赤子》，是唐晓波同志的一部很有功力之作。作者曾长期从事编辑、写作和地方史工作，近10年来，他对金伯阳烈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搜集、采访和整理，特别是在1990年离休后专心撰写，我们才看到了这部好书。

这部传记作品不仅史料翔实，历史地记叙了金伯阳烈士生于民族忧患之秋，受命于革命危难之际，战斗于关东的白山黑水之间，牺牲于风华正茂之年的英雄业绩，而且作品又力求把历史事实与思想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在时代矛盾与生活矛盾交互并存的基础上，对敌我斗争事件进行了合于历史风貌特征的集中与概括。作品以人物的成长过程作为记叙的基本线索，选取人物对信念的执著追求作为描写的着眼点，紧紧围绕人物的性格塑造来决定作品表现方法和语言调度，准确、鲜明、生动地描绘了金伯阳完整的形象，展示了他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那高尚的品格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尤其是作品抓住人物少年有志“音乐比赛见高低”，青年时期“罢工风潮涌巨浪”、“男儿宁苦磨傲骨”以及狱中悲欢、血洒战场等生活与斗争的主要片断铺叙渲染，既有总揽人生的俯瞰，又有于细微之处见功力的妙笔，常常伴随着生命的历程和壮美的青春迸发出人物精辟的思想火花，浮现那幽深感人的意境。同时，作品追求时代风云、地域风貌和自身个性风格的有机统一，在深入展示人物昂扬壮烈的情感领域和深化人物雪耻却辱的心灵层次，再现人物的胆识和功绩中，也不乏对那个时代与环境里劳动人民群众正直与善良、拥戴党的领导的记叙和描写，多方面地揭示了我党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才。作为历史，能产生金伯阳这样的抗日救国民族英雄是大连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作为传记，唐晓波的《铁山赤子》不仅在烈士的墓碑上刻下了永久的“敬辞”和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而且也透过先人的足迹提供了对现代人，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心灵启迪的契机，体现出作者愿把烈士们精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推向社会的努力和心声。从这一点上说，《铁山赤子》的确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原载1991年11月14日《大连日报》）

《铁山赤子》唐晓波著，大连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定价3.20元。



## 高层次的艺术追求 ——评长篇小说《骗泉》

洪 钧

通俗文学一直有着很好的传统，也一直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但是，目前一些打着通俗文学旗号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艺术品位粗劣，不堪卒读。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通俗长篇小说《骗泉》，似乎应该刮目相看。

《骗泉》写的是清末民初时发生的故事。通过一个受骗上当的书生，后来又是怎样骗人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魑魅世界。

按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题材。但是，于平淡中见新奇，于常见中显神通，这就需要作家有一套真本事了。小说以作家丰富的知识，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强而有力的概括能力，在纷至沓来的通俗小说林中，脱颖而出，从而实践了自己的高层次的追求。

《骗泉》也有着一些通俗文学作品的特点，即曲折离奇故事情节，险象环生、瞬息多变的场面，以及身份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但这又是一部有着高层次追求的通俗小说。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作家没有为那些关于通俗小说的司空见惯的说法所裹足，相反，却是独立不羁地做着自己的追求。作家写主人公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骗子，而是黑暗的现实，使他不可承受最终成了一个恶魔。作家对其心理作多侧面的、深刻而又必要的开掘。这就使人物的性格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立体化。

《骗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因为这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而放松了文化知识的传播。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为作家对人文地理、风俗习惯乃至历史掌故的熟悉而赞叹不已。这是我们读过的一些通俗小说时所见不多的。因此，我们认为，作家的这一追求是十分可取的。这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并没有为所谓的“消费性”去迎合读者，而是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追求。

我们肯定《骗泉》的创作，并不等于这部作品就是完美无缺的了。《骗泉》在出人意料的情节中介绍一些历史掌故与人文知识时还有生硬之处。这一缺欠与不足，我想作家自己已经认识到了。

（原载 1991 年 11 月 19 日《辽宁日报》）

《骗泉》冯精志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出版，定价 7.50 元。

## 展示企业家风采

——读梅宝恒长篇报告文学《多彩辐射光》

温金海

报告文学无可辩驳地具有浓烈的社会教化功能，弘扬正气，鞭达丑恶。在这一文学品类中，社会性与文学性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成熟与稚嫩，优秀与拙劣，主要也就是看它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否都达到了较高品位。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上，我们有理由肯定他说，鞍山作家梅宝恒的长篇报告文学《多彩辐射光》是一部成功之作。

《多彩辐射光》以富有文采的笔触，生动传神地再现了辽宁省鞍山市轧钢厂锐意革新、艰难进取，从负债五百多万元的亏损企业翻身成为年创利千余万元的创利大户的曲折历程，塑造了有思想、有才智、有魄力、有人情味的新型企业家刘中志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对外开放进程中工业企业的风采。

在肯定近几年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时，我们无法回避工业题材创作的薄弱与不足。在零零散散的工业题材作品中，我们断断续续看到一些舞场上、情场上、家庭中的厂长经理。以这个窗口透视中国工业和工业企业家，与其说是作家们找到了一个新视角，莫如说是他们在面对城市、工业、时代高科技时掩饰不住的陌生、隔阂乃至反感和由此并发的窘迫与难堪。我们许多作家从农村土生土长，骨子里流淌着的是农民的血液，在描写农村时他们可得心应手操作自如，一旦视线投向城市和工业，就难免捉襟见肘。在这种文学背景下去看待《多彩辐射光》，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欣喜。梅宝恒是《鞍山日报》的一名老记者，数十年来一直负责工交新闻的采写，对工业企业相当熟悉，没有隔膜感，写作此书前又在轧钢厂蹲了两个多月，因而这部作品能够深入纵深地带，正面展示企业的创业画卷。通过对企业家拼搏历程的追踪，令读者得以充分领略企业在困境中崛起的种种苦辣酸甜。

近几年，描写先进人物、模范人物、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并不鲜见，且佳作不少，但不足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的作品回避与主人公身份相符的人物行为的主体部分，只突出其某个侧面的业绩，写政治家不写其政绩光强调他如何艰苦朴素，写企业家省略经营管理只突出他怎么体贴职工，写警察不写他如何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而一味渲染他如何照顾孤寡病残者。这固然能迎合特定时期的政治宣传需要，给读者带来某些情感满足，但人物的行为与身份，总有名实不符之憾。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也就难以达到立体与丰厚，那些政治家、企业家的称号，成了空洞的躯壳。我认为，当今文学要回避政治与经济，根本不能扣紧时代主脉，把握历史的深层律动，不可能成为大作品。同样地，描摹工业企业，脱离经营管理，脱离经营活动中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感所触，就根本写不透写不活企业和企业中形形色色的人。从作品本身可以看出，梅宝恒深明此理，他以饱满的热情正面切入，浓墨重彩地展现、刻画厂长刘中志全身心、全生命投入企业建设，运用渊博的专业知识，卓越的管理才能，使一个破败不堪、负债累累、人心思走的工厂转危为安，扭亏为盈，成为鞍山第一家合资企业，辽宁有名的创汇大户的艰辛历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形象。

工业题材一直被认为难写。的确，烟囱和高炉算不上什么景致，生产线

的运转也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工人的操作必须一丝不苟容不得有丝毫浪漫。这一切似乎很单调枯燥。但单调的只是表相，工业企业中照样有个缤纷天地，那里的人们心灵是斑斓多彩的。《多彩辐射光》写工业，最成功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写活了工业行业中的人。刘中志的上下奔波，与外商的机智交锋，读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把握住了人，写活了人，枯燥的工厂顿时获得了艺术的灵光。

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亏损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普遍存在，如何搞活搞好大中型企业是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多彩辐射光》并不是简单地为搞好大中型企业总结经验教训，但从轧钢厂成功之路的展示中，人们自然而然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此书的出版也就更有其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鞍山市作家协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一批有才华的作家深入大中型企业进行调查、采访、考察，准备陆续推出一批反映企业变革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无论是对文学繁荣，开阔文学家的眼界，促进文学界与企业界的交流，还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皆大有裨益。也许有些人会不屑于此，并视这些报告文学为“广告文学”。我倒觉得，广告文学与非广告文学必须严格区别，绝不能一写企业，一写企业家，一写先进人物，就斥之为广告文学。广告文学是指纯粹为了经济利益，不顾描写对象是否具有宣传价值和将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宣传效应的胡乱吹捧。这种文字不可称为文学，文学是严肃的。事实上，鞍山市作协在挑选描写对象时是相当严格的，所选择的对象是经得来自不同角度的检验、推敲的。报告文学以弘扬正气、鞭挞丑恶，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完善为天职，那么，只要是值得宣传的，对社会有益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去做。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文学何以生存与发展，这一问题已为人论争多时，近年人们倡导文学界与企业界联姻，而一种联姻方式便是文学界被动地接受企业界的经济援助。我觉得这种联姻还仅是较低层次的。鞍山市作家协会严肃认真地与企业界联合，共同探索发展社会经济，充分发挥文学的主观能动性，用文学这一独具魅力的方式为社会做一些更有意义之事，这种联姻方式，我以为是较高层次而值得赞许的。

描写先进企业和先进人物的作品已有不少而且还将增多，他们有个共同的缺憾是就事论事，孤立地为某个先进群体或个人树碑立传。企业与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是息息相关的，孤立去写某个人物的荣辱悲欢，固然可写得精彩动人，社会内涵却总是有限。倘若把他们置于社会大背景下加以审察，宏观把握、理性思辨与微观剖析交错结合，作品容量必然大增，其意义也就不仅宣传某个企业或某个人物，而是可以让读者透过这些表象感受到更为深沉、广博的东西，感受到历史的足音和民族的心律。这样，作品必然给读者带来更为强劲感染力和震撼力。在这一方面，我以为《多彩辐射光》像其它许多作品一样，有所欠缺。

（原载 1991 年 12 月 7 日《文艺报》）

《多彩辐射光》梅宝恒著，沈阳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定价 4.00 元。

## 时代的感悟与自觉

——张琳《五彩星光》逸谈

李人韦

老作家张琳的报告文学集《五彩星光》收集了作家 1982 年以来创作的 19 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对生活中一些富有新意的事件进行采撷的同时，描绘了人们奋起的身影，突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心灵上的步履，体现了作家对时代发展脉搏的敏锐、独到的感悟和把握。

缘起于为农村改革大潮乍起之时的人情世态状貌写真，是张琳早期报告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作家笔下的养猪专业户苏玉兰，奶牛专业户李嘉国，养虾专业户王宝典，文化专业户周尚元，海岛承包户刘丕成夫妇，个体批发货栈经理崔连臣等，他们大多是从困顿中走出来的实干家。作者抓住特定环境里人物奋斗的足迹，以事实表现了新一代农民身上的品质、胆识和作为。当然，人们在历史交替时期那特有的徘徊心理，尤其是“文革”余悸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重负，使得阵痛的发生不可避免。一个被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的富农子弟，不时受到一些人“阶级眼光”的诘难（《烈马驾辕》）；一个敢于承包鱼塘的“钓鱼郎”，却在享受自己劳动果实时忐忑不安（《北国江南钓鱼郎》）。诸如此类的现实描写，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作家从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上来认识农民在奔富道路的羁绊和他们摆脱种种羁绊的努力，其睿智而自信的理性认知，常常聚结为一种共同的信念——“只要政策好，一切都会改变的”——由此传达给读者一种经历岁月的颤栗和释解困顿与迷惘后的使命感。

当我国改革开放的涓涓细流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潮之后，张琳的报告文学创作，也由“走马观花”式的农村采访，转到了作家亲身生活的城市里改革开放的记叙与描写上。伴随着作家对生活体验的趋深，张琳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从生活底层人物的悲喜忧乐中，贴切地描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也具有了对历史嬗变过程中诸种复杂社会因素的作用，以及对深藏在人们心底的一些不和谐性所进行的宏观的、多方位的观察视角。在《晚霞辉煌》中，作品不仅写出了刘金堂这个说话实在、耿直，偶尔还露出几分粗鲁的汉子晚年在事业上大放异彩的先进事迹，写出了他在企业面临困境中抓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抓企业环境改造，抓生产人员出国培训等方面的具体过程和做法，也写出了他带领全厂职工取得一连串让日本专家都感到惊奇的效益背后——依鉴刘邦知人善任的古训，既有对改革开放大趋势所做的很有分量的剖析，也表达出作者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中兼取二者之长的思考。在《光明交响曲》和《五彩星光》中，作者不仅描写了以科研为先导的“转轨变型”、“军转民”生产中一系列矛盾和困扰，突现了商品竞争带给科研战线的冲击，记叙了“以销定产，以产定研”的改革思路，而且开掘了改革人物在形势逼迫下他们的心理从脆弱走向成熟的过程，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大潮中一些似是而非的动向作了精深的透视，从扬利抑弊的选择中揭示了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内容。在《海阔天空》中，不但较早地报道了“劳务出口”这一开放中的创举的产生过程，而且写出了劳务输出人员闯海之“苦”，受苛刻之“辣”，国外影响在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相交而生之“酸”，以及成功之后的“甜”，表达了走一条自力自强、极富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大路的必胜信

念。

由此观来，作家张琳在写报告文学方面的成熟，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从社会的广角镜中折取了历史文化的花絮，从人物的奋斗经历中抒发了时代的情思，从心灵的寄所捕捉了艺术表现的灵感，更在于这些作品反映出了 10 年改革开放的巨手是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面貌，记叙了我们国家、我们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而激励着人们来适应已迈向的新时代。

（原载 1992 年 2 月 8 日《大连日报》）

《五彩星光》张琳著，大连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出版，定价 4.20 元。

画面丰富 资料翔实  
——《中国古建筑美术博览》观后

邓 濯

中国，因具五千年之悠久历史而素有东方文明古国之称。我们的先人以其勤劳和智慧，在这片广袤丰饶的神州大地上，世代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绮丽恢宏、异彩纷呈的古代建筑群。像北京的故宫、承德的避暑山庄、曲阜的孔庙、苏州的园林等，无不在中外建筑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焰。中国的古建筑艺术，早已成为世界上一种有代表性的建筑体系。基本结构建筑形式，曾直接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而独具特色、蕴含着诗情画意的园林建筑，从18世纪以来，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造园艺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内容非常丰富等特点，致使中国的古建筑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用途中形成了多种门类，如宫殿、寺观、园林、陵墓、城关、桥梁、塔、楼阁等，而这些综合性的艺术建筑群体，无一不以广博地融入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工艺技巧而彪炳于世。

从西安半坡村的遗址，我们今天仍可以窥见氏族社会集居的建筑情况。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互相攻伐，筑城、筑台的工程急速增多。各国诸侯都有豪华的宫室、台池及园圃，相传齐国都城临淄有户7万，可见当时城市建筑的规模。秦朝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修全国驿道，迁天下豪富10万余户于咸阳，仿造六国宫室建阿房宫，大修陵墓，调动数10万民工服役，造成空前未有的建筑高潮。西汉经数10年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开始在长安西部建上林苑，“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其建筑规模之大，蔚为壮观。东汉佛、道始兴，佛寺道观的大量涌现，使中国典型建筑踵事增华；其宫殿、府第、花园、别墅的修建比之西汉更为精丽。南北朝时期，佛教极盛，南朝的建筑就有480处寺院，北朝的洛阳龙门、大同云岗、敦煌莫高窟等处的石窟寺绚丽夺目，其雕刻绘画之精及内容之丰堪称举世无双。及至隋、唐两代，长安、洛阳已发展成为最大的整齐雄伟的规划城市。隋时的赵县安济桥，唐代大殿木结构的五台山佛光寺，都可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宏大、雄伟以及优美的建筑风格。宋朝的木结构建筑，诸如殿堂楼阁，虽不失唐代宏伟刚健之风貌，但秀丽绚烂则过之。明、清时代的建筑，在宋、元的成就上又有所发展与创新。明代建筑以砖城、宫殿最为突出，成祖时期建筑之盛达到高峰，如南北两京及其宫殿建筑均以美轮美奂、富丽堂皇而著称于世，而当时重修的万里长城今日仍以其独具的雄姿逶迤蜿蜒于崇山峻岭。清初曾大建喇嘛庙，承德外八庙建筑群体，显示出汉、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成果。继之园林建筑空前发达，凡皇帝游踪所及，园林即随之兴起，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的发展，标志着清代建筑史上的重大成就。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绵延了悠远的时代，屡经战乱，数度兴衰，外患频仍，辉煌的古代建筑也历尽沧桑，曾遭到来自各个方面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要提的是，咸丰十年，毁于英、法联军大肆焚烧抢掠之手的世界建筑艺术精英——圆明园，现在只剩下断垣颓柱供人凭吊，发人愤慨！所幸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没有像古巴比伦与爱琴文化那样陷于终断和泯灭，时至今日，历

史留下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瑰宝，也同金字塔、巴黎圣母院、圣·彼得大教堂、伦敦议会大厦等举世瞩目的其他各国建筑一样，巍然雄峙于世界建筑艺术之林，吸引着千千万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观光考察。本着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繁荣中国建筑艺术的目的，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建筑美术博览》大型画册。作者白文明同志历时数年，行程万里，精力和体力承受着严峻的考验，完成了除台湾以外 29 个省、市、自治区 400 多处古建筑的考察，撰写了 20 余万字的文稿，收录了 4000 多幅包括写生和临摹的照片，几乎将所有古建筑典范及某些装饰艺术搜集无遗，而又分门别类地作了论述，终于完成了这部画面丰富、资料翔实的中国古建筑艺术工具书。该书共分三册，第一册系古建筑门类和造型，包括：宫殿、寺观、喇嘛庙、清真寺、石窟寺、楼阁、园林、名胜、陵墓、塔、城关、桥梁等十二章。第二册系古建筑的构件和单体，包括：天花·藻井、台基、栏杆、柱和柱础、格扇门·窗、雀替、脊饰、照壁、牌坊和华表、经幢、碑碣等十一章。第三册系古建筑的材质和工艺，包括：彩画、壁画、木雕、石雕、砖雕、琉璃、金属雕铸等七章。该书作者在自序中说：“如果这些资料能给古建筑园林设计、维修提供一些参考，给现代工业美术设计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给国内外旅游提供一点艺术性的导游，提高我们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就是我此举的唯一目的。”我想，本书出版后，作者的善良愿望，包括为之付出的心血，决不会付诸东流的。

（原载《美术之友》1992 年第 2 期）

《中国古建筑美术博览》（一函三册）白文明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出版，定价 195.00 元。

名家荟萃 画幅神奇  
——《西游记》连环画全集出版

邓 濯

众所周知，《西游记》这部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小说，不仅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优美的艺术形式。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创造了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这些故事早在我国民间甚至在国外广为流传，深受人民大众的热爱。从30年代开始，伴随着连环画艺术的产生，《西游记》便被改编成连环画形式来出版。几十年来相继出现过不少的版本，但是这期间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将这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巨著改编出齐过。1988年春，辽宁美术出版社领导班子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从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丰富连环画艺术宝库、以此来加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长远目标考虑，决定拿出一定的精力和财力，搞一部冠压群芳的完整的《西游记》连环画。这一决定，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连环画评奖的知名连环画家们的重视，他们钦佩辽宁美术出版社领导的魄力，即在连环画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甘愿赔钱为祖国文化出版事业做一份贡献的精神，于是纷纷欣然接受了《西游记》连环画的约稿。

《西游记》连环画系32开精装本，全书共10册，包括45个完整故事。整部连环画的绘画创作是集全国数十位连环画高手通力合作来完成的。有上海的黄全昌、陆华，南京的高云、胡博综，山东的陈全胜，北京的于水、孟庆江，四川的欧治瑜、徐恒瑜，天津的赵国经，黑龙江的史殿生，辽宁的王弘力等连环画名家。这些画家在全书的总体上采用的画法是一致的，都是用中国传统的白描画法，即通过线条来表现所画物体的立体感、质感、空间及距离的，这种方法表现的画面给人以清晰明快、遒劲圆转的感觉，如果不具备我国传统绘画的高超功力，是很难掌握这种画法来完成此稿的。他们在创作的风格上又可谓各具特色：有的线条流利娴熟、洒脱活泼，有的则顿挫转折、遒劲飞舞；或如春蚕吐丝、精秀细劲、流转自然，或韧而如折钗，笔触如锋斫，刚劲有力。总之，全书所用的线描都具有足以表达画面意境的力量，能使欣赏者得到充分的审美情趣和满足。

《西游记》连环画通过把文学语言改变为可视形象来构成这部神话世界，需要画家们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才行，当然，这决不能靠画家主观的凭空想象。为了塑造出书中统一的人物形象和典型环境，数十位画家们曾到过我国许多的佛教名胜之地搜集素材，如，庄严祥和的神佛仙长的形象有不少是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他们在创作上既来源于生活又各施其才，大胆而自由地张开艺术想象的翅膀，来展开他们的一系列艺术描写和形象塑造。很多人物造型，既有社会化的个性，又具超自然的神性，特别是画面上的各色妖魔，被赋予了某些动物的特性。如，孙悟空乐观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玩世不恭，调侃幽默的性格，与神的莫幻莫测，猴子的急躁敏捷动作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猪八戒粗憨莽撞，好吃懒做极具猪的特色；狮魔的愚蠢凶恶；大鹏怪的阴险狠毒；鼠精的刁钻狡猾；牛魔王的蛮横粗暴……画家们结合原形动物的各种特点，把这些妖魔描绘得姿态不同，面目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翻开《西游记》连环画，读者还会被那



神奇的画面所吸引：风光旖旎、景色优美的花果山；祥云缭绕、庄严静穆的西天世界；淫威森严的天庭；阴森恐怖的地府；晶莹剔透的龙宫，黑气氤氲的妖洞。神佛僧道，金刚力士，妖魔精怪，虾兵蟹将，分置其中，构成一幅幅绚丽神奇、变化无穷的画卷。这些画面融现实于神话，表现了画家们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力。

《西游记》全集连环画在改编上也是成功的，基本上保持了吴承恩《西游记》原著的风貌，剔除了原著中的糟粕，诸如许多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故事情节，由于文字简练活泼，语言富有个性，使改编后的连环画故事趋于完整集中，更具可读性。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西游记》全集连环画，历时四年，是我国至今一部最完整的《西游记》连环画，绘画上集全国数十位连环画名家共同创作，全书的装帧设计既具 90 年代最新书籍装帧风格，又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印刷质量上堪称国内最高水平，所以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与收藏价值。该书在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评奖中获特别金奖，在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一等奖。它的出版，为繁荣我国连环画出版事业，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原载《美术之友》1992 年第 2 期）

《西游记》（连环画，全 10 册）赵敏主编，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出版，定价 200.00 元。

## 春意款款秋梦迟

——读王金屏散文集《迟到的秋梦》

鲁 野

读王金屏散文集《迟到的秋梦》，如嚼他的山东大枣，甜香、清脆，余津无穷。一篇篇诗一样的美文如夏夜的山泉铿锵而歌；一幅幅画一般的境界如雨霓虹影架起了鲜活多彩的人生。

到处看山山不同，并非都因作者身在此山中。读者身临其境，也会找到自己独特的欣赏角度，读金屏散文我的兴奋点首先凝聚在作者托物言志的妙处。金屏在其所言所咏的物中实实在在地倾注了自己大量的真诚。物我两知，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寄我情，我寓物性。托物言志，物我两知。使那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荞麦、石榴、夏蝉、绿叶、红枣以至灯、水、牛无不富有感人警世的人情。

首篇《荞麦，迟到的秋梦》，作者轻轻一跃而跳出《爱莲说》等名篇典范的直抒胸臆单纯比拟的模式。作者首先描述了三秋不见丰收的贫瘠土地上一幅奇景，然后写作者与老汉的生动对话。而老汉补种荞麦，对荞麦的救苦救难的寄托，又焉知不是“我”对荞麦品格的赞美？且不说这种侧面烘托比之直说直侃当收曲径通幽之效。单说“我”从荞麦这迟到的秋梦中省略了多少直白，凝聚了多少深情的角度，读者便会捕捉多少丰富的联想啊！金屏年近50的秋梦，仍不乏春意款款的俏丽，荞情者“我”情也，荞梦者“我”梦也，物我之间情近意和。

在《夏日说蝉》中，他并不回避与古人选材的重复。他善翻古意，抒自己之情。蝉乃大自然的生物状态之一，其本性并无善恶。古人咏蝉大都不离寄情于物的套路，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柳永的《寒蝉凄切》都不免寄托着怜人怜己，牢牢骚骚悲悲切切的情怀。金屏有过“错划”劳改的经历，完全可以套用他山之石，以蝉喻己，顺理成章。但是那样落套的承袭远非金屏之所求。他一翻古人之意，独开一蹊，从夏蝉爱唱高调，工于变化的两大本能描述了一种常见的品行。而这种俗性正是金屏之所恶。金屏对夏蝉的生存特性赋予的社会性、人性便是金屏自己褒贬爱憎的个性。作者虽不讳言对夏蝉之贬，但绝无煽动群情共诛共讨之意。只是“我想，世上没有蝉也许更清静些”。

《蜜蜂的命运》中，我对蜜蜂的感情由恨变爱似乎与杨朔《荔枝蜜》相近。但是通篇构思绝无《荔枝蜜》的影子。《荔》文借蜜蜂勤奋酿蜜之特点颂劳动人民辛勤奉献之高尚风格。而《蜜》文则在其劳动之外纵横开拓。作者把蜜蜂视作一种人，一种奉献型的人。作者以诚恳爱戴之心探视这种人的命运，发现了一个复杂深邃的主题。悲剧、喜剧、偶然、必然都在这一主题的广阔与深邃的背景中发人反思。作者对蜜蜂命运的感叹、思索，显得多么亲切。

深文隐蔚，弦外之音是刘勰所说的“文外之重旨”，作者言物、托物、咏物皆在词外寓满自己的深情。物我两知亦是赋予物以人的灵性使其与人性相通。金屏在集子的许多篇什中都把物性我情溶为水乳，达到感人而不训人，警人而不失人情的境地，实在是高手之作。

(原载 1993 年 1 月 18 日《辽宁日报》)

《迟到的秋梦》王金屏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定价 4.10 元。

## 让生活多一些爱

——读《鲁野康启昌小说选》

金 河

志同道合，作为一条主要择偶标准，无论老少，一直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玫瑰梦。不过向来是求之者众，得之者寡。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就是鲁先生与康女士志同道合的果实。

命笔之初，这二位都钟情于散文。三年前出版的散文集《心心集》，两年前出版的散文集《耐冬·黄叶》，都是康启昌和鲁野的散文合集。也许如山野之泛烟岚，川读之蕴珠玉，厚积而发；也许是对文学的特有灵气和觉醒，虽起步嫌迟，但出手不俗。所著散文情感真挚细腻，文字明丽晓畅，章法严谨考究，见仁见智，尽成滋味。

康、鲁二位志同道合，说来也真同得够水平，“合”得够层次：两人在主营散文的同时，又都兼营小说创作。康启昌执笔的中篇小说《西城泪》，短篇小说《水远山长》、《暮春时节》，鲁野执笔的短篇小说《灵魂的接触》、《碧水东流》、《父子情恨》等作品，又都取材于爱情、婚姻、家庭。从数量上看，每人六篇，秋色平分。

康启昌在小说集的《后记》中披露：“集中小说虽然各自署名，实则均系我二人共同创作，从酝酿构思到推敲定稿无不流尽二人心血……编书出集时，为了便于探索个性，把原署二人姓名的公共财产归还给原执笔起草者，这算是合久必分吧，但其实仍是分久必合。”

他们共同唱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赞歌，共同谴责没有感情婚姻的不道德，共同揭露爱情之外因素对婚恋的侵犯和不正当性行为的邪恶与丑陋。

同是爱情婚恋小说，但细读精品，康、鲁二人的作品的确有个性的显现。康启昌的小说更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她把志同道合和精神世界的汇通作为爱情的基础，把爱情作为婚姻的生命，力图构筑或张扬一种爱情、婚姻的理想模式和道德规范。爱情的神圣眼睛里容不得半点实用主义的庸俗灰尘。非甘泉不饮，非梧桐不栖。甘泉、梧桐不可得，爱情之鸟宁可与焦渴和孤独为侣。鲁野的小说则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辨和对社会学的关注，更注意到中国腐朽的肉欲、占有欲和西方“性解放”观念对健康爱情、婚姻的伤害与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震荡、感情惶惑和人际关系（包括血亲之间关系）的扭曲与毒化。

从对生活的观察视角看，康启昌多站在女性的角度，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美妙追求与冷峻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往往使女主人公幽愤忧思，哀怨凄惋，寻寻觅觅，飘若转蓬。创作主体和艺术客体的特征，规定了康启昌小说叙述语言的个性：清丽纤巧，细针密线，句态袅袅。鲁野多从男性的角度观察和解读生活，或爱或憎，虽不乏细腻的心灵涟漪，但着墨多在表现男性主人公比较外向的热烈、旷达、爽直以及可爱的粗犷。鲁野小说的叙述语言自然也就挺括、峭健，兼有机智的幽默和属于年轻人的调侃。

上述评论，只能说是直观的、浅表层次的、感性的评论。关于艺术哲学、审美取向和文体特征方面深刻、系统的文章，还得留给文学评论家们去做，自知力不逮也。

小说集的《后记》有云：“梳理旧时的离恨别愁，痛悼流逝的青春岁月，我们以过来人的成熟与忧虑由衷惦记着那些今生今世也无法成为眷属的有情人。”这似乎可以成为他们爱情小说创作动因的注脚。但仔细思之，又觉得没有充分道出选择的理由。

康、鲁二位又有一种可贵的使命意识。他们在为夫妇间感情的笃厚与生活的和谐而欣然的时候，便萌生了一种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的劲头。他们希望以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发出由衷的呼喊和劝戒：净化爱情，抨击陈腐与丑陋；尊重选择，普及情人眷属的家庭模式。善良的期冀能否收取理想的效果很难测定。但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旨趣却无疑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

作者对充满爱情婚姻的呼唤和礼赞说明着爱情婚姻的匮乏。其实生活中缺少的不光是性爱，我们不也应该以同样的热情呼唤和礼赞普通的同志之爱、人际之爱么？如果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如塑料花或绢花，样子像花，但却没有生命和芳香，那么，缺乏爱心的同志关系、人际关系则像篱笆墙，尽管彼此相连，但缺乏心灵的沟通，相连变成了有害的掣肘，害人，也不利己，同样是不道德的。

让生活多一些爱吧！

（原载 1992 年 3 月 21 日《文艺报》）

《鲁野康启昌小说选》鲁野、康启昌著，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 年 9 月出版，定价 5.95 元。

## 爱情诗篇

——读《鲁野康启昌小说选》

马石利

向以散文创作的实绩而引人注目的鲁野、康启昌，又推出了他们的小说合集。为文之妙，令人惊喜。

他们赞美诚挚深笃、刻骨铭心的爱。在他们笔下，陷入了情海的男女主人公都十分的痴情，对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更是感人。《西城泪》中的姜小砥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她对“意中人”的思恋可说是深入骨髓，她千里寻访，奋不顾身。这种对爱的深刻追求，实质上体现了对理想的追求——“意中人”正是理想的化身。但由于社会的阻力、人为的束缚、传统的观念等种种原因，追求不一定都能成功。鲁、康夫妇的小说逼真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品中的许多痴情女子，一旦初恋失败，竟可一人独处，或携女寡居。在这些人物身上，作者表现的绝不是封建礼教的从一而终。由于她们都是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新的一代，除了爱情的追求，还有事业的进取，精神另有支柱。对于这样的人物来说，爱情中任何非情感因素的掺入都是不能容许的。姜小砥挣脱无爱的婚姻的勇气和作为，在我国新时期的爱情、婚姻小说中都是罕见的。康、鲁二人在表现爱与婚姻的种种复杂关系的时候，也时时地关注着爱与道德的冲突，他们认为只有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一旦爱的实现须以他人正当幸福的毁灭为代价的话，这爱就不美、不道德了。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看到对于爱的痛苦的巨大的自我牺牲。

鲁野和康启昌也十分注意爱情、婚姻的社会内容、时代特色和历史积淀，通过这些，表现出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伦理道德风貌。

《一阵狂风》中的管大豹，他杀人而又自毙的悲剧固然离不开自身性格的弱点，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的原因，这其中有历史的积弊，也有现时代的阴影。作者循着人物的性格发展轨迹和犯罪心理的流程，挖掘出造成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父子情恨》中的李盼本是个朴实善良有理想有志气也有自己的爱的姑娘，但最终导致朴实的丧失、志气的泯灭和爱情的禁锢与失落。作者通过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的描写和生动而具体的表现，使作品有了较深刻的内涵以及现实的意义。

康、鲁二人的风格是不同的。康启昌文笔清丽纤柔，长于抒情；鲁野文风爽健幽默，富于思辨。康启昌乐于对人物做纵深细腻的心理剖析，她良好的艺术感觉更多表现为对人物心态神态的体察；鲁野则善于描画人物富有个性的行动与语言，他的艺术知觉较突出地体现为对人物举止言行的感受。由于两人共同构思的原因吧，他们的小说结构都长于开篇铺设悬念，引人入胜，使人读不释手。

（原载 1992 年 7 月 12 日《中国文化报》）

## 《中国公案小说史》简评

朱眉叔

黄岩柏同志的专著《中国公案小说史》问世了。我作为他的老友，自然为之高兴。其实，不仅高兴，也长吐了一口郁结之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有的学者这种话，听来就够令人窝火了；孰料又有国外学者说：整理中国公案小说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他们肩上了。这话就更令人窝火了。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共同财富，我还没有小气到不准外人染指的程度，而是自愧不肖，未能尽整理优秀遗产的子孙之责。今天看来，国外有的学者的话成了岩柏写这部《中国公案小说史》的动力之一，他有志为国内学术界争了一口气。尽管这部书可能有不够尽善尽美之处，它毕竟是国内首创也是世界首创。几年前，林辰同志筹划编辑的《三稗丛书》中，就有《中国公案小说史》一项，他是此书的始作俑者。岩柏在他的倡导下完成巨制，还有很多国内学人写了一些有关公案小说的论文，这种重视公案小说研究的新局面的出现，怎能不令人扬眉吐气呢！

岩柏一向治学态度严谨，重视运用科学的方法，在这部小说史中充分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他习惯于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科研成果。我曾嫌岩柏完成此书迟缓，可是他不率尔操觚，非“怀胎十个月”不可，决不肯“早产”。几年前，他就开了《中国公案小说史》这门选修课。在悠长的反复讲授过程中，他不断地充实资料，听取师生意见，检验这部书稿中知识、理论、评价的准确性。长期教学实践的结果，保证了这部书的高质量。

其二，他重视占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为完成这部小说史奠定坚实基础。这部小说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资料丰富。他不囿于鲁迅《中国公案小说史略》所提到的《施公案》、《彭公案》等有限几部小说，而是从中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竭力搜寻。从浩若烟海的小说中发掘出大量的长的、短的、文言的、通俗的公案小说或公案小说片断，介绍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公案小说作家和作品。岩柏这番发掘工作是披沙见金，需要时间、精力，更需要鉴赏力。下如此苦工夫占有如此丰富资料，反映他重史实，不尚空谈，完成的是一部血肉丰满的小说史，而不是干瘪的徒有其名的小说史。

其三，他首先明确这部小说史的研究范围，以防旁支侧出。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阐述了公案小说的概念。在论述中既有公案小说和“侦探小说”、“断案小说”、“法制小说”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结合历史上公案小说实际的探索，还有对今人关于公案小说解释的驳论。其目的是通过明确公案小说的含义，确定公案小说的界限，为这部小说史确定研究对象，既防止论述泛滥，又突出这部小说史的特征。从全书看，他确实是用他所厘定的公案小说的概念，作为尺度，观察历代小说，决定取舍，而且贯彻始终。足证岩柏构思伊始，态度就是严肃认真的。

其四，他避免主观武断，尊重客观实际。今天所见的话本多数没有宋元刊行抄录的准确年代，难以百分之百肯定为宋元旧籍。岩柏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即使有所判断，也视作假说。如此慎重，反映了他治学的严肃性。

其五，他重视揭示公案小说史传承性的重要矛盾斗争。在历代公案小说的评介中，他总是有意识地突出“人治”和“法治”的两种势力、两种思想

斗争。这种反映历代小说规律性实质的态度是科学的。

其六，他长于考证，实事求是。《龙图公案》评点者“听五斋”，有的刊本作“听吾”或“听玉”。对此细节，岩柏不轻易放过，征引《周礼·秋官·小词冠》、《史记·周本纪》、《汉书·刑法志》，说明“听五”的含义，论证“听吾”、“听玉”的误解。这种明察秋毫、辨伪存真精神是可取的。

其七，他重视运用比较法写这部小说史。忽视运用比较法几乎是流行的文学史的通病，岩柏此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几乎随处可见运用比较法。运用比较法的结果，使读者了解一个时代内或不同时代的各体公案小说孰多孰少、高下短长、停滞昌盛、传承关系、消长趋势、历史规律。运用比较法评价如此浩繁的公案小说，自然是艰苦的劳动。岩柏不辞劳瘁，运用这一治史的科学方法，应予充分肯定。

岩柏此书有很多创见，或突破樊篱，或高屋建瓴，发人所未曾言。譬如：六朝以前无公案小说之迹可寻，几乎是一般研究者公论；但岩柏探索公案小说之源，远溯上古神话传说，介绍了司法之神、司法之圣、违法之逆、乱法之由；遍举先秦诸子书中司法寓言故事；评议两汉史传文学中殉法之哲、护法之雄、法外之侠，从中总结出公案小说形成的本源。论据确凿，分析透辟，使人确信自有法时代起，就孕育了公案小说的素材。又如：从来没有人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之类长篇小说和公案小说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有何关系。而岩柏独出机杼，一一列举这些长篇中公案片断，使人只有唯唯称是。再如：每个历史阶段的公案小说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什么，即使是治小说史的人也一时难以明确回答。而岩柏能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高屋建瓴，概括出一代公案小说的特征。这从每一章的标题中，俯拾可见。概括历代公案小说的特征，能给人以史的轮廓性认识，这也是创造。

岩柏寓教于史的思想，流露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他写这部小说史的目的之一，是知识教育，使读者掌握大量的、系统的公案小说知识。随之，读者一旦认识到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有如此丰富的珍藏后，势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目的之二，是通过他的介绍分析，使读者透过公案小说这一窗口，纵览几千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宫禁朝廷的违法乱纪，地方吏役执法清浊，市井细民以身试法的苦乐悲欢，乃至“无足美人”充当间谍所反映的民族斗争。其分析涉及社会阶层之广、社会问题之多、观点的进步倾向，足以培养读者在很多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爱憎感情。目的之三，他有意识地提示读者——特别是执法人员——借古鉴今，不仅要提高法制观念，激浊扬清，还应在执法过程中汲取古人的经验教训，改进执法工作。

此书一个比较重要的不足，是他已运用到唐及唐以前文言公案、宋及宋以后通俗公案这两部分中去的“统计法”，还未能运用到宋及宋以后文言公案中去；在这一部分中，他“被迫”使用“举例法”。从理论上，他认为“统计法”远较“举例法”科学，因为它反映出总体及各个局部的情况，都是量化的质，具有强得多的客观性，可以避免举例法的主观随意性。但是，统计法的基础是占有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资料；只占有一部分，那怕是相当大一部分，也无法使用。宋以后的文言笔记小说，总数约在1500种以上。每一种里，有没有公案小说？有多少？质量如何？有没有超过前人的新东西？这四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系统的二手资料可供利用，只有靠自己一种一种、



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去翻看。岩柏翻看了相当大一部分，所以能在宋后文言笔记公案这方面讲出许多独立见解；但毕竟还有欠缺。弥补这个缺欠，靠个人力量，没有十年八载之功，谈何容易！我希望他能妥善巧妙地克服这一矛盾，再攀一峰。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中国公案小说史》黄岩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定价（平）5.50元，（精）9.85元。

简洁流畅 独具神韵  
——读《小不点童话百篇》

吕 亚

捧起《小不点童话百篇》读给孩子们听，逗得个个雀跃欢快。这部童话集就出自我省著名童话作家盖壤之手。孩子们为什么喜欢童话呢？童话富于幻想和夸张，又有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但童话创作长篇居多。这部童话是以短见长，多是几百字为一篇，又是以中国的谚语、歇后语为素材创作的，很有民族特色，语言口语化，孩子们听起来很亲切。这是作者继《中国俗语故事集》后，写给孩子们的另一新作。

短篇不是简单，是智慧的浓缩。作者深思熟虑，提炼主题，剪裁结构，简洁流畅，小学生看得懂，幼儿听得明白，篇篇有声有色，结尾处又有画龙点睛之笔，既给孩子们智慧与哲理的启迪，又合情入理。这部童话百篇，为童话创作作了有益的开拓。

为这部童话集增辉生色，是著名画家丁午所作插图，采用漫画夸张的手法，生动有味，既增添了幽默的情趣，又描摹出一种独具的神韵。

这本书的封面装帧，那一个“小”字写得那么大，其意自然是不甘其小，小中可以见大，完全表达了本书作者的宿愿，也展示了装帧艺术家的良苦用心。虽是献给儿童的一本书，竟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此书不愧为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精品。

（原载 1992 年 4 月 28 日《辽宁日报》）

《小不点童话百篇》盖壤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定价 2.45 元。

## 一部伴着血与泪的警世之作 ——读《家教忧思录》

流 风

前些年报告文学创作曾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败坏着报告文学已获得的声誉。一些作者不愿意或拒绝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告文学主题，而靠一般浮光掠影的采访和主观臆想的编造，或者从书本资料中寻找和搬弄一些别人的思想，拼拼凑凑。表面上看，这样的作品可能花哩胡哨，很能迷惑一部分读者，实则急功近利，苍白无物，对读者对社会都是一种褻读。蔡永武同志撰写的微型系列报告文学集《家教忧思录》是一部扎实的作品。

《家教忧思录》虽然是一些平平实实（毫无矫饰造作）的文字，但却能让人品出一种痛心疾首的责任，一种与己有关的使命感。无疑作者的心地是真诚的，对青少年的家教问题是焦虑的，由此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搜集到这许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以扼要明晰的道理，剖析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各种表现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不良的家庭教育及其产生的恶果，从而回答日常家庭教育中随时可能遇到的一些其它问题。虽然不会引起所谓的轰动效应（作者也不追求轰动效应），却能因言之有物而引起读者的注目，从而获得社会价值。作品不求面面俱到，也不是长篇累牍，每一篇文字不过两三千字，但却较真实、准确地捕捉到生活本身的镜头，进行朴实的叙述和冷静的分析。作者在书中评说每起案例时，常从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字增强了这本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让读者产生阅读的亲切感，觉得作者诚实可靠，值得信赖。

《家教忧思录》是一本带有警世力量的书。八岁的儿子杀死了父亲；高材生成了扒窃犯；母亲把儿子推上了断头台……通过一桩桩由家庭教育不当引发的青少年犯罪的悲剧，令人震惊，催人思索。

毋庸讳言，当前突出的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已成为一个迫使人们不得不普遍严肃关注的社会问题，而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是子女走向人生之路的向导，可一些家长，他们往往只重视给子女在生活和学习上创造愈来愈优裕的物质条件，却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对子女进行必要的理想前途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法律意识教育。高尔基说过：“爱护子女，这是母鸡都会做的事，然而教育子女，这就是一件伟大的国家事业了。”而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少年儿童（包括一部分青年）家长的文化水平有相当一部分至今还在初中程度上徘徊，在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今天，如此的文化知识结构显然远远不能胜任对其子女的教育责任，并较难得到子女的信任。因为他们往往不很理解子女的内心世界，也不甚了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教育方法也有简单化的问题。甚至有些家长采取简单粗暴的专制手段横加干涉子女的一切。由于父母与子女在对待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形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对立，破坏了家庭生活的和谐气氛。于是，一些家长对子女学习和升学以外的事情，或溺爱放纵，或教育方法野蛮武断，或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致使一部分青少年仅仅只是为了摆脱这种家庭困境而混迹社会。应当看到，这些处于“朦胧期”的青少年在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难不与一些坏人合流或上当受骗的。也正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家庭温暖和良好的家庭教

育，形成子女与家庭的逆反心理和伴随出现的报复意识，促其以代偿和补偿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不法行为，甚至铤而走险，陷进犯罪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因此，书中诸多惨痛的故事在提示我们，要想提高家教水平，使我国的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成长环境，孩子们的父母必须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否则，当硬邦邦的手铐一旦套上孩子那娇嫩的手腕时，痴心的父母才如梦方醒，岂不悔之晚矣。难怪一少年犯家长曾流着眼泪沉痛地说：“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应当仅仅是孩子，还应我们作父母的啊！”这发自肺腑的自责，难道不是给所有当父母的敲响警钟吗？

（原载 1992 年 5 月 5 日《文艺报》）

《家教忧思录》蔡永武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3 月出版，定价 2.10 元。

## 《沈水知艺录》断思

曹 旭

捧读谢俊华同志著的《沈水知艺录》，思绪万千。卢梭说过：“为了认识人，就必须从他们的行为中去认识他们。”的确，读罢此书，人们会倍加认识和了解作者其人其文。这部论文选集与其说是以他10年来撰写的文章编就而成，倒不如说是他在艺术的殿堂里遨游而采集下来的丰硕果实而更恰当些。

俊华同志多年来一直供职于文化艺术单位，作为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像他那样博学多识，读百家书、踏千家卷的通才，尚属少见，这一点，从他的《沈水知艺录》一书中，可窥豹一斑。几年来，俊华同志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植根于广阔的社会土壤，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撰写了大量具有可读性和指导性的文艺评论文章。总观全书，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还是戏剧、舞蹈、音乐、摄影、绘画、曲艺等，无一不涉，并都有精到的品评、欣赏、议论和甄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省的文艺创作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把创作的触角深深伸向火热的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辽宁省涌现出一批新人新作。《沈水知艺录》中的《回头一顾百媚生——新时期辽宁省小说创作述评》、《新生活湍流中的浪花——读获1981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创作奖的短篇小说》等文章对我省的小说创作走向，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这期间成长起来的达理、邓刚、金河、王占君、李惠文等中青年作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文章分析说，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新时期小说创作比较好地解决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表现出与党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的联系。作家们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坚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给新时期小说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发人深省，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使人耳目一新。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开拓，艺术处理，美学追求，而且在小说的创作形式、风格、手法、技巧等方面，更加不拘一格，使内容和形式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

《情真意切，骏爽自然》和《笔端蕴秀写风神》两篇是评论著名散文家单复作品的文章。文章全方位、多元地展现了单复同志散文创作的历史走向。文章从单复青年时期的作品，一直写到其晚年出版的散文著作，跨度大，包涵深。文章指出，单复的散文，既有一幅幅描绘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大陆贫苦大众以及浪迹海外侨民的受难图，又有反映新中国火热生活场面的优雅华章，情真意切，具有浓烈厚重的抒情力量。他的散文不论是写景中情，情中景，还是烘托人物，都具有一种诗的意境，情景交融，气象开阔，颇具特色。从中还可以发现，单复经常用若干短句组成复句，并多以双音节词语或四六短句，错落于长句中间，形成一种抑扬有致、旋宕而进的节奏，潇洒中见自然。

谢俊华同志为满族神话舞剧《珍珠湖》写的剧评《民族沃土的奇葩》，把舞台上优美的神话故事，用文字理性地展现给了读者。《珍珠湖》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很多观众的喜爱，说明了努力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坚持走

民族化创作道路，艺术作品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的极端重要性。文章用美学的观点，指出这是在民族的沃土上开出的一朵奇葩，是祖国大家庭团结一致的象征。

俊华同志是刻苦的。他一有机会就潜心读书，把握艺术，体味人生，专心问学。往日不可谏，来日犹可追，不必说，今后俊华同志会有更多的作品问世。这，也是我的祝愿。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

《沈水知艺录》谢俊华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定价4.40元。

## 莽莽草原的乐章

——评萨仁图娅的诗集《第三根琴弦》

朱虹

我随着三弦琴奏出的美妙旋律，认真地读起了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的诗集《第三根琴弦》。

实际上，我很早以前就读过她的诗集，那是她的第一本诗集——《当暮色渐蓝》。我很喜欢她的诗，她的很多诗是令人回味的。随着《当暮色渐蓝》这本书的轰动，她的名字也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悉和瞩目。记得第一次与萨仁图娅见面，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名句、诗文如珍珠般从口中流泻出来，诗一样的语言，听起来飘逸、自然，就像她的诗一样美妙动听。

《第三根琴弦》是萨仁图娅的第六本集子，全诗分为自然、社会和人生三个部分，E弦、B弦和G弦三根琴弦。正如她所说的：“世界真是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自然、社会、人生是其几根弦，扣动我心弦共鸣。”真挚的感情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显示出这位蒙古族女诗人的诗才。

读萨仁图娅的诗，使我感受到她对大自然的真挚和淳朴的爱。

“……感觉植入自然，云和雾飘得十分惬意，融入无边幽静/我生命之旅中的夏/绿成一种情绪，蓝成一种心情/灿烂天边双虹”。

——《揽住这片山水》

读萨仁图娅的诗，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大漠的女儿的民族的豪情。

“因为景仰，才有辉煌的陵寝屹立在阿拉腾甘德尔梁上/由于无法遗忘，一代天骄的故事与莫名才这样源远流长……一个民族应该有一个魂魄，有了魂魄才不朽/才光耀日月/我倚日轮心逐草浪，找回一个形象”。

——《天骄陵前》

诗人在表现民族性格方面，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由具象而抽象，增强了诗的哲理含量，扩散着诗的抒情意味。

读萨仁图娅的诗，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她的爱情诗的纯与真。在哲人的心中，也许永远不会有纯情的季节，然而对于诗人，却是情也悠长，梦也悠长，总也走不出意若情牵的伊甸园。

“披起婚纱，挽起手臂/娇羞的红霞伴我当你的新娘/相视默默心弦弹唱/在圣洁的仪式纯情的微笑中/世界完成最美丽的形状……”

——《心诺》

实际上爱情诗是很难写的，因为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象。当然，任何诗人都难以通过他的创作实践全面地表现爱的本质，他们只能选择自己独特的角度，表现对于爱情的独特的感受，从而传导他们的美学观念与价值取向。萨仁图娅的诗是纯情的，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舒朗的情怀，描述着爱的甜蜜与芬芳。

“……生活，并非人群与风景/负有责任的爱才充满希望……”

诗是旌旗响入云歌是空气沁入灵魂/痛苦因此美丽而辉煌”。

——《相思没有眠床》

写到这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女诗人席慕蓉，她的诗是在日益发展的台湾工业社会诞生的，以浓郁的情愫描绘出一片多彩的属于心灵的圣地，她的欢乐和悲伤都是美丽的，她的诗也以其纯洁而感人肺腑。萨仁图娅的诗在精神内涵和风格上都与席慕蓉有所不同，她的诗风更加舒朗明快，也更鲜明地表现出生命的觉醒意识和人生价值的真实性。

萨仁图娅的诗，如果能更赋以哲理性，语言如能进一步雕琢得精当些，那么，她的诗将会奏出更加美妙的乐章。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4期）

《第三根琴弦》萨仁图娅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定价2.70元。



新的建构 新的探索  
——评彭定安专著《走向鲁迅世界》

李春林 臧恩钰

—

我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彭定安先生又贡献了一部力作：《走向鲁迅世界》。

作者在本书的自序《对外在世界的理解与内在世界的揭示》中指出：鲁迅世界是一个“双相结构”世界，既有世界万事又有对世界万事的评议，这是两个区分开又结合在一起的主客体世界结构。因此，对鲁迅世界的探索与理解，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的探索与理解——“透过鲁迅世界、鲁迅视界、鲁迅评估的‘眼’对世界的把握；而同时，又是接受者透过对‘鲁迅眼’的理解而形成的‘自我世界’与‘自我视界’，去对世界的把握。这样，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同时也就成为主体世界的自我揭示了”。本书正是如此：作者在总体立意上，是以“走向鲁迅世界”为视角，描述作者本人对鲁迅这个“世界”的观察、理解与诠释，以此为主要目标，来建构一个“理解与接受”的世界。作者以为，只有带有主观色彩的主体体验和“自身情怀”的客观——主观描述，才不仅是有个性的，而且才是必要的，否则，千人一腔，鲁迅研究事业也就寿终正寝了。这种建构不仅“新”在超越了其他研究者，也在于超越了他本人——他10年前出版的《鲁迅评传》，也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细心而又对彭定安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在那本书的某些段落、某些字里行间，发现作者的侧影，而这部新著，在这些方面更是大大增强了。10年前，作者称鲁迅为自己心中的“绿洲”，并且这一点确实反映在《鲁迅评传》中。而今，在这部《走向鲁迅世界》中，鲁迅已经成为他心中的整个宇宙了。这是一个具有三个层面的世界：世界本体（时间与空间的），鲁迅及鲁迅心中的世界，作者心中的鲁迅以及作者透过“鲁迅‘眼’”所看到的世界。亦因之，本书有了四种质素：人类历史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面面观；鲁迅本体、他的生平、思想及作品；浸染了作者个性色彩和诗情的鲁迅形象、他的方方面面；与鲁迅产生和声、发生共振的作者本人的理论天地与情感世界。四种质素的发生，源于三个层面的新的建构。

二

新的建构和新的探索还表现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资料的挖掘，新的研究见解的阐发。

作者说他要走向并带领读者一起走向的整体的“鲁迅世界”，主要有这几个部分：他的生活世界，他的思想世界和他的艺术世界。而这几个世界的展开与呈现，不仅是就着史料与事实从外在角度审视，而且有时也是通过鲁迅的心灵世界这个“眼”来加以窥探的。即是说，作者采取了新的研究视角：从鲁迅心灵世界去理解与把握鲁迅的整个世界。

在叙述赴东瀛仙台医专学习时，仔细描写了鲁迅不忍解剖尸体时的心理活动，特别是他在置面少女或婴儿尸体时的心态：“多么丰满、柔嫩、匀称，

‘造物主’多么精心地制造了这‘人’，年青的、幼小的生命正在生长着，突然停止了。”这是怎样地悲哀啊！他下不了手。“他从这停止了生命的人体中，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从已死的生命体上看见了活的生命体的内涵和珍贵，从而引起对活的生命体的尊重和爱护，燃起使生命免遭戕害的愿望。一种人道主义的思绪酝酿于他的心中。”将鲁迅对“人”的认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均与鲁迅解剖尸体时心灵的震颤联系起来，实在是新颖而又可信。而将鲁迅此时看见“死的生命”的心灵悸动又与他后来在幻灯上看到的“活的死人”时的震惊相对照，就更使人感到鲁迅的弃医就文，并非仅由于“幻灯事件”的突然刺激，而是彼时彼地“这一个”深蕴人道主义激情的鲁迅所采取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

更突出者，乃是作者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对鲁迅的创作进行了新的探索。彭定安 10 余年来在创作心理学方面有精深的、独到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写成了一部长达 50 余万言的巨制《创作心理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在全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反响。他对于鲁迅艺术世界的探索，正是凭借着自己在创作心理学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对鲁迅艺术创作的稔熟；它不独是驾轻就熟，而且确实有新的开辟，走向了一个新的世界。

《野草》是鲁迅创作中最为复杂、深刻的作品，论者对它的评价极多，也往往不一。彭定安则从鲁迅的创作心态入手，对《野草》进行了新的解说。作者认为，《野草》乃是鲁迅在战斗间歇的喘息、抚摸、倾诉、宣泄。“他如此作之后，便觉得‘毒气’、‘鬼气’的消逸，创伤的平复，心理的补偿，情绪的平衡，内心的充实。”同时，此期间鲁迅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兄弟失和），许广平又闯进了他的情感生活，这些使鲁迅的心理更趋复杂，或忧伤，或幸福；或哀痛，或欣慰……这无量多的感情都急欲宣泄，于是而有《野草》。因而《野草》“既是思想斗争的火花迸射，也是劳人的憩息，愁人的兴叹，恋人的情歌，痛苦者的呻吟，战斗者的歌哭，寂寞者的求友声。”——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对《野草》的思想蕴含最为全面与深刻的概括。而这种结论的做出，完全是由于作者从鲁迅创作心理——鲁迅的心灵世界——入手进行分析探寻的结果。至于《野草》的诸多艺术特征，也由于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分析，才显得更加深刻而准确。

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是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的新探索的又一突出表现。当然，所谓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往往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融而为一。不过，我们这里所谓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是指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于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重新审视和评估；而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则是侧重于新的研究范围的扩大，并不拘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一范围。

这部《走向鲁迅世界》，与其前身《鲁迅评传》相比，不仅保留了它的对于“思想世界”探索的深刻性，强化了对于“艺术世界”论析的精辟性，而且拓展了对于“生活世界”探索的宽泛性，亦即增加、充实、丰富了对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表现，而又能将其同作为一位伟人和战士的生活世界相胶着与关联，做到了完美的统一。

关于鲁迅家族的描写，关于鲁迅家族人物对鲁迅性格形成的影响的分析，作者在《鲁迅评传》中业已表现出一定的功力；《走向鲁迅世界》则显得更加具体精深，还增写了不少人和事。如在《评传》中，关于鲁迅的大姑母仅一句话：“大姑母死于一次翻船事故”，连名字都未能留下来。此次，则写了她的名字（周德），而且较前为详地写出了她的死因，不独透视出她

的性格，而且也反映出鲁迅家族的纷争，乃至对鲁迅心灵的影响。对于鲁迅曾祖母戴氏的描写，也多有增益，特别是突出了她因儿子周福清考中进士而大哭，认为他会拆家败业的独异意识与性格。还增加了许多其他更远的周家外围成员的介绍。所有这些，不仅使得全书更为形象化和有兴味，甚至构成了或一时地风情画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都同鲁迅性格的形成、对于人生的朦胧觉醒相胶着，而且与鲁迅的艺术才能与天赋的孕育相关联。作者甚至举出一些鲁迅作品或改著中的例子，与鲁迅家族人们的性格与言行相印证，显得极有说服力。

在写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与相爱之后，比《评传》增写一节“爱的痛苦”，将鲁迅面临这种爱时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但绝非仅仅是想象，而是细密的考察和在此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的推测），既表现出“人间鲁迅”的“人间苦”，又突现了鲁迅人格的高尚。并且在描写这种“爱的痛苦”的过程中，反映出几千年来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的戕害，也反映出“五四”时期人们道德观的多元化及复杂性。尤令人警醒和折服的是，作者认为，许广平与鲁迅的结合，不独是对鲁迅，而且“也是对于人民和民族的一个贡献”。作者站在历史高度观察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不独写出“人间鲁迅”的伟大，而且也昭示出这伟大是系于许多“人间人”对他的挚爱、奉献与浇灌。这也成为鲁迅为我们整个民族所养育的某种象征。

整个看来，对鲁迅个人生活世界描写的拓展，正是本着传主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也是生活……”》）寓伟大于平凡，在平凡中见伟大，——作者在对鲁迅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既是自觉地如此行之，又是于不经意为之，其实客观事物本身也正是如此。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的个人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自觉地依照马克思的此种观点，在本书中对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描述。所谓广泛，是指不局于亲人家族，而是旁及师友、乃至并无实际交往或交往不多却早已心神相交者；所谓深刻，在于作者笔下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决非史料之勾稽或堆砌，也并非为了使书中传主的生活更加充实而热闹，而是写出了传主与同时代人的思想、乃至心理与性格的双向交流或影响，更具象地也更深刻地揭示出鲁迅乃是时代之子，他的诞生与发展，均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方面，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的关系，是全书写得最见功力也最富感情的篇章之一。作者强调：“瞿秋白的影响，成为鲁迅后期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力和因素之一”；认为瞿秋白的文论（包括鲁迅论）正是鲁迅所期望的“操的是马克思主义枪法”；认为鲁迅与瞿秋白的相遇与交谊，不独是历史的偶然，且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时代风格和民族文化含量”。由此可见作者的迥于一般的史识与高屋建瓴的论述态势。

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往往离不开新的研究资料的挖掘与辨析。《走向鲁迅世界》利用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作者自己的挖掘，有的是作者在别人曾经提出的基础之上，又作了新的剔挖和辨析。如关于鲁迅祖籍的说法，历来不一，主要有两种：河南汝南说与湖南道州说。周建人提出的汝南说主要依据是家族人们外出时打的灯笼上写有“汝南周”三字。彭著认为“汝南周”中的“汝南”乃是封号，而非地名；

并据周福清履历所写始祖北宋著名道学家濂溪先生（即周敦颐），而他系湖南道州人，认定鲁迅祖籍是湖南道州。考订细密，辨析准确。彭著还认为鲁迅之小舅父鲁寄湘之长女琴姑曾对鲁迅衷情，并且鲁迅是知道的，或可与其灵犀相通。此事对鲁迅之思想、心理可能产生过影响，并折射于他的创作之中。

新的研究视角的切入，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资料的挖掘与辨析，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更好地写出作者自己心中的鲁迅，并以此表明，鲁迅确实是说不尽的。

《走向鲁迅世界》真可谓新见迭出，作者宛若一个导游，领着读者在鲁迅这一无限丰富、美妙和深邃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长廊中神游，他时而指点一下以前人们忽略的胜景，时而又用他自己特具的灯烛，从别人未曾到过的角度重新烛照，结果，人们发现此景较前更为佳妙。

而更为新鲜的见解，也是比从前更为深入、深刻的见解，还是他对于鲁迅艺术世界的剖析。有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不仅此书与《评传》相比，对杂文的研究大大加强了比重与分量，而且确实不独从政治思想内容角度，更从艺术和美学角度对鲁迅所创造的这一文体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当然，这是基于作者自己的《鲁迅杂文学概论》一书基础之上的。我们觉得最为深刻处之一还在于对鲁迅后期杂文的评价。通常依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认为鲁迅后期学会了辩证法，因而他的杂文设有片面性，对后期杂文评价要比前期为高，而且很有绝对化的趋势。彭著则指出，鲁迅后期的某些杂文也存在着“题材细小、具体、偏狭，主旨较浅，就事论事的弱点”，“同前期杂文中的那些美文比，同那些精粹之篇比，自然不免逊色。”但作者同时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杂文，后期不如前期。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这是严肃的、认真的、切切实实的研究结论。

至于本书对于《呐喊》与《彷徨》的艺术世界的探讨，则更加精采。通常都说鲁迅小说是中国革命的镜子（陈涌的“政治革命镜子”说，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镜子”说，冯光廉的“社会革命镜子”说），彭著却不执着于革命“类别”、“属性”的区别，即镜子所反映的对象的差异；而是着力于这面镜子自身的特殊“质地”，它反映中国革命的特殊角度：“以奴隶们的灵魂为镜子来反映中国革命的轨迹，这是鲁迅小说的特质。”不是正面地揭露与控诉，而是“哀与怒，都倾注于奴隶自身”。正是基于此，彭著对于鲁迅小说的总体立意与总体效应作了全面的、高度准确的概括。

本书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对于《故事新编》与《朝花夕拾》的研究显得薄弱。在这两个方面，作者都是极有功力的。我们期望着作者对《故事新编》与《朝花夕拾》的更具深度与力度的研究成果。

（原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走向鲁迅世界》彭定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定价19.00元。

## 后 记

《辽版图书评论集》编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表在各地报刊上评论辽版图书的部分文章，共计 228 篇。

图书评论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起着引导、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读书的导向作用；同时，能够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汇集书评资料，探寻编辑工作的得失，并向广大读者宣传、介绍辽版图书；同时，进一步推动图书评论工作，藉以不断提高辽版图书的质量。

本书编入的文章，有的出自专家和学者之手，有的出自一般读者和编辑人员之手。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部分辽版图书进行了评论，这对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向关心、支持我省出版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发表过辽版书评文章的报刊等新闻宣传部门深致谢意。

在编辑此书过程中，得到了省内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其他原因，编入的书评文章的质量肯定参差不齐，有些好文章可能遗漏或未被收入，请作者和读者见谅。

——编者

